

Thy Neighbor's Wife

Gay Talese

邻人之妻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house,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wif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aidservant, nor his ox, nor his ass, nor any thing that is thy neighbour's. (The Bible KJV)

[美] 盖伊·特立斯 著

木风 许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y Neighbor's Wife

Gay Talese

邻人之妻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house,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wif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aidservant, nor his ox, nor his ass, nor any thing that is thy neighbour's. (The Bible KJV)

[美] 盖伊·特立斯 著

木风 许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Thy Neighbor's Wife

Gay Talese

邻人之妻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house,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wif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aidservant, nor his ox, nor his ass, nor any thing that is thy neighbour's. (The Bible KJV)

[美] 盖伊·特立斯 著

木风 许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邻人之妻

[美] 盖伊·特立斯 著

木风 许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邻人之妻/（美）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著；木风，许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y Neighbor's Wife

ISBN 978-7-208-14659-4

I. ①邻...II. ①盖.....②木.....③许...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487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010-52187586

书名：邻人之妻

作者：[美]盖伊·特立斯

译者：木风许诺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659-4/K·267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

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Email：info@wenjingbook.cn

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后记

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译后记



"As a Christian, and as one who follows a Leader who said 'I am the Truth' and 'They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set them free,' I believe that the search for truth is a lifelong, and thus a holy, quest and that science has often proven itself to be God's handmaiden in the quest. Although many religious persons may be dismayed by the findings of our scientists, they must certainly realize that new opinions and prophecies are being replaced by knowledge, and that our citizens and efforts may now be redressed toward what appears to be the more serene of the several understandings of our people."

"I have long been concerned that the burden of blame and the therapy of re-education be focused on the true sources of the criminal and anti-social patterns which plague our country and its citizens. I never tired of books, or those that have passed the time, but I was never willing to join in the crusade against them. However, a few years very diligently chosen through our research that the work of such behavior is in the home and in the early years of familial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s. For good, I believe, in everything what may have been, our strenuous responses in the media and its consequence these images are and upon the kind of re-education of the family who's will make for health and sanity."

Rev. G. William Jones,
Commissioner



THE ILLUSTRATED PRESIDENTI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OBSCENITY AND PORNOGRAPHY

Introduction by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Dr. Faxon Munnell/Executive Director for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COMPLETE TEXT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house,
thou shalt not covet thy neighbour's wif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aidservant,
nor his ox, nor his ass,
nor any thing that is thy neighbour's.

~ The Bible KJV ~

不可贪图邻人的房产。不可贪爱邻人的妻子、奴婢、牛驴或他的任何东西。《旧约·出埃及记》

Thy
Neighbor's
Wife

Gay Talese

出版说明

《邻人之妻》是盖伊·特立斯继《王国与权力》《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后又一部非虚构力作。

盖伊·特立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并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杂志撰稿。他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做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在他笔下，人人都可以是主角，毫不区分大亨或贫民。他长期致力于各类特写，1999年曾来华对中国女足队员刘英进行了五个多月的跟踪采访，并深深为中国人民所吸引。2011年，特立斯获颁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邻人之妻》书名典出“十诫”，立意劝诫世人即使邻人之妻美而贤亦不可贪恋。特立斯深入采访全美各地，如实生动并着力刻画了先后涌现的性文化产业代表人物、欲遏制性产业发展而创建坚守审查制度的人们，以及相关民间组织的兴衰。特立斯以这些人物和事件为节点，以小见大、心怀群山，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观念、文化、风俗等诸方面的社会变迁，堪称一幅美国精神观念变革的风情画。

由于题材和作者记者的身份，特立斯在书中细致刻画的某些场面、细节，并不能为世人普遍接受，然因其乃美国社会的客观真实发生，也足堪为一种参照，读者必将有所得益。我们出版此书，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书中人物的立场和作者的某些处理，读者自当有明鉴。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献给南 (Nan)

说明

本书中所有人名、场景与事件，全部属实。

前言

说起过去的畅销书，大多数都活该被扔到郊区别墅客房里受潮的书架上，可《邻人之妻》是个例外。特立斯写这本书花了九年，书中丰满的故事，扎实的细节，包罗万象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变动中的美国社会。

第一眼看《邻人之妻》，像是在已衰落的异国世界里观光游玩，可书中记录的矛盾冲突依然给人压力。特立斯笔下的美国人，迷恋着完美家庭秩序井然的表面，暗地里又垂涎性爱的腥味。今天的文化可能不那么湍流涌动——毕竟，我们比上一代人保守传统——可特立斯描绘的困扰和焦虑依旧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怎样调和过时的婚姻观念与对新鲜刺激的需求？我们怎样克服拉德克里夫·霍尔 [1] 口中的“欲望满足的无穷悲伤”？今天，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与过去有所不同：住在郊区的丈夫上网搜索色情作品，不安分的妻子和同事偷偷发邮件，可基本矛盾——清教传统和对性的迷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改变。

特立斯选择了这个巨大的题目，想必任何人听到，都会觉得他自不量力。他肩负着描写时代精神的重任。怎样才能既不单调、不过度简单化，又不花哨失实地完成这个任务呢？特立斯的回答是，通过人物。有意思的是，人物挖掘得越深，细节写得越具体、越翔实、越有特性，他就越能把握文化的宏观图景。通过对人物不停歇地精彩描写，他捕捉到了美国的整体风貌。休·海夫纳、朱迪斯·布拉洛、约翰·威廉森、黛安娜·韦伯、阿尔·戈尔茨坦，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比一百篇详细的摘要还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种不断挖掘个人生活，从而取得文化宏观事实的方法，就是本书的灵感来源。

《邻人之妻》常常被人误读。本书的情色主题会误导或干扰读者。可这本书并不色情，或者说，它确实有色情描写，可还有对考姆斯托克改革运动的长篇阐述，对最高法院审理淫秽案旁征博引的生动记录，还花闲笔描写了乌托邦社区的兴亡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受的审判和磨难；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史书。在《邻人之妻》里，特立斯完美捕捉到了微妙的心理冲突、清教传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诱人冒险的、崭新的自由形式。在个人经历的离奇细微之处，他触摸到宏大、模糊的文化趋势。休·海夫纳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阿尔·戈尔茨坦的父亲对待服务员的态度，哈罗德·鲁宾的父亲参军时的照片，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关于自慰的日记，无不如此。特立斯将这些人物放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出最保守的本能与最野性的冲动怎样冲突。为了丈量道德观的变迁和真正的历史巨变，他把目光转向个人心灵的挣扎和泪水；为了观察性解放带来的狂欢、陶醉和毁灭，他望向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

本书末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特立斯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突然间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特立斯受到抨击，因为他在实地调查时与人通奸、过于沉浸、在按摩院的台子上接受非常深入的按摩等，但对这一体裁的选择回应了这些抨击。一个“我”是过于简化了。因为他既在那里也不在那里。他在按摩院接受服务，但他也在思索，与他在哪儿接受服务并无二致：“这个女按摩师是谁？她有什么样的童年？其他的顾客对按摩师的工作有何感受？”屋子里总有这个作者，观察着注视着整间屋子，而这种微妙之处，我认为，很多对本书严厉批评的评论员和卫道士并没有把握住。特立斯把自己写成了书中一个角色；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处理这个故事；他总是在写作。这种报道方式中的热忱不同寻常，但这仍旧是一种报道的方式。这本书是他的生活，是件严肃的事，不是当时一些批评者似乎认为的，为了一点儿婚外乐趣而寻找的廉价借口。如果那是他想要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必要花费九年时间、还写了一本近600页的书。

特立斯对故事、对人类多种多样的经历和其中所有瑰丽的、扭曲的细节有无与伦比的喜好。他对陌生人生活中的琐事细节投注关切，而大多数人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都几乎没有如此。他对其他人有无穷无尽的兴趣，不管是声名显赫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满怀爱意地沉浸在他们的过去里——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年幼时对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儿时卧室的样子——这把特立斯和普通记者区别开来。对他来说，书付梓之时故事仍没有结束。他和很多提供资料的人保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联系，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仍旧关心，仍旧在收集信息，仍旧牵涉其中。这不是大多数记者居高临下的、功利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对象和朋友之间的界限既危险又有趣地模糊了。书中角色毫无例外允许特立斯使用他们的真名，这非比寻常，因为他们在谈论的是欺骗、性幻想和罕有的色情事件。但是特立斯获得了那种程度的信任，因为他投入的深度和强度，因为他盘问的精准性和人情味，因为他独特关注中的魅力，因为他真挚的友谊。

人们可能会问，对这么多线人如此激昂的投入，这么多亲密关系，难道不会让人精疲力竭吗？我们中大多数人应该会。但是，正是这位小说家的初心，这位作者对观察、描述这个混乱丰饶世界中所有壮丽复杂性的奇异和永不满足的热情，令这本才华横溢、落拓不羁的书从它的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性新闻写作中的经典之作。

凯蒂·洛菲 [2]

2009年

她全身赤裸，趴在滚烫的沙子上，两腿舒展地伸开，长发在风中飘拂，脑袋向后仰着，双眼紧闭。她像是沉浸在隐秘的思索中，远离尘世，在加利福尼亚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沙丘上静静栖息，毫无雕饰，唯余自然之美。她不佩首饰，头上也不戴花朵；沙滩上没有足印，毫无时间的痕迹，这是张完美的照片。不过，17岁少年汗津津的手指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他攥着照片，眼里涨满青春期的渴望与情欲。

这张照片刊在摄影艺术杂志上，是他刚刚在芝加哥城郊瑟马克路拐角的报刊亭买来的。这是1957年的一个傍晚，冷风呼啸，哈罗德·鲁宾却感到体内热度不断上升。他站在报刊亭后面路旁的街灯下，仔细研究着这张照片，对往来车辆和行人的声音充耳不闻。

他迅速翻着书页，看看其他的裸体女人，判断自己对她们感觉如何。从前有几次，他慌里慌张地买了一本杂志后大失所望，因为这种书都是偷偷出售的，没办法预览里面的内容是否合口。像《阳光与健康》里那些打排球的裸体主义者——50年代唯一让阴毛入镜的杂志，可是她们也太壮了点；《现代男性》里笑容可掬的艳舞女郎，诱惑的姿势又太急切；还有《经典摄影》里那些模特，根本是镜头下的傀儡，在艺术的阴影中丧失了生气。

虽说这些杂志也能让哈罗德·鲁宾在独处时获得满足，但很快它们就被贬到卧室衣柜里的一大堆杂志底下。这堆书的最上面则是经受住检验的几本，女人们或表现某种情绪，或摆出某种姿势，但都是立即就能刺激他兴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效果颇能持久。他要是在别处有了新发现，可以几周或几个月把它们冷落在衣橱里。可没有新发现的时候，他总是有家可回，在纸质的后宫里与哪位宠妃重燃爱火。这种快感与他莫顿高中女友的性生活相较，当然有区别，可也并非水火不容。这两种快感多多少少交融在一起。女孩父母不在家，他俩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他时常会想着杂志里更加成熟的女性。他自己看杂志的时候呢，则会回忆起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刻，她脱了衣服的样子，她身体的触感，还有他们一起做过的事情。

不过最近，可能是因为觉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总想着退学、甩了女友、加入空军吧这些事，哈罗德·鲁宾离芝加哥的现实生活愈发遥远，愈发耽于幻想；当一位特殊女性的照片出现在他眼前时，此类症状尤其严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女人已十分痴迷。

这个女人就是他刚刚在杂志上看到的，沙丘上的裸女。几个月以前，在一本摄影季刊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几本男性刊物、冒险杂志以及裸体挂历上。她很漂亮，身体线条富有古典

美，脸庞充满无邪的活力，可吸引住他的并不光是她的美貌，而是笼罩在每张照片里的灵韵。她漫步在沙滩上也好，站在棕榈树下也好，坐在波涛拍打的石崖上也好，都带着一股不吝天性、慷慨展示自我的气息。即使有些照片里她遥不可及、飘逸脱俗，显得不食人间烟火，她身上的真实感依旧无处不在，让他觉得亲近。他也知道她的名字，是在题图里看见的，他十分肯定这就是她的真名，绝不像有些玩伴女郎 [3] 或者招贴画女郎那样对想要撩逗的男人隐去真名，取个花里胡哨的假名。

她叫黛安娜·韦伯，家在马利布的海滩上。据说她是个芭蕾舞演员，哈罗德认为这解释了她在镜头前摆某些姿势时老练的身体掌控能力。比如他现在拿的这本杂志的一页上，黛安娜·韦伯简直像杂技演员似的，在沙丘上优雅地站着，两臂伸开，一条腿高高抬过头顶，脚尖笔直指向无云的晴空。下一页上呢，她侧身躺着，臀部浑圆饱满，一边的大腿稍稍抬起，几乎盖不住耻骨，胸部袒露，乳头坚挺。

哈罗德·鲁宾飞快合上了杂志。他把杂志塞到教科书中间，一股脑儿掖在胳膊底下。天已经晚了，他马上就得回家吃晚饭。一转身，报刊亭那个抽烟的老头正对着他挤眼，哈罗德没理会。他把手深深插进黑色皮大衣的口袋，朝家的方向走去，特意留长、梳成猫王“鸭屁股”式的金发扫着竖起的衣领。他决定步行回家，不乘公交车，因为他不想和人有近距离接触，不想让人侵入他私密的内心世界，他正急切地盼着晚上，盼着父母睡熟后，独自与黛安娜·韦伯在卧室里的那一刻。

他走在橡树园大道上，接着拐向北边的二十一街，走过路边的平房和稍大些的砖房。伯温这一带的住宅区很安静，离芝加哥市中心有30分钟车程。住在这里的人十分守旧，勤劳节俭。很多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20世纪早期从中欧移民到这儿来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波希米亚来的人尤其多。这些人仍旧坚称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不过让他们扫兴的是，如今在美国，“波希米亚”这个词总是和无忧无虑、沉溺毒品酒精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整天穿着凉鞋晃来晃去，还看“垮掉一代”风格的诗。

在家里，哈罗德与奶奶最亲近，时常去看她。奶奶就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不是波希米亚地区。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靠近多瑙河与匈牙利从前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她经常对哈罗德讲起，自己怎么14岁就来到美国，在那些暗无天日、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里做女仆。这类宿舍是为成千上万来到密歇根湖沿岸工业城镇打工的斯拉夫人准备的，他们来到这里，在炼钢厂、炼油厂之类的工厂里干活，这些工厂都在印第安纳州，分布在东芝加哥、加里和哈蒙德周围。那会儿住宿条件实在是太拥挤了，她说，去打工的第一家宿舍里，四个白班的工人租了四个晚上的床位，四个夜班工人呢，又租了这四个床位，白天过来睡觉。

她说这些人受到动物一般的对待，自己过得也像动物，他们不被工厂老板剥削的时候，就去欺负像她这样打工的姑娘。女人们要住在这种

地方，本来就够不幸的了。宿舍里的男人们总想抓住她，夜里她想睡觉的时候，总有人使劲敲她锁上的房门。最近一次她对哈罗德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坐在厨房里，吃着她做的三明治，突然想到了50年前她的样子：羞答答的佣人姑娘，脸色苍白，和他一样的蓝眼睛，长发绾成发髻，年轻的身体穿着灰暗的裙子在房子里飞快地走动，躲闪着野牛一般的工人们朝她抓来的手指和粗壮的胳膊。

哈罗德·鲁宾继续往家走，胳膊下紧紧夹着教科书和杂志，他想起奶奶的回忆让他多么伤感，又多么着迷，他明白了她为什么只对自己说这些事。他是家里唯一真正对她感兴趣的人，肯花时间来大大的砖房里陪她待着，其他时候她都是独自一人。她丈夫，约翰·鲁宾，以前当过卡车司机，在货运行业赚了笔钱，白天在修理厂里看货车进出的单子，晚上就和秘书睡在一块儿。奶奶很不屑提到她，提到时就说“那个婊子”。这场不快乐的婚姻中唯一的孩子，哈罗德的父亲，完全被他父亲给控制了，长时间在厂里干活；奶奶又觉得哈罗德的母亲与自己不够亲近，不能对她诉说挫折烦恼。所以主要就是哈罗德，有时加上他弟弟，偶尔打破房子里盘踞的寂静无聊。而且，年龄增长，哈罗德的好奇心也更重，与父母和周围的人变得疏远，他逐渐成了奶奶的密友，疏离于自己的同伴。

从奶奶那儿他得知了不少父亲童年的往事，爷爷的过往，以及奶奶为何要嫁给这么一个暴君似的男人。约翰·鲁宾66年前出生在俄国，是个犹太小贩的孩子，2岁时就随父母迁到密歇根湖附近一个叫索比斯基的城市，这里是用17世纪波兰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鲁宾上了短短几年学，家里的窘境毫无起色，后来他因为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组织持枪抢劫被逮捕，争斗中还有一名警察中枪身亡。后来他假释出狱，几年里干过各种杂活。一天，鲁宾来到芝加哥，来看望已经结婚的姐姐，在她家他看上了照看孩子的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姑娘。

后来再去的时候，他发现女孩一个人在家，她拒绝了他的进攻之后——像以前拒绝宿舍里的工人一样——他把她推进卧室，强奸了她。那时她16岁。那是她第一次性经历，还怀了孕。她吓坏了，身边又没有亲人或朋友能帮忙，于是听从主家的劝告，嫁给了约翰·鲁宾，不然他要因为以前犯的罪坐牢，而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们1912年10月结婚，六个月后生了个儿子，就是哈罗德的父亲。

时间流逝，这段无爱的婚姻并无多少改善，奶奶说，丈夫总是打儿子，她去阻止也会挨打，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维护卡车了。后来他捡到了金饭碗，在为芝加哥的一家大型邮购商——施皮格尔公司做马车送货员之后，说服管理层借给他一笔钱买了辆卡车，开始了自己的货车运输买卖，这样施皮格尔公司就再也不用总养着几匹马了，据他说，马的送货效率远不如他。买了一辆卡车还清了借的钱之后，他又买了第二辆、第三辆。没到十年，约翰·鲁宾就有了一打卡车，包揽了施皮格尔在本地所有送货生意，也接其他公司的活儿。

不顾妻子徒劳的反对，他把十几岁的儿子叫来车厂里做司机的帮手。虽然约翰·鲁宾这时挣了很多钱，对贿赂当地官员和警察也十分慷慨——他经常说“想要顺溜，就得抹油”，对家里的花销却出奇吝啬，还总说妻子偷他落在房子里的硬币。后来，他故意在家里各处丢下自己记得数目的零钱，或者把钱摆成特定的样子放在柜子之类的地方，想证明妻子拿了，或者至少是碰过那些钱，可从未成功过。

奶奶的这些回忆，加上自己对冷冰冰的爷爷的观察，让哈罗德对自己的父亲有了很深的认识。父亲44岁，沉默寡言，毫无幽默感，和钢琴上摆的那张照片半点儿也不像。照片是“二战”时照的，父亲穿着下土的军装，既洒脱又英俊，离家乡万里之遥。但即使哈罗德理解父亲，也丝毫不能减轻与他一同生活的压力，哈罗德走到自家所在的东大街时，已经能感到家里的焦虑和紧张了。他想，不知今天父亲又会教训他什么。

以前，要是父亲没挑剔他的功课，那就是嫌他头发太长，要么就是和女孩儿玩得太晚，还有裸体杂志——有次哈罗德不小心没关房门，被父亲看到杂志摊在床上。

“这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父亲问道，措辞绝对比爷爷婉转多了。爷爷一开口，就夹杂着能想到的全部淫言秽语，口气里带着深深的轻蔑，父亲的用词却更加克制，不含感情。

“我的杂志。”哈罗德回答。

“都扔掉。”父亲说。

“这是我的！”哈罗德突然喊道。父亲好奇地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缓缓摇着头，走出了房间。之后他们几星期都没说过话，今晚哈罗德也不想再被父亲撞见。他只希望平安无事，赶紧度过晚餐时间。

进屋之前，他看了一眼车库，父亲的车停在里面，是辆1956年出品的林肯，一年前，父亲以精心打理的1953年的凯迪拉克以旧换新来的，车身还闪闪发亮。哈罗德爬上后门的台阶，悄悄走进了屋子。母亲是个胖胖的、面色和善的中年女人，正在厨房里做晚饭；他能听到起居室里电视机的声音，看到父亲坐在那儿读着芝加哥《美国人报》。哈罗德冲母亲笑了笑，问了声好，声音让起居室里也能听见，可以算是对两人都打了招呼。父亲没有反应。

母亲对哈罗德说，弟弟得了感冒，正躺在床上发烧，不和大家一起吃晚饭了。哈罗德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房间布置得很漂亮，有舒服的椅子、抛光的深色木材书桌，还有大大的维京橡木床。书本都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墙上挂着内战时期的剑和来复枪的仿制品，是父亲给他的，还有个镶边的玻璃箱，里面堆着哈罗德去年在手工课上做的几样钢制工具，在福特汽车公司赞助的全国比赛上得了奖。他

还得过维博尔特百货公司颁发的美术奖，作品是一幅小丑的油画。他做木工活的才能最近也得到了发挥：他做了个木头架子，用来放摊开的杂志，这样看杂志的时候两手就能空出来了。

哈罗德把教科书放到桌上，脱下外套，打开杂志翻到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那页。他站在床边，右手拿着杂志，然后半闭上眼，左手轻拂过裤子前面，轻柔地触碰着性器。它立即就起了反应。他真希望现在能有时间，在吃晚饭前脱下衣服、满足自己，或者至少能从走廊溜到厕所里，在洗脸池前面来一发快的，把她的照片举到药柜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暴露在她的裸体之前，假装与她一同在沙丘上沐浴阳光，让她朝下看的可爱黑眼睛盯住他肿胀的下体，想象自己抹了肥皂的手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他已经这么做过很多次了，一般都是在下午，因为下午关卧室门会显得鬼鬼祟祟的。可是虽说在厕所锁上门很安全，哈罗德却总觉得不够舒服，部分因为他还是喜欢躺在床上，实在不愿站着，也是因为洗脸池周围没什么地方放杂志，没法用两只手。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小心，杂志就会沾上水池里溅出来的水，因为他得把水龙头开着，提醒家里人他在厕所，而且有时手指上的肥皂沫干了，也得用水来润滑。有水渍的裸女照片对大多数青年男子来说大概不成问题，但哈罗德·鲁宾却不能接受。

他想要精心保护这些杂志，还有很实际的考虑：今年，报纸已经刊登了全国反色情运动更加高涨的消息，说不定以后就不能随时买到有裸体图片的杂志了，秘密地也未必能买到。《阳光与健康》已经出版了20年，内页里还有好多老幼俱全的家庭照片，也在今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听证会上被定性为黄色刊物。艺术摄影类的杂志也被一些政治家和宗教团体斥为“淫秽”，即使这些杂志试图和色情刊物保持距离，每张裸体照片下面都会标注说明性文字，比如“皇冠格拉菲2 1/4×3 1/4，柯达101 mm镜头，焦距11 mm，曝光1/100秒”等。哈罗德在报上读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邮政部长阿瑟·萨默菲尔德，想要把有性爱内容的文学和杂志清除出邮政系统。纽约的出版商塞缪尔·罗思就因为触犯联邦邮政法规，刚刚被判五年徒刑外加5000美元罚款。罗思之前的罪名是印刷并传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他第一次被捕，警察突袭他的出版公司，找到了从巴黎偷运来的《尤利西斯》印板。

哈罗德还读到碧姬·芭铎的电影在洛杉矶上映有了麻烦，要是放到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居民都是工人，警察又厉害，还受到天主教道德观念的很大影响，有关性爱的文艺作品只会被压制得更凶。特别是在爱尔兰裔兼天主教徒市长理查德·J·戴利新上任后，情况越来越糟。哈罗德已经注意到，沃巴什大道上的脱衣舞俱乐部被关掉了，州立大街上那家也关了。这种势头要是不停，瑟马克路上他最喜欢的报刊亭没准只剩下《家务事》和《周六晚邮报》卖，对此他父母也绝不会有不满。

他住在家里这些年，从未听见父母说过一句和性有关的话，从未见过他们的裸体，夜里从未听过他们的床因做爱有一丝响动。哈罗德想他们应该还是会做爱的，不过不太确定。他也不知道60多岁的爷爷和情人这方面状态如何，不过奶奶最近一脸苦相地偷着告诉他，她和爷爷自1936年起就不再做爱了。反正他在床上也没什么技术，奶奶很快地补充说。哈罗德琢磨着她的话，第一次想到奶奶会不会也有秘密情人。他觉得可能性实在不大，因为从没见过男人进过她家，她也不怎么出门；不过他记起一年前，自己曾在她书房里意外发现了一本浪漫色情小说。书用棕色的书皮包着，版权页上印着法国一家出版商的名字，下面是出版日期，1909年。奶奶打盹儿的时候，哈罗德坐在地板上把这本103页的小说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第二遍。情节非常吸引人，文字的大胆程度令人惊叹。故事讲了欧洲和东方几个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年轻女子，在绝望中离开了小镇和村庄，游荡到摩洛哥，被帕夏 [4] 俘虏，关到了后宫里。一天，帕夏出门的时候，一个女人注意到窗外有个英俊的船长，就把他勾引到楼上，激烈地做爱，别的女人也轮流来过，中间还偶尔停下来，对船长讲述她们来到这里时的不堪往事。后来几次去看奶奶时，哈罗德把这书看了太多遍，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了：

她柔软的胳膊做出回应，搂住了我。我们的嘴唇交融在一起，变成美味绵长的吻。接吻之时，我的长柄倚着她温暖、光滑的小腹。然后她踮起脚尖，长柄的尖端就埋在了小腹下面短而浓密的毛发之中。我用一只手引导它来到入口，那里也充满热情地接纳了它；我的另一只手抓住她圆鼓鼓的屁股，靠向自己……

哈罗德听到母亲从厨房里叫他。该吃晚饭了。他把印着黛安娜·韦伯照片的杂志塞到枕头底下，答应着母亲，稍等了一会儿，让勃起平息。然后他打开房门，轻松地走向厨房。

父亲已经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碗汤，读着报纸。母亲站在炉子边上轻快地讲话，没注意到其实没人在听。她说今天去镇上买东西时碰到了老朋友，是以前库克县估税员办公室的同事。母亲曾经在那儿工作，负责操作键式计算器。哈罗德知道17年前自己快出生的时候起，母亲就辞了职，后来再没有外出工作。他称赞说饭菜的味道好香，父亲从报纸里抬起眼睛，笑也不笑地点了点头。

哈罗德坐下来啜吸着汤，母亲一边继续讲，一边在餐柜上切好牛肉，端上餐桌。她穿着居家便服，化着淡妆，吸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哈罗德的父母烟瘾都很重，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爱好。他们俩都不爱喝威士忌、啤酒、红酒什么的，晚餐都是配忌廉汽水或根汁汽水，每周按箱买

这类饮料。

母亲坐好之后，电话响了。平时父亲都是把电话放在餐桌附近好拿的地方，他拿起听筒时皱了皱眉。有人从修理厂那边打来的。每天晚饭时几乎都有电话，从父亲的表情来看，像是听到了坏消息——可能有辆车送货前出了故障，或者司机工会要闹罢工；不过住在家里这些年，哈罗德知道，父亲这副阴着脸、绷着嘴唇的样子和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并没太大关系。他天性就是如此，对世界冷眼相看。就算打电话的是电视台娱乐节目，宣布父亲中了大奖，他也还是只会皱皱眉头而已。

不过，管理鲁宾家的运输生意就是有一万个不好，父亲还是每天5点半早早起床，第一个去上班，处理各种大小问题，从维护142辆卡车到解决货物被盗的事，还得应付暴躁易怒的老头子约翰·鲁宾：他还想要掌管大权，但现在车厂的规模他早管不了了。

哈罗德最近听说，鲁宾家几个司机因为没有牌照驾驶，被警察拦下了。老头子为此气得要死，忘了其实是因为自己太小气，才会闹出这事：他为了省钱，给142辆卡车只买了32个牌照，车厂里的司机总得把牌照换来换去，不然就要冒险开着没牌照的车送货。哈罗德知道这事儿早晚要闹上法庭，到时候爷爷就会想办法买通人情，就算他运气好、贿赂成功，花的钱也肯定比给所有车上牌照多。

哈罗德发誓以后绝不去车厂里工作。他暑期在那里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马上就决定敬而远之。爷爷时不时就叫他“小废物”，侮辱谩骂令他不堪忍受；父亲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一天尖酸刻薄地说“你一辈子也成不了事”。哈罗德毫不在乎这恶意的断言，因为他知道要讨好这爷俩，就得完全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哈罗德决意不重复他父亲一辈子的错误：变成老头的喽啰，这老恶棍和不爱的女人搞出来一个不想要的儿子。

父亲挂上电话后继续不动声色地吃饭，一点也不提刚才电话里都谈了什么。饭后，他面前摆上来一杯他喜欢的加了不少奶油的咖啡，接着他点燃了一根“流金岁月”^[5]。母亲提起几天都不见街对面的邻居出来了，哈罗德答说他们有可能是去度假了。她站起来清理餐桌，然后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小儿子烧是不是好些了。父亲走进客厅，打开电视机。哈罗德过了一会儿也走进客厅，坐在屋子的另一端。他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电视，做了一会儿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听着母亲在厨房里洗碗碟，父亲打着呵欠。然后父亲站起身来，又打了一个呵欠，说要回屋睡了。刚过9点。半小时之后，母亲走进客厅和他道晚安，不一会儿哈罗德关上了电视机，整栋房子完全安静无声了。他走向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一阵静静流淌的兴奋和解脱涌上心头。他终于独自一人了。

他脱掉衣服挂进衣橱，从衣橱的上层架子上拿出一小瓶“意式香

脂”牌润手霜，放在床头柜上舒洁纸巾的旁边。他把床头灯调暗，关掉顶灯，卧室于是浸润在柔和的光线里。

在芝加哥这个寒冷的夜晚，能听到风抽打着防雨窗，他溜进冷冷的被单里时不禁打了个冷战，赶紧拉过毯子盖在身上。他躺下待了一会儿，等暖和起来之后，从枕头下拿出那本杂志草草翻起来——他现在还不想就去注视迷恋的对象，黛安娜·韦伯，她在第19页的沙丘上等着他。他想先把整本杂志的52页都过一遍，这里面有11个不同女性的39张裸体照，简直就是金发女郎和浅棕肤色女郎所组成的视觉迷情剂，高潮来临之前的前戏。

第4页上的一个瘦削的黑眼睛女人引起了哈罗德的注意，但是摄影师让她别扭地待在一棵树盘根错节的枝条上，他觉得她待得很不舒服。第6页上的裸体女人挨着一个画架盘腿坐在一间画室的地板上，她的乳房不错，但是脸上的表情平淡乏味。哈罗德仍旧躺在床上，毯子下他的膝盖微微弯起，他继续翻过各式各样的腿和乳房，臀部和毛发，女性伸开的手指和胳膊，眼睛不看着他，眼睛又看着他——他时不时地停下来用左手轻轻抚弄自己的阴茎，右手倾斜拿着杂志以减少光滑书页上的反光。

杂志一页页地翻过，他看到了黛安娜·韦伯那一系列精美的照片，但他马上就跳过去了，不想现在就挑逗自己。他继续去看第27页上那个一本正经地坐着的墨西哥女人，她的大腿上缠着渔网。接着是巨乳的金发碧眼女郎斜倚在地板上，挨着一小尊《米洛的维纳斯》的大理石雕像。接着又是轻盈、迷人的金发女郎站在“曝光1/25秒，焦距22mm”的阴影里，像是在一间剧院空荡的舞台上，她的胳膊盘在下巴和向上翘起的乳房之间，她的乳房优雅地袒露出来，在微妙的舞台灯光中，哈罗德确信看到了她的体毛，今晚他第一次感到兴致高昂。

如果不是如此迷恋黛安娜·韦伯，他知道自己会被这个柔软苗条的金发小美人所满足，也许不止一次——这对他而言是一张色情照片能经受住考验的标志。在他壁橱里那堆杂志中有数十张裸体照曾使他在独处时达到高潮，有些能三四次；有些能使他未来再达到高潮，只要他有一段长时间不看她们，让她们重获神秘感。

然后就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照片，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每一次都能使他满足。他大概有50张她的照片，他能从200多本杂志里一下就把每一张都找出来。他只需要看一眼封皮就知道她在哪里，她怎么站着的，背景有什么，在快门按下的一瞬间她好像在想什么。一旦看到这些照片，他就能想起是在哪里、什么时候买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的每个姿势，都记录着他生命的某个时刻，使他相信他真的认识她，他是她的一部分；通过她，他与自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可不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所谓“自虐”的功劳，更是因为自我接受——他认识到自己的欲望是天性，对理想化的女性也有渴求的权利。

哈罗德再也按捺不住，翻到黛安娜·韦伯趴在沙丘上的那一页。他看着她，趴在那里，头在风中高高扬起，眼睛微闭，左边的乳头挺立着，她的两腿大大地张开，傍晚的斜阳里，她玲珑婀娜的身形夸张地投影在柔软的白沙地上。除去她的身体只有蔓延开去的空旷无际的沙漠——她看起来是如此的孤单、自在、触手可及。哈罗德必须渴望她，她是他的。

他把毯子推开，身体因热望而兴奋地微微发烫。他从床底下拿出在学校做的木架子，他的手工课老师如果知道这架子今晚会上什么用场，一定会大跌眼镜。他把杂志在自己面前架好，放在大张开的两腿之间。用两个枕头把自己的头高高架起后，他够到那瓶“意式香脂”，倒入手掌搓热。然后他开始轻柔地抚摸自己，感到下体迅速地完全勃起。眼睛半闭着，他躺回床上，凝视着自己闪闪发光的性器像塔一样矗立在黛安娜·韦伯的照片前，在沙地上投下一道阴影。

上，下，上，下，他握住自己的性器，前前后后地摩挲着睾丸，他直勾勾地盯着黛安娜·韦伯背部的曲线，圆润饱满的屁股高高翘起，还有两腿间那温暖潮湿的地方……他现在想象自己走向她，弯腰接近她……事后他在床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肌肉松弛下来，双腿虚弱无力。然后他睁开眼，看到她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可爱撩人。

终于他坐起身来，用两张舒洁纸巾擦了擦自己；又用了两张，因为手上沾了体液和润手霜，还是黏糊糊的。他将纸巾揉成一团投进废纸篓，毫不在意母亲早上清空纸篓时可能会认出那是什么。他待在家里的日子不长。几周之后，他就会加入空军，再之后呢，他还没想过。

他合上杂志，放到壁橱里那堆杂志的最顶端。他把木架子放回床底下，爬回被窝里，感到疲惫但是平静。他关上了灯。他想，要是运气好，空军会把他派往南加州的基地，然后说不定他就能找到她。

1928年，黛安娜·韦伯的母亲在南加州的一场选美比赛中夺冠。这场比赛是由格雷厄姆·佩奇汽车的制造商赞助的。比赛奖品之一是在塞西尔·B.德米尔导演的默片中出演一个小角色，黛安娜的母亲演的是个羞涩漂亮的少女，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她自己。

她从蒙大拿州来到加利福尼亚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在痛苦地离婚后，辞去了在比林斯电气公司的工作，来到位于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工作室当电气工。她和父亲远比和母亲亲近，何况她也早就想逃离西北部乡村的粗犷鄙俗：父母隔三岔五地吵架，祖母结了五次婚，曾祖母在河里游泳时，被印第安人的箭射中后背，死掉了。她到了南加州，坚信这里总比视野局限的“大天空”^[6] 乡下强，能带来更多的满足和成就。

大致来说，这里确实不错，尽管她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出演的几部电影中从来没能成为明星。她的满足主要是来自洛杉矶风和日丽的感觉，艳阳使她远离了蒙大拿阴郁的少女时代。在洛杉矶，她可以自由自在、心血来潮地做事，重燃早先对于宗教的兴趣，不穿胸罩在街上走，最终嫁给一个大她将近30岁的男人，七年后又嫁了一个小她五岁的丈夫。南加州典型的对传统价值的漠视、社会根基浅、流动性高、持续性低——这些特点对她蒙大拿的家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包袱，她在洛杉矶却轻松接受了，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也接受了这种新的价值观，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儿为了追寻某种模糊的目标离开乏味的家乡，移民到加州。很少有人能成为成功的演员、模特、舞者，更可能的是，她们最好的年华是在做鸡尾酒侍者、前台接待、售货员，或者圣费尔南多谷里郁郁寡欢的家庭主妇。尽管如此，几乎所有这些女孩儿都留在了加州，有了孩子。大萧条时期，这些孩子就在加州的太阳下长大，40年代整年玩着户外运动，“二战”开始、加州大繁荣时期到来之时，他们也长大成人（当时美国的防卫投资将数以百万的资金注入西海岸的飞机制造厂和科技产业）；50年代，加州出现了新一代人，他们以靓丽的外表、休闲的穿着、轻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等著称，他们的形象在麦迪逊大道、整个国家，甚至在海外都非常鲜明，被认为特别有“美国范儿”——就是所谓加州风格。而黛安娜·韦伯在50年代就拥有这种风格，不过她母亲并没有觉察到。

黛安娜的父母离婚时，她与母亲的矛盾就产生了。黛安娜的父亲比母亲大27岁，是从犹他州奥格登来的作家，叫作盖伊·恩皮。他矮小结实、专横且富有冒险精神。1911年，他加入了美国装甲部队，而且因为美国很晚才加入“一战”，还跑去加入了英国军队。他上过欧洲的前线，脸上留下了让他后半生引以为傲的伤疤。1917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冲出战壕》，卖出了一百多万册。后来他又把这本书拍成了一部电影，自导自演。

盖伊·恩皮之后十年又写了几本书，但都不及第一本出名，到了30年代他只能去为杂志写低俗小说，常常是用笔名出版。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好莱坞的一次聚会上遇到这个来自蒙大拿的娇小、活泼、芳龄20的女演员。她的一头黑色短发、一双棕色大眼睛，以及极富感染力的笑容都让他想起了默片明星克拉拉·鲍。他很快就用一束束鲜花向她求爱，开自己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载她兜风，不久就向她求婚了——而她也答应了，尽管他46岁，和她的父亲一样大。

不明智的是，他把新娘带回自己家去住了，家里还有他深爱的母亲和姐姐，《冲出战壕》就是题献给她们的。两人都是从纽约来的饱读诗书、精明强干的女人。他母亲的舅舅理查德·亨利·达纳是《航海两年》的作者；他守寡的姐姐——之前嫁给了W.&J.斯隆家具地毯公司的高级主管，每周都要读《纽约客》，她在洛杉矶的家里布置了很多精致的家具，还有一个了不得的图书馆，书都是从美国另一头带过来的。这两个女人，尤其是盖伊·恩皮固执己见的母亲，对这个蒙大拿来的小演员并不怎么满意。而盖伊·恩皮无力解决，或者不愿意去解决，他们之间不断升级的婚姻冲突，只在1932年独生女黛安娜——名字取自当时的流行歌曲——出生时才稍稍停歇。

黛安娜2岁时父母分居；5岁时，经过短暂的调停程序后父母就离婚了，之后黛安娜就得在父亲家和母亲家之间来回奔波。工作日的时候她住在母亲家，她母亲在1939年又嫁给了一个24岁的英俊小伙儿，那人是国际通讯社的摄影师，还曾经穿着一身牛仔行头，为切斯特菲尔德香烟的大广告牌做过模特。他们结婚的时候这小伙儿在日落大道有一家小餐馆，而黛安娜29岁的母亲压抑了她所有挥之不去的电影野心，在新老公的餐馆里当服务员。

周末黛安娜会乘电车从好莱坞山到回声公园，奶奶在那里接她去父亲的住所。亨德尔的音乐轻柔地从唱片机中流淌出来，她置身于姑姑和奶奶知性的陪伴中。她们鼓励她广泛阅读，带她看趣味高雅的电影，说话用词黛安娜得查字典才能明白。当姑姑和奶奶每天午睡时，父亲在打字机前工作（不过收效甚微），黛安娜会独自静静地坐在屋中阅读，从《风流世家》读到莎士比亚戏剧，从《天方夜谭》读到《格雷氏解剖学》。渐渐地，她积累了扎实的——可能还有点古怪的——古典文学基础，以及强烈的幻想气质。

某天下午看了芭蕾舞《胡桃夹子》之后，她的幻想变得更加清晰。从此黛安娜在梦里总能看到美丽动人的自己，穿着紧身裤独自在舞台上用脚尖优雅地旋转。她开始每周放学后去上芭蕾舞课，不过只有当她表现好，而且把房里的很多杂事做好之后，母亲才给她这种“特权”。她的继父——和他在一起总是让人很不舒服——常常会在黛安娜在家里练芭蕾时看着她，有时她在客厅扶着壁炉架，将一条腿高高地抬向空中，他也会温柔地取笑。这场景让母亲老大不高兴，她本来就反对年轻的丈夫在走廊里挂巴尔加女郎招贴画 [7]，对他如此关注自己12岁、含苞待放的女儿，就更不痛快了。一天傍晚，母亲暴躁任性的脾气发作，说黛安娜

的美貌绝对赶不上自己，使她极为受伤。

母亲那年晚些时候又生下一个儿子，黛安娜在家里的处境迅速恶化；两年之后，又添了一个女婴。黛安娜正进入青春期，对于男孩子和约会越来越感兴趣，却必须每天放学回家去照顾弟弟妹妹。这种情形差不多持续到她高中毕业。之后她离开家和姨妈住了一段时间，在威尔希尔大道上的萨克斯百货商场做了一阵礼物包装员，赚钱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和舞蹈课。几个月后，为了不再干扰姨妈的隐私——她当时正和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办公室上班的一位有妇之夫交往，黛安娜搬到了好莱坞影视俱乐部宿舍，这是给投身电影产业的女人们的住处，母亲曾经就住在这里。在那里黛安娜得到了给旧金山一家夜总会歌舞团跳舞的面试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对于有志成为芭蕾舞演员的黛安娜来说不是那么对路，但她觉得自己的年龄可能已经太大了（那年她18岁），加上缺乏训练，虽然在幻想中她跳得是如此完美，但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精通这门精妙的身体艺术了，于是她参加并通过了面试。当她问母亲是否应该接受这个职位时，母亲说：“别问我，自己决定吧。”于是黛安娜去了旧金山，不过她拿不准母亲这样说是让她独立了呢，还是根本就对此无所谓。

黛安娜每周赚80美元，每晚跳三场，每周跳六个晚上，在歌舞团里她曾为索菲·塔克这样的巨星伴过舞。她平常的演出服挺保守，只露出腰腹部，但是当 she 到后台换衣服时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大家的裸体，她可以比较自己与其他人的身体。她的条件相当出色。所以当歌舞团的一个朋友建议她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艺术教授那儿做人体模特赚外快时（这位教授为一次简单的裸体摄影付20美金），她倒是一点儿也不惊讶。

黛安娜怯生生地来到教授的住处，不过他超然、正式的举止让她很快放松下来。她脱掉自己的衣服，赤裸着站在他面前。她看到他退后几步，听到按快门的聲音。她听到照相机一次又一次地按下，不用他指导，她便像芭蕾舞者一般舞动起来，听着发自内心的音乐声和照相机的咔嚓声，她的胳膊慢慢地抬起，转过身去，用脚尖旋转，她已经意识不到教授的存在。她只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控制这身体如同演奏精巧的乐器，借此她便能超越极限。尽管光着身子，她并不觉得赤裸。跳舞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被内化了，私密、孤独，深深地潜心于自己的情感中。这些情感可能从她的动作或表情流露出来，但她并不清楚，也不去想镜头后的教授印象如何。她只能勉强看到远处他模模糊糊的灰色身形。黛安娜摘下了眼镜，而她近视挺严重的。

完成了在夜总会跳舞的工作后，黛安娜回到了洛杉矶，她开始主动打电话约见列在分类名录里的各种时尚摄影师。她给戴维·鲍尔弗、基思·伯纳德、彼得·高兰、安德烈·德迪恩斯、威廉·格雷厄姆、埃德·兰格等都打过电话。几乎所有人都被她吸引了，看起来如此健康单纯的姑娘会这么愿意做裸体模特，这事儿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黛安娜至少领先了时代整整十年。

1954年，黛安娜22岁，她的照片开始在全国的裸体主义杂志和摄影杂志中刊载。1955年，她的一系列彩照被送往芝加哥的《花花公子》杂志社。社里年轻的出版人，休·海夫纳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照片，立马就被迷住了。

第一次看到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海夫纳28岁，杂志出版的第二年。1953年，他编辑第一期《花花公子》杂志时，得窝在厨房里，与老婆和襁褓中的女儿共用一张桌子；不过如今他手下有30名员工，在芝加哥市中心附近租了四层楼房。此刻顶层的大办公室里，他正坐在现代感十足、L形的办公桌后，眼前是黛安娜·韦伯的相片。

他轻快地一张张翻看照片，丝毫显不出面对裸体时他曾经有多么害羞，少年时代在严肃古板的家中做了春梦后又是多么难堪。休·海夫纳现在是情色杂志年轻有为的出版人，和妻子分了居，同两个年轻的女下属睡觉，春梦已经变成了现实。他一手创办的杂志也重新塑造了他。

他真的每天就和铜版纸住在一块儿，晚上睡在办公室后面一间小卧室里，不分昼夜地费心设计《花花公子》的颜色、版式、图片、标题、新闻、文章，每一行字都要细细读过，就像现在，他手拿放大镜，认真鉴赏着黛安娜·韦伯的裸照。

第一张照片中，她裸着上身，站在芭蕾舞室里，穿着哑光的黑色紧身裤，勾勒出有力而优雅的大腿、小腿和浑圆的臀部。她的腹部平坦，光滑、强壮的背部毫无瑕疵，没有舞蹈演员容易长的那种多节的肌肉；而且，虽然她在运动，皮肤上却没有汗水的闪光。这让海夫纳印象颇深，他自己年轻时极易出汗，像在学校舞会上用手扶着女孩的腰或在电影院里搂着女孩的肩膀时，出汗就尤其厉害。

他的视线缓缓扫过黛安娜·韦伯的乳房，接着是乳头……他惊叹其形状与尺寸的完美，想象着把这么一对乳房握在手中的感觉，他知道一旦这些照片被选登上杂志、发行流通，还有几千个男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夫纳与购买他杂志的男人十分相像。从收到的读者来信和《花花公子》飞速增长的销量里，他就知道，他喜欢的东西他们也喜欢；他时常把自己看作幻想供应商，在精神世界里给男性读者和杂志女郎牵线搭桥的媒人。每月新刊在他的指导下出炉之后，他闭上眼都能想象出，全美孤独的男人为他选择的图片欲火难耐的高潮时刻。他们中有汽车旅馆房间里的旅行推销员，营地的大兵，寝室里的学生，乘飞机的主管——杂志如同秘密旅伴一般藏在手提皮箱里。他们是得不到满足的已婚男人，收入中等，志向平平，对生活早已厌倦，工作也无聊透顶。他们想要在虚拟的性爱冒险中获得暂时的逃避，拥有更多的女人，那些在现实中他们因为没能力、没时间、没钱、没权力，或者根本没有想要的勇气而错失的女人。

海夫纳理解这种感觉，结婚的头几年也尝过这种滋味，他半夜会从熟睡的妻子身边溜出来，在城里长时间散步。他仰望着矗立在湖畔的豪华公寓，看到伫立在窗前的女人，想象着她们同自己一样郁郁寡欢；他想要秘密地认识她们每个人。白天见到的女人，走在街上也好，在公园散步也好，正坐上轿车也好，他都会把头脑里脱掉她们的衣服，虽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连眼神接触都没有，他还是感到内心一阵狂喜；几周以后，在他剧场般的脑海里，这些女人的形象依旧栩栩如生，他凝视着她们清晰的身影，就像现在凝视桌上裸体舞者的照片一样。

透过放大镜，他眯着眼注视着黛安娜·韦伯高高抬起的下巴，肉感的嘴唇，她大大的淡褐色眼睛回看着他，神情既迷人又疏远。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她率直地看着你，可又与观者的反应相距甚远，好像她是头一次在人前展露身体，对男人还天真无知。海夫纳想要杂志里的裸女传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不过很少有玩伴女郎能有这种表情。从1953年12月第一期杂志刊登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以来，每一期《花花公子》的中央拉页都是专业模特，表情老练，胸有成竹；她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不过，她们每个月都能吸引为数众多的读者，连海夫纳也咂舌不已，《花花公子》初期的巨大成功很可能并非源于杂志本身，而是要归功于那些买杂志的男人。

《花花公子》出版以前，美国男人鲜见裸体女性的彩照，他们在报刊亭买《花花公子》时兴奋不已，又难抑尴尬，走路都要把封面卷起来。他们好像公然承认了自己糟糕的需要，长期压抑的秘密，承认自己在现实中没法得到满足。虽然《金赛报告》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自慰，50年代早期这仍然是不能提及的秘密行为，而且也从没人提起自慰会和照片有什么联系；可现在这联系已是昭然若揭，因为《花花公子》大获成功，发行的头两年内销售量就从6万份攀升到40万份。如此得到读者的钟爱，很难说是杂志里文章的功劳，其他诸如卡通、讽刺作品、重新刊载安布罗斯·比尔斯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小说也都没什么出彩之处。毋宁说是一手创办起杂志的海夫纳，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作为追求者的读者，看着每月刊登的性感又可亲的裸女，以求在脑海中能拥有她。

他们是他们精神上的情人。独处时她能提供刺激，他们与妻子做爱时眼前也总能浮现她的形象。她简直成了存在于观者眼里和心里的特殊物种，满足着所有的幻想。她能在床边随时待命，完全在掌控之中，知道怎样触摸私密的部位，在狂欢的一刻到来之前从不说扫兴的话，不做扫兴的事。

每月她都换一副新的面孔，满足男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回应各式各样的冲动与执念，从不要求回报。她的行为举止都是真实女人所不会做的，这就是幻想的本质，也是休·海夫纳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原因。他创造出富有诱惑、容易到手的女人幻象，成了第一个靠着公开营销自慰之爱而发家致富的人。只要有买本杂志的钱，几千个男人就能从海夫纳那里得到各色女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中瞧都不会瞧他们一眼。他给老男人年轻姑娘，给丑男人美女，给害羞的男人女色情狂。一夫一妻制度

下，已婚男人想象的婚外情中，他是共犯；对于蛰伏沉睡的男人，他是提供刺激的闹钟；他与全美《花花公子》读者的中央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坐在办公桌前用放大镜为他们在激情开始前来点预备的求欢，而他位于芝加哥的办公室便是这本终极服务杂志的勃起中心。

对海夫纳自己而言，他还有着更宏伟的目标。他不仅仅想要些裸体照片，还想拥有照片中摆姿势的女人。他在性爱方面长期受挫的胃口，现在已然贪得无厌。他不满足只是表现出性幻想，还渴望亲身经历，与之产生联系；渴望让自己强烈的视觉想象力与身体机能同步运作；还渴望制造出某种情绪、某个情爱场面，让他既能感受，又能观察。

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注意力的分散，不如说是思维的双重状态。他现在也好，过去也罢，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他就是自己的偷窥狂。有时他行动就是为了观看。一次他故意在酒吧里被一个同性恋搭讪，就是为了看一看、而非享受和男人的性事。海夫纳第一次出轨的时候，录下了与女友做爱的过程，他把这卷16毫米的自制录像带保存了起来，连同成箱的个人文档、纪念品、相册和笔记本搁在一起，这些东西记录、描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从很小的时候起，虽然十分害羞、不受欢迎，他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相信自己与众不同，自己的存在早晚要成为公众事件，因此任何经历都得小心谨慎地记录下来。他还留着小时候画的画，从小学到参军时期、从大学到结婚再到创办《花花公子》的照片也都精心保存。他还不断地更新这些材料，收集平时的信件、笔记和照片，其认真细致简直像深知自己藏品价值的博物馆馆长。

没有录下和写下的部分，海夫纳都全神贯注地观察铭记，他连周围景物的质地也记得一清二楚，能看到自己站在中央。他13岁时，有天晚上去参加童子军集会，透过隔壁一扇半开窗子的阴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脱衣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除去衣服的女性身体，为之倾倒。几十年后，他仍然能鲜明地回忆起当时的所见所感。

海夫纳从未在家里见过裸体。母亲在家里活动都会穿戴整齐，换衣服也要小心地把门关上。夏天，父亲带他和弟弟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在男更衣室里穿泳裤都会背对着他们。海夫纳把自己早年的羞涩归因于父母在泳池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多裸露的肉体，公然冒犯了他们传统的谦卑态度。在海夫纳对泳池的记忆中，还包括他一直没学会游泳这件事。他早年对水极为恐惧，因为曾经被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哄骗着，跳下了没过头顶深的泳池，差点淹死。虽然游泳技术娴熟的父亲也试着帮他克服恐惧，年青的海夫纳却执拗不听，有天父亲挫败又愤怒，打了他一顿。

父亲这样的情绪爆发十分少见，几乎令他欢喜，这个冷淡克己的男

人平时很少对家人表露感情，多数时间都在芝加哥一家大公司里做会计。老海夫纳一周工作六天，有时要工作七天，他觉得能在大萧条期间有工作就是万幸，能当会计更是交了好运。休和小他三岁的弟弟基思，基本上完全由母亲格蕾丝抚养。母亲身材娇小，细声细语，礼貌周全。和丈夫一样，她19世纪末出生在内布拉斯加的农场，成长在虔诚的原教旨主义气氛中。在20世纪的芝加哥，她也想延续这种虔诚。

她的家里从来没人喝酒、抽烟、骂街、玩牌。周六她偶尔会带孩子们看场电影，但周日在海夫纳家一定是礼拜上帝的日子。男孩们要是在屋内觉得憋闷，可以去坐在后院里的工作台边上画画，或是用她给的彩色黏土捏东西。休·海夫纳对画画与雕塑驾轻就熟，这种活动在他眼里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他经常是一副对黏土人物着了迷的模样，倾注了别样亲密的感情，如果这会儿母亲从后门那边叫他，他也会听不见。

在学校他整天做白日梦、游手好闲，对课堂进度毫不在意，老师把告状的信件寄到他家里，弄得母亲难过又难堪。她自己结婚之前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当老师，而且虽然她确信休的智力没有缺陷，却被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态度搞得手足无措。她第一次注意到他逃避外部世界，是他4岁患了乳突炎的时候，他从自己感染的耳朵里揪出药棉，全神贯注地捏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后来，他就完全沉迷于画些怪物、疯狂科学家、宇航员和调查局探员一类的东西；屋里电话响了，他好像也听不到，虽然听力完全正常。他坐家里的汽车会晕车。咬指甲。偶尔说话还结巴。在游泳池差点溺水的经历更让他深深退缩回自我之中。最后，母亲终于带他去了伊利诺伊州青少年研究所，请教儿童心理专家。经过一系列检查，他们总结说休的问题十分特殊。休·海夫纳是个天才，智商高达152。但是，医生补充说，他在情绪方面存在缺陷，就年龄来说社交能力很不成熟，他们还建议，海夫纳太太应该在家里多表现一些温暖、爱意和同情理解。

鉴于格蕾丝·海夫纳十分端庄持重，连儿子的嘴都没有吻过——后来她解释说是因为害怕传播细菌，医生的建议无疑是种挑战。但关于休智力超群的报告鼓舞了她，加上她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她的确在家里努力做到支持、理解儿子。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她的支持和理解演变成了对休·海夫纳卧室墙上裸体招贴画的容许。

招贴画的风格颇为独特，是阿尔韦托·巴尔加斯和乔治·佩蒂登在《时尚先生》上的作品。40年代《时尚先生》在芝加哥发行，是当时美国最为伤风败俗的男性读物。休·海夫纳去小学同学家里玩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它，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广告设计师，订了这本杂志。《时尚先生》里的所有内容都让年青的海夫纳兴奋不已——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写的浪漫冒险小说、老爷车的照片、内涵深远微妙的漫画、风景名胜的游记，还有每月拉页上精美的彩色美女图画。

海夫纳用这类淫靡的东西装饰房间，母亲虽然不甚赞成，也是默许的，因为他的功课突然间好了起来，似乎也决心开始追求某种模糊的艺

术目标，母亲不忍阻挠。他的绘画和卡通画以前都散落在家里，现在则登上了由他编辑的初级中学的报纸，以及他精心编纂、时时更新、图文并茂的私人日记里，每天他对同学们和自我的观察都记录在册。虽然海夫纳不擅长运动，面对女生十分害羞，作为记录者的他却和同学们保持着紧密的社交联系。

高中的前两年，他也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后来他逐渐崭露头角，凸显自己的存在感，既观察，也参与。他参演班里的话剧和讽刺剧，也帮着写剧本。他当了学生会的主席，文学俱乐部的副主席。他为学校董事会做过广播，也想过将来做新闻主播或电影明星。他习得了娴熟的舞技，面对女孩也放松多了。他约会过的女孩里，最近有一个的照片登上了学校报纸，她刚刚被选为斯泰因梅茨高中的学生代表。虽然当选以前她对他并没多大吸引力，可当选这件事迅速影响了他，让她变得魅力十足——她现在象征着全体学生的渴望，成了崇拜的对象，他被她身上的光环吸引住了。他经常约她出门，一天晚上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他开始触碰她，手伸到她裙子下面，放在大腿之间。这是他高中时期最大胆的性举动，他将会铭记终生，虽然之后并没有做进一步的事情。

1944年他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成绩在212名学生里排前四分之一，还被同学们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第三名。他计划着上大学，不过因为被征召入伍推迟了。此时在亚洲和欧洲，“二战”正在进行，还有一年才会结束。他母亲知道自己要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只会无休无止地担心儿子的安全，便在芝加哥一家油漆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谋了个职位。虽然休也多少对当兵感到惶惶不安，倒是很高兴有了出远门的机会，此前他都没走出过芝加哥。不过就在入伍仪式两周之前，他遇到一个姑娘，突然让他想晚些再出征。

她是个浅棕肤色的美人，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有风韵。她头发又长又直，剪着齐刘海，友好的举止也让他很快就放松下来。她叫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而且，虽然他俩在斯泰因梅茨的毕业班里是同学，以前却一点儿不熟，海夫纳对此惊讶不已，因为他特别喜爱这种浑然天成的美貌。好多次，他约她一起去派对跳舞，送她回家，抓紧没入伍的时间同她约会。

1944年夏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接受基本训练，常常写信给她。他有时感到军旅生活的无聊，有时又为此惊骇不止。作为一个理想化的18岁青年，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性经验极其有限，甚至连自慰也没有过，休·海夫纳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军营里典型的粗俗与世故所包围。他虽然努力适应，却没有过度放纵。他也去士兵俱乐部里跳舞，但并不追求基地附近的女人。一闲下来，他就去看电影、画漫画和素描、给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写充满思虑的长信。虽然了解不深，但她已经深深存在于他的幻想与梦想的未来之中。

休假的时候他回家看她，她也没有让他失望。她在性爱方面严格遵

守当时的社会道德，拒他于千里之外，这却增加了她身上的挑战性和神秘性。她笃信天主教，拒绝婚前性行为，作为刚上大学的年轻女孩子，她也怕被牵扯进复杂的问题，影响学习。虽然米尔德丽德有着美国女孩标准的无忧无虑的面孔，家里却愁苦、拥挤。她父亲在芝加哥做公交车司机，挣的工资勉强才能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虔诚的母亲也只能靠宗教信念苦苦支撑，觉得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惜并没有。所以米尔德丽德很早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相信要过得好也只能靠自己。她从不偷懒，在学校发愤学习，傍晚和周末还为了上大学打工存钱。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她晚上在图书馆工作，计划将来做老师。她没有加入女生联谊会，没时间约会。暑假也每天工作，毫不懈怠，海夫纳休假回来看她，她都不请假。他虽然不痛快、生闷气，暗地里却佩服她的勤勉精神。她有点像他母亲，多年以前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内布拉斯加农村的父母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帮一点儿忙。

海夫纳自己的野心也一点儿不小。1946年退役之后，他也进了伊利诺伊大学，决心每学期都要尽可能选最多的课，夏季学期也要上满，这样他两年半就能读完四年的课程。他想要补偿那两年荒废的军旅时光，战争在大洋那一边打，他只是在美国各个基地之间转悠而已。他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成了一名大学生，20岁的他急切地想要重整旗鼓，定下人生目标，同时继续对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那近乎维多利亚式地追求。

目前为止他对她的了解，除了休假里有限的那一点儿相处时间，大部分都来自她写的信，信里的语气高度理想化，谨慎地表露出热情，鼓舞人心——这些信让他从军营的孤寂中解脱出来，也令他坚信，她就是自己心中那个浪漫形象的化身。

但现实比他的理想还要美好。1946年他与她在伊利诺伊的校园里重逢，每周末约会，每晚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碰面，与她牵着手慢慢地走在他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一个秋天。她的相貌、她的动作，全都令他赞叹、惊羨，周围的世界也让他兴奋不已：大学生活新鲜的自由，其他学生对他这个退伍老兵的另眼相看，还有潮水般汹涌的乐观与自信——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许多美国人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鼓舞。

作为每周末的娱乐活动，海夫纳在学校附近的机场学习特技飞行，一年之内他就考取了飞行执照，驾驶着双翼飞机在空中翻转、熄火、绕圈。他模仿弗兰基·连恩的风格，在学生舞蹈乐队里唱歌。他还创办了本大学幽默杂志，在心理学专业拿了很高的分数，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外貌也富有魅力。他的漫画和文章发表在《每日伊利诺伊》上。为了活跃思维，他还写了部话剧，讲科学发现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话剧的结尾，政府认为公众无法接受事实，警惕地压下了这个消息。

海夫纳写这段情节的时候，是个不可知论者，后来也一直如此，与

他所受的卫理公会原教旨主义教育颇为背离。但他认为，自己拒绝继承家庭的传统，只是周围社会大环境变革的一部分。他在报上读到，企业家兼制片人霍华德·休斯发行了名叫《不法之徒》的电影，挑战了好莱坞的道德底线，片子里性感风骚的女演员简·拉塞尔和男人爬上了床。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虽说邮政部想将其作为淫秽读物清除出邮政系统，可它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从此可以不受阻碍地散布、传播。最近发现盘尼西林可以治疗性病，顿时减轻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放荡生活的恐惧心理。而且《金赛男性报告》，这份基于12000多份采访得来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虽然有清教徒节制的姿态，但其公民私底下可谓相当好色。一半的已婚男性在结婚期间与其他女性睡过觉，金赛报告还声称，85%的男人在婚前已经有过性经历，90%的男人会自慰，另外还有一项震惊了许多读者的数据——37%的男性至少有一次曾通过同性间性行为获得过高潮。

等等如是地发现让金赛教授陷入了神职人员、政客和社论作家的唾骂声中，休·海夫纳读了这本书却大为震动，他在自己创办的大学杂志《矛》里评论这本书说：“这项研究揭露出有关性爱的道德与法律是多么欠缺理解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的道德假面、我们对性的伪善态度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挫败感、犯罪行为和不快乐。”

最后这句也适用于海夫纳自己，虽然他在大学的前两年成就不少，性爱上却一直受挫。22岁的他还没有过性经验。他一次又一次想要引诱米尔德里德，但每次她都含着眼泪哀求他再等等。她不仅仅是由于宗教原因和害怕怀孕才这么想，还希望他们第一次做爱美妙绝伦，是在浪漫的环境里一次秘密的庆典，而不是和别的学生一样，是在借来的车里鬼祟匆忙的例行公事。

起先，海夫纳也同意她的观点，赞赏她的态度。她和他母亲一样，理想化得不同寻常，是个严肃、坚强、值得信赖的年轻女人，他希望结婚后能完全独占这女人。不过几个月过去了，海夫纳难以遏制性冲动和好奇心，于是周末约会时他们在他父亲的福特车里彼此爱抚，后来又变成了用嘴爱抚。一个周六晚上，他们坐灰狗巴士回学校，在黑暗的车厢里，两人的爱抚和亲吻变得愈加热烈，他催促她就在座位上用毯子挡着亲吻他的下体。虽然她对这种要求感到惊愕，但对毫无抵触和别扭就愿意答应的自己感到更加惊愕，她那一刻是多么渴望取悦他，要在一群毫无疑问心的乘客背后做这种事，甚至觉得兴奋。当她在黑暗中低下头，把他的下体含在嘴里时，不仅感到了爱情，也感到了戏剧性的自我觉醒。

即使不再定期去参加弥撒，她也没觉得这是道德感消退的象征，反倒觉得对未来的丈夫增加了忠诚，从他身上，她现在学到了许多给予和索取快乐的艺术。她惊叹于海夫纳对性爱的广博知识和关切程度。他孜孜不倦地读着婚姻手册、情色小说、裸体杂志，以及有关性法律和性审查的书。从他嘴里她第一次听说“性敏感带”之类的词汇，也通过他的嘴经历了第一次性高潮。

芝加哥的一个下午，父母都不在家的時候，他把她帶進二樓的臥室，拉上了窗簾；他從櫃子裡拿出閃光燈和照相機，稍加哄騙之後，米爾德麗德緩緩地脫下衣服，裸體站在他面前。靜靜地，滿心激動地，他開始拍照，她在床上的樣子，靠牆站着的樣子，以前那面牆上貼的全是性感招貼畫。很快她就跟在公交車上一樣，自然地回應起來，主動擺出姿勢，和他一樣欣賞着自己美麗的身體。不過她照樣對自己居然願意做這事驚訝不已，幾個月以前，這對她是不可想象、駭人聽聞的事情。

雖然她從未見過洗出來的照片，也不知道海夫納拿照片幹什麼用，她还是繼續對這些性愛片段懷有正面的情感，連仔細反思過之後也這麼認為。她覺得既然已經是大學畢業班的学生，對這些事情就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後來她也是這樣做好了準備，1948年春天考完最後一門試以後，她便去伊利諾伊州丹維爾的一家旅店裡找海夫納，当晚就與他做愛。

兩人相信這是天作之合，準備盡快訂婚。1948年夏天，海夫納回到了伊利諾伊大學的校園，米爾德麗德則在該州西北部一所小高中裡接受了第一份教職。由於兩人都沒有車，對工作和學習又十分專注，他們並沒有每星期都見面。見面一般都在芝加哥，在這裡他們的戀愛關係和將來的婚姻已經得到雙方家長的承認和支持。雖然為了這種皆大歡喜的局面，海夫納多少也在宗教觀點上讓了步：在米爾德麗德的要求下，海夫納跟一位神父學習了宗教知識，也答應將來讓孩子入教。這倒不是米爾德麗德宗教情感多深厚，而是因為她母親。海夫納一開始不願意，因為覺得天主教是反對性自由和個人隱私權的專制力量。從前他給米爾德麗德寫信時就總是表達這種觀點，他質疑教皇的無過錯地位，不同意教會在生育控制和流產方面的政策，譴責教會審查出版物的歷史，從中世紀至今，數以千計的情色書籍、圖片、電影和其他藝術形式遭遇禁令。雖然準備婚禮時他對天主教的态度絲毫未變，但功課太忙，他完全無心把這事鬧大；另外，他也清楚米爾德麗德內心早已脫離了宗教的控制，覺得結婚後完全不會有什麼問題。

於是他全身心撲在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上——1949年2月要完成大學學業，6月與米爾德麗德結婚，然後要迅速成為成功的漫畫家、作家和編輯。大學裡他在这三項上都有天分，這讓他增加了不少自信，也發現自己能吸引年輕女性，但他並沒有利用這一點。米爾德麗德畢業之後，他也一直忠實於她。虽说他曾經認為孤獨終老是種富有詩意的活法，可現在他急切地盼著同米爾德麗德結婚，特別是1948年聖誕假期他們正式訂婚之後，他從米爾德麗德那邊感到了一丝猶豫，於是更加焦急了。

他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是聖誕假期之後他們周末見面的時候，她有點忧心忡忡、緊張的樣子，春天他們第一次親密之後、她表露出的那種熱情也沒有了。他抱著教書給她帶來了新的壓力因此才會心煩意亂的希望，把自己輕微的煩躁壓下去，給了她很多理解和耐心。兩人獨處時，他偶尔也想引導她進行深入的長談，找到她煩惱的源頭，可輕柔的試探什麼也問不出，直接詢問她又會全盘否認自己有麻煩。

芝加哥一个寒冷的周末，他开着父亲的车，把米尔德丽德从家里接出来，去市中心看电影。电影名叫《暴劫》，主演是洛丽泰·扬。这部片子里洛丽泰·扬演的是个漂亮却拘谨的大学女教师，一个男学生来找她，说自己迫切需要指导和建议，于是她答应和他出去吃个晚饭。这天晚上，男学生开车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试图引诱她，不成之后，又想要强奸她。但她摸到一个钢质的东西，拼命打了回去，安全之后，却发现学生已经死了。她吓得要死，慌忙从现场逃掉，跌跌撞撞地跑到公路边，搭上了一辆卡车。她强打精神，一点儿没透露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全回到家，第二天继续教课。为了避免被认出和死去的学生吃饭的女人就是自己，她开始改头换面，穿时髦的衣服，弄时髦的发型，很快她就变得富有魅力、令人心动，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接受犯罪调查的时候，连公路上载她的司机都认不出来，负责谋杀案的警官和死者的律师也都深深迷上了她。

但最后罪恶感促使她说出真相。电影放到这儿时，眼里一直含着泪水的米尔德丽德抽泣起来，让海夫纳送她回家。一上车，她哭得更厉害了，海夫纳搂住她，温柔地轻声询问，可她情绪愈发激动，近乎歇斯底里。

最后米尔德丽德还是控制住自己，从座位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泪水映着车里昏暗的光线。她坦白，她和任教学校里的一个老师有了肉体关系。

海夫纳难以置信。这事对他冲击之大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像是还在看刚才那部电影一样。他坐在方向盘后，觉得头晕目眩、遭人背弃、孤独刻骨。米尔德丽德突然变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了解的爱人。她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解释事情的经过。她最早认识那个男人，是一个周五晚上，她要乘火车去芝加哥，他主动提出送她去车站。他们聊得很开心。她说，她从芝加哥度周末回来以后，工作日晚上他们有时就和其他老师一起玩桥牌。一天傍晚，在他的车里，他探身过来吻她，她也立即吻了回去，他们不停亲吻着，直到做爱。

后来他们又这么做了许多次，她继续说着，她觉得现在自己配不上海夫纳，他绝没有义务和她结婚。虽然叙述这些事情时她懊悔、难堪，却也觉得卸下了重担，甚至感到了自由。但她看到了海夫纳的眼睛，看到他在哭泣。她靠过去抱住他，说自己十分爱他，同时也不停说着他应该选别人做妻子。

但海夫纳摇了摇头。不，他说，他只要她一人。即便不愿承认，他现在比从前更加想要占有她，其他追求者的竞争激发了警戒心。他求她不要再见那个男人；米尔德丽德满心困惑和负罪感，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想相信这次短暂的出轨并非自己的本性使然，也很感激海夫纳愿意继续筹备婚礼。

他们于1949年6月15日结婚，婚礼在芝加哥圣约翰·博斯克教区举

行。米尔德里德穿着白色婚纱，得体地微笑着。后来与海夫纳及家人的合影里，她也是这种笑容。他们戴着兰花、头发花白的母亲和一身深色西服、神情严肃的父亲，肩并肩站在教堂外，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勉强装出一家人的表情。

婚礼之后，海夫纳开着父亲的车，带米尔德里德去了威斯康星州的黑泽尔赫斯特，在斯泰沙开的伯奇伍德乡间别墅度了短暂的蜜月。然后他们回到芝加哥，开始了共同生活，浪漫一去不返。

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夫纳大学毕业后没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他关于漫画连载的种种想法遭到了报纸的冷遇，最后只得在一家卡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就职。后来他发现公司拒绝雇佣黑人，便出于义愤辞了职。当时人才市场上挤满了求职的退伍军人，海夫纳又不愿勉强做不喜欢的工作，宁愿待在家里创作新漫画。米尔德里德要兼职好几份工作，比如在海夫纳就读过的芝加哥小学教书，以换取维持生计的钱。

为了省钱，他们住在海夫纳父母的房子里，想着这只是权宜之计，等休·海夫纳的漫画大卖了，或者事业有了起色，就能搬出去。可两年多过去，他们还住在那儿，芝加哥西北外围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小小的两层砖房，二楼老海夫纳房间边上的卧室里。房子建于1930年，休·海夫纳4岁时，花了1.3万美元，是他唯一的家。可现在，挤在这个家的小角落里，年轻时志向宏伟的梦想破灭了，同时妻子对他的性吸引也消失了不少。

不过米尔德里德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她不太想同他在家里做爱，因为床的声响很容易被隔壁的公公婆婆听到，她还觉得，自己和另一个男人的失态行为让海夫纳失去了浪漫的热情，也唤起了她童年时对性爱和快乐的罪恶感。享受了罪恶的性爱，她自嘲地给自己解释，现在要受到惩罚。惩罚就是毫无激情的婚姻生活，和公公婆婆住在幽闭狭小的房子里，丈夫整天在房间里画漫画，他从小如此，不过最近她注意到，他的作品有沦为下流的趋势。他为了自娱，画了“三明治与金发女”的色情版漫画。他往家买色情杂志，都懒得从她眼前藏起来，而从前他肯定是、现在也是要避开母亲的。

虽然婆婆礼貌周到、从不问东问西，但米尔德里德这些年来仍绷着根弦，从没有和海夫纳的父母讨论过婚姻问题。他们住得很亲密，感情却很疏远。老海夫纳夫妇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早各自去上班，晚上回来趁着儿子儿媳不用厨房的时候去做饭。这个家里极度地整洁有序、法度分明。米尔德里德住在家里这些年，从没见过海夫纳的父母情绪失控，哪怕一瞬间也没有。她从没听说过他们喊叫、哭泣、争吵或气得跺脚；也没见过爱情的流露，进门时温柔地亲吻，轻柔地触碰，亲切的话语，全都没有。米尔德里德倒不认为这是感情淡漠，而是极其抗拒表现感情。比起她感情外露、时常争吵的父母来，海夫纳夫妇便是节制、压

抑、克己的杰出代表。

米尔德丽德不清楚这种氛围对海夫纳家的小儿子基思有多大影响，他已经去外地上大学了，可对她丈夫的影响是一清二楚的。休·海夫纳和父母一样，想要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秩序井然他才最为舒心。从瑞典裔、虔敬派教徒的母亲那里，他继承了完美主义和道德规范；从德国裔、做会计师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一丝不苟与讲求实际。与父母不同的是，他会表达情绪。米尔德丽德感受过他的愤怒，见过他的眼泪。她认为他创作的色情漫画、买来的色情杂志，是他对成长环境的反抗，她同时也感到了结婚后他内心的烦恼之深，于是劝他离家一阵，暂时不考虑事业，回到曾经令他快乐的大学生校园里，读个硕士学位。

1950年，他这么做了，去西北大学念社会学研究生。但他在那里唯一的成果就是美国有关性的法律的学期论文，他认为大部分有关性的法律应当废除，因为它们既过时，也难以施行。性行为十分私密，很难由政府监管，像当时很多州还有即使夫妻之间也禁止口交的法律。虽然海夫纳广泛的调查研究得了很高的分数，可他的结论教授并不十分支持。一学期以后，海夫纳焦躁不安，离开了校园，想要在外面的世界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他先是在芝加哥一家百货公司里写广告文案，然后又在这家广告公司工作；第一份工作他主动辞职，第二份工作又被解雇。然后他进了《时尚先生》公司的推广部门，公司出版男性时尚杂志，还有口袋大小的高雅文摘月刊《花冠》。海夫纳迅速地想象着自己工作的地方充满创造气息，周围都是温文尔雅的编辑和漂亮姑娘。可工作之后，他发现办公室呆板沉闷，女同事土气又一本正经，男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完全找不到杂志彩色拉页里的那种活力。一天下午，海夫纳从口袋里拿出女演员卡门·米兰达的一张照片——她在舞池里旋转着，短裙高高飘起，没穿衬裤，他把这张照片拿给《花冠》的主编看，可他转过头去，毫不动容。

1951年，公司宣布要把《时尚先生》和《花冠》的推广部门搬到纽约，海夫纳加薪5美元的要求刚刚被拒绝，便辞职留在了芝加哥。他喜欢芝加哥，而且自我感觉也变好了一些，因为有家独立出版商要把他描绘芝加哥的绘画和卡通出版成书，发行5000册。虽然这本书并没赚来多少利润，媒体的评价却让海夫纳得到了本地人的注意。他预见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出一本铜版纸杂志，专门讲述芝加哥的城市生活。

在这段过渡期之后，海夫纳找到了一份每周80美元的工作，比《时尚先生》那边还多20美元，为芝加哥一个杂志大亨做推广经理。大亨名叫乔治·冯·罗森，是个精打细算、有远见的男人，他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求职失败，为几家音乐杂志做过营业主任，其中还有一本是迎合清教牧师口味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二战”之后决定起家做出版商，想在日渐兴旺的大众情色杂志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战争期间，纽约的出版商已经挣了一笔钱，比如罗伯特·哈里森主编的杂志——都叫《调情》《偷笑》《媚眼》或者《秀色可餐》一类的名字，对于美国内外孤独的服役士兵真是魅力不小。但哈里森自己就不能接受裸体，1952年还在自己的新书《机密》里面揭露了不少丑闻。他自己的性感杂志上只能登黑白照片，年轻女人穿着泳装、绸子睡衣和内衣，只比星期天《时报杂志》女式内衣广告稍微诱人一点儿——虽然讳莫如深，《时报杂志》也是全国主要的供读者私底下“打飞机”的杂志之一。

乔治·冯·罗森进入市场之前，其他提供自慰可能性的杂志包括刊登比基尼女明星的电影杂志，偶尔描绘落难时衣衫不整美女的冒险杂志，《阳光与健康》这样的裸体主义家庭杂志，还有发行量很大的《生活与服饰》：以十分诱人的方式，在呈现性唤起的照片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杂志。

30年代末期，《生活与服饰》将其刊载的争议照片定性为新闻图片：女演员海蒂·基斯勒裸身游泳、露出一边乳头，是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狂喜》中的剧照。这部电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轰动一时。后来《狂喜》在各地或被禁止上映，或被审查剪辑；海蒂·基斯勒搬去好莱坞接拍其他电影时改头换面，把名字改成了海蒂·拉玛。

1941年《生活》刊登了可能是“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招贴画：丽塔·海华丝穿着带花边的缎子衬裙，跪在床上；姿势生硬，可是莫名地性感——人气无可匹敌，除了一张贝蒂·格拉布尔的工作室宣传照，拍的是她穿着贴身泳装的后背，据说后来丽塔的照片被贴在了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上。1943年《生活》上粲然微笑的金发模特吉莉·威廉姆斯的照片上，圆点泳衣的裆部微微陷了进去，据杂志社说，他们收到了10万多封“狂热的”读者来信，她也收到了好莱坞一些小角色的试镜。

虽然有些出版商认为美军回国之后，招贴画的热潮就会减退，乔治·冯·罗森却相信一丝一缕的幻想已经渗透了美国大兵的性意识；战后的几年，他发行了一系列杂志，强调了他心目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枪炮、胆识和姑娘。这时有色情杂志的法律还不完善，还没有后来经宗教团体和邮政部高官煽动而成的长篇大论的立法，专门针对《阳光与健康》这种坚持在报刊亭售卖，也通过邮政系统每月寄送未修版裸照的杂志。邮政部号称全裸即淫秽，可支持《阳光与健康》的那些裸体主义组织成员，自认是异教徒而非色情作者，坚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他们精确描述裸体主义运动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在官方杂志里展示阴毛的权利。

非官方发行的裸体主义杂志也要求类似的权利，其中一本——《现代日光浴与保健》——就是由乔治·冯·罗森出版的。他遵守了不能出现阴毛的邮政系统规定，可几乎是独家刊登了年轻女性丰满身体上的乳房和乳头。有些模特还违背裸体主义的传统，摆出独自处于室内的姿势，与

《阳光与健康》颂扬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家庭聚会相距甚远——这也令关于乔治·冯·罗森的流言显得有理有据，说他从合法途径拿不到好看的裸照时，不反对用脱衣舞女做模特。

一看就像脱衣舞女的女人频频出现在冯·罗森的《艺术摄影》杂志里。不过，似乎是为了对审查者保证杂志的立意高尚，裸体模特都像雕塑一般凝滞、暗哑，如同古典雕塑中大理石的裸体少女，她们面无表情，眼神单纯无害，与隐藏着邪念的相机镜头没有接触。

冯·罗森对待其他更加火爆的色情杂志可没有如此小心谨慎，因为他觉得只要模特穿上点类似于衣服的东西，她们就能更自由地做表情，例如对镜头眨眼啦，抛媚眼啦，扭动臀部，或者半张着嘴微笑。

他最成功的色情杂志在1951年创刊，不久休·海夫纳就加入其中。这本杂志叫《摩登男性》，它创刊号上的封面女郎是女星简·拉塞尔，她微笑着坐在围栏上，穿着边缘磨损的短裤、紧身运动衫和皮靴。虽然《摩登男性》采用窥淫狂式的拍照视角，冯·罗森倒不认为自己是个色情狂，他觉得自己是敬业的商人，给一个渴求漂亮女人照片的市场注入效率。这种效率很超然，和他将练习曲卖给学钢琴的学生、把《阐释者》与《布道文评论》卖给传道士没什么两样。在《摩登男性》中他首要面对的编辑问题不是男人想要看什么，而是想要读什么。同时他还得想法讨好审查员，在杂志的正文部分加入但愿能挽回社会价值观的东西，以求中和杂志中过多的乳房和臀部。

决意不在淫秽读物和政治异见的边缘走钢丝，《摩登男性》的正文内容中规中矩，和与性无关的户外男性杂志（例如《真相》和《大商船》）的内容非常类似。在它的创刊号中，有关于热爱登山运动的文章；有在演员达纳·安德鲁斯的小船上对他的采访，他提供了许多如何驾帆船的建议；有介绍时髦的定制车（例如捷豹1913）的栏目；有一个关于巴黎皮加勒广场的附图随笔；还有一个针对经典枪支收集者的购物指南。读者对这个购物指南的热烈反馈，加上对之后几篇写收集枪支和打猎的文章的反馈，最终促使冯·罗森又创办了另外一些只讲这些题目的杂志。在《摩登男性》中唯一谈得上创新的也许是冯·罗森决定既登载活泼可人的半裸美女，也登载严肃的全裸艺术模特。海夫纳后来在《花花公子》中也效仿了这种组合。

冯·罗森在《摩登男性》刊印的第一年花了数千美元来买安德烈·德迪耶奈什——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摄影师——的作品，以求展现最体面的裸体艺术摄影。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曾在30年代拍摄了一系列在杜乐丽花园、卢浮宫和其他大博物馆中展出的欧洲艺术和雕塑作品。战前《时尚先生》刊载了杜乐丽花园的很多古典裸体雕塑摄影，但在冯·罗森创办《摩登男性》时，《时尚先生》的编辑们已经逐渐取消了这种“小骚动”，尽管自1933年创刊以来这些就是杂志中重要的调味料。不只是因为《时尚先生》的编辑们觉得男性杂志在战后的美国马上就会过时——很多老兵已经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接受了高等教育，也因为杂志社

已经厌倦了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风流形象辩护。尽管它赢得了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杰出的天主教徒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提出的淫秽案起诉，打官司却是既费钱又费时，从1942年一直持续到1946年。

此前，《时尚先生》的管理层就已经受到过教会成员的威胁。在其下属的另一本杂志《肯》中曾刊载了一篇贬损天主教会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将军的文章。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这篇文章一付印，教廷就鼓励神父们在礼拜日布道时抨击《时尚先生》的出版物。不久，大范围的抵制活动就在销售《时尚先生》《皇冠》，尤其是《肯》的报刊亭展开，加速了《肯》的早早停刊。所以1951年时，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的裸体照就刊载在了《摩登男士》而非《时尚先生》上，此时美国最大胆的出版商毫无疑问是乔治·冯·罗森，直到海夫纳在1953年后以《花花公子》超越了他。

从某些方面看，海夫纳和冯·罗森非常相像。都是在中西部的清教徒式的家庭里长大，父亲都是有日耳曼——美国血统的会计；两人都井井有条、野心蓬勃、沉迷自我。冯·罗森比海夫纳大11岁，精瘦活跃，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健壮整洁的仪表看起来像一位海军司令官，他也确实像管理一支舰队一样掌控着自己的杂志。他要求下属们绝对守时，办公隔间里要绝对整洁，要以正式礼节对待他。公司里的气氛几乎是死气沉沉的，他雇佣的那些来自中西部的保守男女职员对裸体照、排版等感情上都是漠然的——冯·罗森自己就是这样，这点休·海夫纳就很不一样。对冯·罗森来说，杂志仅仅是一种高效、有利可图的商业运作；对海夫纳来说，杂志是他个人的热情。

假如冯·罗森没怎么看出来这种区别的话，原因大概是他们共事时他并不了解海夫纳，而就他了解的那点儿来看海夫纳只是等闲之辈。他觉得海夫纳的漫画非常平庸，于是一张也没有在杂志中发表，而有天海夫纳拿着个包裹进办公室说这是一部非常棒的色情电影时，他还多少有点儿震惊。海夫纳亲切地提议为员工放这部电影，冯·罗森断然拒绝了，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想看这样的电影，也对海夫纳竟然在上班时间提议放这种电影感到恼火。尽管海夫纳在营销部干得还不错，但他给人一种不安于一个职位、总有很多公司外的兴趣和冒险的印象。这种态度不招乔治·冯·罗森的喜欢。要是冯·罗森完全知道海夫纳是如何全神贯注于他的“兴趣”的话，他会感到迷惑多过烦扰，大概也会确信海夫纳在性方面确实有点儿古怪。

在这段时间米尔德里德·海夫纳怀孕了，他们也终于搬出了父母的房子，住进了芝加哥海德公园社区中一栋迷人的公寓。但是海夫纳对婚姻生活仍旧不满，与一个护士发生了婚外情，他不久之后就会和她拍一部性爱影片。这部影片在海夫纳一个男同事的公寓里完成，他把它当作个人的一次历险，完全是为了乐趣和体验拍的，没幻想着将来自己会成为专业电影制作人，甚至是色情电影制作人。但是，他倒是知道自己未来的职业肯定和性有关，因为性越来越占据他的头脑。他拓展自己的好奇心，对别人的性生活几乎和对自己的一样兴致盎然。他继续读了很多关

于性法案和性审查的书，古代的社会习俗与仪式，还有国王、教宗，以及像加尔文这样的神权领袖是如何宣称某些给人快感的个人行为是被禁止且会受到惩罚的，以此达到控制大众的目的。他读了很多经典的小说，例如薄伽丘和亨利·米勒的——很多退伍老兵在“二战”期间找到这些书，把它们偷运回了美国。海夫纳在艺术书中研究大师们如何再现裸体画，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安格尔、雷诺阿、鲁本斯、马奈、库尔贝，以及很多其他人经常画出裸露的性器、公然袒露的乳房，眼睛更直接地看着观赏者，比冯·罗森在他的摄影艺术杂志里允许印出的更甚。冯·罗森的杂志里是否出现过这么挑逗的形象令人怀疑：比如马奈1865年画的几乎是淫荡的年轻裸女；库尔贝画的两个肉感十足的裸女相拥而卧；或者戈雅的《裸体的马哈》，斜倚在枕头上，双手扣在脑后，她的眼睛紧盯着观赏者，阴毛裸露。

当然这些作品和男性杂志里图片的不同之处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艺术。但是什么被提升为艺术，什么被贬低为淫秽，在不同时代总是根据受众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大博物馆里悬挂的裸体艺术是专为委托画家作画的贵族和上流阶层创作的，但杂志里的照片是为街上的一般人印刷的，他们的博物馆就是街角的报刊亭。

就是针对后者，审查者们希望能够保护一般人免受淫猥的侵害，当然也为了控制他们。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针对出版商卢·罗森的有罪判决，他的期刊《百老汇》中的女性照片被定义为“淫秽低俗”。这是在“考姆斯托克法案”下的第一个联邦判决，此法案得名于美国历史中最可畏的审查官安东尼·考姆斯托克。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是个报复心很强的福音派教徒，184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一个农场。10岁时母亲的过世使他变得格外阴郁，他一生都极度崇拜母亲，之后也将他领导的净化运动献给她。

考姆斯托克青少年时过度沉迷于自慰，他在日记里承认这几乎让他想自杀。他十分相信色情图片和文学有内在的危险，也知道政法部门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1842年一项联邦法律已经禁止进口法国明信片，内战时期考姆斯托克在康涅狄格州兵团服役时仍旧经常看到士兵们传看这种色情卡片。战后他在纽约看到下百老汇区聚满了妓女，或者看到路边小贩兜售淫秽杂志和书籍，同样感到震惊。

那时并没有反淫秽出版物的联邦法律，尽管早在17世纪马萨诸塞州就有了反淫秽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并非从性的角度来定义“淫秽”，而是认为反对既有宗教的文字和话语是“淫秽”。例如，在该州清教徒聚居区，直到1697年渎神罪的刑罚仍旧包括死刑，甚至之后的法令规定罪犯可以受到被烫烙铁在舌头上穿孔等方式的折磨。清教徒势力强大的马萨诸塞州也立法反对传播、占有宣传贵格会 [8] 思想的宗教书籍，1711年对唱“不敬歌曲”也增加了处罚，罪犯有时会被戴上颈手枷。

直到181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男子才第一次因性方面的淫秽接受传唤——他展示出售一张“下流”男女的图片；但因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最终是依据1663年的英国判例法将他逮捕的。判例是“雷克斯诉塞德利案”。此案中，塞德利被判罚款和关监一周——因为他在酒吧的露台上赤身裸体，醉醺醺地嚷脏话，把瓶子里的尿倒向其他顾客。尽管这场闹剧和美国人被抓到展示色情图片这事儿没什么相似性，但宾州的执法者认为二者都违背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共礼节以及宗教要求的伦理标准。

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此前也在英国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里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

殖民地时期在美国领导者的私人藏书里发现有性方面淫秽的书，例如奥维德、拉伯雷、乔叟和菲尔丁的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为当时能读书的基本上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文学审查并不像后世那么重要。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读会写，大批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在扩张的国家里无法像原来那样控制日常生活后，审查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加上学校更多，包括1820年建立的第一所公立高中，政府越来越关心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书籍；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于19世纪60年代

在纽约替他的审查运动辩护时，也同样表达了对于青少年的担忧，想保护他们免受腐化。

内战后考姆斯托克百无聊赖地在纽约一家食品杂货铺当店员，之后又去做纺织品推销员，但他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活跃成员。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他持续不断地请求公共职能部门强化和促进反不道德、反性表达的律法。他坚信色情读物和图片会给青少年带来灾祸，也会让成年人因自慰、通奸、堕胎和性病而堕落。

尽管很多政客同意考姆斯托克的结论，但他们却不大愿意支持他矫枉过正的方法——包括使用密探、间谍、诱饵及私拆信件等，因为这些威胁到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更像是当时英国为对抗不道德行为而采取的压制性措施。1864年英国政府为了消灭性病，立法强制那些被怀疑会传播性病的女性就医，并规定她们在被治愈以前必须身着黄衣。在医院里这些女性被隔离到专门的、被称为“金丝雀病区”的地方。这一举措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女性主义者的抗议成功废除了这项法令。

英国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治疗自慰的方法，包括一种贞操带——父母在儿子上床睡觉前绑在他两腿间。这种小玩意儿有些外面装上了铁钉，有些有铃铛，只要这年青人碰他的性器或者勃起，铃铛就会响。

彼时，公民反堕落社会组织充斥于英国，不仅攻击妓女、通奸者和所谓的色情文学作家，也追击一些性教育手册的出版商。这种组织其实以不同形式已在英国存在了几个世纪，17世纪中叶尤其显著，因那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废除了会引起渎神的败坏源头——戏剧。但19世纪中期，在维多利亚女王英明的治理下——大概也是见不得光的性行为达到顶峰、色情读物泛滥的时候，反堕落组织愈发狂热化，此时一系列压迫性的法律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有一项法律允许政府搜查私人店铺，看有没有淫秽物品出售；同时，1868年时英国的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得严格到成人不管读什么看起来不适合儿童的东西，都会被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法者禁止。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为所有“会使看这类读物、脑子容易受到不道德影响的人腐化堕落”的东西。这项法律还允许法庭在即便书中只有少数与性有关的段落的情况下将整本书判定为淫秽，也不管作者为何要写这些个段落。

更加惊人的是，这项1868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不仅比这个在位六十余年、死于1901年的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女统治者 [9] 活的时间更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仍旧影响着英国和美国对淫秽的定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如此大胆地反叛母国的美国，在性立法方面倒是对英国法律卑躬屈膝。而没人比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更成功地强化了美国的清教徒之根，他自己管自己叫“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

对反对者毫不在意，考姆斯托克和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追随者精力

旺盛地向纽约州立法院和华盛顿的联邦机构请愿，要求设立更严格的反堕落法律来对抗不道德行为，而此提议适逢其时。经过内战后的混乱、持续不衰的街头犯罪和穷困，还有强盗贵族的丑闻后，联邦政府对任何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自己的无能腐败中转移开来的借口都求之不得，更别提这个提议还能加强对桀骜不驯的公民的控制。再加上一些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相信性放纵会影响工人工作，于是也青睐收紧对大众道德的规范。教会团体意识到那些街上的妓女和售卖“争议文学”的报刊亭，觉得早该有场变革了，也觉得作家们变得过分不敬神了，包括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刚因为写了“下流读物”《草叶集》被内政部解雇。

考姆斯托克宣称，更坏的东西还在出版界大行其道，作为证据，他向国会出示了成箱的婚姻指南、色情小册子，还展示了一些图片，他将其统称为“偷袭青年人道德的秃鹫，悄悄把尖利的爪子伸向他们的心脏”；由于一些著名人物也支持他的观点——像肥皂制造商塞缪尔·科尔盖特 [10] 和银行家J.P.摩根（他本人也收藏情色作品），1873年考姆斯托克终于说服国会通过了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该法案由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签署，包含的修正案中指定考姆斯托克负责邮政部门一个特殊的反色情机构。两个月后，考姆斯托克成立的组织——纽约反堕落协会，由国家立法机关给予了调动警察的权力，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有了持枪权。

之后多年里，考姆斯托克和他的协会恐吓出版商，逮捕了数百名持有问题作品的公民，还导致15名被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女性因不堪忍受公开审理的耻辱而自杀。针对这些女人的种种指控包括卖淫、堕胎、售卖节育工具，以及——比如艾达·克拉多克——写作了名为《新婚之夜》的婚姻指南。

纽约出版商查尔斯·麦琪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关了一年，外加罚款500美元，只是因为存货里有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卡纳尔街的一家书店老板也因为出售阿什顿博士的《人之天性与婚姻指导》而受到了类似的惩罚，虽然此书在纽约的书店里已经长销20年了。钱伯斯街上一个年轻的卖报人，禁不住有顾客纠缠不休、非要出高价买色情图片，弄到图片之后，却没想到买家是考姆斯托克的线人，结果坐了一年监狱。

考姆斯托克在纽约给人定罪的依据大多靠诱骗得来。他本人，或是他的协会成员，假装成顾客，或者用假名写挂号信，寄钱去购买某些书和册子，然后这些东西就成了法庭物证。由于贩卖和传播节育信息都属违法，许多毫无戒心的药剂师因为出售安全套或许多女性因为只是为了保洁才使用的橡胶球注射器而被捕入狱。

摄影工作室时常遭到突袭，翻查文件里是否有色情图片。一位幻灯片放映者受到调查并被捕，只因为他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放映了几张裸体雕塑的照片。1878年的一个晚上，考姆斯托克和协会里的五名男性成员来到了格林街224号的一家妓院，给了三个女人14美元让她们跳脱

衣舞，之后考姆斯托克便掏出左轮手枪，以有伤风化罪逮捕了她们。

对考姆斯托克的这些手段，各大报纸鲜有不满之词。发行商和政客都觉得，反对考姆斯托克可能会被解读成姑息犯罪，自己的私生活大概也会受到他的检查。不过，几家小规模、代表了当时地下新闻界的刊物，倒是慷慨陈词、批评了考姆斯托克，特别是编辑部位于下百老汇的《真理探寻者》周报。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对《圣经》也充满质疑的业主兼编辑D.M.本内特，受托马斯·潘恩影响，偏爱的社论话题包括避孕、向教会财产征税，以及尊重考姆斯托克否认的那种自由。

文章中，D.M.本内特将考姆斯托克比作托克马达——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首任大法官，还有17世纪的“猎巫者”^[11] 马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本内特写道，“仗着法律权威，在英格兰诸郡悄无声息地潜行，伺机抓人，而考姆斯托克也有着类似的法律权力，潜行于美国的某些州，用同样的方式抓捕倒霉的猎物们。”

鉴于淫秽行为如今在美国已是联邦重罪——最高可处以5000美元罚款，10年刑期——本内特强调政府应当明确“淫秽”的定义，让每个市民都明白它的含义，像谋杀、致死、强奸、纵火、盗窃和伪造文书这些罪名一样清晰。但遗憾的是，淫秽罪的定义并不清楚，不同的公民、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公诉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读，结果就是，这个罪名留在法律书籍里，以便有权的人随时随地、以各种理由对其利用，制造新的罪人。

如果像考姆斯托克说的那样，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道德观念，情色材料的传播要被排除出邮政系统，那么本内特建议由家长、老师和保安来检查所有寄到家里和学校的邮件，省得政府人员和宗教狂热人士插手。本内特和他同时代许多著名的怀疑论者都相信，宗教组织是压迫人的、反智的，许诺遵守教条者死后能进入天堂、威胁不信者要堕入永恒的地狱，以此来控制、欺骗人民；宗教的礼拜仪式虽说基于虚无的神话，政府却不加干涉，因为它具有抚慰广大民众的功效，不然这些人就要上街反抗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了。

在本内特眼里，主流教会和政府结成了利益伙伴，共同让公众顺从权威，从而维持彼此的特权地位。教会不必纳税，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资产，自然乐得对政府在战争中不人道，乃至野蛮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则时常提供警力，支持教会侵犯个人隐私的行动。教会认定自己有权干涉人们在自家床上做什么事，能评判性爱的标准和目的，能控制文字和图片中对性行为的描绘，能通过审查制度消灭信徒脑中幽灵般挥之不去的不洁念头，从而将思想控制正当化，这激起了无神论者本内特的怒火，他觉得这背叛了美国国父们创立宪法的反神学基础。

无休止的激烈言论，加上大胆将之付印发行的鲁莽劲头，本内特无

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法律。1877年一个大风天，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本人，由美国法警副官作陪，拿着逮捕令来到了本内特的办公室。考姆斯托克神色凛然，指控本内特通过邮政渠道传播两篇低俗渎神的文章，都是登在《真理探索者》上的。一篇名叫《有袋动物如何繁衍后代？》，另一篇叫《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

面对考姆斯托克，本内特迅速争辩他有权利发表这两篇文章，而且哪篇都既不低俗，也不渎神。有袋动物的那篇是接收的投稿，是篇科普文章，精确谨慎地回答了题目的疑问。给基督的那封信出自本内特笔下，确实质疑了圣母玛利亚的处女身份，但他坚信思考此项奇迹并不违法。

考姆斯托克要是想找犯淫秽罪的证据，本内特说，《圣经》里有的是，有亚伯拉罕赶走小妾的故事，有强奸他玛，有押沙龙通奸，还有所罗门好色无度的辉煌战绩。考姆斯托克听得不耐烦，催本内特拿上外套赶紧走。他再不想听哪怕一句这种不敬神的话，本内特照做了，被押到百老汇大道和公园街路口的邮政大楼，关进政府专员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本内特被告知，保释金为1500美元，下周要参加审前听证会。考姆斯托克想让他成为邮政扫黄联邦法的头一个牺牲品。

获得保释后，本内特立刻开始准备辩护事宜，发表了攻击考姆斯托克和相关法律的新文章。很多人受到鼓舞，支持他的活动，其中就有他著名的朋友、同为不可知论者的律师罗伯特·G·英格索尔。英格索尔和本内特一样，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南北战争时期作为联邦骑兵上校英勇战斗，他参战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出于对奴隶制的反感。他父母在开战前20年就已经公开支持废奴，以致他父亲辗转于各个教堂集会之间，与做礼拜的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的时间比公共礼拜的时间还长。这场面影响了年轻的英格索尔，也与他早期对基督教美德的怀疑不无关系。

内战之后，罗伯特·英格索尔投身法律界，频繁参与一些当时很有争议的案件的辩护。他十分痛恨审查制度，自然成了考姆斯托克的敌人。如果政府要通过审查《真理探索者》上刊登的文章来支持考姆斯托克，那英格索尔巴不得替本内特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于是 he 就这样通知了华盛顿的邮政部长。

用来起诉本内特的证据文章，既不淫秽也不粗俗，无疑还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案子要是提交到最高法院，考姆斯托克的赢面不大；也许就是因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英格索尔的从中调停，邮政部长默默地撤销了对本内特的指控。

遇上这种境况，换成一般人，刚刚让政府和令人生畏的考姆斯托克吃了瘪，又想到审查者可能存心报复，今后也许就要小心营生，D.M.本内特可没有。他在报纸上大肆庆祝自己毫发无损，又加紧批驳考姆斯托克，催促政府撤销邮政审查制，呼吁避孕指南和避孕工具的合法化。他还写作并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讽刺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历史就是打着

神圣的旗号屠杀，以基督的名义进行血腥征服，教皇们多有奸淫、乱伦和谋杀之行。

本内特将使徒保罗描绘成不虔诚的改信者、伪善小人，还痛恨女人，开启了罗马教会中反女性的传统。保罗二世则是“粗鄙、虚荣、残忍、荒淫的教皇，最大的乐趣就是用烧热的火盆和恶魔般的刑具折磨异教徒”。在本内特眼里，耶稣会士都是制造秘密恐怖的党羽，他把马丁·路德称作“疯狂暴徒”，约翰·加尔文则是“老谋深算、残忍的偏执狂”。庇护四世“让教皇宫殿住满了妓女变童，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激情以平息欲火”；庇护六世犯有“鸡奸、通奸、乱伦和谋杀”罪；西斯都五世“绞死了60个异教徒以庆祝自己的加冕”。与此类似，本内特还描绘了数十位其他的教皇、圣徒、宗教改革家、传教士和清教徒，最后总结说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逊于教中任何一位前辈，逮捕、迫害、告发、毁灭着自己的同胞”。

这篇文章发表于1878年。那年本内特又一次被考姆斯托克逮捕，但逮捕令里只字未提他对宗教的批评，因为即便言辞激烈如此的文章，在言论自由修正案的保护下还是可能被辩护无罪。考姆斯托克手上有更好的材料，一本完全写性爱的小册子《丘比特之轭》，书中支持自由恋爱，诋毁婚姻，描绘了人们生活在不受束缚、充满情色的公社里的景象。书中大胆发问：“既然大脑和肠胃都是自由的，凭什么公民的性器官就要受神父和法官监视呢？”

虽然此书既非本内特所写，也不是由他发行——作者是已经入狱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思想家E.H.海伍德，但据说本内特一直在售卖这本书，以及其他具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地点是纽约伊萨卡的一次集会上。考姆斯托克十分确信，自本内特第一次被捕之后，这回有见识的人就不会那么急着公开支持他了。

但这次，公众对考姆斯托克的反对却不断高涨，这是他反淫秽改革运动的第五年，本内特又一次利用自己的报纸赢得了不少支持和用以辩护的经济援助。不过，案子还是闹上了法庭，一位严厉的法官——向美国法律体系引入了1868年英国的狭隘法律，规定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一部分被认定淫秽，整部作品即被判为淫秽，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判定本内特贩卖情色书刊有罪。法官随即宣判本内特在奥尔巴尼的监狱 [12] 做13个月苦工。

很快，数千市民向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请愿赦免本内特，还有风声说他要向最高法院上诉；但这些努力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因为考姆斯托克想法弄到了花甲之年的本内特写给一位年轻女性的情书，公开谴责其是好色的奸夫。本内特在狱中承认自己确实写了信，这令一些人更加不满，包括本内特太太和海斯总统的夫人；据说就是海斯夫人怂恿丈夫对释放本内特的请愿置之不理的。

本内特做满13个月苦工，身体垮了不少。刑满之后，他游历欧洲，

把报纸留给入狱期间代为管理的伙伴。1881年，本内特出版《异端在外国》，是典型的他个人风格强烈、不敬神明的文章及评论合集。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19世纪美国自由思想运动中的地位，接下来的几代人时间里，该运动吸引了众多出版商，包括伊曼纽尔·朱利叶斯——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饱受争议的“小蓝书”系列 [13]，开启了整个美国的大众市场平装书产业；塞缪尔·罗思——30年代到50年代时常因为出版违禁书籍而入狱；还有巴尼·罗塞特——最终用法律手段阻止了邮政系统的审查。

D. M.本内特死于《异端在外国》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宿敌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要长寿得多。直到1915年去世前，考姆斯托克还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1869年他尤其高兴，因为这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卢·罗森的有罪判决。卢·罗森出版的邮寄刊物《百老汇》，印有具挑逗性的女人图片，部分覆盖着灯黑 [14]，订阅者在家可以轻易擦掉。虽然罗森的律师慷慨陈词，以种种理由反抗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包括证据所使用的《百老汇》是通过伪造政府信件得来，而且卢·罗森自己并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这么容易就能被擦得掉的炭黑掩盖，最高法院仍旧支持考姆斯托克法案，卢·罗森被迫做了17个月的苦工。

考姆斯托克的去世并未使对色情产品的指控减轻多少；继承他衣钵的有邮政审查者、教会领袖、纽约反堕落协会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比如波士顿监防协会、芝加哥法律与秩序联盟等。

芝加哥联盟的带头人是阿瑟·B.法韦尔，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本来就有传教士的宗教热情；他父亲是当地的政治领袖，与某些芝加哥的骗子、恶棍和一个著名的鸨母在金钱和社会关系上相互勾结，这一打击性的消息传出，更加深了法韦尔的宗教狂热。从那时起，年轻的法韦尔就刻意与父亲疏远，对于任何利用政治阴谋或赌博牟利的人，以及从不道德的性爱中寻找欢愉的人，他也同样容不得。

在法韦尔联盟的不断呼吁下，大部分芝加哥的妓院1912年都临时停业了，1915年，联盟成功让芝加哥的酒馆在周日关门停业。美国禁酒令实施期间，政客与黑帮勾结，开办地下酒馆、挑起无数威士忌战争。法韦尔联盟打击政客与黑帮的利益联盟收效不大，部分原因是1919年《沃尔斯泰德法案》出台之后，芝加哥市受到种族团体的强烈影响——主要是爱尔兰人。这些人不同意禁酒主义者认为喝威士忌是恶习的观点，不过在性爱方面，爱尔兰人可能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

实际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是休·海夫纳那严肃清醒、卫理公会教徒的父母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芝加哥定居的时期，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多少取代了法韦尔式一本正经的清教徒在城市里执行性道德了。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移民为芝加哥输入了一支生气勃勃、充满狂热的天主教派，其基础是性约束和正统教义，这些价值逐渐反映在城市的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人们对非正统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不能包容。即便

在爱尔兰人还没有掌控市长办公室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他们经常能掌权——对于道德和性审查的正统天主教观点他们也不乏执行者，像州议会里占压倒性多数的爱尔兰裔立法委员、市政议员、选区领袖、州检察官、警官，以及和政治挂钩的教会人士。爱尔兰人比其他移民更快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登上新大陆就会说当地语言，团结在宗教信仰周围，过去在家乡反抗英国人的经历则让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井然，铁板一块。经由不同教派间的通婚和任用政治亲信，这种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慢慢地，从芝加哥南区的棚屋里、蓝领住的平房里、黑人不得入内的公寓楼房里，芝加哥的民主党机器开始成型。从这些地方走出了理查德·戴利市长，在他之前还有两位爱尔兰天主教派的市长，埃德·凯利和马丁·肯内利。

戴利的成长环境和一般白种人聚居地差不多，主要居住的是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俄裔犹太人；这些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社会观点保守的芝加哥人，死守着自己的家庭和贸易联盟，比起开明城市的移民，这里的人更加封闭、顽固，结成了一个投票集团，排外得可怕。芝加哥就是这样秩序良好、一潭死水、情感冷漠——市民对附近的剧院老板放场性感的电影如临大敌，对政治诈骗和极端的种族主义倒是见怪不怪。

少年休·海夫纳在罗克尼剧院做引导员时看的电影、成年海夫纳在其他影院买票看的电影，放映前都要受到警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人员通常是五位家庭妇女，都是警察的太太。海夫纳在冯·罗森的推广部门工作时，芝加哥主要的杂志分销商都拒绝运送冯·罗森的产品，因为性感内容太多，可能惹市政厅和教会领袖不高兴。因此，冯·罗森的杂志都是由一家规模小、野心大、胆子肥的公司派车偷偷送去各个报摊，这种公司就是卡车运输行业所谓的“次级”分销商。

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主要分销商，负责流通社会可接受的大众杂志，像《读者文摘》和《淑女居家月刊》，还有一个“次级”分销商，专门接主要分销商不愿碰的业务。芝加哥的次级分销商就是议会大厦新闻社，和其他城市里的这类公司一样，它把仓库设在偏远的小路上，窗户用砖头封死，省得路边有人打探。从印刷厂运来整车新杂志的卡车司机进仓库之前，先要按旁门的门铃，用对讲电话确认身份；然后大大的拉门才会升起，卡车进库，大门落下锁好之后，理货员会帮司机卸下货物，放在交接处。杂志的箱数要对照发票详细清点。一部分杂志是从纽约、洛杉矶这样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运货人开车穿越美国的次级运输路线，把货物卸到丹佛、得梅因、克利夫兰、哥伦布等地。大卡车离开芝加哥的货仓之后，议会大厦社的小型厢式货车会进市内向报商分发提前定好数目的杂志，一些商家偷着在柜台下卖杂志，或者用棕色牛皮纸包上寄给顾客。

议会大厦社送货物就像先前卖私酿威士忌一般小心，而且运货司机可能也大致固定，仓库里的箱子装的倒也不全是情色出版物。议会大厦社还负责分销一些学术和文学杂志，像《党派评论》，在芝加哥卖得不

怎么好，主要分销商没有兴趣。仓库里还有一些是对地方领导人和宗教领袖有所冒犯的政治刊物，比如共产主义者的《工人日报》。议会大厦社还分销所有的黑人出版物——《乌木》《黑人文摘》《棕色》，还有《芝加哥保卫者日报》。

议会大厦新闻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个经常赌马的芝加哥人，亨利·斯泰因博恩。一开始他主要代售股票行情报告，但也运一些当时认为伤风败俗或淫秽的杂志——《阳光与健康》《警察公报》《游民新闻》之类，印着“影坛新人”泳装照的影迷杂志，还有某些女性自白杂志。虽然这种情事自述类杂志里没有挑逗性的照片，但芝加哥和全美很多神父都认为其描述堕落史的内容和对私生活的曝光会诱发淫欲的思想，督促教区居民不要阅读这类杂志。（有意思的是，1868年英格兰第一例定义了淫秽罪的案件——律师界称其为希克林决议——源头就是对一本小册子的控诉，其中描述神父听了女性的忏悔，时常欲火难耐得要自慰，甚至在忏悔室里和信徒交媾的情节。）

随着“二战”期间色情杂志的流行，议会大厦社的生意，连同国内其他次级经销商的生意，都大为兴隆。议会大厦社在芝加哥市内分销罗伯特·哈里森的出版物（《媚眼》《调情》《低语》《秀色可餐》），还有另一个纽约出版商阿德里安·洛佩斯的杂志（《美人儿》《偷笑》《长官》《热门》）。战后纸张配额取消，开始出现新兴杂志，像《日夜》《欢庆》和《焦点》，里面都有一个刚刚出浴、来自加州的高个金发美女，名叫艾里什·麦卡拉的；还有一个魅力十足、带点邪气、脚蹬高跟鞋、气场强势的佛罗里达棕肤美人，叫贝蒂·佩奇。这两位比别的照片上的模特都红，是战后成千上万男人的幻想对象，而且到50年代依旧人气不减。这时黛安娜·韦伯刚刚出道，衣服越穿越少，在《阳光与健康》和冯·罗森的杂志里做模特。

冯·罗森的杂志越来越大胆，除了阴毛什么都敢入镜，议会大厦社的亨利·斯泰因博恩不禁担心起警察会突袭搜查他的仓库。他找了个新地方，租了更大的仓库，门口的公司名牌却很小。斯泰因博恩人生中第一次开始赚钱了，有十辆卡车在市内运货，其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报摊偷偷买进色情杂志。每卖一份50美分的杂志，报摊老板赚进10美分，亨利·斯泰因博恩也进账10美分。芝加哥每月卖出上千份杂志，很多出版商都雇律师当顾问，想知道照片里露多少才合法。一些律师说了自己的观点，另一些耸耸肩，说怎么定义淫秽罪，就看碰上哪个法官；于是斯泰因博恩的厢式货车明目张胆地往各个报摊送货，后来还送到一家书店里。一开始，这书店开在迪尔伯恩街，后来搬到了范布伦街。

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般书店都有的平装和精装书，但商店深处、柜台底下，则是次级经销商才会卖的书和杂志。

时间一长，很多顾客开始意识到这商店的货品之多样，时不时进店逛逛，和店员混熟后，就能得到即便不买也可以翻一翻色情杂志的特权。不过大多数顾客起码也买过一本，掖在外套底下，塞进包里；还有

两个人，可能是书店最大的主顾，几乎每本能买到的色情杂志都要。其中一个就是休·海夫纳。另一个年轻一些，叫哈罗德·鲁宾。

1955年的一天，狂风呼啸，《花花公子》杂志社里，休·海夫纳坐在办公桌前，斟酌着选哪张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做5月刊的跨页插图。他能听到街对面芝加哥圣名主教座堂的钟声传来。这是晚6点的祈祷钟，每日三次，提醒虔诚的信众，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报喜的故事，通过无性的奇迹，她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

天主教将性交视为耻辱，认为最有美德的人无需性事；这一否认的信条流行了数百年，其间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必须禁欲，期望未婚的教区居民保持童贞，将婚姻中的性交神圣化，称其目的是传播信仰。还把圣阿格尼丝这样的女人奉为楷模，因为她不屈从于男性的淫欲，宁愿作为处女殉道。

这种苦行主义距离街对面《花花公子》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远，要是海夫纳早先仔细想想这一点，可能会把杂志社选在远一点儿的地方。这巨大的天主教堂在街区里威风凛凛，《花花公子》的四层灰色小楼就蛰伏在其不以为然的阴影之下。

可是没有伟大的罪人，伟大的教堂也无以建成、存续，这么说来海夫纳也许选对了地方。不过像大多数不知悔改的罪人一样，他无法得到信者的祝福，而且几个月前他已经惹起了红衣主教的怒火，因为他在《花花公子》中重印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一篇中世纪故事，讲的是女修道院里一个园丁与几个欲火焚身的修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16世纪中期就谴责了这篇故事的教会，看到1954年9月它又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评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官署发出强烈谴责的声明之后，海夫纳就让议会大厦社的分销员把这一期从市内的报摊上撤了下来，不过这些杂志又重新被销往了其他城市。海夫纳的出版商生涯刚刚开头，不想加剧与宗教的冲突，本来他要处理一般性的商务问题就够忙了，何况之前还遭遇了很可能是教会成员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芝加哥的邮递员，就总是迟好几天才会送寄往花花公子大楼的邮件，经常会耽误杂志的订单。一般出版物都可以享有的、较为便宜的二级邮政特权，华盛顿的邮政部长也禁止《花花公子》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杂志有伤风化。连芝加哥的警察，在花花公子办公楼前的停车场执法也特别严，一有机会就开罚单、拖走汽车——因为这种差别对待，有一天，一个叫安森·芒特的员工报警说，街对面有辆违法停靠的车，那是芝加哥大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的豪华轿车。

警察一开始觉得安森·芒特在开玩笑；但芒特坚称，芝加哥的停车法规应当一视同仁地执行。警察问他要不要正式投诉。芒特说没错，然后

填了表、签了字、写上了自己的地址。一周以后，芒特正在家里，房东敲门说有两个警局来的人。他们穿的是便衣，芒特请他们进来，房东走了之后，其中一个突兀地问：“你对大主教有什么不满？”

芒特说他对大主教没什么不满，可没容他说第二句，另一个便衣突然暴怒，朝芒特冲过来，狠狠地扇他，然后把他撞到墙边。两人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芒特。他的第一反应是告他们殴打自己，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诉诸法律的结果可能比现在还糟，在法庭上对抗芝加哥警方似乎也是徒劳，白费时间，而且肯定会对杂志造成不利的公众影响。

虽然反对重重，《花花公子》却十分畅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它陡然而红，在全国的报刊亭几乎脱销，曾经认为该杂志不适合推广自己产品的广告商也回心转意，而他们从没想过去找海夫纳登广告还有可能被拒绝。

海夫纳绝不要登任何关注男性问题和烦恼的广告，讲谢顶、身体虚弱、肥胖的都不行。他在出版界发了笔小财，靠的就是卖强调“享乐”的杂志，将裸体女人与精明强干、开跑车、纵酒狂欢、住有真皮家具的精装修的单身公寓、夜夜饮酒作乐的年轻男性相联系。这美梦绝不能被那些广告玷污，让男性读者想起自己的粉刺、口臭、汗脚和疝气。海夫纳相信享乐主义能带来健康；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总往好的方面想。要不是这样，过去两年他也不会有所成就。

1953年海夫纳创办《花花公子》，初始投资只有600美元。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以他海德公园公寓的家具作抵押。他那年27岁，与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儿一起住，开一辆破旧的1941年产雪佛兰，不过，仍有金色的幻梦催他前行。

1952年，他辞掉了冯·罗森公司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儿童杂志找了份工资高但无聊的事，以腾出时间来策划自己的杂志。多年来他阅读、分析了无数杂志，从最廉价的招贴画到最光鲜亮丽、内涵深刻的刊物。海夫纳相信自己心目中的杂志与所有杂志都不同，甚至与冯·罗森的女郎杂志也不一样。

比如说吧，冯·罗森那本《摩登男性》里的文章，还有像《真理与商船》这种男性出版物里的文章，都是写给行动派的男性读者看的，他们喜欢打猎、钓鱼、收集枪支、深海潜水、登山等户外活动，这类冒险行动能加深男性间的友情，也就是“二战”中许多男人体会过的战友情谊。而像海夫纳这样住在城市里、喜欢室内活动的人，其阅读兴趣完全被这类杂志无视了。他们不喜欢打猎钓鱼，梦想是有一天住在现代化的单身公寓里，坐拥一套闪亮的高保真音响，换新女友加换新车。海夫纳将情爱冒险与社会地位和经济繁荣相联系，认为床上成功的男人做生意也成

功；虽然这只是理论可能，但他已经准备史无前例地在杂志里宣传这种观点。

性，在其他杂志里，是遮遮掩掩的背德和丑闻。男性杂志《雄性》每月刊登一篇叫《罪恶都市》的文章，痛陈美国各大城镇中腐化堕落的夜生活，像滑稽剧院，夜总会，妓院——每次文章旁边都配几张异域风情的舞女或脱衣女郎的照片。

罗伯特·哈里森的色情杂志把性爱描绘成怪异的行为，女主角们穿着高跟鞋、手拿鞭子、眉头紧锁，简直是严格按照清教传统对享乐进行惩罚。女性杂志则把性欲当作问题，请医生或家庭咨询师来解决并宽慰受害者。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现在也忽视性爱的存在，而那些充斥着性爱元素的杂志——便宜的低俗刊物和比《时尚先生》更大胆的小报——则把它当作深可厌憎又能无限挖掘的题目，标题都是《小镇姑娘有多放纵？》《堕胎生意之内幕》《数百万元的淫秽骗局》一类的。

“淫秽”也是大型都市报坐班编辑特别爱用的标题词，包括《纽约时报》，因为这词与他们身处的狭窄空间十分契合，能激起读者兴趣，还暗示了编辑的不赞成。编辑们最高兴的，就是有新闻既能满足他们谈论色情的兴味，又能抒发道德上的义愤。战后这类新闻的典型，就是没完没了地报道斯特龙博利岛上罗伯托·罗塞利尼导演与已婚影星英格丽·褒曼的绯闻，最后褒曼自我流放，离开好莱坞七年。

海夫纳策划杂志的时候，新闻标题里都是最近披露的性新闻，包括克里斯汀·乔根森的变性手术，冒牌继承人米奇·杰尔克的咖啡厅援交组织，还有1953年的金赛报告《女性性行为》。金赛的数据显示，大约50%的女性以及60%的女大学毕业生婚前就有过性行为，还有大约25%的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为。超过一半的女性会自慰，43%的女性与男性有过口交行为，还有13%的女性曾与另一个女人有过至少一次达到高潮的性体验。

虽然全国性的媒体对金赛的发现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些媒体作者依旧认为金赛比色情小说作家强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将其斥为“社会的害虫”。有些报纸认为报告结论会冒犯读者，不让该报告在新闻专栏中出现——《费城快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报纸本来要刊登，被宗教团体一抗议也就作罢。虽然舆论乱象丛生，金赛的研究却在科学界和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还成了产科医生威廉·马斯特斯研究人体性反应的灵感。

对海夫纳来说，报告证实了他多年的猜测——女人的性欲越来越强，而且他所属的战后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们父母年轻时的道德标准。海夫纳几乎是带着感伤的眼光，将父母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轨迹固定。他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批处女新娘。海夫纳的妻子就没有他母亲的这种美德，或者说束缚，海夫纳

自己也对女性追求更多性体验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喜欢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处，打算尽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对米尔德丽德订婚期间的出轨，他仍旧难过不已——这事让她变得不那么特别了，她已经为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为这事，他们的婚姻没能守住大学校园里浪漫的诺言，现在离婚看来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纳觉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灭了——米尔德丽德也这么觉得，他们大学时认识的几对年轻夫妇也是，现下各自离婚或分居。海夫纳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夫妻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愁眉苦脸地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住在城郊的家里，又太年轻，无法在循规蹈矩的50年代安顿下来，加入乡村俱乐部，被那位乘电动车巡视高尔夫球场的老将军会长所激励。

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体向美国大兵换些罐头食品和香烟；华盛顿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让媒体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轰炸广岛说成是神圣的浩劫。要过许多年，媒体才会完全从对政府的轻信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战中的阴谋、对亚洲事务的干涉等。

“二战”结束，美国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结，但还有几千名来自小城镇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国人没来得及调整角色——这些年轻男人不再与

历史大事有联系，慢慢地退却到和平时期较为琐碎的问题里，退却到私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将军装束之高阁，以纪念大洋那边甜蜜的诱惑和情书、街上人们的欢呼致敬；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成了超龄的学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战争时期女人把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对于这些人，这是个需要重新适应军队解散的时期，也是要承受尽快安定、拿房屋贷款、娶妻生子的压力的时期。很多人迅速且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调整，凭着工具箱和在战后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突围到城市的近郊和远郊，头一次开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车和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悦感。但海夫纳这样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寻找与市郊火车和凯鲁亚克笔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纳不想背着过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

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个错误。他按规则来，结果输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学校里守规矩，热心参加活动。退伍以后，他两年半就读完了大学，娶了他的校园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画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纸箱公司、广告公司、百货商场和三家杂志发行商那儿做过事。现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败的婚姻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

同年龄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业里未老先衰，海夫纳却重读了爵士时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索着生命的丰盛、闪亮的物品、与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尝爱情的琼浆。他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又不想要与这些目标相伴而来的限制。他考虑过无数种商业和爱情的冒险，在夜间散步的时候，看着芝加哥湖边奢华的公寓大楼，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体内涨满了青春的乐观热情，从前他在罗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游时的热情再高，海夫纳也想不到，才过了十余年，他就会拥有芝加哥最雄伟的摩天大楼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识会高悬在37层的大楼顶上，俯瞰不远处圣名大教堂的金色十字架。这样的事超越了他的想象，因为1953年夏天他设计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同时代有那么多男人有着同他一样的梦想和欲望。起初他觉得《花花公子》大概会有3万名读者，这还是拿到刊登玛丽莲·梦露那张著名裸照的许可后大受鼓舞的估算。

这张照片连同三张裸体照，是梦露1949年还在好莱坞一文不名时拍的。当海夫纳在《广告时代》上看到这些照片的版权归芝加哥城郊一个日历制造商所有时，他立即驾车去了印刷厂，没有预约就见了厂主，以500美元买下了他觉得最性感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她躺在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涩地看向镜头，半张着嘴，半闭着眼睛，而且什么也没穿，像她后来回忆的——“只穿了电台的广播”。

现在看来，500美元的出价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纳是当时唯一一个给日历制造商报价的人，可能因为只有他愿意冒风险，在杂志上全版印刷电影女演员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远远超过了艺术摄影杂志上那些一脸凝重的裸体模特。购买梦露的照片之后，海夫纳600美元的银行贷款只剩下了100美元，但他也拿到了创办杂志所需的劲爆卖点。这张照片，连同他极具感染力的热情，迅速令他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到了钱。

最早的一位投资人买了2000美元海夫纳新公司的股票，他是前空军飞行员，也是海夫纳的好朋友，叫作埃尔登·塞勒斯，从前和海夫纳合作拍过性爱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塞勒斯已经和妻子分开，为邓白氏公司做信用调查员。买了股票之后，他成了海夫纳的业务经理——正是塞勒斯建议杂志名叫作“花花公子”的，因为他母亲多年前开的一辆时髦汽车就叫这个名字。海夫纳本来已经确定杂志名是《单身派对》——要不是从招贴画杂志《单身汉》的律师那里寄来了威胁信，他可能会坚持用这个名字，之后他马上接受了塞勒斯的提议，认为“花花公子”这个名字能激起20年代以及他强烈认同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那种蓬勃精神的想象。

另一位贡献了50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是海夫纳的弟弟基思，基思和他一样热心研读色情杂志。母亲虽然对大儿子选择的事业大惊失色，却没说什么，还交给儿子1000美元，他父亲后来也做了杂志的会计。

《花花公子》正式发行前，海夫纳已经通过股票筹了接近1万美元，请了几个作家和插画家，还有一个刻工，这些人都同意用公司股票代替报酬。看了海夫纳的招股说明书和对梦露照片的描述之后，国内几十家二级杂志零售商——很多人都是他在冯·罗森手下工作时认识的——决定下大额订单订阅第一期杂志。到1953年夏天，订单总额已经超过了海夫纳期望的3万份。到了秋天，订单已接近7万份。虽然杂志如果在报摊上卖不出去，都可以退回杂志社，但这么多前期订单已经预示了成功，这也让海夫纳获得了印刷公司的极大信任，能在芝加哥东北80英里的工厂里印刷《花花公子》。

第一期的封面上是穿着衣服的玛丽莲·梦露，共48页，如预料的一般，专为喜欢待在室内的城市男性打造。他们认为单身是福，对婚姻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杂志主打的文章叫作《1953年的淘金小姐》，对离婚后被迫付不合理高额赡养费的男人表示了同情。杂志还重刊了薄伽丘有关通奸的故事，由金赛女性报告而创作的风俗插画，一对年轻夫妇在起居室里玩“脱衣猜谜”游戏的照片——根据海夫纳加的说明，这游戏对“玩腻了”的人们是绝佳的消遣项目。海夫纳自己就和米尔德里德以及另外几对夫妻在公寓里玩过，但脱衣服的程度对他还不够刺激。最近他想着让米尔德里德和另一对夫妇玩交换伴侣，虽然还没对她提，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既然愿意与另一个男人分享她，那他对她的占有欲、嫉妒心和深切的关注已然消失了。

除了中间插页上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照，那期杂志上还有海夫纳的

一幅漫画，一整页派对笑话，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进行日光浴的黑白照片，一篇足球评论，另一篇写音乐团体多尔西兄弟的文章——海夫纳上高中时，他们就开始出名了。杂志里最专业的一篇文章出自已去世多年的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安布罗斯·比尔斯，他们的文章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版权有效期在1900年以前，不用付稿酬。

海夫纳不得不重刊著名作家的旧作，不光是因为预算紧张；他也愿意要现代作家的稿件，可这些人的经纪人和出版商都拒绝了。他向《纽约客》申请重刊詹姆斯·瑟伯 [15] 的《世上最伟大的人》，被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是“著名期刊”。斯科里布纳也拒绝了他刊登海明威短篇小说《北密歇根》的请求，因为《花花公子》还没有“展现出品质”。他去找兰登书屋买约翰·奥哈拉 [16] 《日子》的重印权，出版方开价1000美元，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不过他生意兴盛了之后，给作家的稿酬比美国别的杂志社都高，只有《纽约客》可与之比肩。

但第一期杂志发行之前，海夫纳与那些已成气候的出版商一样，感到了杂志未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法律反应和公众反响方面；这无疑影响了他，使他没有在版权页刊头印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封面上也没有印日期。如果杂志头一个月卖得不好，他希望它能在报摊上再坚持一个月，直到大多数杂志卖出去为止。

1953年10月，《花花公子》即将送印，海夫纳、埃尔登·塞勒斯和阿特·保罗——接受股票代替工资的设计师——开车到伊利诺伊州罗谢尔市的印刷厂做最后的修改，并看着7万份杂志中的第一批从印刷机上下下来。海夫纳由于狂喜和疲倦而处于兴奋过度的状态，也很沮丧：杂志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负责向全国分发杂志的人以前也是冯·罗森的员，叫杰瑞·罗森菲尔德——他也投了钱给海夫纳——态度乐观，觉得杂志会大卖，但他和海夫纳都不知道具体能卖多少。如果只卖了1万到1.5万份，超过三分之二被退回，海夫纳会当即破产，《花花公子》也就终止在第一期。海夫纳得重新找工作。还清贷款需要很多年，银行还会收走他的家具。那晚海夫纳回到家时，尽量不去想这事。

他必须相信能出第二期杂志，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公寓里设计新一期的版式。他已经有了下一期的中心插页，一张性感却不太出名的模特的彩色裸照。他也拿到了几张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摄的艺术裸体照。在公版领域有相当丰富的虚构类作品可以选择，还有几篇非虚构作品已经完成，可供登载。当然了，他自己的漫画也不限量供应。

这个时期米尔德里德格外地支持、容忍他。她从不抱怨，虽然公寓起居室的地板上到处扔着裸体图片，每天她在厨房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看着丈夫的同事进进出出，讨论性爱和女人。

当月内，第一期杂志抵达了芝加哥的报摊，海夫纳离开家，开着车环绕全城，在路边摊位调查销售情况。他停好车，一家接一家地造访报摊，远远地观察着翻杂志的人。他也会走近报摊，拿起一期《花花公

子》，假装是第一次看。如果摊主没注意，他会把杂志挪到好一点儿的位置，放到前排，或者挨着《纽约客》《时尚先生》，离《现代男士》远远的。他希望能自己去向过往的行人推销杂志，能自己在路边演讲、宣传杂志已经到货。有时他看到有人拿起杂志，手指捻着书页。要是杂志卖掉了，海夫纳内心便一阵兴奋。

杂志上架一周之后，海夫纳感觉他去的大多数报摊上，一擦擦的《花花公子》越来越低。两周以后，他接到杰瑞·罗森菲尔德报告好消息的电话，说杂志在全国都卖得很好，让海夫纳一定要继续做第二期。继而海夫纳得知《时代》和《新闻周刊》都赞扬了第一期杂志，《周六评论》说和新杂志比起来，“从前的《时尚先生》，哪怕是最开放的时期，也跟W.C.T.U. [17] 的贸易公告一个样”。月底，杂志卖出了5万多份，海夫纳的旧车也彻底坏了，但他突然感觉十分富有，买了辆锃亮的斯图贝克，再往罗谢尔的印刷厂送印第二期杂志的时候，他在封面上标了日期——1954年1月——而且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刊头。他是《花花公子》的编辑和出版人，他想让每个人都知道。

杂志的急速蹿红让海夫纳离婚姻愈发遥远，他躲进了诱人的自由和每月按期交稿的挑战之中。第四期杂志发行后，米尔德丽德很少能再看到他。他和七个员工一道搬进了教堂对面的楼里，显然对杂志十分痴迷，没日没夜地工作，黑白颠倒地睡在办公室后面的卧室里。米尔德丽德对他说自己又怀孕了之后，他简直毫不关心，不过他确实新租了湖边一幢楼里更大的公寓，自己却没有跟着妻子搬进去。

夜间他不再外出散步，数周都待在花花公子大楼里。他把衣服放在那儿，吃的送进来，姑娘也送进来，就在那间卧室里做爱，再回到办公桌前读原稿、想图片说明、写标题、检查下一期玩伴女郎的彩照底片。

一天，有位摄影师拍了张他在桌前查看图片的快照，海夫纳显得脸色苍白、缺乏营养，高耸的颧骨下双颊瘦削，黑眼睛下有阴影，一看就知道整晚没睡。虽然他的黑头发剪成50年代年轻总裁的样子，衣服却很不合身。虽然拍照时戴着领带，但他在办公室最经常的着装却是运动衫、深色裤子、平底便鞋和白羊毛袜子。有些员工以为平底鞋和羊毛袜是他大学时期休闲的穿着习惯，其实穿羊毛袜是因为他参军时期染上了脚气。虽然就一本想吸引男性时尚类广告的杂志来说，海夫纳这张照片真没什么作用，但它还是出现在了1954年12月的发行周年纪念刊上作为庆祝，这一期印了17.5万份。

孤僻避世的海夫纳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中展示自己，不仅仅是挑选在杂志上登哪张照片，写宣扬自己观点的专栏，后来，杂志发行量和财富都翻了一番——在专为《花花公子》拍摄的裸照背景中，他开始嵌入自己存在的证据。在一张年轻女人淋浴的照片里，海夫纳的修面刷和梳子出现在洗脸池边上，他的领带挂在镜子旁边。虽然现在海夫纳只是作为照片中女子情人的幻影出现，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某一天，当杂志社越来越强大，他会真正拥有这些女人的肉体 and 情感；他会实现杂志读者

和自己的梦想，去触摸、追求、最终穿透那些惹人欲火的当月玩伴女郎。

但首先，他得按自己的口味把她们塑造得更性感才行，让插页上她们的眼神和姿态满足他对处女的特殊喜爱。他立即意识到这种爱好是很矛盾的，让他和街对面教堂里那些不赞成他的信徒有了奇怪的联系。但这种矛盾和复杂的激情是他的组成部分，他拥护性解放的理念，也受到圣母情结的折磨，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当时很多男人的代表。

他们想要贞洁、奉献、永远忠诚的女人，又终其一生心心念念别的女人，在沙滩上、公园里、街道边看着她们，在脑子里与她们调情，或是隔着院子、透过楼房窗玻璃偷看她们，让她们出演各种猎奇的幻想。在海夫纳成长的时代，美国把年轻女人分成两类——与性毫无关系的“好女孩”，与性有关的“坏女孩”。他的性欲贪求着后者，却无法想象与她们有浪漫的关系。但与米尔德里德交往期间，他被迫要修改自己关于现代女性的性别定义。他知道端庄清秀的女学生——像米尔德里德那样，也能裸体在镜头前摆姿势，在公交车里给人口交，还能和一个男人有秘密性事，同时与另一个男人订婚。

这就是50年代的新女人，外表正派，性欲却不可捉摸。海夫纳想通过图像来展现——像金赛用统计学来揭示的那样，他想要《花花公子》揭开那些“好女孩”的面纱，可能的话，利用那些生计艰难的小明星、职业模特和交际花广泛传播这一形象。即便照片大获成功，梦露还是被《花花公子》的批评者说成是落魄女演员的孤注一掷。接下来15期的《花花公子》里，海夫纳都很少标注中心插页女演员的名字，虽然他基本都知道。比如简·曼斯菲尔德，一头白金色的长发，急切想当下一个梦露；还有贝蒂·佩奇，黑头发梳成米尔德里德一样的刘海——但海夫纳是从过去看的、私下里对着自慰的地下照片里记住她的。

可他现在想要能参与他公共生活的玩伴女郎，社交方面和性爱方面都能带给他快乐的女人。唯一的问题是，他得去找愿意为《花花公子》宽衣解带的普通年轻女子。黛安娜·韦伯身上洋溢的那种加州户外感是海夫纳目前最满意的，5月刊的插页就会刊登她的照片，附注名字和简要经历。但海夫纳知道黛安娜已经在别的杂志里出过镜，她还不是他寻找的镜头处女。

海夫纳想要发掘新人，赢得她信任后再说服她拍照，然后，如果有必要，以符合自己品味的方式重塑她。19世纪90年代有吉布森女郎，20世纪20年代有齐格飞女郎，30年代有戈尔德温女郎，40年代有鲍尔斯模特，现在，他想创造50年代的海夫纳女郎。^[18]她健康、不造作、不咄咄逼人，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在大城小镇里看到的普通漂亮姑娘；是微笑的女秘书，是飞机上的空姐，是银行家的女儿，是学校的啦啦队长，是男生俱乐部里的甜心，是邻居家的女孩——他还想感到她属于自己。

在第一次为《花花公子》拍摄裸照之后，他也不想让她再为别的刊

物拍照。他想让她专属于自己的杂志，他会付丰厚的报酬；但为了保证她为己专有，他也订好了对新玩伴女郎都实行按月付报酬、两年付清的计划。这段时间里她，还有同她一样的模特，都会与《花花公子》保持关系，还可以去广告商和客户那里露露面、挣些外快，而且也能帮助海夫纳塑造自己耽于享乐生活的形象。

由他自己挑选的第一个玩伴女郎，已经有了人选。她是自己手下新来的员工，在二楼的发行部工作。她是个20岁的金发姑娘，一对蓝绿色眼睛，脸颊光滑细腻。她总高高兴兴的，人挺机灵，虽然穿得不起眼，但海夫纳一眼就看出她身材超级棒。她叫查兰琳·卡拉勒斯。她这个月才来《花花公子》，是看了业务经理塞勒斯登的广告来应征的。塞勒斯的面试之后，海夫纳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地表白了他的个人兴趣。他安排了一次晚餐约会，开着自己花6500美元现金刚刚买的古铜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带她去了餐厅。

他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开始定期约会，也在他办公室的卧室里做爱。查兰琳热切地想以各种方式帮助杂志社，而且特别想取悦海夫纳。他的关注让她受宠若惊，他的成功让她敬畏，他来找她做7月号的当月玩伴时，她也不愿让他失望。相应地，他许诺亲自监督摄影的全过程，照片出版前也会拿给她和她母亲过目。他在业务部给她母亲安排了工作，说题图也不会写查兰琳的真名。他会给她另取名叫“珍妮·皮尔格林”^[19]，微妙地讽刺了五月花号上把清教带进美国的朝圣先民。

在7月号她的照片介绍里，海夫纳写道：“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貌美如花的当月玩伴只存在于遥远的世界。其实，有潜质的玩伴女郎就你身边：办公室新来的秘书，昨天吃午饭时坐在你对面、眼神迷离的美女，你常去的店里卖衬衫和领带的姑娘。7月小姐就是我们发行部的员工，处理着订单、续期合同和过期刊物订单。她的名字是珍妮·皮尔格林，业务过硬，长得也漂亮。珍妮以前从没做过职业模特，但我们觉得她完全能和最棒的玩伴女郎相媲美。”

中心插页上，她坐在卧室的柜子上，长睡衣敞着，露着粉色乳头的丰满胸部，背景里有个男人站在焦点之外，背对着镜头，穿着晚礼服，拿着高顶礼帽。他就是休·海夫纳。

珍妮·皮尔格林的首次出境收到了数百封赞许的读者来信，很快海夫纳又开始怂恿她为下一期圣诞号拍照。她这次有点犹豫，因为她的亲戚看了杂志后表示很难堪，而且她自己也因为某些来信里陌生人的亲近口气觉得有些惴惴不安。但她抗拒不了海夫纳的魅力和口才，被说服再次出境。

这次海夫纳让她站在圣诞树下，给她裸露的身体点缀上闪光的珠宝，肩上松松地围上白色貂皮披肩，强调出胸部的轮廓。他还登了几张抓拍的黑白照片，是她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休息，听着弗兰克·辛纳屈的唱片、读着《玛乔丽晨星》^[20]、正要脱衣服睡觉的样子。海夫纳在说明

文字里还写，珍妮·皮尔格林喜欢穿男人的睡衣——不过只穿上半身，裤子都扔掉了。

这一期出版之后，杂志社收到若干件男性读者寄来的睡衣上半身，想换珍妮不要的睡裤，还有各种模特、电视节目和百老汇演出的机会来找她。不过她选择留在《花花公子》。于是1957年，很大程度因为她做的推广宣传活动，杂志印数从60万份增加到90万份。

作为《花花公子》销售噱头的一部分，她给每个花150美元终生订阅杂志的人都亲自打了电话；她还去到全国各地，代表杂志出席商务展会、交易会、赛车竞速和大学校园里的特别活动。她曾在周末作为荣誉嘉宾去了达特茅斯大学，参加了文艺展演，还为自己的玩伴女郎照签了名。在学校里，她觉得比平时参加商业展会、面对那些年纪大些的男人要开心多了。因为她拍了这样的照片，那些人就觉得她可以狎近，他们跟着她到酒店大厅、尾随她上楼梯，不断向她求欢；她答应跳舞的时候，他们紧紧搂着她的身体；有时她为了拍照，答应和读者亲吻，他们还会试图强行把舌头伸进她嘴里。

还有别的事让她不高兴，就是在她为杂志做全国巡回的时候，海夫纳正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卧室里勾搭别的女人。她从公司的朋友那儿听说这事儿，又愤怒又沮丧。她小时候家庭不幸福，父母分居，18岁离开家，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生活。她误以为和海夫纳的浪漫关系会第一次给予她安全和稳定。恰恰相反，她觉得更脆弱了，于是试图对他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晚上也不接电话——但他会跑到她公寓外面使劲敲门，直到她开门为止。他想要确保她没有别的情人。一天下午，在办公楼附近的东方旅店酒吧里，她正和一个年轻男人坐着喝酒，海夫纳突然进来，抓着胳膊把她带走了。她就像那个新取的名字一样，是海夫纳创造的产物，他觉得自己有随时收回她的权利。

她辞职了两次，每次都被海夫纳的坚持劝了回来。她甚至又为插页拍了照，对于海夫纳在摄影室里看着她拍照所感到的乐趣，她又爱又恨。他是个自私、令人不安，却又无辜的少年，也是个喝着百事可乐、穿着白袜子的商业巨头，正用让人瞠目结舌的现实感建设他的帝国。他并不对她撒谎，但他的生活方式使她迷惑。海夫纳告诉她，自己的婚姻一年以前就不行了——目前两人确实分居了——之后她就听说他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珍妮有一天还在报纸专栏里读到海夫纳和她在酒店餐厅里吃晚饭的新闻，但她知道，实际上他是和一个很像她的金发女郎在一起，那个女孩刚刚为《花花公子》拍了封面，打扮成了大学啦啦队员的样子。

这之后不久，珍妮·皮尔格林，这个在海夫纳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待了两年的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她从未表现过这种决心。她已经遇到了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与她有相契合的价值观。他离婚后，她就与他结了婚，随他搬到了纽约，在风景优美的城郊抚养孩子。

如今，31岁的海夫纳继续追求一个又一个女人，几乎都是封面女郎或杂志社的员工。这些办公室的情事不仅没有影响他工作，反而激发了他的活力，增强了他的自尊，激励他冒更大的商业风险，增长了他的财富，也把他推到前台，让他成了公众人物。杂志的推广总监，一个温文尔雅、离了婚的29岁男人，维克多·朗斯——他进入海夫纳的世界，最开始是为《花花公子》的年轻总裁照片做模特，在其影响下，海夫纳在穿着上花了更多心思，衣物也更昂贵，不再穿白色羊毛袜子，还买了部白色奔驰车。

海夫纳受到全国性新闻杂志的采访，还上了电视，边抽着烟斗边贬斥着清教徒“消灭乐趣才能铸造成功”的观念。他巡游全国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不仅广开销路，而且已不再是地下商品，从报摊上买杂志的男人们也不再显得那么尴尬——他们不再迅速把杂志卷起来，或是藏进报纸里了；他们觉得放松了一些，因为现在每月有接近100万人购买《花花公子》，还有几样跟风的杂志；而且对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性，美国人如果没有十分痴迷的话，至少也更加宽容。

在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时代，美国人更加开放，大胆承认自己的需求，而且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和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寻求享乐。新开发的避孕药片备受女性期待。从法国传入的比基尼泳衣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海滩上。报纸上会讲某些城郊社区里换妻俱乐部的故事。全国的点唱机都放着猫王摇晃胯骨的音乐。人们聚到夜总会里，听语出惊人的新近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 [21] 说段子。

布鲁斯的特色是言人所不能言，描绘某些个人行为 and 态度时让听众红着脸想到这就是自己。虽然布鲁斯和海夫纳都以各自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动机，延伸了性表达的范围，但要不是50年代末法律本身也开始宽松化，这两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受众。而那个促成法律发生变化、用叛逆的一生写下60年代性解放序章的人，在美国却不那么出名，只有将其抓进监狱的那些权威人士知道他：全国最屡教不改的文学界法外之徒。

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罗思。

塞缪尔·罗思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山村，父母是犹太教正统派教徒，对印在纸上的文字有本能的敬仰。安息日的下午，母亲会给他读拉比们所施的奇迹，希望他能虔诚信仰宗教；但1904年春天，他坐在去往纽约的轮船下等客舱里，与家人和200个移民一起旅行时，因为一件小事，他信教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塞缪尔·罗思时年9岁，在床铺上读着一本意第绪语的小册子，是汉堡码头的一个陌生人给他的。册子里写了一个犹太预言家，比所有拉比都聪明，虽然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起死回生，继续履行传教的使命。这是《新约》里的一段，年轻的罗思读到这里，十分着迷，开始念给旁边的旅客听。于是大家开始探讨、辩论宗教问题，声音连上层甲板都能听到。

突然一个高个、红胡子的拉比出现在楼梯顶端，用暴躁的声音问谁在念诵“异教经卷”。小男孩被人指了出来，拉比走下楼梯，走进气味刺鼻的黑暗客舱，里面一片死寂。只有一个人认出了这个审问者，敬畏地悄声说道：“伟大的平斯科拉比啊！”

拉比走到男孩身边，一把抢过了册子，责骂说这是罪恶的作品，犹太人的禁区。他几下把书撕烂，从舷窗扔进了海里。罗思看着他，受到了震惊和羞辱，看到那个拉比责难的眼神，听到他警告人们错误知识有多么邪恶，他下意识地想躲开。最后，拉比回去了上面的船舱，罗思对这个神圣的代表感到了憎恨。那个晚上，以及之后的许许多多夜晚，他都会记起这位神使的咒骂，永不再遵从任何对文学妄下结论的行为，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下东区 [22] 的公立学校里，罗思是个早熟的学生。不过老师们对他和他那喜欢辩论的天性都不怎么喜欢，也不允许他把与课程无关的书带到课堂上来。他总被训斥，最后被停学，惹得他谦卑的父亲大发雷霆。父亲是在血汗工厂里做裤子的，对挑战权威的儿子并不同情。

罗思自认是反叛者，甚至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追随爱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别尔克曼 [23]，经常去听他们在东百老汇学园里的演讲。他喜欢读无政府主义杂志《大地》，还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交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年轻朋友，这些人有一天会通过工会获得力量，通过罢工获得名声。但罗思太过我行我素，很难长时间和任何团体保持融洽，连家人也不行，所以15岁时，他被父亲赶出家门，上学也从来毕不了业。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太爱书了，没法当好学生。”

他不上学的时候，断断续续做了各种零工。他沿着纽约卖过报，卖给那些坐渡轮通勤的人；在小餐馆里做过服务生；还在药店里打过工，装瓶、贴标签，有时还会卖安全套给红着脸的拉比。到了晚上，要是不能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他就睡在大楼的门厅里，枕着报纸，洗澡就用公园或车站的公共洗手间。只有在图书馆，他才觉得放松，尤其是东百老汇和鲍厄里街的那家，他一遍又一遍读着济慈、雪莱、斯温伯恩的诗作，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自己写诗和文章，通常都寄给英国犹太周刊，有时还能收到稿费。

罗思的朋友把他发表的作品拿给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知名英文教授看，之后罗思就在1916年获得了该大学的奖学金。但和过去一样，他当不了好学生，无心坐在教室里听课，热心于编辑校园诗歌杂志，还参加了抗议美国加入“一战”的学生运动。

罗思有视力缺陷，不能参军，但他焦躁不安，在学校里连一年也待不下去。1918年，他娶了一个在下东区认识的年轻女人，在西八大街49号开了家小书店，很快就因为里屋有非法酿酒作坊而出了名。格林威治村 [24] 的画家可以在他书店的墙上展示自己的油画，他也为当地画家和作家提供典当贷款服务。他借给这些人不多的钱，基本没有还款，换来卖不出去的手稿和肖像、没销路的廉价首饰和家传“宝物”，毫不稀少的旧书，以及稀少而没人想要的书。

罗思很乐意当书商，可他卖不出去几本书，1920年圣诞节过后，他便关掉书店，按照他认识的《纽约先驱报》编辑的建议，接受了在伦敦采访文学名人的任务。但这次机会最后也成了不幸的遭遇，因为他发回的文章太过率直，和当初与《先驱报》讲好的不一样。把乔治王朝时期的诗人描写成“吸吮济慈干枯的膏血”，说亚瑟·西蒙斯是“点亮真空的火炬”，还暗示乔治·穆尔是个性无能， [25] 当初《先驱报》让罗思当文学记者，想要的可不是这种报道。所以到了26岁，他的英国口音越来越好，习惯了用手杖、穿毛领外套，衬得他六英尺高的身躯更加瘦长，却被不光彩地召回纽约。接下来的几年，他的文字天赋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去下东区的特殊学校教犹太移民学简单英语。

幸运的是，他在财务方面有了接济：他妻子从十几岁就在制帽业学徒，现在做女帽的生意还挺红火。本来这生意还能做得更大，可1925年，她听信了能说会道的丈夫，加入他觉得更有人文追求的事业，创办了出版文学杂志和邮购书刊的企业，专卖19世纪作家，比如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人创作的软色情作品。

罗思的杂志名为《彼端世界月刊》，最早几期刊登了备受谴责的《尤利西斯》节选，不光冒犯了禁止销售此书在美国的审查者，还惹恼了身在巴黎的原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虽然罗思提出为每期杂志上连载的内容付50美元的双倍价钱，以尊重作者是“天才中的天才”，乔伊斯却认为罗思没有得到连载该书的许可。

罗思辩解称，他向乔伊斯的经纪人埃兹拉·庞德取得过出版许可，这又导致了庞德和乔伊斯在欧洲的争执。与此同时，罗思继续在《彼端世界月刊》上连载《尤利西斯》，删除了乔伊斯一些露骨的性描写。但出版了几期之后，法院就命令罗思停止连载，许多读者因为无聊而不再订阅杂志，他和妻子濒临破产。

终其一生，罗思都自豪于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对审查《尤利西斯》发起挑战的人。后来他因为发行未删节的全书而入狱60天，却觉得这经历和接受军功章一样荣耀，这是1930年的事——三年后，这书就在联邦法官约翰·M·伍尔西的判决下，从淫秽升格为艺术作品。虽然兰登书屋坐收法庭胜诉的成果，直接从乔伊斯那里取得了在美国的发行权，大获其利，罗思却坚信是自己的不妥协才换来兰登书屋对经典作品迟来的高尚辩护。在日记中，罗思写道：“富有的出版商却让穷困的那个来树立道德标准的先例。”

后来，可能是受够了道德标准和穷困的境遇，也想弥补妻子被赔光的财产，罗思大胆进入了地下文学产业，在自己的出版公司——换了个名字、改了临时地址——里加入了一个邮购分公司，希望靠贩卖过去的情色作品发家，比如14世纪的阿拉伯性爱指导《芳香花园》，里面的插图画了237种男人和女人“交会”时可能的姿势。罗思能拿到这本书，是有一天一个地下书商来找他。这人刚刚因为发行《欢场女子回忆录》被抓进去过，便急着出手之前藏在第四街仓库里的300本《芳香花园》。这书在巴黎印刷，标价每本35美元，但卖家几近绝望，说可以每本3美元卖给罗思，也就是说，生意做成的话，他可能赚到1万美元。

没等见着这笔钱的影子，罗思的邮购生意就已经被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人渗透了。从连载《尤利西斯》时开始，这些人就留心监视他。协会不仅通过造假信件拿到了足以定罪的《芳香花园》副本，还突袭了第十二街上罗思和妻子租来拍卖艺术品、售卖书籍的商店，发现了一本薄伽丘的书，还有一系列人物画，都是协会领导人约翰·萨姆纳——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继任者——认为属于淫秽的。由于这些违法行为，罗思被判在纽约福利岛 [26] 做三个月苦工。

刑满以后，既没重获新生更没有悔改之意的塞缪尔·罗思马上重操旧业，继续做打审查擦边球的出版生意。因为他多次被捕，且傲慢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妥协，便在书店云集的小街上有了点名气，经常有欧洲来的走私商人向他兜售黄色小说和情色文学经典，收藏家也来找他，热切地想购买色情方面的稀有出版物。摄影师愿意卖给他私藏的裸体照片，作家也会把由于种种原因、别的出版商不愿接受的手稿交给他。

在罗思安排付印装订的手稿里，有一本是英国人约翰·哈密尔写的赫伯特·胡佛总统传记，笔调十分恶毒，后来各家报纸都拒绝评论、宣传；不过这书还是卖出了近20万本，在华盛顿、波士顿、圣路易斯都成了畅

销作。克莱门特·伍德写的《成为教皇的女人》也是经罗思之手出版，声称从853年到855年，即利奥四世与本笃三世之间，梵蒂冈是由一位女神父统治的；虽然这本书并不畅销，却使罗思在纽约大主教管辖区和当地警察局的恶名更甚于前。

罗思还重印、销售了若干地下版本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古印度的性爱指南《爱经》，还有一本叫《自娱》的书——“本手册旨在阐明这种普遍习俗的益处和损伤，有时这习俗也被称为自虐”。另外，罗思还出版了一些自己写的书，其中有饱受争议的作家弗兰克·哈里斯的传记——罗思以赞许的口吻评价了他。哈里斯最有名的作品是充满色欲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真称得上情色文学的精品，挑逗、震慑着每一个读者，只有哈里斯太太例外。她相信丈夫大大夸张了自己的性经历，1931年哈里斯死后，她还说过：“要是弗兰克真做了他书里写的那些事，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去法国时在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做的。”

虽然30年代早期，特别是伍尔西法官取消对《尤利西斯》的禁令之后，很多持自由论的公民都相信美国的审查制度正逐渐消失，罗思却没有这么乐观，因为东四十六街他的办公室对面，就有人拿着望远镜从酒店窗户里监视他。罗思还从一个邮局内部人员处秘密了解到，每天从他办公室进出的信都会由联邦检查员截下，利用蒸汽拆开，细细读过，再去上门劝顾客在法庭上做不利于他的证词。罗思给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写信申诉，没有回音，不久后却收到一纸诉状，告他以淫秽物品亵渎邮政系统。证据里列出的书单就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芳香花园》。

审讯之后，罗思被定了罪；1936年，他开始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监狱三年的刑期。不出意外地，文学界没什么人同情他，因为他瞧不起其他大多数出版商，觉得他们是只会迎合众人口味的懦夫。罗思在狱中写作的自传里，特别提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27] 被反堕落协会警告以后放弃出版拉德克里夫·霍尔的《孤独之井》的反应：“克诺夫碰到此类情况，一贯如此处理。”罗思写道：“他背弃了对文字的忠诚，屈服于对审查的恐惧。他不再出版这类书籍，还撤回了原来签的合同。”

罗思对文学出版方面的律师也没什么好评，特别是被定罪之后。“要换掉律师可不像换个医生看病、换个珠宝商买珠宝，”他写道，“每一个律师都能在你的案子里多找几个难点，多收点钱，而且他们和《麦克白》里的女巫一样，能同步行动，无论你最后选了哪个来辩护，价格总归是越来越高的。”

罗思在路易斯堡服满了刑期，回到纽约，继续之前的营生，不用说，过一阵还得回监狱。他一个朋友怀疑他可能就乐意待在监狱里，或是有意要做文学的殉道士。但罗思并不承认。他说自己的狱中记录很容易解释——“我一直与警方做斗争”——“警方”不仅包括巡警和侦探，还

有地方检察官、联邦调查局探员、邮政员工、神职人员，以及他们在反堕落组织和司法界的同伙——任何企图限制阅读、写作的人都是罗思的敌人，于是他任凭自己的一生在分歧与报复中度过。

离开路易斯堡以后，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他已然习惯了时刻被穿便衣的人跟踪，这些人很快就发现了他在百老汇693号的新办公室。这次在办公室里工作的除了他妻子和几个耽于空想的雇员，还有他正在上学、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对父亲在法律上碰的钉子，他们很伤心，有时还被搞得很难堪，但两个孩子却都和父亲一样支持言论自由。罗思的女儿翻译了他出狱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克劳德·蒂利耶的小说《我的叔叔本杰明》，罗思的儿子入伍之前也一直在公司的销售部门兼职。

为了逃避邮政检查、保护出版物不受自己名声的影响，罗思在公司信笺和邮寄书籍的包裹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假名。有些标签上写着书是由考文垂书屋出版，有些是箭头集团出版，还有阿瓦隆出版、野猪头出版、比尔迪莫出版公司，等等。罗思有时会把书放在纽约公交站或火车站的储物柜里，钥匙交给某些特殊的客户。这些书——作者都是亨利·米勒、弗兰克·哈里斯，还有维多利亚时期《我的秘密生活》的无名作者之类，一般都是从法国走私来的贵重版本，尽管“二战”期间，专业的走私商人都竞争不过美国军队的外行了。无数士兵从海外归来，背着装有非法书刊的粗呢包，美国的地下文学市场似乎快要饱和；不过在战后，好像是为了彻底消灭某个未被打败的敌人，政府加强了对色情文学的管制，不光罗思的书受影响，一些现代作家所著、由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较为性感的作品也受到了影响。

战后被起诉的知名作品有莉莲·史密斯的《奇怪水果》，厄斯金·考德威尔的《上帝的小小田地》和埃德蒙·威尔逊的《赫卡特县回忆录》。

[28] 纽约反堕落协会发起了反对威尔逊作品的运动，基层法院判决该小说为“淫秽”，纽约州的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之后，埃德蒙·威尔逊的出版商道布尔迪公司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到这里，案子就陷入了四对四的僵局，因为菲利克斯·富兰特福克大法官是作者的朋友，自行退出了该案；于是纽约州对该书的原判决有效。

费城1948年发起的反色情扫荡中，警方没收的书籍包括威廉·福克纳的《圣殿》，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 [29]；这些书本来还会在地下文学中埋没多年，要不是宾夕法尼亚州还有位法律观点惊人的法官：柯蒂斯·博克。

博克法官谴责了费城扫荡，认为刺激读者有犯罪行为的书才能算淫秽；但他认为很难断定书籍本身就有这么大的负面力量，因为读者还会受到书页之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普通人在性欲很低时看淫秽书籍，只会打呵欠，”博克法官写道，“他性欲高涨时，就算看《施工留置权法案》，也会感觉不一样。可书里的内容和性毫无关系。”

1948年，很少有法官赞同这种评判色情文学的温和观点。绝大多数

的法官都认为淫秽书籍即使没有促使读者犯罪，其本身就是犯罪实体；这种观点从40年代流行至50年代，塞缪尔·罗思便以各种可能的由头被起诉了一个遍。

因为出售据称是淫秽书籍的《捷克诙谐故事》被法庭传唤之后，他又被邮政检查员指控，说他以色情的方式，通过邮政宣传了两本并不色情的书。一本书是《女性自我防卫》，其广告可能会吸引男性受虐狂；另一本被宣传成刺激的爱情小说《布玛拉》，实际上是罗思在狱中写的毫无色情元素的作品。由于使用了虚假的宣传手段，罗思以“诈骗”的名义被起诉。

罗思还在向上级法院申诉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探员听说他自愿为阿尔杰·希斯案 [30] 作证，也上门来找他了，警告他不要出庭。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希斯被怀疑犯有间谍罪，罗思并不认识他，却认识指控希斯的人，惠特克·钱伯斯。20年代钱伯斯还在格林威治村，是个野心勃勃的诗人时，罗思就认识他。那时钱伯斯以“乔治·克罗斯利”的笔名向罗思投过诗稿，希斯后来正是宣称钱伯斯曾以这个假名擅自转租了他在华盛顿的房子。

钱伯斯在法庭上说自己完全不记得用过这个名字，于是罗思联系了希斯的律师，提供了有关“克罗斯利”的信息。钱伯斯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31] 的明星证人，假名的事情会让他自己和公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信用一落千丈。罗思本来打算不顾联邦调查局的警告，出庭作证，但希斯和律师们最后认定，让一个臭名昭著的色情书商来帮忙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不过，阿尔杰·希斯后来被定罪、入狱之后，不情愿地承认没有传唤罗思可能是个错误。希斯承认这点的时候，罗思的名声已经愈发败坏。

沃尔特·温切尔在自己的广播节目里谴责他是淫秽之王，因为罗思出版过莱尔·斯图尔特所作批评温切尔的传记。1954年，温切尔在广播里总结说，罗思就该因为传播淫秽再次入狱；第二天警察就来到了罗思位于西八十一街11号的公寓门口，拿着搜查令，说罗思和妻子可能涉嫌同谋。接着，不顾罗思的反对，执法官闯进了屋里，开始仔细检查整间公寓，翻找卧室衣柜、柜子抽屉，把家具翻了个底朝天。罗思要给律师打电话，却被制止了，后来他从公寓跑出来，冲向楼下的电话亭，两个警察追过去，把他按在墙上，起诉他袭警。

罗思和妻子被带到曼哈顿市中心，在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的办公室里，罗思看到几个出版社职员也在等候室里，听他们说到出版社办公室也被突袭了——档案橱柜、办公桌和书本都被搬上了警车，信件都被拆开，电话现在也由警察接听。突袭负责人是霍根的助手莫里斯·纳贾里，当罗思手下的一个职员问到公司将来会怎样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你们老板在业界算完了。”

夜间法庭上，纳贾里要求罗思夫妇每人交1万美元的保释金，说已经没收了13车超过5万册淫秽书刊。接下来几天里，这次突袭都是热点新闻；不过几个月以后，上诉法院裁定对罗思财产的搜查和没收都是非法行为，却鲜有新闻报道。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同意撤销上诉，条件是罗思不起诉市政府。他勉强同意了，因为1955年这个时候，他忙着应付对自己不利的联邦案件，还收到了法院传票，让他出席一个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听证会，发起人是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

基福弗参议员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1951年电视转播审讯黑手党领导人时，他在全美国有了犯罪斗士的名声；媒体的某些小圈子里，他也是有名的风流成性，这事不止一次地妨碍了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宣传。在芝加哥，这个他安排开展有关黑帮影响听证会的城市，他却被偷拍到和一个与黑社会有关的年轻女人在旅馆的床上。他知道照片的事——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得知的——以后，取消了芝加哥的听证会。

但他对色情出版物的调查却不因这些丑闻而退缩。在纽约联邦法院大楼里的听证会上，他对罗思非难不断，说他的生意是“污垢”，还说这种出版物和美国青少年犯罪也有部分关系。

罗思否认了这点，提到他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少年犯，虽然在他身边长大、在他的公司工作；他还说少年犯大概是最不会受到书本坏影响的群体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看。虽然罗思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有理有据，但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带点儿英国口音的连讥带讽，都表现出自己屈尊纡贵的态度，让基福弗大为光火。当罗思辩称他出版的大多数作品都有文学价值之后，基福弗指出他曾试图与米奇·杰尔克案 [32] 中的妓女帕特·沃德签出版合同。

“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的主角，为什么你想出版她的书呢？”基福弗问道。

“依我看，”罗思说，“《新约》也是围着这种女人转的。”

基福弗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在总结陈词中他反复说罗思的出版生意“应当受到谴责”，参议员威廉·兰格也赞成他的观点。然后，基福弗允许罗思在委员会前做最后陈词。

“我相信，批评我的人错了。”罗思说着，看向基福弗，“我相信你比他们错得更多，因为你对我妄加判断。我也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说服你，你确实错了。”

“那你可得说上很久。”基福弗说。

“我会做到的。”罗思坚持说。

走出联邦法院大楼的时候，罗思相信自己刚刚的表现不同凡响，也

预料到了代价将是沉重的。但之后从律师那里得知，政府已经收集了26条淫秽罪名准备对他提起公诉，很快就要带他上法庭时，罗思还是被击垮了。他被指控通过邮政散播淫秽出版物的最重要的物证，是几册口袋大小、叫作《好时光》的杂志，里面有几幅气笔喷绘的裸体画，还有一期《美国阿佛洛狄忒》的精装季刊，重印了《维纳斯与唐怀瑟》，由奥布里·比亚兹莱 [33] 写作并配插图。

虽然罗思认为，《好时光》杂志和比亚兹莱明快的插画、深奥难懂的情色作品不会让陪审团觉得受冒犯，但他还是要求法庭推迟审判日期，以使自己有时间充分准备，也抽空关照下困难重重的生意、备受侵扰的家庭生活。但请求被驳回了，1956年1月，他坐在法庭里，面对着陪审团和有一张大红脸、曾任地区副检察官的法官。

审判持续了九天，其间罗思并没有为自己作证，这是听从了家人的意见，说他保持沉默会比较有利。罗思倒是打电话给阿尔弗雷德·金赛教授，问他是否愿做辩方证人，但金赛断然拒绝，说他不愿支持淫秽。罗思这边的证人都力图向陪审团展现他想要维护个体权利、热爱文学的一面，但控方把他描绘成低俗、渎神的色情贩子，收效更加明显。

经过12小时的审议，又草草看过罗思散布的材料之后，陪审团认定罗思有罪，罪名有四条——一条是重印比亚兹莱的《维纳斯与唐怀瑟》，其他三条是邮寄含有性暗示的广告传单。尽管有罪认定让罗思沮丧不已，他依旧觉得既然26条罪名里22条都不成立，惩罚顶多就是坐牢90天。但他的律师从司法部的熟人处得到消息，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你可是值得重判的惯犯，”律师说，“而且还有美国参议员与你为敌。”

这个对现状悲观的判断不幸成谶，1956年2月7日，罗思站在法官面前，听到自己被判入狱5年，并处罚款5000美元的判决。塞缪尔·罗思，时年62岁，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潮水般退去——这生命诞生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小村子里，很可能要终结在美国的地牢中。没等他转身向家人说句话，两个警卫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边门带离了法庭，推进一间屋子，锁在铁窗后面。

虽然罗思的律师继续向上级法院申诉，每一级法院却都认定其有罪成立，只有一个联邦法官杰罗姆·弗兰克提议美国最高法院复审该案，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重新定义法律上的“淫秽”一词。1957年，这个词的定义仍旧受到1868年英格兰法律中希克林决议的影响，该决议认定：“检验淫秽作品的标准是该作品是否具有使易受不道德影响和可能拿到此类出版物的人堕落、腐化的倾向。”

弗兰克法官认为出版物很难使任何人“堕落、腐化”，无论老少。他此前做的大范围调查也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他也承认文学中的性描写有刺激性，但香水和其他那些既可以邮购也能在商店里看到的商品同样有刺激性；裸体女人的照片肯定会使男人兴奋，但报纸广告上穿泳装和内

衣的女人也照样能使他们兴奋——事实上，公共场合衣着整齐的女人每天都刺激着男人们，弗兰克法官补充说道，引用了他赞成的一位心理学家的话：“穿着丝袜的腿比裸露的腿性感许多。被文胸托起成型的胸部也比下垂的真实胸部更加诱人。”

但最让弗兰克法官骇然的是，现行有关淫秽的法律在预防不道德行为的名义下，可以侵犯公民隐私。“让几个容易犯错的凡人——公诉人、法官、陪审员——得到审查文学艺术的巨大权力，让他们成为约翰·密尔所谓的‘道德警察’，就是制造了专横独断文学作品的暴君。”弗兰克法官写道，“今天他们判定平庸的作品是淫秽读物，明天就要查禁一部天才之作。原创难得，需要人们的珍视，而非扼杀。作家写作时要是想着公诉人和法官会怎么看，想象力也会受限制；出版商害怕政府审查，可能会拒绝发表当代雪莱、马克·吐温或惠特曼的作品。少数几个人会坚持抗争，要求有权利写作、发表、传播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可厌恶的作品。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人关进监狱，好像对大家并没有什么损害。这种表象是遮人耳目的。定罪、惩罚了少数几个人，却让更加敏感、不那么勇于抗争的作家吓破了胆。他们放弃创作的那些作品，可能就是文学巨著。斯宾诺莎曾说，‘镇压会让国家越来越小，直至天才也无处容身。’”

1957年4月，最高法院审理了塞缪尔·罗思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罗思一方律师的论点是，现行的联邦邮政章程，即1873年的考姆斯托克法案，是违宪的，并且罗思所传播的有争议性质的作品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也是被允许的。然而代表政府的律师则称：“国父所主张的并非绝对的言论自由，否则至少公共道德会受到威胁。”还补充说社会“在保证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之外，还有着自身的利益”。

九位大法官听取了双方的陈词之后，就该案进行了内部讨论，两个月以后，他们发表的意见反映出对塞缪尔·罗思的复杂态度。

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应当释放罗思，因为如果罗思有罪的话，也只是因为他挑起了读者的“想法”而非“公开行为”或者“反社会举动”；道格拉斯还说：“我相信人民有能力拒绝有害的作品，正如他们能够在神学、经济、政治等方面分辨真假一样。”雨果·L·布莱克法官同意道格拉斯认为色情作品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观点，也支持道格拉斯对人们的警告：“淫秽检查今天查禁了廉价小册子，明天就可能查禁文学佳作。”

约翰·M·哈伦法官虽然对文学佳作被查禁不那么在意，也支持对淫秽作品采取更多法律管控，但他也投票给布莱克和道格拉斯一方。

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支持罗思有罪的判决，对罗思宣传自己杂志和书籍的“手腕”感到特别气愤。虽然材料本身并不淫秽，沃伦决意惩罚任何以低俗广告迎合大众的被告人，他觉得罗思就是这样的人。另外五位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菲利普斯·弗兰克福特，哈罗德·H·波顿，汤

姆·C.克拉克和查尔斯·E.惠特克——也认定罗思有罪，认为淫秽作品和毁谤一样，是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布伦南法官记录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淫秽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而布伦南对检验淫秽作品的标准是：“无论对于普通人，还是施以现代社会的标准，该材料的主要意旨是迎合色情的兴趣。”

鉴于九位大法官里六位都认为不能判罗思无罪，他被判服满五年刑期，这一新闻受到了全国宗教团体和反色情组织的热烈欢迎。全美正派文学组织发表声明说“正派的理想得到了壮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邮政部长阿瑟·萨默菲尔德也表示很高兴看到法庭没有违背考姆斯托克法案，他宣布：“邮政部欢迎最高法院做的决定，认为这是将淫秽材料从邮政系统中清除的重要一步。”

然而，许多控方律师仔细读了布伦南法官的观点之后，从中看到了法律对于性表达态度的历史性变化，让许多现在被禁的书籍有了希望。最高法院第一次对“淫秽”下了定义，终于与1868年英国希克林案中那个狭隘的观点彻底割裂开来。

希克林案中，英国法庭判定，某本书中只要含有淫秽的段落，整本书都要被查禁，然而布伦南法官的措辞是全书的“意旨”是淫秽，该书才能被禁。希克林案中，含有性描写的书籍如果不适宜青少年阅读，就不能发行，而布伦南法官写的标准是，要对“普通人”构成冒犯。布伦南还定义淫秽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可以解释为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只要提供了一点点“社会价值”，就可以逃脱审查；如果这是真的，对罗思的裁定就昭示了更大的自由。无论趋势如何，辩方律师还得等到下一个重大淫秽案件闹上最高法院，再从法庭意见中寻找线索。1957年秋天，这样的案子出现了。

案件涉及一部名为《爱情游戏》的法国电影，该影片在芝加哥被禁止上映，因为其中有裸体镜头，并且据称其内容堕落。电影的开场是在沙滩上，一个遭了船难、赤身裸体的少年，出现在年轻女孩们的视野里。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风骚诱人的年长女人，她引诱了他、教会他种种性爱技巧，其后他又和同年龄的女孩重温这些情色片段。虽然影片不含有直接描写性爱的场景，但明显暗示了男女交媾。芝加哥此案也由联邦仲裁法院维持禁止放映的原判。但最高法院审理了该案，观看了电影，认为剧本中存在足够的社会价值，便根据新的罗思定义，认定该影片不构成淫秽。

最高法院还援引罗思定义，撤销了后来对同性恋杂志《一》和裸体主义杂志《阳光与健康》的不利判决。洛杉矶的一位邮政局长禁止同性恋出版物通过邮政系统传播；虽然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却主张《一》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生活方式，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最高法院对邮政部长萨默菲尔德诉《阳光与健康》案的判决也与此类似：最终法院第一次认定，连阴毛和生殖器也可以代表对裸体主义运动十分重要的“理念”，因此可以合法地流通于邮政系统。萨默

菲尔德对这个裁决很不高兴。让他更生气的是，某一期《阳光与健康》上居然有邮政部的职员去佛罗里达州参加裸体露营、正在晒太阳的照片。该职员当即被解雇了。

渐渐地，随着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淫秽作品的有罪认定，被禁的小说和情色艺术电影突然被罗思定义挽救了回来。看到“罗思”一词，人们想起的更多是斜体字的法律词汇，渐渐想不起那个路易斯堡监狱里的“不法之徒”；讽刺的是，罗思服刑直到1960年以后，其间能够通过邮购买到害他进监狱的大部分作品。

他溜下床，背对着她，赤裸、苍白、瘦削，他走向窗户，微微弯下腰，拉开窗帘，向外看了一会儿。他的背部洁白美丽，紧实、漂亮的臀部有着优美精致的男人味，脖子后面有点儿泛红，线条细腻，可是又结实……

他耻于面对她，因为这欲望勃勃的赤裸。他捡起地上的衬衫，挡在身前，向她走去。

“不！”她说，同时从垂下的乳房之前伸出手臂，“让我看着你！”

他扔掉衬衫，静静站着，看向她。太阳从低低的窗口里射进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大腿和平坦的腹部，勃起的下体颜色发暗，看着诱人，从小小一丛鲜艳的金红色毛发里升起来。她又惊讶，又害怕。

“真怪！”她慢慢地说，“他站在那儿多奇怪！这么大！又这么黑，昂首挺胸的！他就是这样？”

男人低头看他苗条、洁白的身体前面，笑了起来。结实的胸口上，毛发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可腹部往下，粗大的下体呈拱形勃起的地方，毛发是鲜明的金红色，像一朵小小的云。

“那么骄傲！”她心神不定地喃喃着，“还那么威严！现在我算知道男人为什么总那样专横了！但他很可爱，真的。像另一种生物似的！还有点儿吓人！……”她把下嘴唇噙在牙齿中间，既恐惧又兴奋……

“躺下！”他说，“躺下！让我来！”

他现在很着急。

之后，等他们平静下来，女人不禁又揭开男人的被单，观察那神秘之处。

“现在他这么小，软软的，像是生命的嫩芽！”她说，把又小又软的阳具握在手里……“你这里的毛也很可爱！真是，真是不一样！”

“那是约翰·托马斯的毛，不是我的！”他说。

“约翰·托马斯！约翰·托马斯！”她迅速亲了亲软掉的阳具，它便又精神起来了。

“唉！”男人叹息着，几乎带着疼痛舒展着身体，“他扎根在我的灵魂里，那个绅士！有时我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唉，他有自己的意愿，要合他心意可不容易。可我也不愿让他死。”

“怪不得男人总是很怕他！”她说，“他真太可怕了。”

颤抖划过男人的身体，而意识流再一次改变方向，向下冲去。他完全无助，任凭它在缓慢、轻柔的波动中变得充实、汹涌、坚硬、勃然而起，自负地挺立，姿态如同一座古怪的塔。女人看着，也微微地颤抖。

“快来！抓住他吧！他是你的了。”男人说。

她颤抖着，自己的意识融化了。他进入她时，无法言说的快乐如同猛烈而柔和的浪潮，冲刷过她的身体，令人溶解的震颤一阵阵传播开来，直到她冲上那最后的、令人盲目的巅峰。

以上场景，加上其他描写亲密场景的段落，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贴了30年“淫秽”的标签；但1959年，一位联邦大法官受到1957年最高法院对罗思一案判决的影响，取消了对该书的禁令，并承认该书作者D.H.劳伦斯是个天才。

劳伦斯要是还活着，无疑会双手赞同这观点，不过1928年小说完成后，也是他去世两年前，他听到的评价更多是说他是个令人不快的色情作家、性瘾者。作品被某个英国评论家说成是“败坏我国文学的最为邪恶的污水，搜遍法国色情文学的臭水沟，也找不出这样粗俗恶心的作品”。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描写了一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战”中受伤的贵族，专横而性无能；她与一个猎场看守偷情，怀了他的孩子，为他离开了原来的丈夫、家庭和社会地位。虽然故事主题是通奸，劳伦斯却认为这是一本讲述肉体之爱的积极的书，能够帮助清教徒把思想从“对身体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他觉得几百年来对于性爱的模糊处理让思想“停滞不前”，不能“对性怀有应有的尊敬，对身体的奇特经历也没有相当的敬畏”；所以他创造了查泰莱夫人，一位性觉醒的女主角，敢于拿走情人腰下那片无花果树叶，观察神秘的男性。

尽管描绘裸体的女性早已成了画家和色情文学作者的特权，阳具却通常被模糊处理，或者经过美化，勃起时也从来不出现；但劳伦斯就打算写一部“男性性器官的小说”。在书里查泰莱夫人也经常全神贯注地看着情人的下体，用手指抚摸，用乳房爱抚，用嘴唇触碰，她把它拿在手

里，看着它变大，她还伸手到下面去抚弄，感受那奇特的、软软的重量；她的惊叹从劳伦斯笔下发出，唤起了成千上万男性读者的性欲，他们想象着查泰莱夫人凉凉的手指抚摸过自己肿胀发热的器官，也通过自慰间接体会到作为她情人的快感。

情色文章可能导致自慰，这已足够让劳伦斯的小说引起争议；更有甚者，通过猎场看守的角色，劳伦斯探索了男性对阳具的敏感和心理疏离——它几乎有自己的意志，有超越自身大小的野心，它常常让人尴尬，因为它有需求、有痴迷，还有不能预测的天性。男人有时觉得阳具控制了他们，将他们导向歧途，引得他们在晚上哀求女人的欢心，白天却宁愿忘记那女人的名字。它有时贪得无厌，有时惶惶不安，却时刻要求证实自己的能力，让男人常遭遇不必要的难题和频繁的拒绝。它既敏感，又伸缩自如，不论白天黑夜，只要一点点哄骗就能上钩。它虽然未必技巧熟练，却坚实地运作了几百年，无止境地探索、感受、扩张、刺探、插入、搏动、萎缩，想要更多。它从不隐瞒自己好色的本性，它是男人最诚实的器官。

它也是男性缺陷的代表。它不平衡、不对称、晃里晃荡，还很丑。在公共场所露出来就是“有伤风化的暴露”。即使用石头做成，它依旧十分脆弱。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都有很多大力士形象的雕塑，阳具却是有伤痕、缺损，甚至完全断掉的。没被损害的阳具可能只有那些不合比例、特别小的，是雕塑家为了不伤及器官不够大的赞助人而特意制作的。宗教作品中，阳具经常被描绘成蛇的形象，被圣母玛利亚用脚踩住；11世纪以来那些发誓独身的神父，也强硬地拒绝过它贪婪的引诱。教会向来认定自慰是罪恶的，并且长期推荐教区未婚的男性居民冲冷水澡，以浇灭激情燃烧的第一缕火苗。

虽然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力量和法律都试图净化阳具的作用，将它的种子限制在神圣的婚姻仪式里，可阳具天然就不是个专一的器官。它不懂什么道德规范。造物主就把它设计成喜欢浪费，它渴求多样性，除了阉割，什么也消灭不了妓女、偷情、通奸和色情书刊的魅力。

色情书刊格外吸引着那些没钱找妓女或情妇的男人、因为害羞或太丑而勾引不到女人的男人、暂时与女人隔绝（被关在监狱里或住院）的男人，还有想要对婚姻忠诚的男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忠诚，除了对着杂志幻想而达到高潮的时候，以及做爱时想象着妻子是别的女人的时候。这叫“映像叠加”，是最常见也最隐秘的出轨，而且不需要色情作品的刺激。

每天，阳具都被街上、商店里、办公室里、广告牌上和电视广告里的性感场面击中：金发模特从管子里挤奶油时暧昧的眼神；旅行社的前台接待员真丝衬衫里若隐若现的凸起；商场里坐自动扶梯时穿着紧绷绷牛仔裤的屁股；化妆品柜台散发出的香味——这是动物吸引伴侣时生殖器官发出的味道。

城市提供了部落丰收舞蹈的现代版本，一场性爱的狩猎，很多男人感到了要不断证明自己猎手本能的压力。阳具总被看成武器，其实也是负担，是男性的诅咒。它让一些人成了老色鬼、窥淫狂、暴露狂和强奸犯。它催着男人参军打仗，让不少人早逝。它愚蠢的诱惑催生了婚姻不和谐、离婚、儿女分离、赡养费等问题。它在高层人士中的肆意妄为引出了政治丑闻，政府也为之崩溃。它带来了痛苦，甚至有男人选择彻底摆脱它。

但大多数男性，像猎场看守一样，承认自己无法杀死它。虽然用劳伦斯的话说，它象征了“对身体的恐惧”，却依旧扎根于男性的灵魂，若它没有能力，男人便不能真正活着。没有它，查泰莱勋爵便被一个下等人夺去了夫人。

查泰莱勋爵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在佛兰德战场上报效国家时瘫痪的，而妻子背他而去，投向好色的猎场看守的怀抱，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让整个故事更有悲剧性，更加淫荡。1928年，劳伦斯完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后一稿时，他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都拒绝与该书扯上关系。

其他出版商也拒收稿件，劳伦斯便把手稿带去了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印刷商愿意帮助他。他们一个英文也不认识，听到劳伦斯口述书中的性爱场景时也波澜不惊——“我们每天都这么做呀！”一个印刷商人说。在他们的帮助下，劳伦斯出版了一千册精装限定版。这些书被偷运回英国，在他的朋友和一些读者间流传。许多人好奇批评家口中“污秽的深渊”和“英国文学中最下流的书”是什么样的，更加盼望一睹这部作品。

第一版很快卖空，开始第二次印刷。随即苏格兰场开始搜查劳伦斯朋友的住处，没收书籍，使得该书在英国更加稀少。还有人提醒审查者，说美国纽约的海关官员也截获了几船私运的书本，据劳伦斯说还转卖给了黑市商人。这些书里有的是通过照片翻印的、模糊不清的便宜货，有些则是像经文或赞美诗一样有着黑色封面的精装本。

虽然劳伦斯对盗版像对审查一样恼火，因为两边都剥夺了他的作者权利，但多数仰慕他的读者都很感谢盗版书商，提供了意大利印刷商无法给他们的作品；虽然像塞缪尔·罗思这样私自传播、销售该书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却也因为卖劳伦斯的作品付出了代价。30年代罗思就两次因为交易该书入狱，这些事加上其他贩卖非法作品的行为，都是罗思1956年被判服刑五年的诱因，直到1959年夏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宣布合法之后，罗思依然在牢狱之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解禁是在美国邮政部被起诉之后，起诉人是个颇为浪漫激进的年轻人，巴尼·罗塞特，在格林威治村有家先锋出版社，叫格罗夫出版社。罗塞特要是早生十年，可能会像罗思一样坐牢，因为他也像罗思一样热爱独立，憎恨审查制度。但罗塞特运气好，他出版情色书籍的时候美国已经对生活和文学中的性更为宽容；而且罗

塞特的生意还有额外的提携，因为和罗思不一样，他生在富有家庭，掌握着资源，能在法庭上以震慑人心的气势替自己出版的书辩护，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及其他有感官描绘的书和电影，都是格罗夫出版社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发行的。

罗塞特家富有的源头是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野心勃勃的芝加哥银行家和商人，是给香槟瓶子做木塞的倒霉俄国犹太人的后代；“二战”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显赫地位和爱国心，他把游艇捐给了美国海军。罗塞特的母亲1921年赢了一场选美比赛，引起了银行家的注意，并娶了她。她父亲是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好战分子，从戈尔韦被流放出国，在密歇根州做水管工，说盖尔语 [34]，极度瞧不起英格兰人，屋子里都不能见红色，因为红色让他想起穿红衣的英军士兵。巴尼·罗塞特是独生子，也知道母亲的反犹倾向，听见她私下里说过芝加哥犹太邻居的坏话，这让他不禁想到母亲对犹太人的厌恶，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针对他的。

少年时他敏感、多动、充满叛逆心。私立学校里，他参与编辑了一份叫《反一切》的报纸，还参加过在影院外面抗议放映《乱世佳人》的活动，因为电影有歧视黑人之嫌。虽然他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却是高中橄榄球队里的明星中卫，还和班上可能最漂亮的姑娘约会过。高年级时他还担任班长，是圈子里第一个会开车的，车子是崭新的帕卡德米色敞篷车。他也是他圈子里第一个买到非法版本《北回归线》的。

1940年，他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新生，写了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文学论文，得了B——；第二年，他被学校里的贵格会烦得坐立不安，转学去了芝加哥大学。三个月之后，他还是不满意，又去了洛杉矶，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不到一年，1942年10月，他又参了军，后来还成了通信兵部的少尉，被派到中国执行摄影任务。在中国他有时也大胆跑出边界，不得被同行的军官限制行动。

战争结束后，罗塞特回了家，从芝加哥大学拿了哲学学士学位，和别人共同买了一架小型飞机，可以从天空俯瞰城市的摩天大楼，还同一位想当画家的金发社交名媛有了风流事。那时这种事为社会所不齿，两个人却照旧堂而皇之地同居，一开始在纽约，后来去了法国；1949年他们最终在普罗旺斯结婚的时候，爱情基本已经完了。

回到纽约，她慢慢疏远了罗塞特，跟了一个生计艰难的犹太表现主义抽象派画家。罗塞特也很快结识、娶了布伦塔诺书店里的女店员，她父亲“二战”时是德军的情报官。罗塞特再婚时是1953年，一年以后，他收购了格罗夫出版社，开始出版有才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要么不够商业化，要么不够传统，要么让美国的大出版商觉得太标新立异，却正好迎合了罗塞特兼收并蓄的口味和喜爱冒险的天性。

与罗塞特签约的作家有让·热内、萨缪尔·贝克特、欧仁·尤内斯库、阿兰·罗伯——格里耶、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有其他欧洲人和住在巴黎的文学流亡者。那时巴黎还是西方文化的首都。罗塞特待在巴黎的时间

相当之久，不光是为了和法国经纪人、出版商谈版权，以在美国出版他欣赏的小说和剧本，也是为了结识在巴黎的年轻美国人：这些人有的编写文学杂志，有的写小说，有的只是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度日、感受着海明威所谓“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的意蕴。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巴黎有独特的社会与文艺自由，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一个人，一个胆大包天的出版商，莫里斯·吉罗迪亚，因为他，美国人才能在巴黎买到因为太过露骨写实而无法在本国出版的英文书。

莫里斯·吉罗迪亚和罗塞特一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罗塞特在巴黎见到了他，不久两人便十分亲近，互相欣赏对方的职业。吉罗迪亚的公司叫奥林匹亚出版社，1953年成立，率先用英语出版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J.P.唐利维的《红头发的人》、波利娜·雷阿日的《O娘的故事》、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以及特里·萨瑟恩与梅森·霍芬伯格合著的《糖》。像罗塞特一样，吉罗迪亚冲动、大胆，受到被他称作“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痛恨资产阶级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虽然他在巴黎也出版了一部分传统书籍——吉罗迪亚出版过政治论文集、法语版的俄国文学名著，甚至还有专讲编织工艺的杂志——但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与自由派观点联系在一起。他贡献给文学界最为肉欲的作品是《用张开的嘴》《肉体战车》和《白色大腿》之类的小说。

最后一本署的是假名弗兰西斯·伦格尔，作者实际上是意大利——苏格兰的天才作家亚历山大·特罗基，也是面向巴黎读者的英语文学季刊《梅林》的编辑。吉罗迪亚还出版了一部叫《淫欲》的冒险小说，作者是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罗格，用了吉罗迪亚提议的笔名帕尔米洛·维卡里昂伯爵。吉罗迪亚还把《糖》的作者写成“马克斯韦尔·肯顿”，因为该书的美国合著者特里·萨瑟恩觉得，要是自己的名字与这个威斯康星州放纵少妇的故事连在一起，他刚刚写好交给美国出版商的童书的出版机会就要大减。

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想要匿名的作家也会给吉罗迪亚投稿，用“马克思·范·海勒”“迈尔斯·安德伍德”和“卡门西塔·德拉斯·路纳斯”之类的名字。因为企业管理松散，吉罗迪亚时常缺钱。缺钱时，他就给法国和海外的广大客户群邮寄产品广告，里面写着新作品即将出版，还有性爱小说诱人的情节简介，怂恿大家出钱买；等收到足够数目的订金，他就找个作家写一本小说，情节多少按他的说法炮制就行。

“我那时乐在其中。”后来在回忆录里，他回顾自己在战后巴黎飞速增长的生意时说道，“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正在被色情的舰队攻击、入侵、渗透、包抄和征服。英格兰狄更斯时代的学校教师们因为无助的愤怒而痉挛，大法官的假发下也毛发直竖，纽约和伦敦的黑市上，我们的绿皮书价格简直要一路涨上天去。”

吉罗迪亚在巴黎指挥着“色情的舰队”。虽然他的法国姓氏取自信天主教的母亲，他所跟随的却是父亲多年前规划的航向。他父亲名叫杰克·卡亨，是个英国犹太人，直到193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不懈地侨居在巴黎写作、出版当时被认为是淫秽的英文书。

杰克·卡亨出生在曼彻斯特，“一战”时还是年轻的英国士兵，伊普尔战役中因为德军的毒气弹肺部受了伤。但战后，他此前对德军的轻蔑让位给了对英国的幻想破灭，他厌恶英国那种严苛的规范和长久不衰的维多利亚风尚。早在政府长篇大论地批判D.H.劳伦斯之前，卡亨就抛下了英国，与热辣的法国妻子来到了欧洲大陆，后来创建了方尖碑出版社，与亨利·米勒成了朋友，也是《北回归线》的第一个出版商。

除了出版自己那些不够正派的小说，卡亨还出版了西里尔·康诺利、阿内斯·尼恩的作品，^[35]还有弗兰克·哈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乔伊斯的诗歌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以及劳伦斯·都瑞尔^[36]的第一部小说《黑书》。但1939年写完《书贩子的回忆录》之后不久，卡亨就去世了，留给20岁的儿子莫里斯几张没付的酒单，以及继续经营方尖碑出版社的挑战。

有一阵，吉罗迪亚的生意就靠在巴黎的美国老兵支撑，他们大量购买米勒和哈里斯的作品，和芬妮·希尔的“回忆录”。但后来莫里斯·吉罗迪亚出版了法国抵抗运动人士写的内幕自述，直指公共官员与商业巨头相勾结，给自己树立了政敌；虽然法国法院认为吉罗迪亚不构成诽谤罪，但之后他便感觉做出版树大招风，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有检查的人上门来问淫秽书刊的事。

一开始他被问到米勒的作品，这事已多年没人提了，然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又在出版很久后被公布为淫秽作品。后来又有人反对让·热内的《鲜花圣母》和奥布里·比亚兹莱写作并插图、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在山下》。

突然间，吉罗迪亚觉得法国的自由传统——流血革命换来的遗产，正在被政府内的反动势力颠覆；还有几个住在巴黎的政治观察家和记者也这么想。其中一个，大卫·舍恩布伦，就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连遭军事失败，使很多爱国者觉得法国缺乏纪律，自由太多，随意过多抽干了国家的活力，有必要重新恢复秩序、权威与旧式道德。

清洗色情作品通常是右翼专制政府上台的信号——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时，最早的举措就是禁止裸体露营、查禁性爱指导书《完美婚姻》——50年代后半期对吉罗迪亚屡次骚扰，预兆了戴高乐将军和他严厉、虔诚的妻子上台掌权。在戴高乐影响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队享受到了更多的特权和影响力，很快，莫里斯·吉罗迪亚就成了他口中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自命不凡价值观”的受害者。关于法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的欢乐都离开了这个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让巴黎赶走了最后一批年轻艺术家和游荡者；这城市外表干净，政府的法令将它粉饰一新，但它

的精神已经死灭，俗世的盛宴也已告终。”

吉罗迪亚关掉了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巴黎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罗思一案带来了新的淫秽作品定义，将左岸文学界的欢乐景象传到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旧金山的北滩，洛杉矶的威尼斯海滩，再到芝加哥的近北区。意式咖啡馆在各大城市里遍地开花，“垮掉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佳作不断，热内和贝克特的平装书在大学书店里热销，在法国依然遭禁的《洛丽塔》在美国已经合法化，1958年由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37]出版，一年后，巴尼·罗塞特的格罗夫出版社就印刷发行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法国人还在追随旧日的英雄，美国人却日渐厌倦他们上了年纪的将军，戏仿着艾森豪威尔对白宫媒体含混错乱的讲话。1960年，美国人还感到了冒犯和难堪。这年苏联指控美国的间谍飞机在其领土上空巡逻，艾森豪威尔驳回了这一说法，结果后来一架美国U-2战机被苏联击落，飞行员被俘——暴露了他的欺骗行为。

这件事加上一系列其他事件，让公众越来越怀疑美国领导层的正直和权威，这件事也标志着年轻一代正在背离过去的政策和实践。就像U-2战机的飞行员向敌人坦白、背弃了军队的传统——这种行为在艾森豪威尔当将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无数年轻的美国人现在也抛弃了父母那一辈的规矩和拘谨，开始铸造新的社会，一个没有那么多秘密、更加开放、不再墨守成规的社会——一个很快就会要求校园里有言论自由、谴责种族主义、在越南战争期间烧掉征兵卡的社会。虽然类似这样的反抗行为大多被历史标记在60年代中晚期，最初的地震其实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就开始了；而且分裂潮流的源头几乎都与性有关。

1959年，一个叫拉斯·迈尔的电影制作人——以前他是给男性杂志拍女人半裸照的摄影师——拍了一部名为《蒂斯先生的邪念》的电影。影片中出现了好莱坞女星裸露的胸部和臀部。迈尔利用了刚刚变宽松的淫秽作品法，在全国几家艺术影院放映了自己的影片，观影群体远远大于通常会来的寂寞男性。迈尔的电影投资仅仅2.4万美元，却挣回了100万美元的利润。这很快就催生了几十部跟风展示裸体的影片，在美国开发了市值数百万美元的“裸体色情片”市场。

虽然伦尼·布鲁斯的夜总会表演还是总被警察突袭，对他淫秽罪的指控却屡屡被上诉法院驳回，他便能继续高谈阔论地批驳美国的伪善，为色情作品的言论自由辩护，恶意猜测、嘲弄审查者和神职人员的性生活（直到1966年吸毒而死）。

曾经裸女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登在男性杂志上，1960年，《时尚芭莎》刊登了理查德·埃夫登[38]摄影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金发的社交名媛——克里斯蒂娜·保罗齐，这照片让社交名人录[39]删除了她的名

字，却把她扶成了媒体名人，《时尚芭莎》也高调地成了时尚风向标。

全国上下，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电影和杂志中的裸体不再那么大惊小怪，对海滩上暴露的比基尼也更能接受了。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无疑是《花花公子》杂志。这是杂志创刊第七年，怀着对更大自由的支持、不遗余力推广比基尼的决心，杂志卖得更公开、更火爆，不仅城里的报摊，连小镇的杂货店里都在卖。杂志也吸引了全国的广告商，因为它抓住了很大一部分利润丰厚的年轻人市场——四分之一的杂志卖到了大学校园里。许多年长的美国人对杂志内容还有抗拒心理，但也对其商业成就印象深刻；现在对传播类似期刊的人，陪审团定罪也不如以前严格了，甚至在戴利市长执政的芝加哥市都是这样。

1959年，芝加哥的反色情小队逮捕了55个报纸摊贩，指控他们贩卖色情杂志。法庭上，由五位女性和七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某个教会团体一直坐在法庭上，拿着玫瑰念珠默默祈祷，陪审团完全不为所动——投票认定被告无罪。当陪审团宣布达成一致的时候，法官好像惊呆了，然后从座位上向前倒下，被迅速送往医院。他犯了心脏病。

1960年，海夫纳的财富日益增长，他买下了一座价值37万美元、有48个房间的维多利亚式豪华大宅，就位于高级的湖滨大道附近，又花了25万美元翻新装修、置办家具，比如一张圆形可旋转的大床。这座宅子成为海夫纳不断扩张的帝国的核心。这一年，他还在芝加哥开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请了新晋的黑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墙上装饰着珍妮·皮尔格林和黛安娜·韦伯等拉页情人的海报。最早来俱乐部的顾客里，就有刚满21岁、待业的哈罗德·鲁宾。

像就是为了正式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那爷爷级别的时代脱离出来，宣布新一代必然的崛起，1960年11月，美国选出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43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

在他简短而戏剧化的任期内——其间他试图进攻古巴而失败，不过成功地对苏联进行了海上封锁，刚果、柏林和东南亚有种种危机，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麻烦不断——他还是找时间成立了美国和平队，在国内推广身体健康和健康意识，去纽波特航行，穿着游泳裤出现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周围是崇拜他的女性。他让白宫笼罩上了魅力的光辉，有幸同享这光辉的人将终生铭记。

他演讲时说的每句话、公共场合下做的每件事、私下里读的每本书，在那个赶时髦的时代都有令人惊叹的影响力。他公开表示喜爱伊恩·弗莱明 [40] 的间谍小说，弗莱明作品的销售量就上升；他让吸雪茄成了地位的象征；他因为背痛而特制的摇椅，甚至也很快成了家具厂商争相模仿的热捧样式。

他个人如此受欢迎，当然有一部分是他年轻时尚的妻子杰奎琳贡献的。她是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另外，也是无数男性杂志读者的幻

想对象。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多男人偷偷渴慕着总统夫人；可任凭她这样美貌动人，也拦不住丈夫对别的女人感兴趣。他虽然信仰罗马天主教，却不甘于守着一个伴侣；他是天主教里的精英成员、家财万贯的信徒，像父亲一样与红衣主教常常来往，但天主教扼杀可怜教民性生活的禁欲理论，他才不感兴趣。

虽然他的不贞行为没有上过报纸，谣言却长盛不衰，记者们认为他的情人包括但不限于：两位好莱坞女演员，一位住在波士顿拉德克里夫学院的研究生，一位在白宫工作的漂亮秘书，一位通讯公司总裁温文尔雅的小姨子，还有位住在洛杉矶的可爱离婚女人。之所以在60年代这些情人里没有一个人被曝光，使他避免让这种秘密的爱好发展为丑闻，是因为他不像以前的某些总统眷恋于一人，他对单一情妇没有兴趣，他喜欢多样的新鲜感，而且据一位与他熟络的记者说，他做爱就像在游泳池里游个来回那样轻松自如——不是说他共享床第之欢的女人不够喜爱，而是性交对他而言，并非纠缠不清、复杂沉重的承诺。性交是纵情享受纯粹的欢乐，是项健康的运动，能消除紧张情绪，产生真正活着的愉悦心情。肯尼迪是位——D.H.劳伦斯可能会这样说——阳具总统。

且不论他的性爱风格多么能代表60年代，一些白宫助理和政治同盟对他的行为嘴上不说，心里却默默骇然。有些人多年以来习惯了总统应该是个老人，对肯尼迪和其他支持“新边疆”^[41]的内阁成员那年轻旺盛的性欲惊讶不已。

1960年，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也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得到了白宫的工作。她本以为这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理想主义获得的，却发现肯尼迪和他的几个男性副手只是看上了她的身体，这让她失望不已。另一位白宫秘书也随总统去过竞选旅行，杰奎琳不在时，也与总统度过了许多私人时间。1963年，她渐渐为焦虑侵蚀，因为她害怕媒体很快就会曝光他的风流韵事，和她的涉身其中，以致后来，当听到他在达拉斯死去的噩耗，她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现在他英武潇洒的领导者形象可以保全下来了，不会因为私生活被人爆料而染上污点。

肯尼迪被刺身亡之前，《时代周刊》驻华盛顿的记者休·西德尼已经写好了白宫内放荡主义盛行的文章，但此文只是交给纽约编辑的机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西德尼写到，肯尼迪政府奢侈淫荡的作风有时让人想起古罗马的享乐主义，这也给他的报道工作造成了困难，因为一到晚上或周末，政府发言人好像就都忙着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参加社交活动，连影子也见不着。备忘录还补充说，某个周末，肯尼迪和内阁成员都在棕榈滩，连总统年迈的母亲罗丝·肯尼迪也成了狂欢的一员，带着男伴参加了派对——西德尼偶然听到，这位男伴被人称作她的“小白脸”。

虽然只有《时代周刊》的工作人员能看到这份材料，休·西德尼却被请到了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里，震惊地听到他愤怒的声音：“我们可以告你诽谤。”罗伯特·肯尼迪的桌上放着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西德尼要求知道肯尼迪得到文件的途径，回答却只说是有人送来

的。现在，西德尼感到了愤怒，他道歉说不该轻率称罗丝·肯尼迪的男伴为小白脸，但他不肯撤回报告中任何其他内容，比如说政府的现状“令人作呕”，还说“政府不该这样运转，你们也不该鼓励它这么运转”。

《时代周刊》要是发表了西德尼的备忘，读者大概会有很热烈的反应，特别是住在远离东海岸小城镇里的人。因为肯尼迪虽然带来了兴奋和积极变化，中产阶级还是有些伤感，觉得变化太快了，南方有太多静坐示威，华盛顿有太多没邀请他们的派对。肯尼迪家族造成了一类排他的“内部”群体，成员是俊男美女、电影明星、哈佛教授和有钱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在哪儿都想推行民主，除了在自己治安良好的城区，以及新英格兰、汉普顿的私人海滩上。

追求年轻的风气让许多三十几岁的美国人感到自己太老了，尤其是副经理级别的人。他们心系公司，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但进入这个新人物层出不穷、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时代，他们突然就感到迷茫无措、跟不上变化了。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60年代再回母校，不由得被母校的新自由震惊。未婚的女学生，有些还率先使用了避孕药，公开与年轻男人同居，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自由，全不顾几年前这样做会立即被开除。60年代的男学生也似乎全无礼仪的概念，不打领带，对年长的人也不尊重；他们一副轻松自信的神态，可能觉得有了最新技术的知识，加上老一辈很快要被淘汰，自己的事业一定能走捷径到达成功。

年长的毕业生虽然恼火这种态度，却也羡慕他们享受的新自由，恨不得自己年轻几岁，好在这自由中纵情声色。其中有一个人，他的情感可说是代表了几千个30岁出头的男人——后来他受到诱惑，有了一次超越想象的感官体验。当下，他还是个平凡的、小心翼翼的保险经理，名叫约翰·布拉洛。

约翰·布拉洛身体结实，身高超过六英尺，淡褐色的眼睛，身材匀称。每天早上，他穿西装打领带，到洛杉矶商业区的保险办公室上班，性格外向，讨人喜欢。他的衣服是布克兄弟 [42] 风格，浅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整齐利落——他父亲准会对此十分高兴，父亲是意大利裔，曾在芝加哥赫斯特大楼开一家只有六张椅子的小理发店。

布拉洛曾投票给肯尼迪，也哀悼了他的遇刺，他也知道肯尼迪的影响让父子间的距离更远了，这种气氛下，“代沟”将会应运而生；约翰·布拉洛自己也对1964年伯克利的校园运动有所不满，因为有个学生写的头条是：“你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布拉洛33岁，觉得比起那些自以为是、打着正义旗号的暴乱分子，自己同样值得信任且满怀理想。

1956年在纽约大学拿到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之后，布拉洛压下了去医学院进修的冲动，选择在洛杉矶的好莱坞男生俱乐部1里做青少年工作。1960年，他和朱迪斯·帕尔默结了婚，她是个金发美人，正在受培训，要去贝弗利山庄诊所做护士。婚后布拉洛便转到保险行业，找了个薪水较高的职位，他觉得这与社会工作和社区支持相关，广义说，和国民福利也有关系。

没有大型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布拉洛认为美国就不能取得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奇迹，在纽约人寿洛杉矶办公室当推销员时，他就满怀自豪地读了公司历史。从 [43] 845年起，公司就分担着美国人冒险过程中的悲伤和荣耀。纽约人寿给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资金，给那些乘着四轮马来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上了人寿保险，还买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债券，以支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行动。

虽然约翰·F.肯尼迪没有投保，但之前已有九位总统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罗斯福和两位遭到暗杀的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此外还有一些冒险的个人主义者，比如哈利·胡迪尼、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查尔斯·爱迪生和沃尔特·克莱斯勒；还有乔治·卡斯特将军，1876年他在小比格霍恩河的最后一战就由纽约人寿赔付了5000美元。 [44]

布拉洛加入时，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五家保险公司之一，在全国有360处办公室，接近1万名正式员工，还有同样数目的独立保险推销员。尽管只是如此庞大群体的一分子，布拉洛还是对公司有个人感情，他天生就喜欢团体，把公司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很快，他得到了提升。1962年，他达成了公司的最高销售标准，成了副经理。1964年，他被任命为区域经理，工资涨了一大截，买下了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一带伍德兰希尔斯市郊的宽敞房子。他是当地扶轮社和青年商会 [45] 的成员，为联合劝募筹集资金，还是老东家好莱坞男生俱乐部的顾问，同时

也是谷地橡树宗教科学派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抛弃了意大利裔父亲不够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犹太裔母亲的犹太教传统。

少年时，布拉洛住在芝加哥的下层中产阶级社区，反犹主义盛行，他从不敢向同学提起母亲有俄国犹太人血统。他害怕被社会排斥，希望融入主流基督教人群，便加入了社区里隶属于圣公会的青年俱乐部。但母亲越来越厌倦芝加哥寒冷的冬天，在她的坚持下，195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洛杉矶，布拉洛也更能接受自己了。

在南加州日渐蔓延的开放气氛中，他变得不那么拘束、执着于种族观念了。这里没有那种狭隘的社区，那种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或德国人独霸一方，派系斗争激烈，只有在敌对犹太人和黑人上才团结一致的社区。洛杉矶是个相对年轻、无根的城市，与旧世界的纽带和传统没什么联系；来这里定居的不是欧洲移民，而是其他城市的美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籍很有安全感，不需要在种族联盟里寻求庇护和力量。他们十分依赖汽车，流动性相当高，不像大多数芝加哥人和纽约人那样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在洛杉矶温暖惬意的气候下，即使贫民窟那棕榈树荫下一排排的白色棚屋，看起来也比芝加哥冬天阴暗湿冷的公寓舒适许多。

向西迁徙的几千人让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州，布拉洛也像这些迁徙者一样，把这次搬家看成是自己和家人重新焕发青春、得到自由的机会。他父亲一开始不愿离开芝加哥生意兴隆的理发店，后来却很快就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找到了新工作，给克拉克·盖博、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马里奥·兰扎理发。母亲时隔18年又生了小孩，高高兴兴地忙着在加州照料小女儿，不怎么管儿子的私人事务。1955年，她劝儿子不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大学；后来儿子和一直约会的年轻犹太女子分手，她也觉得失望；不过后来布拉洛与朱迪斯·帕尔默交往，她倒没有反对，1958年还去参加了他们由公理会牧师主持的婚礼。

与朱迪斯·帕尔默的婚姻，极大地满足了布拉洛融入主流社会的追求。她能接受他，对布拉洛来说，几乎等于加入了大多数人所属的时髦俱乐部，不用再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不完整的美国人。她父亲是洛杉矶一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给加州投资了几十亿的军工行业有不少人脉，布拉洛感到，在自己向往的商业精英世界里，他会是个有力的联盟者。

从第一眼见到朱迪斯起，布拉洛就喜欢上了她健康漂亮的外貌，红润的肤色和脸颊，让他想起女演员金·诺瓦克的金色短发。参加派对时，朱迪斯比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能喝酒，布拉洛觉得这是因为她成长环境自由，加上她崇拜的父亲那享乐作风的影响。她虽然喝酒，却并不在公众场合失态，布拉洛也没有多余的担忧，而且知道这对他们的性生活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参加完派对、喝了许多酒以后，她在床上变得特别敏

感、无所顾忌，会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和热情与他缠绵。

不然她对性爱就很被动，60年代里，这种被动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像50年代里他们结婚前那种不合法的激情随着合法的婚姻消退了，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恢复。而且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是儿子，然后是个女儿。朱迪斯晚上总是很累，布拉洛有时也宁愿这样，因为纽约人寿的工作越来越多，家人睡着以后，他便在家里熬夜工作。

他很喜欢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这是他蜗居公寓很长时间之后拥有的第一幢房子。这是座米色的牧场式平房，厚实的木板瓦屋顶，门前种着松树、悬铃木和一株胡椒树。马蹄金的草坪上一条弧形的车道穿过，车库里有两辆车，一辆是布拉洛的新款奥兹莫比尔，一辆是旧些的雷鸟，是朱迪斯父亲送她的礼物。房子的内饰是西班牙风格，有砖砌的壁炉和做吧台用的椭圆餐桌，上面放着许多加利福尼亚产的红酒。

到了周末，夫妻俩有时会出门，与布拉洛的同事和妻子一起吃晚餐，吃过饭、喝过一杯餐后酒之后，就各自回家。一天晚上，来了个约翰·伯奇协会 [46] 的人，给他们放了一部支持保守党的政治影片，急切想要得到布拉洛的帮助，成立伍德兰希尔斯的伯奇分会。

肯尼迪去世之后，布拉洛的政治观点更偏保守，但离伯奇协会的激进主义还很远；虽然他和朋友们对最近洛杉矶沃茨街区的种族动乱十分惊讶，对校园里没完没了的骚乱也很反感，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迷上了现在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为少数群体和非主流观点辩护的开放态度及坚定信念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享受性自由的那份悠闲自在，布拉洛只能艳羡。

周日早上，作为惯例，布拉洛告诉朱迪斯要和骑行俱乐部的人一起骑车去乡间。有时布拉洛会独自骑上15英里到威尼斯海滩。这儿有很多学生、嬉皮士、画家和退学的人，他们或聚在咖啡馆，或沿着岸边休息，晒着太阳，讲讲话，读读平装书——都是布拉洛听也没听过的先锋小说。他沿着棕榈树成行的小路，慢慢骑着10速自行车，穿着纽约大学的运动衫和白得过分的跑鞋。他看到五颜六色的飞盘在空中慢慢地旋转，长发的情侣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他经过海边公寓敞开的窗户，瞥见年轻的人们轻松自如、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布拉洛时常在空气中闻到大麻的香味，听到咖啡馆里传来的吉他和民谣音乐，飘飘然地嘲笑着他物质至上的世界。这时他想要从自行车上下来，礼貌地坐在桌边，接近这些宁静的陌生人，同他们讲道理，说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也对社会体系充满怀疑，尽管看上去成功，却没有得到个人满足。但他还是继续骑着车，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嘲弄，他把周日骑车去威尼斯海滩当成是自怜自哀的运动，是在试图解决自己也说不清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年过而立，感到衰老，十分孤独。

但到了周一早上，周日就像没存在过一样，布拉洛重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热情满满地开上新车去办公室——或者像1965年9月的这个

早晨一样，坐飞机去棕榈泉参加保险大会，一半也是为了监督会议顺利进行。受邀的人有几十个新进公司的加州推销员，他们会在沙漠中的现代化酒店里住三天两夜，听高级经理的演讲，参加讨论会，了解公司的未来目标。受邀的推销员加入纽约人寿的时间不长，却已经用业绩证明了自己能卖出保险，这可是稀少的特殊能力，因为推销员要卖的是在人们潜意识里与死亡和灾难相联系的产品，人们对它天生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推销员一开始必然会遭到拒绝。

因此，布拉洛认为，女性卖保险比男性更难；女性倾向于避免被人当面拒绝，而男性在性追求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被拒绝，虽然这令人不快，但他们认为这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大会第一天布拉洛就注意到，70个新推销员里只有4个女人；可其中一个女人的销售额比几乎所有男人都高，布拉洛已经听说了她的大名，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又在鸡尾酒廊遇到了她。

他与另外三个经理坐在拥挤的房间里，这时她独自走了进来，一个认识的人邀请她加入他们，她便坐了下来。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克拉默。一个娇小、戴眼镜的女人，二十几岁，短短的金发，合体的黑色套装裹着好身材；她长相素净，可有点儿男孩子气，让人着迷。她挨着布拉洛坐下，推开了人家递来的烟，点了杯酒，男人们继续交谈的时候，她安静而专注地听着。他们在说基奥计划——国会刚刚通过的为自由职业者而设的养老金项目，她没有唐突加入谈话，却仍旧表现出自己和他们一样明白这计划的复杂性。

事务讨论持续了一小时，大家又点了两轮酒，男人们站起来互道晚安，桌边只剩下了布拉洛和芭芭拉·克拉默。她没起身，抱怨说有点头痛，于是布拉洛说给她找片阿司匹林。酒吧人很多，布拉洛穿过大厅，走向不远处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打开药箱时，他听到身后的房门锁上了。一转身，原来芭芭拉·克拉默跟着他上了楼。她站在床边，微笑着。

“我想好了，”她说，“我要的不止阿司匹林，我还要好好睡一觉。”

他知道自己没听错，就算这样他仍被她的直截了当所震惊。他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进屋时有没有被下属看见。地区副总裁就在隔壁，经理们也都住这条走廊；没容他说话，她就脱掉了外套和鞋子，开始解衬衫纽扣。

“那，”她开口了，他在沉默中一直盯着她看，“你要和我一起吗？”

布拉洛又兴奋，又迷糊，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询问似地看着他，手指停在衬衫纽扣上。

“我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布拉洛终于开口说道。他把阿司

匹林放在写字台上，向着衣柜走去。他脱掉鞋子，解开领带，眼睛却紧盯着继续脱衣服的她。她把衬衫小心地挂在椅子靠背上，首饰和眼镜搁在桌上，褪下了裙子。布拉洛解开她的胸罩，看到了她硕大的乳房、坚实的大腿和臀部，她向着床边转过身去，完全赤裸。她爬到被单底下，等他脱下裤子和内裤。他完全勃起了，难为情地走过房间，意识到她现在正看着自己。

他上床时，她什么也没说，但很快他就感到她的手摸过自己的胸口和肚子，向下摸。他面朝天躺着，任她抚摸，然后压在他身上。她是进攻者，控制着每个动作，他也享受着被她控制的感觉。比起他的妻子和其他女人，她是那么的不同——她不要甜言蜜语的抚慰，也不想拥抱、吻他或被他吻。她好像纯粹只在肉体方面需要他，不受任何感情干扰，没多久，她跨坐在他身上，把他插进体内；她上下运动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直到握住他臀部的手抓得更紧，然后她舒缓地叹口气，停了下来。

“这就好多了。”她说。

“比阿司匹林还好。”他补充道，看到她笑了一下。然后她翻了个身，表明自己准备好了让他也满足，他便挪到她上面，很快高潮了。

他们上床还不到十分钟。又躺了一会儿，她起身戴上眼镜，开始穿衣服。布拉洛发现，她的身体肉感、成熟，与小小的、男孩子气的脸庞和乱蓬蓬的发型很不相称。性这方面她像个男人——布拉洛头一次遇到“打一枪就跑”的女人。

“明天晚上，”她说，背对着他穿好了衣服，照着镜子，“你可以来我房间。”

她向着他转过身来，他在床上点了点头。她走到门边，慢慢打开门，看准了没有人在走廊上；然后，冲他挥了挥手，就走了，轻轻地关上了门。

芭芭拉·克拉默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爸妈不想要的孩子。母亲生她时已经39岁，另外两个女儿是20年前生的，那时她的婚姻虽不是一直幸福，可还有希望；但1939年，芭芭拉出生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偏僻农场，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劳动，更加无法逃离的惨淡、看不到尽头的日常生活。

母亲的阴沉让芭芭拉退缩，两个姐姐又都早早出嫁，过着比家里强不了多少的日子，芭芭拉的成长中很少有女性的影响。她没去欧塞奇郡的乡村学校上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六、七年级的学生坐在前排上课，低年级的坐在后排，能听多少是多少，而是留在农场里帮父亲干活，给花园锄草，喂鸡，还在小麦和玉米田里开过拖拉机。

农场离最近的沙莫伊镇七英里，芭芭拉的社交圈子就只有附近农场的几个朋友，大多数都是和她一起玩各种球类运动的年轻男孩，从他们身上，她以最自然、开放的方式了解了异性。她10岁的时候，看到认识的两个男孩站在谷仓里，手在身前动作着；其中一个叫她过去，她便走近些，看到两个人在抚摸下体。

虽然父亲在厨房边的电镀浴缸里泡澡时，使她见过了男性的裸体，但她还从没见过勃起的阳具，不过，她表现出了毫不畏惧的好奇心。大一点儿的那个男孩，当时13岁，问芭芭拉是否愿意摸一摸它，她摸了一下；他又说自己很想让芭芭拉来爱抚它，她也照做了，感受到它的抽动、看到乳白色的液体从自己的指间渗出，她感到的不是厌恶，更多是惊讶。

年纪小的男孩到高潮之后，年纪大的那个亲吻了她，她不觉得受到侮辱，反而觉得温暖、被人需要。这之后，她和大的那个男孩便经常在草棚里互相抚摸；但是，虽然他们从没讨论过，两人都感到了继续探索的危险，没有进行到下一步。

在克拉默家，性从来就没人提起。芭芭拉开始来月经时，母亲只是给了她几块白布，告诉她垫在内裤里，之后再吧白布烧掉。那个地方农场的女人都会收集旧的床单和布头，留作此用，从不在杂货店里买高洁丝卫生巾，这么做的原因更多是出于羞怯，而不仅是为了省钱。

芭芭拉发现乡村的平凡农妇普遍不好看，直到她去沙莫伊上高中，才见到外貌漂亮的同性。她叫弗朗西丝，高高的个子，打扮入时，受男生欢迎，遭女生嫉妒，只有芭芭拉例外：她对自己在班里“假小子”的身份很满意，对女性美没有敌意。两个年轻女孩很快成了朋友，多半是因为她们有互补性：弗朗西丝优雅从容，芭芭拉强势大胆。芭芭拉可不会

被男生吓住，他们胡闹说了什么话，她马上就能反驳，甚至连他们偷偷带进学校的波本酒，她也从瓶子里咂过滋味。两个姑娘形影不离，除了暑假，芭芭拉要做全职工作挣出自己的学费。

一年夏天，她在一家乡村杂货店打工，店前是加油站，后面是舞厅，除了给汽车加菲利普斯66牌汽油、卖日常用品，她还在后屋卖啤酒给农民和当地青年，有些人留着时兴的莫西干发型——两边的头发都剃光，只留中间一条头发。

第二年暑假，她想要离家更远些，就走了50英里来到杰斐逊城，住在一个同学姑妈开的出租房里，在伍尔沃思的冷饮柜台后工作。寂寞无聊的下午，就听听收音机里猫王唱的《心碎旅馆》打发时间。后来她在裤装工厂找了份薪水高点儿的工作，身边都是脾气暴躁的中年女裁缝。她整天摸着男装裤裆，上下拉着拉链，心里常常想着性。

她现在16岁了，最近才失去童贞，是和沙莫伊的一个学生，她觉得自己爱他。他比大多数人都聪明，他俩在他的旧车里做爱时，他总是很小心，会用安全套。他们的共同兴趣是厌恨农场生活，他还经常说想当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虽然想着要当空姐，但知道自己不够漂亮，也不够恭敬顺从，不过她还是去申请了几家航空公司，当然没有回应，她既不惊讶，也不失望。

即便还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她也确切地知道，绝不要过从前看到的那种贫困、不幸、机械繁衍的农村生活。毕业之后，她回到杰斐逊城，在医院里做X光检测员，后来又和弗朗西丝搬到圣路易斯市，住在一间公寓里。弗朗西丝在保险公司当职员，芭芭拉则在纸箱厂商的财务部门工作，很快她就烦透了那里。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是分开的，芭芭拉的部门有15个闷闷不乐、撇着嘴的女人，一点儿幽默感和精神都没有。

芭芭拉还没有碰见过喜欢自己工作的女人。她读书、看杂志的时候，也没读到过职业女性的故事，她还没见过事业型的女人，成功、受人尊敬、富有、性爱自由、不依赖男人——然而芭芭拉内心就模糊地希望成为这种女人，在密苏里州不行的话，就去别处。有天晚上弗朗西丝提议说去洛杉矶和她姑妈住在一起的时候，芭芭拉已经准备好离开了。这时她父母已经离婚，男友也去了得克萨斯州参加飞行培训；她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一到洛杉矶，她就喜欢上了那里温暖的天气，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以及新结识的热心的人们。在这里，工作和娱乐似乎完美地融合了，人们既注重健康和运动，也注重生产力和物质，芭芭拉很自信，这里是属于她的。

和弗朗西丝的姑妈住了几个星期之后，两个年轻女孩在好莱坞租了公寓，暂时做着秘书，周末就开着新买的车去探索城市。芭芭拉为美国

百科全书做了几个月打字员之后，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商的签约部门找了份更好的工作，就在那儿，她有了第一次偷情经历，对象是个已婚男人，老板的女婿。

中午她会陪他去汽车旅馆，有时晚上也去，她很喜欢性爱，对结婚不感兴趣，这种惬意的关系本来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可他动了真情，占有欲又特别强。一天下午，他在床上泪眼婆娑地对她述说自己对妻子多么不满、岳父又多么专横跋扈之后，芭芭拉知道这种关系应该结束了，不然会变得过于复杂棘手。

她在另一家汽车经销商的保险部门找了份新工作，遇到了一个高个子、线条粗犷的业务员，篮球赛季还在全国职业男篮打球。她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兴趣，他很快就有了回应，但上了床，芭芭拉发现他是个粗心情人，是头健硕、好进攻、不敏感的公牛，结束得很快，然后就想睡觉了。但她还是被那运动员的身体吸引，容忍了一些换作别的男人她绝不会忍耐的事，这一半因为他算是个名人，是个有头有脸、骄傲自尊的男人，也有种孩子气的魅力，他就利用这魅力把汽车卖给那些崇拜他的矮胖男人。

她自己的工作也做得不错，效率非凡，雇主很赏识她，给她涨了工资，也增加了职责。周末不工作时她就去滑水，或是滑雪，要么就看书打发时间；搬到洛杉矶真是转运之举，只有一件事让她烦心，就是在一起住的第二年，弗朗西丝决定和一直约会的男人结婚。虽然对弗朗西丝的喜爱从未以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芭芭拉听到消息却感到奇怪的慌乱、悲伤和迷惑；后来，弗朗西丝搬出公寓时，她觉得被伙伴抛弃、背叛了。她没有参加婚礼，后来也没再见过弗朗西丝。

不过她也很幸运，在这个时期交了个朋友，一个能抚慰人心又有趣的男人，虽然年过七旬，可是身体健壮，做派潇洒。他是这城市的汽车之王，每周都能卖出几十辆，芭芭拉·克拉默则受雇帮其管理保险部门。虽然他做生意时精明、强硬，对她却一直很好，在他身上，她感到了从没有过的父爱。他带她去昂贵的餐厅，说服她相信自己很特别，还鼓励她努力实现自己的野心，不用在乎那些约束女性的传统。

在他的公司里做了一年之后，她渴望独立性更高的工作，于是去了纽约人寿当推销员。她从几家零售商店里买到了大主顾的名单，又整理了她通过汽车行业认识的人的名单，之后便花费无数个小时打电话，约人见面；然后她开着新买的福特野马红色敞篷车去城市的各个角落，和人讲多买些人寿保险的益处。虽然她和别人一样，吃了许多闭门羹，却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找到了商机，因为她更能坚持，也会重点关注一些被忽视的人群，比如职业女性，特别是护士，她们每天都与死亡和事故打交道，被她一讲解上份保险是多么重要，很容易就受到影响。

在纽约人寿的前两年，她的身心都被卖保险占据了，一年能赚接近3万美元，对男人没什么切实的兴趣；因此，棕榈泉会议的第一个晚

上，在鸡尾酒廊放松的气氛下，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性冲动，为此她惊讶不已。

有人把她介绍给约翰·布拉洛，她觉得他挺有魅力，身体也很壮实。但在桌旁和他坐了一小时之后，她感到这人不是主动进攻的类型——因此，他说要给她找片阿司匹林时，她就决定跟着他。

约翰·布拉洛与芭芭拉·克拉默的婚外情，从1965年的秋冬持续到来年春天，基本都是中午在公司附近的汽车旅馆里很快地做一次，然后她就开车去谈生意，留下布拉洛独自吃午饭，回味着性爱的快乐，不时也有轻微的罪恶感和浮上心头的焦虑，让他有些消化不良。

他害怕迟早会被公司的人发现他与芭芭拉的私通，酿成丑闻，使事业和婚姻都陷入危机；但目前这恐惧还没有成为现实。正相反，认识芭芭拉·克拉默以后，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芭芭拉在他身上激起的性欲延伸到了婚姻上，他对朱迪斯潜伏的欲望又被发掘出来，也得到了她的回应。事业上也顺风顺水，公司很快就要派他去纽约总部接受高级经理培训。

对这事芭芭拉也很高兴，在整段关系中，她一直富有专业精神地给他鼓励。他总是惊叹芭芭拉将两人关系严格控制在性爱和闲谈之内的能力，从不投入过多感情，也不对他的婚姻提任何要求。他在家时，她从不打电话过去，也不抱怨他晚上和周末不能出来，从不打听他妻子，只有一次对朱迪斯接受护士培训的事有点儿兴趣。

在办公室里，芭芭拉对布拉洛的态度正式得毫无瑕疵，即便他们刚刚从旅馆回来。他们晚上不经常在一起吃饭，去吃的时候她有时会付账，有时也出旅馆费用。有一次，他不愿陪她去某个汽车旅馆，因为离他在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很近，她便让他在车里等，自己去前台开房，回来时手里拿着房间钥匙。

她是他见过的最独立自足的女人，他对她感兴趣，也被她在床上冷酷、不带感情的态度所激怒；好像他们做爱和给福特野马加油没什么区别，加完油，她就要忙着赶去谈生意。不过，要是她真的突然浪漫起来，他知道自己又会被吓慌手脚，所以对这种关系模式，他从不抱怨——不错的婚外性爱，又不占用过多的时间精力，对他的事业和婚姻没有威胁，过去的一年，他已经习惯了，甚至依赖上了这种关系。

但布拉洛还是有不自在的感觉。他总觉得，这关系最终会让他损失惨重，得知自己秋天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参加经理培训项目，他松了一口气。临行之前几个月，与芭芭拉·克拉默的关系以他预想不到的方式，突然结束了。

他有几星期没见她了——她也在抱怨会谈太多。一天下午，芭芭拉给他打电话，说最近碰到了个喜欢她的男人；以一种不像是她的羞怯声音，她承认自己恋爱了。那人是个工程师，她继续说，很厉害的技术人员，曾经投身于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火箭的工作；布拉洛恭喜她选到

了好男人，心里却很不舒服，觉得她夸那人就是在贬低自己。

他很快就想邀她晚上出来，但她礼貌地拒绝了。他一周后又给她打电话，但她重复说自己现在只和工程师一人约会，又说正在考虑结婚。布拉洛最后不情愿地承认，这段偷情是结束了，意识到这点令他悒悒不乐。

他继续上班，一夏无事，然后和妻子孩子去度了次假，开始准备去纽约待几个月。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在纽约，不过周末也会回洛杉矶，9月朱迪斯开车送他去机场时，说自己会想念他，不过也为这段旅行能让他升到高级管理层而高兴。朱迪斯心情很好，说再见时也没有哭鼻子抹眼泪，布拉洛便怀着奇特的不安心情登上了飞机。

自从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十年，位于麦迪逊大道和二十七大街上的总部大厦离他在格林威治村的旧公寓很近，走路就能到。来的第一个周日下午，他就去华盛顿广场转了转，虽然听了学生们在喷泉旁边唱民谣，欣赏地看着穿迷你裙、T恤衫下略有凸起的年轻女人，他却没有像在加州海滩上那样被青春自由的景象所引诱。他现在对公司更加忠诚，意识到从全国的纽约人寿职员里，自己成为被选中的11个之一，接受当总经理的培训，是多么光荣的事。课程结束后，布拉洛和其他十个人会回到各自的地区，在纽约人寿的总经理办公室管理员工和推销员。对布拉洛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特权，以及晋升到顶层的机会。

学员们住在四十五大街上的罗斯福酒店，工作日的早上就一同乘地铁或出租车去纽约人寿大楼，除了布拉洛。他特意早起，慢跑过18个街区，以保持最佳状态。虽然人行道这时人还不多，也会有几个行人停下来，看着他西装革履地跑过，公文皮包有时夹在胳膊下，像带着足球似的。有时他希望能听到嘲笑或议论声，了解自己是什么形象，不过除了汽车的喧闹，他只能听见自己的西班牙皮鞋踩在人行道上沉重、有节奏的响声。

离总部公司不远的时候，布拉洛就放慢脚步，把衬衫塞进裤子。总部大厦是幢灰色的哥特式摩天大楼，有34层高，经过层层叠叠阶梯状的楼身，是金字塔状的金色尖顶，最上面是金色的灯饰。布拉洛进了门，穿过装饰用的青铜大门，走上拱形的大理石楼梯，进入装饰着浮雕的华丽电梯。电梯开动时很安静，大楼里所有办公室的天花板都铺着吸收噪声的毛毡，说话和打字的声音都是听不见的。布拉洛感觉自己是按时去大教堂祷告的教民，对公司和保险的历史越熟悉，他这种敬畏的心情就越增长，他认为人寿保险是种俗世的宗教，为死去的生命估价，抚慰人们对来世的恐惧。

布拉洛第一周参观纽约人寿档案馆的时候，在玻璃柜里看到了已故

著名投保人的签名：卡斯特将军，罗杰斯·霍恩斯比 [47]，富兰克林·D·罗斯福；展出的还有给公司带来大笔花费的灾难照片——1903年芝加哥的易洛魁剧院大火，烧死了19名投保人；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毁掉了纽约人寿的一个分公司；被认为是坚固不坏的泰坦尼克号，1912年带着12名投保人沉入了大海；还有卢西塔尼亚号远洋班轮，1915年被德军潜水艇的鱼雷击沉，死了18名在纽约人寿投保的乘客。

布拉洛读到，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各式各样的海事保险就在航海国家存在，但17世纪后，人寿保险却在欧洲触犯了许多教会领导人，他们谴责保险商是巫师、拿死亡赌博的人、神意的伪造者。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18世纪末，人寿保险才被解禁；但在英格兰这样的主要航海国，给船只和货物上保险，以防遇到风暴和海盗已是约定俗成，把这种保护机制扩大到内陆的财产和人身上也没有太多反对声音。

布拉洛还读到，是英国人把保险生意介绍到了美国，但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保险业都踌躇不前，部分原因是农业经济下，大部分人都没有多余的现金或存款来为不一定发生的紧急情况提前买单。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的保险公司作为物质主义的保卫者，开始生意兴隆。布拉洛从当前的宣传册和数据图中看到，顶尖的保险公司现在——也就是60年代中期——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富有的私人企业，总资产甚至超过了大型石油公司。

最大的保险商，美国保德信保险公司，资产总值达350亿美元，比美孚石油公司还多100亿美元，第二大的大都会人寿保险也比美孚多70亿美元。布拉洛的公司价值140亿美元，是第四大的保险公司，排在价值200亿美元的公平保险之后、价值130亿美元的恒康人寿保险公司之前。美国还有超过30家市值至少10亿美元的保险商，每天保险行业都能收入1.2亿美元，相当于全国的男女老少每人出了40美分，支付的死亡索赔和养老金却还不到这数目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的10%都花在了保险上，这是给保险之神的什一奉献 [48]。

但在一片繁荣的产业背后，经营这些巨大企业的人却默默无闻，要是新闻杂志想登一篇保险公司的头条新闻，都选不出一个人们认识的名字、熟悉的脸放在封面上。保险业的领导者好像都有些羞怯内向的品质，布拉洛在纽约人寿总部大楼里参观时，抬头望着墙上成排的油画肖像，都是过去的总裁画像——19世纪初留着胡子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20世纪初戴着眼镜的保守党人。这些人脸上相似的表情让他印象深刻，都是害羞而安详的表情。他们是性格内向的商业巨头，布拉洛想，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不知能否与这些深得公众信任的杰出负责人相比。

他相信自己足够勤奋，也不乏谦逊，能在纽约人寿的高层占据一席之地，却没有意识到，内心深处他其实想反叛公司的规范，被美妙的自由所引诱，虽然在纽约时，他死死地压下了这股冲动。在总部的每一天，无论外表、举止，他都是前途光明的年轻经理模范。他似乎完全沉浸在公司的政策和理论之中，努力学习新推出的主要医学项目和集体保

险的计划。下了课，他经常和同事去吃晚餐，但不会和他们一起晚上去外面喝酒，他保存着性爱的精力，留给周末在洛杉矶与朱迪斯的会面。

暂时的分别对布拉洛的婚姻起了积极作用，每次回家都像是新度蜜月一样。站在机场微笑的朱迪斯金发碧眼、美丽动人，在人群中十分显眼，她热情地拥抱他，在车里兴致很高地同他讲话，回家见过孩子们以后，他们便像恋爱时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做爱。

后来他回到洛杉矶常住，当上了总经理，在伍德兰希尔斯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管理着包括九个核保师在内的一拨员工，他与朱迪斯的关系好像又渐渐回到了去纽约之前的疲态。朱迪斯在家照料了一天孩子，晚上早早睡觉，布拉洛就在起居室里熬夜做升职带来的大量工作。

他几个月都没和芭芭拉·克拉默说过话了，听说她现在和工程师约翰·威廉森结了婚，继续在公司上班，销售业绩还是那么出色。布拉洛想着给她写张便条，或是打电话问候一声，不过还没来得及真正打电话，一天下午，他就在总公司的电梯旁边碰见了她。她态度很热情，想到她已经结婚，再被人看到自己和她说话，布拉洛也不会不自在；后来他们又约好吃午饭，他全没想到两人的关系还能再和性扯到一起。

吃饭的时候，芭芭拉以她特有的语气提议再去一次汽车旅馆。起先布拉洛觉得她在开玩笑，但她又说了一遍，还说她可以去登记开房，让他在车里等，听到这里，他便叫人结账，同她走出了餐厅。对她的冲动和大胆，他格外敬畏，也兴奋地期待着与她做爱；但把车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她下车去开房之后，他等在驾驶座上，不安起来；他在方向盘后面坐得更低些，想着与一个已婚女人来这里是不是明智，一边好奇她会不会在登记簿上签她丈夫的姓。不过，她拿着钥匙回车里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觉得此时最好一句也不提她的婚姻。

进了房间，她很快脱掉了衣服，布拉洛又一次看到了她出众的身体，他裸身躺在床上，任她骑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又感到了她充满进攻性的触碰。她取得满足的那份从容，不和他分开就能把他拉到自己上面的灵巧劲儿，让他想到了马戏团里翻跟头的表演，虽然结了婚，她这种嬉戏似的性爱风格并没改，对额外性爱的欲望也没消失。

结束之后，他们躺在床上，布拉洛问她婚后生活是否快乐。她说是的，又说丈夫是她见过最出色的男人；他又体贴，又自信，不会认为她的独立性是威胁。实际上，她继续说到，他还鼓励她更加独立，希望她在获得了更高程度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知以后，将这些宝贵的品质投入到婚姻中来。婚姻应当是促进个人成长的，而不是限制、束缚人的成长，她不停地说着，布拉洛带着一丝嘲讽的心情听，心想她可能理解偏了她丈夫的意思。他从没听过她这样讲话，既对她丈夫这么做的动机迷惑不解，又想着要是她丈夫知道了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会怎样反应，便

沉默不语。芭芭拉·威廉森则继续说着她丈夫的好处，可能也是在说自己和这段婚姻的好处。

很多结了婚的人，她说，都有“所有权问题”：他们想完全占有配偶，想坚守一夫一妻制，一旦有一方承认自己有不忠行为，就被看成是夫妻关系恶化的标志。但这其实是胡扯，她说——丈夫和妻子都应该有权享受与其他人的性爱，而不会危及原本的关系，不用撒谎，也不必对婚外性经验感到罪恶。人们不该指望一个性伴侣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芭芭拉又说，她和约翰·威廉森的关系就因为两人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而得到了加强，他们对彼此的爱情很有信心，完全可以向另一半承认自己有时与其他人发生关系。

听到这儿，布拉洛紧张了起来，很快打断她说，希望她不会把汽车旅馆会面的事告诉她丈夫。她笑出了声，满不在乎地说承认这事对约翰·威廉森绝没有什么影响，他不是好妒的人。布拉洛突然感到体内同时涨满了惶恐和愤怒，他跳下床，几乎想要尖叫，不过她很快抬起胳膊，摇了摇头，对他说放松点儿，别紧张，她不会对丈夫说的。布拉洛丝毫没有放松，她把这话又说了几遍，他还是觉得不能相信。

离开汽车旅馆以后，他决定再不要和她上床。她和新婚丈夫放荡的生活，加上那一套性忠诚的谬论，一定会带来恶果，这颗定时炸弹爆炸的时候，他可不想受连累。报纸上丈夫谋杀妻子和情夫的故事够多了，主人公平时也大都“不是好妒的人”。布拉洛明白，自己该对芭芭拉·威廉森提高警惕。要是继续与她纠缠不清，而且她还在试验新得来的自由，最后一定会爆出丑闻，让婚姻蒙羞，他光明的前途也会就此终结。作为保险从业者，他把当前的状况评估为风险过大。

两天以后，秘书按了他办公室的铃，说威廉森太太在线上，他已经准备好了和她说再也不能出去吃午饭，也不会答应她别的要求；但一接电话，她劈头就问了一个很紧急的业务问题，讨论时口气完全公事公办。她还说有个很优秀的女人，想申请做纽约人寿的推销员，芭芭拉想让他去面试，并主持公司例行的客户评估测验。布拉洛的职责范围包括招新，于是他在日程上安排出第二天下午的时间，芭芭拉谢了他，挂了电话。

芭芭拉带到他办公室的申请人是个苗条优雅的女人，不到30岁，长长的黑头发，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富于表现力，面试时一直热切地看着他。她叫阿琳·高夫，出生在斯波坎，现在和当工程师的丈夫住在洛杉矶。她说自己做过室内设计师，还在休斯航空公司做过秘书，但她对自己卖保险的能力很有信心。她穿得很保守，一套裁剪合体的灰色套装，能说会道，泰然自若；她的性感身姿也让布拉洛印象深刻，他暗地希望自己的心情不要表现得太明显，让坐在桌子对面的芭芭拉看出端倪。

秘书进屋说试卷已经准备好了，芭芭拉向他们挥手道别，离开了房间，阿琳·高夫则被带进了会议室。这会儿正是傍晚，高夫太太做完试卷

以前，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办公室也要关门了。她答完题，带着自信的表情走进布拉洛的办公室，问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他说还需要几天，会通知她的。她接着问能不能在楼里等他下班，然后搭他的车回家——她丈夫因公外出了，芭芭拉又不能等她。她住的地方离布拉洛不远，他便说愿意效劳。

在车里，她紧挨着他坐，亲密又热心，到家之后，她邀请布拉洛进去喝一杯。屋里很安静，她从厨房拿了冰块出来，站在吧台边看着他的眼睛，好像等人亲吻似的；于是布拉洛吻了她，她立即吻了回来，把身体紧紧压在他身上。他感到她的胳膊搂着自己的脖子，她的手从自己背上慢慢摸到屁股和大腿，接着轻声说他们应该到卧室里去。

不论布拉洛平时的性格有多谨慎，多么能管住自己的冲动，现在这谨慎都灰飞烟灭了，他毫不犹豫地跟她进了卧室，很快脱了衣服。然后，他看到了她可爱的裸体，优雅又有肌肉的线条，像舞蹈家一样；他进入她身体的时候，感到她的长腿环绕着他，凉凉的脚跟抵着他的后背。布拉洛欣喜若狂，高潮来临时，他听到她叹了口气，感到她的动作加快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生命中竟发生了这种事——阿琳和芭芭拉一样贪求快感，他只好推断她们的婚姻一定有什么古怪或缺陷。

担心阿琳的丈夫晚上快回家了，布拉洛7点钟就离开了，愉快地感到精疲力竭，开车穿过安详的市郊道路，回到伍德兰希尔斯。他开进院子时，看到朱迪斯在草坪上。一下车，他就抱歉回来晚了，解释说自己和一个有私人问题的推销员喝了几杯酒。朱迪斯没有露出怀疑的样子，他进屋时，电视声和孩子们的哭声也让他免于继续解释。

第二天芭芭拉打来电话，问他觉得阿琳怎么样，流露出她可能知道了两人上床的事；但布拉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考试结果出来以前，他都会保留意见。布拉洛着急挂掉电话，芭芭拉提议一起吃午饭，他便很快答应过几天见面，挂断了。

一小时后，阿琳·高夫打了过来，说之前和他在一起十分享受，又说等下周知道她丈夫的日程安排之后，希望能打电话约他见面。她又很快补充说，不管考试结果怎么样，她都想见到他，布拉洛听到这里松了口气，因为他刚刚想好绝不能录取她，不然真是错到家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布拉洛下班回家的路上去了好几次高夫家；而且他还违背自己的理智，继续和芭芭拉·威廉森见面。他虽然下定了决心，可芭芭拉的坚持难以拒绝，一方面他很享受这种短暂的情爱幽会，一方面也觉得自己既然也和她朋友阿琳见面，这时候就不该拒绝她。虽然两个女人从来不问他是否和另一个有肉体关系，但他觉得她们一定互相交流过了，只要她们的丈夫不怀疑，他倒是不怎么担心。

芭芭拉不断向他保证会保守秘密，终于打消了他的疑虑，让他开始放心享乐；她解释说，没人会受伤害，互相都能获得很多快乐。他只得

同意，而且对芭芭拉和阿琳的兴趣也重新点燃了他对妻子的性冲动；既然他办公效率依旧很高，没什么理由不让这种欢乐而复杂的状态持续下去。

然而，1967年初冬一个下雨的周一早上，布拉洛来到办公室，秘书对他说刚刚有个男人打了两次电话，坚持要见他，名叫约翰·威廉森。布拉洛胃里一阵痉挛，打了个寒战。秘书显然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芭芭拉的丈夫，说那人没留下口信，只说会再打来。

布拉洛点点头，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门。他慢慢陷进红色皮椅里，揉着额头，想要保持冷静。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朱迪斯和孩子们的照片，墙上挂着销售业绩的奖状、纽约大学的毕业证、一块感谢他为好莱坞男生俱乐部做出贡献的牌匾。他的整个人生看上去很快就要失控，变得七零八落，他痛恨自己的愚蠢，也怨恨芭芭拉引他误入歧途。他觉得，要是按自己真正的直觉走，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不过这时他也没什么好做的了，只有等着面对。最坏的情况就是生命受到暴力威胁，或者闹上法庭，成为人尽皆知的丑闻，损害朱迪斯和保险公司的名誉。就算威廉森像芭芭拉说的那样，占有欲不强，他也可能会要求经济补偿、敲诈他，要求个人贷款或是商务方便，或许还有更离谱、更不寻常的要求。

布拉洛听到电话铃响，秘书按铃说威廉森先生来电话。布拉洛打起全副精神，说了声“你好”。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特别轻柔，布拉洛几乎听不太清。

“我是约翰·威廉森，芭芭拉的丈夫。”他开口道，“不知能否和你吃个午饭？”

“当然，”布拉洛很快回答，“今天怎么样？”虽然今天已经安排了重要的商业午宴，他还是决定推掉，以减少几天的痛苦和担心。

“好的，”威廉森说，“那我12点半左右开车过来接你？”

布拉洛同意了，威廉森道过谢，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上午，布拉洛翻了翻管理提案，用手指拨弄着桌上的文件，看着时钟。他给芭芭拉办公室打了电话，没有人接，他又不想打到她家里，生怕是她丈夫接电话。

12点半一到，布拉洛的秘书按了铃，说威廉森先生在接待室里等。他立马出了办公室，伸出手向来客走去。这是个宽肩膀、大个子的男人，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他三十四五岁，留着耀眼的金发，狮子一般的相貌。这张脸上最惹人注目的，是眼皮低垂、忧郁的浅蓝色眼睛。威廉森勉强笑了一下，与他握了手，接着用温和的南方口音感谢布拉洛抽出时间见他。

外面还是阴云密布，不过雨停了。在停车场，威廉森提议坐他的车，一辆米色的捷豹XKE，布拉洛马上同意了。进到车里，布拉洛发现空调还只装了一半，威廉森解释说这车是刚买的，而且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所有机械活计。

威廉森开得很快，换挡突兀。布拉洛看到，合身的西装下，他的肱二头肌和小臂十分粗壮，皮肤红润、布满雀斑的手强健有力，手指也很粗。虽然威廉森根本没有回头看他，专心开车，布拉洛还是感到被上下打量，自己每一次紧张的抽动都落在威廉森眼里。布拉洛想不出话说，又觉得非说不可，于是他冒险说起了威廉森轻微的南方口音。威廉森回答说自己在亚拉巴马州，但高中之后就没有回去住了。布拉洛等着对方说下去，可接下来只有沉默，他只好又开口问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威廉森简短地说自己没上过大学。布拉洛后悔不能收回刚才的一问。

车继续开，寂静中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布拉洛学乖了，不再问问题，而是看着车窗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们开过圣费尔南多谷的卡诺加公园，路旁的景色布拉洛很熟悉——他在这一带卖过保险，骑过自行车，光顾过这里的餐馆。威廉森开下了主路，沿街开向红公鸡餐厅，布拉洛的心沉了下去——这是他从前经常和芭芭拉来的地方，选在这里吃饭一定不怀好意。

布拉洛下车时什么也没说，跟着威廉森走进餐厅，等了几分钟后，就有人带他们到靠里面的一张桌子。餐馆里人多，十分嘈杂，不过一个好心的服务员正好有空，让布拉洛很快点了杯酒。威廉森握着双手，犹豫着。他好像是害羞，又好像是在烦恼。布拉洛向前倾了倾身子。终于，威廉森开口了。

“我知道了你和芭芭拉的事。”他静静地说。

布拉洛向下盯着桌面，什么也没说，他觉得掉进了陷阱，痛恨芭芭拉居然背叛了他。

“我知道，”威廉森继续说，“我觉得这是好事。”

布拉洛不敢相信地抬眼看他，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你觉得这是好事？”布拉洛重复道，怀疑令嗓音升高了。

“是，”威廉森说，“你对她有好处，满足了她的某些需求。她觉得你很不错。我也觉得挺好，而且，”他温和而坚定地补充道，“我愿意让你们继续。”

布拉洛现在更糊涂了，他觉得威廉森可能是在用扭曲的幽默感挑衅自己。可他认真看了看威廉森的脸，那双蓝眼睛温和地看着他，他便相信了威廉森的诚意，可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说什么话，也不知道威廉森要求他与芭芭拉保持关系背后的动机为何。

服务生拿来了酒，给了布拉洛几秒钟说话前思考的时间。现在他当然不想说错话，可这一刻他完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进餐厅的时候，他以为会被心存报复的丈夫威胁勒索；相反，威廉森夸奖了他，还鼓励他继续与自己的妻子睡觉。在这种古怪的情形里，布拉洛不确定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但这会儿他更不想冒险得罪这个不寻常的男人了，要是激怒了他，可能会遭到报复。

服务生走后，布拉洛很快拿定了主意，现在应该跟着威廉森的思路走，避免一切争论和分歧，必要的话还得恭维他。布拉洛内心的确感到了欣喜，因为他的工作和婚姻都保住了，至少目前是这样；他怀着庆幸的心情举起了酒杯，感谢威廉森的好意，表达了他对他自由婚姻的羡慕之情。

“你和芭芭拉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很妙。”布拉洛开始说道。

“没错，”威廉森同意说，“不过我们还想走很多步。”

布拉洛点点头，说自己已经从芭芭拉那里听到了威廉森的理念，婚姻不应当鼓励占有欲，理想的夫妻应该可以与他人维持性关系而没有负罪感和嫉妒心等。

威廉森接受了布拉洛的总结，不过说这理念还要复杂和有野心。威廉森说，有一组人会定期到他家里聚会，探讨、寻求在婚姻中得到更大满足感的方式。美国人的婚姻出了问题，他说，传统的性别角色需要重新定义，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学家专业方法太过冷漠，而个人又还没准备好，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不过威廉森说，他的小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因为成员都很愿意拿自己做“激发他人改变的道具”。小组成员大多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在当地有像样的工作，也有稳定的社交地位，但他们意识到，自己身上和自己周围存在某些限制和缺陷，因此想要改进。威廉森还提到，小组里有一个布拉洛已经开始感兴趣的女人，阿琳·高夫。

“是的，”布拉洛说，听到她也与此有关十分惊讶，“但这有点太复杂了，我想冷静一下。”

“请随意。”威廉森轻快地回答。

布拉洛对威廉森这种轻松自信印象很深，他想，那天没准就是威廉森让阿琳·高夫和芭芭拉一起去了保险公司。这种策划安排有点儿吓人，像是为了干扰布拉洛的性爱阴谋；不过，午饭时威廉森一直在说聚在他家里的男人和女人多么有趣，有时还会裸体聚会，布拉洛感到越来越好奇，违背自己的意志受了引诱。

午餐结束时，威廉森说希望布拉洛到他家里做客，见见他的朋友。布拉洛说他很愿意。

“那好，”威廉森说，“明天晚上8点见。”

事情进展得这么快，让布拉洛惊慌不已，他也害怕被卷入威廉森的情色世界，可他掩饰住心里的不安，说会准时到。

历史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只是为了让过去有所秩序。进化却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真正的事实和主人；人类如果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将在生活的环境中创造出未来之秩序，最终理解自身的过去。

——约翰·威廉森

威廉森过去是从大萧条开始的。他生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南边的沼泽地里，那里懒散无名，随处能见到松树林和柏树林、木头房子和抱团的家庭。每天早上，人们会捕鸟类、松鼠和兔子来吃，人和动物一样，都受原始本能的驱使。

男人们打猎，用的是弹弓和来复枪，女人们则用烧木柴的铁炉子做饭，这也是木屋里唯一的热源：这里的冬天雨雪交加，木屋周围的地面都是冰块。边远林区的夏天炎热潮湿，很少有风，树叶都纹丝不动，鸟儿也噤声蜷在树枝上，水边唯一的声响，是凝滞的水面上偶尔冒出几个气泡，这是水下看不见的生物在啮咬东西。

晚上，树林里会响起蟋蟀和蚂蚱窸窣窸窣的声音，还有蛇在地上爬的声音，但住在空地上六间木屋里的二十几个人——就是约翰·威廉森的家人和亲戚——毫无畏惧地由熟悉的路径穿过这暧昧不清的伊甸园。他们宁愿在这里，也不喜欢外部世界精致、不稳定的文明。男人们即便能在外面的农场和磨坊里找到全职工作，也宁愿待在林地里。他们熟悉这里的声音，与世隔绝的回响，学会了打猎、打鱼、私酿威士忌，然后卖给私酒贩子，再由他们贩卖到禁酒的村镇里。

蒸馏器就搁在沼泽地里，威廉森的舅舅负责煮玉米和糖，晚上，他独臂的父亲克劳德就开车把威士忌运到酒贩子那儿去。这车破旧得生了锈，千疮百孔，可是内部机械什么毛病也没有。

克劳德·威廉森是个瘦长结实、黑色头发、脾气暴躁的男人。他年轻时试图爬上一辆运行中的运货列车，结果左胳膊被轧断了。他学着适应少了一只手臂的生活，可是精神上很难调整过来。事故之后很久，他还觉得原先左臂和手指的部位会疼，有时还梦见小虫子钻进埋在土里的盒子，吃他的断臂。他还觉得，被埋的胳膊一定是别扭地弯曲着，所以他才会总这么不舒服。最后，他挖出了埋葬断臂的盒子，发现先前想的确实没错。他把胳膊摆正、封死了木盒上的一道缝以防虫子入侵之后，顽固的疼痛便离开了他的身体。

约翰·威廉森的母亲，康斯坦丝，出生在中西部，她和克劳德来亚拉

巴马的林地里定居，几乎就是对自己所蔑视的母亲的反抗。她母亲出生在芝加哥，是个丰满漂亮的巡回演出舞女，到处游乐、性情放荡，为一个英俊的赌徒离开了康斯坦丝的父亲。这段恋情终结之后，又和其他男人有风流事。康斯坦丝是独生女，晚上常被留在家里，或者托给不太熟的人照管，有时在别人家一住就是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少女时代的康斯坦丝十分孤独，但能适应环境。她思想独立，善于反思，在念过的几所学校里都努力学习，阅读兴趣广泛。她不像喜欢炫耀的母亲那样打扮得轻佻时髦，总想着吸引男人注意，康斯坦丝不在乎自己穿什么衣服、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她相貌平平，圆脸、金发，蓝眼睛没半点儿情绪，而且她从年少时起，一直都体重超标。

母亲在莫比尔市和卖纳什汽车的新丈夫定居以后，15岁的康斯坦丝逃出了家。母亲找到她时，康斯坦丝已经和林地中的人住在一起，怀了孕，与19岁的克劳德·威廉森结了婚。她死也不愿和母亲、继父再回去，就和威廉森留在林地里。1924年，她生了个女儿；八年之后，康斯坦丝已经两度离开酗酒的克劳德，但每次又都回到他身边，1932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约翰·威廉森。

虽然和克劳德在一起生活条件原始，没什么诗情画意，康斯坦丝却在这公社一般的群体中获得了安慰，土气质朴的陌生人，却让她有家人的感觉。人们种的蔬菜、打的猎物和鱼，都会互相交换，谁有了个人问题和繁难的家务，别人也会主动分担。男人们互相帮忙盖房子、扩建、盖储藏室，女人则志愿为孕妇接生。每家的孩子都自由地在户外疯跑，要是受伤了或受了惊吓，不一定径直去找父母，经常是跑到最近的大人家里。

孩子们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每天早上一起走路上学，有时都不穿鞋，走过一英里长的小路，到一条土路边上，会有公车过来接他们，再开上十英里到乡村学校。傍晚放学，他们就回来帮着大人们打扫、准备晚饭、劈柴烧火。闲暇的时候，在树林和灌木的掩护下，孩子们有不少性冒险，而且由于这些家庭与世隔绝，年轻表亲男女之间的性接触十分常见。约翰·威廉森第一次性交，就是12岁时与一个小表姐。但所有人都遵守不得与直系血亲有乱伦行为的准则。

这里很多人都有法国血统，受过天主教的洗礼，比较虔诚的人和克里奥尔人 [49] 周日会去路边的小教堂做礼拜，听一个耶稣会的老神父做弥撒，他是从20英里外的莫比尔开车赶来的。康斯坦丝·威廉森后来也皈依天主教，在教堂里弹着管风琴唱歌，可家里别的人都不信教，特别是她漂亮的女儿玛丽昂，这个黑眼珠、浅黑肤色、体态丰满的女孩儿。正直的女人觉得她已经受到了撒旦的引诱，不然不足以解释她粗野放荡的做派。

玛丽昂·威廉森穿衣服都挑最紧身的，从14岁起，林地里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得到她的身体。她知道了这一点，举止更加轻浮，尽情享受自己在异性身上激起的反应；但年轻的玛丽昂觉得，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她垂青，他们也给不了她真正想要的东西——逃离，离开这个闭塞、静如死水的木屋，离开她乖戾的父亲和死气沉沉的母亲。

她觉得母亲简直像经历了什么隐秘的悲惨事故，像是荒野里生长的狼孩，玛丽昂觉得自己和母亲半点也不像，倒是和外婆比较相像。外婆是个上了年纪的舞女，母亲极少时候会带玛丽昂去莫比尔看她。外婆相貌漂亮，喷着香水，染着黑头发，做工精细的袍子下峰峦突起。她住得很舒坦，家具一应俱全，还有一辆宽敞的汽车，是个健壮的德国人留给她的，他是她第二任丈夫，却不是最后一任。她喝马提尼，一根接一根地抽切斯特菲尔德烟，有幽默感又充满活力。玛丽昂看着这个风尘女子，又看看自己没见过世面、苍白的母亲，觉得看到了进化的倒退，她年轻的头脑很快判断出了哪个女人更聪明。

玛丽昂渴望出逃，还因为这时整个莫比尔地区来了几千个花钱无度的飞行员和海军士兵，等待在战争中接受征调。这是1940年，广播新闻上说着日本和德国的进攻，每天莫比尔的沼泽地上空都隆隆作响，那是附近的布鲁克利空军基地的飞机，或是佛罗里达州海岸边的彭萨科拉海军训练营来的飞机。莫比尔的造船厂都忙着签国防协议，很快船厂就需要大量工人，连林地里的人也被招工，受雇的工人之中就有玛丽昂那独臂的父亲。

一到周末，临海城市的人行道上全是沿街看女人的飞行员和水手，很快他们就会看到长相比实际年龄成熟、面带微笑的玛丽昂·威廉森。她从家里跑了出来。父母再听到女儿的消息之前，她就嫁给一个军人，15岁时当上了新娘。

婚姻并没遏制住她的躁动不安，没有几个月，军事合作行动开始，她的婚姻也告终结。不过，16岁她又结婚了，这次丈夫是个海军飞行员，比她大十岁。他叫约翰·威利·布洛克，把她从彭萨科拉带去了诺福克[50]。1941年2月，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后来，布洛克被派去驻守珍珠港，玛丽昂和儿子搬到了蒙哥马利市，与丈夫的父母同住。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布洛克死里逃生，玛丽昂带着孩子去了加利福尼亚，对公婆说她想离丈夫近些，等他回来。但在加州她认识了另一个男人，开始偷情，把襁褓中的孩子扔在儿童福利院里；很快，亚拉巴马州的公公婆婆就收到了儿子愤怒的来信。布洛克正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写信向父母告知了妻子的行为，让他们坐飞机到加州去找回孩子。他们去了，把孙子带回了蒙哥马利，尽管玛丽昂不断反对，但他们后来还是成了孩子的合法监护人。同时，海军少尉布洛克修改了遗嘱和军人保险的受益人，还为儿子建了个信托基金。这是他去世前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中途岛战役中，日军的高射炮打中了他的鱼雷轰炸机，布洛克坠机身亡。

1943年，玛丽昂嫁给了一个名叫理查德·麦克利戈特的海军军官，他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这段关系仍旧不能磨灭她与其他男人冒险的冲动。没多久，她离开了海军军官，嫁给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一个职员，又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她又离开了这个丈夫，嫁给一个巴西牧场主。

她像羽毛鲜艳的鸟儿一样，方向不定、不知疲倦地飞行着。在她离开林地以后的无尽冒险中，去过美国、欧洲和南美的众多城市短暂定居，还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里约热内卢当导游，在托雷莫利诺斯 [51] 当酒吧女招待，在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做助理采购，在贝弗利山一家叫“卢奥” [52] 的夏威夷风餐厅做收银员；而且她还定期、从不打招呼地回亚拉巴马州看父母和外婆。外婆去世前玛丽昂最后一次看她，是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交界处的一家下等酒馆，两个女人，外加玛丽昂抽着大麻烟袋的女儿，随着自动点唱机的音乐跳跳舞，玩着老虎机，度过了一晚。

玛丽昂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理解她这种流浪天性，而且还努力效仿的，可能就是弟弟约翰了。他还很感激姐姐，让他第一次有了看到树林外更大世界的机会。上学的时候，姐姐两次邀请他去外地，同自己和第三任丈夫，也就是海军军官理查德·麦克利戈特一起住。第一次是1943年——理查德被派到了波士顿一艘巡洋舰上。11岁的威廉森就在他们坎布里奇的公寓里住了六个月，上波士顿的公立学校。1947年，威廉森15岁，暑假就和麦克利戈特一起去了加州的阿尔汉布拉市，离洛杉矶不远。他在那儿认识了一帮十几岁的改装赛车和老爷车的爱好者，帮他们修理维护发动机。约翰·威廉森年纪轻轻，却已经是熟练技工了。

在亚拉巴马州时，放学后他就去修车厂里给修车师傅打工。修车厂离家不远——因为战争期间父母用滚圆木的方式把房子挪到了林地外面。威廉森喜欢安安静静地修东西。他身材精瘦、神色阴沉、金发泛白，手指总脏兮兮的，因为时常摆弄农场卡车坏掉的零件、出故障的来复枪、不响的唱机。他对机械部件间的关系十分敏感，凭直觉就能修好东西。12岁的威廉森自己做过收音机，用的是在林子里找到的电线和废弃金属，其中一个铜片是从私酿酒厂偷来的，害他遭父亲一顿暴打。

他上了乡村中学，科学和数学成绩很好，历史很差。班里有18个同学，但他并不对某个人特别好。父亲脾气不好，他放学后从不带同学回家，愿意独自待着，看看书，摆弄机械，或是用业余无线电设备和遥远地方的陌生人对话。

他也偶尔和附近的农场姑娘睡觉，还有一个同意让他拍裸照，可他从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幻想的内容也主要是独自一人从南方的农村逃出去。1949年高中毕业以后，姐姐写信说帮他在安纳波利斯学院安排了面试，可他想到要受学校的严格约束就不愿意，于是报名参加了海军。在

圣地亚哥经过了新兵训练，又在加州北部的海军学校经过电子学培训之后，威廉森被向西远送几千里外，加入了南太平洋上原始岛屿群的美国驻军，接下来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里就是他的家。

这段时间他成了军队里最全能的电子技师之一，所有种类的设备，从电传打字机到雷达声呐，他修起来都得得心应手。一开始他被派到马绍尔群岛，住在一个荒凉、几乎连树也没有的珊瑚岛上，叫夸贾林环礁。岛上的一千名水手和飞行员长期处于极度无聊的状态。由于威廉森有专业维修技能，便有机会坐海军的巡航飞机到另外几个岛上，这让他不仅认识了很多军人和非军队人士，以及女人，而且还见到了当地原住民，他觉得这些人要有趣得多。

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加罗林群岛中的波纳佩岛 [53]，这里有火山爆发形成的肥沃土地，有美丽的丛林和热带雨林、瀑布和溪流，还有几千个友好的当地人，像其他岛上的住民一样，说着独特的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文化。威廉森后来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被请进了他们的家里，熟悉了他们的手工艺品，参加了他们的仪式；他还喝了卡瓦酒，一种用胡椒树根酿成的烈酒。有时，这个偏远的小岛让他禁不住地回想起被抛在身后的、林地里的童年。

50年代早期，军队开始慢慢把一些岛屿移交给美国内务部，内务部则在联合国特许下管理岛上的事务。威廉森接受了提前退役的协议，作为一般政府雇员帮助维修导航和通信设备，以保证美国对南太平洋一带的监视与接触。

靠着美国和当地技师的帮助，威廉森在特鲁克岛 [54] 盖起了工作室，但每周都远赴几千英里之外的其他哨所检查设施。一天，在西加罗林群岛的雅浦岛，他遇到了一个德国金发美女，她比他大三岁，独自住在预制房里，在雅浦岛美国医院的档案处工作。她叫丽罗·戈茨，理想是当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南太平洋的本土文化。从小时候在柏林看到《叛舰喋血记》第一版电影 [55] 时起，南太平洋群岛就迷住了她。早年上学时，她读完了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南太平洋的书，1950年，她离开柏林美国人居住区的家，坐飞机到了火奴鲁鲁，在夏威夷大学学习了两年。

她远渡重洋，来到南太平洋群岛之后，短暂地在几个岛上居住过，后来到了雅浦岛。她知道自己已经成功融入了新环境，因为她最终能够毫无负担地和雅浦岛男人做爱，姿势还是当地人喜爱的蹲坐式。这种体位需要很好的平衡力和强壮的双腿，而她有多年运动的基础，还喜欢跳舞；1953年，威廉森在医院负责人举办的派对上第一次遇见她时，正是被她健康挺拔的外貌吸引住了。

威廉森努力克服了见陌生女人就沉默寡言的癖性，和她聊起了天，说下周还会来雅浦岛，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吃晚饭。她彬彬有礼地接受了邀请，虽然当时没有提起，她其实已经有点认识他了，而且最近还打听

过他。有一天，她从办公室的窗户里看到了他，当时正刮台风，他却站在信号塔边上，好像察觉不到狂风暴雨似的，拍着气象照片。她很喜欢看他，看他被雨水浸透，被狂风推来搡去的身影，她想起了那些电影里的海军上校，在暴风雨中勇敢、高傲地站在船桅上；不过，同他吃过晚饭之后，她满意地发现他完全没有胆大、鲁莽、不负责任的毛病。正相反，他矜持多虑，善于倾听，博览群书，有点儿忧郁，而且——在性这方面，沉默而顽固。经过几次晚餐约会之后，她拒绝和他睡觉，他明显失望了，可此后也继续给她打电话，每次从特鲁克岛来都会去看她；而且为了讨她喜欢——她不喜欢他左臂上的文身，说这是暴徒的记号，而他根本不是——他便去找医生除掉了它。

很快，威廉森不仅成了她的情人，还说服她一起去了离雅浦岛800英里远的特鲁克岛。他催着她离开，说雅浦当地人对西方人的不满情绪正越来越高，她也同意这观点，因为有一天晚上她看到两个不带笑容的雅浦男人晃到她住处附近，挥舞着弯刀。和威廉森待在特鲁克，她觉得安全、满意。1954年3月，他们在岛上结婚，又在岛上度了蜜月，她觉得这段时间就是最典型的罗曼蒂克。

但到了11月，她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并得了恶性贫血，威廉森觉得终归该离开南太平洋，回到北美大陆去，不光为了丽罗，也是为了他自己好。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大海的变幻无常、要乘飞机和船只来往各个地方、热带岛屿上脆弱的房子，都令他厌倦。他还听说，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在佛罗里达东海岸，还有卡纳维拉尔角找到工作，因为政府在那边有导弹项目，希望有一天能发射卫星进入太空。有几个大公司答应给航天研究投入大笔钱；美国科学家，加上韦恩赫尔·冯·布劳恩 [56] 和其他移居美国的德国导弹专家现在都受雇于美国军方，正在研究比“二战”时纳粹所用的V-2火箭更大、更强大的火箭。

丽罗不仅想要，而且急于去美国，于是等她身体稍好些，两人就离开了特鲁克岛。1955年2月底，他们到佛罗里达州一个月后，威廉森就进了波音公司，丽罗生了个儿子。丽罗给他起名罗尔夫。孩子转移了她的注意力，不用总想着住在狭窄潮湿的汽车旅馆里多么丧气，这旅馆还在沿海挺荒凉的地方，离卡纳维拉尔角的军事基地只有几英里远。这可不是她在旅游杂志上读到的佛罗里达——这里只有荒芜的沙丘，沼泽边长着瘦小的棕榈树，还到处都是蚊子。从海滩向内地100英里到代托纳比奇，甚至再往南到劳德代尔堡，卡纳维拉尔角还没准备好安顿跟着导弹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这片与世隔绝的海滨火箭基地的女人和孩子。最近的百货商店在可可比奇的镇上，有3英里远。最近的电影院有15英里远；罗尔夫出生的医院有20英里远；要找个好餐厅吃饭，或是享受一下夜生活，就得往内地开上60英里，到奥兰多市去。

丽罗有时会想念南太平洋上风光如画的岛屿，可她也知道丈夫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虽然军队规定很严，他不能对她说太多。每天早上他

都开着福特小型黑色敞篷车去空军基地，到飞机库里和别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会合，办公室和实验室都设在飞机库里，晚上他就回到汽车旅馆，在两间屋的公寓里吃晚饭。几乎所有汽车旅馆里的人，还有住在高速公路边上摇摇欲坠木房子里的人，都和卡纳维拉尔角的军事项目有关系，丽罗觉得很讽刺，这些未来科技的先锋们竟然居住、工作在这么陈旧破烂的地方。

不过到了1956年，情况有所改善，海滩边上、环礁湖沿岸建起了新的房子和旅馆；到了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号 [57] 震惊美国之后——好像突然有了无限量的政府资金，用来与苏联人进行太空竞赛。每天都有军用飞机降落在卡纳维拉尔角，从华盛顿带来高级官员和科学家，冯·布劳恩和随从人员也定期来往亨茨维尔市。海边建起了更高的发射塔，更多火箭发射场，和更多飞机库，工作人员也多了一倍，多了两倍。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把可可比奇镇周围开发殆尽；商店、沙龙、快餐店遍地开花，后来又有了自动售货机、加油站、洗衣店和药店，保险推销员、医生、神父和酒吧女郎也接踵而至。

沿岸经济繁荣之前，丽罗和约翰·威廉森在可可比奇环礁湖一带买了两英亩土地，用不到1万美元盖了座小房子，很快其价值就翻了四倍。威廉森从波音公司跳槽到了洛克希德，成了X-17、“北极星”和其他导弹的工程师，他还会出差执行保密任务。在家里，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早期的火箭总是出各种故障、毛病，威廉森和同事几乎永远是疲倦而沮丧的状态。他们都感到了要赶超苏联的压力，苏联人的火箭更大，已经将一条狗甚至一个人送入了轨道；而且卡纳维拉尔角的媒体越来越多，美国出什么乱子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在家里与丽罗和儿子在一起，威廉森总是紧张而疏远。他睡得不规律，半夜又花许多时间读技术手册和科幻小说，要么就琢磨一些机械部件的设计、维护事宜。儿子快3岁了，他也不怎么感兴趣；1958年8月的一个周日早晨，威廉森正在屋前的草地上调整沼泽车的推进器，小男孩从围墙另一边跌进了环礁湖里。推进器噪声太大，听不到孩子落水的声音，后来，男孩被卷进一艘停靠的帆船下面，再也浮不到水面上来。

一直在厨房里的丽罗出来找孩子，却找不到，她跑向海边。威廉森也沿着湖岸找，潜进水里找，却没看到被困的小孩。后来警察来了，才发现尸体。丽罗崩溃了，有两个月都要用镇静剂。约翰·威廉森认为都是自己疏忽的过错，葬礼之后，他和丽罗离开佛罗里达州去了德国，和她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

1958年10月，他们在德国待了六周之后回家，威廉森接到了为期一年的临时任务，要他去加利福尼亚州做军事顾问，然后要去代顿 [58] 的莱特空军基地做顾问。丽罗陪着他，同他一起住旅馆、布置公寓，也一直外面工作。1959年末，她心怀感激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但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约翰经常要连夜去加勒比地区的导弹跟踪站，丽罗就得独自待着；一天晚上，约翰催她去德国看看姐姐——因为他正在做一项重大的机密任务，又说很快就会去欧洲找她，然后可能一起搬到巴基斯坦。他好像对这些事很激动、很高兴，她也一样渴望离开这个只有孤独和绝望的地方。

但丽罗在德国收到他的信，说计划突然取消了。他不会来欧洲找她，也不会搬去巴基斯坦了；要她回佛罗里达。丽罗回到可可比奇，见到丈夫时，被他的憔悴消沉吓了一跳，都没立马质问他巴基斯坦的事。他眼睛下有浓重的黑眼圈，胖了不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酒也喝得厉害，几乎是呆滞，或是吸过毒以后的状态。过了几个月，丽罗也没有猜出他为何没去欧洲，为何没有搬到巴基斯坦。

从他透露的一点点儿信息和周围听来的谣言推断，她知道了丈夫是U-2间谍飞机的工程师——1960年被苏联人炮火轰下来的那架，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被抓，披露了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抗议的苏联人中，有人声称某些U-2飞机是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生产的。

虽然这件事占据了几星期的世界新闻头条，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军领导人大失颜面——也中止了U-2计划——政治声浪最终还是平息了；可丽罗的丈夫整天郁郁不乐，有时还流露出对某些政府、军队官员的怨恨。丽罗只能猜到他大概卷入了对U-2飞机通信设备或是操作能效方面的长期争论，因为这飞机按计划要能飞到任何苏联的地面武器都打不着的高度。不管怎么说，苏联人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科技实力，而且她丈夫情绪低落，想必那些有秘密军衔的美国间谍飞行员和民间合作者也不会好受。

约翰·威廉森照旧每天早上去洛克希德上班，可丽罗怀疑他能否克服沉闷、无聊的情绪，当个称职的仪器工程师。她有一次提了提心理医生可能有帮助，他冷冷地回绝了。1961年艾伦·谢泼德成功完成亚轨道飞行、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太空之后，^[59]他也只是淡淡地高兴——这两件事让海岸边的几千名目击者、卡纳维拉尔角的几百名官员和技术人员激动不已，人们欢呼雀跃，尽情庆贺。庆祝着陆的派对上，来了许多工程师、政治家和宇航员，威廉森带妻子去了，可一点没有开心的样子。他喝得很多，说话很少。他已经变了，至少对丽罗而言，他已经变得不可接近，不复浪漫，不再是多年前那个冒着飓风，站在塔下，被雨水浇得透湿的形象。她想到，他可能有了别的女人，卡纳维拉尔角附近就有几个漂亮的，有的在航空行政部工作，有的在可可比奇的商店里，有的在餐馆和新建旅馆的酒吧里。要是他没和其中至少一个女人上床，也应该有些牵扯，因为在家里他几乎就没有性生活。

晚上他从办公室回来总是很迟，身上一股酒味，他好像退缩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他对年幼的女儿也不比对儿子更上心。晚饭后，他待到深夜，读哲学、宗教、心理学的书，还有平装本的科幻小说，他都按打买。

1962年圣诞节之前，他全神贯注地读了一部长篇小说，好像突然莫名地恢复了精神。小说是安·兰德 [60] 写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他读完后，丽罗对这书很好奇，他便与她讨论了里面的某些部分。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意志坚定的美国工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华盛顿的政客和官僚反对他们，想把他们转化成政府赞成的平庸、顺从的良民，进而控制他们。这些个人主义者不仅反抗了这种压力，最后还离开了这个国家，用高明的才能在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地方创建了理想社会。男主人公是个古怪、难以捉摸、聪明却格格不入的人，叫约翰·高尔特；女主人公是个充满活力的铁路企业继承人，叫达格尼·塔格特。全书对联邦官僚体制的讽刺正与威廉森这两年的感受相合。

像书中主角一样，威廉森也认为改良社会的方法之一就是暂时远离它，在私密的地方精心创造更理想的生活模式，然后慢慢扩大、宣传这个地方及其理念，引诱愿意改变并且值得改变的人进来。威廉森一直渴望改变和被改变，但觉得现在的自己只是个不断迁徙、误入歧途的人，从亚拉巴马的林地到太平洋岛屿，又到卡纳维拉尔角的技术部落，他还是没找到与自己契合的地方。也许他会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发现这地方是找不到的；这地方要亲手创造出来。他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开始，但已经决定不再为政府工作。

他辞去了卡纳维拉尔角的职位，准备这周就去洛杉矶，暂时接受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在一家制造磁力录音设备的公司当工程师。他对丽罗说，希望她这个月内就随他去加州，带着孩子慢慢地开车，等到了加州，就能住进新房子。她揣度着该怎么办，也怀疑婚姻是否能持续下去；但她没有理由，也不想再留在佛罗里达，于是同意去加州找他。

1963年，丽罗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加州，和威廉森在洛杉矶市郊度过了波澜不惊的一年，他终于提议两人离婚时，她不怎么惊讶，更多是松了一口气。没有爱情自然也没有敌意。她默默同意了他说的两人应该走各自的道路，对他提出的离婚协议也没有异议。目前她会继续住在洛杉矶的房子里，佛罗里达可以收到租金的房子归她，她每月还可获得650美元抚养费。威廉森还说，想给她上份更好的人寿保险。离婚手续办完的前一天，他带了个推销员回家解释保险条款。那个推销员，正是芭芭拉·克拉默。

芭芭拉·克拉默第一次见到约翰·威廉森，是他在洛杉矶电子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芭芭拉去向他推销集团保险。他态度生疏，对她几乎有些粗鲁；她到了公司，他却忘了之前有预约，她又没法改期到第二天，令他恼火；他将芭芭拉打发到接待室里坐着，过了很久才让她进到自己阴冷、家具很少的办公室，他坐在灰色的不锈钢办公桌后面，不停抽烟，芭芭拉解释着保险条款，他听得心不在焉。

这时中午刚过去不久，虽然威廉森很冷淡，芭芭拉却镇定自信。她刚刚在汽车旅馆里愉快地和布拉洛见了面，后来独自去圣费尔南多谷兜风也很开心，她在车里随着音乐哼起了歌，因为冲了澡，觉得身体特别轻松。她觉得，开车也是种性感的体验，有机会暂时离开众人，想想私事，在平滑宽阔的道路上跟着音乐动动身子。她觉得肯定还有几千个加州人也这么想，每天在挡风玻璃后面享受独自思考带来的抚慰和好处——洛杉矶到处是移动中的冥想者、在高速路上进行内心旅行的人，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被这种幸福包裹起来，完全不受威廉森办公室里那愤恨无礼的气氛影响。

要说有点影响，就是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单纯的好奇，他好像煞费苦心做出不在意形象的样子。办公室简朴得过分，显然是精心安排过的效果。桌上没有小东西或照片，只有两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地上没有地毯，椅子也不舒服。办公室灰色的墙面光秃秃的，只在桌子后面挂了一幅大画，画的是沙漠里两条空荡荡的公路向远方延伸出去，在无限远处交汇。她问的问题，他大部分用单音节回答；他讲话很少，态度冷漠。但她感觉到，在他的外表下面，就是近乎绝望的需要。他很可能造了一堵墙，希望有人翻墙过来。

她解释完条款，他突兀地站起身来，表示会面结束了。他说她可以留下文件，他会研究一下，然后本周内给她电话回复。一周过去了，他并没联系她，芭芭拉便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出来吃午饭。他说没兴趣，提议去吃晚饭。她答应了，没想到的是，那晚居然过得很愉快。

他们在好莱坞山一家东方餐厅吃饭，之后又去了夜总会。他们喝了很多酒，轻松自然地聊了很多关于私人生活的事，她不能相信这个风趣、说话轻柔的男人就是办公室里那个一脸不痛快的家伙。要么他有双重人格，要么就是她赶上了他特别倒霉的日子。现在，她感到他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背景和她也有点像：两个人都出生在乡村，住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了穷困的白人乡村，想在商业世界取得成功，却没有初始资金和人脉——不过那天晚上，威廉森承认自己想辞职，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芭芭拉很快就看出，这人不能帮她向同事推销保险，但她也不在乎。她对威廉森突然只剩下了个人的兴趣，这个周

五的晚上，他们手挽手离开夜总会时，他冲动地提议说一起出去过周末。

她同意了，三个小时以后，两人疲倦又兴奋地到达了旧金山，站在一家旅馆的登记处。

“两间房。”威廉森对服务员说。服务员看了看这一对，问道：“何必要开两间房呢？”

“因为，”威廉森说，“我们是两个人。”

第一个晚上分开睡，芭芭拉觉得这样非常浪漫，正是几次这种小小的惊喜让她对约翰·威廉森越来越感兴趣。第二个晚上他们依旧没有做爱，等回到洛杉矶，两人在她的公寓里做爱时，因为有了个周末的熟悉和欲望，释放的过程便格外令人兴奋。

他对芭芭拉的影响立竿见影，既惬意，又令人迷惑。同他在一起，芭芭拉就莫名地腼腆、女性化、没了攻击性，却依然觉得自由。她像从前一样大胆追随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和野心，从谈话中，她也知道威廉森欣赏这种独立的精神和风度，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虽然他唐突无礼，可他对这些品质的认识默默吸引了芭芭拉。他对她说，自己不喜欢顺从、依赖性强的女人，不喜欢有关性别的双重标准，也不喜欢夫妻的传统角色，几乎所有婚姻都被这些角色支配着，他自己失败的婚姻也一样。他对芭芭拉说，要是再结婚，他不要顺从的妻子，而是要一个强壮、平等的伴侣，经营一段进步、有冒险性的关系。

芭芭拉在洛杉矶与他一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每晚都见面，有时还去他在范纽斯的单身公寓，她渐渐意识到，他有那么多哲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的书，不仅是出于好奇，而是有越来越浓厚的专业兴趣。

约翰·威廉森事业上的野心似乎从机械工程转移到了感官工程，从电子的奇观变成了贪欲的动力学，虽然他关心的是现代社会，知识却延伸到古代：从早期宗教到最早的预言家和异教徒，到中世纪的科学家和反对者，还有自由思想者和想在工业时代里构建农业乌托邦的人。他对受人争议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赖希反对性别的双重标准，认为这和对女性的普遍压迫一样，是社会保护家庭单元，从而维持强权政府的堕落方式。赖希认为，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将女人当作“为国家生育孩子的人”和免费做家务的人是有“经济利益”的。“由于女性经济上依赖男性，生产能力也相对较弱，”赖希观察到，“婚姻便是她的保护机制，而她同时也受到婚姻的剥削。”

赖希认为女性所处的早期社会环境是“性否认”的，顶多是“性容忍”；但从政府和宗教机构支持的保守道德观念来看，这种性方面的消极

让女人成为更忠诚的妻子，也没准是更大胆的情人。与此同时，男性自身不得满足的性欲，就通过赖希所谓的“雇佣性行为”来发泄，即去找妓女、情妇等上流社会认为低贱的女人。这些女人大多出身下等阶层，在这个蔑视、惩罚她们的社会里做性服务者，可社会也无法抹杀她们。赖希写道：“通奸和卖淫是双重性别标准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包袱；男人婚前婚后都有性自由，女人的性自由则因经济原因被否认。”

赖希个人不赞同卖淫和滥交，但他认为法律不该禁止成年人间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者的性行为；他也觉得不该约束未成年人的性表达。“有人认为，”他写道，“让未成年人禁欲对社会和文化进步有好处。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男人取得的社会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从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转移。该理论被称为‘高尚化’理论。……也有认为年轻人性交减少其成就的观点。事实却是——所有现代性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所有少年人都自慰。单这一项就能推翻之前的观点了。因为，既然性交对社会成就有消极影响，难道自慰就不会吗？”

威尔海姆·赖希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维也纳做弗洛伊德的临床助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大胆地为性快感辩护，这让他命途坎坷，最后在美国进了监狱，1957年死在狱中。弗洛伊德只进行言语分析，而赖希同时研究思维和身体；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社会工作，他总结说，阻抗行为可能表现在肌肉组织、身体的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状、绷紧的肌肉、僵硬的骨头，以及其他代表防御、压抑的身体迹象中。赖希把这种身体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认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层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质地层一样，这种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历史性事件和动荡。一个人可能为了抵御痛苦和拒绝而发展出盔甲，同时也封住了感受快乐、做出成绩的能力，而埋藏过深的情感可能只有从自我毁灭和伤害他人的行为中得到释放。赖希还相信，对性的剥夺和压抑导致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乱和战争——20世纪60年代抗议越南战争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就是对赖希主题的再度回响，他还指责信教的家庭和学校里反性的道德观、政府的“反动意识形态”，认为其造就了害怕担责任却欣赏权力的公民。

赖希进一步指出，无法得到满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认为社会上的性表达是粗鄙可耻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审查者表现出的症状，赖希还说，宗教传统认为性即邪恶，是因为独身的基督教领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体状况不佳。否认肉体的人更容易创造出灵魂的“完美”“纯净”这类概念。赖希推断，那些神秘宗教灵感的能量就是“改变了内容和目标的性兴奋”，他补充说，人享受到了性爱的快乐，对上帝的迷恋就会减轻。

那类得到性满足的人拥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他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为它能穿透盔甲，将酿成精神官能

麻木和毁灭的能量转移到温柔与爱的渠道中，释放出所有“坏掉的性兴奋”。根据赖希的说法，生殖性格的人与自己的身体、冲动和环境有全方位的联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够“顺从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动，不受任何压抑……没有焦虑、不快，也不会一直幻想”；只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满意状态，但个人至少能不被毁灭性、非理性的情绪所围困、扭曲，也不会因为过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质量的机构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由于赖希认为健康的性交是许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评家常认为他只知支持快乐，但事实上赖希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让患者既能感到快乐，也能感觉痛苦。“快感，以及生活的乐趣，”他写道，“要经过斗争、痛苦经历和自我的挣扎才能获得”；虽然他也强调，给予爱和增加快乐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觉破灭后不会逃避到死板状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坚信而赖希坚决不相信性压抑能让文化繁荣；在他眼里，教会和政府合力控制民众，贬低肉体的快乐，提升莫须有的精神价值，简直不能容忍。赖希认为，当权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组织的宗教在基督教国家的虔诚信众中培养了顺服、接受现状等品质，它天生就要谋求人们的顺从，政府也认同这种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虑和罪恶感压在那些遵纪守法、敬畏上帝、只偶尔有出格性行为的良民身上。这些法律赋予政府额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为的名义羞辱、骚扰、监禁某些激进的个人和群体，只要它认为这些人对自身有政治威胁或是冒犯。作家安·兰德的想法比赖希更进一步，认为有时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这样它便可以运用惩罚的特权：“谁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国家呢？”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一个政府官员这样问道，“那还能有什么好处？……法律就该既没法遵守也没法执行，也无法客观地说明白——这样，国内全是违法的人，靠定罪你就能发财了……政府唯一的权力就是制裁罪犯的权力。”

被制裁的罪犯中就有威尔海姆·赖希，他成了性革命的殉道士，他的话和思想在他居住、工作过的每个国家都掀起了争议和冲突。赖希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却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写了有关性自由的文章以及他的“反革命”思想。纳粹也贬斥他是“犹太色情作家”。1933年，丹麦的正统派心理学家攻击他，他便很快去了瑞典，但瑞典也有不少敌意和反对声，于是1934年他又去了挪威。1939年，经过挪威媒体两年的负面报道，赖希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做心理治疗实践，培训心理医生，去社会研究新学院演讲。联邦调查局此前认为赖希可能是敌方间谍，一直留存着他的档案，1941年珍珠港遭袭一周之后，便把他囚禁在埃利斯岛[61]三星期。

战后，他声称发现了“生命能量”——一种在有机体和大气中存在的原初能量，患者可坐在赖希的“生命箱”里吸收该能量，“生命箱”长得和电话亭差不多——这事刊登在口气尖酸的杂志文章上之后，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来调查他了。虽然患者在进箱子治疗之前都签了协议，

声明已知晓治疗是试验性质的、不保证治愈效果——不过不少人希望这能量包治百病，从不举到癌症都能治好，管理局还是以诈骗为由叫停了生命箱，还查禁了赖希写的所有书，包括有关健康和性爱的社会政治学理论书籍。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浓厚的麦卡锡气氛中，很少有人愿意为赖希的公民权利辩护，他自己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无视出庭日期，给法官写信，说法庭不应该是科学问题下判决的地方。1956年，赖希因藐视法庭和违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被判两年徒刑，被押往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很快塞缪尔·罗思也在1956年因淫秽罪入狱）；入狱八个月后，赖希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57年11月，威尔海姆·赖希的死并没在媒体掀起波澜——11月5日的《纽约时报》在31版下方刊登了简短的讣告，除了持与主流观点相异的学者、赖希一派的治疗师和认同“垮掉一代”运动的年轻美国人（凯鲁亚克、巴勒斯和金斯堡都是赖希的支持者），也很少有人对被禁的赖希作品感兴趣，这些书大部分被食品管理局烧掉，只有少数流转在地下市场。

但60年代中期，一切都改变了。由赖希从前的同事和朋友写的传记和文章，还有合法重新发行的赖希作品——包括《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和《性革命》，为高校学生和社会活动家所接受，通过赖希，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赖希要是活到激进的60年代，无疑能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预言成真，社会正在“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马上就要以“没有游行、制服、军鼓和礼炮”的形式迎接新纪元的到来。这件事不亚于一场感官革命。政府和教会正在逐渐失去控制人们身体和思想的力量。赖希也承认，社会变革的开始会产生对峙、冲突和荒唐的行为，但他相信最终会有一个更健康、更加赞成性爱、更加开放的社会。

1965年伯克利有一场口号缩写为FUCK（即克拉克·克尔之下的自由）^[62]的言论自由运动，南方有公民权利运动，华盛顿有接连不断的反战游行示威——静坐、时事宣讲、爱之集会，这些都是新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加性开放的表现，他们也更加不尊重权威、社会传统、种族障碍、征兵局、教务长和神父。这一代人更加具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而非另一位激进的弗洛伊德学派盖佐·罗海姆^[63]所谓的“排便控制道德观”^[64]。

60年代，当这些读神、不穿胸罩、把和平挂在嘴边的反文化主义年轻人受到媒体瞩目时，无数安静的中产阶级已婚人士也卷进了这场运动，要求自由表达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越战征兵期间，抗议者拒绝拿自己的身体到越南冒险，以此反抗法律；很多女人虽然也去教堂，却

通过流产和其他节育手段避免生下不想要的孩子，违背了宗教教义。1967年有报告称，全国有600万女人使用避孕药，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其时上身裸露酒吧、迷你裙、留长发的律师和商人到处都是，很明显社会的约束力已经不大能影响人们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了。阴毛也在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中出境，阳具形状的女性用塑胶振动器也公开摆在很多城市的药店橱窗里，不过《纽约时报》还是不允许这种物品出现在自己的广告栏里。

身体的性满足——快感，而非生育——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才是性交的首要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矫正追求快感却性冷淡的病人，圣路易斯市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的研究者率先使用了一种八英寸长、阳具形状的塑胶“性交机器”，前期实验时雇用了不少当过妓女的人，后来该诊所也为性功能失常的男性提供“代理妻子”做性伙伴。

后来一位代理妻子的丈夫起诉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中心，公共媒体对性交机器的性能也多有诟病，研究者便决定不再继续此类实验研究；不过由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功成名就，美国又开了几家性治疗诊所，代理妻子们并不会失业。有些诊所里，会给情侣提供如何互相爱抚的教学，还有指导影片表现不同技巧带来的快乐，这些影片比第四十二街的影院里放的色情片更露骨。

美国换妻人士大多是已婚已育的中产阶级，据某个波段交易的期刊统计，全国交换伴侣的夫妻数量超过1万对；而且在一次对美国心理协会的演讲中，心理学家、作家阿尔伯特·埃利斯博士说婚姻可由“健康的通奸”而得到改善。据心理学家亚伯拉罕·M·马斯洛说，集体裸体对个人的身心也有益，他认为在裸体露营和裸体公园里，人们可以从层层包裹的衣装和盔甲下解放出来，更加接受自我，坦白真诚。

60年代期间，盛行裸体混浴和按摩，在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就有这种“成长中心”。这是个豪华的疗养院，藏在俯瞰太平洋的悬崖峭壁之间。在这里，赖希的精神依旧活跃，工作人员负责举办许多性感的讨论会，几千对中产夫妻都来参与，这里成了一家年入上百万美元的企业。大多数的新式疗法都多少源自赖希的作品——生物能学、相遇疗法、敏感度训练、原始疗法、罗尔芬健身法 [65]、按摩疗法，这些在艾莎林都能见到。中心最出名的治疗师是弗里德里希·S·佩尔斯医生 [66]，他是德国难民，“二战”之前是赖希的病人。

像赖希一样，佩尔斯也对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不满意，有许多刻板遵循弗洛伊德教诲的医生，在佩尔斯的眼里，都是“自缚手脚”——就像是“越南伪善的天主教徒攻击犹太科学”。佩尔斯的疗法强调用新方法获得更自由的身体运动，更多自我意识，更完整的表达，以及“生命感受”。佩尔斯认为，很多人对头脑太执着，却疏远了身体，他补充道：“我们需要放下思考，诉诸感受。”

艾莎林这类机构信奉的思想和约翰·威廉森的态度是相通的，不过威

廉森比赖希的追随者走得更远，想用性试验改变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为了那些愿意追随他的夫妻，他想尽快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社区，消灭双重标准，消除女性的从属地位，营造性爱自由和彼此信任的气氛，人们不再需要占有欲、嫉妒、罪恶感和谎言。威廉森感觉，现在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社会不停动荡，人们愿意接受新思想，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无数趋势和风格从这里风行至全美。

如果成功，他的项目也可以赚钱——就像艾莎林，或是那个由前酒鬼成立的西纳农戒毒所一样；或者至少能得到大笔的投资，使社区具有偿还能力，像金赛机构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诊所一样——同时也能帮助建立健康、平等的社会。不过当务之急是要组织起核心成员，几个能帮助他开展工作、最终能在人们生活中成为“改变因子”的亲信。他已经想好了几个人选，三年前他来加州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大多二十七八岁，要么是三十出头，在大公司上班，婚姻不幸或是已经离婚，不安于现状，喜欢冒险。他考虑的几个人里有工程师，是靠着加州的国防工业谋生的保守人物，他们极度厌倦了目前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可以接受剧烈的改变。

威廉森想到的女人里有阿琳·高夫，之前在休斯航空两人有一次短暂的偷情，之后关系也不错。他也和自己公司里两个女同事关系很近，其中一个还是特别漂亮的空姐。不过，在他看来，项目里最重要的人——后来他将其命名为“协同计划”，就是芭芭拉·克拉默。

旧金山之旅后的几个月里，威廉森慢慢意识到，芭芭拉身上有许多品质，其实就是协同计划希望女性达到的目标：她事业成功，个性独立自信，践行性爱自由，依心情有时还富有侵略性，而且不怕被拒绝。她有些像《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女主角达格妮·塔格特，不过还好，她不是女性精英主义者，所以很适合做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榜样，帮助威廉森吸引这些人加入协同计划。他把芭芭拉看作中产阶级变革中的新女性原型；而且，从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芭芭拉也恰好适合他——她的长处弥补了他的缺点，反之亦然。她善于言辞、有行动力，而他擅长论理、孤独内省；她也许头脑没那么精明，眼光没那么长远，可是做事直接，效率高。她从不拖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27岁她就打定主意不要孩子，原因是看到她不幸的母亲，和离开密苏里州乡下后见到的养孩子的女人。可芭芭拉依然想变得更女性化，更温柔，更敏感，她向威廉森承认，自己有时会对某些女人产生性冲动。威廉森劝她不要压抑这种感受，要带着自我觉醒的目的来探究它；1966年夏天，他们结婚不久——两人商量好要举办婚礼这种传统的仪式，为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营造社会可以接受的伪装——约翰·威廉森决定全面考验一下芭芭拉对于婚姻性多元的接受程度。

他们离开洛杉矶，去阿罗黑德湖过周末的几小时之前，他告诉芭芭拉会有个年轻女人同行，是他办公室里的职员，叫卡罗尔，以前是空

姐，他在认识芭芭拉之前和她约会过。芭芭拉看起来热情不高，他便安慰她说卡罗尔特别有女人味、有魅力，又说，芭芭拉和她做朋友一定有益有趣。

芭芭拉以前听他说过卡罗尔。他的口气总是很怜爱，可从没透露出现在还和她认真交往的意思，也看不出以前两人有什么严肃的关系。芭芭拉的想象里，卡罗尔就像自己做前台时那样，是平庸企业的漂亮门面，年轻又天真，把约翰看作父亲一般的角色；她和无数别的女人一样，被他吸引，因为他不像无数别的男人：他会认真听她说话。

那天傍晚，见到卡罗尔之后，芭芭拉修正了自己的想象。她是个又高又瘦的金发美女，一对黑眼睛，身段优雅，怎么看也不像未经世事的小女孩。她态度相当镇静，不过既不傲慢，也不矫情。她好像真的很高兴见到芭芭拉，说从约翰那听到芭芭拉是职业女性，十分佩服；三个人驱车去阿罗黑德湖的路上，卡罗尔同约翰谈起公司的事和两人共同的朋友时，都不忘让芭芭拉参与谈话。

可是，尽管卡罗尔做了这么多努力，芭芭拉仍然觉得不舒服，她在社交场合碰到女人就总有这种感觉；虽然她内心里恋慕她们，却不能自如地和她们交往，她自己十几岁时是个假小子，后来也很少和女性打交道，所以没什么经验。她唯一一次交上的女性朋友，就是弗朗西丝，而那段友谊以悲伤和痛苦收场，直到现在，想起弗朗西丝宣布要结婚、搬出公寓的那刻，芭芭拉也说不清自己为何会有那样奇怪、充满敌意的反应。

芭芭拉坐在车里，觉得有些惊慌，她感到在约翰、卡罗尔和她这三个人中，自己格格不入；还感到他们俩已经背着她商量好了周末的计划。丈夫一提起卡罗尔要来，她就开始琢磨他的意图，现在呢，她觉得马上就要面临是否接受卡罗尔当床伴的选择题，也可能没得选，只能旁观丈夫拥抱着卡罗尔，证明他平时常说的观点：朋友间完整、公开的性不会干扰婚姻的深层意义。

夜幕降临，他们来到了阿罗黑德湖。芭芭拉看到房子里有两间分开的卧室，松了一口气。行李还没收拾好，约翰就说要赶在餐厅关门前去吃晚饭。三人喝了几杯酒，吃过可口的晚饭，轻松愉快地聊了会儿天，芭芭拉觉得放松了一些；但吃过饭、回到住处，她看到卡罗尔和约翰把行李放在了一间房里，开始轻松地脱衣服。

芭芭拉留在起居室，惊呆了，沉默着，徒劳地等着有人向她解释。她太骄傲，绝不开口说自己不舒服，又太震惊，连想法都理不清，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卧室敞开的门。她听到他们把衣服挂进衣柜里，轻声交谈。门是敞开的，约翰无疑在说随时欢迎她加入，可他也不来哄她进去，怎么做完全看她自己。

这是个迷惑、艰难、让人害怕的时刻，从结婚起约翰就一直对她讲

开放性关系的好处，可芭芭拉此时的不确定感丝毫没有减轻；同意约翰说的理论是一回事，现在和刚认识的女人把这理论付诸实践可大不一样。芭芭拉犹豫得越久，越感到自己不能、不愿意走近那扇门。

她感到麻木、眩晕，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站起来，走进了另一间卧室。她关上了门。这会儿已经过了午夜，她又累又冷。她想起行李箱还在起居室里，可不想去拿。她慢慢脱掉衣服，搭在椅背上，爬上床，想要睡觉；可是含着泪，听着那两人做爱的声音，到天亮也没睡。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丈夫用轻轻的触碰和温柔的吻叫醒了她。卡罗尔在他身后微笑着，端着早餐盘，很快，两人都在床边坐下，抚摸着芭芭拉，安慰她，好像她是大病初愈的小女孩一样。芭芭拉觉得既奇特，又尴尬。约翰说爱她、需要她；芭芭拉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他提议吃过早饭一起去湖上游泳、滑水，可芭芭拉说想在床上多待一会儿，让他们先走，之后再会合。

下午，她在木屋里待了一阵，又出门在阳光和新鲜空气里散了很久的步，恢复了冷静。她并不生卡罗尔和约翰的气，不过这个周末确实开启了她婚姻的新阶段；奇怪的是，她没有惊慌和受威胁的感觉，反而觉得更满意，更自由。对性爱和身体快感，丈夫帮她去除了某些不可名状的恐惧和浪漫幻想，也把快感和婚姻之爱的意义区别开来。她丈夫昨夜和另一个女人有了性关系，芭芭拉从震惊中恢复之后，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今天早上约翰当着卡罗尔的面说了他爱她，芭芭拉相信他，因为事到如今，没有撒谎的必要。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坦诚开放，不仅扩展了他的世界，也让她见识到更多。她知道现在可以随自己的愿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必担心他有敌意。她觉得他应该没有。他厌恶私下偷情、无意义的占有欲和嫉妒心，昨晚，他就激烈反抗了几百年来财产与欺骗的古老传统。她承认，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了刺激。她与一个不同寻常的男人结了婚，这个人神秘、有趣、无法预测、性格沉静；他说爱她，需要她。

她散过步，平静了许多，回到木屋里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她就去找约翰和卡罗尔。约翰看到她，微笑着挥了挥手，她走近了，两人都站起来拥抱了她。很快，芭芭拉就感到，和卡罗尔在一起轻松自在，与和丈夫在一起时没多大区别。虽然餐吧里人很多，又吵闹，三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谈话，却感到一阵特别的温暖。这顿有红酒的晚餐对于芭芭拉来说，是几小时愤怒和焦虑的欢乐收尾；这时她绝不会料想到，生活的复杂程度会成倍增加。

快11点钟，晚餐结束了，突然有个男人来到了他们桌旁，是芭芭拉过去喜欢的男人。这人是她丈夫的朋友，叫戴维·施温登，是个工程师；他是约翰在洛杉矶认识的少数几个未婚男人之一。今年早些时候，芭芭拉和约翰去弗雷斯诺附近的派恩弗拉特湖滑水时见过他，注意到他强壮而优美的线条、运动员般的体格，以及有些害羞、冷淡的个性。戴维·施温登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某个周末，他很快修好了一台坏掉的快

艇发动机，约翰便看出他机械手艺不错。从那时起，约翰就和戴维熟络起来，带他吃午饭，下班后也时常见面。现在，在阿罗黑德湖，戴维坐到了芭芭拉身边，没有打招呼，可从她丈夫毫不吃惊的神情看，一定是知道他要来。虽然还不太明白戴维来这里的意图，但凭着对丈夫的了解，她知道这次造访一定有目的，到了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芭芭拉有一种无忧无虑的顺从心情，和戴维亲切地聊着天，虽然也察觉到 he 有点儿不舒服，话不多。他呷着杯里的酒，说话很少，听得也漫不经心，大部分时间都是约翰和卡罗尔在说话，周六晚上人多，越来越吵，很难听见在说什么。戴维好像在心里斗争要不要留在这里。半小时之后，约翰买了单，要起身离开，戴维便说自己该走了；可约翰劝他和大家一起回木屋去，芭芭拉也对戴维笑着，希望自己的笑容有安抚的效果。

几个人回到木屋，早就过了午夜；在起居室坐了一会儿以后，芭芭拉说要去煮咖啡，让戴维帮忙把角落里的小炉子点上。等着水烧开的时候，两人就站着聊天，身心都被对方吸引了，完全没注意到约翰和卡罗尔悄悄离开了房间。戴维转过身，发现沙发上没人，好像吓了一跳。

“约翰哪儿去了？”他问。

芭芭拉看到卧室门关上了，便用新学会的无所谓口气说：“他跟卡罗尔在一块。”戴维询问地看着她，她又匆忙补充道，“没事的。不用担心。”

“可我该走了吧？”

“别，不要走，”她很快地说，“我想要你留下。”她走近他，用双臂环住他，说丈夫想让他晚上住在这儿，她自己也想。她的手伸到他身后，关上了起居室的灯，她拉住他的手，带他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关上门，立即就开始脱衣服。

那晚和戴维做爱，清晨又做了一次，芭芭拉感到了极大的放松和毫无顾忌的快乐；她对这事既没有罪恶感，同丈夫的爱情也没有产生隔阂，她觉得正相反。和约翰一起，她收获了更高层次的亲密感情，她也相信，前一晚她和约翰在不同的房间、与不同的人一起分享了爱与信任。

与另一个男人睡过以后，她对约翰的爱非但没有减少，她还确信自己更加爱他。她起床吃早餐、离开熟睡的戴维时，在起居室里迎来了丈夫赞许的微笑和亲吻。

约翰·布拉洛与芭芭拉·威廉森的婚外情被她丈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正当化了——他还带布拉洛去吃饭，劝他们保持关系。布拉洛知道别无选择，只能答应约翰·威廉森惊人的要求，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他也勉力实践了诺言。

布拉洛还答应去威廉森在伍德兰希尔斯的新房子拜访，见见几个支持性解放的朋友，他对这任务惶惶不安，直到一天晚上去了那儿之后，发现这群人既热心，又惹人喜爱，特别是一个娇小、浅黑色皮肤的黑眼睛美女，她在门口招呼他，安静地笑着，只穿了一件长晨袍。她叫奥拉利亚·利尔，借着门口的灯光，他透过轻薄的布料看到了她挺起的乳房和深色的乳头，跟着她走过前厅的时候，他端详着她优雅的臀部，发现在晨袍下她什么也没穿。

奥拉利亚·利尔去倒红酒的时候，芭芭拉和阿琳·高夫走了过来，亲亲他，把他带进光线昏暗的大起居室，里面有六个衣冠整齐的人，有的坐在地毯上，有的坐在椅子上，专心听约翰·威廉森用温和的声音讨论着印度唯灵论者克里希那穆提 [67] 的作品。

看到布拉洛，威廉森站了起来，感谢他的到来，将他介绍给屋里其他人。威廉森穿着休闲风格的运动衬衫、宽松的裤子和拖鞋，但其他男人包括布拉洛都是西装领带，女人们则穿着晚装裙、戴着珠宝、穿着高跟鞋。不同的只有奥拉利亚的晨袍，带着一丝准备在卧室里嬉戏玩乐的意味，也可能是她独自进行某些情色表演、其他人做观众。不过当她拿着布拉洛的红酒、回到起居室的时候，看起来特别害羞、认生，好像还因为自己的打扮而难堪，很快，她就蜷缩在地板上威廉森脚边，像寻求他的庇护似的，后来也很少再说话。

布拉洛坐在沙发上，夹在阿琳和芭芭拉之间，听着人们继续讨论克里希那穆提，这人他从没听说过，对于威廉森和朋友们经常提到的马斯洛等人物，他也所知不多。布拉洛感到自己的见识短浅，恼怒地想一定得重新受更高、更广泛的教育，要读更多书，要拓展兴趣，不能被保险行业的狭隘需求所桎梏。他之前求学的动力，好像在拿了硕士学位之后就枯竭了，结果现在他像傻子一样坐在屋里，谈话都由一个没上完高中的健壮金发男人主导。小猫一般的奥拉利亚就坐在这个男人脚边，布拉洛细细端详着他，不情愿地承认威廉森的确有不怒自威的气度，对事实、数据和人物了如指掌；布拉洛也烦躁地承认，他身上有许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但今晚，布拉洛显然不会知道的一点是，这个夜晚聚会的真正目的为何，以及这些人和威廉森之间是什么关系。布拉洛坐了一小时，喝了

第二杯红酒，后来谈话转向了最近斯坦福大学的外科医生做的心脏移植手术，威廉森便请教他有关医疗事故保险费用增高的问题，他也有理有据地给出了回答，之后便说自己该回家了。到目前为止，这间屋里除了奥拉利亚，都像是最普通的城郊家庭；虽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发生很多事，却不允许布拉洛留下来。妻子朱迪斯还在等他，他也说了是有个晚间商务会议，只会耽误一小会儿。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送他到门口，说希望他下次再来，多坐一阵，又说家里每晚都有客人，随时欢迎他来。布拉洛点点头，谢过了他们，心里知道自己肯定会再来，就算不为别的，只为了再次看到奥拉利亚·利尔美丽的身体、满足对于这些所谓“性解放”人士的好奇心，他也会回来这里。

之后一周的某个傍晚，布拉洛来到了威廉森家门口，芭芭拉出来迎接他。他对没有提前打电话而致歉，解释说开车回家路过这一带，看到门口停了很多车，就想进来稍作拜访。芭芭拉说很高兴他来，挽着他的手臂穿过门厅进了屋。他突然停住脚步，屏住了呼吸——起居室里坐着几个全身赤裸的人，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毯上，抿着红酒聊天，丝毫没有忸怩羞涩，这一点让布拉洛十分吃惊，不亚于乍一看到他们裸露的肉体。

虽然和约翰·威廉森吃午饭的那次，布拉洛就被提前警告说可能看到裸体，现在他真的跟着芭芭拉走进了起居室，却感到自己脉搏加快、掌心出汗，下身一阵战栗。他转头看芭芭拉，等她解释，希望她能说句话、做个手势以减轻自己的紧张和尴尬，可芭芭拉只是轻松地带他来到沙发旁，沙发上坐着一个高大、漂亮的红头发女人，布满雀斑的丰满乳房上只有一串珍珠项链稍加掩盖。

“你还记得约翰·布拉洛吧？他有一天晚上来过。”芭芭拉问道，女人点了点头，微笑起来，她伸手给布拉洛时，胸部也抬了起来。布拉洛满脸通红。芭芭拉带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见见其他人，但他不敢正眼瞧他们，瞥见的全是晃动的乳房、长毛的胸膛、裸露的屁股和白花花的大腿，还有各种颜色的阴毛、大大小小的阳具，有的割了包皮，有的没割，而且它们全都令人惊讶地没有勃起。

在角落里，布拉洛认出了阿琳·高夫熟悉的身体，她正和一对衣装整齐的夫妇说话，布拉洛简直要感激他俩。在他们旁边、靠着音响跪坐着一个身材健美的人，就是布拉洛上次来见到的工程师戴维·施温登。坐在屋子正中、被一小圈专心的听众围住的魁梧人物，就是约翰·威廉森，他胸膛宽大，将军肚，阳具很小，像尊金发的大佛一样；美貌惊人、橄榄色皮肤的奥拉利亚正按摩着他的右脚。她像是裸体的纳芙蒂蒂 [68] 一般，有着完美的身体，布拉洛觉得，在场的每个女人都会对这身体嫉妒不已。

威廉森招呼布拉洛加入他们，布拉洛便跟着戴维·施温登离开了芭芭

拉，小心地穿过各式各样的身体和四肢，在地毯上坐下，靠着威廉森和奥拉利亚。她对他笑了笑，打了个招呼，继续按摩威廉森脚。虽然布拉洛努力盯着周围人们的脸看，还时不时点点头，表示在注意听别人讲话，眼睛却不断瞟向奥拉利亚的身体曲线，他看到，她浅黑色的皮肤毫无瑕疵，胸部也没有下垂，腰腹平坦，让他一看到就被撩拨起欲望。他感到阳具在短裤下渐渐起了反应，便抬起膝盖，抵着别人递过来的红酒。

布拉洛不想继续痴迷于奥拉利亚的诱惑，便把目光向上移，研究起高高的斜屋顶上沉重的木头房梁来，他估计，屋顶离地面起码有30英尺。整栋房子设计得不同寻常，坐落在山峰上，俯瞰着圣费尔南多谷，上一次他来的时候，就从宽敞的院子里看到，天黑之后山下的房子就亮起灯光。起居室里只有一段窄窄的楼梯通往楼上的厨房，主要的活动空间都在一层；从他在地毯上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两扇关上的门，他猜想是两间卧室，其中一扇门忽然开了，走出来一对裸体情侣，手挽着手，加入了人群。

这房子里秘密进行的事情，或者他亲眼所见的事实，显然都超出了布拉洛的理解能力，特别是现在，他身陷焦虑、动弹不得。他感到与这群人没有联系，对自己十分沮丧。即便在这些人当中，他也讨厌当局外人，可他今晚偏偏就是局外人，在这些性解放的裸体主义者中间，他是被衣服捆绑着的囚徒。阴魂不散的冒险冲动引诱他脱掉衣服，可身体里还有更强大的力量阻止他这么干，主要是因为害怕在这么多人面前第一次暴露那无法预测的器官，他以为这器官是每个男人的负担——不过，从周围松松垮垮的性器的数量上看，今晚负担沉重的只有他一个。

要是布拉洛坐下之前，威廉森对他说穿少些会比较舒服，他也许会一时冲动、脱掉衣服；可没人怂恿，现在要脱衣服比登天还难。威廉森很可能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看着，等人们自己解脱束缚，在布拉洛的眼睛看来，这房子突然变成了迷宫，威廉森诱人进入迷宫、用不确定的许诺刺激人，让他们自行争抢着脱衣服，还都打着学习体验的名义。

布拉洛听到身后有笑声，转过头看到芭芭拉和阿琳正满面笑容地迎接一对新来的情侣，阿琳只用一张酒巾遮着阴部，夸张地模仿着脱衣舞女扭屁股和抛媚眼的样子。芭芭拉今晚因为负责应门，所以一直穿着衣服，她看向布拉洛，冲他招手。他抓住这个机会，离开了威廉森的讨论小组和可望不可即的奥拉利亚，站起来走到门厅，加入了芭芭拉和其他人。他知道，不久就可以不引人注意地走掉。

离开之后，他坐立不安，刚刚度过的夜晚难以描述。他看见了一切，又什么都没看见。他被视觉冲击搞得狼狈不堪。现在已经很晚了，接近午夜，要是妻子还醒着，他真不愿面对她。他吻了芭芭拉，道了晚安。她送他出门，提醒他第二天的午餐约会。她提议说就在这房子里见面，不必出去，他同意了，说下午1点前就来找她。

他到家时，朱迪斯已经睡熟了，因此省了他撒谎说自己去了哪儿。可她就这样睡着了，他也有点遗憾，因为现在他的性能量十分旺盛，很想在黑暗中想着奥拉利亚的形象做爱，他觉得这样比想着她自慰好太多，而且感受完全不同。布拉洛一直不怎么喜欢自慰，甚至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也是，那时他父亲开理发店，店里就常备色情杂志。在阿蒙德森中学橄榄球队，他是个上进的队员，也受到那个时代斯巴达式教练的影响，认为它使人身体虚弱、萎靡不振，消耗战斗的精力；50年代初期，布拉洛给好莱坞男生俱乐部当教练时，这种影响仍然存在。然而，性交就完全不一样了，至少他这么觉得，虽然不知道确切原因，也许性交比起自慰对身体的害处要小；但今晚，他把这种学术问题彻底抛到了脑后，反正他决定两种都不做。

他倒了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拿了本书到沙发上，准备睡前看一会儿；那晚他就睡在沙发上，胸口压着一本厚重的大书，是美国传统出版社出版的布鲁斯·卡顿 [69] 写的内战作品。

清晨，布拉洛醒来，静静地走到浴室里洗漱、刮胡子，穿戴整齐。他给朱迪斯留了张字条，说要去参加早餐会，然后上了车，在朱迪斯醒来之前安全离开了。

上午坐在办公室里，他觉得不安，还有点儿罪恶感，他知道过会儿应该给朱迪斯打电话，可又不能真说出自己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只能撒更多的谎。真荒谬，真可悲，他简直像当年那个中学生一样，掩盖事实、害怕暴露：对芝加哥的朋友隐瞒自己的种族背景，对犹太裔母亲说她想听的谎话，哄她高兴，假装是个模范儿子，母亲也假装满意。但现在，对妻子撒谎这事还有更病态的地方，就是虽然他对昨晚的事有罪恶感，却根本没做什么越轨的事。要是他和奥拉利亚上了床，或者加入了威廉森客厅里地毯上放荡的狂欢，那么至少还值得对朱迪斯撒谎。可事实上，他掩盖的只有自己的失败，在那个轻佻、淫靡的客厅里，他也没能实现潜伏心底的渴望，那个晚上也证明了威廉森的论点——对性爱说谎无疑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布拉洛惊叹于威廉森的婚姻，他客厅里那淫逸的场面，惊叹于芭芭拉能轻松地在门口迎接客人，与此同时奥拉利亚一丝不挂地卧在地毯上、按摩威廉森脚，天知道他们还做了什么别的。布拉洛一上午都玩味着这些事，同时也集中精力处理纽约人寿乏味的文书工作，他坐在红色的皮沙发上，办公室墙上挂着镶框的学位证书和各种证明他在社会工作中成就和贡献的证书——可这些都挡不住他12点半准时离开办公室，去和芭芭拉·威廉森吃午饭。

他开车经过穆赫兰道高低起伏的弯曲公路，急切渴望着得到满足，到了威廉森家，芭芭拉没有让他失望。她独自在家，用绵长的亲吻和热情的拥抱欢迎他，他提议说先不吃午饭，直接去卧室，她也毫不犹豫地

同意了。

卧室的墙上、天花板上都装了各式各样的镜子，他先是惊讶，很快便贪婪地开始享受这种设施。他裸身躺在床上，看着芭芭拉向他爬过来，娇媚地微笑着，垂下的乳房掠过他的胸口。她挑逗他，而他能从各个角度看到这幅景象。这真是十分难得的视觉体验，在镜子里看到无数个她性感的身體、低下的金发头颅，并被镜子复制了成千上万次，有无数的手和嘴爱抚着无数个他，可他都能感受到、都能看到，这些或近或远的形象，是一场视觉的狂欢。

很快，他感到体内开始痉挛，他向后躺下，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沉溺在片刻的高潮之中，之后他睁开眼，看到周围反映出平静的自己。他和芭芭拉在床上待了一个小时，不像平时见面那样短暂，这天，他们都贪求性爱而非食物，不断追求着快乐，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

快到下午3点，布拉洛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开回圣费尔南多谷的办公室，他感到像在滑雪，头晕目眩又自由自在；可回到压抑沉闷的保险公司，给妻子打过电话，他就又得开始面对对生活不稳定的重心。

他向朱迪斯提议晚上去两人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她拒绝了，不过语气里也没有对他最近晚归的不满；正相反，电话里她的声音很平静，几乎是很高兴地说，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晚餐，又说晚上已经安排好了别的事情。她说，约翰·威廉森之前来过电话找他，她也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威廉森热心地同她聊天，又夸了布拉洛不少好话，说他们夫妇可以晚饭后来家里喝一杯；朱迪斯最近都没怎么出门，很高兴地答应了邀请，说大概晚上9点钟去。

布拉洛吓得呆若木鸡。他攥紧了电话，眼前闪过威廉森家客厅里裸体的男男女女，他想威廉森应该不会让刚刚认识的女性见识这幅景象，可对威廉森，他也完全拿不准。他继续沉默着。朱迪斯问他能不能听见；他应声之后，她便提醒他晚上不要迟到，因为她想在隔壁的姑娘过来帮忙看孩子之前出门，然后她接着说了些琐事，布拉洛全听不进去，只盼着她赶紧挂电话，好和威廉森夫妇联系。他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朱迪斯打电话，想知道接下来这个晚上会发生什么。威廉森的电话拨通了，他提醒自己可不能显得恼火、唐突，特别是如果接电话的是威廉森；布拉洛依旧觉得，和那个男人打交道一定要加倍小心。

可威廉森家里没人。布拉洛下午又打了几次，甚至打到芭芭拉的办公室，都联系不到人。下班后他开车回家，心知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让朱迪斯做好准备，以防晚上有什么未知情况。

吃过晚饭，孩子们去睡觉以后，他对朱迪斯说，威廉森夫妇可能有些不同寻常，他在办公室听说他们认识一帮朋友，有时会在家里举办裸体聚会。布拉洛说自己也不清楚这消息是真是假，心想着这下朱迪斯再见到什么也不会太受惊吓了。他又补充说，要是她不想去，现在还来得及。

及取消约会。

她奇怪地看着他；然后，她带着困惑和恼火的神情，质问他究竟什么意思，为什么直到出门前最后一分钟才提起这事。他很快道歉说，不该惹她不高兴，只是觉得要把听来的话告诉她；朱迪斯回答说，她觉得裸体聚会简直可笑，可既然她并不打算脱掉衣服，也不必取消今晚的约定。布拉洛不再多说，暗暗惊讶她态度如此宽容。

不过在驱车前往的路上，朱迪斯沉默少语，他觉得，她大概也染上了自己的焦虑。他把车停在威廉森的院子里，注意到房门前已经停了三辆车，屋子里所有的灯都亮着。他听到屋里有人说话，便按下了门铃。奥拉利亚打开了门，他松了口气，看到她穿着低调的裙子和毛衣。芭芭拉和约翰也走了过来，都衣着整齐，布拉洛向他们介绍了朱迪斯。在起居室里，其他人也都穿着衣服，包括阿琳·高夫和戴维·施温登。

朱迪斯说她很喜欢这房子，尤其是高高的天花板和古董家具。芭芭拉便带她到露台上，看山下的费尔南多谷。杯里盛着红酒，音响里流淌出音乐，很快，布拉洛夫妇就舒服地坐在客厅里，和其他人进行着普通的谈话。这谈话似乎无穷无尽，然而，毫无征兆地，朱迪斯主动提起了裸体的话题，说自己听说威廉森夫妇会参加裸体聚会。

约翰·威廉森点点头，芭芭拉则微笑起来，可约翰·布拉洛的脸都白了。

“可这些裸体组织的人都做些什么呢？”朱迪斯坚持问道。

“做人们都做的事。”约翰·威廉森回答。

“听我丈夫讲，你们好像是坐在一起谈话，”朱迪斯继续说，“可为什么要裸体？”

“你没尝试过？”威廉森问。

“我觉得没有必要。”

“脱掉衣服是打破障碍的第一步，”芭芭拉解释道，“在我们的小组里，大家都尝试与别人真诚、开放地交流。人们的很多问题，都是出在不诚实上……”

“是这样，”朱迪斯打断了她，“可要诚实，也不必非得脱衣服呀。”

“没错，”约翰·威廉森说。“不是一定要脱衣服。可是对许多人来说，脱掉衣服的确能消除某些心理负担，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诚实。”威廉森继续讲，约翰·布拉洛却一言不发，紧张地坐在其他人中间，企盼着有什么办法转移掉这个话题。朱迪斯喝了红酒，现在酒劲上来了，他想；她来这里本来就不自在，现在肯定更严重了，她现在十分戒备，几

乎是怀有敌意。可他现在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尽量不参与讨论，本来这战略就要成功了，可芭芭拉突然转向他，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哎，你今晚可真是安静啊，约翰。”

“哦，”布拉洛说，“我在听呢。”他咂了口红酒，懒洋洋地看阳台。芭芭拉可紧追不舍。

“约翰，你和朱迪对彼此开诚布公吗？”

布拉洛慢慢转回身子，面对着芭芭拉，表情像是哪里有点儿疼。此时此刻，屋里寂静无声，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他怎么回答。最后，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是，我觉得我们对彼此是诚实的。”

“我们对彼此特别 诚实。”朱迪斯补充道。

“这么说，约翰什么都会告诉你？”芭芭拉问朱迪斯。

“没错。”

“他也说了和我在一起的事吗？”

朱迪斯迟疑地看向丈夫，她丈夫则死盯着地板，慢慢地开始摇头。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朱迪斯回答说。

“就是，”约翰·布拉洛愤怒地抬起头说，“你他妈的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对朱迪说过我们的事？”

“我们有什么事？”他质问道。

“就是说，”芭芭拉轻松地继续说道，“你有没有告诉朱迪，今天下午我们俩 的事？”

屋里的所有人身子都往前倾，布拉洛看到妻子的目光游移不定，她焦灼地问：“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布拉洛嚷了起来，“我就是下午来这儿和芭芭拉吃了顿饭。”

“噢，得了吧，约翰，”芭芭拉打断了他，“这样也叫诚实？”

“没错，”奥拉利亚说，“你明明就不只是吃饭。”

布拉洛目瞪口呆，没想到看起来怕羞妩媚的奥拉利亚居然会反对他，看看四周，别的人也都带着谴责的表情，连阿琳·高夫也是，她坐在沙发上，看他的眼光像是陌生人。他朝朱迪斯转过身去，看到她眼里噙

着泪水，而她脚边的地毯上就坐着那不发一言的教唆犯，约翰·威廉森。屋里的沉默继续着，直到芭芭拉盯住布拉洛，再一次挑战了他。

“今天我们还 做了什么，约翰，除了吃饭？”

布拉洛看不到出路。他知道，继续假装是没有用的，芭芭拉会追问到底。

“我说行了吧！真是的，”他喊了出来，“我今天下午和芭芭拉上床了！你们就是想听这句话吧？——我今天下午和芭芭拉上床了！”

“只有今天 下午？”芭芭拉紧接着问道。

“不是！”他冲着所有人尖叫，不再管自己说了什么，“我之前就和她睡过！”

没人说话，也没人动；寂静中，布拉洛垂头坐着。他感到虚脱，几乎有些犯恶心。听到朱迪斯抽泣声，他抬起头，看到约翰·威廉森靠过去安慰她，他轻声说着话，用手轻轻摩挲着她的脚踝。她一开始有些不适应这个奇怪的动作，皱起了眉头，可没有反对，威廉森便继续触碰她，很快屋里的其他人也凑过来安慰她，布拉洛被晾在一边，觉得孤独，受了谴责。

时间一点点流逝，布拉洛只是呆坐在一边看着，木讷得像是被催眠了。包括芭芭拉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进行安慰他妻子的奇特仪式。可不哭了之后，朱迪斯就突然直起身子，挥挥手让其他人走开，用出人意料的暴躁声音说道：“你们今晚对约翰太过分了！”

没有人回应，约翰·威廉森也不再摩挲她的脚踝。朱迪斯的注意力转到了丈夫身上。

“告诉我，”她用坚定而不带谴责的口吻问道，“除了芭芭拉，你还和别的女人偷过情吗？”

“是的。”他承认了。

“还有谁？”

“这个，”他说，冲着芭芭拉身边冷淡的苗条女人点了点头，“阿琳·高夫。”

朱迪斯打量了阿琳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又转向丈夫。

“我们在拉佩尔住公寓楼房的时候，你和楼里的那个黑头发女孩睡过没有？”

虽然十年没见，布拉洛立马想起了自己与艾琳的婚外情。她是芝加

哥人，离了婚的美术老师，住在贝弗利山的公寓里，就在北拉佩尔145号布拉洛家的后面。艾琳走起路来像是芭蕾舞演员，大腿肌肉紧实，肤色发暗，像是外国美人……

“睡过。”他说。

“哦，我就知道，”朱迪斯说，似乎让他承认偷情有种报复的快感，“我那时候疑心得都快疯了，我还特别恨自己那么想，现在才知道我想的都没错！我记得有一次说起她来，你特别光火、一副受冒犯的样子……”

“够了吧……”

“你才是够了。你搞得我几个月都神经兮兮，总想着后面公寓里那个女人，看到她进进出出，有时在洗衣房里还能听到她打电话，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记得有个周末你说要和健身俱乐部的朋友去野营，我就知道你是去见她——你说要把车停到俱乐部，我还专门跑去俱乐部看过，根本就没有你的车。到了周日晚上，我听到她回家之后，你就到了家。你俩的车都是从一个方向开过来的！我知道，因为我在窗边看着呢。你一进屋，我就发现你没戴结婚戒指。那时我就问你她的事，你还赌咒说我肯定疯了，是在无中生有……”

“该死的，朱迪，那时候你怀疑我跟每个人上床。你要不是喝醉了就根本不让我碰。我还能怎么办？”

朱迪斯不说话了，因为意识到所有人都热心听着她暴露自己的婚姻私生活，难堪不已。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随后约翰·威廉森慢慢站起身，走到捂脸坐着、消沉的布拉洛身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威廉森面对着朱迪斯，乐观地预言说，今晚这样的事件虽然痛苦，长期来看，对她和她丈夫都是有好处的。更高层次的坦白已经取得了，威廉森宣布，他们的感情关系便可以继续维持、成长，不被通常婚姻中的欺骗和幻象所扰。要面对性爱的不忠实对她来说很痛苦，威廉森承认道，可布拉洛夫妇依旧是相配的一对，和今晚刚进门时并无不同——只是现在，一切都公开了，可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变化。

布拉洛含讥带讽地听着，心想威廉森肯定不止一次做过这番演讲，可朱迪斯好像很受打动，她打断威廉森，说今晚的事确实让她有了变化。一方面，她说，知道了过去对丈夫的怀疑都是有理有据的，不是他所谓的家庭主妇出格的妄想，这证明了她的清白。她还意识到控制欲太强是在贬低自己，在窗边偷看、放大不安全感，还总觉得自己像个泼妇；她坚持说，这不是她的真实性格，威廉森也同意地点点头，说她是婚姻中常见的“占有欲问题”的受害者。朱迪斯承认，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想紧紧抓住身边的人，可能是因为10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后来约会的女人都让她觉得受到威胁。但现在，朱迪斯想要克服对丈夫的控制欲，威廉森便说自己 and 小组成员都可以帮助她，只要她愿意公开解决这

个问题；随后他建议：她可以再来威廉森家里，亲眼看着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走进卧室做爱，以这种方式，她可能会意识到，比起添油加醋的怀疑，公开的肉体不忠行为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

朱迪斯认真考虑着威廉森的提议，她丈夫却为之骇然。他迅速地抬头看着威廉森说：“我们可没准备那样做！”

“操心你自己吧！”芭芭拉噎了他一句。

最终，朱迪斯有点害羞地看了看丈夫，对威廉森说：“我愿意试试。”

布拉洛坐在椅子上，吓得目瞪口呆，被刚刚发生的事情惊到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与他结婚十年、他自以为了解的女人，对他们的私生活突然变得这样大胆，这样没有顾忌。

接下来的几周，和朱迪斯一起，约翰·布拉洛几度拜访了威廉森家，这绝对是他人生中最奇怪的一段时间。即使是多年以后，他再回忆起这些情色冒险时，也很难相信这些事真的发生了，而他居然听之任之，虽然全程都很不情愿，或者他宁愿认为自己不情愿。

不过，朱迪斯可全无抗拒心理，她坚持接受威廉森挑战性的测验，看自己能否接受公开的不忠，她希望这种疗法有效，让她克服多年来的依赖心。她不喜欢现在的自己——这个住在城郊的家庭主妇，可在与威廉森的小组那次不幸的会面之前，她从没遇见过愿意或者有能力帮助她改变的人。虽然没有对丈夫明说，可是她私下觉得这小组也能促成她的自我解放——丈夫被迫承认了偷情的事，她也想从某些秘密的重压下解脱，这些事已经给她造成了不小的焦虑和罪恶感。比如说，她也想坦白自己在婚姻中也有不忠的行为；去威廉森家的第一晚，开车回家的时候，她就有强烈的冲动想告诉丈夫。但她没有勇气，可能是因为这段性爱经历有些特殊，牵扯到一位年轻黑人。

他叫梅多斯，是洛杉矶一所退伍军人医院的护理员，朱迪斯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也在那儿工作。由于所有患者都是男性，实习护士全程都有护工陪同。梅多斯高大帅气，是朱迪斯第一个熟识的黑人。医院的娱乐时间——护送病人到医院的草地上玩球之后，朱迪斯和梅多斯就在草地上坐下来，一边看着病人，一边聊天；一天，两人谈得很亲密，梅多斯便提出下班后私下见面。

朱迪斯这时刚刚结婚一年，可是与布拉洛的性生活已经成了每周末无聊的例行公事，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可是毫无办法；婚后她就是没法享受性爱，不像从前，她和布拉洛——还有和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做爱时都是偷偷摸摸的，溜到汽车旅馆和借来的公寓房间里，趁着父母和监护人不在家或是没注意时在卧室里打情骂俏。偷偷做爱对朱迪斯来说十分刺激，又有奇妙的罪恶感，是对她严厉宗教教育的反抗；可1958年2月她结了婚，性爱变为合法，她便渐渐觉得这事儿只是件要做的家务，和买菜做饭差不多，接下来的一整年她都这样觉得，只除了1958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与梅多斯的短暂偷情。

她和梅多斯会从医院去附近另一个黑人护工的公寓，一般都在她丈夫加班的时候；有几个小时，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沉溺于性爱的快乐，这使她感到满足又刺激——纯粹的快乐，没有情感承诺带来的复杂问题，因为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与梅多斯结婚；和他在一起的，是她最不能接受的那部分自我，是她成真了的黑暗幻想，这幻想骤然而来，又匆匆离去。这段婚外情已经令她晚上无法面对丈夫，他走进卧室，她无法再假装睡着；他偶尔求欢，她也无法理直气壮地拒绝。朱迪斯意识到

自己表里不一，同时也发觉自己想要孩子，她相信，孩子会给生活带来欢乐和目标，后来也的确是这样。

但在随后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她再没有过性爱的激情，偶尔朱迪斯会期待像梅多斯那样不正当的情爱关系，可她害怕这关系会威胁到婚姻和家庭生活，一想起这点，她就更加不安，生怕丈夫哪一天会出轨。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疑心，于是很同意威廉森的意见，即这种感受是毫无必要、应该消除的。第一次去威廉森家的那天，丈夫坦白出轨，她惊讶于自己并没有特别难过；两人开着车，第二次去威廉森家时，她也很期待这次拜访，可驾驶席上的丈夫身体僵硬，简直像鬼魂附身了一样。

布拉洛夫妇到了威廉森家，见到了客厅里的小组成员，朱迪斯认出了上次见到的人，除了一个人不认识。一个漂亮、身材姣好的年轻女人，盖尔，长着红头发，有酒窝。有人把她介绍给布拉洛夫妇，可是她不敢碰上朱迪斯的目光，使朱迪斯想到，这是否就是今晚为她丈夫挑选的床伴。很快，朱迪斯的信心就消退了。同时，她注意到丈夫一看到盖尔对他微笑，精神就格外振作，盖尔也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注意力全在他身上。

朱迪斯坐在沙发上，靠着戴维·施温登和阿琳·高夫，她抿着红酒，对周围的谈话心不在焉，焦虑得要命；然后约翰·威廉森走了过来，跪在她脚边。他那温柔、关切的态度，令她觉得，这个男人特别了解她的感受，他把手放在她脚踝上，开始了那奇怪的按摩，她却无意抗拒，反而很欢迎。对于威廉森的外表，她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可他有不寻常的特质，显得特别、神秘，甚至有些轻率，这特质吸引了她；他对这屋里的人有明显的影响力，也令她印象深刻。他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人自己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在他身上，朱迪斯感受不到威胁，相反，她觉得威廉森是真的关心自己，关切她的利益与个人成长。他问朱迪斯是否足够坚强到能接受上次所说的过度控制欲测验时，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出于想要他认可自己的心情，坚定地说，她准备好了。

于是威廉森挥挥手，让屋里的人静下来，对小组成员解释道，朱迪斯·布拉洛为了克服自己的占有欲，现在需要他们的合作。他转向盖尔，请她陪约翰·布拉洛到一间卧室里去。盖尔立刻站起来，把手伸给他。布拉洛浑身不自在起来，因为所有人都转头看着他，包括朱迪斯。虽然朱迪斯点点头，确认她同意这样做，他还是觉得心脏在颤抖，站起来时膝盖都发软。可他跟着盖尔走向卧室的时候，看到她晃动的臀部，又满心期待着同她做爱。

她带他来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房间，柜子上有一盏小灯，发出昏黄的光。她关上门，一动不动地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好像突然有些不情愿、犹豫不决。布拉洛有些担心，这可能只是威廉森测试朱迪斯嫉妒心的手段，不是真的让他做爱；然而盖尔拉起了床罩，开始解衬衫纽扣，

同时说自己感觉十分奇怪：几年以前，她说，她还住在美国中西部，由于家里信爱尔兰天主教，27岁了还是处女；可现在呢，她一边说，一边解开了文胸的搭扣，她马上就要第一次和已婚男人做爱，而且此人的妻子就坐在隔壁房间不到40英尺远的地方！

布拉洛笑了笑，想要说句合适的话，可他开始脱衣服时就不再说话了，而是带着热切的欲望看着她裸身爬到床上。很快，他也躺到她身边，温柔地吻她，爱抚着她丰满的乳房，慢慢地，他发现，虽然她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可她身体上却有了闪光的汗水。突然之间，她就变得羞怯、紧张、无知、顺从，却没有热情。她的眼睛紧闭，像是不想看到眼前发生的事。他亲吻她，她也轻柔地回吻，手却不碰他的身体。他好奇起来，想这样一个被动的人，怎么会在威廉森的小组里，然后他想到，可能她和朱迪斯一样，正接受某种私密的测试——威廉森这个性爱问题专家，可能正在帮助盖尔克服性冷淡，而布拉洛就是药方。他在她耳边轻声问她是不是还好，她点了点头，仍旧闭着眼睛。等他费了不小的劲，终于插进她的身体时，盖尔突然在他身下活了过来，弓起身体迎合他的动作，双腿缠绕在他身上，开始呻吟，一开始声音很轻，然后越来越响，他的突迫也越来越快，她几乎尖叫起来了，布拉洛希望有办法让她安静些。他之前从没和喜欢呻吟的女人做过，不知该如何反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能继续猛冲，尽量不去想客厅里肯定能听见这声音的众人。

接着，一阵裂帛般的哭声，布拉洛听到客厅里传来了高亢、歇斯底里的号哭，是朱迪斯的声音。他试图隔绝她的哭声，继续让自己高潮，可这两支旋律冲突的调子搞得他焦躁不安起来：盖尔快乐的叹息和呻吟，朱迪斯绝望的痛哭和尖叫；没多久，他软了下来。

盖尔睁开眼睛，什么也没说。他趴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两个人静静地躺了一阵，听着客厅里的哭声逐渐平息，其他的声音都在安慰朱迪斯。接着卧室门缓缓打开。来人是阿琳·高夫，轻声说现在一切都好。阿琳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走进来坐在床边，微笑着问他们想不想三人一起。布拉洛谢过她，摇了摇头，说今晚与一个人做爱就够他应付的了。

阿琳走后，布拉洛又能勃起了，完成了与盖尔的做爱，不过比刚才的激烈程度差得很远。虽然朱迪斯的痛苦声音没有了，但他们都能感到她充满压迫的存在；穿衣服的时候，布拉洛又听到了朱迪斯的声音，不过现在，她的情绪显然恢复了——她在笑着；布拉洛打开门，看到她坐在威廉森身边的椅子上，显得自在又高兴。

屋里只有朱迪斯和约翰·威廉森，其他人显然已经去了别的卧室，朱迪斯的兴趣全在威廉森身上，丈夫进屋来，她都没注意，直到他俯身吻她才发现。她露出了微笑，可没有站起来；她向他保证一切都好，可是明显想继续和威廉森独处。于是布拉洛走到一边去找盖尔，他第一次觉得，在他们的婚姻中朱迪斯不再属于他了。

开车回家时，这种感觉也持续着，接下来的一周也是这样。虽然朱迪斯看起来很高兴，做家事特别勤快，对孩子态度也好，但她总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晚上也不和他一起睡觉，而是熬夜看威廉森借给她的书，是艾伦·沃茨、菲利普·怀利、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一天晚上，她坚持要独自去威廉森家，早上3点才回来，充满了活力和自我发现的能量，他一直等着她回来，想同她说话，她却说自己待一会儿，要在桌子前把心里涌动的诗句写下来。

朱迪斯科服了占有欲，现在她好像无法被占有了；她离得越远，他就越急切地渴望她。讽刺的是，她突然就成了布拉洛一直在幻想中渴求的完美女人——大胆、无忧无虑，他沿着威尼斯海滩骑着自行车追寻的就是这样的人；这种冲动、性解放的女人，最好的代表就是拉佩尔公寓里的那个美术老师。

现在，朱迪斯显然是把威廉森的小组当作了安心和启蒙之源，布拉洛觉得自己也得和小组保持密切联系；第二天她提议周末和威廉森夫妇一起去大熊湖，他不情不愿地同意了，害怕如果自己去，她也照样会和他們去，没准还和别的男人一起。

周五晚上，威廉森要开过80英里的路程到大熊湖。布拉洛在车后座上一直握着朱迪斯的手，希望周末放松一下，他们的关系能更和谐、紧密一些。四个人在车里轻松友好地聊着天，吃过晚饭后，威廉森带了红酒回到木屋，几个人在壁炉前谈到午夜，说着年轻时的事。

布拉洛说得最多，因为威廉森夫妇对他的话很感兴趣，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他喝着红酒，继续回忆往事，慢慢开始说起一些从没说过的事。他说起芝加哥那些反犹的邻居，说他害怕暴露自己有一半犹太血统，他记起了在橄榄球队里受过的许多伤害，想要摆脱犹太人不擅长体育的形象。他记起了和犹太裔母亲的争吵，去基督教堂时的别扭，自己为了被社会接受而向周围人说的谎——现在一想起这些谎言，就引起他的难堪与自我憎恨；可他也十分同情那个孤独的小男孩——朱迪斯和威廉森夫妇还在等他说下去，突然地，布拉洛开始颤抖。他站起身，走进了卧室。

芭芭拉跟着他进屋，关上了房门。她看到他含着泪水，便递过手绢，用胳膊搂着他。他默默地坐在床上，垂着脑袋，她吻了他，轻声细语地安慰他，然后开始解他的衬衫纽扣。

芭芭拉脱光了他的衣服，自己也脱了衣服之后，就让他躺在床上，布拉洛顺从地照做了，她躺在他身边，温柔地抚摸他的身体。虽然之前做爱的次数不可胜数，这却是布拉洛第一次感受到她的温柔。

做爱之后，布拉洛的痛苦烟消云散，在她怀里稍微睡了一会儿。然后，他被隔壁房间的奇怪声音惊醒了，他起身打开门，看到火光融融的壁炉前面，两具赤裸的身体躺在地毯上。

布拉洛以前从没旁观过别人做爱，此时目瞪口呆、充满敬畏；木头烧得噼啪作响，在流转的火光中，两具锁在一起的身体不停运动，他一时看得入了迷，觉得这场景很美。然后，他认出了妻子大腿那熟悉的形状.....

布拉洛向后退去，踉踉跄跄地快步走向卧室。他感到芭芭拉靠近身边，想要拥抱他、安慰他，可他粗暴地推开了她的手，不想再被她碰一下，也不想再碰任何人。他摔上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他觉得，生活的平衡和秩序全毁了。约翰·布拉洛燃起了复仇之火，悄悄策划杀死约翰·威廉森，同时也考虑自杀。让威廉森死很容易，趁他在卧室、脸埋在朱迪斯双腿中间的时候，往他背上打两枪就行了，妻子的命倒是可以饶过，还需要她来带孩子。至于自杀方式，他想象着自己去参加马里布的潜水课程，在最后一节课上慢慢沉没到海浪之下。他每次开车往返保险公司的时候，都会在脑中一遍遍放映这场景。

布拉洛在车里听着新闻，得到了些许安慰，知道不止自己一个人这样混乱——实际上，1968年，整个美国都充斥着暴力、疯狂和自我毁灭的行为。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罗伯特·肯尼迪也在洛杉矶被射杀，在布拉洛居住的芝加哥，一边是挥舞着棍棒的警察，一边是几千名反战游行者，加上被民主党全国大会吸引来的嬉皮士，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成群的警察横冲直撞，粗暴推搡着无辜的行人，休·M·海夫纳就是这些旁观者中的一个。

越南又死了几千个美国士兵，战争谁也不想要，又似乎无法停止，林登·B·约翰逊总统支持率惨淡，决定不再参加下次大选。和平示威的人围住了全国的校园，为公民权利抗争的人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设立无种族隔离的保龄球馆，结果与警察冲突时死了3名黑人学生，37人受伤。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两个黑人短跑运动员赢得了金牌，在《星条旗永不落》的乐声中举起了黑色的拳头，随即被国家队开除。美国史上威力最大的氢弹在内华达州爆炸，震动从偏远的沙漠传到了100英里外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劫持了数架美国商用飞机，转移到古巴。杰奎琳·肯尼迪，这个全国最妖娆的寡妇，坐着私人飞机到伊奥尼亚海的私人岛屿，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俄勒冈州监狱的700名犯人发起了暴动，造成2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最后连典狱长也换了人。波士顿的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和威廉·斯隆·科芬神父阴谋教唆年轻人逃避征兵。美国海军在“二战”中经过惨烈战斗得来的硫磺岛，在23年后归还了日本。缉毒警察在纽约码头发现了246磅海洛因，价值2240万美元，藏在从法国海运来的一辆汽车里。

纸币预期走低，投资者都争着买黄金。阿拉伯酋长从石油矿区使用费里拿了大笔美元，是最为活跃的黄金交易商。加利福尼亚的实业家、艺术收藏家诺顿·西蒙为一幅雷诺阿的画出价150万美元。几个城市里都开起了人体彩绘工作室，芝加哥市里的某一家就是由28岁的哈罗德·鲁宾经营的。该年度最有名的文学形象是菲利普·罗斯 [70] 的《波特诺伊的怨诉》中长期自慰的角色。

亚特兰大举办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抗议的女权主义者烧掉了胸罩。由于避孕药的普及，生育率比大萧条时期还低。纽约上演的音乐剧《毛发》和进口自瑞典的电影《我好奇（黄色）》都正面展现了男性和女性裸体。美国人选出的新总统承诺会打击色情淫秽产品，打压团伙犯罪，就在他上任前一天，某个全部内容都是性和色情的低俗小报出版了第一期，名字叫《搞》。

该刊物认为只要成年人之间互相同意，任何行为都不算淫秽，色情作品——一点不输给其他表现形式——也是了解自然的途径，那些看了对开放性关系的描绘觉得受冒犯的人，其实是因为看到了裸露的自我。本着以上原则，《搞》很快对尼克松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发起了攻击，其对当代美国生活的观点，任何一家主流刊物都难以接受。

《搞》每周发行，35美分一份，报纸照片上的人们炫耀着生殖器、朝上流社会竖中指，标题和文章里遍布脏字，被外界认为反映了普通人对政府的愤怒和失望。漫画描绘的政客和法官如同禽兽、荒淫无德，四星上将们在越南投下炸弹之后互相搞来搞去。某篇文章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标题明目张胆地问出了很多人憋在心的问题：“约翰·埃德加·胡佛到底是不是基佬？”报纸虽然无视公民权利运动领导人的政治言论，却报道了一个黑人因为在内华达州若干家合法妓院里招妓被拒、抗议种族歧视的新闻。

登在《搞》上的照片里的女人几乎都不是美女，不过刊物的本意就是要呈现不加修饰的真实，长相普通的女人、身上有各种瑕疵和缺陷——她们就是现代的莫莉·布鲁姆 [71] 和康斯坦丝·查泰莱，而不是《花花公子》里那些塑料假人一样的完美玩伴。通过详细报道男性新兴市场上人工阴道、充气塑胶娃娃和女性用按摩棒销量的增长，《搞》记录了美国社会中非个性化的过程；广告栏登的是妓女拉客、孤独老姑娘的内心渴望和单身男人不寻常的欲望：“足部专家，长相英俊，寻脚底敏感的姑娘。来函请寄：纽约市2428信箱，艾德收，邮编10001。”

《搞》的社论尖锐，热爱挖掘社会阴暗面，嘲骂多管闲事的政府一边美化战争，一边抓捕情色书刊出版商，比如《厄洛斯》的出版者拉尔夫·金兹伯格；纽约警方叫停《切·格瓦拉》的舞台剧，逮捕了十个演员，连剧场的清洁工也被抓了起来，因为该剧中有一场口交的戏，会给戏剧观众造成道德风险。《搞》随即发文章质问，既然纽约市本周有145人被谋杀，为什么警方不干脆在这期间戒严所有街道。对于警方突袭纽约市的性用品店、成人书店和情色剧场的行为，《搞》也含讥带讽地表达了担忧，认为每个拿着警棍的愤怒警察身后都有个性冷淡、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母亲，酗酒的父亲，以及一位内心是同性恋的神父，坐在忏悔室里谴责男女之间的肉体乐趣。教区如果挨着色情产品盛行的地区，比如达菲神父 [72] 曾经住过的爱尔兰裔聚居地，就在时报广场西侧，那里支持个人自由的人和 support 宗教管制的人就会没完没了地打仗；各大日报都

支持最近时报广场上的反淫秽宣传（此类活动会消灭投币西洋镜一类的大众色情，对《噢！加尔各答！》这样合法舞台上的高价性感表演却网开一面），《搞》的员工却在为老色鬼们享受快乐的权利辩护，拥护站街妓女的生存权，看到贫民窟出身的“黑魔鬼” [73] 开着玫瑰紫色的拉皮条专用豪华轿车招摇过市，也不会大惊小怪。

有人认为自从性产业近些年开始繁盛以来，时报广场不再安全怡人，《搞》反驳了这种说法，指出时报广场向来是个浮华艳俗的所在，昙花一现的天才和没教养的游客扎堆，人们会来这儿找他们不想在家附近见到的东西；而且，现在的时报广场警备更完善，也更安全了；在达菲神父的时代，贫穷的年轻人拉帮结伙，从附近的地狱厨房 [74] 涌入这里，抢劫案、谋杀案频发，20世纪早期，四十二街南边也是妓女成群，住在当地的主教曾说，妓女比城里的卫理公会教徒还多。

为了向读者提供历史视角，《搞》经常重印褪色的老照片，都是过去妓女和歌舞女郎的照片，她们一度是迂腐的“小花”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 [75] 的眼中钉；在一期名为“过往风尘”的特辑里，《搞》刊登了尺度极大的私人老照片，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匿名寄来的，他们想为子孙后代留下当年情欲的影像见证，而且并不在乎左邻右舍会怎么看，因为邻居们已经先赴黄泉。

警察第一次突袭《搞》的编辑部，是在1969年5月30日的报纸出版之后，那一期印了张合成照片，是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展示着巨大的阳具，题图写着，市长的政治才能显然不如床上本事，不过他也只会传教士式这一招。《搞》的高级编辑被指控犯了淫秽罪，在警察局留了指纹、拘留了几天，却不耽误报纸每周出版，风格还一如既往地无耻。因为报纸突然热销，公司便能请得起顶级律师，能在法庭上争取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能赢回编辑们的自由。出版一年后——警察仍旧会围堵在路边公开贩卖《搞》的报摊，其中一些摊主还是盲人——报纸每周的发行量达到14万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 [76] 称赞其是美国唯一一份真正服务读者的报纸。

编辑认为，报纸的大部分读者对纽约各式各样的性爱亚文化很感兴趣，还有很多人会亲身参与，《搞》会介绍各类酒吧，列出地址，以适应交换伴侣的夫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迷恋施虐受虐人们的需求；读者也能看到假阳具、异形避孕套、高级避孕套和壮阳药的优惠信息。考虑到邮购“婚姻辅助工具”的读者大多较为害羞，有抗拒心理，即使买到假货和没价值的商品也不会投诉，《搞》还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购买、测试这类邮购商品。有些产品名不符实，比如某个有名的阳具增大器；或是价格虚高，比如维持勃起的油膏，效果和药店里卖的几款脱敏乳液差不多，价格却高出十倍；经过实验检测，此类产品会被负面评价。

《搞》的评论家观察到，色情电影在报纸上做广告，往往会夸大影片中的色情内容，于是他在新写的每篇性爱电影评论里都注明自己看的

时候勃起了几次，对每部电影，都有这项叫作“彼得尺” [77] 的标准化测评。报纸还明察暗访了某些诈骗性质的男女交友俱乐部和相亲机构；对有露骨性描写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报纸不仅会刊登书评，还会大段摘录作品中的激情片段，供读者了解作者的风格和大胆程度。

维京公司新出了《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选集》的平装本，《搞》是唯一一家故意在书评里引用乔伊斯和妻子诺拉淫猥通信的报纸。那时乔伊斯离家很久——这些信件可能会吓到守规矩的刊物，因为乔伊斯对受虐（“诺拉，我渴望被你鞭打”）、恋物癖和肛交的兴趣在信中一览无遗：“最细小的事也会令我勃起——你嘴唇淫荡的动作，白色内裤裆部一点点棕色的污迹……想感受你充满火热情欲的嘴唇吮吸着我，想趴在那对粉红色乳头的乳房中间干你，想在你脸上高潮，体液喷到你滚烫的脸颊和眼睛上，想把它塞进你屁股中间，从后面上你。”

“这是相当典型的意淫文字，”《搞》评论道，不过它对维京出版社的态度倒是很友好，证实了很久之前H.L.蒙肯 [78] 说的话：“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从来都不是清教徒，也很少有体面人。”

《搞》的内容和哲学主要来自其总编兼创始人之一，阿尔·戈尔茨坦。他没什么改造世界的野心，只想要如实反映自己了解的世界，他认为，世界就是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无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32岁时的戈尔茨坦怕生、肥胖、性生活不顺心、坐立不宁。他第一次结婚，是和一个娇生惯养的犹太女人，她父母从一开始就反对，离婚的过程也很痛苦；第二任妻子是个清秀的空姐，也是女权主义者，两人的婚姻生活注定不能长久。戈尔茨坦从纽约的佩斯大学退学之后，卖过保险、开过出租、打包过玻璃、领过救济、在纽约世博会的嘉年华上摆过摊、为奔驰士公司当过工人间谍，还为耸人听闻的八卦周刊《美国之鉴》写过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创作的故事描写的都是享乐之后痛苦和惩罚紧接而来，是典型的犹太——基督教模式，这类故事他写了相当多，并不光是凭想象力，更多是来自过去的回忆。

戈尔茨坦生长在布鲁克林一个条件艰苦的犹太人聚居地，年轻人之间的霸凌现象十分猖獗，流行的游戏是到商店里偷东西。那时，他是个口吃、虚胖、总担惊受怕的小屁孩，十几岁还在尿床。公立学校里的犹太女教师总阴沉着脸，为了避免和老师的眼神对上，戈尔茨坦上课就总垂着眼睛、趴在桌上无休无止地画“二战”时的飞行员，画他们在空战中对射的场面。五年级，他考试不及格，被送到教育局指定的儿童心理学家处接受治疗；可他的功课并未长进，连学习热情也一落千丈。他留了级，和比自己小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觉得很丢人，同龄的孩子又排斥、无视他，结果在他的不合群里，慢慢掺进了敌意，放了学走在街上，比他大的孩子总是揍他，特别是黑人。很快，他几乎有点喜欢被打了；至少他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通过一次次主动接受惩罚，他甚至赢得了某种奇怪的尊敬。他看到小混混们站在街角，有学校里的体育生、有拦路

抢劫的、有手段厉害的小偷，他就做手势挑衅这些人，他们便照例抓住他，用拳头一顿暴打，他也疯狂地反抗、嘴里骂着脏话，激他们继续打他。

戈尔茨坦的母亲比他口吃还严重，她富有激情，却很软弱，是俄国移民的后代；他父亲在下东区的小学也没毕业，就辍学做了赫斯特 [79] 旗下《国际新闻图片》的通讯记者，骑着摩托搜寻新闻，最终他做了摄影记者，和一大群新闻猎犬到处跑，脖子上只要没挂着相机带子，就像丢了魂似的，全身僵硬。和家人一起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父亲会温顺地坐在一旁，还管华人服务员叫“先生”；在家里，他要么一脸不赞成地静静待着，要么就对家庭事务漠不关心。阿尔对父亲唯一好奇的地方，是他衣柜抽屉里有大尺度的裸女照片，有些是东方人，是他“二战”时作为赫斯特太平洋战场的摄影记者拍下来的，还有些照片是他从纽约警察局的朋友那儿弄来的，警方突袭时报广场扫黄之后，就会有这类东西。

戈尔茨坦家族里，阿尔唯一崇拜的男性是乔治舅舅，他块头大、长相英俊，就是达蒙·鲁尼恩 [80] 笔下的那号人物，他离了婚，住在百老汇剧院区附近的酒店式公寓里，开了一家业务繁忙的停车场，接待的车主有不少名人。虽然乔治和这些人并无深交，只是熟悉他们的车子，他还是向侄子阿尔成功传达出自己认识百老汇大多数顶级制作人和明星、赌徒和皮条客；乔治能言善辩，他对阿尔的父母说，侄子到了16岁还是处男，真是愁人，老实巴交的夫妻俩信以为真，承认儿子本来就麻烦不断，现在又出了新问题，还同意了乔治提出的解决办法。很快，阿尔接到舅舅的电话，叫他第二天晚上10点去乔治的酒店套房，说有个女人会在那儿等他。

阿尔·戈尔茨坦穿上成人礼服，提前半小时到了酒店。舅舅和他打了招呼，给他倒了杯威士忌，然后带他到街对面的药店买了安全套，是很贵的羊皮带润滑剂安全套，福雷克斯牌，舅舅觉得这牌子是安全套中的劳斯莱斯。然后他让阿尔先绕着街区散会儿步，等那位女士到了再回酒店。

20分钟后，阿尔返回酒店，看到709套房的门半开着，起居室里黑着灯，舅舅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摔跤比赛。他招手让阿尔进屋，叫他脱掉外套，指着卧室的门，祝他好运。

阿尔紧张地推开房门，听到女人沙哑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你好，我叫海伦。很高兴你来这儿。”他紧抓着门把手，女人又说道，“进来吧，关上门。没什么可怕的。”她似乎很友好、很温柔，虽然他还看不见她，却能清晰地闻见香水味。

“你紧张了？”她问。

“不。”他说。

“你愿意脱下衣服，到我这儿来吗？”

“愿意。”

屋里虽然暗，但他渐渐也能看到她了，她坐在床上，盖着被单。好像是金发。他小心地解下领带、脱掉衬衫，接着脱下裤子，搭在椅子上，听到兜里的硬币和地铁代币叮当作响。他慢慢爬上床，感觉到她伸出了手；很快她便开始慈爱地抚摸他，轻柔地引导他的手到达自己的身体，让他抚摸她的大胸、肚子，和两腿中间的毛发。她很高大，可是并不胖，他把嘴唇按上她的胸，她便鼓励地说：“这就对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接着，他感到她的手也在探索自己，用一种奇特而美妙的方式令他兴奋。她问他有没有带安全套，他回答说带了；可等他站起身去拿，街对面百老汇高楼里的灯光照出了他勃起的下体，他尴尬极了，转身不看她，笨手笨脚地在衣服里乱找。他把裤兜翻了一遍，然后是衬衫口袋，然后又翻了一次裤兜，才找到；他爬回床上，迟疑着，她从他手里拿过安全套，拆开，熟练地套上，又说：“一切都会好的。”他太兴奋了，说不出话。

她舔湿指尖，爱抚着自己双腿中间的部分，之后便拉他到自己身上，让他插了进去，开始有节奏地上下运动，他也跟着她的节奏。他感到身心都被这个高大的女人包裹了起来，舒服地安坐在她沉重的大腿和长长的手臂之中，达到高潮后，她拥抱了他，说：“噢，刚才真是舒服。”他从没这样快乐过。

后来，他懒洋洋地躺在她身边，她便问他喜不喜欢上学之类的问题，可是完全不说自己的事；他也不好意思问。他很想同她在舅舅的床上多躺一会儿，可是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早还要上课，他最后便说自己该回家了。他穿衣服的时候，她还在床上，他谢过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吻了他。

舅舅还在起居室里看摔跤，看到他进来，站起身问是否顺利，听到他说是，舅舅似乎真心为他高兴。阿尔与舅舅握手，感谢他的好意。很快，他乘电梯下楼，百老汇夜晚的空气扑面而来，周围全是人、喧闹的声音、流光溢彩的灯火；他感到有些长大了。

没过几个月，戈尔茨坦满17岁，辍学参了军。父亲在赫斯特集团的朋友给五角大楼写了封信，介绍阿尔·戈尔茨坦加入了通信兵部队，接下来的两年，他在各个基地里做摄影师，拍摄过几百次阅兵和授勋仪式——还有一次，他服从长官的要求，拍下了妓女为长官口交的照片。

当兵时，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戈尔茨坦都是妓女的常客，直到1958年冬天退伍后，根据安置法案进了佩斯大学，他才消除必须为性爱付钱的观念——这也是第一次，他不再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头脑是周围人里最差的。在军队里，他变得成熟了，军营里无数孤独的夜晚让他

读了很多书，在佩斯大学里，他比班里大多数人年长两三岁，比他们去的地方多，作为退伍老兵还有些威望。他的成绩很好，也给学校报纸写稿，每天课后还会跟着父亲去《国际新闻图片》做实习摄影师。他克服了口吃的毛病，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被选为队长。

他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经被人接受，可他对别人的态度一点没改；要说有变化，现在他有了自信和地位，能更多表达长期以来的敌意和愤怒。既然如今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要发泄多年来因为口吃被人模仿、嘲笑而积攒的怒火；如果获得成功，他就证明了昔日的小学老师和同学没能发现他成功的潜力，而这一点是他最想要的。

对辩手阿尔·戈尔茨坦来说，胜利就是一切，尤其是现在佩斯大学要和常青藤大学的各个辩论队比赛了。他觉得常青藤的辩手肯定都是社会地位高的有钱人，所以就应该被他鄙视。为了赢过他们，戈尔茨坦可以无所不为：造假也好、歪曲事实也好、说各种谎话也好——他都愿意做，良心丝毫不受谴责，因为在他看来，常青藤的人活该被人骗。

很快，他这种粗鲁无礼的冲劲就转向了学校。他开始和教授们结仇，写社论谴责学校政策，抗议学生得穿正装、打领带上学的规定。作为一名21岁的年轻人，戈尔茨坦留起络腮胡，成了学校最初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不学课本，读凯鲁亚克的小说和艾伦·金斯堡的诗，成绩也下降了，不过这也有别的原因，就是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辩论队里一个心思难以捉摸的漂亮女生身上。

她是他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戈尔茨坦满心都是浪漫的激情和天真的期望，而且她喜爱冒险、受人欢迎，从一开始就声明，决不会为了他的夜生活而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动。她时不时就同其他男人约会，有时让他知道，有时背着——不算很频繁，可正好够让戈尔茨坦一直处在不确定和绝望的状态。没有和她睡觉的晚上，他就想着她自慰，在想象中，她那苗条、优雅的身体异常清晰，简直让人发疯，她漂亮的长腿环着其他男人的身体，都是比他更优秀的男人。

他虽然胖，却很嫌恶胖女人；他母亲胸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戈尔茨坦才喜欢辩论队女孩那不大却坚实的乳房；从两人开始约会起，他便让他十分痛苦，从前的自我怀疑卷土重来，可她同时也燃起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冷酷的征服欲望——她就像一场辩论赛，他相信自己最终能赢，只要用上聪明的头脑、善辩的嘴巴。特别是这一回，还要用到舌头。

要想通往她的心，一定得用大师级的技巧经过她的下身。一天晚上，她轻轻把他的头按到自己两腿之间，说这是她最爱的快感，戈尔茨坦便初步得出了以上结论。在这之前，他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事儿，听到的只言片语也绝没有这样直白。在军队或者布鲁克林偶尔有人提到这事儿的时候，用的都是令人恶心、干巴巴的说法，其中最委婉的一个是“暖手笼 [81] 潜水”，而且他认识的那些大男子主义、自高自大的小流氓，没

有一个肯承认干过这种事的。这样不够男人，没准还不卫生。它让男人变成了女人的仆从。只有变态才这么干。

的确，戈尔茨坦在好几个图书馆的性百科全书里查过相关条目以后发现，只要用到舌头都被政府正式定义为淫秽行为，属于鸡奸的一种，即使夫妻之间私下里这么做，在美国大多数州也是违法的。在康涅狄克州，口交犯罪可被判处服刑30年；在俄亥俄州是20年。在佐治亚州，这种“违背自然的犯罪”可能会导致终身监禁和苦工——比和动物性交的处罚严重许多，后者在佐治亚州只会被判刑5年。

禁止口交的法律显然是从宗教法令发展而来。自中世纪起，基督教法律就认定这些与繁衍无关的活动是不自然的，而实际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无数人自然地实践着这一行为。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卷轴上就有此类图画，在古代东方的饭碗、花瓶和鼻烟壶上也都有类似绘画。印度古代的神庙里就发现了呈此姿势的雕像；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也多次提到，认为这些行为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中都十分常见。中世纪的教会对那些承认口交的人施以严厉的处罚，也促使没承认的人感到罪恶，可背地里，人们对此的爱好几百年来有增无减，不过很少有人公开描绘这种行为，除了被禁的绘画和文学，比如18世纪的小说《芬妮·希尔》以及亨利·米勒饱受审查的作品。

戈尔茨坦读了米勒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对书中有关舔阴的生动描绘印象深刻，而且也相信米勒自己就十分享受这样为女人带来快乐的过程——阿尔·戈尔茨坦也是这样，他从年轻的女友那里得到了很多锻炼和鼓励。他的头埋在她两腿中间，他第一次感到对她拥有了权力。舌头是比阳具更有力的武器，至少对当时的他是这样；舌头更可靠、更可控，能随心调遣——阳具可能会疲软、不举，可是舌头总能深入、卷曲、搅动，博得她的欢心；嘴贴在她身上，他不仅见到了她下身的华丽景象，也感到自己和亨利·米勒有了文学上的联系。

不上床的时候，她态度冷淡，后来她选了晚上的课程，就更是如此，渐渐地，到了1960年秋天，这段恋爱终结了。他很快找了另一个女孩，没她那样老于世故，对他更上心；可 he 也没有特别关注她。

通过课后在赫斯特打工，戈尔茨坦学到了不少摄影技巧，圣诞节假期，他接了一家摄影工作室飞去古巴拍摄的任务，新晋的卡斯特罗政权和美国政府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久两国就会终结外交关系，而阿尔·戈尔茨坦出现在哈瓦那，很可能加速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下飞机不到一小时，他就开始从旅馆窗子里用长焦镜头拍经过大街的女民兵，当天下午，他又在城里闲游，拍全副武装的军事基地和广告牌上的反美标语。到了晚上，他脖子上挂着四台相机，参加了由古巴领导人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在拍下30张发言人和讲台上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后，他突然被拿枪的警卫推搡出了房间，并被要求交出胶卷。

戈尔茨坦的工作被打断，愤怒极了，他当即拒绝了警卫的要求；他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自己的媒体记者证，可是没用，他被扔进一辆车，开到了军事监狱，因为间谍罪被捕。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四夜，后来美国大使馆知会古巴方面，说他并非间谍，只是个对假期打工热情过头的学生摄影师；于是戈尔茨坦被释放，乘最早一班飞机离开古巴岛，回到迈阿密。

古巴的事件让他出了名，在学校的声望愈发增高，可这也加剧了他离开校园的想法，特别是他接连三年都通不过大一数学考试，对校园生活也厌倦、不满足。1961年春天，大三的戈尔茨坦退学当了全职自由摄影记者，希望成为专业记者、经历不寻常的冒险。可他这希望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乘着政府媒体的飞机去巴基斯坦，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到达该国的照片；最惊心动魄的冒险则是，1963年1月和一个他根本不爱的年轻女人私奔去了纽约长岛大颈镇。

他第一次遇见她，是从佩斯退学前不久；他虽然不喜欢她——体重超标、性格咄咄逼人，父母都是有社交野心的犹太人，很纵容她，却很惊讶她竟然对自己有好感，她也是第一个认真说他将来会有所成就的人。她父母强烈反对女儿和戈尔茨坦的头几次约会，要是没有他们反对，这两人的关系顶多就是一般熟的朋友；可是他们坚持说戈尔茨坦配不上她，要求女儿不再和他约会，这激发了她的反抗心，戈尔茨坦也被激怒了，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他非得娶他们的女儿不可。他这么做了。他很后悔。

两人搬进西五十四街的新公寓后没多久，就都意识到与对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半，其间争吵不断，很少做爱。戈尔茨坦不愿与她做爱，经常在深夜躲进卫生间对着裸女照片自慰，照片里是黛安娜·韦伯、贝蒂·佩奇，或者1953年著名黄色电影《自作聪明》中的明星、漂亮的得州脱衣舞女坎迪·巴尔，或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上的内衣模特，或是《生活》杂志上玛丽莲·梦露爬出泳池的照片，或是杰奎琳·肯尼迪穿着低胸长袍的新闻照片——他在想象中脱掉了那光滑的布料。

为了寻求性刺激，他也会去百老汇看色情电影，整个下午都和其他寂寞的男人一起，坐在黑暗中一厢情愿地幻想着，内心不停起伏。他们都刻意不挨着坐，电影换场之间灯亮时也避免有眼神接触。有借口能单独出门的晚上，他会去哈莱姆 [82] 众多妓院中的一家，这地方对猎艳的白人男性还不算禁区；不久后的黑人权利运动和种族恐惧虽然抑制了强迫卖淫，结果却使黑人妓女坐着豪华轿车被带到城里、安置在列克星敦大道和时报广场一带。

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尔茨坦结婚的这几年，的确证实了妻子恋爱时

的预言：他真的成功了，可不是作为摄影师成功，倒是卖保险相当出色。他急切想要挣比当摄影师多得多的钱，便应征了《时代周刊》上纽约互惠保险公司的招聘广告，上班不到一年，他的销售记录已然位居7000名员工中的第14名。他有野心、有活力，骑着摩托车在城里轻快地跑来跑去，他巧舌如簧、能说服很多人天灾人祸随时会降临，这本领让他获益颇丰。

进公司两年之后，烦心的家庭生活也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他的业绩下降了，突然就得面对他曾经给别人预言的灰暗前景。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公寓被洗劫了。家具都搬没了，衣服扔得到处都是，还被剪成了碎片。他昂贵的雪茄被掰断，立体声音响没了，浴室地上全是碎玻璃，一股剃须乳液的味道。老婆已经不见踪影，她的东西也一件没剩。

他愤怒极了，又完全无助。他知道，永远无法证明这是妻子在蓄意报复自己的冷漠，如果去告她，她父亲又是律师，在法庭上也不好对付。于是戈尔茨坦直接离开了公寓，去皇后区的父母家住了几晚，这个没上过保险的保险人受惊过度，一句话也说不出；接下来的几天，主要都是买过他保险的朋友来安慰他。

很快他就决定转行，认为再卖保险只会更加郁闷；后来有一个朋友——负责纽约世博会的“比利时村庄”展区——介绍了抛硬币展台的工作，戈尔茨坦立马接受了。一周里六个晚上，戈尔茨坦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站在麦克风后面吆喝，招徕人们玩抛硬币，把硬币扔到木块上刻着的小红圈里就算赢，奖品是电视机。游戏过程没有造假，1965年夏天他送出了30台电视，一周挣了250美元，在狂欢的气氛里忘乎所以。

可1965年秋天，世博会结束了，他和妻子之前欠下的信用卡账单还有四千多美元，于是接下来的一年戈尔茨坦又开始打各种零工，推销地毯、推销百科全书、开出租车，还定期在时报广场的一家血站卖血。他灰心丧气，对周围的世界也没了兴趣，30岁头上，他兼职漂泊，全职幻想。

因为婚姻失败，他不太愿意与女人有深入交往，可还是渴望女性的陪伴，每晚都想着纽约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孤单的漂亮女人，只要他能找到，就随时可以邀请她们。他本来可以去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可不喜欢喝酒和嘈杂的环境，而且还必须要和其他男人争抢搭讪的机会，他觉得自己太老了，太胖了，不适合去这种单身大学生扎堆的地方。酒吧女和站街妓女总是有的，随叫随到——他平生第一次明白了，社会上有这种女人是多么必要，可是他手头不宽裕，不能这样满足性欲。他还注册了一次电脑约会服务，结果是骗子。每周他都买《东村边缘》，看看个人广告栏，里面经常有女人寻觅男性伙伴的广告，还附邮箱地址。可他的回复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没有回音，剩下一个通常还是妓女。

他也加入了单身男女俱乐部，积极回应笔友组织，订阅通过信函提供社交往来的杂志——比如纽约市沃利·比奇的“精选”服务；沙伦在多伦多多的“异国风情”服务；华盛顿的文艺复兴索引俱乐部；加州的惠蒂尔快乐邮件——最终他为自己写了广告，发给全国各个征友组织。他写道：

本人30岁，身高5.8英尺，蓝眼棕发。曾在巴基斯坦和古巴等地做摄影记者。现已离婚。希望此事不会降低你的兴致。一般人都看不出我是“二手货”。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双舒服的鞋，“不磨脚”。我喜欢任何与读书、电影、戏剧、户外运动和其他不自私的娱乐相关的活动。我工作期间会旅行，很快要去新泽西州梅斯兰丁的裸体主义殖民地度过两到七天。对，我任何事都会尝试一次。

请回复我这封短信吧，附上你的地址、电话等。

你未来的玩伴，

阿尔·戈尔茨坦

他列出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了几星期。没人回复。

就在屡屡被拒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工作，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佩斯大学认识的一个年轻男生，说有个没准很有赚头的兼职工作，问戈尔茨坦是否感兴趣；雇主是个大公司，每周出200美元，如果工作完成得好，最后还有1万美元奖金。戈尔茨坦拿到了纽约一个劳动律师的电话，他会安排面试。戈尔茨坦打电话过去，由律师本人和另一个人面试之后，拿到了工作。现在，戈尔茨坦成了奔德士子公司的工人间谍。

这个子公司——长岛市的P&D制造公司，是给底特律生产点火系统和其他汽车零部件的——利润不少，高层人员害怕工厂工人会脱离原来由管理层掌握的工会、加入独立而有权力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83]，因为一旦如此，新工会必然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UAW已经安排带喇叭的卡车停在工厂大门外，游说P&D的雇员在下次劳工大会上投票给自己，现在公司高层想知道，400个工人里大概会有多少人会退出原来的工会。

戈尔茨坦的任务是混进工人里，打听他们对UAW的态度，然后秘密向董事会报告。戈尔茨坦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也在工厂上下送汽车零部件，这样可以在各个部门间自由活动，也能拓展交际面、多听小道消息。不到一个月，他就推断出大多数工人偏向UAW；和管理层的人商量之后，他参与传播了谣言，说如果UAW当选，公司就会关掉长岛的工厂、搬到南边去，几乎所有人都会失业。由于最近在长岛有一家UAW获胜的工厂真的倒闭了，谣言可信度很高；最后工人们投票时，UAW的提

刚开始，戈尔茨坦对这种胜利感到了一点变态的快乐，可是后来他就开始感到罪恶、厌恶自己。他行踪古怪、反复无常，可是不论行为上多么愚蠢、不端，他对无权无势的底层人还是同情的，现在他厌恶自己居然做了管理层的间谍；他在这岗位上又待了几周，本来还要继续秘密行动的，不过他感到连雇主那边也开始轻蔑他的行为了，因为这让他们想起自己的表里不一。

最后，一天晚上，戈尔茨坦不打招呼地离开了公司，第二天早上也没回去，之后再也没回去过。他不知道为什么下定了决心；就是一早醒来，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要同公司断绝关系，即使要损失那1万美元都拦不住他。他在家待了几天，任电话一直响，晚上就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荡，要么到时报广场的书店里翻书，要么就去看夜场电影。这个时期，他越来越依赖收音机，在家里定时听巴里·格雷、朗恩·约翰·内贝尔和让·谢普德 [84] 的脱口秀，还有WBAI [85] 的政教分离主义评论，以及其他几个能在痛苦中陪伴他的节目。

1966年夏天，他又开始开出租车，就花了大部分积蓄买下一台德国产便携式收音机，在车里听喜欢的节目；这是台价值500美元的诺曼底短波收音机，让他白天晚上都能收到世界各地传来的话语和音乐。这台他去哪儿都不离手的收音机，就是1966年戈尔茨坦和当代生活的主要联系，要不是偶然碰到了在保险公司就认识的推销员，他不与人打交道的的时间可能更长。那推销员很热心，看起来很担心戈尔茨坦的情况，说话间，他告诉戈尔茨坦自己有时与一个空姐约会，她的室友也是个空姐，戈尔茨坦满可以去约她出来。她住在西九十一街，跟的是泛美航空的航班；她的名字叫玛丽·菲利普斯，从南卡罗来纳州来，是个金发碧眼、皮肤苍白的姑娘。

这描述使戈尔茨坦从浑浑噩噩中醒了过来，他一回到西二十街的公寓，就拨通了她的号码。没有人接，他一小时后又打了一次，再一小时后又打，之后，带着近乎绝望的坚持，他打了一整晚，之后又打了一周的电话。

他沮丧极了，还想起了在征友刊物上登广告而没人回信的悲伤往事，他给保险公司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很同情他，可是鼓励他继续打——玛丽·菲利普斯很可能是在越洋航班上，或是在度假，朋友又说等她回到纽约，和戈尔茨坦见了面，他一定不会失望的。

戈尔茨坦谢过朋友，接下来的两周里，他每天给她打几次电话，她一直不接，他的幻想便开始膨胀；他越来越迷恋她，相信她最终会满足自己所有浪漫的想象，嫉妒和她在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在35000英尺的高空跨越几个时区调戏她的商人——一天下午，他拨了号，铃声响了几下，那头有人拿起了听筒，戈尔茨坦突然就想挂掉，可他听到女人的声音说了你好，然后他问玛丽·菲利普斯在不在，那个声音说：“是我。”

戈尔茨坦稍微有些结巴地做了自我介绍；他提到了两人都认识的保险公司的朋友，问她下周是否有空出来吃午饭或晚饭。她感谢了他，说有飞行任务和其他工作，下个月可能都没时间出来吃饭，不过再之后她很愿意见他，让他再打电话过来。听起来她挺真诚，戈尔茨坦也喜欢她说话的声音，温暖活泼，不过他很快地提醒自己，她是个空姐，可能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对人礼貌，而自己却傻乎乎地高兴。

尽管如此，他还是定期给她打电话，每次打通后她都拒绝——可她富有魅力、彬彬有礼，他既没有恼火，也没打退堂鼓；她越是遥不可及，他的期待越高，欲望越是强烈。

最后，在尝试了五个月以后，阿尔·戈尔茨坦终于约到了玛丽·菲利普斯。在她公寓附近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餐厅，两人吃了早午餐。他坐在她对面，为她的美貌所震慑，几乎吃不下饭、说不出话来。她的蓝眼睛美极了。她一头金发，脸颊是奶油色，个性阳光，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她苗条的身材正是他喜欢的，他坐着听她说话，看到别的人走进餐厅，不禁想这些人肯定在奇怪为什么她会跟他在一起——这个金发美人，居然在和肥胖的犹太出租车司机吃早午饭。

可她似乎一点儿不尴尬，轻快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说了很多。她讲到自己的工作，在南方度过的童年，家里几代人都是乡村医生和律师，母亲是音乐家，父亲在查尔斯顿市的美国高等军事院校里教历史。她好像很喜欢父母亲，谈到过去也并无不快，戈尔茨坦听了便意识到两人的差距之大。虽然他还完全不了解她，却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追求到她。他粗鄙得不可救药，她却像仙女一般。然后她说，自己大二时，因为在寝室里留宿情人，被学校开除了。

她说得这样轻松，和她被开除这事儿一样让他震惊。她声音里毫无悔意，那天使般的神情也没有变化。她说起春假之前，被叫去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希胡德学院的纪律委员会，说有个男性在她宿舍里住了几晚。实际上，她向戈尔茨坦承认说，那个年轻男人已经和她住了将近一个月，她知道这样违反校规，可是觉得在宿舍就应该有隐私权。玛丽和男朋友离开学校，对父母说了被开除的事，他们很生气。父亲把玛丽的情人赶出家门，母亲则要求她不许对镇上的人说为什么离开学校。

她在家伤心地坐了几天的，看到了查尔斯顿报纸上的通告，说泛美航空的代表刚刚到达本市，要面试未来的空姐，玛丽觉得，这是逃脱父母责难的大好机会；于是她报了名、通过了考试，被公司录取。几周之后，她去了迈阿密参加培训，五周后培训结束，来到纽约。她在泛美航空第一年，跟的是加勒比航线，后来又调到欧洲航线。她对戈尔茨坦说，不打算一辈子都待在航空业——她的理想是做编辑或自由作家，可她也喜欢现在的工作，很享受住在纽约。

吃过饭，她邀请戈尔茨坦回自己的公寓。她很开放，态度亲切，整个下午两人都在聊天；后来，她用女人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和他上床。他犹豫了，不能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到了傍晚，两人已经开始做爱。

他后来常常见她，虽然仍旧怀疑她对自己的感情，觉得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不过他并不想多问，毕竟她是他快乐的源泉。1968年春天，她搬进了他的公寓，同年夏天，两人在墨西哥结婚，而他还没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不怎么在乎这种技术问题，世道这么乱，政府的意见不值一提，不服从和反对政府在全国上下成了风气；戈尔茨坦以前从没想过自己在政治上会是个激进分子，可是现在，他觉得有必要站在政教分离主义这边，于是他决定，要在地下刊物上揭露他为奔德士公司做的间谍工作。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平息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也能让那个和政府签下主要国防合同的大公司难堪，于是他找到一家激进的小报，纽约的《自由新闻》，亲自对编辑说了他的想法。编辑们很希望刊登这个故事，他很高兴。他们只出得起100美元，可是答应他会印在头版，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创作，把白领高层设计欺骗毫无戒心的工人的每个肮脏细节都写出来。

戈尔茨坦花了十天写作，最后把故事送到出版社时，编辑们都对其谴责公司的证据印象深刻，预言报道一旦发表一定会对奔德士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灾难性冲击。1万份《自由新闻》被送到了各个报摊，戈尔茨坦的故事登在头版上，标题是《我曾为奔德士公司的工人当间谍》，可是编辑们明显高估了公众对此事的兴趣，也可能是读者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

不论是什么原因，《自由新闻》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通电话。阿尔·戈尔茨坦每天坐在报纸编辑部里，期待高涨，然后落空，结果如此惨淡，他明显泄了气。不过，和《自由新闻》的这次交往长期来看，对戈尔茨坦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与报社的一位年轻职员交上了朋友，后来，这个人帮他办起了自己的报纸。

吉姆·巴克利是个排字工，也是《自由新闻》的助理编辑，他个儿不高，一头黑发，是个24岁的新英格兰人，虽然在海军里待了四年，半生坎坷，可还是流露出唱诗班男童那种一本正经的天真劲儿。他有双大大的、忧郁的棕色眼睛，干干净净的白皙面孔，性格羞怯，掩盖了内心的不安分，这躁动的精神促使他不停换工作、换住处，与看起来有目标的人做临时的伙伴。

巴克利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父母常年争吵、分居，轮流抚养，然后又抛弃他，巴克利的童年便在几家不同的孤儿院里度过，在新英格兰、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都上过学，后来他辍了学，搭便车旅行，由于长相精致、性格温顺，司机们无一例外愿意停车。1965

年，巴克利随海军去了一趟东方后退役，开始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他在旧金山的证券公司做过电传机操作员，在路边卖过《自由新闻》洛杉矶版，在格林威治村的餐厅做过厨师，当过联合国的打字员、纽约世博会的软糖小贩（他的玻璃小店离戈尔茨坦抛硬币的摊子不远），还在一家每天五美元房费、招待游客的廉价伦敦旅馆做过门童。

他在法国与几个倒卖兴奋剂的美国大学生住了一阵，在北非与阿拉伯牧羊人也住过，回到美国，和詹姆斯·阿吉 [86] 的侄女谈了场任性的跨国恋爱之后，巴克利觉得可以在纽约定居下来，在新闻界发展事业。可是到《自由新闻》工作没几个月，他已经准备辞职，想用不多的积蓄自己办报纸，少些争议、多赚利润，《自由新闻》的老板为了应付下属涨工资的要求，绝望地赤脚在办公室里走。

这时，吉姆·巴克利遇到了阿尔·戈尔茨坦，帮他编辑了做间谍的故事，戈尔茨坦的那种挫败他很熟悉，并且觉得这是两人切实合作的基础——至少，单打独斗肯定很难成事。戈尔茨坦想做色情小报，巴克利一开始并不愿意，他还没有从天主教孤儿院多年的严格教养中完全解放出来，不过他很同意戈尔茨坦的观点，即这种周刊在发行之前已经有了市场——对于身体享乐和色欲的《消费报告》、能够毫无顾忌地描绘情欲世界的报纸，这世界已经在人们周围日渐形成，主流报纸那些神经质的老板却选择无视。性就是20世纪中期美国最大的新闻，戈尔茨坦以推销员的骄傲语调对巴克利说，他们充满情色和玩乐内容的期刊会大受欢迎，与控制美国地下媒体的新左派那阴沉的空话形成强烈对比。

于是，1968年夏末，两人各出175美元成立了公司，发行由戈尔茨坦取名为《搞》的报纸，灵感来自不久前一份已停刊的诗歌刊物，叫《操：艺术杂志》。戈尔茨坦害怕首任妻子会哪一天合法要求《搞》的股权，就用第二任妻子的名字玛丽·菲利普斯注册了股份，她的名字和巴克利一起作为合伙人写在报头上，不过她人还是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戈尔茨坦自己当总编，名字写在一大串雇员的名单之前，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子虚乌有。

1968年11月，《搞》出版了共有12页的第一期，两位编辑在文章中称其是“西方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新刊物”。戈尔茨坦和巴克利几乎包揽了全部工作：戈尔茨坦写了大部分文章，巴克利排版，然后两人亲自把首印的7000份报纸送到纽约的各个报摊，只要报摊老板愿意接受这份色情小报——封面上是穿着比基尼的浅黑肤色女人，抚摸着—根粗大的犹太萨拉米香肠。

第一期卖了超过4000份，第二期卖得更好，十期之后，《搞》已经扩充至24页，每期销量近10万份。现在他们有了招聘编辑和记者的钱，招到的人大多具有能在纽约任何一家刊物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教育背景。《搞》的书评人迈克尔·珀金斯，本科毕业于俄亥俄大学、在纽约城市大学读的硕士，之前为《村声》 [87] 写书评。新来的执行主编肯·高尔毕业于西东大学文学系，在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和其他出版社工作过；特约编

辑迪安·拉蒂默是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写作奖学金获得者。美术指导史蒂文·海勒是巴克利在《自由新闻》的纽约同事，几年后会去《纽约时报》做美术指导。《搞》的年轻摄影记者彼得·布伦南是福德汉姆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在哈佛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学位。

《搞》搬进了一座12层的砖砌建筑，是由1907年设计建造的工厂改造的，不过建筑结构相当精巧；有飞檐的柱子、弯曲的前窗、外部有带花纹的金属镶边，面对着大街的墙上，二楼那一排华丽的窗户上面，刻着这建筑曾经的主人、百万富翁的姓名首字母——E.W.B.，爱德华·韦斯特·布朗宁，在从前八卦周刊的头条里则是“布朗宁叔叔”，因为在20年代他卷进了丑闻，和一位曲线窈窕、为人轻浮的蓝眼睛女孩有了关系，她才14岁，叫皮奇斯·希南。

布朗宁是在百老汇麦卡尔平酒店里的中学舞会上注意到皮奇斯的。虽然他年过50、头发花白，可是在年轻人群里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在纽约是有名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也是慈善家，慷慨捐助过经济困难的学生、生病的孩子和孤儿。

1919年，布朗宁和妻子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便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一年之后，两人又收养了另一个女孩。为了哄她们开心，布朗宁在自己上西区的一座公寓大楼屋顶上盖了个住处，装饰着日本灯笼、寺院的钟、喷泉和鸣禽，还有个足够划小船的湖。布朗宁叔叔的豪华礼物得到了全国上下媒体的赞美，1924年的连环漫画人物沃巴克斯叔叔和孤女安妮 [88]，可能就是从他这得到的灵感。

然而，1925年，布朗宁的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大女儿去了巴黎，留下他和小女儿森夏恩；他在媒体上做广告，要给8岁的森夏恩找一个“14岁女孩”做伴，这事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来信有几千封之多。可是他要给女儿征求伙伴的好心很快就显得有些可疑，因为他遇到了年轻的皮奇斯·希南，后来又与她约会。这下子，人们在第五大道上看到皮奇斯，坐在他孔雀蓝的劳斯莱斯后座上微笑着，周围堆满了玩具、贵重衣服和珠宝盒子。皮奇斯之前是和父母住在华盛顿高地的出租公寓里，1926年，他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皮奇斯·希南在16岁生日那天成了第二任布朗宁太太。

这时，爱德华·布朗宁的身价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他生长在曼哈顿，父母很严厉、有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从小就拿《圣经》规劝他，对他讲辛勤工作的美德。布朗宁长大成人之前，没怎么有轻佻爱玩的少年时期。可自从和皮奇斯结了婚，他便发誓要少些工作、多花时间享乐，在公众眼里，他变成了花花公子，也迅速适应了这个新形象。突然之间，他就融入了爵士时代 [89]，带着披貂皮大衣的皮奇斯进高级餐厅时，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他会耐心地在人行道上多站一会儿。他给皮奇斯买了豪华轿车，配备专人司机，皮奇斯和母亲在第五大道疯狂购物，他也会买单；她母亲是医院的护士，从一开始就鼓励女儿和布朗宁交往，相应地，两人恋爱时她也收到了红包。

布朗宁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本剪贴簿，上面都是关于他的新闻剪报，他也从不错过受采访的机会——即便在结婚十个月之后，在一大群闹哄哄的记者面前，他伤心地被迫承认，皮奇斯跑掉了。仆人们说看到她 and 母亲离开了长岛，开着一辆货车，里面是他送她的所有东西。虽然布朗宁伤心欲绝，还是表示自己仍然爱她，并对着镜头恳求她回来。

布朗宁再次见到妻子，是在人满为患的纽约法庭上，她的律师要求布朗宁离婚并支付巨额抚养费，皮奇斯自己也站出来，指控他性情冷酷、不道德。她说布朗宁喜欢看她裸体吃早餐，还送给她裸体照片的书，暗示他有不正常的欲望。

然而，布朗宁的律师交叉质询时，出示了皮奇斯在婚前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与她做过爱的男人名字——她流着眼泪承认了，法庭里纷纷响起叹息和议论，法官不停地敲着木槌。虽然最终判决的抚养费数额远比她的预期要低——她拿到17万美元现金，还有六处西区的房产，她却利用这件事的公众效应，在母亲的指导下成了歌舞节目的女演员，野心勃勃地想进军娱乐圈。不过她事业上不太成功，接下来几十年媒体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再婚上面——布朗宁之后，她又结婚离婚三次——最终，在1956年，报纸头条报道了前皮奇斯·布朗宁夫人在浴室滑倒身亡，享年44岁。

1934年，爱德华·布朗宁过了60岁生日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晚年的精力都放在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他还赶在当时的大部分商业巨头之前，预见到了大萧条的到来，在经济崩盘前以很高的价格卖掉了西区的房产，包括西十七街11号的公寓楼。

布朗宁去世几十年后，这栋楼的外观大致还是当时的样子，外墙装饰是20世纪初的华丽风格，他的名字首字母深深地刻进墙里；不过内饰就差很多了，一幅疏于照管的模样。油漆斑驳、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煤烟糊在窗玻璃上，室内的光照都不好。这栋窄小的12层楼位于零售女装业中心的南边，从前的租客都是小型女装工厂和制帽商，现在这些人有的破产，有的不满意这楼的设施破旧，唯一一台又小又慢的电梯还总出故障，渐渐都搬了出去。

30年代到60年代间，这栋楼转过几次手、卖给了几个不同买主，而谁也没从其中赚到钱，到了70年代，上层的空间就不再挑剔租客，租给了年景好时不会考虑的客人。《搞》的总部在11层，10层是美国共产党的总部；顶层是个同性恋公社，主要是年轻男性，把布朗宁的旧办公室改造成了住房。下面几层的房客，要么是政治或社会上的异端，要么至少是不循常规、神秘兮兮、稀奇古怪的人。

房客中有个金属匠人，专门做指节铜环的。还有一帮中年男人，每周都有几天晚上聚在一起，在屋里铺上微型铁轨、摆弄着火车模型在上

面跑。有一家科幻恐怖杂志的编辑部也在楼里，杂志叫《怪物时代》，另一层楼上还有一家叫《偷窥的汤姆》的丑闻小报。一个离了婚的纽约名流，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 [90] 的后代，把他那一层用作画室和浪漫的隐居之地。还有个深居简出、红头发的书籍装订女商人，到了半夜，她的孪生姐姐常来拜访。再下面两层，是个以色列的修理工，他工作的地方只有几台打字机，后面都没有人——所有机器都是自动的。1970年圣诞节前，两个从前在快餐行业工作的男人租下了第九层，开了家按摩疗养所。

他们把裂缝的墙贴上富美家木镶板，地上也都铺了地毯，因为地板缝里全是生锈的别针和针头，是从前在这儿工作的服装工人丢下的。他们在电梯间附近盖了间接待室，里面放着一张荷兰式现代风格的桌子、带靠垫的转椅、一套音响、一张大咖啡桌，桌上放着《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接待室后面，他们造了一间淋浴室、一间桑拿室，还有四个小型的私人按摩室。每间屋里都有一张按摩桌，床头柜里放着按摩用的酒精、油、滑石粉和盒装的舒洁纸巾。

然后他们在《村声》和其他报纸上登了广告，招聘女性来当“人体模特”或是“女按摩师”。他们希望至少招八到十个女人以配合日程安排，这样在中午、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等繁忙的时段，至少能有四个人在四个按摩室里值班。由于按摩疗养在纽约还算是新生事物，警察也还没有将其列入打击卖淫的名单，有几十个毫无戒心的年轻女人应广告而来，以为是去摄影棚或是健康俱乐部工作；可一旦意识到这工作就是往男人的裸体上抹油，还要面对他们的勃起和挑逗，她们就扭头去找别的工作了。

可是还有些女人，经过了60年代的性解放，对这种工作不会大惊小怪。她们面对陌生人的裸体不会尴尬，很少受到50年代早期道德的约束，不像她们保守的母亲。受雇的人里，有在纽约上大学、打工挣学费的学生，有辍学的人，有开始上年纪的佩花嬉皮士，还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认为比起辛苦做服务员和秘书，按摩工作要轻松、好赚得多。其中一个申请人，之前就是七层《怪物时代》的秘书，被编辑解雇之后，走上两层楼，就当上了按摩师，每周的工资涨了两倍，到了350美元。

按摩疗养所的成功给楼里带来了新的社会元素——紧张兮兮的中产阶级商人，鬼鬼祟祟地来，急匆匆地走，使楼里不祥的空气愈发浓郁。十层上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头发花白的极端左派，大萧条期间联合广场上闹抗议和游行那会儿，他们的革命热情就达到了顶点，对于按摩疗养所的成功，他们格外地看不顺眼，不光因为这些人是在性爱方面是刻板的清教徒，而且他们也知道，楼下有这么家准妓院，这地方肯定会臭名远扬，招来警察时常拜访和靠找茬为生的市督察员。楼里面已经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准备租下第九层，电话里总有人威胁要放反共炸弹，人行道上还有充满敌意的罢工纠察，这些上年纪的党员无疑是被害妄想最严重的，电梯里那些一言不发、抿着嘴唇、穿着保守的男人，说

不好就是联邦探员。

唯一欢迎按摩疗养所房客的是《搞》的男性员工，他们可以随时去泡桑拿，而且还能以折扣价选一位裸露上半身的女士，让她为自己按摩并爱抚至高潮。反过来，员工们也会写赞扬疗养所的文章——疗养所的名字叫“第一体验”，《搞》还会登疗养所的付费广告，写着联系电话和营业时间，吹嘘女按摩师的神奇手法和带来的销魂快乐。

很快，《搞》的广告栏里就有了纽约其他疗养所类似的宣传，有些还贴出了裸胸的女人照片，一群抛着媚眼、姿态诱人的女学生和臀部丰满的交际花，暗示顾客只要出按摩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她们。可是《搞》不久就接到了读者投诉，说有些是虚假广告，有些按摩师在收了25或30美元之后，将顾客挑逗至欲火难耐的状态，却拒绝为顾客服务，除非再收至少15美元的小费；还有人投诉说，有几个按摩师不论出价高都固执地不肯碰男人的生殖器，理由是这样做违法。

整个纽约市、整个美国对法律的阐释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道德究竟允许私人按摩室里发生哪些事情。曾经有过具体的市县法令，禁止按摩师为异性服务，然而“二战”爆发后，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规定就不起作用了，有越来越多的护士和其他女性医护人员为伤兵治疗，按摩行业也主张自己不分性别、对病人和顾客进行治疗的权利。按摩行业认为，拿了神经学和病理学学位、对人体肌肉组织有足够了解、持有执照的按摩专家，没理由不能像足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那样，依照道德治疗异性病人；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按摩业多年来强烈抵制的事实是，按摩从业者——其中很多人都是美国按摩与治疗协会受尊敬的成员——的执照是由城市健康委员会颁发的，该协会还颁发理发师和化妆师的执照，而不是由给各类医生护士发行执照的纽约州教育厅颁发的。

然而到了1968年，在专业按摩组织的不断游说之下，政策发生了变化——专业按摩师被重新分类为医务人员，从业许可由奥尔巴尼教育厅颁发；每一个按摩学生拿到学位之前，需要在特殊学校经过500小时的学习，并通过全国综合考试，检查其按摩技术和对人体肌肉及神经组织知识的掌握。

考官还要确保学生了解该行业的道德规范，包括一定要给躺在按摩桌上的人盖上块毛巾或床单以遮住生殖器，避免与女性胸部有直接接触等。考官的这些劝诫并未被过分强调，因为“二战”后美国允许异性按摩服务的很多年里，鲜见按摩师不端行为的报道。

这可不是说，按摩桌上就没有不当行为；事实上，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某些拿执照的按摩师，包括一些中年发福的女按摩师，她们粗壮的身形好像激不起什么浪漫的幻想，可是也愿意答应男性客户或患者的性要求，只要他们口风紧，值得信任。鉴于此类性接触的内容基本就是用手，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的按摩师还认为，令人放松的按摩就该以这种健康的方式达到高潮，而且都是依从客户要求秘密进行的

——客户不仅喜出望外，还会付额外的小费。按摩组织虽然表面上从不容忍性接触，但也不想暴露某些从业者的不法行为，医护组织也同样不想让自己圈子里的违规操作公诸于世。几十年来，医疗圈内已经尽人皆知，某些著名医师违法为特权客户做人工流产手术，心理医生有时与沙发上的女病人偷偷幽会，住院的男病人行动长期受限制、焦躁不安，值夜班的护士和女医生便在夜里为他们缓解性焦虑。

实际上，这种慈善性质的行为，男人们都怀着感激，并认为它是复原过程中的一剂良药。水到渠成地，这些为病人按摩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们成了疗养所的第一批女技师。50年代末60年代初，按摩疗养所在西海岸的小城市和镇子上悄悄地兴盛起来。这些疗养所实际上就是按摩室，一般都设在专门租给外科医师、牙医、足病医师、皮肤病医师和其他医疗人士的商业大楼里。乍一看，按摩室也很像是诊疗室——大门是白色的，上面装着磨砂玻璃，玻璃上印着黑色的小字“物理疗法”或“按摩”，还有医师的名字。房间内部就算不是无菌环境，也很卫生，家具都整洁干净；墙上挂着镶框的羊皮纸按摩执照和物理治疗学位，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边上装饰的花体字和小天使可一点不假。后屋里有这行常用的按摩桌、淋浴间、成堆的白色毛巾和瓶装润肤露，常常还有涡流按摩浴缸，桑拿间和减肥设备。

只有预约过的客人才能进入，按摩师都是精心打扮的女人，穿着护士服，给桌子上的裸体男人按摩时再穿一件白色罩衫。享受全套按摩，再让一个穿白袍的专业按摩师抚慰自己，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是色情程度很高的体验，干净无瑕的环境尤其带来罪恶感，也满足了男性青少年时期与保姆、学校护士、多明我会修女狎昵的幻想，现实中，这些女人不会出现在按摩室里，手指上沾着油，娴熟地抚摸着勃起的下体，直到它喷薄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或纸巾上。

数十个男人每周光顾这些女按摩师，多年来按摩业长盛不衰、没受到法律制约，一半因为政治家和执法官员们是这里的常客，一半也因为女按摩师很守规矩、严守秘密。全身按摩每半小时的价格很少超过15美元，而且一般不收小费。她们只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在“按摩”一栏下寥寥写几行字，上面只有营业时间和电话。顾客也着意保护这些技师的生意；有不少男人真心相信自己是唯一接受“特殊服务”的顾客，即使是没那么天真的顾客，也不会城里四处炫耀、传播自己的按摩经历。去过花天酒地的妓院后男人也许会兴高采烈，有了婚外情可能会同朋友讨论，大白天预约一个假护士抚慰自己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承认这种事可能会被说成绝望可悲，或是有变态性癖；这事儿和新奇的冒险也扯不上关系。要付钱给女人，要她做男人也轻易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被人说愚蠢，不过按摩室的常客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像其他男人，能独自对着《花花公子》之类杂志上的女性照片轻松自慰，去按摩的男人喜欢共犯，想要一位外表值得尊敬的女性相陪，帮助他减轻罪恶和孤独，来完成这最为孤独的爱之行为。

接受按摩的男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典型的秘密幸存者：他有工作

能力，对妻子和家庭都还满意，人到中年，他想寻求不同性爱的刺激，又不想卷进复杂的情爱关系，觉得精神和经济上都消耗不起。他太老了，不能去单身年轻人的聚会；反应太慢，不能在附近酒吧里让不满足的人妻垂青、免费做一次爱；他也远远躲开站街妓女，不去廉价旅馆里做下流而可能染上病的勾当；甚至应召女郎和靠着夜晚生意挣钱的女人，即巴尔扎克所谓“双腿间的财路”，他也不去她们装潢精致的闺房。

这样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欲望与罪恶、躁动与谨慎的冲突间忧烦不已，性爱按摩简直就是抚慰心灵的万能药；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伪装成医疗机构的按摩室，可以找到穿白袍的人工理疗师，用他妻子不会，或他不愿让妻子用的方式触摸他、满足他的欲望。

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这类私人服务开始公开化，按摩的世界里也起了变化：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企业家加入了该行业——他们还在药店里卖大麻卷、瑜伽书和其他让人离苦得乐的商品，开起了时髦的按摩疗养所和裸体摄影室，就在大街上公开营业。疗养所的大门口和橱窗里，毫无顾忌地挂着“姑娘随心选——活色生香的裸体模特”，人行道上还站着长发的男人，往男性行人手里塞宣传单，上面暗示了店里的额外服务。

宣传单上并不直接许诺顾客有性高潮的服务，不过保证有“无上装按摩师”进行“性感按摩”。一开始，这种宣传没有受到执法机关的反对，因为1970年，美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有条件接受了性感按摩和展示裸体的合法性。百老汇舞台上的《毛发》和《噢！加尔各答！》中出现了全身裸体；几个城市里也允许开设无上装和无下装的酒吧，至少目前是这样。著名的艾萨伦疗法，就是由晒得黝黑、漂亮迷人的裸体男女按摩师给加州水疗的顾客身上抹油，已经出了带插图的书和手册，其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这种疗法，在全国销售；电视脱口秀上，受赖希影响的理疗师和作家大力推荐情色按摩，称其能改善夫妻关系。在性爱诊疗所，女代理们挑逗、爱抚那些“不举”的男人，使他们达到高潮；而性爱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则接受培训，学习用爱抚生殖器的技巧和互相抚摸来刺激性伴侣，也学习如何时不时在振动器和人造阳具的帮助下独自自慰。在美国许多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上，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自慰不再被描述成羞耻、可悲的行为。

虽然新疗养所外头挂着霓虹灯和炫目的招牌，让有执照的按摩组织心里很不高兴，可这些组织者也不急着谴责他们，因为某些不守规矩的护士私下里早就这么做过。警察也有理由无视这些疗养所；他们多年来挥着警棍和年轻人起冲突，跟着就是在法庭上被指控暴力执法、在媒体上臭名远扬，因此他们也避免冲动行事，不会随便突袭疗养所，而有关按摩的法律自1970年起一直含糊其辞。

年轻企业家可谓生逢其时；相关法律模糊、享乐市场不断扩张，性解放影响的女人越来越多，有着60年代剧变带来的自由精神，又还没工

作，拿着抚摸男人下体挣来的钱，她们也毫不内疚；对年轻的疗养所老板来说，初期投资很小——只需要在商业区的商店二楼或三楼租一个月房间的钱，再雇个新手木匠在屋里竖几块板子，隔开接待室和几间房间，有的用作按摩，偶尔也用来拍裸体照。装修也不贵，用旧货店里的沙发、椅子和旧的前台桌就行；二手的按摩桌和行军床，盖着印度风格印花的床单；墙上装饰着花里胡哨的海报，或是满眼碧绿的油画——很可能是嬉皮按摩师去乡间公社待了好久，充分享受了宜人的隐居生活之后回到城里来画的。虽然70年代开设第一批疗养所的年轻男人里，有些真的在公社里住过、对和平运动有感情，可在愉快的举止和刺绣牛仔服的下面，是追名逐利的热忱：这些“逍遥骑士”，上大学时就倒卖轻量毒品，现在则以同样轻松自如的姿态贩卖轻量情色。

纽约市里公开繁荣的第一拨按摩疗养所里，有一家叫“粉红兰花”的，在第三大道附近的东十四街200号，老板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个毕业生，亚历克斯·舒布和丹·拉塞尔。舒布很害羞，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个有野心的摇滚乐手，木工活做得也好，建疗养所的时候，他就用上了这门手艺，拉塞尔更外向一些，是疗养所的主要经理人和筹办人。

粉红兰花甫开业，很快红火起来，1970年夏天，每天平均接待40名顾客，两个年轻人便多雇了些人，也和别的疗养所合作开展生意——比如西二十三街上的芳香花园，和邻近五十七街的列克星敦大道模特工作室；亚历克斯·舒布有时也有偿去帮助其他年轻人开设疗养所。

舒布为一个朋友、迪金森州立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列克星敦大道和二十六街上“秘密生活”里四间淡紫色、灯光暗淡的按摩室；还有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学生，是他的熟人，在上城有两家疗养所，分别是“东方城堡”和“西方城堡”，舒布将墙四面都贴上白色的塑料，边缘凹凸不平，营造超现代洞穴的气氛，像是太空胶囊损坏后的残片。在五十一街附近的第三大道上，舒布建造了“中洲世界”，老板是个中途退学的学生，十分迷恋托尔金的小说，疗养所是嬉皮社区的风格，有串珠窗帘、马德拉斯抱枕，屋里还有熏香。

与这些地方竞争客人的有东十八街12号的“舞台工作室”，招牌是“年轻的演员模特”提供的特别服务；西三十四街440号的“34疗养所”也承诺说：“五个年轻漂亮的大学女生——您中意的那种”。

作为工资，所有按摩师可以拿到每次按摩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小费，她们一周依所选的工作时长，平均能赚300到500美元。每家疗养所都有下午班和晚班，女按摩师的日程也都可以调整。忙事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经常和其他按摩师换班，或是请病假去参加试镜。疗养所里屋、靠近按摩师休息室的地方也有投币电话，让她们能随时和经纪人保持联系。

还在上大学的按摩师——比如在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亨特学院，不忙着接待客人的时候，就在接待室里看课本；其他的按摩师——充满冒险精神、离了婚的年轻女人，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不想做“呆板”办公室工作的法国姑娘，“白日美人”^[91] 妻子们，疗养所主人的女朋友，还有漂亮的拉拉和双性恋女人（疗养所能为她们介绍其他做按摩的姐妹）——都在接待室里打发等待的时间，互相聊天，读读杂志，在地板上练练瑜伽，或是在角落里冥想，全不顾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音乐声和经理桌子上的电话铃声。

如果经理暂时不在接待室，由女按摩师接起了电话，她有时会听到电话那头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或是语无伦次的荤段子——所以大多数疗养所只让男经理接电话。经理除了向客人收钱、把每位顾客送进单独的按摩室、过了25分钟就按铃提醒按摩师半小时的疗程即将结束，有时还要充当保镖；可是基本上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很少有顾客会闹事。几乎所有光顾按摩室的男人都礼貌周全、性情羞怯，很多人是穿西装、打领带来的。他们走进门来，有时还拿着在路边收到的宣传页，坐在桌子后的经理便来迎接他们，站在一起的按摩师们也会微笑。顾客把钱付给经理之后，选一位中意的按摩师，她会陪着他穿过走廊，进入一间按摩室，手臂上搭着条从壁橱里拿的、上过浆的床单。

等关上门、把床单铺到桌子上，她便站在一边等男人全部脱光，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大多数的疗养所经理都相信，即使顾客不巧是个便衣警官，因为他自己先在按摩师面前暴露了身体，也不能指控按摩师不道德；这种设想在法庭上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不过疗养所都是照做不误的。

虽然大多数顾客的岁数都可以做女按摩师的父亲了，性爱按摩开始之后，两人的角色却奇妙地发生了倒转：掌握权威的是年轻女人，她有权力给予或否定快乐，而男人们顺从地仰天躺着，闭着眼轻声呻吟，任人往身上擦婴儿油和爽身粉。对这些男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和如雷贯耳的青年性解放运动有亲密接触，这是伍德斯托克和避孕药的世界；等他们成了疗养所的常客，和按摩师混熟了，便开始对自己也帮忙制造了的这疏远的下一代有所了解。

反过来，按摩师也看到了不少中年男人的沮丧无奈，他们的婚姻困境、工作问题，他们的幻想与不安。有些人特别紧张，躺在按摩桌上浑身发抖，水洗似的出汗。有些人没法高潮，要么是不能勃起，除非按摩师对他表现出个人的兴趣，恭维他身材好，保证他的性器和其他男人一样大，或是更大。有些人罪恶感太强，无法体验到最大程度的快乐，除非按摩师遵照他的要求，一边抚摸，一边口头训斥他，就像他还是学生、被抓到“自虐”的时候被斥责、批评的样子。

还有最近离开宗教职位的顾客，想要适应第一次被女人触摸；正统派的拉比用避孕套或夹层袋套住阳具，认为这样就没有肉体接触了。还有身份尊贵的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和按摩师谈别的服务的价钱，解释

说自己的妻子不肯这么做；蓝领的工人也很享受这项服务，可坦承自己绝不会对妻子提出这种要求。

拄着拐杖的老人、鳏夫和离婚男人，当代的布朗宁叔叔，他们都在疗养所有定期预约，有的还在橱柜里存着平日爱喝的威士忌；还有健壮的年轻男人，一次叫两位按摩师，付双倍的价钱，在半小时中享受三次高潮。有一天，一个特别害羞的人，亚瑟·布雷默，穿着带马甲的西装，出现在四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维多利亚按摩室”里，可是他太过紧张，直到疗程结束都没有高潮。一个月后，马里兰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他开枪打中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W.华莱士，导致其瘫痪。

有很多浪漫的男人频繁光顾按摩室，有时还会爱上女按摩师，可要是哪一天来早了，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房间里，他们脸上就掩不住失望。二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秘密生活”里，有位常客是哈佛毕业生，新近离了婚，在曼哈顿做心理医生，他熟悉的按摩师是位金发美女，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为《外观》杂志做过模特。经过按摩室里许多次性爱服务，两人开始在外面约会，一年之后就结了婚，搬去了佛罗里达。

没多久，几个赞助过疗养所的商人——疗养所资金不足、条件简陋，连淋浴室里的基础设施都难得齐备，让他们很不满意——开始搭建自己的疗养所，场地更大，有模塑成型的塑料椅子、空调、新按摩桌、蒸汽室、桑拿室、紫外线灯、轻音乐，还能用信用卡结账。第一家这种特许经营的现代疗养所叫“第一体验”，在布朗宁叔叔旧楼的第九层，老板以前是快餐行业的；可不到一年，就有几家别的疗养所的舒适度和设备超过了它。《搞》的总编阿尔·戈尔茨坦去过所有这些疗养所，开始在报纸上为蓬勃发展的按摩行业开设每周鉴赏专栏——从此他便可以声称，每次愉快的高潮都是在为税收做贡献。

戈尔茨坦的打算是，悄悄拜访城里不论新老每一家疗养所，和其他顾客花一样的价钱；他感受不同按摩师的手法，在脑中记下每家的卫生状况和经理人员的服务态度，然后在《搞》上为每家疗养所写一篇简介，再依一星到四星为其打分。

1971年戈尔茨坦开始这项工作时，纽约的疗养所还不到12家，可到了1972年末，疗养所的数目已经超过40家。戈尔茨坦听说每家的服务和价格都不一样，甚至每天都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摩师的心情以及她和顾客的契合程度。比如第十四街上的“粉红兰花”，他去的时候又热又挤，淋浴和空调一概没有，戈尔茨坦花了14美元，叫了一个穿热裤、浅黑肤色、闷闷不乐的女人为他按摩；说了会给她15美元小费之后，她敷衍了事地用手和嘴服务了他一回，途中一直在看表。《搞》的下一期里，戈尔茨坦给“粉红兰花”打了一星，描述为“不推荐”。

第五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法国小姐疗养所”就不一样了。老板是三个以色列人，疗养所里共有七个房间，装了空调，有小吃吧台，

接待室里还有投影仪往墙上播放彩色的色情图片。戈尔茨坦花了20美元做按摩，后来又给了25美元小费，换来了在水床上与一位离了婚的26岁女人做爱，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住在康涅狄克州的城郊，还说周末会去那边兼职卖房子。她亲切友好、容易相处，戈尔茨坦便给“法国小姐”打了三星——“推荐：该类型服务中的佼佼者”。

第三大道835号砖砌大楼的二层是“中洲世界”，戈尔茨坦付给经理18美元，挑选了一位蓝眼睛、浅黑肤色的按摩师，她头发又长又直，肤色光洁，脖子上戴着玫瑰十字架。她说话不多，举止优雅，在按摩室里很快让他勃起了。她的手很漂亮，手指细长，好像很喜欢这件工作，爱抚他时，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勃起的下体，无疑知道很多男人喜欢看女人熟稔地爱抚这个陌生的物件。他几乎不能再忍受，想要把它放进她嘴里；可他开口提要求时，她礼貌地拒绝了，说“中洲世界”的规定严禁这样做——只允许“手动释放”，这是包含在按摩价格里的，不需要额外付小费。然后她吐露说，按摩室墙上的小块镜子其实是单向玻璃，让经理能观察屋里的情况，确保没有违规行为。知道了这个秘密，戈尔茨坦的好心情顿时跌到谷底，与这位按摩师的亲密感也消失了；他很享受这次过程，可是只给“中洲世界”打了两星。

后来他去大一些的按摩室，也能看到许多镜子，有的按摩室一整面墙，甚至天花板上都是镜子，他不舒服极了，不仅因为可能有个窥视癖的经理在后面偷看，而且他也不想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裸体躺在桌子上的肥胖身躯。

东四十六街219号是家豪华的仿古罗马式疗养所，叫“恺撒隐居地”，里面有不少镜子。不过戈尔茨坦的注意力都被穿着古罗马托加袍的按摩师吸引住了，她举止格外放纵，克服了他的难堪感觉；最终他为“恺撒”打了四星。纽约没有哪家能和“恺撒隐居地”比肩的，老板显然花了几千美元——他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当过股票经纪人，叫罗伯特·沙拉加，装修了许多私密按摩室、桑拿房、涡流按摩浴室、石膏塑的罗马式雕塑和喷泉；顾客在接待室等待时，可以喝到免费香槟，按摩油也是温热的香精油。一般按摩价格是20美元，不过多出钱还能买到其他服务，客人花100美元，就能和三位开放的女郎一同洗香槟浴。

戈尔茨坦调查过纽约的疗养所之后，便在全国旅行，发现全美国都在心心念念着情色按摩——它就是性爱的快餐业，力比多的营养品。在华盛顿城郊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滴答滴答”按摩疗养所就开在购物中心里。达拉斯、亚特兰大、夏洛特都有疗养所；在受戴利控制、天主教气氛浓郁的芝加哥，南沃巴什街的商业区也开了一家疗养所，内部装潢仿照教堂的装饰。经理的小接待桌在一间重达600磅的哥特式木质忏悔室里，是从拆除了南区教堂的公司买来的；疗养所里还有祈祷用的长椅，和别的基督教物品，还有华丽的硬木书架，上面摆着最露骨性爱杂志和假阳具。

为了保护疗养所不受警方渗透，老板规定疗养所是私人会员制，顾

客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还要签一份文件，声明自己不隶属任何执法机关——顾客不仅要签字，还要在忏悔室前大声读出来，全不知自己已被隐藏麦克风录了音，忏悔室里挂的紫天鹅绒帘子的褶皱里也藏着摄像机，记录下了他的面容。这个小心谨慎的疗养所老板，叫作哈罗德·鲁宾；戈尔茨坦走进疗养所、要求按摩时，鲁宾热心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搞》的忠实读者，还坚持让戈尔茨坦以内部价享受两位按摩师的服务。

在洛杉矶，戈尔茨坦看到，沿圣莫妮卡大道和日落大道有几十家疗养所，有些还是24小时开放。洛杉矶最有名的疗养所——老板是42岁的马克·罗伊，以前是亚瑟·穆雷舞蹈中心的教练，后来开过几个女士减肥沙龙，发了财——叫“马克西莫斯马戏团”，占了一幢宽敞的三层宅邸，离日落大道半个街区远，在拉谢内加大道上。房子的停车场能容纳80辆汽车。像纽约的“恺撒隐居地”一样，“马克西莫斯马戏团”的内饰也有罗马享乐主义的气息；30位按摩师都穿着紫色、金色或白色的织造迷你托加袍，疗养所的广告宣称：“自庞贝时代后，男人从未有过的乐趣”。

距日落大道半小时车程，马里布海滩上方托潘加峡谷静谧的山峦里，戈尔茨坦拜访了一家名为“极乐园”的裸体主义“成长中心”。这地方有七英亩远离喧嚣的可爱土地，在四周的树木和高高的篱笆后面，裸体的成员可以互相按摩，或接受专业人员的按摩。就像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一样，“极乐园”也为会员和客人安排日程，提供“觉醒”讨论会和心理治疗项目；不过和艾莎林不一样的是，“极乐园”的主要功能是享乐，除了游泳池和桑拿房，还设有网球场、骑马场，主楼里还有半私人的房间供人们做爱。

戈尔茨坦之前在《搞》上登过“极乐园”的照片，亲眼见到后愈加印象深刻。他采访了这里的创始人，艾德·兰格，高个子、身材健硕的前时尚摄影师，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52年前，兰格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保守的德国家庭里，在学校运动出色，可是内心强烈向往脱离群体、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自从30年代末偷偷买了第一本《阳光与健康》杂志开始，兰格就迷上了裸体主义；40年代他搬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舞美设计和自由摄影师，为《时尚》和《时尚芭莎》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先锋裸体主义俱乐部，有时还被警察突袭。50年代中期，他在俱乐部里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妻，约瑟夫和黛安娜·韦伯，接下来的15年里，黛安娜·韦伯在全美杂志上的照片都是由兰格拍摄的。后来，他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发表了这些和其他裸体照片；买下建造“极乐园”的土地也实现了兰格的夙愿。

戈尔茨坦来的时候，兰格正在与洛杉矶县的官员争论，那些人想要根据当地的分区制法令关闭他的社区，认为这项法令禁止区内的裸体主义小组进行集会。提到的团体不光是“极乐园”，还有附近一个在托潘加峡谷山里的“成长中心”，叫“砂岩隐居地”的。“砂岩”占地面积15英亩，成员有几对裸体夫妻，都是支持公开的性自由，追求消除占有欲和嫉妒心的。“砂岩”的主人叫约翰·威廉森；那几对夫妻里就有约翰和朱迪斯·布

拉洛。

约翰·威廉森成为朱迪斯·布拉洛的情人之后不久，就辞去了电子公司合伙人的职务，以15万美元售出了股票，付了山中一处隐居地的首付，作为他情爱小组的活动场所。这地方比太平洋面高1700英尺，在圣莫妮卡山的山脊上，离马里布海滩8英里，从洛杉矶市区开车过来要一小时；要从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直接过来，开车的人需要开过狭窄、弯曲的小路，沿途是震慑人心的、险峻的美丽景色，这条可怕的路蜿蜒而上，越过山谷中盘旋的雾霭和倾斜的树顶，直延伸到陡峭的悬崖边上，然后突然调转方向，伸进山腰黄色的乱石中间，又曲折地转出来，冲向无遮无拦的公路边，它一忽儿猛地扎进山里，一忽儿又回到开阔的天空下，让司机一不小心会坠崖的危险——这是段横冲直撞、令人头晕目眩的路，只有想到旅途尽头性爱的快乐，才能勉强忍受。

“砂岩隐居地”建在山南，通往这里的私人道路有两根石柱标记；主建筑离大门有1.25英里远，是一栋很大的白色两层房子，坐落在宽阔的混凝土台基上，周围是桉树和蕨类植物，还有个带小瀑布的池塘，房前的草坪修剪得特别整齐，可以作高尔夫球场用。从二楼的红木露台上，可以看到太平洋海岸线，点点白色的帆船，还有卡塔特莱岛雾气弥漫的轮廓。庭院后面，岩石嶙峋的地面升得更高，盖着小些的灰泥房子，门口都有木头台阶，还有一座很大的、有玻璃门的建筑，宽阔的屋顶下是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供人们在里面裸泳。

“砂岩”占地有15英亩，周围的土地在山腰上延伸出去几英里远，这片地方原来归富裕的农场主和莱娜·特纳这样的好莱坞明星所有；可是1968年，威廉森随着房产经纪人第一次来这地方时，看到的只有荒凉破败，建筑都灰头土脸，土路颠簸不平，山上滚下来的石头、被太阳晒硬了的土块，都挡在路上。最近的杂货店在下面的山谷里，有几英里远，托潘加的购物中心又土得掉渣，是嬉皮士交易毒品、穿皮夹克的摩托飙车族聚会的地方，主路上总有十几条皮包骨头的野狗无精打采地晃悠，开车的人得使劲按喇叭，它们才不情愿地躲开。

威廉森第一次对小组成员展示“砂岩”活动场地的时候，大家一点儿也不满意；这地方太偏远、太破旧，要把房子收拾得能住人、把损毁的道路修好，还需要做上几个月的苦工。

可威廉森还是买下了这块地方；他想方设法激发成员们的冒险精神，唤起他们远离城市中狂怒、屏障和限制的愿望，慢慢地说服他们，这就是建立性感乌托邦的理想之地。威廉森很顽固，说服力超强。他和过去建立乌托邦的人一样，不满于周围的世界。他认为美国的现代城市生活会摧毁人的精神，宗教组织就是诈骗的天堂，联邦政府组织累赘、人员腐败，挣工资的普通人税负沉重、很容易被替代，只是计算机化社

会里互不相干的一员而已。

威廉森的追随者中，除了几个人，都有这种悲观的态度。像他一样，他们也在体系里工作过，发现了体系的局限之处，而且也都想从个人生活和婚姻的乏味无聊中逃离出去。大多数人都至少离过一次婚，都是在压抑或不稳定的家庭中长大。奥拉利亚·利尔是七个孩子中最大的，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墨西哥裔家庭，她努力逃脱贫困和家里年长男亲戚的性骚扰，打工在洛杉矶念完了专科，结果只是陷入了不幸的婚姻，和一连串公司秘书、前台接待一类的无聊工作。阿琳·高夫出生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父亲是职业军人，她是个“随军小鬼”，从小就随着父母辗转于各个军事基地，16岁时怀孕，30岁前结了两次婚。红头发的盖尔是在中西部一个信奉苦行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27岁时第一次和未婚夫有了性体验，之后母亲就送她去神父那祈求宽恕。工程师戴维·施温登，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做着不满意的工作，父母住在俄亥俄州的小镇上，疏远而保守，他单调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在《花花公子》的拉页里，或者晚上溜到邻居家的窗户外面，偷看那家年长的漂亮女人。

威廉森小集团里的其他人也都有着相似的卑微背景：他们大多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在以年轻人为中心的60年代过得无声无息，对伴侣也并不忠诚尽心，生活从没有太多的意义，也不抱自我提升的希望，直到遇见威廉森，被引诱进他的情爱大网。在妻子的帮助下，威廉森将性自由作为联结自己与他人生活的手段，将他们囊括进团体婚姻，认为这样可以有效满足他们对爱意、情感支持、献身于更高存在的需求，还能给予他们之前缺少的家庭温暖。

“砂岩”里有居住区，环境比他们在城里能负担起的要奢华不少；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责，不过威廉森鼓励男人和女人抛弃传统观念，分担厨房里的杂活和户外更偏男性的活计。晚上，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威廉森会带着关注和耐心，听成员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和焦虑；他是心理医生和教师的结合，对男人是领导者，对女人则是情人。

现在圈子里的五六个女人，他全都追求过，他也将自己的妻子分享给其他男人，营造彼此宽容、认可的气氛，从而在小组内实现性开放，他坚信自己正在建立一种小众文化，很快就会吸引更多相信平等关系的夫妇前来加入。

约翰·布拉洛则不然，他对威廉森的计划一直不甚看好；他继续与威廉森的小团体来往，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朱迪斯拒绝离开。她敬畏威廉森，坚持要经常与他做爱；她支持威廉森的计划，因为这计划主张给女人更多自由，而且谴责双重标准。朱迪斯多年来在圣费尔南多谷做郁郁寡欢的主妇，现在终于找到了身体和意志都愿意参与的事业，约翰·布拉洛也看出，要是还想挽救自己的婚姻——他的这种愿望现在格外强烈，一半是因为需要自我满足，那他别无选择，只好和小组保持关系，指望朱迪斯对威廉森的迷恋只是一时头脑发热，是情绪多变、性格不安定的症状。

同时，布拉洛与小组交往也有自己的方式：他很享受威廉森周围的女人们愿意与他做爱——芭芭拉、阿琳、盖尔，后来他终于也和异域风情的奥拉利亚做了爱，可是同时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回应威廉森的期望。其他男人有的辞职、有的不再上班，全天和威廉森一起在“砂岩”生活、工作，可布拉洛每天还继续去纽约人寿办公，每天晚上才回到主屋里，与朱迪斯和其他人一起吃晚餐或喝酒，而白天里众人已经擦过地板、粉刷过墙壁、劈好木头、修剪过篱笆，威廉森和戴维·施温登也已经开着两台推土机碾过车道，挪开石块土堆，把路基推平。

虽然砂岩建好后，布拉洛把谷里的房子租了出去，却没有跟其他夫妇一起把家当搬进来，他租下了附近托潘加山谷里的一个牧场，对威廉森夫妇解释说孩子们还太小，不能接触砂岩这种成人的自由；虽然他和朱迪斯也请了建筑师，准备设计不久后在砂岩高地上盖的房子，布拉洛心底里却从没打算做到这个地步。现在，他计算着时间，暂时放纵妻子新学来的女性主义，参与主屋里小组的裸体集会和享乐，试图隐藏他对威廉森日渐加深的敌意和妒忌，这个安静、结实的金发男人正掌握着朱迪斯，作为他自己情爱的人质。

可是有一天晚上，经过一天酷暑天气里的重体力劳动，众人正在主屋里裸身休息，布拉洛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他傍晚从办公室开车上山，心里不断琢磨着威廉森对小组成员的控制力，认为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和活力，而是他利用了这些人生命中巨大的空虚感。

布拉洛想到，大多数人天生就要服从，迷茫的人想受人指引，任何理论家、神学家、独裁者、毒品贩子，或是好莱坞精神领袖只要许诺给他们即时见效的药方和办法，他们就会轻易上当、听信这些人的话。加州这个时髦、无根的地方尤其容易接受新鲜的观点，一个有些远见的人，有强劲的意志和决心，又能聪明地保持自身形象模糊神秘，就很容易让其他人把心目中理想和美好的品质加在他身上，早晚都能吸引到一票追随者。布拉洛认为，威廉森就是这类人，支持无视罪恶、拥护享乐。威廉森赞美自己的追随者，管他们叫“改变的人”，说他们有改变他人的能力，他们自己也已经成了威廉森性理论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布拉洛不情愿地承认，目前威廉森确实改变了朱迪斯，可他怀疑这种忘忧果式的生活对深山外面广大的市场能有多大吸引力——而威廉森恰恰打算要将其推而广之；他的终极目标是贩卖自己的哲学，在媒体上宣传砂岩项目，吸引某些夫妻付一定的费用，拜访“改变的人”，分享他们的快乐，并可能转变想法。威廉森就是肉身的古鲁 [92]。

布拉洛也知道，威廉森不会同意他把砂岩的目标说得这样低俗，可这个炎热的晚上，他才不在乎威廉森想什么。他把车停好，走进主屋，看到朱迪斯裸体在露台上斜躺着，靠着威廉森，裸体小组其他的人正静静地客厅里聊天，没人注意他。

他脱下衣服，挂在前门附近的衣柜里，走向露台，却又停下脚步，因为他听到芭芭拉正含讥带讽地说，他每次都能恰好赶在白天的活儿都

完了的时候来，真是神秘——他便突兀地大声回敬：“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芭芭拉？今晚我不想听你废话！”

芭芭拉微笑起来，好像很高兴能轻易激怒他；可露台上仰卧着的约翰·威廉森翻了个身，用胳膊撑着半坐起来，看着布拉洛不快地问：“你为什么从不肯抛开膨胀的自我，好好听她说话呢？”

“因为，”布拉洛说，“我不相信她 是什么识人专家。她该花时间解决自己那一大堆问题，别来唠叨我。”

威廉森默默地摇了摇头，好像在说这问题太傻了，不值得讨论；可布拉洛朝下死盯着威廉森，愤怒地继续说：“你怎么不让她自己说话？没了你伟大的支持和指引，她就站不起来了是吧？”

威廉森站了起来，客厅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很不安，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无礼地对威廉森说话；朱迪斯也站了起来，手抓着威廉森的胳膊，与他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丈夫。

“芭芭拉能照料自己，比你强太多了，”威廉森坚定地宣告，脸气得通红，“你无时无刻不担心失败，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大家已经辛苦工作了几个月，打理这块地方，这样才能开始赚钱、支持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可你只会操心自己那点可怜的、狗屁不如的自尊。”

“你真他妈说对了，我还就是操心自尊，”布拉洛喊道，“因为在你的专业指导下，这个倒霉的小组在全天候努力毁掉我的自尊——还有家庭。你人生中最大的刺激恐怕就是干别人的老婆吧。好像干你自己的老婆没什么乐趣是吧！”

威廉森严厉地看着布拉洛，说道：“你只是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与其他人交流，不能忍受她个人的成长。你宁愿把她锁在柜子里，自己继续在外面做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这不就是你困境的源头吗？”

没等布拉洛说话，威廉森就大跨步地从他身边走开了，朱迪斯紧随其后，留下布拉洛自己站在露台的玻璃拉门处。他感到心跳得厉害，恐惧又有些自得。他挑战了威廉森，之前他没有勇气这么做，可现在，他看着夜空，感到踏实了一些。他走到露台上，有微微的凉风，坐在帆布椅子上。他能看到远处海岸边的灯光，听到草地边上蟋蟀的鸣声。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朱迪斯，至少现在是这样，她对威廉森那样忠诚，确实让他意外，不过他坚信，只要自己愿意，一定能赢回她，如果 自己还愿意的话。这一刻，他也不确定自己的想法。

坐了一会儿后，他听到身后有人来，转过身来，看到是药剂师布鲁斯的妻子，一个意志坚决的女人，胸部小而坚挺。他以为她是来安慰自己的，可她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问道：“约翰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能对他说这种话？”

布拉洛强压怒火，没有答话。他知道，不能继续在威廉森这群荒唐的隐居者中间待下去了。他站起身，走到衣柜旁，开始穿衣服。他注意到威廉森卧室的门关着，能听见屋里有人说话，可他没有和朱迪斯说自己要走了；今晚她得搭别人的车回家了。

他到家时，孩子们和保姆都已经睡了，他累极了，很快躺倒在床上。第二天是星期五，他早早醒来，发现朱迪斯还是没有回家。他有些烦躁，不过并不惊慌。早饭的时候，他对孩子们和年轻的女佣说朱迪斯今天回家，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了。他开车到公司，一天都在忙公事；到了5点钟，他心血来潮地决定，今天要一个人 在外面过夜，留朱迪斯在家担心他去了哪里。

他驱车驶过谷里蜿蜒的公路，开到太平洋海岸高速路上，右转开往马里布海滩。等红灯的时候，他看着晒成棕黑色的年轻男人，与穿着比基尼和冲浪装的女人，他们走在一辆辆汽车面前，穿过马路——他们把颜色鲜艳的冲浪板顶在头上，冲着排成长队的汽车无忧无虑地微笑。布拉洛继续沿着海滩开车，经过了路边搭车的嬉皮士，开下主路，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走下了车。他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留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她很可爱，可是蓬头垢面，似乎疲惫不堪。他走近前去，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去旅馆的咖啡店吃点东西。她点点头，跟在他后面。

他坐在隔间里，帮她点了汉堡和可乐，这时她去了洗手间，回来时虽然精神好了一些，他还是能闻到她身上一股臭味，估计有几周没洗澡了，他便打消了邀请她去旅馆房间的想法。那晚他独自睡下，想着朱迪斯的事，也享受着离开威廉森追随者之后的独立和孤寂。可是，早上一回到家，看到朱迪斯还没有回来，他第一次觉得有点发慌了。

按照日程表，他下午要去海滩，同戴维·施温登和药剂师布鲁斯一起上潜水课；周末保姆要放假，他带上了孩子，因为朱迪斯肯定很想见孩子，会坐布鲁斯和戴维的车从砂岩过来。布拉洛早早到了海滩，把潜水用具从车里拿出来，与孩子们在海边玩。

很快，他看到戴维·施温登的凯迪拉克开进了停车带；车前面坐着三个人，其中没有朱迪斯。除了戴维和布鲁斯，车里还有前天在露台上责备他的那个女人，布鲁斯那不怕人的妻子。两个男人加入了潜水课的学员队伍，对他点了点头，可布鲁斯的妻子一看到他，就转过脸去；布拉洛只能推测，这次肯定是受威廉森的派遣，来阻止男人们与他交谈的，因为她从没上过潜水课。戴维和她丈夫不潜水的时候，她一直待在两人身边，课程一结束，她就提议马上回车里，于是几个人走了。布拉洛看着他们的车开远，越来越挫败，又一次地开始考虑杀掉威廉森。用来复枪应该很容易，只要藏在树林里，等他开着挖掘机上下山的时候动手就行。

他带着孩子们开车回家，还是没有朱迪斯的影子，他忍不住打电话去砂岩找她，虽然根本不知该说什么；他心怀怨恨，觉得她背叛了自

己，可又想同她说话。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响声，他真想挂掉，却听到了芭芭拉的声音。他说要找朱迪斯，芭芭拉却说：“我去问问她愿不愿意和你说话。”

“你去问呀！”他尖锐地说。

没一会儿，芭芭拉回来了。

“她不想和你说话。”

“和她说，我要谈孩子的事情。”

又停了一会儿，芭芭拉再一次说道：“她不想和你说话。”

他想尖叫，想威胁她，可是会吓到隔壁的孩子，于是他挂了电话，努力平息怒气。

傍晚，他做好晚餐，之后与孩子们玩了一阵，送他们上床睡觉，然后又拨通了砂岩的电话，芭芭拉一听是他，就语带不快地解释道：“听着，约翰，朱迪不想和你说话。她正安排照顾孩子的事，大家都希望你别再打电话了。我们今天很忙，都累坏了。”

芭芭拉挂断了。布拉洛呆站着，手里拿着没声音的电话，他浑身发抖，愤怒极了，他感到无助。整个城市都没人能帮他——保险公司的人、家人和朋友都不行。这些年来与他有亲密关系的每个人都受到威廉森的影响，他们会觉得他被戴了绿帽子还得看孩子，男人的尊严和自信都没了。可是，正如威廉森在露台上说的那样，布拉洛陷入这种窘境，只能怪自己不好；他已经享用了不少女人的身体，只是在朱迪斯主张自我独立之后才开始痛苦。

不过在布拉洛看来，朱迪斯的所作所为和自己并不一样；对他来说，与芭芭拉、阿琳、盖尔和奥拉利亚做爱只是为了消遣、找乐子，不牵涉复杂的情感，也不威胁婚姻，而朱迪斯显然对威廉森有了爱慕和依恋——她对这个男人比对自己丈夫还要坚定、忠诚，那天在阳台上对峙的时候，她站在威廉森一边，这也证实了这一点，自打威廉森成为她的情人，她几乎整天要黏在他身边。芭芭拉好像并不在意，布拉洛对此却越来越气恼——其实，光看到那晚他们俩在露台上裸体躺在一起，这一对情侣如胶似漆的样子就让布拉洛痛苦不已，远远超出他愿意承认的程度。开始时，这只是小组里消除双重标准的实验，可现在对于朱迪斯来说，这已经是严肃的恋爱关系。仅仅与威廉森有性关系对她显然不够了；她一定得用浪漫的幻想来美化这关系，让威廉森成为她生活的中心，而这危及了婚姻和孩子们的成长。

朱迪斯这种传统女人总是这样，布拉洛苦涩地想；她们就不能够单纯享受婚外性爱，非得让情感插一脚进来不可，这就是这些女人和他这样的男人的区别。普通的已婚男人只要有精力，可以同几个女人做爱，

而不缩减对妻子的爱和欲望。可朱迪斯这样的女人——不像芭芭拉和阿琳这样真正解放的女性——就是不能把男人当作临时的取乐工具；她们想要柔和的灯光和承诺，只有阳具还不够，还要掌握它后面的男人。

可是明白了这一点，朱迪斯也不会回来；布拉洛明白，除非与威廉森和好，重新被砂岩接受，否则连和朱迪斯说句话的机会都很渺茫。他不确定是否还爱她，她给他带来了这么多痛苦和羞辱，他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她，不想失去她，特别是不想把她的输给威廉森。布拉洛也怀念还是小组成员的时光，虽然小组有这么多缺点，却是他目前唯一的亲密人际圈子——童年对于隔绝和拒绝的恐惧还萦绕在他身上；他决定了，必须压下骄傲和愤怒，亲自去砂岩乞求原谅。这代表他要全面投降，可是除了暴力手段，他看不出还有另外什么选择。

布拉洛给还没结婚的妹妹打电话，着急地问她能不能晚上过来看孩子。快到11点，她到了以后，他便开上去砂岩的上坡路，重重踩下油门，感到旅行车庞大的身躯斜靠在山路上。对现在做的事，他还是觉得有点丢人，可是狭窄的道路不允许他回头，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行，直到停在主屋前面的院落里。房屋四周的灯几乎都关了，宽阔的窗帘也紧紧拉着。他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听到了脚步声和芭芭拉的声音：“你有什么事？”

“我想和约翰说话。”布拉洛说。

那边停了一下；然后门打开了一半。布拉洛看到威廉森站在芭芭拉身后昏暗的客厅里，他没等人开口，就小声说：“约翰，我想为那晚的事道歉。”

威廉森冷冰冰地沉默着，好像不愿接受布拉洛的道歉。终于，芭芭拉问道：“你是真心的吗？”

“是。”布拉洛说。

威廉森说话了，声音轻柔而坚定。

“你确定不是为了见到朱迪才这样说？”

“不是，”布拉洛回答道，“我真的很抱歉……我想回到你们中间。”

布拉洛垂头在门口等着，几乎要相信自己说的话。然后他感到威廉森的手搭上了他的肩，芭芭拉则敞开了门，让他进去。在威廉森身后，昏暗的起居室中间，聚着很多人在听他们讲话，只有朱迪斯不在。众人走上前来，拥抱了他，布拉洛听见威廉森警告说：“朱迪再也不愿忍受你的敌意了。”

“我不怪她。”布拉洛回答。

不久，美丽的金发朱迪斯出现在布拉洛面前，既熟悉又疏远，她试探着张开双臂，走上前迎接他。他们的臂膀环绕着彼此，拥抱了几分钟，布拉洛感到了她的亲吻，也感到自己的欲望。其他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只留他们两人在大屋中间。朱迪斯拉住他的手，陪他进了一间卧室；她慢慢地帮他脱掉衣服，那天晚上，她带着激情和爱意同他做爱，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这样有热情。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晚，一起吃了早饭——就像假日一样；大家都很放松，很高兴，布拉洛见到威廉森时，好像之前什么龃龉也没有过似的。真是厉害，布拉洛暗想，威廉森的这种风度——前一天他好像很邪恶，第二天又像个圣人，不用花多大力气，他的情绪就能改变整栋房子的气氛，影响里面的每个人。这天早上，威廉森尤其慷慨大度，没有让布拉洛感到自己是个悔罪者，也不是需要重新赢回小组信任和接纳的叛徒。布拉洛感到与人交往异常轻松——同芭芭拉、奥拉利亚，甚至药剂师的老婆也好。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虽然不感到背负了义务，却自愿待在砂岩，开始分担工作。

他在纽约人寿办公室里的时间减少了，他很自信，觉得自己挑选、培养的销售代表不需要时时监督，他还决定今后的生活要更加自主。公司没有他照样能运转，他没有公司也能活；大概他当上班族太久了，现在他断然决定，要在自己的内心多花时间，全盘测试自己能否融入这个不寻常的地方。

白天留在砂岩，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块地方令人瞩目的进步。不光是主屋，连山坡上的小房子也油漆一新，布置得舒舒服服。庭院美化也快完成了，路面光洁，虽然还没全铺上柏油，从前的电线和水管也该修的修、该换的换。那个玻璃门的大游泳房，池水加热至体温，凉爽的夜晚，小组成员最喜欢聚在这里，主屋后面的高地也是人们爱去的，黄昏时能看到绝妙的太平洋风景。夜晚静谧，安宁——砂岩最近的邻居也在两英里外，晚上仅有的访客就是几只找食的浣熊，爬过砂岩西边的篱笆，不辞辛苦地攀上紧紧盖着的金属垃圾箱，设法爬上楼梯进入厨房。

一天傍晚，小组成员吃过晚饭，正在客厅休息，布拉洛突然很想说说回到砂岩给他带来的积极影响；他很满意地宣布，自己已经克服了防范心，现在已经脱离了山下城市的束缚。威廉森静静地听着，然后建议布拉洛测试一下自己的情绪，开车到沙漠里，在绝对的孤独中待一段时间。

“哦，我肯定能做到。”布拉洛很快回答说，几乎有些自满。

“那就去做。”威廉森坚定地说。

“这周末我就去。”布拉洛说。

“为什么不趁现在？”威廉森问。布拉洛被他的挑战惊呆了，他望向四周，每一个人都看着他，等他做出反应。这时将近晚上11点，开车去

沙漠简直荒唐；可布拉洛没有不去的理由。他努力做出轻松的样子，说：“好吧，我去。”

威廉森拿起壁炉上的一串车钥匙，递给布拉洛。是威廉森的捷豹敞篷车的钥匙。布拉洛没说话，接过钥匙，心里琢磨这没准是威廉森确保他不能睡在自己的旅行车而必须睡在沙漠的办法。

布拉洛穿上短裤、衬衫和登山靴，在跑车里放了一个睡袋、一些罐装食品和水、木柴和一把大弹簧折刀。朱迪斯帮着他，其他人则站在院子附近的阳台上看。布拉洛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他感到一阵刺痒的兴奋，而且，出于一些莫名的理由，他也有些期待这次旅行。他少年时就经常幻想自己是个冒险家，像堂吉诃德那样探险，可现实生活中，遇到威廉森之前，他都是受小心和习惯的驱使。他吻别了朱迪斯，爬进车里，发动了引擎。踩下油门之前，他转过脸，冲威廉森周围的小组成员挥手，注意到威廉森满面笑容。

布拉洛开车出了峡谷，一路往北，朝着兰开斯特市驶去，两小时后，他便向东进入了莫哈韦沙漠。刚开始，夜晚的空气还很炎热，不过没多久便冷了下来，他停下车，拉起了车篷。路上没有别的车，两边都是寸草不生的平地，黑暗而荒芜。他又开了一个小时，想着朱迪斯和孩子们，以及砂岩的人们，他在黑夜中游荡着，提醒自己现在正坐在汽车的方向盘后面，脑中却没有明确的目的；这是通往内心的未知旅行。

他继续开车，直到困倦得低头打瞌睡；他放慢速度，打开远光灯，小心地开下了公路，从比较结实的沙地开向一座很大的沙丘。他决定今晚就让这座沙丘来挡风。他铺开睡袋，躺了下来，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早上7点钟，耀眼的阳光把他晒醒了，他环顾四周，只有延伸至远方的空茫沙地、灌木丛、石块和暗淡的蓝天。他从未这样孤独过，周围无边的澄澈和静谧让他兴奋不已；他休息得很好，精神放松，期待着开始新的一天，对他毫无索取的一天，对这样的一天，他也没有要求。

他从水罐里喝了些水，打开了一罐食物，然后走到离车一百码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洞准备大便。虽然他离公路很远，离有人的地方也不知多少英里，在明亮的户外解开腰带、脱下短裤时，他还是觉得很怪异，要是周围有个树丛，他一定会躲一躲。不过他还是蹲在了洞上方，伸出胳膊保持平衡，刚刚找到个舒服的姿势，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鸣声。他转过身，什么也看不见。可是那声音继续响着，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布拉洛抬头看，才看到一架小飞机正朝他落下来，飞行员肯定是觉得他迷路了，或是想不开。布拉洛尴尬得要命，赶紧站起来穿上短裤。飞机嗖地从他上方飞过，又掉头飞了回来。布拉洛轻松地朝它挥了挥手。很快，飞机离开了，静默又重新降临，布拉洛脱下裤子，继续蹲着。

上午，布拉洛又开上主路，进到沙漠更深处，停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路边加油站，加了油，继续开往死亡谷方向。现在路上渐渐有了车，基本都是大型卡车，沿着混凝土公路呼啸而过，沙子都扬进了他的挡风玻璃。到中午，气温升至一百华氏度，他感到衬衫黏在了身上，皮肤也发痒，他想起了最近在马里布的汽车旅馆外碰到的那个金发搭车客，自己现在肯定和她一样臭。他真想到砂岩的游泳池里泡一泡，看看朱迪斯、奥拉利亚和其他人的裸体。他考虑着，要不要在夜幕降临前回砂岩去，不过还是决定要在沙漠里再过一晚，即便他现在有些焦躁。他已经回应了威廉森的挑战，所以才会来这片荒原里挨晒，这又是被自尊害的，可他愿意证明自己依然能接受挑战、能大胆体验新事物，而非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男人一样拒绝变化。

布拉洛整个下午都在思考威廉森和小组，快到傍晚，他靠着死亡谷的西边，在离“中国湖”不远的一块没人的地面上扎营。今天比前一天晚上更冷，他收集了一些被风从沙漠里吹来的木头和枯枝，生起一堆火，躺在睡袋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远远地，他能听到郊狼的呼号，声声催人胆寒。他记得在哪里看过，郊狼群体行动时十分勇猛，落单便胆小如鼠，他疑心自己也是如此。他需要与人相互依存，在人群里意志坚定，独自一人就心里发虚，像是孤零零的一根木头，不够把火烧旺。他整夜没合眼，凌晨便把东西都打包进后备厢，开长途返回砂岩。

他回到山顶，经过石柱门，环绕主屋的树都是那么熟悉，他第一次惊叹这地方的美，欢喜能成为它的一部分。他把车停下，拿出行李，看到戴维·施温登开着挖掘机、从上方的路面朝他招手；一转身，微笑的约翰·威廉森正走来迎接他。

威廉森伸开双臂，布拉洛也这样做了，然后，威廉森以一种城市人绝不会用的方式拥抱了他。他们站在一起，交谈了几分钟，布拉洛讲了自己的旅行，告诉威廉森他去过的地方、体会到的情感，最后他坦承，在孤独中度过的时间让他看清了，也加深了对威廉森的忠实感情，他愿意全心建设情爱公社。

威廉森点点头，没说话；可是他转身朝房子走去之前，布拉洛震惊地发现，威廉森的眼里含着泪水。

砂岩，和约翰·威廉森企图创立的社区，有些像罗伯特·海因莱因 [93] 的科幻小说《异乡异客》里描写的理想社区，一群男女过着与世隔绝的舒适生活，在温暖的泳池里裸泳，不带羞耻感与罪恶感地彼此做爱，共同抵抗十诫中的第九诫 [94]，原因像小说主角所说：“你没必要贪恋我的妻子。爱她吧！她的爱没有界限……”

威廉森也承认他对砂岩的野心与这部小说的主题有几分相似，可他认为小说只是灵感的来源，几百年来，总有某些男人因真实而强大的欲望而耗尽生命，小说只是无数表现、反映这种欲望的作品之一，即希望在西方文化中重现狂欢式的情爱和愉悦的男女关系，这是由异教的受孕仪式而来，在早期的基督教中也有，直到中世纪教会强调罪恶和过错，压抑了这类欲望。

有一个人威廉森可能会认同，15世纪的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波斯，自由灵兄弟会的成员，领导着一群放荡的男男女女，这个色情的教派认为自己是亚当与夏娃的直系后代；他们在叫作“乐园”的秘密教会中裸体崇拜神灵，虽然也有多人性爱，他们却认为这是分享爱情的体验，而不是没有人情味的群交。他们认为神父和修女的独身违反天性，也不同意性快乐是原罪的说法，这些寻求自由的兄弟姐妹，有时也被人称为“亚当后裔”，最终被宗教裁判所消灭了，不过，耶罗尼米斯·波斯的油画中记录了一些他们裸体聚会的场景。

离威廉森的时空更近些，还有19世纪纽约奥奈达的乌托邦，创始人是个极端的宗教研究家，和妻子一道在最亲密的朋友间实践自由性爱，30年来，他在惬意的隐居地与无数爱人追求“持久的恋爱”，称这块土地为“人间天堂”。这块土地的中央是他与追随者建造的豪华别墅，足够容纳一百个人；周围是宿舍和学校之类的建筑，供奥奈达社区的众多孩子居住和上学，还有工厂，社区成员做着好几个挺红火的生意——比如19世纪70年代成立的奥奈达镀锡铁勺公司，一直存活到20世纪，成了市值几百万美元的企业。

奥奈达社团的创始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是个气度不凡、独断专行的人，留着齐整的红胡子。19世纪30年代，他为当牧师在安多佛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不过他对《圣经》的理解与上级神职人员分歧太多，影响了对他的授职，使他一生都是个变节的传教士。

最让新英格兰教会高层不高兴的，是诺伊斯关于性爱与婚姻的看法，他坚称《圣经》支持上帝真正的信徒之间都可以互相恋爱和发生性

关系。诺伊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自私和占有欲的体现，限制了人们爱他人的能力。他预测未来会有“复合婚姻”，即关系和谐的男女团体共同生活、工作，定期但不限于与团体内成员做爱，所有人都是团体内孩子的共同父母。为了限制出生婴儿的总数，不至于给社团造成经济负担，也为了让女人更好地享受性爱、不必担心意外怀孕和分娩的危险，诺伊斯倡导男人们做爱时要忍住不要在女人体内射精，除非他已经同意了一对情侣想要孩子的请求，或是他自己选中了一对愿意承担繁衍职责的男女。

诺伊斯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优生学，和他劝说其他人改变性观念的能力，只是因为追随者相信他受了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意志的媒介——他们是他们的救世主，庄重、疏远、博学，应许拯救他们于罪孽，应许他们持久的富足、健康，和几个伴侣之间的性爱快乐。生命应当是喜悦的，他向支持者们保证——“最快乐的人即为最好的人，行最大的善”。提到外部世界对性问题的小心保守，他宣称“为性器官而羞耻就是羞辱上帝的技艺”，他还补充说，“从羞耻感而起的道德改革，就是企图向自然发起必败的战争。”

虽然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赞成快乐的价值，却并不容忍享乐主义和懒惰。社团中的男人女人一周要在社团的农场、别墅、学校，或是某个奥奈达的企业里工作六天；通过制造、贩卖社团产品挣来的所有钱——1866年，单奥奈达的捕兽夹工厂就收入了8.8万美元——直接进入公共金库，支持成员高水平的生活。

奥奈达的常驻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和牙科诊疗服务；社团里有裁缝、制衣工人、制帽工人和鞋匠，制造并修补所有的衣物；别墅里有很大的餐厅，每天提供两餐到三餐。在别墅的地下室里，有土耳其浴室。整个社区占地275英亩，有不少宽阔的草坪，设有门球场和棒球场。在奥奈达湖可以划船、钓鱼，在池子里可以游泳。奥奈达还有22人的管弦乐队和剧团，提供舞台娱乐表演，周末在别墅的舞厅里还有集体舞会。

每个孩子都要在社区学校上学到16岁，有些抱负远大的学生被送往哈佛和耶鲁深造，成为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毕业后也有些人回到日益扩大的社区生活、工作。当诺伊斯认为奥奈达的年轻人足够成熟到有第一次性体验时，社区里的女人便自愿与少年男子同床共枕，而诺伊斯和由他选中的男人则会对她们进行指导。诺伊斯相信这个系统不仅给年长者带来快乐，也能让年轻人从经验丰富的爱人身上学习——而且，年长的男性已经证明了自己能遵守诺伊斯的“男性自制”政策，也不太会发生意外怀孕的情况。虽然年轻成员也被允许和同年龄的人享受性爱，不过社团里一直有反对“排外”性爱的压力。个人的身体，同社团里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共享的；任何形式的占有欲都被认为是违反社团精神和上帝意志。

育儿室和游戏室里，小孩子们很早就学到，自己对任何一件玩具都没有专有权；所有的玩具都要分享，后来，监督者发现有几个小女孩特

别喜欢某几个洋娃娃，给娃娃梳头发，对娃娃说话，还把娃娃带到床上睡觉，他们便设法干预了这种儿童模仿传统母亲角色的行为。监督者提醒女孩们，娃娃只是虚假的拟人物体，在它们身上花太多精力不符合奥奈达理想女性的要求。

在奥奈达做领导的女人认为，女性生命中的第一要务不是生育和家庭；她们同意诺伊斯的说法，外部世界的已婚女人常常沦为“生育苦力”，奥奈达女性认同的目标是精神成长、个人解放和学识提升。诺伊斯鼓励她们参加别墅晚间的成人教育课程，去社区里有4000册藏书的图书馆学习。她们穿短裙和灯笼裤，剪短发，认为自己和男性成员一样在社区里有分工和职责。她们轮流去工厂上班，男人们也轮流进厨房。男女共同承担对所有儿童的爱护和关注，不过小女孩们喜爱洋娃娃这种穿着百褶裙、化了妆、穿着外部世界风格的服装、用蜡做成的小雕像，在奥奈达的成人看来是不健康的精神，应当设法祛除掉。

一个做老师的女人建议说，可以把所有的娃娃收到一堆，扒光衣服，放到燃烧的煤堆上，“在欢乐的火焰中焚烧掉”。负责抚养和教育儿童的委员会考虑了这个提案，孩子们也被叫到一起，要对此问题做出回应——最终，在年长者的鼓励下，男孩们一致投票赞同烧掉娃娃，女孩们虽然不情愿，终究也同意了。其中一位交出娃娃的女孩，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了1851年那可怕的一天：“指定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围在火炉前，每个女孩都抱着她一直最心爱的娃娃，唱着歌向前走。我们走到炉门正对面，把娃娃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焰，看着它们在眼前化为乌有。”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个人也同意焚烧娃娃——“玩偶精神，”他强调说，“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应当与崇拜雕刻形象划为一类”；诺伊斯也能轻易将任何有“排外”之爱的成员驱逐出社区，不论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彼此相爱的情侣。“新的戒令，”诺伊斯写道，“是要我们爱彼此……不是像世间一样两两相爱，而是爱全体。”奥奈达的成员顺从、敬畏上帝，不应该因为血亲间自私的联系，或是某对情侣独占的爱情，而被剥夺了应得的爱和关注；诺伊斯坚称：“心灵应当自由地爱所有真实与有价值的事物。”一个男人对诺伊斯坦白自己对某个女人绝望的爱情，他却只是不耐烦地评论道：“你不爱她，你爱的是快乐。”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非正统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并非是童年特殊经历的结果，诺伊斯家是佛蒙特的名门望族，没有丝毫古怪的地方，1811年，他出生在布拉特尔伯勒。诺伊斯的母亲波莉·海斯，家庭环境融洽，人也聪明，她的家族来自新英格兰，家族成员中有美国的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他父亲，老约翰·诺伊斯，先后当过教师（教过丹尼尔·韦伯斯特 [95] ）、牧师，还是成功的商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4岁时，他被选为南佛蒙特议会的议员。

小时候的诺伊斯在同龄人中很受欢迎，迷恋户外运动和露营，学习

也很刻苦，和父亲一样，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1830年诺伊斯离开大学，打算学习法律，却被某些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吸引，他们天资聪颖、口才过人，在诺伊斯的家乡和整个新英格兰，这些人以上帝的名义挑战对《圣经》的传统阐释，特别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信条，即人类没有价值、人间罪恶横行、上帝已预先挑选子民和罪人的说法。有些新牧师走得更远，认为人在真正皈依上帝后，有能力超越原罪，在尘世获得完美。这样的情况不仅吸引着广大听他讲道的信众，在万事似乎皆有可能的后独立战争时期，似乎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此时的美国有极大的乐观和热情；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正式撇清了和母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自由地扩张。探索自己的荒野和国民意识，重新评估过去的清教传统，掌握自己的命运。

约瑟夫·史密斯 [96] 是新英格兰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1827年，他声称受到了天使摩罗乃的神启，还有其他一些神迹出现，之后史密斯就创立了摩门教，实行一夫多妻制——直到1844年，一个愤怒的暴徒闯进关押他的伊利诺伊州监狱，杀死了他。史密斯成了先知，给房子刷漆、装玻璃的工人布里格姆·扬 [97] 接了他的班。扬将摩门教向西迁移到了犹他州，教派繁荣发展，他娶了27房妻子。

路德会的牧师乔治·拉普，多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被天使加百列拜访过，他受到启迪，在身边聚起800个追随者，在一块叫作“和谐”的隐居田里，过着无私而满足的共同生活，并且坚持独身。

弗朗西丝·赖特的父母是富有的苏格兰人，她是个社区主义者，也支持废奴。1826年，她在孟菲斯附近建立了“那肖巴社区”，那是一块2000英亩的农场，黑人和白人一起工作，也可以睡在一起——很多人的确这样做了，直到种族间性爱的谣言传遍了乡下，激起了争议，加上农场也一直不赚钱，难以维系，小组在1830年解体。弗朗西丝·赖特不仅因为反对蓄奴而闻名，其批评宗教组织和婚姻机制的演讲、文章也很出名。“在婚姻生活中，”她写道，“女人牺牲了独立性，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期，其他女性激进主义者对婚姻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住在小型自由情爱社区里的普通女人也有此类看法。这类社区在纽约州、新英格兰和俄亥俄州柏林海茨这样的城镇里都有。“傅立叶式”的社区有时也鼓励两性间的自由性爱，这种社区是想通过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建立的，他们的灵感来源就是异想天开、富于理想，又几乎一文不名的法国贵族夏尔·傅立叶。

直到1837年在巴黎去世前，傅立叶在演讲和著作中一直强调，19世纪人类天生贪婪、喜好破坏，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南辕北辙，除非彻底改变西方文明系统。傅立叶提案说，各国领导人将国民分为各个独立的团体，每个团体约1600人，在巨大的工业建筑里生活、工作，这种建筑叫作“法伦斯泰尔”，可以满足公民所有的私人和职业需求。

理想中，每个法伦斯泰尔有六层楼高，装潢精美、设施完善，设有

生产和社交、生活等专区。摄政者会监督每座法伦斯泰尔的收入状况，每个人都做着最擅长的工作，虽然也会定期轮换岗位，避免产生厌倦；每个人都有最低工资，凭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才能还能拿到相应的高工资。法伦斯泰尔的房租依照房间大小和条件而定；要是住户想换更好的公寓，却付不起房租，可以用加班时间抵偿。虽然傅立叶社区鼓励成员通过多劳动取得更高地位，但任何成员都不会因生产力低下而被社会排斥，在性爱上也不应有沮丧或被剥夺之感：即使外貌最没有魅力的成员，“情爱圣者”也会在专门的私人套间里保证其能享受到“基本性爱”。

傅立叶不支持情侣践行一夫一妻制，认为小家庭是控制欲、裙带关系、小团体思想的温床，还会助长人们的狭隘视野，看不清人类历史的大方向，对乌托邦造成损害。虽然傅立叶终生也没能筹到钱建立哪怕一所法伦斯泰尔，他的某些观念却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称赞过，认为可以将其付诸实践，比如阿尔伯特·布里斯班 [98]。他在巴黎见到了傅立叶，他的书《人类的社会命运》引起了《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对傅立叶的注意。之后格里利便邀请布里斯班在报上开设专栏，推广夏尔·傅立叶的理论和设想；于是，傅立叶主义也在美国小小地风行一时。

19世纪40年代初，各式各样的空想家、避世者和支持性爱自由的人受到傅立叶启发，做了几十项社会实验。偏远的农场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镇与村庄边缘的灌木丛里，他们占据了布局凌乱的大房子，试图通过园艺、小生意、手工艺和轻工业来集体谋生。可是这类组织很少能存活超过两年，原因不外乎是资金不足、组织仓促，很快就因派系斗争溃散了。

这些社区里最有名的，也许是1841年成立、性政策较为保守的布鲁克农业与教育农庄，该机构维持了六年，位于距波士顿十英里的西罗克斯伯里。布鲁克农庄为历史铭记的原因是，早期成员中有一位雄心勃勃却刚刚在波士顿海关丢了工作的年轻作家——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在农庄里靠劳动挣得食宿，一开始，他十分痴迷农村生活和农庄里的超验气氛，在满是粪肥的田地里待了一天之后，他还能写信对朋友说：“你可能认为，再没有比这种苦工更不合时宜、令人不快的了。确实，这种劳动弄脏了手，可绝不会污染心灵。这金色的矿石是纯净、健康的物质；不然我们的自然母亲不会这样乐意消化它，再从其中转化出丰富的营养，再回报我们满仓的饱满谷穗和根茎。”

不过，没到六个月，霍桑就放弃了布鲁克农庄，认为社区会阻碍他的文学追求。“爱情小说和诗歌，”他后来写道，“要靠毁灭来生长。”在1952年受布鲁克农庄启发而创作的小说《福谷传奇》中，他提到社区生活使人们距离太近，太过在意别人的感受和个人怨恨：“……任何两人间有了不友好的感受，整个社区多少都会有些混乱、不快……要是有人朝邻居的太阳穴上打了一拳，每个人的耳朵里立马开始嗡嗡作响。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比世界上其他人脾气都好得多，也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揉

耳朵。”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对傅立叶运动很熟悉，19世纪30年代，他也去参观了马萨诸塞州布里姆菲尔德的自由性爱社区，可他宁愿将自己与当时的性激进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区分开来；他觉得自己受上帝指引，是灵魂的信使，帮助神在尘世建立宗教，使人民真正、完全地爱自己的邻人。他不像富于幻想的傅立叶，也不像参观布鲁克农庄的那些流亡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参观的人包括梭罗、爱默生、亨利·詹姆斯和玛格丽特·福勒、布里斯班和格里利。诺伊斯不喜欢空想乌托邦，也不支持个人自由；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专制主义者、神权主义者，希望将自私之罪清除出人类的灵魂，使他们皈依他所谓的“圣经共产主义”。虽然诺伊斯指责其他人的自我中心，他的自我却也是个庞然大物；不过，他总能把自己的无数喜好与观点，包括禁止一夫一妻制婚姻，说成是遵循《圣经》的教诲。

“在天堂王国里，”他写道，“不存在一个男人全权拥有一个女人的婚姻制度，因为当基督复活时，他们不会结婚，也不会被给予结婚的权利，而是作为天堂中上帝的天使……所有信徒的爱情关系都不应当排外，基督和门徒，乃至整个《新约》的要旨都是这样要求的……重塑两性间的真正关系十分重要，仅次于人要与神和好。圣经共产主义就是照此运作。自1834年，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新约》的宗教，同上帝联合……”

诺伊斯提到的1834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年，他相信自己完成了精神升华，经过将近三年，心灵终于进化到了无罪的状态——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他参加了一场为期四天、狂热的奋兴 [99] 布道会，第一次领悟到了上帝的指示。在1831年的布道会上，他才21岁，是个雄心壮志、奋发图强的学生，不过对自己的使命还不明确；集会之后，他回忆说：“以我不曾预料到的方式，光照进了我的灵魂。一开始很暗淡，几乎看不到，逐渐就亮得耀人眼目。这一天结束之前，我就决定终生侍奉神，为神工作。”

他进了安多佛神学院，一年后就退学了，认为那里学风不够严肃；然后他又去了耶鲁神学院，发奋钻研，经常与同级生和教师争论如何阐释《圣经》，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热情，被同龄人比作犯了“急性热病”。很快，他在耶鲁私下发表的理论被其他学生解读为神经症和异教狂热——比如他相信耶稣再临不是未来的事，而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时就已经发生过了，那时人类就得到了救赎。在诺伊斯看来，从那时起，神之国度就已经出现于尘世，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而且能够通过真正信徒的灵魂培育出来；诺伊斯听说，在新英格兰有福音新教的传教士四处旅行，传播至善论 [100]，他也像这些人一样，相信人皈依宗教后，可以达到精神至善，不必受世俗道德的约束，而是遵从上帝的意志——诺伊斯还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834年2月的一天，他在纽黑文自由教会布道时，公开宣布自己已达到精神至善，闹成了丑闻，几乎是立即被撤销了公理会牧师的执照。诺伊斯没了能宣讲的教会，便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四处云游，露天讲道，招募追随者。他希望吸引一些名人，或是能提供资金支持的人，他徒劳地试过接近《解放者》的编辑、废奴主义者威廉·洛伊德·加里森 [101]，加里森刚刚被波士顿一伙支持奴隶制的暴徒袭击，差点被私刑处死；还有争议缠身、可是有大笔财富的长老会牧师莱曼·比彻 [102]，他女儿哈莉特·比彻·斯托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儿子是亨利·沃德·比彻牧师，被林肯誉为“圣保罗以降最伟大的演说家”，不过最让他出名的是，在伊丽莎白·蒂尔顿通奸案 [103] 的审判中，亨利·比彻站到了被告席上。

诺伊斯不但改变了自身的信仰，还与人合作发行杂志，推广自己的宗教观念，杂志名叫《至善论者》，读者中有不少自由思想家、唯信仰论者和其他反对传统的人，其中有一个心底热忱、过着小康生活的年轻佛蒙特女子，其祖父曾经当过副州长。她叫哈莉特·霍尔顿，读到诺伊斯关于基督二次降临的文章之后，开始注意他。

很快，她开始与诺伊斯长期通信，后来又捐了大笔的钱支持他的运动。她父母已经去世，祖父母和家里的亲友都想阻止她和至善论扯上关系，可她对诺伊斯的理论很感兴趣，见面之后又迷上了他本人，他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看法也没有减低她的热情，即使他在信里警告她说：“我们不可以订婚，世俗的婚约会限制我们爱情的范围。”

在另一篇于自由思想刊物上发表的信件中，诺伊斯强调了对一夫一妻制的反对，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婚姻关系：

我将某个女人称为我的妻子——她是你的，也是基督的，在基督里面，她也是所有圣人的妻子。在陌生人手里，她也是一样惹人怜爱，我记着对她许下的诺言，欢欣鼓舞。我对她拥有的权利比这世上、这宇宙里一切的结婚誓言都切实。

当上帝的意志加诸人间、如其加诸天国一般，婚姻将成为过去。为羔羊准备的婚姻晚宴上，每位客人都能免费享受每道菜。不会再有排他、嫉妒和争吵的位置……

哈莉特·霍尔顿理解并接受了诺伊斯的信条，1838年，他们在帕特尼结婚后，开始邀请其他信教的夫妻来家里做客，这些人对《圣经》感兴趣，是潜在的至善论信徒。没过几年，他们结交了五六对夫妻，至少在理论上相信了至善论；在这个小团体里，最狂热、外貌最吸引人的成员就是玛丽和乔治·克拉金。

1840年搬到帕特尼之前，克拉金夫妇就与纽约州北部的自由情爱异端者有联系，还曾经在著名奋兴派教徒查尔斯·G·芬尼的教堂里帮忙传道。芬尼是个高个子、精力充沛的牧师，举止充满热情，有一副高低音都能唱、足以进合唱团的好嗓子；他在纽约州旅行，在教堂讲坛上虔诚地鞭策人们，经常能让听众突然号啕大哭、尖叫、发狂甚至昏厥——芬尼自己也得面对不少暴力威胁和挥舞的拳头。虽然这种方法为不少长老会牧师谴责，芬尼却照样因为转变了纽约州西部大批的罪人而备受称赞，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来到纽约城布道时，影响力依然不减，教堂也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叫纽约百老汇会堂。

就是在这里，教堂会众之一、担任主日学校讲师的乔治·克拉金认识了另一位志愿跟随芬尼的人，一个苗条可爱的缅因州年轻女人，玛丽·约翰森。经过一年的交往，他们于1834年结婚，在纽约办了喜庆的仪式，参加者只有最虔诚的教徒。之后这对夫妇就乘上邮政马车，去了纽瓦克度蜜月。虽然玛丽和乔治都出身于新英格兰的富裕家庭，但因为痴迷宗教，他们与家人感情不深，父母连遭不幸，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可继承的遗产；另外，乔治·克拉金也没有商业野心——他已经拒绝了为一家纽约公司做欧洲代理这份前途无量的工作，因为他觉得雇主是异教徒。于是克拉金夫妇只好艰苦朴素地住在纽约，靠精神食粮寻求安慰。

可到了1837年，这样的生活也中断了。他们俗世的领导者查尔斯·芬尼离开了纽约，去往俄亥俄州新建的奥伯林学院，成立了神学系，后来还当了奥伯林的校长。克拉金夫妇随着其他奋兴派成员到处漂泊，宗教热情慢慢消退，直到1840年在佛蒙特，他们受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影响，重燃起宗教热情，那时诺伊斯的宗教社区还在成立初期。

最早追随诺伊斯的有他自己的家人——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和她们的丈夫。诺伊斯的母亲和其他家人都公开表示不赞成至善论，不过他父亲新近去世，遗嘱里留给诺伊斯和弟妹们2万美元现金和各类不动产，倒是没人对他们的继承权说三道四。有这些资产，加上诺伊斯妻子赞助的1.6万美元，还有其他追随者的贡献，社团成员便能专心于传播至善论、招募新成员。

除此之外，社团也确实从诺伊斯买的一家杂货店里有所收入；诺伊斯继承了两个农场，成员们的大部分食物都靠耕种得来。所有成员及其子女都住在诺伊斯家里，或是他两个妹妹的家里，每到周日，大家就聚到自己建造的小教堂里，听诺伊斯布道。在诺伊斯的坚持下，每个成年人每天要花三小时进行宗教冥想，阅读《圣经》；如果某人总是表现出自私、占有欲强，或是偏离了社区精神，诺伊斯会传唤他站在全体成员面前，接受严厉的训诫。被指责的成员应当一语不发，谦卑地坐在房间中央，任由其他人轮流发表批评意见，有时这种体验太过痛苦，导致有些人因为恐惧或愤怒退出了社区。

不过，乔治·克拉金第一次参观诺伊斯的宅地时，丝毫没有不和谐迹象；接下来几年，也没发生什么令克拉金改变观点的事情，那一天的印象仍旧令他痴迷不已。“那里的信仰者小圈子和我从前所见的十分不同，”克拉金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样善良、安静、善于思虑、好学，精神又这样自由……如今，上帝已经用尘世的天堂补偿了我。”

1841年，诺伊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名叫西奥多，这孩子给社团带来了快乐和乐观精神，因为诺伊斯太太在结婚头两年流产了两次。可1843年和1844年，她相继产下两个死胎，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决定再也不让妻子承受“繁衍之爱”的生理风险和精神折磨，从那时起，他开始实践自己“男性自制”的主张。很快，他将此作为社团内的性爱方针推行，不仅因为这可以降低生育风险、方便控制社区人口，还因为其符合诺伊斯用复合婚姻的纽带来团结社员计划。

在妻子的支持下，1846年春天，诺伊斯决定接近玛丽和乔治·克拉金，邀请他们成为自己的第一对伴侣。诺伊斯多年来一直喜欢克拉金太太，他妻子也对克拉金太太温文尔雅的丈夫有好感；诺伊斯私下提出要求后，克拉金夫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约好的夜晚之前，玛丽·克拉金在日记里这样写诺伊斯：“他对我这样好，希望用自身充满我，我愿意服从、献出自己、被他的精神贯穿，我渴望爱和感激能启迪我的心，让我在自己的快乐之前，先感受他在这件事里获得的快乐；我知道，这可以提升幸福的能力。”

诺伊斯和克拉金夫妇的共同婚姻这样美满幸福，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夫妇也开始交换婚姻伴侣；虽然成员都有权拒绝，分享性爱的风气还是在至善论者中间迅速流行起来。然而，1847年，帕特尼关于这些人狂欢纵欲的谣言传遍佛蒙特州，随即有了对诺伊斯的逮捕令。

诺伊斯向法律权威们投降了，可是没有悔改的意思，他被指控通奸，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后等待审判。不久，律师对他说，帕特尼有个道德治安团体正计划抓他去实施私刑；伊利诺伊州也有这么一群愤怒的公民，私刑处死了监狱中的摩门教领袖约瑟夫·史密斯，诺伊斯得知此事后，便决定在保释期间逃走，暂时藏在纽约城里。

这时是1847年11月，他销声匿迹了几星期，直到帕特尼的狂怒平息下来。1848年初，他写信通知追随者，说已经发现了新的定居地——纽约州北部160英亩漂亮的草地，在锡拉丘兹市和尤蒂卡市之间奥奈达溪谷中静谧的谷地里。这片土地上有两座小农舍、一间棚屋、一架风车，还有两座木屋，之前是一伙组织松散的印第安人住着。这样的条件对帕特尼社区的19个成人和孩子们来说并不太够，不过诺伊斯很幸运地结交到了锡拉丘兹市的一个年轻建筑师，并成功说服他入教。这个年轻人叫伊拉斯塔斯·哈普古德·汉密尔顿，答应会设计一座大别墅，并且监督至善论信徒们施工。

提案得到了帕特尼信徒的热烈反响，立即就有新人来到奥奈达定

居；从1848年早春到夏天，再到秋天，男人、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不知疲倦地清理田地、锯木头、运来石块建造地基和地窖，架起、加固承重的房梁和墙壁，铺设地板和天花板，最后整体粉刷，整个建筑有三层，60个房间，屋顶还安了炮塔。

除了建筑师和另一个新入教的老手石匠，所有工作都是由经验极少的新手完成；然而1849年冬天，这幢大房子已经全面完工，可以住人了，20年间它都牢固耐用，直到后来另建了有100个房间的砖房，这房子才被拆掉。

主居住区建好之后，奥奈达的成员们又建了两层楼的儿童房和一所学校，由从前当过教师的克拉金太太监管。然后又建了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建筑——机械车间和铁匠棚、裁衣修鞋的地方、养马场和家禽栏、温室、储藏间，甚至还有蜂房。另有一座专门为社区成员清洗衣物的建筑——男人和女人都得做这项工作，靠每周抽签决定。

一开始，农耕是奥奈达的主要产业，但诺伊斯认为单靠农业，社区很难发展。这也是布鲁克农庄之类的傅立叶主义社区的一大问题——创始人太过相信土地的生产力。诺伊斯感到了农业式微、工业兴起的趋势，很快将奥奈达转变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社区。

19世纪50年代早期，奥奈达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宅地风景优美，吸引了近一百名新成员，急着向至善论大业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时间。诺伊斯管理着不少制造产业。玉米叶做成扫帚，卖到附近的城镇、村子和锡拉丘兹市、尤蒂卡市里。上市售卖的还有杉木躺椅、棕榈叶编的帽子、绒布旅行包、马车轮辐、钢制的捕兽夹等。1848年，一个从前在当地做猎人和铁匠生意的人遇到诺伊斯，加入了社区，带来了捕兽夹制造技术，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的毛皮市场开始扩张，纽约城和芝加哥的零售商都需要捕兽夹，这成了奥奈达最赚钱的生意。

新入教的人不仅带来了技术，加入社区时也理应上交自己俗世的资产，以这种方式，1850年奥奈达从一个富有的信徒手上收下了一艘大船——以此为契机，在诺伊斯的鼓励下，有些乐观的奥奈达成员沿着哈德孙河做起了航运石灰石的生意。1851年7月的一天下午，船行到纽约市金斯顿附近，舵手虔信上帝，对航海却半懂不懂，这时暴风骤起，装满石灰石的船翻了。跟船航行、没能活下来的人里就有玛丽·克拉金。

事故让整个社区陷入悲伤与绝望，纽约市内报道事故的报纸也都持同情态度；不过有几家乡野地区的报纸和宗教刊物一直对诺伊斯持批评态度，这时抓住了机会，说溺亡事件是上天对该社区淫乱行为的惩罚。这些文章，加上宗教界和俗世一些领袖的责难，鼓舞了奥奈达宅地附近一个很小却很能发表意见的治安团体，他们找到地方法官，投诉说诺伊斯在煽动“摩门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无宗教主义”。

可比起帕特尼，诺伊斯已经在奥奈达投入了太多，他全然不打算离开这里，发表了一系列公众声明，激烈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在社区报纸中写道：

仔细查看过奥奈达社区任何时期的家庭生活，你绝不会发现淫邪的精神，恰恰相反……它能减少两性间轻率的接触——减少“放纵享乐”的可能性，更大大减少了不受规范的言行，而俗世所谓的上流社会圈子中，却有不少这样的言行。

我们确实不承认那些严苛的规则和习俗，因为它们只能让自私凌驾于两性关系之上；但是……通过组织成员的健康，可以证实我们严守道德。奥奈达还没有一个成年人死去……很多加入时还患病的人已然痊愈……妇女们也几乎可以免受生育与抚养儿童之苦。过去四年中，40个家庭中的人口增长比维多利亚女王一人的子女都少得多 [104]。那些叫嚣“淫乱粗鄙”的声音可以停歇了。

在附近的城镇里，奥奈达社区也有不少有权势的朋友，都是和其有良好商业往来的个人——诺伊斯也对法庭让步，答应废除复合婚姻。因此，对诺伊斯及其追随者的指控并没发展到庭审。

然而没多久，诺伊斯就认定，坐在俗世法庭里、尚未达到至善的法官没权力审判上帝的乐园奥奈达，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情爱制度；与此同时，诺伊斯警告追随者，只有更加崇敬上帝，才能抵挡“野蛮”入侵奥奈达的土地，他督促信徒们多读《圣经》，深化自己对至善论的忠诚。“只有不再欲求棍棒，我们才能逃脱棍棒，”他写道，“只有不骄傲，我们才能享用丰盛的赐予。”

对奥奈达的商业进展，诺伊斯很满意，可他现在担心信徒们有资本主义的倾向、赚得利润的骄矜、对占有欲和个人成就的偏好。“只有主应当受歌颂。”诺伊斯警告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社区的收入和捐款越来越多，诺伊斯让工厂里的工头把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天6小时，而外面大部分工厂要求工作12小时，他还重新强调了社区目标是精神升华和自我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没有一分钟是不受约束的：即使在社区成员聚在一起缝制手包、用棕榈叶编遮阳帽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成员坐在人群中间，大声朗读启示录或者历史文学名著——狄更斯的小说、杰斐逊的传记之类。社区鼓励所有成年人参加每晚在别墅里举行的晚间课程，由过去当过老师的成员任教；有音乐、美术、象棋等才能的成员也应指导有兴趣的成员学习相应技能。

分享原则在育儿室和学校里也有体现，孩子们不能说“我”、“我的”，而要说“我们”、“我们的”。农场里、工厂里、手工商店里，年长工人一对一地指导年轻学徒；不论多么粗重的体力活，也不能当成负担，

而是奉献。大多数的劳动都伴着音乐：要是有人在庭院草地上悠扬地吹起黑管，就是向所有空闲的成员发信号，说有特殊任务需要人手——可能是摘果子，也可能是收割玉米、装罐蔬菜，或是修路。志愿者聚齐之后，项目负责人会挑选足够的人手，排成一列，在横笛和小鼓的伴奏下，精神饱满地列队走向工作地点。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工厂、商店、农场和参加各类任务的人重新集合到别墅，回到房间梳洗、换衣服，准备吃晚餐。晚餐5：30开始，主餐厅能容纳110个人。成员们到达后，就自觉走向房间后面，坐在屋子中央的餐桌旁，或是靠墙摆放的椭圆桌子旁边。这里人员混杂，有种自由的精神，没有小集团，成员不论男女老少、亲属配偶，都没有结对的风气。只有12岁以下的儿童在儿童房里吃饭，十几岁的少年要轮流在厨房帮忙、在餐厅服务，其他未成年人也像成年人一样在餐厅用餐，也要遵守庄重的餐厅礼仪。

晚饭后，如果没有室外音乐会，礼堂里也没有儿童剧或诗歌朗诵，一些成员就聚在起居室里谈天、下象棋，其他人则去图书室读书、看杂志，还有定期邮寄的《纽约论坛报》一类的报纸。奥奈达人和外界只有微薄的商业联系，认为自己是祖国土地上“和平的异国人”，可他们照旧对当时的新闻头条和焦点话题感兴趣，主要关注奴隶制、妇女参政、联邦主义和禁酒的问题。

诺伊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因此这两项在奥奈达都是不道德行为；而且因为社区的宗教信仰教导说，在主的眼中人人平等，成员们一致支持妇女权益、解放黑奴和给予劳工人道待遇。虽然社区也交税，男人们却选择不投票；而且不知什么原因，1863年征兵时，没有一个奥奈达男性被联邦军征召，诺伊斯自然也不会寻根究底。可能征兵的军官觉得，让奥奈达人入伍会对其他士兵产生什么不道德的奇怪影响；也可能因为奥奈达宅地横跨了两个选区，归两个郡的征兵局管，两边都认为奥奈达在另一边的领地里。

奥奈达的生意在战争期间不太景气，和平之后又开始复苏；到了1866年，许多退伍军人重操旧业，干起了毛皮商人和捕兽猎人的行当，社区工厂每周能卖出超过1000美元的捕兽夹；箱包工厂、风车磨坊和其他企业也接到了许多业务，社区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招募外部人员，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社区扩建了许多旧建筑，又建了不少新的；占地面积增加到275英亩，除了满足住在当地的200名成员的生活需要，还支持康涅狄克州沃林福德的分社区。第一代奥奈达成员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有的开始学习承担管理职责。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就是耶鲁大学的医学生。乔治·克拉金的儿子查尔斯也毕业于耶鲁大学，眼下正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学习现代丝织技术，这也是奥奈达未来的产业之一。

1869年，诺伊斯认为社区已经足够繁荣，精神上也足够强韧，可以

超越“长久关系”和“男性自制”，委员会挑选男女，实践优生，尝试养育至善论者特殊的下一代。

从奥奈达成立之初的1849年，一直到1869年，社区里有至少100个性成熟的成年人，却只有35个孩子出生。有几个孩子是不小心怀上的——诺伊斯虽然不厌其烦地强调男性自制，可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完美执行，还有些是女人害怕年纪太大了不能怀孕，得到了诺伊斯的允许。

除了这35个孩子，其他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来奥奈达的，父母将养育的责任交给社区，也学着适应社区里盛行的自由情爱。在奥奈达的自由情爱系统里，任何男人若是想与某个女人上床，先得向由诺伊斯指定的中间人申请，这人是年老的女人，她会“邀请”发给相应的女性，确认她是否同意。虽然女人们可以任意拒绝某一个甚至所有男人，不过在奥奈达赞许性爱的风气下，一般人都不会拒绝；根据中间人的记录，奥奈达社区的大多数女人一周平均有两到四个情人，有些年轻女人一周还有七个不同情人。中间人介入不是为了降低性交频率，奥奈达认为活跃的床上生活是健康、体面的事，而是为了监督可能对彼此有“特殊”感情、不愿与其他人分享身体的情侣。任何与“排外”沾边的行为都会被中间人阻拦，诺伊斯开始优生计划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政策的意思。

诺伊斯通告社区成员说，奥奈达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抚养更多孩子，又征集了愿意把身体借给优生计划的女性，之后诺伊斯明确地说，他会挑选提供精子的男性，女人们对亲生的孩子也没有特别抚养权。虽然限制众多，依旧有超过50个人申请，全都附有女性同意下列声明的签字：“在一切方面，我们都不属于自己，我们首先属于上帝，而后属于上帝真实的代理人诺伊斯先生……我们会摒弃一切嫉妒、幼稚和自我追寻，同那些受挑选的子民一同欢庆；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愿意为科学牺牲，如果诺伊斯先生以任何理由认定我们不适宜繁衍，我们也会满心欢喜地放弃做母亲的愿望。”

看了申请后，诺伊斯以身体条件和其他没有明说的理由拒绝了其中九个。被选中的女性平均年龄比男性小12岁，有些还是处女——不出所料，诺伊斯选中了自己，来让这些女人怀孕。

这个项目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共养育了58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是诺伊斯的骨肉，姓氏也随他。其他的父亲都是诺伊斯认为有着高贵的精神和体魄，并且对诺伊斯哲学最为忠实的奥奈达男性。不过，有一个人选并非众望所归，后来还在70年代末导致了奥奈达的分崩离析。这个受质疑的人就是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忧思多虑、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放弃了医学专业，一直质疑《圣经》，还总显露出极度自私和情绪不稳定的迹象。可年长的诺伊斯显然对这个孩子有偏爱，这是他妻子早年间怀孕五次、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诺伊斯本是严厉、公正的独裁者，可由于对西奥多的纵容，他形象上便有了触目的弱点和裂痕。

对西奥多的指责包括贪图淫乐、性关系混乱，对某个年轻女人有嫉妒式的情感，以及对社区企业的轻蔑态度。后来，佛蒙特的一个亲戚留给了西奥多3500美元的信托基金，他便离开奥奈达去了纽约，成员们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可一旦他投资失败、钱都打了水漂，寄回家的信也显出羞愧之情，奥奈达便接纳西奥多回来，诺伊斯也欢迎浪子回头的他。

虽然诺伊斯对儿子的过失十分宽容，但对其他挑战他权威的人，他照样不容置疑、施以铁腕，对一个叫詹姆斯·W.唐纳的人更是如此。詹姆斯·唐纳能言善辩、性格鲜明，之前在老家俄亥俄州做律师，后来突然爆出丑闻，众人发现他和妻子都是柏林海茨自由情爱社区的成员。社区的活动中心被一群暴怒的镇民烧毁之后，唐纳便带上家人和几个朋友狼狈搬走，来到纽约州，最后遇到诺伊斯，加入了奥奈达社区。

有一段时间，詹姆斯·唐纳是个积极分子；他起劲地工作，不论分到什么任务都高高兴兴，他的学识和自信也迅速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倾慕和尊重。唐纳完全赞成诺伊斯关于无私和分享的价值观，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这位奥奈达尊敬的导师有观点冲突。

1875年，63岁的诺伊斯感到了衰老和死亡的迫近，对社区宣布34岁的西奥多将会接任自己的位置，上下哗然；虽然大部分奥奈达成员不敢反对领袖的决定，可也有一小部分人起来质疑西奥多的资格，这些反对的声音中，最响亮的就是詹姆斯·唐纳。

诺伊斯害怕这个直言不讳的俄亥俄人有在奥奈达夺权的野心，对唐纳十分戒备，接下来的几年里，新一批少女开始进入性成熟期，他便故意不选唐纳和其他反对西奥多的男性做“首位丈夫”。詹姆斯·唐纳固然认为这样不公平，可这一举措更加触怒了几个年长的男性，他们多年来遵守“男性自制”和至善论，现在却被排除在生殖快乐之外，只是因为他们不支持某个年轻后裔做领导人，这个人自己就意志不坚定，却能随便进出奥奈达处女的卧房。的确，西奥多被选让三位女性受孕——再加上他父亲新出生的九个儿女，看起来诺伊斯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经绑架了这个项目，使其成为在奥奈达肥沃土地上播撒自己家族种子的工具。

要内斗，现在是最坏的时机。时值19世纪70年代，奥奈达的大门外面，神职人员和法律界人士得知奥奈达的女性非婚生产了几十个孩子，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论也谴责诺伊斯以优生学的名义创立达尔文式的野蛮系统，内在动机其实是“杀死病弱的孩子”。

经过全美清教神职人员大会，反对奥奈达的统一战线形成了。美国最厉害的审查者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也加入了反对诺伊斯的活动中。他宣称奥奈达的宗教宣传册和有关自由情爱的印刷品——大多是通过邮政传播的——侵犯了联邦政府的邮政反淫秽法令。1873年，考姆斯托克亲自

在国会鼓吹这项法案，这也为他和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下属们提供了有力的长鞭，可以随意抽打任何偏离他刻板、狭隘道德观的人。

无数卖法国明信片的小贩、鸨母和妓女，以及D.M.本内特编辑这样的自由思想者被关进了牢房，安东尼·考姆斯托克还控告——或者打算控告——展出裸体艺术的博物馆，卖避孕套的药店，出版玛格丽特·桑格[105]所著婚姻指南和避孕措施书籍的出版商。考姆斯托克怒斥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还力促开除写作《草叶集》的沃尔特·惠特曼出内政部。考姆斯托克向联邦检察官上书，造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的入狱。1872年，伍德哈尔是平等权利党派的主席，支持自由性爱、妇女投票权、放松离婚限制和节育措施；后来在她主办的周报里，还揭露了亨利·沃德·比彻在性生活方面的虚伪作为，也因此被考姆斯托克以散播淫秽为名处罚。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末那混乱的几个里，考姆斯托克的报复再可怕，这位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的战士还不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最担心的：诺伊斯听到可怕的传言，说有些最近背叛奥奈达的人，已经被政府的公诉人说服，答应出庭作证诺伊斯与社区里一些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女性有性接触；因为此事属实，诺伊斯知道自己会被起诉犯了强奸罪。

压力越积越多，执法官也在全国上下逮捕实行一夫多妻的摩门教徒，诺伊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社区。如果他消失了，至善论的敌人可能就会不再惩罚他们，就像以前在帕特尼那样。

所以1879年6月23日的晚上，在绝大多数成员，包括西奥多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另一位社区元老爬上四轮马车，驶出了奥奈达的大门，之后便再没活着回来过。诺伊斯向西横穿过纽约州，经过尼亚加拉瀑布来到加拿大，在一所小房子里安顿下来，很快他的妻子和几个旧时代的亲信也来了。他很沮丧，也很虚弱，可还是充满希望，相信有一天能回到奥奈达。与此同时，他指定了代理奥奈达事务的委员会——包括西奥多，但不包括唐纳——尽量管理这个三百人社区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还有信使定时来往加拿大和奥奈达，捎去他语气热烈的信件，里面是各种指导和建议，用于在奥奈达的集会上宣读，还有相当多的居民相信他的智慧和高贵。

可他决定自行离开，并没有减弱外界反对势力消灭奥奈达的决心；至少，神父和执法官下令终止奥奈达的优生项目，怀孕的年轻女性和未婚母亲必须与令其怀孕的男人结婚，以赎清罪恶——这项命令实施起来十分复杂，因为很多男人已经和其他女人结婚了。比如有一位最近生了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儿子的女人，也和另一个已婚男人有孩子，还与另一位无法确定身份的奥奈达人有孩子。这类无法辨认孩子父亲的事，在从前繁荣的奥奈达都不是问题，在这个避风港里，诺伊斯预言复合婚姻会成为最高结合形式，社区企业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各位上帝新娘和其后代们的生活。

此时奥奈达依然繁荣，社区新开发的银器产业也似乎正为其高达50万美元的财产添砖加瓦，但奥奈达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仰赖公众的好意和支持；如果反对奥奈达的声浪再不平息，肯定会导致人们抵制至善论社区产出的产品，最终这片美丽的乐土会变成穷困、隔绝、臭名昭著的标志。

如果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还在奥奈达，他有力的领导和无畏的精神会给予追随者们力量；可他流放期间写再多鼓舞的信，也没法减轻奥奈达的惊恐和焦虑，无法阻挡社区里出现泾渭分明的三个派别，分别提出解决现阶段问题的不同办法。

第一派，包括西奥多和几个热心商业的年轻成员，认为社区应当更加世俗化、资本化，也许重组成股份公司，淡化其神秘的宗教背景。为了平息外部的批评声音，他们愿意停止引起争议的性爱实践，至少暂时停止，也愿意公开鼓励年轻人结婚。

第二派以詹姆斯·唐纳为首，仍旧对圣经共产主义和性爱自由有着军人般的忠诚，他们认为如果唐纳先生代替那个年老的流亡领袖，让至善论者都听从他强力的领导，社区就能迅速动作反对外部的骚乱。对于奥奈达要屈服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观点，唐纳毫不动摇地持反对意见。“我信仰情爱共有，正如我信仰财产共有。”他说，“我不相信婚姻和共享能共存。”

第三派有一百人，比前两派的人数加起来还多一倍，成员主要是忠诚于诺伊斯的人，相信他是上帝在尘世唯一的代言人，甚至不能想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特别是听说诺伊斯还活着、注定了随时会回归之后。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是从帕特尼时期就追随诺伊斯、皈依至善论超过30年的元老，比如诺伊斯的妹妹哈莉特·诺伊斯·斯金纳；第一个与诺伊斯合作尝试复合婚姻的人，乔治·克拉金；还有奥奈达第一幢公寓的建筑师伊拉斯塔斯·H·汉密尔顿。

可在这一派较为边缘的部分，还有另一些奥奈达人持中立和观望的态度，或者每天都转换立场，或是仅仅关心奥奈达的资产，因为在社区围墙外没有经济支持和维生手段，这些人都在偷偷祈祷，盼着不要被诺伊斯口中的“野蛮人”入侵社区。

不安感最为强烈的，是几个有孩子的未婚女性，还有很多适婚年龄的处女。现在社区内的自由和情爱得不到保障，她们便不那么愿意为了自由情爱献出身体。很多女人这段时间都禁欲，使男人们大为懊恼，另一些女人要求比身体快感更多的东西，希望得到自己偏爱的男人的称赞——她们想被占有，也想占有别人，想从爱情的对象身上取得长久婚姻的许诺。

这种种倾向，和其他与至善论理念相违背的行为，都被诺伊斯的亲信写在信里寄给了他，他读到这些描述，很难过也很忧心。年轻的学生

和十几岁的少年似乎尤为反叛奥奈达的传统：他们自行其是，成为一对对的情侣；他们不理睬《圣经》和年长者的批评；有不少年轻男人搞到了自己的马，公开违抗奥奈达不许持有私人财产的规矩；有几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留长发，开始向往外部世界风行的长裙子。

之前，教师和保育员对每个孩子具有绝对和不可置疑的权威，现在受到了亲生母亲的挑战；母爱重新发挥作用的后果之一，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守规矩，为了抢玩具争吵，总体的纪律风气也恶化了。

除了来自奥奈达的坏消息，诺伊斯还收到了大城市报纸的剪报，只有很少几个例外，其他剪报基本都反映了全国从法律、道德方面对奥奈达的谴责，将其成员塑造成混乱、好色的怪癖者。最典型的是《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题目是：《奥奈达的古怪人群，社会主义社区的烦扰》。

外部的曝光和嘲笑仍在继续，内部状况也在恶化，诺伊斯和几个最信任的顾问考虑、谋划了好几周，最终决定，为了避免长期、昂贵的法庭战争，避免让奥奈达的企业破产，社区士气低落——更不用说一直有暴徒的武力威胁，他必须宣布放弃复合婚姻和优生优育政策。他知道，媒体会把这事解读为对敌人的无条件投降，可在1879年8月的公开声明和他之后对媒体所做的陈述中，他却显出不知悔改的强硬态度，甚至暗示有一天自己的子民会再次享受到永恒关系的欢乐仪式。

官方声明是这样说的：“我们放弃复合婚姻的实践，它已经在社区里实行了33年。我们并非抛弃对此制度的原则和其未来正义性的信仰，而是为了缓解明显和日益上升的社会反对势力。”在另一份声明里，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社区对过去毫不后悔；恰恰相反，受到上帝的征召而实践这样先锋的工作，我们感到幸运；对于此次试验的总体结果，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没有放弃过去的信念，只是为了当前的大局稳定，暂时放弃复合婚姻，遵从圣保罗的教诲，他允许婚姻，然而更支持独身。”最后，仿佛是在为至善论的最高目标和其对19世纪美国的贡献做历史评价一般，诺伊斯写道：“我们冲锋到了未知的地域，为它绘制了地图，然后安全返回，没有损失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虽然诺伊斯把圣保罗拉到统一战线上，宣称独身是最可追求的美德，他本人却没做出任何牺牲，那时他已经68岁，在壮年时充分享受了自由情爱的好处，现在则可以在加拿大的隐居地颐养天年，看着九个在奥奈达出生的孩子茁壮成长。这些孩子随他的姓，在20世纪里追忆他的荣耀。事实上的确有一位诺伊斯后裔，一位勤劳刻苦的年轻人，皮尔庞特·B·诺伊斯——母亲是9岁时被带到奥奈达的哈莉特·沃登——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奥奈达的领袖。后来在他的子嗣的帮助下，20世纪70年代，把奥奈达的银器生意发展至跨国公司，市值接近1亿美元。

然而，即便是支持自由情爱的人，也无法把不断增长的财富归因于

多元性爱带来的能量，因为自1879年诺伊斯宣布放弃复合婚姻，老奥奈达的奢侈性爱再没有重建过——虽然必须补充说一句，奥奈达很少有人相信诺伊斯迟来的独身教诲。诺伊斯发表新的信条之后，外部的仇恨因此平息，社区内大部分独身的年轻人两下权衡，选择了缔结婚约。

很快，奥奈达迎来了37场婚礼，大部分都由奥奈达成员主持，在公寓前葱翠的草坪上举行。可还有些成员——包括12名40岁以下、有孩子的女性——一直没有结婚，他们是不是支持独身主义、那些结婚的成员是否忠于彼此，奥奈达的历史学家并无记录。大多数新婚夫妇选择留在奥奈达，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或者附近小些的房子里，也继续在社区内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

1880年，奥奈达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其226名成员都成了奥奈达社区有限公司的股东。在股份分配方面，至善论的元老拿到了价值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股份，新加入的、年轻的成员拿的比较少，这成了社区内的矛盾焦点；而且不出所料地，对股份分配最为不满的成员，也是最不满诺伊斯坚持放弃复合婚姻制度的成员——就是詹姆斯·唐纳和他的30个追随者。

1882年，71岁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加拿大去世——尸体被送回奥奈达埋葬。那之前四年，詹姆斯·唐纳与其派系退出了社区，将股票换成现金，坐着一辆马拉的篷车，开始向西长途跋涉，来到气候更温和，联结更松散的南加州土地上。这群人在洛杉矶南部的圣安娜安顿下来，慢慢融入了当地环境，幸福而繁荣——后来，詹姆斯·唐纳被选为此处地方法院的法官。

狂风击打人的自负，让它啜泣
 和尖啸，留下赤裸惊惧的灵魂。
 随风而去，虔敬如一。
 因恐惧紧闭窗帷，与永恒失之交臂
 还有那明艳、跃动的自我的火焰……

那么所追寻的是沉思领悟无限。
 去它的门前，大胆地叩问意义。
 长途漫漫，满是贪婪的庸人
 渴求与你的根脉交缠。
 抛之脑后，因为他们与夏日同朽……

——约翰·威廉森

当约翰·威廉森1970年开始为砂岩隐居地招募新人时，很多人像他一样相信“新生活方式社区”的时代在美国终于来临了。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全国估计已经有将近两千个此类居所，大小各异千差万别，遍布在农舍、城市阁楼、山腹庄园、沙漠坯房、网格球顶的大厦以及犹太聚居区的廉租公寓里。住在里面的有嬉皮士园艺家、爱冥想的神秘主义者、时髦人物、耶稣迷、崇尚环保的福音派信徒、遁世的摇滚音乐家、厌倦的和平请愿者、辍离公司的人，还有威尔海姆·赖希和马斯洛、B.F.斯金纳 [106]，以及维尼熊的忠实信众们。

俄勒冈州尤金市以西几英里处有一个占地80英亩的定居区，是由一群经营肉牛生意的性解放的中西部人创建的。在加州伯克利，受到罗伯特·默一本性乌托邦小说的感召，璧人们比翼齐飞地——当然不总是和和气气地——住在一座叫“哈罗德西区”的大房子里。在奥克兰市郊拉斐特林地中的一个僻静所在，住着34岁倡导“负责的享乐主义”的维克多·布兰科，他在房地产开发中赚了钱，现在在加州和其他州拥有几个迷你社区；《滚石》杂志称他为“社区界的山德士上校 [107]”。

在离新墨西哥州圣克里斯托瓦尔不远的地方，一位纽约艺术家和他受过斯坦福大学教育的妻子建立了占地130英亩的拉玛社区；而在科罗拉多州群山中、毗邻沃尔森堡的地方有一簇属于“自由社区”的小木屋，它的成员中有油漆工、陶器匠、皮革匠等。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市以外十英里是奥兹嬉皮社区，它的土地是从一位前海员兼商人手里继承过来的；而在弗吉尼亚州中部离库尔佩珀镇不远的地方，一群年轻的社会理论家创建了120英亩的双橡园社区，他们还经营农场，生产吊床，把自己的主要居所叫作“奥奈达”。

在纽约城，崇尚精神的社群主义者住在褐砂石房屋 [108] 中间的静修院里，他们不练瑜伽和吟诵曼特罗 [109] 的时候就外出做木匠、泥水匠、油漆工等。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组织一个多世纪前被驱逐，而现在在这里已经成立了五个反主流文化的社区，其中最无政府主义的“红苜蓿部落”，大体是由一位麦片生产世家的公子提供财政支援的。佛蒙特州北部边远地区还有一个叫“布林阿斯”的农业社区，那儿有不少赖希的读者，他们相信，一夫一妻制、占有欲、妒忌和战争确实紧密相连；但这个社区，像许多类似的充满学院派激进主义者的农业社区一样，面临财政困境，因为成员们花太多时间阅读严肃书籍和在壁炉边高谈阔论，所以就没有多少时间在牛舍挤牛奶了。

一位叫罗伯特·乌里耶的作家屡屡有如此印象。1968-1971年间，为写作《破镜重圆》做调查时，他拜访了全美几十个社区。尽管对弗吉尼亚州的双橡园等地所呈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高效率充满钦佩，但他无法忽视有很多社群主义者没有戒律和决心来践行他们的理念：他们谴责外面的污染和铜臭，自己却在满是迷幻剂的污浊小棚屋和阁楼里弄出来一种垃圾文化，这些地方挤满了嗑了药亢奋但精气萎靡的流浪汉。罗伯特·乌里耶所到之处都听到年轻人高呼着渴望与地球有机和谐地共处，渴望栖居于远离贪婪和敌意的和平之所，但是他在社区中也发现自己“被口水战和马拉松一样冗长的会议淹没，会上人们甚至无法决定是否该把狗关在门外。到处都是不能开的车和不能抽吸的泵，因为所有人都对塔罗牌的神秘历史了如指掌却对机械学一无所知。到处都是人们在为自给自足、脱离资本主义系统而奋斗，但他们却又接受食品券和老爸——一家卖维生素P的公司——的施舍。残羹剩饭堵住了水池，奶牛从没关的门里溜达出来，却没有人被责怪。到处都是摇摇欲坠和顷刻无常。总有人要离开，卷起行李，包好吉他，向人们吻别——他们要再度去寻找真正自由、无忧无虑的社区”。

约翰·威廉森很清楚这样的社区往往会吸引无根游民，他格外小心在砂岩不要吸收太多这样的人。虽然他想要反主流文化的伴侣加入砂岩体验——甚至在洛杉矶地下刊物《自由报》上登广告说砂岩要扩招，但他刻意不透露地点，只列上了城里一个租来的小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这样他的下属就可以一对一地面试申请者，向他们说明加入砂岩的基本要求和代价。

因为砂岩没有农场或产业来维持生计，威廉森决定接收大概200名

付费会员，每年交240美金就可以把砂岩当作某种俱乐部：白天可以来游泳池游泳，在主屋的露天平台裸体晒日光浴，在草坪野餐；特定的晚上还可以和“大家庭”共进自助晚餐，通常是裸体的但并不强制如此，餐后他们可以小心翼翼地下楼到一个60英尺×20英尺的大房间里，那里灯光朦胧，铺着红地毯，任何人想要都可以在排列好的软垫和大枕头上做爱，或者仅仅是听立体声音乐放松一下，或者在壁炉边交谈。

为确保所有准成员都预先收到警告：砂岩会有放纵的夜晚，每个申请者在面试时都会领到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

砂岩背后的理念包括：人的身体是善的，公开表达爱与性也是好的。砂岩的成员只要不粗鲁无礼或把自己的欲望强加于别人身上，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这里没有安排好的活动，不需要学习行为方式，也没有导师。在交互友爱的精神之下，成员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砂岩体验中强烈而持久的重要性在于人与人的接触，但并非像鸡尾酒聚会那样充满了计谋戏耍和躲躲藏藏。在砂岩，接触包括基本水准上如实的、身体的赤裸和公开的性爱。在这些方面，此体验的意义远超任何理性的分析。行动的真实性，以及在基本层面上的接受与被接受，没有任何保留和掩盖，是砂岩体验的精髓。它超越了幻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在那里所有人的精神、身体和存在在彼此之间都不再陌生。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成为愉悦的源泉而非冲突的缘由。

砂岩为数不多的严格执行的规范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成为成员；设施内不可使用任何毒品；另外，为了保持性别平衡，只有伴侣们可以结对参加晚间的活动。尽管晚餐伴有葡萄酒，饮用烈酒却被劝止。在办公室的初试，以及之后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砂岩主屋进行的复试里，他们都下了很大功夫来了解申请者是否有酗酒、吸毒，或者精神疾病的历史，或任何可能被砂岩高强度的性氛围所唤醒或恶化的问题，在砂岩，忠诚的伴侣们可能会第一次充分了解甚至目睹他们爱人不忠的行为。

约翰·威廉森想要尽可能召集大量稳定的伴侣，那些相信如果没有性独占，私人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的年轻中产阶级肉欲主义者。威廉森也希望能囊括较多媒体和学界的代表、商业领袖、律师、医师、作家和社会科学家，这些“改变的人”也许可以将砂岩的哲学用文字——如果不是用行为——传播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以及愈发接受新观念、新价值的消费大众。

威廉森为了和影响力的人会面，可能的话也吸收他们，给著名的

大学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发了邀请函，邀请他们来砂岩做一天客；他雇了专攻公关的同事，在媒体接受采访；和妻子芭芭拉一起，不远万里去研讨会上发言，那些研讨会探讨新生活方式社区和婚姻模式变革等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群山间的科克里奇隐居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威廉森发表了一篇演说来解释砂岩的目标，听众包括罗伯特·弗朗克尔——他从天主教神父变成了作家、丈夫和费尔里·狄金生大学的胚胎学性学教授；拉斯特姆和德拉·罗伊，两位宾州州立大学的化学家，也是一对富有经验的夫妻关系顾问；斯蒂芬·贝尔茨，身任费城行为矫正中心执行主任的心理学家；小说家罗伯特·里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听了威廉森的演讲对他在加州的实验饶有兴味，想要拜访砂岩看看那儿都发生了什么。

威廉森在远方撩拨起人们的热情时，家乡的“大家庭”可不是那么理想化地与他合拍；甚至他在砂岩时也似乎总是那么高瞻远瞩，从亲密圈子中游离出来，关注未来的计划，花大量时间款待重要访客，将他的魅力和性精力用于追求满足新欢。

第一个察觉并怨恨威廉森善变性格的人是朱迪斯·布拉洛，她过去曾被她热烈追求过，也习惯甚至是依赖上了威廉森的特别关注，现在感觉自己有些像旧物被弃之不理。为了他，她中断了家庭生活，离开郊区舒适的家，带着孩子和心怀不满的丈夫举家迁移到托潘加峡谷一个租来的农场里，只为了能离砂岩近些，能方便帮助威廉森他们清扫、油漆、改建、造园和其他装修。现在，完工的屋舍光彩照人，却不过成了玻璃橱窗，展示着威廉森的自我和不断扩张的野心。

威廉森不再是表面上那个罗曼蒂克的古鲁，他真正的职业更像是精打细算的工程师。在朱迪斯的眼里，威廉森正将砂岩变成一个家庭实验室，裸体大家庭像模型一样被展览，吸引新成员、新资金，以及威廉森一直想得到的学术界的兴趣。他高中之后就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唯一能为砂岩赢取学界地位的方式是建立一个顾问团，成员由大学认可的科学家和随机的行为主义者组成。顾问们自身的欲求在砂岩获得满足，也许会帮助威廉森在未来获取私人甚至政府基金，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研究妒忌和占有欲的根源——而朱迪斯认为除非人们不再深深在乎彼此，否则妒忌和占有欲无药可医。

朱迪斯相信，虽然约翰·威廉森并不限制自己的妻子，但事实上就连他也受到性独占欲的影响；他似乎挺反感珍爱的奥拉利亚·利尔现在越来越多地与戴维·施温登单独相处，而且当朱迪斯向威廉森承认自己也被施温登的身体吸引时，她觉得他的反应也很不满和消极。

朱迪斯不理睬威廉森的反感，有天在孩子们去上学、丈夫去保险公司上班后邀请戴维到家里来；但她没把这次，还有接下来的另一次约会告诉任何人。不过她对这些幽会很不安，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因为觉得威

廉森会反对，就遮遮掩掩一件其实和他毫不相干的事，这让她备感困扰；也因此她渐渐承认威廉森对她的私生活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整个处境充满了矛盾冲突：威廉森，直言不讳地拥护不独占的、开放的性爱，但在对待奥拉利亚和她自己时似乎很伪善；而朱迪斯对威廉森与新欢的“不忠”心怀怨愤，也或许在用和施温登私通来悄悄地报复，这些都是在嘲讽她自以为加入威廉森的团体后就获得了自由解放。除去她和丈夫都心知肚明的通奸，有可能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占有欲强、在性方面内疚缠身的传统女人；在这种固执的自我怀疑中，再加上威廉森对她的生活难以捉摸的影响令她心烦意乱，朱迪斯决定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威廉森和他正在幻灭的乌托邦。

不过，使她下定决心的关键性事件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表面上看来与她和威廉森的关系、她的性生活、她的婚姻、孩子，或者任何非常私人的事情毫无关联。导火索只是她的宠物猫。

一天朱迪斯发现她的猫刚下了一窝猫崽，她被这个新妈妈迷住了，满心欢喜地看这只咕噜叫的花猫宠爱它的孩子，给它们舔毛喂奶。下午的时候她注意到母猫叼着小猫从屋里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好像在寻找一个更温暖舒适的地方。但是母猫似乎总不满意，把猫崽们聚在屋中某处后，它又会再把它们叼起带到另一处，循环往复；当朱迪斯饶有兴致地观察时，她开始认同母猫焦躁不安寻寻觅觅的天性。

那天晚上，朱迪斯和丈夫用过晚餐，孩子们都上床睡了后，她听见汽车开进车道，透过窗户她看到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来了。不提前打电话就拜访，这在加州很常见，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都这样，通常她也毫不在意；但在现在这情形下，她还沉浸于和猫在一起的宁静下午，日间还仔细考虑了要与自己的家庭更加亲近，因而威廉森夫妇的突然到访就被她看作是侵扰了。

朱迪斯挤出一个微笑在门口欢迎他们，热过咖啡后，她和丈夫坐在客厅听芭芭拉和约翰解释他们在城里忙的事情，在回砂岩的路上顺道过来看看。他们继续闲聊，提及这几周没怎么在砂岩看到朱迪斯，这时朱迪斯注意到她的猫仍旧走来走去，嘴里似乎叼着一只小猫；再一看，朱迪斯看到一条又长又细的尾巴在猫嘴角晃荡，她突然意识到猫正紧紧咬着一只血淋淋的大老鼠。

朱迪斯惊叫着跳起来，让所有人看她的猫在壁炉边蜷来蜷去；她滔滔不绝地说起这只猫——毫无疑问它整个下午都知道有这只鬼鬼祟祟的老鼠——为了保护猫崽如何不断地把它们移出老鼠的攻击范围，直到它最终决心短兵相接，铲除威胁。这个小插曲对朱迪斯来说有象征意义，她是如此沉浸于对猫的自豪感，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威廉森夫妇全无她这般的热忱。

朱迪斯这样一个看起来自由开放的女人竟然会如此认同一只家猫的母性本能，威廉森夫妇对此表达出来的，若不是其他情感，也是无聊和

厌烦。朱迪斯的丈夫保持着沉默，朱迪斯却已与客人们争吵起来，狂暴地为自己辩护。后来想想，朱迪斯觉得，自她加入威廉森的团体以来就没有尽到身为母亲的职责，那一次只是长久累积的焦虑和疑惑的总爆发。

但是现在，多少自我审视也无法缓解她对威廉森夫妇的愤慨，他们无子，就对身为父母的情感不闻不问；那晚当威廉森夫妇离开后，她对丈夫说她和约翰·威廉森结束了，她准备好了搬出这里，和砂岩断绝一切关系。

在其他任何时候和情形下，约翰·布拉洛都会乐意接受她这个决定，会很高兴能把威廉森赶出去，恢复自己对家庭生活的一点儿掌控力。但那时他犹豫了，向朱迪斯承认他现在不是很想离开。他解释他终于开始适应这个地方，喜欢和这儿的各色人等在一起，甚至和约翰·威廉森发展出值得信赖的友谊。布拉洛现在觉得可以从威廉森那里学到很多，他不怀疑，自己和威廉森做朋友后已经变得更有自我意识了；自从威廉森挑动他独自走进沙漠后，他更加思想独立，能够忍受孤独了，布拉洛自己后来也重复过几次这种治愈性的冒险。

不过他没向妻子坦白的是，看到最近威廉森的冷淡给她的自尊造成的伤害，他多少有些开心，也不反对她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多感受一下威廉森日渐消逝的热情。他想，现在该轮到她受苦了，就像她最初迷恋上威廉森，在那刻骨铭心的夜晚与威廉森在小屋的火炉边做爱所带给他的痛苦一样，这些事都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但布拉洛认识到自己对妻子的义务，他不能不顾她感到的痛苦；他也不能忽略，最初是他把她带到威廉森的世界里去的。他也知道，如果她继续郁郁寡欢只会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婚姻，他不想毁掉它，也不想因此给两个他们都深爱的孩子带来不幸。

威廉森夫妇拜访之后的几天，布拉洛注意到更多朱迪斯消沉的迹象：从办公室回来时他可以看出她下午喝了酒，晚上在床上时她冷漠疏远，暴躁易怒，不愿意做爱。一天晚上他想和她亲近，她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把孩子们都吵醒了。第二天早上她很懊悔，答应去看心理医生。她再次提到离开托潘加峡谷，这次布拉洛同意了。所以每天下班之后他便帮她整理打包。不久他们就做好搬回伍德兰希尔斯郊区的准备了。

因为有租户住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合同还没有到期，布拉洛一家必须短租另外一个地方，找到这个地方倒是意想不到的容易。虽然那房子比他们自己的略小，但满足了他们暂时的需求，而且它坐落在一个整洁又有夹道绿荫的街区，那儿修剪齐整的篱笆和平缓的街道，与峡谷里尘土飞扬的崎岖山路、悬崖嶙峋的氛围形成了可喜的反差。从这儿布拉

洛每天可以很方便地往返办公室；而朱迪斯想要在孩子们上学之后也有事可忙，便在附近的医院找了个做白班护士的工作。晚上他们通常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很少会出门。取而代之，他们在客厅听音乐、读书，或者看电视，他们早早上床休息，为尊重朱迪斯的意愿，并不做爱。

约翰理解她的选择，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觉得是她与威廉森分手之后对所有男人的消极反应；他相信，他们在自己家里安定下来之后，更适应郊区生活和彼此之后，情况就会好转。但就在他们快要搬回去时，朱迪斯竟然恳求约翰不要和她一起，使他极为震惊；她请求给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应付自己无常的情感。

约翰虽然心烦意乱，还是同意自己先在外面租一段时间公寓，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事。他愿意做任何事来恢复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也相信朱迪斯也在为之努力。她不酗酒了，开始看心理医生，工作也似乎勤勉守时。从自己在附近恩西诺小镇的公寓，他开一会儿车就能看到孩子们，每周两晚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去自己的住处玩儿。每天他都给朱迪斯打电话，在他们分居最开头的几周里朱迪斯让他放心，虽然还没做好让他回来的准备，但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每天开车上下班时，他常常多开几个街区只为经过自家房子，他向自己解释说，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他关心家里过得好不好；但当他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做，没日没夜地在埃特纳街上来来回回地开时，他也就明白了这是因为自己对妻子的直觉，对她忠诚的怀疑，害怕她可能是不想让自己在家，这样就能更自由地和其他男人约会。

不久之后，布拉洛就注意到家门口常常停着一辆蓝色的庞蒂亚克 [110]，不是威廉森的，也不是布拉洛认识的任何人的。有时候它一大早就停在路边，傍晚才走，但晚上孩子们大概都睡了的时候又会回来。观察它几天之后，约翰再不能压抑焦虑，当面指责朱迪斯在见另外一个男人——而她平静地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想。

布拉洛勃然大怒，无法控制自己。他感到背叛，被羞辱，惊呆了。他想知道那男人是谁，但朱迪斯只说是她最近遇到的一个人。布拉洛要她不再见那个男人，而朱迪斯看起来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心不在焉，回答说她没法保证。布拉洛更加气急败坏地谴责朱迪斯为孩子们树立了糟糕的道德榜样，提出孩子们应该和他一起生活；但朱迪斯回答，她没法和孩子们分开。布拉洛威胁要动用法律手段时，她沉默不语。

第二天晚上布拉洛又看到那辆庞蒂亚克停在路边，他一时冲动想下车去敲房门，和他的情敌打个照面；但又把这冲动抑制住了，因为不想在孩子们面前造成可能的暴力场面。不过他记下了庞蒂亚克的车牌号，在他多年混迹保险业所结交的熟人们的帮助下，他不仅知道了车主是谁，还知道了他的私生活。除了其他种种，布拉洛被告知这男人是戒酒协会的成员，曾经无业，四处游荡，他也曾因施暴和殴打被警方拘捕。

当布拉洛把这些告诉朱迪斯的时候，她变得满怀敌意，谴责他侵犯别人的隐私，还说她早就知道那男人的背景了，他已经亲自告诉过她。而且，她告诉丈夫，他这种恶意刺探只让她确信了和他分开是明智的；这次不管布拉洛怎么解释也没法填补他们之间的鸿沟，之后的很多次对话也于事无补。她说她需要给他们的婚姻放个假，想要自由自在的，不再对一个丈夫负责。她继续说，要不是有对孩子和工作的义务，她也许已经和情人离开镇子去另一个城市开始新生活了。

尽管布拉洛难以相信她真就是那个意思，而且竟能如此迅速地和一个男人好上，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所有和解的希望，脸色阴沉地和她一起办了分居手续。他同意给孩子们付抚养费，她每周给他几天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也答应不让任何男性朋友在家过夜。

之后几个月里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仍旧定期相见，不过都是在约翰来见孩子的时候简短地会个面。她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适应了分居的生活，精神很好，看起来也更能控制情绪了。尽管现在她见情人的次数也少了，承认这点时她口气里并没有懊悔之意。实际上，她现在不只和一个男人约会，也结交了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新朋友。约翰毫不怀疑，她对自己的生活就算不是乐不可支，也至少是心满意足。他自己的境况可没有这么好。

对他来说最近几个月紧张狂乱，令人沮丧。他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约会，但是最轻微的关系发展都让他退缩。尽管两次接受威廉森夫妇的邀请参加砂岩的聚会，还有一次周末一起出游，那次他们还带来了迷人的女伴，他仍旧觉得被冷落、郁郁不乐。现在得不到的朱迪斯似乎比原来更加撩人心意、不可取代了。

工作也从没像现在这样令他厌烦。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待了十年，最近好几个月来注意力在工作和烦扰的婚姻之间游移，布拉洛觉得自己最好在解雇之前辞职。他估计，用存下的那些钱他可以生活一年，不用正式工作，所以他打起精神递交了辞呈。

他想骑摩托短期旅行，在沙漠里待一段时间；而且大胆地承认了很久之前的雄心壮志：他想写一部小说。那将是不顾廉耻的自传体，一个关于他婚姻的故事。过去，当他妻子被勾跑，而他自己在办公室和砂岩间穿梭往返的时候，他记了大量的笔记，写在公司信纸上和黄色的标准拍纸簿里的日记，描述对身边的事和自己心理状态的印象及反应。

这些日记是有意识的发泄，但现在当他回头再看的时候，却因窘迫而畏缩。重读自己的生活没有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反而加重了它：在棕榈泉的保险业大会上与芭芭拉的第一次性接触；约翰·威廉森以问题解决者的形象出现；在穆赫兰大道威廉森家的裸体夜晚；那时看起来如此心花怒放自由解放的几个月；现在它们像毁灭与混乱的序曲一样阴森地逼近。他看出来，曾使他生活稳定的爱与秩序，不论是什么，都已经献祭给了一时兴起的试验与反复无常。他试着想象那些夜晚，要是他没

有带朱迪斯去——那里奥拉利亚、盖尔和阿琳·高夫看起来如此魅惑而触手可及，他的婚姻会怎样；不过他怀疑，就算他抵制住了威廉森解放传统婚姻窒息束缚的允诺，结果也还是一样。尽管看到朱迪斯回应其他男人让他非常痛苦，布拉洛并不是不清楚自己获得的许多补偿，但当他现在读起自己空洞的回忆录，一切似乎都简化成情绪的碎片，毫无意义地消散了。他孤独一人，没有工作，丝毫没有希望。

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继续去看望孩子们，却已被盲目迷惘占据。就是在这种颓唐的状态中，他听到了阿琳·高夫的消息——他和她曾有一小段情史，但她和朱迪斯最近一样已经离开威廉森的团体，消失在山谷里。阿琳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她被发现身中一弹，死在家里的床上。警察在她身边发现另一个死者，是她的情人，《洛杉矶时报》年轻的新闻记者。楼下的桌子上有一把刚开过火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几个小时后，警察逮捕了阿琳·高夫16岁的儿子，控告他犯下双重谋杀罪。

傍晚夕阳消逝在山后的时候，几十辆汽车爬上山路向砂岩驰去——开着外国轿车和敞篷车的贝弗利山探险家们，身着古驰鞋和裁剪合体的细帆布衣裤；旅行车和私家车载着发型时髦的情侣们从山谷和奥兰治县绝尘而来；大众牌巴士和丰田牌轿车从托潘加下区和威尼斯海滩运来长头发的年轻人，他们将车停在砂岩地产西角之后，不忘拿下悬挂在烟蒂夹上的大麻烟，吸了最后一口。

到访者即便在进主屋之前，从正门旁巨大的落地窗中已能看出派对开始的迹象：马车轮形的吊灯悬挂在屋梁上，灯下大家庭的成员和早到的客人们手拿饮料站着聊天；巨大的砖石壁炉中火焰熊熊；而在屋正中惯常的位置上，扈从环绕之中，安坐着那位壮硕、金发的君王，全身赤裸。

约翰·威廉森点点头，向新到者中的熟人轻轻微笑；但他们得先获得芭芭拉允许才能进入屋子接近约翰。芭芭拉站在一张登记桌后，手里拿着笔，浑身上下只戴着一副眼镜——这副平常的金边眼镜和她书记员般的面容很相配，却愈发反差衬托出她小巧坚定的下巴下，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如繁花盛开般迷人的身体。

芭芭拉并不乐意做守门人的工作；她更想做适合她砂岩第一夫人身份的轻松点的事——但没人能像她那样高效地完成这微妙的任务：她需要巧妙而坚决地挡下非成员和徘徊的不速之客，拖欠会费的、没带异性同伴的，以及因违反俱乐部规定被暂停身份的成员也被她拒之门外。要是换一个男性家庭成员来拦，被拒的人可能会暴烈地反抗，要是换奥兰治这样不那么令人生畏的角色，又可能遭受花言巧语以求通过。芭芭拉简明务实的风范似乎把门口的冲突减到了最少。她虽然一直很礼貌，但明显不会为心口不一的奉承、男子气概的显扬、暗示的威胁，甚至是公然挑衅所动。有一件轶事把她镇定自若的天性彰显无遗，尽管可能被夸大了，但这故事被砂岩成员们愉快地传唱。一次，芭芭拉开车经过峡谷的时候，看见一个挣扎的女人被推到路边一辆车上骚扰，那男人显然是想强奸她。芭芭拉把车停在路边，跳出来，无畏地走近喊道：“放开她！你要是想操谁，可以操我。”那男人大吃一惊，迅速就畏服撤退了。

但芭芭拉要是愿意，也可以非常妩媚娇柔，尽管她在门口时是个严厉的哨兵，也并非毫不通融：她有直觉，欢迎那些虽是不请自来却可能对砂岩有用的人，或至少是身份体面能被介绍给她丈夫的人。砂岩越来越富庶、越来越放宽俱乐部经营方式后，很多只身前来的被偏爱的人也可以入内，成为荣誉会员，因为他们的到来，意味着其在智识方面认可威廉森夫妇的研究方法和目标，就算不是认可，至少也是饶有兴趣。

有几个晚上他们围聚在壁炉边交谈，穿着或多或少，有的时候全裸。这里有英国生物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他之后写了《性的愉悦》；心理学家和作家菲莉丝和埃伯哈特·克龙豪森，他们将在旧金山创立色情艺术博物馆，展示其广泛收藏中的精品；婚姻咨询师威廉·哈特曼和玛丽莲·菲西安，经常被称作西海岸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纽约邮报集团的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曾是洛杉矶公羊队橄榄球明星，现在是诗人和演员的伯尼·凯西；兰德公司前任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安东尼·拉索，他们已经复印了五角大楼文件，正被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艺术家、女性主义者贝蒂·多德森，在纽约威克沙姆美术馆的个人展上，她描绘情欲的壮美画卷令参观者眼花缭乱、惊叹不已；格罗夫出版社的编辑肯特·卡罗尔，正计划拍摄和发行关于砂岩的纪录片；性学研究的专业作家爱德华·M·布雷赫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密友；洛杉矶《自由报》主编和前业主亚特·昆金，1969年他吃了官司，被罚5.3万美元，因为他刊印洛杉矶毒品贩子的姓名住址，这件事导致他将报纸卖给了马文·米勒，一个性文学出版商，后来米勒自己在一个色情读物官司中被定罪，这案子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以里程碑式的1973年“米勒判决”告终。就是这案子中的观念威胁到全国所有自由的性表达，取代了1957年反对考姆斯托克且广受赞扬的“罗思意见书”。

尽管砂岩的起居室有时像个文学沙龙，楼下却仍旧是寻欢作乐者的欢场，那里的景象和声响，就算很多访客熟谙性爱艺术和文学之道，也从没想象过会在同一个晚上同一屋檐下遍览。

走下铺着红毯的楼梯，访客进入一个半明半暗的大房间，在那里会看见，斜倚在有垫褥的地板上、沐浴在壁炉橘黄色光晕里的满是阴影覆盖的面庞、交缠的四肢、丰满的乳房、张开的手指、上下移动的臀部、闪光的后背、肩膀、乳头、肚脐、金色长发散开在枕头上，粗黑的手臂抱紧软白的屁股。叹息、极乐的叫喊、交合的肉体相互撞击和吸入的声音、笑声、喃喃低语、立体声音乐、燃烧的黑炭木噼啪作响。

访客的眼睛适应黑暗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众多形态、尺寸、质地、色调：有些伴侣盘腿坐成一圈休憩闲聊，仿佛在沙滩上野餐；其他的以各种体位抱在一起……

屋子一角，在墙壁上急流而过的旋转光线中，点缀着裸体迪斯科舞者黑色的剪影。……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像高级时装模特那样的，像橄榄球后卫的，像瓦格纳歌剧女高音的，速泳运动员的，或者肌肉松弛的学者的；文了刺青的胳膊，平安珠，足镯，生命之符 [111]，细小的金腰链……美国再没有其他房间有这样的景象，仿佛一剂视听催情剂，耶罗尼米斯·博斯画作的活人展现。

所有美国清教徒想判为非法，想审查，想藏在反锁的卧室门后的一切，都在这间成人游戏室里展览，那里很多男人第一次看到其他男人勃起，很多夫妇看到自己的配偶与新情人交缠在一起，被刺激、震惊、愉悦、悲伤等情绪交替占据。就是在这儿，一天晚上约翰·威廉森看到芭芭

拉被一个英俊健壮的黑人满足，有那么焦虑不安的一会儿，他沉浸在少年时期对南方乡下人的情绪里。

生物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医生常常全身赤裸，挥舞着雪茄，穿过整间屋子在俯卧的身体间闲逛，那专业的神态仿佛鳞翅目昆虫学家挥舞着捕虫网在田野上漫步，又或鸟类学者在海浪间追踪一种稀有的燕鸥。康福特医生头发灰白，戴着眼镜，面孔像猫头鹰般严肃精明，身体保养得很好，他不怕羞地被情侣交合的场景和他们的柔情低语深深吸引，认为那既迷人又充满无穷教益；只需稍加鼓舞，在把雪茄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后，他就会加入一群友善的身体，为这欢愉添砖加瓦。

康福特有个好姓 [112]，在人群中怡然自得，也能让初次接触聚众裸体和性交而紧张局促的人舒缓下来。在医学同行中他是稀有的能把对病人亲切的临床态度带到纵欲聚会中去的人。安抚人心、诙谐幽默、博学广知但从不自命不凡，康福特博士的镇静和愉悦对身边人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几乎没人注意到他用来熟练地做群体按摩的左手上其实只有一根健壮的大拇指。30年代只有14岁时，他在英格兰家中的实验室里，一次过于热切的火药实验，炸掉了他的其他四根手指。尽管失去这些手指最初令他消沉压抑，“罪的错觉”久久缠扰，令他寝食难安，也严重限制了他演奏钢琴的精湛技艺（虽然如此他仍旧会弹），却不妨碍他未来成为一位产科医师、诗人、小说家、丈夫、父亲、BBC的战时无政府和和平主义哲学家、老年学家，以及身体力行的性学研究者。

事实上，那场事故之后的十年中他出版了十本书。第一本从15岁时开始写，是描述他乘坐一艘希腊船游历南美洲的游记；第十本是关于“二战”时法国陷落的小说，写于24岁，那时他已经在名人录上榜上有名。其时他也作为医学学生从剑桥毕业；几年后成为执业产科医师，他发现，自己受伤的手和灵活的大拇指在施行子宫内翻修复术时倒颇有优势。

早在写作《性的愉悦》很久之前，康福特就已经因为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开放态度，成为英格兰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1963年，那一年普罗富莫的应召女郎丑闻 [113] 震惊了保守党政府，也是许多道德改革家事业的开端，而康福特因公开在青少年中推广避孕用具和避孕药被很多人诋毁；后来一个女教师指控，有个学生在读了康福特博士的一篇论文后感染上了性病——这一传染病案件的指控，康福特不无欣喜地发现，并没有获得法庭多少支持。

1970年搬到加州圣巴巴拉之后，康福特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做高级研究员，他听说了砂岩，不久就来拜访，这是他之后众多拜访的第一次。虽然他已经是个习惯了的裸体主义者，是英格兰第欧根尼裸体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波尔多北海岸像蒙塔利韦这类隐居地的常客，但他还是立刻被砂岩开放的性行为吸引住了，这给他一个在非实验室环境下观察

人类交配行为的机会。

在这里他可以看到解剖学上的多种样态，丰富的前戏，以及真正陌生人与人之间交换的非法的柔情。康福特早些时候遇到一个看起来很怕羞的女人，她和丈夫一起来到楼上，在那里她似乎对脱掉衣服感到窘迫不安，而现在正裸体在楼下和另一个男人打得火热……

很多夫妇只是满怀惊叹地看着一切，对他们来说到访砂岩是一种学习，一堂生物课，一个机会去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逐渐增长性的知识，传统上人们用这种方式去学习几乎所有事，除了性。康福特相信，在砂岩的一个晚上，访客们能学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性自我的知识，比从所有权威的性手册和性学家主持的研讨会上学到的还要多。

在这儿他们可以观看其他人的众多技巧，听到各种回应，看到脸上的表情，肌肉的动作，晕红的皮肤……一些访客私下沉迷，却从没向情人要求过的特别的挑逗方式——因为这些嗜好似乎很“怪异”——在楼下常常都能看到，因此砂岩能使访客安心和认同自己。需要相当长时间刺激才能达到高潮的女人，之前怀疑过自己是否正常，但她会在砂岩发现很多女人都这样；曾被其他女人吸引却厌恶想象女同场景的女人，会看到自由的异性恋女人在三人四人性爱中爱抚其他女人、对女性愉悦兴奋地感同身受。男人也是这样，虽然比女性更在意同性恋的阴影，但也会在赞同群体性爱的氛围之中触摸其他男人，按摩男性身体，与男人接吻，就像几十年前，在清教徒社会男性青春期结束的仪式中亲吻父亲的嘴唇一样。

想要摆脱婚房里的无趣又不愿毁了婚姻的夫妇们，在砂岩通过接触其他人来鼓胀情欲，之后再将这种性能量导回婚内关系。男人注意到妻子激起其他男人的性欲，很多时候也会被吸引，力图再次占有她；而女人，尤其是长期在一夫一妻婚姻中的女人，能和新的男人重新体验被渴求的旧感觉，性方面自由自在，无需负责……尽管方式并不总与他们的婚姻相调和。

一些女人刚经历烦扰的离婚，尚未准备好投入新的恋情，暂时将砂岩当作了第二家园，一个能把约会对象带来，又能通过与他人做爱和相伴来保持独立性的中转站。对于性欲旺盛、多少带有侵略性的女人，在这儿她们可以大胆地把男人当作玩物来追求，在楼上人群中能走近任何欲求的陌生人，简短交谈几句就直接问：“你想下楼吗？”

在砂岩无需卖弄风情和女性传统的娇羞作态，不必顾忌“名声”，也没有在酒吧或其他公共场合与陌生男人搭话时大部分女人会产生的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合理担忧。在砂岩不可能出现《寻找顾巴先生》^[114]里那样的场面，因为女人被周围的人保护，不会成为一个男人的恶意的受害者。一个性方面爱冒险的女人如果愿意，在砂岩可以体验到，她的身体一个晚上能耗尽多少健壮的好色之徒最好的精力。

谁要是怀疑女性的性耐久力比男性强——据金赛说，一个完全勃起的男人插入之后平均只能猛推两分半钟，只需在聚会的夜晚到砂岩楼下“舞厅”，观察一下像萨丽·宾福德这样积极活动的女人。这位有着灰白色头发、优雅的46岁离异女人，她美丽匀称的身体总是让一个又一个恋人热情洋溢，但她明亮的黑眼睛却不向任何男人寻求对自己魅力的认可：她的身体有多诱人，她的情感就有多镇定自若。她还是个冒险家，一个致力于建立两性间更平等社会的女性主义者，建立一个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差，即要被同等考量——的世界。

萨丽·宾福德生命中的前20年在纽约出生长大，之后20年去了芝加哥，在那儿获得了四个大学学位和三个丈夫。后来她搬去加州，60年代中期她参加并推动了西海岸持续不断的激进化运动。

1970年初夏，得知托潘加峡谷有个不同寻常的社区之后，一天下午她只身开车爬上崎岖山路来到田园诗般光辉壮丽的砂岩隐居地。停好车从主屋前面的大落地窗望进去，她看到起居室一角有个金发男人裸体坐在桌后，正在打字机上轻敲。

约翰·威廉森听到她敲门时停下打字；芭芭拉打开门，萨丽出示证件后就被欢迎入内了。威廉森很快被眼前这个人吸引，邀请萨丽游泳，并把她介绍给了大家庭其他成员，包括一个叫梅格·迪斯蔻的年轻快活的棕发女郎，她是萨丽·宾福德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人类学系学生。

从那以后萨丽·宾福德成为砂岩的常客，也是约翰·威廉森和其他一些男人的性伴侣。

萨丽·宾福德的职业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学习研究灭绝了的文明和尼安德特穴居人；但是，和她挖掘研究的许多史前对象不同，她可以适应各种气候、氛围、居所，一旦对环境和其中的人不满意了，她很快就会从某地搬到另外的地方。

从她在长岛郊区的青少年时代开始，那些影响了大部分同辈女性行为的社会习俗和性规范，基本上都被她忽视。她被富有的父母在配有佣人的大房子里养大，但和她被青睐的姐姐——一个她深深憎恶的循规蹈矩的人——不同，萨丽·宾福德在家是反叛者、假小子，某种她母亲容忍但从未理解的小怪物。

萨丽也无法理解母亲，这个女人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却为这桩在郊区缔结的婚姻放弃了事业。之后她的生活围绕着这栋房子，消遣的方式就是一些麻将聚会，还有与其他无所事事的贵妇一起参加慈善活动。其中一位女士介绍给她广受好评的富尔顿·约翰·申主教的布道，在他的影响下，萨丽·宾福德的犹太母亲转信了天主教。

萨丽的父亲是个精明专断的人，出生在伦敦，有德国犹太血统，大萧条时期靠进口虫胶清漆在美国小赚了一笔。用这笔钱，他培养了一种彬彬有礼的个人做派和体育爱好，享受着其他女人私下的爱慕，买了一辆凯迪拉克，周末可以开着它去长岛最好的乡村俱乐部，那儿允许犹太高尔夫球手入内。

长岛无处不在的排犹主义、种族歧视、趋炎附势——更不用说对两性的双重标准，激起了萨丽想要与众不同、反传统、反公众准则的欲望，远离母亲那起装饰作用的家庭生活，而贴近她更青睐的父亲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作为勇敢的年轻骑手，从锡达赫斯特马房骑马出来，萨丽对自己能控制一匹高大强健的动物颇感兴奋；作为在学校舞会上穿着低胸礼服的放肆小妞，她轻而易举就诱惑了年轻男人，令女同学们心生嫉妒，说她不知廉耻伤风败俗。在伍德米尔学校上完高二又在鳕鱼角剧院找了份暑期学徒工后，她遇到了一个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戴上从第五大道下一个妇科医生那里拿到的避孕隔膜，她开始了第一场恋爱。

一年后，1942年，母亲坚持让萨丽上瓦萨学院，一所萨丽觉得无聊透顶的女子学院，为反抗这一决定萨丽翘了足够多课，第一年还没结束就被开除了。萨丽从伍德米尔学校毕业时父母亲戚给了她一些战时公债，她把它们换成现金，搬到纽约，在西十三街租了一间单间公寓，在儿童法院的精神病治疗诊所找了份工作，打字输入一些案例，与这些案

例相比她自己的过往倒显得如此审慎小心。

她过得很开心，喜爱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和波希米亚风格。有天晚上她在谢里登广场附近的酒吧遇到一个40岁的黑人爵士音乐家，他之后带她进入哈莱姆区，向她介绍了大麻沉静平和的刺激，还有许多新潮复杂的做爱技巧。

在格林威治村待了将近两年，中间还在《长岛日报》社当了一阵儿记者，萨丽决定应该回到学校；在父亲的财力支持下她在1945年秋季进入芝加哥大学，因为被它的本科项目和富有革新精神的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所吸引。

搬到中西部去没有令她失望，在那儿她成为出类拔萃的本科生，之后又拿到了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也参加了到欧洲和中东去的考古考察队。在芝加哥她住在海德公园区，那是湖边一个满是维多利亚式房子的迷人街区，住着大学教员、作家、艺术家、年轻夫妇，还有一个憔悴的黑头出版商，他家客厅地板上摊着一本杂志的创刊号，日后他要将它取名为《花花公子》。

尽管这城市的政治系统腐败，种族歧视严重，用索尔·贝娄的话说就是“没有哪个世故明智的人在芝加哥走动时会不加防卫”。但萨丽·宾福德在街道上却感到安全，在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 [115] 日渐增长的声望中，萨丽也看出他是更为文明开放的选民的代言人，因此她去了史蒂文森的竞选团队工作。她也为芝加哥的文化生活骄傲，包括第二城戏剧俱乐部，那儿捧红了像迈克·尼科尔斯、伊莱恩·梅、塞弗恩·达登和芭芭拉·哈里斯这种天才 [116]。在芝加哥萨丽·宾福德只有一个领域没获得满足：婚姻。到最后，她与其说是和那三个嫁了又离的男人不和，不如说是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男性世界不和。像当时大多数男人一样，他们不能接受自由解放的女性——那些女性痛恨双重标准，痛恨这种设定：不管她有怎样的事业野心和聪明才智，都应该专注于家庭杂务、抚养孩子和煮饭。她领先了美国的女性运动十年；但是聪明如她，却似乎天生易于爱上最合适不合适的丈夫：像她父亲一样的大男子主义者。

结果，她的婚姻充满了火药味又短命；萨丽常常独身，焦躁不安，没法满足性欲，在很多孤独的夜晚对着脑海中朦胧勾画的男人自慰，都是些她想象中在火车上、飞机场、认不出的城市里遇到的陌生人。这些男人尾随她，温柔老练地强迫她、控制她，最终引诱她投身情色的场景，类似于她存放在海德公园公寓卧室里的色情读物中所描绘的。

50年代，几乎所有这些书在芝加哥都是违禁品，被去过巴黎的教员和富布赖特 [117] 学者偷运进美国。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欲经》《我的秘密生活》《香水园》，亨利·米勒的《热带》，还有许多法国情色小说，精通法语的萨丽直接读了原版。书中最挑逗她的，是那些她私下渴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的性行为，或者她很好奇但不太能在生活中尝试的。在这些性幻想中，她有时想象自己在一场纵欲盛宴的中

心，被技巧娴熟的爱人们包围，他们同时满足她每一个奇思异想，爱抚她身体的每一寸，而她反过来将他们激发到高潮的狂喜巅峰。

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和一任丈夫曾按照一份浪荡子期刊上的广告赴约，想尝试群交，结果在一家餐厅酒吧见到的，是个翻领上别着戈德华特 [118] 徽章的胖子，和帽子上别着塑料雏菊的胆怯妻子。在一片尴尬的友善氛围中，这一对儿解释说他们并无兴致四人性交，只是想私下交换伴侣。之后他们握了手，那对夫妻就消失在温煦宜人的夏日夜晚中。

在这段婚姻、情史、教学、旅行的时间里，萨丽·宾福德也养育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女儿，她一长到差不多大就马上离开了家，在60年代辍学成了一个嬉皮士。萨丽自己迈入60年代时，烦恼缠身但苗条时髦，穿着紧身合体的蓝色牛仔裤，戴着玫瑰色的金属框架眼镜。透过镜片她再次以年轻人的感官看这世界，似乎她个人的自由指日可待。她搬到了南加州，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在那儿作为一个激进的行动派教员卷入了校园和平运动。

在威尼斯租来的面朝沙滩的公寓里，她结交了学生激进分子，和像她一样对权贵阶层的政策方案满怀愤慨的年轻人，而这种愤懑之火在她的同辈人心中早已熄灭。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四名俄亥俄州学生在与国民警卫队的对抗中被射杀——发生之后，1970年5月她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罢课抗议；她发表反战演讲，参与游行示威。这段时期她与四处漂泊的女儿重逢，女儿自己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萨丽在学生家里也遇到了一个留着傅满洲 [119] 式八字胡和长头发的魁梧男人，他叫安东尼·拉索。一年后他作为诡诈的理想主义者在全美家喻户晓，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起他拿到了五角大楼文件并泄密给媒体，向公众揭露出美国政府在对越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扯下的一系列谎言。但当萨丽初次见到拉索时，他的言行中还没有那个政治亡命之徒的影子；只是一个有意大利乡下血统的南方人，30多岁，刚刚信奉反主流文化，还没完全适应长及肩膀的头发。他当了很多年公司智库，已获得安全许可，但现在靠着失业保险住在洛杉矶，对萨丽描述自己是一个“兰德 [120] 辍学生”。萨丽挺喜欢他。和他更熟了之后，又通过他见到了他的朋友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萨丽决定介绍他们俩去砂岩。

两人中埃尔斯伯格更快地适应了砂岩。他以前曾和裸体主义者在一起，拜访过洛杉矶的“极乐仙境”和南法著名的勒旺岛。1967年回到兰德之后，埃尔斯伯格和美国国防部赴越南执行一个为期两年的任务，那时他将近40岁，刚离婚尚未再婚，参加了不少纵欲派对，那里的人他要么是通过洛杉矶《自由报》上的广告认识的，要么是在洛杉矶影视城一个叫“摇摆”的特殊酒吧中遇到的。

“摇摆”或许是全美第一家这样的酒馆，店主名叫乔伊丝和格雷格·麦克卢尔，是一对迷人的夫妇。格雷格曾是电影演员，出演过《伟大的约翰·L》。埃尔斯伯格结交了麦克卢尔夫妇，常常光顾酒吧，在1968年称

呼自己是“唐·亨特”。考虑到自己在兰德的职位，埃尔斯伯格不想让真名出现在泛泛之交的地址簿中，尤其是没人能确定群交在当时的加州是否合法。但除了使用假名，他对在酒吧和性派对中交往的人们几乎不设提防；对暗示挑逗他来者不拒，不管是三人行还是群交他都怡然自得，尤其对自己性爱时的精力和格调志骄意满。甚至当他拷贝了五角大楼文件，几乎能确定联邦调查局马上就会窃听跟踪他时，埃尔斯伯格也一点不想掩盖他夜间的畅饮，前往性酒吧到性派对和砂岩就像参加哈佛校友会一样若无其事。

回想起来，埃尔斯伯格推测，在他1971年以间谍罪、叛国罪被起诉后，有可能正是他在性方面的开放最引起尼克松白宫中清教徒们的好奇。他们或许觉得，如果参加纵欲聚会对埃尔斯伯格来说都稀疏平常，那他真实的私生活一定离经叛道、凶险邪恶。不管怎样，尼克松总统决意让埃尔斯伯格名誉扫地，惩罚他把政府文件泄露给媒体的行为。总统授权了一项彻底的调查，要将这名曾是忠诚的海军、国防部鹰派高级幕僚的叛徒的本性揭露出来。这项由前中情局特工霍华德·亨特和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戈登·利迪进行的调查，后来使他们闯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在贝弗利山的办公室。

八个月后，亨特、利迪和其他“渗入者”会被委以相似的手段对付总统的敌人，那些敌人住在华盛顿，办公室在一栋叫水门的建筑中。

理查德·尼克松到白宫上任时，坚信美国精神正被国内激进分子、堕落的嬉皮士、剥削他人的色情产品出版者所侵蚀。他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要将这个国家从它骇人的诱惑物中净化出来，在校园和城市重建律令和秩序，为此他倡导了一场“公民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尽管他的出生地就是美国大部分色情电影和露骨色情照的发源地，可尼克松既不欣赏也不理解这些东西的魅力何在，他也从不认同南加州人散漫、闲适、自我放纵的生活作风。

尼克松在崇尚户外运动的加州成长为一个从事室内工作的人。他是清教徒，出生于洛杉矶城外一个穷困的乡村，那儿离《愤怒的葡萄》比离好莱坞山更近。他的父亲是个冷漠的电车司机，1906年从俄亥俄州一片不毛之地移居到西部，曾经经营过柠檬种植场，但失败了。他脾气暴躁，沮丧失意，要求孩子们服从他严厉的纪律。尼克松的母亲汉娜·米尔豪斯12岁时和她信奉贵格会的父母从印第安纳州来到南加州，在惠蒂尔宗教社区中长大。这社区是19世纪末由新英格兰的贵格会信徒建立的，同一时期，詹姆斯·唐纳崇尚性爱自由的奥奈达社区成员搬到了附近的圣安娜。汉娜是个坚毅不屈、信仰坚定的女人，为了给理查德·尼克松患结核病兄弟付医药费，她离家做厨子和清洁工工作三年。

理查德·尼克松毕业后做了很多份工作，几乎没有放松闲暇的时间，他成长为一个尽职尽责、不苟言笑的年轻人。周末时他在友谊教堂弹钢琴，在惠蒂尔学院——致力于培养基督教领袖人物的贵格会机构，他名列前茅，辩才尤其凌厉。他获得了奖学金就读于杜克大学，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海军服役，之后于1946年击败一名加州民主党员，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抨击这名民主党员的自由派观点是亲共产主义。尽管这场措辞激烈严苛的竞选活动，和此后很多类似的竞选一起，将尼克松以爱国者和卫道士的形象置于全国万众瞩目的焦点，他自己却鲜少感到被选民真正接受和崇敬，甚至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也常常内心不安。

如果尼克松能完全掌控这个国家，他会将惠蒂尔学院的风气推广到大街小巷，那里充满了秩序和服从，有对勤奋工作、宗教和道德刚正的尊敬。上任总统时，他带了两个加州人去华盛顿，他们和他一样认为这些传统应该保存下来，这两人成为他国内事务的首席顾问。他们都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是不沾烟酒的基督教科学派 [121] 信徒；都是保守的共和党、爱国者、顾家男人，对喧闹的反主流文化、广为扩散的性放纵、影视和出版物愈发色情化的趋势大感震惊。其中一个叫H.R.霍尔德曼，高个平头，是个专断的前广告经理，日后成为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检察官约翰·D.埃利希曼，前鹰级童子军 [122]，授勋的空军领航员，在德国境内执行过26次轰炸任务，他之后成为总统国内事务

助理。在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之后，埃利希曼组织“堵漏人员”进行报复，他们突击查抄了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还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在水门的总部。

除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尼克松总统在自由派的厄尔·沃伦 [123] 退休之后任命沃伦·伯格——一位白发苍苍、仪态庄严、卫理公会崇高道德的模范，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以此来支援他的“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伯格是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由艾森豪威尔任命在上诉法院供职，他支持政府对国内激进分子的窃听特权，限制媒体自由，厌恶色情产品。

不久，在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去世，亚伯·方特斯 [124] 因公众对财政问题的质疑被迫离职后，总统又得以在最高法院安插了三名保守派。他们分别是威廉·伦奎斯特——47岁，来自密尔沃基市，是务实坚定的戈德华特共和党党员，他曾在尼克松的司法部工作，赞成死刑判决，反对堕胎；哈里·布莱克门——绝对戒酒主义者，老派刻板的哈佛毕业生，明尼苏达州人，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也加入了圣保罗的同一所教堂，还是伯格婚礼上的伴郎，在任命前的面试中，布莱克门回答尼克松的提问时向他担保，布莱克门家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嬉皮范儿”；还有刘易斯·F. 鲍威尔——一个体面的弗吉尼亚州人，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在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一天他不得不坐在法庭的放映室里，观看色情电影《一丝不挂》中金发裸体的瑞典女演员淫荡的表演，这是一起淫秽案的证据。

有这些守旧的法官入驻法院，尼克松期望反色情的行动能得到大范围支持；他同时也期冀从新成立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中获得帮助，这个由前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委任的18人小组，旨在研究露骨色情物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且在必要情形下提议一些矫正方案。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以及很多国会议员和教会领袖很久之前就坚称，露骨的性杂志和电影会怂恿暴力犯罪和强奸，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尝试寻找证据来证实这种论断，直到该总统调查委员会建立，国会拨款200万美元支持该委员会进行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

委员会中有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商人。其中一位成员在1969年因一项外交任务辞职后，尼克松任命了一位他挑选的人，据他所知是全美反色情最狂热的人之一。他名叫查尔斯·H. 基廷，是个精瘦、金发、坚定的天主教徒，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是辛辛那提市的检察官，他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

查尔斯·基廷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全美高校游泳前冠军、“二战”期间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以及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在他的社区颇受人敬畏；50年代，他被城市报刊亭中越来越多的色情杂志和书籍激怒后，说服了一些热心市民、商业领袖和虔敬信徒加入他的反淫秽运动，并为他建立的免税社团“正派文学公民联盟” [125] 捐款。

该社团的主要目标是向地方政客和执法者施加社区压力，促使他们关闭辛辛那提有露骨性爱书籍和影片的书店和电影院，还号召人们写信抗议，甚至抵制性爱杂志商店店主、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赞助方，只要它们容忍以性为导向的栏目，或播放其他可能被认为不适宜道德高尚的家庭合家观看的节目。CDL本质上是在复苏老天主教良风团 [126] 战前的策略，良风团曾经吓坏了好莱坞电影业，直到像霍华德·休斯和奥托·普雷明格这样的独立制片人出来勇敢地挑战它；虽然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最开始对基廷的CDL不屑一顾，认为它太过时了，该社团却在60年代蓬勃发展，成长为在20个州有32个支部的全国性组织，据估计，它大约有35万活跃成员，他们支持约束性爱及书刊检查制度。它的荣誉成员包括11位美国参议院议员、4位州长和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很多市政首脑、地方检察官，以及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天主教大主教们都支持它。几十个大城市的日报，按理本该是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却都支持CDL的“洁净”计划，同意约束、压制或完全禁止X级 [127] 涉性电影刊登广告。这样做的报纸有《辛辛那提问询报》（基廷的弟弟是这家报业公司的董事长）、《迈阿密新闻》、《旧金山观察家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新闻》、《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最终，连《纽约时报》也被这种趋势影响。

CDL自己的双月刊《全国正派报道》热情洋溢地详述每一场全国机敏的警察对“肮脏”书店的突袭查抄，热切地宣布法庭对色情产品出版者的定罪判决；它每期也会带着奉承的口吻刊印一位执法警官的人物小传和照片，此人定是最近惩罚过“淫秽商人”，大标题赞誉他为“本月执法者”。

《全国正派报道》中擅长揭发丑闻的编辑叫雷蒙德·高尔，是个戴眼镜、敦实、面色红润的50多岁男人，被基廷发现之前默默无闻地在洛杉矶工作，他当过一家牛奶公司的会计，还是一家链锯生产公司的系统分析师。高尔正是基廷希望招募到CDL的那种人：政治保守派，天主教徒，海军老兵，有七个孩子的顾家男人，为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奋斗了几十年，还要压制住内心的愤懑——怨恨国家福利欺诈、充满优越感的校园激进派，还有性堕落者们，后者犯下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反上帝、反自然的罪孽。

高尔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引起了基廷的注意。一个周日晚上，高尔走去一家中餐馆给家人取餐，路上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站在一家新开的性用品商店门前，它就开在高尔家的好莱坞街区。在橱窗里他看到很多标题耸人听闻的平装书、排列整齐的电动按摩棒和橡胶假阳具、法式螺纹避孕套、一管管的润滑剂、吊袜带，还有很多本印有裸体年轻女人全彩照片的杂志，她们张开双腿、高展胳膊、半张着嘴巴。尽管不以为然地对自己嘟哝着，高尔仍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兴奋，可憎地觉察到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他马上转身走了，对自己竟然在那儿逗留了那么长时间感到困窘。

当天晚上，妻子和孩子都睡了后，那邪恶商店橱窗里的影像仍旧久

久停留在高尔的脑海里。他被这些影像困扰，焦躁不安、心烦意乱；但他同时也感到被圣灵召唤，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自他在芝加哥老家当祭台助手的时期之后，就再没有过，他从内心深处体认到一份虔诚的热忱，希望对抗和战胜由可鄙的色情产品商所挑起的魔鬼诱惑。那晚他几乎没睡，第二天他给好莱坞商会写了一封愤慨的信，抗议在他家附近开那样一家店。一周之内他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中承诺会通知警察。几天之后，他从报纸中读到那家店已经被当局查抄，关门大吉。

此事令雷蒙德·高尔印象深刻，大受鼓舞，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自己有力量影响这个鄙俗的世界，他开始一有空就驾车在城里转悠，记下其他性用品商店的名字和地址。在洛杉矶的商业中心，靠近市政府的地方，他算了算有六家生意似乎很兴旺的店面，于是他写信给市长，质疑像这样的店如何能合法地开在市长办公室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周围。几天后高尔接到市反堕落小队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尔先生，留意明天的报纸。”第二天，洛杉矶媒体头版都报道了对这六家店同时进行的突击查抄，逮捕了一些店员，没收了七吨淫秽用品。

这之后不久，一个CDL的代表联系了雷蒙德·高尔，紧接着，查尔斯·基廷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说期间，安排了与高尔见面。在外貌和风格方面，这两人迥然相异。基廷高挑，整洁得无懈可击，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威严；而高尔资质平平，相貌沧桑，腰身足够宽，把他紧身西装的线缝处抻得紧紧的。但他们都对罪恶的性深恶痛绝，在这方面他们有相似的灵魂；更熟识对方之后，基廷觉得高尔又质朴又健谈，认为要是他为CDL代言会令人信服。

不久基廷对高尔的直觉要在一次检验中体现出来：CDL一个专讲性爱话题的常任演说者由于一项更重要的职责，不能到洛杉矶的一家服务俱乐部 [128] 演讲，高尔被说服去代替他。尽管最初非常紧张，因不得不在一大群人面前而很难为情，但高尔仍用简单坚定的语句缓和了气氛，向听众表明，他反对色情作品作者公开亵渎私密而神圣的爱。他不否认色情产品的诱惑力。他承认事实上他和大部分人一样难以抵御它的刺激。但他说它很可能是引人堕落的，它替代了性结合所应象征的诚挚爱意，令人厌恶。如果兜售性产品的人将来仍享有现在这样的自由，被允许继续传播这些下流物品，他们的污染不仅会毒害消费它们的人——他们选择消费这些产品就难免受害，也会毫无例外地传播到整个社会，削弱家庭生活的质量，危害国家的伦理道德健康。

高尔的首次演讲如此成功，于是基廷力劝他成为CDL的发言人。高尔之后又公开露面了几十次，不仅在服务俱乐部里演讲，还和CDL的成员一起，在大礼堂的讲台上舌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129] 的律师和各种拥护第一修正案的人。1967年雷蒙德·高尔接受基廷的提议，成为CDL洛杉矶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CDL出现在加州和全国的学界听众面前与广播——电视脱口秀中。有一次高尔飞回他的故乡芝加哥，受邀在一场脱口秀中谴责色情产品，和他对峙的嘉宾是一个当地的色情产品商人兼按摩院店主，29岁，名叫哈罗德·鲁宾。高尔和鲁宾立马就互相看不

顺眼。高尔认为这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是个无所顾忌、缺乏准则的俗物，而鲁宾从高尔身上看出自己父亲的迹象：那也是在一个在芝加哥出生、受压抑的蓝领保守派，性比越南战争更会让他不舒服。

1968年雷蒙德·高尔在华盛顿做CDL非官方的游说者。在那里，通过《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华莱士的帮助，高尔和CDL一位叫詹姆斯·J. 克兰西的律师一起，与几位国会议员私下会了面，强烈要求引入力度更强的反淫秽法案。他们被允许进入参议院地下的小房间，里面配有一个幻灯机和大屏幕，参与者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斯托姆·瑟蒙德议员、密歇根州的罗伯特·P. 格里芬议员和爱荷华州的杰克·米勒议员，他们向这些议员展示淫秽品的样本，这类淫秽品能在全美国范围内通过邮政传播和销售，大体是因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标准过于自由宽松。

颇巧合的是，高尔和克兰西在华盛顿的时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正开始组织公开听证会，提名亚伯·方特斯法官代替即将退休的77岁的厄尔·沃伦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很多政客和利益攸关的组织，包括CDL，都反对方特斯上任。1968年初夏和秋天，对方特斯的血泪控诉，包括他从研讨会费用中获利，还有据说他打过电话呵斥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曾对约翰逊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持有异议。由格里芬议员带头的一些共和党人对约翰逊总统的行为表现愤怒，因为约翰逊总统虽然已经宣布1968年不会再谋求民主党提名竞选，却在主政的最后几个月，试图提拔他律政界的朋友就任高职，要不然此职位可能会由新总统青睐的人就任，那样首席大法官就可能会是个共和党人。

CDL与方特斯的不和，是由于他在最近几起淫秽案中对色情作品的宽容，包括他投票赞同合法化那本长期被禁的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妓女芬妮·希尔的故事（书名叫作《欢场女子回忆录》），还有在“科林斯出版社诉威斯伯利案”中纵容像《罪恶耳语》这样的黄色小说。此外，CDL注意到，《罪恶耳语》的出版商曾经是方特斯在华盛顿律所的客户之一——千真万确，CDL声称从联邦调查局探员那儿得知，此出版商据说曾吹嘘过和方特斯的关系，暗示这会保护他免受联邦起诉；CDL进一步宣称，这条联邦调查局内部消息在参议院的传播，最终影响了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M. 德克森（他最初是支持方特斯晋升的），使参议院内的势力天平倾斜到反对亚伯·方特斯的一方。

理查德·尼克松1969年1月宣誓就职总统后，他的司法部长约翰·M. 米切尔带来一项对方特斯不利的新证据——他曾从一名金融家创办的基金会那里收受2万美元费用，该金融家曾经因为销售未注册的证券而获罪。于是亚伯·方特斯被迫从最高法院辞职，尼克松又得以在他的空缺处填补了一名保守派。

方特斯辞职一个月后，CDL才有了高兴事，尼克松任命查尔斯·基廷加入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CDL的报纸表达出了乐观情绪，认为基

廷强有力的个性（尽管他在约翰逊总统成立该委员会一年之后才加入）不久定会激励其他成员，找到有效的手段让淫秽产品好看。基廷认为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其中有温弗雷德·C·林克，一位来自田纳西州赫米蒂奇的卫理公会牧师；欧文·莱尔曼，在迈阿密海滩的伊曼纽尔寺中任犹太教祭司；还有莫顿·A·希尔，一位天主教神父，之前曾在曼哈顿带领纠察队对抗色情作品出版商，他也是一个叫“媒体道德公司”的监察组织的主席。名单上还有一个来自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教员兼牧师，叫G·威廉·琼斯；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还有两名女性，一个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英语教师，叫凯思林·斯比茨，另一个是在美国电影协会工作的纽约律师，叫芭芭拉·斯科特——人们期待对于女性身体常常在色情世界中被使用的方式，她们能浓墨重彩地表达出女性的愤慨。

其他委员似乎也呈现出可靠的社会图景：莫里斯·A·利普顿，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奥托·N·拉森，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爱德华·D·格林伍德，门宁格基金会 [130] 儿童精神病学家；约瑟夫·T·克拉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社会学研究者；托马斯·D·吉尔，康涅狄格州少年法庭首席法官；弗里曼·刘易斯，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总裁；爱德华·E·埃尔森，亚特兰大通讯社总裁；马文·E·沃尔夫冈，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雷德里克·H·瓦格曼，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B·洛克哈特，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院长。

还有其他二十多名职员辅助委员们的工作，其中有些并非是做研究的专家，他们被指派在全国各地旅行，为委员们收集可用于分析评估的信息。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基廷加入之前，委员会曾派遣研究小组采访和分析那些制造露骨色情产品的大商人、色情商店经营者，还有定期购买的消费者。研究者发现，邮政检查员和执法部门对色情产品最为了解，他们不仅认识、洞察到该非法产业的规模和范围，还判断黑手党在生产流通色情产品过程中可能的影响。研究员去中西部和纽约的监狱，讯问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期望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前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书籍和杂志。

委员会咨询了100个全国组织，要求他们书面提交对色情产品的看法。一名委员会调查员甚至被派去丹麦，因为最近露骨色情产品和现场色情表演在那里已经合法化，以期弄清这对丹麦性犯罪的数量、社会行为趋向以及该国的道德氛围有何影响。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个科学团队每天给23名男学生播放90分钟色情电影，每周五天，持续了三周，想研究这些电影对学生个人习惯和情欲的影响。所有学生志愿者看电影时都穿着长袍，袍子下面的阳具上套着连有电极的避孕套，来精确检测勃起，他们的胸周围也挂着风箱，耳朵里戴着电子设备。每天放电影之前，研究者会私下问学生在看过电影后的24小时内是否自慰过或做过爱。

委员们自己也看露骨的色情电影。1968年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印第安纳州的金赛研究所举办，在那儿除了展示金赛博士收集的大量春宫图、简要告知全国最新的与性相关的数据，成员们还被护送到一间放

映室，观看老式色情电影以及全彩的当代色情电影集锦。也许观众中最着迷的是莫顿·希尔神父，尽管放映结束灯光再亮起时他满脸通红。在纽约他是色情产品最博学、最不屈不挠的敌人之一。那次放映之后，还有以后接触类似作品之后，希尔神父都向委员会中的女律师表达心中的忧虑，担心她被强制观看如此污秽的东西；但当女律师表示这些并不真的令她惊惧嫌恶，神父很明显惊慌失措，回答说会为救赎她的灵魂而祈祷。

尽管委员和职员可以内部自由讨论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反应，威廉·B. 洛克哈特主席却力阻他们向公众或政府官员透露个人见解。洛克哈特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研究项目有潜在的煽动性；如果处理不好，或者在委员会完成所有研究给出诠释之前贸然将残章碎片泄露给媒体，可能会引起很多误解和争执，以致削弱最终报告建议书的冲击力和重要性。因此，媒体或政客在调查期间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转给洛克哈特或他的个人助理，由他们来统一回答；虽然在委员会第一年的运转中，洛克哈特的同事恰如其分地尊敬着他作为法学院院长的权威姿态和委员会主席的尊贵身份，但1969年查尔斯·基廷加入后，基廷过于自信专断的言行却立刻给团队互动带来一抹张力和对峙。

冲突开始于基廷发现大部分田野调查并非委员们自己进行，而主要是由洛克哈特挑选的职员和研究者开展的。紧接着进一步触怒基廷的是，洛克哈特选择的法律顾问，隶属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保罗·本德尔律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会议，而基廷在CDL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詹姆斯·J. 克兰西甚至无权观摩这些活动。洛克哈特不允许基廷出席所有他想参加的会议，这也让基廷非常烦扰；在基廷看来，公开听证会可以很好地宣传色情产品的传染性，曝光靠售卖淫秽物品致富的不法商人，于是当洛克哈特坚持反对举行公开听证会后，基廷决定拒绝参加委员会之后的所有会议。

但比起基廷对委员会初步调查结果的激愤和嘲讽，他与洛克哈特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由洛克哈特主导的委员会在1970年秋季完成了初步调查结论和建议，正准备编辑并递送给政府印刷局。基廷目瞪口呆地发现，花了那么多金钱、精力和时间调查色情产品，洛克哈特带领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色情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国家问题，处理它最明智的方法——至少在参涉者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就是干脆忽略它。

报告称：“委员会相信，政府无权持续干涉成人完整的个人自由，因为由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的大量经验调查，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接触和使用露骨的性物品会对社会或个人造成严重伤害，例如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性方面或非性方面的行为反常、剧烈的情绪扰乱等”。

报告继续说，在监狱和精神病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强奸犯和其他性犯罪者不大会是色情产品的消费者，却更可能有“保守的、压抑的、来自缺乏性爱的背景”；该报告补充道，对美国流行色情产品最为暴跳如雷的

人群，是那些“过分热切的”“宗教方面活跃的”年长公民，他们也相信“报纸无权刊印批评警方的文章，应禁止人们出版攻击我们政府体系的书籍，应禁止人们发表反上帝的言论”。

放映色情影片对北卡罗来纳23个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大致是到最后他们都觉得无聊透顶；丹麦色情产品合法化，不仅没有引起早先一些丹麦人所担忧的犯罪率飙升，结果反而是，像窥淫癖这样的不当行为有相当地衰减。这似乎暗示，窥淫狂们既然能在裸体酒吧、色情电影和现场色情表演中看到更多，就更不愿意冒着被捕的风险从人家窗户里偷窥。报告继续说到，不同于很多美国公民的设想，美国性产业并非被黑手党或其他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派系控制；色情商业自然是养活了很多有犯罪记录的人——想想看，警察不断以非法涉性交易逮捕他们，有犯罪记录并不奇怪，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与黑手党歹徒勾结的“统合的‘淫秽’产业”。性产业中的大亨——例如洛杉矶的米尔顿·吕斯和马文·米勒，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克利夫兰的鲁本·斯图尔曼，亚特兰大的迈克尔·特维斯——大都确实不是美国商业促进会 [131] 中受人尊敬的会员，但他们也并不是统治着“一家子”职业杀手的黑手党教父，没有形成什么黑手党全国性网络。而且，报告继续说，美国大多数性产品的消费者，那些每年贡献百万美元观看色情电影、购买裸体杂志、光顾按摩院、在色情影片自动贩卖机那儿花了几吨硬币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道德败类、强奸犯、摩托党、杀手或其他精神失常的社会渣滓，相反，他们大多是最高法院所定义的“一般人”，或者用委员会报告中的话说：“绝大多数是白种人、中产阶级、中年、结过婚的男人，穿着西装或整洁的休闲装。”

色情产品对这些人的影响，并不像危言耸听者所坚称的那样，会刺激人们疯狂地跑到街上强奸女人，或煽动他们砸了房子抛弃家人。如果色情产品有什么刺激的话，也是引起私下自慰；或者要是这个人有善于接纳的妻子、情妇或女友，会增加做爱的欲望。但是，报告重申，犯罪行为并不来自接触色情产品，因此以洛克哈特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美国政府——它每年投资数百万纳税人的钱骚扰和起诉色情产品出版商，成果却颇令人怀疑——现在应该废除所有不当的法律，那些法律剥夺了成年人观看、阅读任何所谓淫秽材料的权利。

查尔斯·基廷对这项建议很警惕，在警告了尼克松政权洛克哈特那儿即将产出的结果后，他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暂时拖延了委员会出版报告的计划。在基廷申请的一条禁令被法官批准了后，他召集CDL的人马给华盛顿写信发电报，强烈要求“国会对委员会进行迅速彻底的调查”。委员会18名成员中，只有基廷和其他三人完全反对洛克哈特的幕僚所起草的报告。与基廷一道反对者包括莫顿·希尔神父、温弗雷德·林克牧师和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希尔神父对报告的怒气和基廷一样大；希尔——林克的联合反对意见以此表态开头：“委员会的多数人报告是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

不久，很多重要人物加入了基廷的抗议。其中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

纽，美国邮政部长，参议院两党领袖，以及美国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的主席。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声称：“如果我们想要一种社会，它鼓舞人高贵的一面、使人类得以升华，那么我认为色情产品绝对是有害的。”最终，尼克松总统弄清楚了报告确实像基廷宣称的那样，对人们不具有惩戒功能，于是他公开宣布“完全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并谴责委员会“损害了”国家利益。他补充道：“只要我主政白宫，国家控制淫秽产品、从国民生活中剔除淫秽产品的努力就不会松懈……委员会认为下流书籍影片的激增对人的品性没有持久有害的威胁……几世纪的文明史和十分钟的常识思考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美国的伦理道德并非儿戏。”

要是尼克松有权撕毁委员会的报告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委员会是在一项国会法案下运转的，该法案要求它书面呈交研究成果和建议；所以，基廷的禁令带来的十天冷藏期一过，委员会报告就复苏了，并进入投送政府印刷的程序，不过条件是允许出版另一份报告，反映出基廷对色情产品问题的看法。

基廷的报告是一份长达175页的文件，责难了洛克哈特和他的调查方法，将委员会的事实探寻者们描绘成是天真的“象牙塔”学者和年轻的“青涩毕业生”，他的报告还重印了警方记录和时事评论员们的观点，他们将不道德的性和色情产品看作现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基廷引述阿诺德·汤因比 [132] 的见解，即最先进的文化会推迟年轻人的性体验；他也加上布鲁诺·贝特兰 [133] 的言论：“如果一个社会不忌讳性，孩子会在性爱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历史彰显出，这样的社会无法创造文化或文明；它就一直是原始蒙昧的。”基廷的报告中也包含一段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134] 在1835-1840年游历美国后写下的文字：“我在美国宽阔的港湾和丰沛的河网中探寻她的伟大非凡——但无所获；在富饶的土地和广袤的牧场——也无功而返。直到我来到美国的教堂，听到她的布道坛被正义的言辞点燃，我才明白她非凡和强盛的秘密所在。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国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复伟大。” [135]

基廷的报告所引发的争端，让报纸对委员会调查结果一事持续报道了很多天；就在事情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事件使冲突愈发恶化。1970年11月，加州出版了一套未经授权的插画版总统报告，这本售价12.5美元、352页光泽照人的大开本平装书里不仅有委员会项目的全文、基廷的辩论，还有对这个论题的图解——一张张照片和绘画，描绘交合的情侣、纵欲聚会上的群交、女性为男性手淫、男性用按摩棒满足女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中世纪的修女用蜡烛自慰、把放浪淫逸描绘得详尽精确的古代东方画作、把流行漫画书中的角色淫荡化的卡通画、巴勃罗·毕加索的色情雕刻、穿皮衣和高跟鞋的女人抽打上了手铐的男人、不同人种混在一起狂欢作乐的照片，还有一个红发女人用舌头爱抚一匹马的下体。书中有不少于546张插图，覆盖了读者能想象到的所有性交类型，出版商辩称，使用它们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正是委员会成

员在完成报告前详细检查和评估的那种材料。

除了第一版发行了10万本并将它们投放到全国的“成人”书店，该加州公司还邮寄了5.5万本广告册子，里面包含书中的一些精选插图，并告知读者如何能买到插画版报告，同时也夹带了一条声明指责尼克松总统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广告册的大标题写着：“多谢，总统先生”。下面的正文继续说道：“一项伟大不朽的调查研究现在集结成一本巨著。所有的事实和数据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充分配有黑白和全彩插图。详细展现出史上最争议的报告的方方面面。本书是所有公共和个人图书馆必备的 研究性书籍，严肃地涉及完整的学术自由和成人选择权。此项研究花费公共基金数百万美元，来发现在当今美国关于情欲的精准真相，但最高层却竭尽所能查禁这些信息。甚至总统本人也立即拒斥这些事实。企图压制这份报告是对全国每一个成人不可宽恕的侮辱。每个个体必须 被允许做出他自己的决定；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很多成年人，很多很多，读过这份报告后定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甚至没有必要有这样一本书。”

可以预见，联邦调查局探员很快就弄到了一本这样的插图版报告，然后快递到约翰·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在那儿，局长表达完对这样一本书竟然可以刊印的愤怒和惊诧之后，提醒总统留意这件事。而尼克松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几天前怒不可遏的基廷已经寄给他一本，是雷蒙德·高尔在洛杉矶一家性用品商店闲逛时注意到，买了很多本，并向基廷通报的。尼克松对他看到的東西目瞪口呆，不久，联邦检察官和探员们就开始讨论怎样最有效地用法律手段惩罚出版商：一个精力充沛的叫威廉·哈姆林的50岁男人，他们已经相当了解他了。

早前十年在圣地亚哥，威廉·哈姆林曾在几起淫秽案中被传讯，在那儿他的公司靠销售书籍获利数百万，书籍包括热辣的平装书和杂志、激进的政治论文、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像亨利·米勒的《殉色三部曲》那样的畅销书、特里·萨瑟恩和梅森·霍芬伯格的《糖果》，以及萨德侯爵、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136] 和伦尼·布鲁斯的作品。曾一度是亚伯·方特斯所在律所的客户还被联邦调查局引述，据称说过自己逍遥于联邦律法之外的，正是哈姆林——高尔和克兰西1968年在参议院游说，反对提名方特斯任职首席法官时，提到的就是这段轶事。

实际上，政府掌握到的哈姆林的情况，不少已经被高尔在CDL报纸上发表了，他是从法庭记录中整合出哈姆林诉讼经历的案件历史；之后高尔会对哈姆林了解得更多，在圣地亚哥一间脱口秀的电视演播室里，他和威廉·哈姆林第一次打了照面。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见面就会厌恶他，但在节目开始前与哈姆林在后台闲聊的几分钟里，高尔却很奇怪地缓和下来。举止和外表方面，哈姆林和高尔并非毫不相像：他们都是中年人，灰白头发，穿着几乎相同的保守西装和领带；都是芝加哥人，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继续交谈下去后高尔发现他们这一生几乎是

彼此的影子。

两人都是在1921年夏天出生于芝加哥北区，在弥撒中都当过祭坛助手；他们在同一片沙地玩过球，上的是邻近的高中。哈姆林和高尔第一次离开芝加哥都是去服兵役，战后回来都娶了年轻的芝加哥女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并组织了一个大家庭。几个异常严寒的冬天过后，两人都举家迁移到南加州，在那儿，鬼使神差地，在色情作品问题上两人却持有了相悖的立场。现在，在圣地亚哥一家演播室里，他们将作为辩论对手被介绍给观众，高尔感到哈姆林对于自己似乎有某种亲缘关系，最初全无争执和烦扰他的兴致。

但当高尔在开篇陈述时颇有优越感地提及兴旺的污秽文学生意，哈姆林开始变得敌对戒备——痛处被触及，两人立刻辛辣尖锐地争执起来。哈姆林强调他有权私人拥有并按行规出版裸体杂志和色情书籍，而高尔质疑这项权利，主张应该禁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接触这类诱惑人的东西，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应受谴责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是危险的。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相互对抗，对话常被打断，情绪激动充满挖苦；甚至在录制结束后，两人还能感受到节目所激发的敌意和憎恶。摄影机停机、头顶的灯光熄灭后，高尔和哈姆林同主持人握了手，然后就冷淡地转身离开了对方，离开演播室前也只刻板地道了声晚安。

高尔后来好奇，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虽然有如此多共同点，却在这一问题上迥然相异；他只能得出结论，在芝加哥的布道坛和联邦法庭的长椅之间的某处，哈姆林和他宗教的精神丧失了联系。

要是高尔能和哈姆林再多谈谈的话，他就能证实自己的猜想，因为威廉·哈姆林在40年代离开芝加哥加入军队之后，确实就丧失了信仰；尽管哈姆林也可能会辩称，是教会自身丧失了信仰，因为它在战争期间背离了很多传统，变得更世俗，不那么克己禁欲和精神至上了，因此也就不那么配得上他曾经给予的敬畏和热爱了。

更年轻点儿的时候，哈姆林曾考虑过当神父，他在教会的约束中感到自身变得高贵，在它严格的规章准则中感到安宁无虑，教会鉴明和惩罚罪恶时的把握和确信也令哈姆林谦卑。虽然有很多限制，天主教至少在所有人类事物中表明了清晰的立场，它看起来绝对而且无所不知，而一个希望实现永恒救赎的教民，并不需要在这个混乱和殊途密布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他只需要虔诚地沿着教会清楚标明的道路走下去即可。

但在军队里哈姆林的观点改变了；在那儿他看到教会在战争中变得不那么超脱，变得尊崇国家主义，且更加放任纵容。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突然不再被教会当作罪来惩罚了。天主教士兵周五可以吃肉，可以不望弥撒，可以不听每周忏悔后的规劝。主教祝福投炸弹的人；教会中的主事者和司令官结盟——确实，而且司令官比神父级别

要高，后者穿着黄褐色卡其布罩袍向星条旗行礼；当军队将几吨性感女郎画报运往前线，为不能接近女色的战士们提供替代刺激品，曾经对这类事那么严厉监察的教会却沉默了，沉默的背后是同谋。

虽然，鉴于战争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几乎所有层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教会的这种让步毫无疑问是无法避免的，但哈姆林仍旧相信，战时教会的世俗化确实暗中损害了众多像他这样的天主教军人的宗教热情；当他退伍后回到芝加哥的平民生活，他已不再被早先的熏陶、对罪恶狭隘的观点和对“不圣洁的性”^[137]的内疚感所支配。

适时地，哈姆林发现，他当编辑的那家出版公司分发各种各样的月刊，其中有一本叫《现代男性》，里面有性感女郎彩页和探险类文章，还有一份裸体主义者期刊，叫《现代日光浴及卫生》，内有喷绘的彩照。哈姆林的老板叫乔治·冯·罗森，拥有所有这些刊物；最早和哈姆林成为朋友的职员是冯·罗森年轻的销售经理休·海夫纳。尽管海夫纳比哈姆林小四岁多，但他对自己这一生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却清楚得多，他已经决定不久就从冯·罗森的公司辞职，在自己创办的一份杂志上试试才气和运气。当海夫纳向哈姆林描述他头脑中构思的那种杂志，期望哈姆林能投资时，哈姆林饶有兴致地听着，但最终断定，虽然退伍老兵使战后社会愈发自由，但要在全国范围出版海夫纳预想的这本在性方面如此大胆的杂志，恐怕还没有足够多的人做好出钱资助的准备。

几年后，海夫纳作为《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一夜暴富，哈姆林却仍旧为通俗杂志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默默无闻地辛劳。一天下午两人在芝加哥友好地共进午餐；去餐厅的路上，海夫纳自豪地让哈姆林注意路边停着的一辆优雅的新跑车，一辆自己刚买的古铜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哈姆林是开着他破旧的1941年产哈德逊汽车进城的，他对海夫纳如此迅速地改变境况印象深刻，也有点嫉妒——海夫纳不仅是富裕的出版商，还是《花花公子》的人格化身；尽管哈姆林知道自己的性情无法真正迎头赶上他的朋友——比起追逐艳遇，他更喜欢晚上和妻子弗朗西丝待在家里；而海夫纳最近离开了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去追求单身汉永恒的欢愉，但他仍禁不住痛斥自己当初过于谨慎，没有买《花花公子》的股份，现在它正在飙升。因此午餐期间，哈姆林坐在餐桌对面，带着愈发浓重的尊敬和接纳倾听海夫纳；当海夫纳表达出对哈姆林事业的关心，提议他也应该创办一份裸体杂志，并补充说男性杂志领域还几乎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巨大的财富等着被赚取时，哈姆林下定决心是时候放下他一贯的审慎缄默了。

再次听取海夫纳的建议，一周之内哈姆林就联系了帝国新闻公司的经理杰里·罗森菲尔德，是他最初帮助《花花公子》负担经费，现在正作为其全国经销商赚得盆满钵盈；罗森菲尔德赞同哈姆林创办新杂志的计划，承诺预先支付刊印所必需的款项，回报是授权他销售该杂志。于是，1955年11月，哈姆林创办出《无耻之徒》杂志的创刊号；虽然它没有《花花公子》那么时髦，印的是黑白照而非全彩，但1956年末它的销量也已经接近每月30万本，在书报摊上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从而招致

CDL的非难——而且它被邮局归类为淫秽物品，邮局想要取消其二等邮递优惠。

海夫纳的杂志也被邮局裁定为淫秽物品；但是邮政检察官没有起诉销量更好根基更牢的《花花公子》，却决议拿《无耻之徒》小试牛刀，无疑是认为后者在法庭上更容易被打败。但在华盛顿，哈姆林在帝国新闻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有门路，而亚伯·方特斯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虽然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无耻之徒》辩护花了哈姆林1.3万美元诉讼费，但邮政局长的起诉最终还是被撤销——哈姆林得以仍旧以二等邮资标准邮递杂志；而休·海夫纳没花任何诉讼费，《花花公子》就自动享有了同等优惠。

法庭上的凯旋和他因此在男性杂志领域获得的名气，令哈姆林激动万分；当《无耻之徒》的月发行量逐渐达到50万份时，1959年哈姆林开始进军以性为导向的通俗平装书市场。他雇佣了几个有才华又穷困的写手，他们用笔名写出数量惊人的快餐式淫褻小说，由哈姆林在“床头书出版社”出版并大量销售。

1960-1963年间，哈姆林把公司搬到圣地亚哥，他从那些装帧俗丽的小说中获利400万美元，每一本小说都鼓吹一种淫荡的历险——尽管哈姆林使用的封面标题会奇异地唤起一种罪的情绪。“罪”“耻”和“欲”这样的字眼反复在新书名中出现：《罪孽相随》《欲壑难填》《耻辱商店》《罪恶耳语》《罪恶狱长》《耻辱市场》《激情女祭司》《罪人降神会》《阁楼异教徒》《河口罪人》《罪之奴仆》《欲池》《羞耻代理人》——这些书名也许直接来自芝加哥教区里那些修女和神父的劝诫，他们都谴责性爱，哈姆林良心上还没有完全逃离那里；甚至在南加州奢靡的氛围中，他个人也在抵抗小说中过度描绘的那些诱惑——这些小说他一卡车一卡车地发送到全国杂货店和书报摊的后架上。威廉·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时一样仍旧是忠诚的丈夫、六个孩子的父亲、衣着保守的商人，与制造领带、空调或汽车零部件的商人没什么两样。他60年代初在肉感多汁的三级小说生意中成为富豪，如果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赞誉的地方，那就是他拜休·海夫纳所赐，明白美国即将迎来性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他不久就意识到，数百万像他一样传统的男人，从阅读放荡女人的事迹中间得到快感，这些女人和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妻子迥然相异。哈姆林的典型读者是隐秘的登徒子，有非凡幻想的普通人，他们的幻想在更加精巧、由纽约更大的所谓合法的出版商发行的感官小说中很难被满足。

正当哈姆林冒险进入性平装书市场之时，国家的反淫秽法案变得更加自由化了，要是没有这个契机，他就不会富有起来。最高法院在罗思案意见书中首次作出暗示之后，就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不仅在1959年合法化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著名的小说，也包括很多二流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杂志和平装书出版商的含有露骨性描写

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两个最高法院判例中，罗思案判决里所蕴含的自由精神进一步扩展了：在1962年的“手册企业公司诉戴”案中，法院判决几本有同性恋导向的裸体男性“健美”杂志免于邮政部长爱德华·戴的遏制；在1964年的“雅各布斯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对克利夫兰剧院经理尼科·雅各布斯的定罪，他之前获罪，是因为放映了艺术电影《恋人》，描绘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法国家庭主妇不忠的故事。在雅各布斯案意见书中，法院点明强调了在罗思案中还是暗含的定义：电影或任何表达形式，不论其有何种涉及性或不道德的内容，都不可以作为淫秽物而被禁止，除非它“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短语在1964年11月迫使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撤回最近对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的判决。尽管伊州法院仍旧坚称，布鲁斯的夜总会的例行演出令人厌恶反感，却不得不承认，他在舞台上讨论的一些题目还是有点“社会意义”。

最终，在1965年的“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爱德华·W.布鲁克，他谨遵该州传统，不断地谴责和处罚《芬妮·希尔》这部小说，该书正是1821年在马萨诸塞州率先被宣告非法的——布伦南法官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他表明一本书、电影或杂志只有同时犯有以下三种罪过，才可以被归为法律上所说的淫秽：必须勾起一般人对性“淫邪的兴趣”；必须“显然冒犯”一般成年人；必须“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

鉴于很少有作品会是“全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即便它淫邪又明显冒犯，因此绝大部分可疑的期刊、照片、电影和书籍——包括数百万本哈姆林的床头书出版社平装书——在60年代中期被允许在全国任何角落销售。但是，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多数有宽容的第一修正案倾向，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下级法院中支持性审查的人在这段时期会停止骚扰和起诉要表达性爱的人。恰恰相反，反“淫秽”的活动家们变得更加顽固和警觉；联邦探员和市反堕落小队（由教会领袖和像CDL这样的公民组织支持）在整理对色情产品承办商不利的证据时，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吹毛求疵，他们知道后者那些待遇优厚的律师们，或许会将所有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高等法院，而且如果必要，直达最高法院——他们希望能在一些法律技术细节上赢得逆转，或创造性地解释“淫秽罪”那措辞灵活可塑性强的定义。

因此邮政部增加了检查员和“诱饵”信件写手的数量，以此来更有力地对抗色情产品发行人。“诱饵”信件写手用假名和假地址回复露骨色情物品的广告，这些邮政员工试图设圈套，引诱色情产品发行人违犯“禁止通过邮件寄送淫秽物”的考姆斯托克法。一个叫哈利·西蒙的邮政检查员是“诱饵”们的主任，他在写过的数百封信中用过几十个假名——扮演羞怯的单身汉、上了年纪的鳏夫、大学生、小镇农夫等，要求邮购商寄送露骨色情照片、“婚内辅助用品”和淫书。这些信由西蒙的同伴们从全国各地寄出，其中很多信的回复地址栏中，写下的是一个保守社区的邮局信箱，那里有偏执的法官和思想正确、清教徒式的公民，从中可以选出一个有利的陪审团——联邦检察官们于是可以利用1958年的国会修正案，迫使性用品商人在任何收到他产品的地方出庭应诉。即使政府的起

诉是无力的，在遥远城市里长达数月的审判，也足以让一个性用品商人陷入财政困境——也许破产，因为商人这段时间被禁止营业，收入的来源被切断，还要支付不断增加的诉讼费，以及与他同住的律师们的差旅费、住店餐饮费，更不说那些被迫和他一起应诉的职员所导致的费用了。

道德社团和个人给国会议员寄去大量邮件，不断告知他们色情作品蔓延开来的情况，人们投诉他们街区的杂货店和书报摊被没有任何可取价值的垃圾文学污染；最高法院也收到很多轻蔑的邮件，由于在自由表达和个人自由问题上纵容的裁决，以及似乎漠视保守家庭和教会组织的传统，最高法院尤其成了美国右翼攻击的对象。自1953年厄尔·沃伦当首席法官的时代开始，最高法院就被各种各样的派系诋毁，因为它判处公共学校里的强制宗教实践为非法，因为它废除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因为它约束窃听行为，因为它降低了福利金受众的居留年期规定，因为它规定联邦囚犯如果在监狱里受伤可以起诉政府，因为它禁止执法当局“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因为它维护宣传和接受避孕信息的权利。在言论自由和性表达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法官接到的嘲讽邮件会比法庭里最教条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威廉·O·道格拉斯——更多。

道格拉斯法官拆阅这些信件——其中很多是学生签写的——的时候，经常发现精确相似的短语甚至是标点，使他推断这些信是从学校或教堂的黑板上抄下来的。虽然大部分信攻击他的法庭判决，但也有一些指责他的私生活和多次婚姻。1963年，六十四五岁的道格拉斯法官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三年后，他会再次结婚，新娘还是20多岁。在最高法院自1789年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一共只有三次法官离婚的记录。三次都属于道格拉斯法官。

威廉·O·道格拉斯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荐下加入最高法院，自那以来，他就代表着个人主义对抗专制势力。他曾经写道：“宪法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使政府不再压迫人民。”道格拉斯法官在保守派阵营引起的敌意，导致他的对手三次试图弹劾他，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引领的“猎巫”行动激发起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这期间，道格拉斯为作为被告的苏联间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签署了一项暂缓执行令——不过他们那年晚些时候还是在电椅上死去。第二次驱逐道格拉斯的呼声，出现在他第三次离婚之后；另一次撤销他职位的尝试，是在他的书《叛乱要点》出版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弹劾决议书中认为，该书会引起“暴力、无政府的混乱和社会动荡”。格罗夫出版社的《常青书评》，一份向来大胆、常常配有色情插图和故事的文学月刊，摘录了道格拉斯这本著作的片段之后，杰拉尔德·福特站在国会大厅里挥舞这份载有摘录的《常青书评》；决议书也宣称道格拉斯法官从不正当的来源收受资金——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确证两项指控都是捏造。就像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威廉·兰格一次对这个最高法院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官说的：“道格拉斯，他们给

你扣了不少屎盆子——但感谢上帝，都不黏。”

同样，道格拉斯收到的所有这些弹劾威胁和谩骂信件，都没有削弱他对媒体自由和性表达自由的坚持，即使这些性表达确实缺乏可识别的可取价值。道格拉斯法官有次评论道：“不管淫秽是什么，它都无法被当作犯罪来衡量，只能被当作罪恶来描述。作为罪恶，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在其他人的头脑中，而且它太主观，不能由法律惩罚。”在他看来，恰如其分地审查什么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言行，这项任务超越了道德团体、警察、邮政职员、神职人员、陪审团和法官的智慧和理解力——包括九位坐在这个国家最高法院席上、受人尊敬的法律贤人。关于最高法院的同僚们他写道：“恕我直言，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其他组织比它更没能力做到：首先，从所目睹的东西中认识到什么是淫秽；其次，深思熟虑地裁决，某刊物在年轻人或年长者的头脑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有害或有益的影响。”

不管道格拉斯对同僚法官们在色情方面领悟力的评价有多低，也不管他多希望法院和警官远离这个国家的锁眼，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律法真正应该关注的领域，最高法院在60年代还是继续仔细检查那些美国公民幻想和愉悦的源头；在两个罕见的案例中，高等法院非同寻常地决定，色情书籍出版商的社会影响如此差、如此无法补赎，使得这两个受审的人除了坐牢，不应获得任何较轻的处罚。

两人的一个叫爱德华·米什金。他的案子——“米什金诉纽约州案”——与“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在1965年12月的同一天由法庭审理；但是米什金的情况，和那个最终被赦免了的古老的芬妮·希尔故事的案子完全不同。米什金在纽约被逮捕定罪，罚款1.2万美元，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制造和销售一些粗制滥造耸人听闻的平装本小说，并为它们散发了大量下流广告，这些书似乎对异性性爱行为不那么着迷，反而沉迷于施虐受虐、恋物癖和其他被认为是变态的行为。米什金的律师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辩护，希望可以以此释放当事人：他们承认米什金的书也许确实全无可取的价值，也许甚至使一般成年读者恶心嫌恶；但是这些书不是为一般人而写，当然也就并没有激起一般人淫邪的性趣。鉴于对“淫秽”的明确定义中要求一般读者受到撩人意象的影响，米什金这些诡异的书不能被归为淫秽作品。

但是这个逻辑最终并没有说服足够多的法官，情形还是对米什金不利。虽然道格拉斯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法官和雨果·布莱克法官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投票推翻对米什金的判决（布莱克法官和道格拉斯一样，坚持不论出版社刊印了何等不道德或离经叛道的作品，政府对全国出版社都没有管辖权），其他六名法官却认为下级法院对米什金的定罪是正当的，他们没有撤销对他的罚款或监禁。

这段时期第二个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也是纽约人——拉尔夫·金兹伯

格，《爱欲》杂志、《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和双周简报《连音》的出版人。《爱欲》杂志引发了对金兹伯格的指控，罪名是违反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但实际上这本杂志与其说是淫秽，不如说只是撩拨人：它的人物彩照并没有露出生殖器或阴毛，文章也没有公然勾起淫欲，而且它优雅的图片、厚重的纸张和精装硬皮封面表明该杂志的设计和品质不凡。这本季刊靠邮件订阅销售，价格是一年25美元；出版的第一年，它收录的专题包括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泰利耶夫人的妓院》，由埃德加·德加配图；全彩重印重要博物馆里的古典裸体油画；还有《圣经》里有情欲的片段，并以《旧约》人物木版画做页边装饰。也有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 [138] 一篇名为《呼吁多偶制》的文章；另有菲莉丝和埃伯哈德·克龙豪森一篇名为《女人作为情欲旺盛者的自然优越性》的文章；重印马克·吐温曾颇具争议的短文《1601》；莎士比亚诗作的一些范例，它们被解读为暗示莎士比亚是同性恋；孟买男妓的照片；还有声名狼藉的楠·布里顿的故事，她在20年代初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沃伦·G·哈定私生子的母亲，制造了全国轰动的丑闻。

1962年冬天《爱欲》第四期被邮寄给订户，里面包括一个金兹伯格称为“炫彩的黑与白”的栏目，那是一系列展现一个强健有力的裸体黑人男性和一个迷人的裸体白人女性亲密接触的照片；尽管16张照片中没有一张的焦点在生殖器上，这一对儿却很明显是被刻画成了恋人。一些照片中他们在接吻；另一些中他们躺在一起爱抚对方；在也许是最惊人的照片里，他们面对面站着，手臂紧紧地抱住对方，大腿和骨盆牢牢地贴在一起，他们的身体靠得如此紧，女人的左胸都压平在黑人坚实的胸肌上。在这些照片的简介里，《爱欲》称它们为“摄像音诗”，它写道：考虑到法律要求的“可取的社会价值”——这一对儿是献给“一种信念，即不论种族，男女之间的爱是美的”；而且，文案继续写道：“今天，跨种族的情侣忍受着这种耻辱：不得不在一个质疑他们的世界里保护爱情。明天，他们会被承认是一个更文明进步的时代的先驱者，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偏见，唯一的种族是人类。”

当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照片时，据传他被激怒了。虽然很多肯尼迪的密友和同事相信，在私生活方面，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或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人们知道，在大众色情作品问题上他和约翰·埃德加·胡佛一样正直；而且，据维克多·S·纳瓦斯基所写的《肯尼迪正义》里说，在肯尼迪看到这对跨种族的情侣照片之前，他就已经打算审查《爱欲》和其他性出版物了。但是，据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副手尼古拉斯·德伯·卡岑巴赫向纳瓦斯基解释的，肯尼迪担忧这种干涉会被政治性地解读为他偏向于拥护天主教。不过，《爱欲》载有跨种族情侣的第四期是在全国打广告和发行的，包括南方腹地，而因为在密西西比大学正强行废止种族隔离，以及第一个黑人学生——叫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坚毅的年轻人——的到来，那是一个暴动四起、紧张不安的时期。肯尼迪相信《爱欲》的照片也许会对南方的民权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他迅速行动，以通过邮政派送淫秽物的罪名控告金兹伯格。

针对金兹伯格的刑事审判程序被安排成他必须在费城出庭应诉，而

该市市长和警方在种族问题方面非常反动，而且强烈倾向于执行反淫秽法案，在最近费城学校督察长出席的一场典礼中，很多色情读物在教堂的台阶上被焚毁，当这些书在热浪中萎蔫下去的时候，一群男孩儿组成的唱诗班高唱着“荣归主颂”^[139]。在金兹伯格受审之前，一名费城居民在当地图书馆的日志中写道：“拉尔夫·金兹伯格在我们（费城）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一样大。”

1963年6月开始的审判由一名冷峻的法官主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呈递上来的材料似乎都让他非常尴尬；庭审最后，政府召集了几个证人诋毁金兹伯格的作品，接着法官自己宣布，他从《爱欲》中找不到“哪怕一点可取的社会、艺术或文学意义或价值”，他对简报《连音》和《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也没有更高的评价。《手册》这本书是一位女作家对自己的多次婚姻和不忠行为自传式的描述，法官断定它“在法庭看来极度无聊，令人厌恶、震惊，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

但最终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两位小镇邮政局长在法庭上的证言，他们回忆起曾经收到过金兹伯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发来的信件，信件请求从他们的邮局邮寄金兹伯格的文献和公告传单，这两个邮局都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社区。两个社区的名字都有性暗示意味，一个叫“布卢博尔”，另一个叫“因特克丝”^[140]。两个邮政局长以设备太小无法处理这么多邮件为由拒绝请求后，金兹伯格联系了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141]的邮局；那儿的邮政局长允许后，金兹伯格和他的职员从米德尔塞克斯发出了几百万张传单，吸引人们订阅《爱欲》和其他产品——收件人名单有一部分是从电话簿里弄来的，人数极大，且对象不加区分，尽管很多人积极答复了金兹伯格，其他人却并不高兴，尤其是在性方面节制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一不注意就拆了邮件，读到广告商承诺让人从色情文学中获得满足的诱人广告词。一些宣传《爱欲》的广告传单和都市日报整版广告中，甚至将该杂志的起源归于美国最高法院对性宽容的政策：“《爱欲》是最近一些法庭判决的产物，这些判决以注重实际的精神解读美国的反淫秽法案，给了这个国家自由表达的新气息。判决使得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此前被禁的文学名著得以合法出版。”尽管拉尔夫·金兹伯格在费城的一些拥护者也认为，他在《爱欲》的广告中提到最高法院并不明智，也相信从米德尔塞克斯散发邮件的想法是个低级玩笑，但当费城的法官宣告判决后，他们仍旧大吃一惊：金兹伯格以淫秽物玷污邮政，裁决有罪，罚款4.2万美元，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打击，金兹伯格和律师们立即向同位于费城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但11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上诉被驳回，起草维持原判意见书的72岁的联邦法官声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家式经营，靠迎合和利用人类最大的弱点之一来卑劣地牟利……”

最终在1965年12月，“金兹伯格诉美利坚合众国案”被最高法院审理；庭审最热心的参与者之一是CDL的查尔斯·基廷，他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 [142] 意见摘要，支持政府检察官，强烈要求严格执行联邦反淫秽法。金兹伯格的辩护和在费城时一样，仍旧是《爱欲》和其他出版物既不淫邪，也不公然冒犯，也不是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确实，在肯尼迪起诉后的三年间，金兹伯格见识到休·海夫纳和其他几个出版商在展现赤裸裸的性等方面远甚于他，却没有被起诉；金兹伯格有信心，在华盛顿不像在费城，法律会被客观公正地解读，必然会撤销对他的有罪判决。

最高法院听取了金兹伯格首席律师的辩护词和政府发言人的立场之后，休庭数周仔细审议此案；三个月后宣布判决时，金兹伯格才得知法庭根本没有在意《爱欲》《连音》和《手册》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法院仔细考虑的反而是金兹伯格的广告宣传活动；最终投票结果是五比四，金兹伯格因通过邮件“勾引”而获罪，这是一项在那之前从未被处罚过的罪行——拉尔夫·金兹伯格的有期徒刑和4.2万美元罚款只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被判合理有效。

起草多数派意见书的布伦南法官宣读意见书时态度粗暴，令律师和听众的观察员们大吃一惊。他指出，金兹伯格的广告中弥漫着“好色之徒猥亵的目光”，也毫无疑问地表达出对金兹伯格行为的愤怒，因为他利用了米德尔塞克斯邮局，还在赞美《爱欲》的整版广告中鲁莽地提及了最高法院。过去十年间，崇尚自由的最高法院被指责在美国煽动很多事物，但布伦南法官不会允许《爱欲》杂志在此之列；不管在法律上它不属于淫秽物，布伦南认为金兹伯格有罪，是因为他经营“迎合低级趣味的卑劣生意——‘提供文字或图片材料，公然以引起消费者性欲的方式做广告’”；作为对其他出版商的警告，布伦南补充道：“只要出版商唯一强调的是他出版物中撩人性欲的那一方面，仅这一事实就可判定其为淫秽物。”

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波特·斯图尔特、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中，道格拉斯法官的意见书最清晰有力地为金兹伯格的宣传手段辩护。他指出：“在最好的杂志中做的广告，都充斥着大腿、关节、小腿、胸部、眼睛和头发，使潜在买主能注意到乳液、头饰、食物、酒、衣服、汽车，甚至保险单。这些性感的广告既不增加也无损于所售商品的质量。我也看不出来，为何它就会增加或损害一丁点儿所售书籍的合法性。一本书应该以其自身来受到评判，这与它为何被写出以及销售它时采用了何种诡计都是无关的。”

金兹伯格的律师们用巧妙的法律策略和不断的延期为他争取了保释，自由了几年，他们最终还说服司法系统将有期徒刑从五年减到三年；但逃不掉的，他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法警手里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服刑的城市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刘易斯堡，不到20年前，政府在那儿监禁了像威尔海姆·赖希和塞缪尔·罗思这样的文字和思想的传布者。金兹伯格在刘易斯堡对媒体做了最后一次街头演讲，对他的处境表达愤慨，还将一

卷印有人权法案的羊皮纸揉成一团扔进街边的垃圾箱，之后他转向联邦办公楼，在那儿他将正式失去自由。后来记者看到他戴着手铐走出办公楼，和一个犯有抢劫银行和过失杀人罪的黑人囚犯铐在一起，由联邦交警护送到一辆车中，他将被载到几英里远的高墙铁门里，一个狱监正等在那里。

旧的道德问题不断有新的违犯者，最高法院继续审理这些人的上诉；处理完金兹伯格的案件一年后，法院审理了一个出版不法之徒，但他既不是出版商，也不是经销商、编辑或作者。他在时报广场上的书报摊做生意，1966年一天下午这个不走运的人卖出两本平装书——分别叫《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给一个恰巧是便衣警察的顾客。摊贩罗伯特·雷德鲁普在那个便衣要买之前，从没读过也没听说过这两本书。事实上，雷德鲁普甚至不是书报摊的正式职员；他只是在那天顶一个休病假的热人的空缺。但警察对这些情况不感兴趣，亮出徽章之后就将愁容满面的罗伯特·雷德鲁普逮捕了。他在看守所按了指纹，被警探痛斥，然后被指控违犯纽约州刑法第1141项禁止销售“淫秽、猥亵、下流的书籍”的规定。

《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的出版商、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有责任保释雷德鲁普和为他做法律辩护。尽管刚在休斯顿历时两个月的淫秽案官司中花了30万美元——他被指控犯有25项罪名，陪审团悬而不决，但其最终裁断使他的几本书随后被禁，哈姆林仍旧毫不犹豫地为雷德鲁普辩护，该案在纽约州一路上诉，最终上诉最高法院。哈姆林将花费10万美元为这两本售价75美分的书，还有在时报广场上售卖它们的摊贩辩护；但他觉得这非常值得，因为1967年5月，七名法官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释放了雷德鲁普，并裁定这两本黄色读物在法律上不算淫秽物品。这是一个由法庭整体做出的判决，无需单一法官起草意见书；但雷德鲁普案不久就被性文学出版商们称赞为最高法院做出过的最自由化的裁决——因为如果《欲池》和《羞耻代理人》都不算淫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书算淫秽了。这些书和罪犯爱德华·米什金之前出版的书一样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比金兹伯格被起诉的那些书报杂志色情得多。因此，支持第一修正案的律师和法学学者将雷德鲁普判决解读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废止了书刊审查制度。只要没有像金兹伯格那样以“勾引”的方式做广告，没有强加给不愿接受它的公众或卖给未成年人，不管一本书的内容有多色情、恶心、毫无价值，法院都允许其存在，并被卖给任何想读它的人。

哈姆林欣喜若狂。在他看来，3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诉《尤利西斯》案”——该案中文学精英们取得了胜利——所开启的法庭抗争，现在在1967年终于结束了，而最终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凯旋。一本性露骨的书要合法出版，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乔伊斯的名著，甚至不需要证明是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有可取价值的小说；现在，最高法院在雷德鲁普案中似乎终于放弃了它国家文学作品公断人的角色，它确实既无时

间也无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这一判决的衍生结果振奋人心。它暗示任何书，就算是垃圾，就算充满了全国最平庸的小说写手喷出的愤怒咒骂和污秽的胡言乱语，也可以被出版和销售，不管警察、神职人员或CDL会怎么想。它意味着，加州弗雷斯诺的出版商桑福德·E·阿达伊所销售的平装小说《一个警察的性生活》——他被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夏威夷政府起诉——因为雷德鲁普案的判决，现在合法了。

在最高法院1967年的备审案件目录表中，几乎有另外30个淫秽案以类似的方式被撤销，诉状上只印上了一个词——雷德鲁普。这也意味着，1968年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兰登书屋能够不受审查和巨额诉讼费的威胁，发行菲利普·罗斯关于手淫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哈姆林认为，美国自由表达的边界不是被纽约的文学机构扩展的，而是被他自己、米尔顿·吕斯和桑福德·阿达伊这样不那么高雅的加州出版商拓展的——他们每年在法庭上花大笔钱，与反堕落小队、联邦探员和南方“圣经济带”^[143]的郡县治安官抗争，如此打开了新的领域，当像出版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约翰·厄普代克这样有名气作家的出版商以后再探索的时候，就容易许多，获利也更为丰厚。

哈姆林对雷德鲁普判决的称心满意，很快就被由CDL这种组织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作用力抵消，他们用成千上万封信件和电报围困国会和约翰逊总统，抗议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对性的纵容。就是为回应这些抗议，两名议员、CDL的荣誉成员——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卡尔·E·蒙特和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多米尼克·V·丹尼尔斯——提出了法案，成立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除了其他任务，还要求委员会研究“淫秽色情物品对公众，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它与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自由分子最开始反对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派的议员都不愿意公开为“淫词秽语”辩护，以防激怒选民，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他们也认为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工具，帮助他们以“道德”之名让思想审查正当化。

因此委员会两年后得出的结论——莫顿·希尔神父谴责为“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的报告——让绝对认同第一修正案的人又惊又喜，程度不亚于所引起的CDL的惊慌；哈姆林随后决定，出版发行装饰有几百张狂乱纵欲的照片和图画插图版报告，使这件事引起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升级。这是哈姆林职业生涯中最放肆无礼的举动，让很多人非常不舒服，包括他的老朋友休·海夫纳。哈姆林请求在《花花公子》的书评专栏宣传插图版报告，被拒绝后，哈姆林才注意到海夫纳的感受。海夫纳的主编纳特·莱尔曼寄给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一封信，里面解释了拒绝的理由。关于插图版报告，莱尔曼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非常发人深思，但看不出任何在《花花公子》给它撰写书评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写一篇书评，仅仅是

祝贺（贵公司）有这样精巧的想法，把一大堆露骨色情材料和证明它们无害的文章放在一起。天呐，想想“可取的社会价值”吧。我觉得要是有一天最高法院的这条准则无以为继，你们的这版总统报告就是罪魁祸首。

的确，我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心。总统报告是在审查制度领域出版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受到极多攻击，而你们这群人推波助澜，造成是政府给你们提供了这些图片来搭配报告文字的印象，以赢取更耸人听闻的效果。你认为尼克松政府会善罢甘休吗？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们的机灵将导致你们身败名裂。你真应该让哈姆林读读希腊人是如何定义傲慢的。

当哈姆林看到莱尔曼的信后，感到遭到了背叛；他突然看到了《花花公子》和海夫纳的怯懦及伪善。在性产业中大发横财之后，海夫纳现在似乎变得保守戒备起来，也许是因为尼克松现在主政白宫，而且大部分都市日报的社论版都发声赞同反淫秽运动。哈姆林在一封给海夫纳的信里写道：

《花花公子》是否给我们的书做书评是不相干的，实际上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尽管同样无关紧要，（莱尔曼）表达出来的无礼更别提傲慢粗鲁的态度。鉴于他的主编职位有名无实，我可以判断他只是代管理层发声。因为管理层就是你，所以应该通过合适的渠道澄清是非，以教导他。

他若无其事地提到最高法院准则——它在60年代初期和中叶最浓墨重彩地制定出来，而实际上它大半是基于对我们公司的判决制定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你不谙世事的编辑并不在场。1953年那个晚上，在埃文斯顿的我家，当我告诉你和你可爱的妻子米丽，你不能向美国公众兜售性产品的时候，他当然也不在场。我当时的想法，在《花花公子》诞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判断错误，但与当时的商业伦理吻合。你投入战斗，但尽管如此，《花花公子》也被邮局判为淫秽刊物，无法获得二等邮政许可，直到1957年年中，我通过华盛顿的联邦法院，为我的杂志《无耻之徒》赢得了一个二等邮政许可，此后不久，受此案之惠，《花花公子》没通过法庭抗争就获得了自己的邮政许可。

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你的员工觉得是法律自己爬到了奥林匹亚的高度，但事实是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努力，通过胆魄和毅力实质上改变了法律气候。莱尔曼先生知道什么是“可取的社会价值”？当这一因素被决定的时候，他在联邦法庭里吗？我在，你很清楚……

至于《报告》本身，我基本上不需要莱尔曼告诉我的公司它有多重要……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我很清楚这一点，也正因此我们要出版它。完全不像莱尔曼那样蹑手蹑脚装腔作势，我们大声清晰地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像今天这样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因为大约15年来，我公司的立场一直是无畏而直白的。莱尔曼觉得《花花公子》是在哪儿大量生产出来的——在《时尚先生》一间充满无病呻吟的保守思想的密室里吗？……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你那时在冯·罗森以性为导向的出版公司工作，《花花公子》正是从那儿产生的吗？

所以在书评这件事上，请好好管管你不懂事的雇员吧。当你私下要看这本书时我寄给了你，感觉你对它的兴趣是真诚的，我了解它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毫无疑问会引起的争议。《报告》是通往思想自由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这条道路有很多部分是我们铺设的。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就是重要的铺路石之一。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我仅仅是以为，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运用杂志赋予你的领导权了。抱歉我看错了你。不会再有这种事。

休·海夫纳没有回复，但是哈姆林在全国发行插图版报告后不久，收到的一则回复是美国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在达拉斯和圣地亚哥对他的起诉。哈姆林和他的三个员工在圣地亚哥被指控传播和销售“未经授权”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而且用淫秽图片说明这份报告。

接到米切尔起诉的一周之内，哈姆林买下《洛杉矶时报》和两份圣地亚哥日报的整版广告，批评米切尔的行动是尼克松政权“遮掩不住的政治手腕”，意图用“色情威胁论”转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注意“如下问题：失业、饥饿、贫困、扩张的城市贫民窟、教育、支离破碎的税收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秘密进行的战争”。广告继续说：“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浪费在监督美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上，公民也不应该因批评官方行为而被惩罚。法庭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此等事务上。司法部长和政府应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当下紧迫的问题中去。”

尽管政府起诉哈姆林的诉讼程序很便利地在他的居住地展开，省了他不少要是在达拉斯——联邦调查局购买插图版报告的地方——应诉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但是哈姆林在圣地亚哥要面对的联邦法官戈登·汤普森，却是最近被尼克松任命的；甚至在庭审开始前，哈姆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深陷在无情的处境中。首先，汤普森法官拒绝了辩护律师延期一个月审判的请求。延期可以让法庭上抽取陪审团成员的主要陪审团任选轮盘 [144] 中纳入一个最近编制的名单，新名单中新注册的选民也许在性方面比轮盘中年老些的选民要宽容，而轮盘中的旧名单已经三年没有更新过了。然后辩护律师建议，询问每个可能的陪审团成员如下问

题：“你是CDL的成员吗？”“你认为自己非常虔诚吗？”“你最近是否在你礼拜的地方听过关于淫秽的布道？”也被法官驳回了。

1971年10月开庭时，陪审团由九男三女组成，年龄都相对较大；而且让哈姆林不舒服的是，政府的一位首批证人梅尔文·安凯尔博士是个非常支持CDL的人，还帮助基廷完成了少数派报告，他斥责哈姆林的插图和宣传册是败坏的“淫欲”。报道庭审的圣地亚哥报纸对哈姆林的插图也一样没有好印象，管它叫“下流报告”。“下流”这个词在日报大标题中不断出现：“下流案在密谋事实方面遇到阻碍”；“法官禁止阅读下流报告”；“三专家为下流案庭审作证”。另外，比起辩方证词，圣地亚哥报纸编辑们刊载了更多政府证词；而且汤普森法官决议排除一项证词，这也扰乱了辩方，因为那是最支持哈姆林的一位证人——一个年轻女性，她最近在圣地亚哥做了一项调查，给718名公民看了哈姆林的色情宣传册后，她发现，基本上大多数人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禁止阅读它。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考虑这项调查，因为哈姆林是由于一项联邦罪行——污染邮政——而受审，因此证据必须与全国的性标准相关，而不仅仅是圣地亚哥的标准。

庭审历时两个多月于1971年11月结束，陪审团历经重重困难才做出了裁决。尽管哈姆林书中的插图对陪审团来说色情得再露骨不过了，但陪审团内部也承认，这些图片准确地描绘了总统报告所研究的内容；而且哈姆林书中的文字，几乎全部是委员会的一点儿也不淫秽的文章和数据。但是，对于哈姆林寄出的5.5万份广告宣传册，陪审团就不那么宽大了。虽然宣传册重印了书中露骨的色情插图，但它没有加上委员会报告的任何原文摘录，反而用编辑版面攻击尼克松总统拒绝委员会的建议；这种组合冒犯了至少十几个未经索要就收到这份宣传册的公民，他们分别在邮局正式登记了投诉。所以经过六天私下辩论和争执后，陪审团裁决，就算书不淫秽，那份宣传册也许是淫秽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汤普森法官在1972年2月传唤威廉·哈姆林到法官席前，阴沉地宣判他四年有期徒刑和总计8.7万美元的罚款。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两个下级职员被判处缓刑五年。

判决使哈姆林目瞪口呆、心烦意乱，但鉴于他以保释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和他的律师们打算上诉到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被驳回之后，他们会去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哈姆林的书在那儿都胜诉了。

1973年6月，上诉法院公开了对哈姆林的意见书；它支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确认哈姆林有罪。但是两周后，正当哈姆林的律师们在准备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诉状时，哈姆林听到了他认为在出版业这么多年来最不祥的消息：最高法院突然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新定义预示了色情产品出版者的阴暗前景。一份令人吃惊的决议在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通过，大半是由四个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伯格、布莱克门、鲍威尔、伦奎斯特加上肯尼迪任命的怀特法官——支配的。在决议里，最高法院迅速从法律用语中删去了“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喜爱表达性爱

的人们一直最常钻空子的短语。1973年6月21号公布的新法律使得想要取缔涉性作品的公诉人不再必须证明它“全然没有”价值；它只要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就可以被认为是淫秽。近些年来所有自由化的趋势——“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雅各布利斯诉俄亥俄州案”，现在都被首席法官沃伦·伯格起草的新意见取代；一个色情产品出版者的案子促使他和保守派同事强化反淫秽法案，这个色情产品出版者曾经因为用邮件传播淫秽广告小册子而被传讯。

这个已被定罪的出版人是洛杉矶的马文·米勒，威廉·哈姆林对他很了解，因为他名声在外。近几年来米勒通过发行X级的家庭电影、露骨色情照片杂志和黄色读物赚了几百万；而且，像那么多被指责为以可耻的出版和贸易为营生的美国人——例如哈姆林、海夫纳和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例如大卫·S.艾伯茨，一个被定罪的洛杉矶邮购商人，和埃德·朗伊，一个洛杉矶裸体公园的主人，他也为那位历史上裸体上镜数最多的女人摄影——一样，马文·米勒在芝加哥城出生长大。似乎那个爱尔兰天主教气氛浓重的城镇，注定要养育一些对性爱着迷的本地人，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最终会将自己流放到更加自由的地方。芝加哥就是美国的都柏林。

马文·米勒是芝加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父亲在他1929年出生前几个月去世。马文·米勒和他穷困的俄国移民母亲靠救济金生活了五年后，在6岁时因闯入一家面包店而被捕，然后被委由一家犹太少年机构看管。此后米勒的大部分青少年时代是在寄养家庭和公立寄宿学校度过的，他的监管人都承认他智力出众，有躁动的野心，而且像几年后在一份假释报告里记录的，他“有天分找到能迅速致富的生意”。

大一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后，米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散装二手银箔经销商，卖覆盖整个地面的地毯织料的推销员，股票经纪人，以及洛杉矶一个毛巾和日用织品供应公司的经理——50年代初，他因为在那儿伪造公司账目，骗了公司3.5万美元而被法庭定罪。这些罪行，加上像纵火罪这样的其他罪行，使米勒成为加州监狱的常客，在那儿他的行为总是反面教材，但他也被监狱教辅们认为只是个无聊的骗徒，有些许魅力，但不大了解社会系统如何运转，甚至更不知道什么会让他惹上麻烦。

1961年从监狱被释放之后，他适时地在洛杉矶色情产业圈赢得盗印者的恶名，他以连载的形式私下复印出版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我的秘密生活》，而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刚刚花了5万美元，从一个德国收藏家那里买下这本书的所谓美国独有出版权。但是米勒没跟任何人说，就在十期杂志上连载了这本书，每一期在书报摊上卖1.25美元。当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以版权侵犯罪控告米勒时，一个加州法官发现自己处境奇特，不得不解决这两个他都想送去监狱的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因为，在格罗夫出版社紧跟罗思判决，以昂贵的两卷本发行《我的秘密生活》之前，它毋庸置疑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尽管非法），所以从技术上说格罗夫出版社的起诉伤不到米勒；罗塞特唯一可以阻止米勒继续印

刷该书的方法是在庭外付给米勒一大笔钱，他很不情愿地这么做了。

当马文·米勒开始通过邮件发放几千份广告宣传册，吸引人们注意他想卖的一些物品时，他短暂的好运就结束了。其中一本叫《我，一个同性恋》的裸体男模画册售价3.25美元；一本叫《名叫邦妮》的大开本画册售价10美元，里面允诺给读者一个金发裸体女人24张撩人的彩照；另外一本售价10美元的画册《非洲的黑色性爱力量》里，有一对黑皮肤夫妇的特写；价格15美元一册的《色情图录》刊印了150件色情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其中包括萨默塞特·毛姆和法鲁克国王 [145] 的一些经典收藏；还有一部叫《夫妻性交》的X级8毫米电影，售价50美元。

米勒发放宣传册的联系人名单，是由洛杉矶一家邮寄名单中介提供的——该公司专门把使用邮购的消费者的名字编纂成名单，名单以他们过去买过何种商品分类，这些商品从园艺用品到古董汽车零部件不一而足。为了保护他的名单，该中介不透露有各种“特殊兴趣”的人的名字，却负责填写地址和邮寄制造商想要散发的广告材料，他向制造商要价高达每1000个名字100美元。马文·米勒要求得到将近30万个名字，花了他大约3万美元。虽然所有的名字都在中介的所谓“X和Y”名单上——过去曾买过“成人”用品的人——但实际上中介没法确定，米勒的邮件会不会偶尔到了“错误的人”手中，因为中介手上的性产品消费者全国名单中，渗入了不少邮政检查员和道德社团间谍的假名。

因此回想起来也不奇怪，米勒进行广告宣传战役后不久，警局就接到一些投诉——不过就法律来说，是谁打开了邮件并没有什么差别。根据加州法庭的裁决，米勒的材料是淫秽的，他有罪，日后他因犯下此罪被沃伦·伯格警告，而伯格可以说已经算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了。在伯格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历史性的判决中，他写道：“上诉人销售插图书进行了大范围的广告宣传运动，这些书可以被委婉地称作‘成人’材料。”伯格在脚注补充道：“我们在此案中讨论的材料应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色情作品’或‘色情的材料’。‘色情作品’（pornography）一词由希腊语而来（*porne*，娼妓；加上*graphos*，书写）。该词现在的意涵是，‘1.对娼妓或卖淫的描述；2.对纵欲或淫荡的描绘（在写作或绘画中）：对色情行为的描绘，意图激起性欲。’以上摘自韦氏新国际词典。下流的色情材料是所有‘下流’表达的子集但并不是全部，至少从我们的语言现在如何使用‘下流’这个词来看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使用的词语‘下流材料’有源自罗思案的特殊司法意义，即‘关于性的’下流材料。”

早在马文·米勒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前，沃伦·伯格就已不能容忍在美国书籍、杂志、电影和现场表演中性爱被呈现出来的样子了，不仅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是这样，在明尼苏达州小一点的中西部社区也是这样，伯格就是在那儿被他正直审慎的家庭抚养长大的。去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州都出现了按摩院、裸体酒吧和像《深喉》这样的电影——62分钟长

的正片里有50分钟是各类性交的场景。不仅上百万男人看了这部电影，他们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深喉》是很多情侣一起观看的第一部露骨色情电影，他们中很多人被好奇心诱惑，因为这部影片被大张旗鼓地宣传，放映时经常被全国的反堕落小队突袭，他们坚韧但徒劳无功地想要完全查禁它。

但现在在马文·米勒案中，首席法官伯格和最高法院中其他保守派终于找到机会，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性开放的愤慨，驱除他们前任在60年代的放任纵容的态度。伯格宣布，色情出版商凭着在俗丽书籍的扉页重印“伏尔泰语录”就可以令这些下流书合法化，这样的好日子结束了。而且，他扩展这个主题，继续说：“如果国家警察权力可以在公共街道上禁止某种行为或对该行为的描述，那么当这些行为改到了在酒吧或‘现场’戏剧舞台上发生，也不会让它们自动受到宪法的保护，就像宪法不会保护正午在时报广场‘现场’表演交合的男女一样，即便他们同时也在严肃参与政治对话。”

伯格强调，新的反淫秽法也意味着，也许一些事物在时报广场和日落大道的电影院和人行道上仍旧是合法的，但这不再会影响主要街道的地方法官或“圣经带”的郡县治安官对审查法的解读——因为现在是以“社区标准”，而不是“国家标准”，来判决所有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淫秽案。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一本像《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它的广告商总是假定，《花花公子》每月既可以被摆在大城市也可以被摆在小镇的书报亭里）以及像《巴黎最后的探戈》（由马龙·白兰度主演，预期向全国观众放映）这样的主流情色电影，现在也许会发现他们在那些城市或市镇的市场被审查制度限制了，在那里，有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团体给地方政客和警察施压，要求维持道德的“社区标准”。最后，抛弃了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首席法官伯格写道：“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和淫秽材料之间有联系，立法机关还是可以明智地决定，这样一种联系确实或可能存在。”

伯格的判决意见书要求全国的报纸刊登在头条，代表保守地区的国会议员、神职人员和像查尔斯·基廷这样有宗教热忱的公民，热情洋溢地称赞它，基廷发表在《全国正派报道》中的声明说：“从我创立CDL十五逾年以来，色情出版商肆意践踏美国公众，用污秽的浪潮吞没了这个国家，将她引到道德败坏和衰亡的道路上。他们是为了钱。巨额的金钱。数十亿元。为了钱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国家、同胞和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陷于性堕落的枷锁中。这些阴沟里的商贩把他们肮脏的商品包在美国国旗里，自己蜷缩在宪法后面。他们想利用那份解放了人的心智和精神的伟大文件，来奴役美国男人，贬低美国女人。这些卑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久我们就会带着震惊和怀疑回首，看看我们让自己被他们以‘自由’之名拽入何等深渊。”但是，基廷的社评继续说：“现在要看我们的了。要看你的了。美国正直的人，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将要发动一场神圣的，是的，神圣的战役对抗淫秽物商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休息，所有和CDL有关联的人都不会休息，直到美国所有色情出版商要么歇业，要么进监狱，或两者兼得。”

反对伯格判决的，有他在最高法院的四位同事——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布伦南和马歇尔，和一些之前支持过“反淫秽”净化运动的大都市报纸出版人，他们以前没发现，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和表达性的权利之间有直接联系。《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评版承认，伯格判决给了“地方审查员许可。它可能会像道格拉斯法官担心的那样，引起‘对图书馆的搜查’。长远来看，它会允许每个地方社区和每个州来裁断什么材料能被接受，因此会要求所有与性有关的文学、艺术和娱乐产品，去适应容忍度最低的公共标准。警察局和法庭的道德标准将迎来它们的黄金时代”。

伯格判决出来几天之后，犹他州官方宣布，本来预订在盐湖城公映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被禁播了；在好莱坞，正在商谈将休伯特·塞尔比写工人阶层同性恋的小说《布鲁克林黑街》搬上荧屏的两家工作室，突然放弃了计划。“我们不想惹上官司，我们只想拍电影。”一家工作室的经理解释说。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蒂痛惜，最高法院新的判决“可以产生50个或更多关于什么是淫秽的不同观点”，而其他的业界发言人预测，主要的电影制作方，当然还有所有电视工作者，现在在处理任何可遭诟议的题目时，会变得不那么“成人”，但这反而会更加倒人胃口。

《花花公子》《搞》和其他以性为导向的出版物的下一期封面，都由它们的艺术总监迅速进行了调整；在全国的色情用品商店，顾客排队买大量的商品，因为他们担心，不知何时这些就永远不能再摆上货架了。《阁楼》杂志的罗伯特·古乔内说：“这项决议的直接后果，将会是逼迫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转入地下——这意味着行贿和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这和回到禁酒时期是一回事。”媒体引述《深喉》的主演琳达·洛夫莱斯的话说：“上一个启动审查制度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他们下面要做的就是敲你家的门，带走你的电视和收音机。”

在所有对伯格意见书忧心忡忡的小说家中——包括库尔特·冯内古特 [146]、杜鲁门·卡波特和约翰·厄普代克的一个团体，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147] 认为该判决是一个尚武社会的表现，这个社会因为不能继续在越南释放攻击欲望而有些失意。她解释说：“当美国不出去打仗的时候，想要惩罚人的清教徒欲望就不得不在家里释放出来。”

威廉·哈姆林急切地读着其他人对淫秽这一问题的回应；但当他的案子应诉的日子越来越近，197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忖度，当他取代马文·米勒的位置站在华盛顿正义的大殿里，新的法律会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他。他的希望是，因为他最初是被一个圣地亚哥法官以“全国”，而非“社区”标准做出的判决——权威调查显示，圣地亚哥的性标准比全国标准更加自由——基于对米勒案的解读，他至少可以获得发回重审的机会。但1973-1974年间，哈姆林的律师提交复审的诉状，既没有为他赢得重审，也没能减轻原法官的四年有期徒刑加8.7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判决。

最终，在1974年4月15日华盛顿一个刮风的周一早晨，威廉·哈姆林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爬上最高法院白色的大理石台阶，走向正门，从那儿通向的房间里，九位显赫的人将仔细考虑“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等待法官到来的时候，威廉·哈姆林和妻子女儿坐在华丽拥挤的最高法院大厅，第六排桃花心木长椅上，抬头看着高高的藻井天花板、大理石的柱子和古典雕像；和几十年前少年时期在芝加哥做大弥撒时一样，哈姆林心中感到既焦虑又敬畏，有一种战栗的崇高感。这天早上哈姆林的上诉将被审理，他的命运将被讨论和决定。但是不管他胜诉或败诉，他的名字和案例“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都会永远被列在法律教材——美国法学的最终审判书中。他对审判结果还抱有希望。他相信他的律师——那身材矮小且跛腿的人，在屋子前端的律师席上几乎看不到他——在他被指控的这种难以下定义的罪行方面，他是全国最能言善辩的辩护人。

但哈姆林的妻子并没有这么乐观。对于弗朗西丝·哈姆林这个意志坚定、目光敏锐的女人来说，头次来华盛顿的这趟旅行毫无意义，审理该案对房间里几百名旁听的游客和法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个有趣的大场面，但对她丈夫来说只是一个过场，最终法庭毫无疑问会确认下级法官已经做出的判决。她并不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什么更优秀的地方；在法官袍下面他们也是一般人，政治上被任命的人和有偏见的仲裁人，尽管还没出现在法官席上，他们却已经预先决定了她丈夫的命运，那布有浮雕的铮亮的法官席，在她面前像个祭坛般阴森地若隐若现。

作为妻子，她坚定地支持这个常被起诉的出版商，默默地忍受着多次审判所带来的苦难，他1948年娶她时她是个寡妇，他慈爱地收养了她四个年幼的孩子，因此她深深地痛恨其他人对他道德品性妄加评判的傲慢；最后那年，她对全国执法者愈发怀疑和冷嘲热讽。美国司法部长约翰·M·米切尔，曾亲自让大陪审团起诉她丈夫发行插图版报告，但司法部长自己现在正因在水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1971年非难报告时看起来是多么一本正经，在受到行贿和逃税的指控后已经被迫辞职。全国无人比肩的伪君子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因为他的水门诡计被绝望地困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广播和电视新闻报道每天都在推测他会被弹劾或入狱。

然而，这周早些时候在首都参观时，她注意到巨大笨重的联邦官僚体系继续维持，在纳税人头上昂贵地运转，这是她对华盛顿最骇人的印象：官僚体系规模巨大，绵延不绝的灰色建筑容纳了大量雇员，豪华轿车造成交通拥堵，还有政府轿车到处运送数不胜数的冗余的人和杂役，薪金名单上都是他们的名字，但无疑对高效地服务美国公民毫无助益。

最高法院自身也是这样。她和丈夫穿过走廊的时候，在楼里到处都看见一间间屋子里挤满了办事员、警卫、接待员和秘书；但到了法官办公室后，他们却惊愕地发现职员犯了错，哈姆林的律师原本为他们安

排了在审判庭落座的特别位置，职员却在名单里漏掉了他们的名字。所以他们并没有被分配到能看到诉讼全局的前排位置，而是被引到法庭的后半部，这使她丈夫极为愤怒，他已经在这个案子上投了40万美元，他认为法庭礼节应该确保，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能坐在近台位置来观战他生命中最昂贵的法律决战。

进法庭之前，警卫对她、她女儿和丈夫搜身时滥用职权的态度，也惹恼了她。首先他们坚持要求她脱下为这个场合新买的黄色大衣，把它暂存在衣帽间；然后他们仔细检查她的皮手包，发现里面有个照相机后，严厉地提醒她不允许拍照，并没收了相机，指示她审判结束后再取回。

法庭上她紧挨丈夫坐着，努力抑制着对他未来的忧虑。四年有期徒刑和8.7万美元罚款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因为没人能在法庭上说话甚至耳语，她在屋里四处看，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看到富丽堂皇的内部装饰、庄严的骨白色高柱，以及优雅的法官席、高背黑皮椅后面作为背景红色天鹅绒帷帐。一座金表从两根柱子之间悬挂下来，显示现在是早上9：57-几分钟后就就是法官们预计入场的时间。在法庭前部上方，接近44英尺高屋顶的地方，弗朗西丝注意到一件有趣的肉感十足的古典艺术品：横亘整个大厅，金碧辉煌的米黄色大理石雕带，展现了大约20个裸体半裸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形态各异聚集在一起。这些形象象征着人类智慧、真理、正义和德性；但对她来说，这些身体也可以轻易被说成是一群罗马享乐主义者或纵欲主义者，她觉得非常讽刺，法官们将要审问她丈夫在《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中使用插图的方式，而这样一副场景就盘旋在他们头顶上。

突然，执法官敲槌子的尖利声音打断了她的沉思。屋里所有人迅速站起，法庭传令官开始诵咏：“肃静！肃静！肃静！所有莅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事咨询尊敬的大法官的人士请近前，敬请注意……”突然，红色帷帐戏剧性地拉开了，九个身着黑色法官袍的男人出现在天鹅绒揭开的地方，向前走了几步后落座，而传令官继续道：“本庭现在开庭。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和此尊敬的法庭！”

坐在中间，脸庞结实红润，头上细心梳好的银发闪着光泽，这是66岁的首席法官沃伦·伯格。在他右边，皮肤皱缩体格瘦小的是所有大法官中最年长的威廉·O·道格拉斯，今年76岁，已经在最高法院任职35年。伯格的左边，是戴眼镜且谢顶的74岁法官威廉·布伦南，他于1956年由艾森豪威尔任命，是最高法院将近200年的历史中，所有六个天主教徒法官之一。这些老人旁边坐着其他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一个相当敦实、面相和善的59岁中西部人；57岁的拜伦（“奇才”）·怀特曾经是罗德学者 [148] 和橄榄球明星中卫，下颌坚实，半球形后脑的形状像老式的橄榄球皮头盔，他现在看起来很严肃；66岁宽胸膛大胡子的瑟古德·马歇尔，是最高法院第一个黑人法官。法官席靠外的地方，坐着尼克松任命的法官：外表整洁、戴着角质框架眼镜、薄嘴唇的65岁的哈里·布莱克门；体形瘦削，看起来有点虚弱的66岁的弗吉尼亚州人刘易斯·鲍威尔；

以及最年轻的最高法官，49岁的威廉·H·伦奎斯特，他是个高大健壮目光冷漠的保守派，有平滑的黑发和剃刀修出的锐利鬓角。

首席法官伯格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宣布，今早候审的两个案子中，将首先审理涉及好莱坞电影《猎爱的人》的案件，这部电影在佐治亚州富有乡村气息的城市奥尔巴尼被判为淫秽。弗朗西丝·哈姆林放松下来，因为《猎爱的人》案的控辩双方至少会各有半个小时陈述相左论点，她丈夫的案子至少在一个小时后才会被审理；所以她不动感情地听着《猎爱的人》的律师，干净利落声名显赫的路易斯·奈泽站在发言台后，声明对该电影的起诉是严重的误判——全国的社论主笔已经再三地表达此观点。电影中并没有露骨的色情镜头，所以，就因为放映它而逮捕和判罚佐治亚州剧院经理，这件事震惊了好莱坞、媒体和大部分法律界人士。但是由于最高法院在五比四投票通过的米勒意见书中，确定了“社区标准”的规定，甚至一部有思想深度，只有那么一点色情的电影，也可能被小地方的一小派假正经的公民起诉——就像在奥尔巴尼发生的那样，而佐治亚州最高法院之后维持了原判，该州限制成年人之间两厢情愿的性表达比限制居民兽奸农场动物还要严格。

但是，正如奈泽在最高法院法官席前以戏剧性的方式强调的，《猎爱的人》不是一部性露骨的电影，并不显然冒犯他人，并不激起性欲，它也没有拍摄演员们生殖器的接触。相反，这是一部严肃精妙的作品，在任何美国社区都应该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全国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奥斯卡奖得主迈克·尼科尔斯的一项艺术成就。奈泽继续赞美这部电影的时候，弗朗西丝·哈姆林向屋子四周看，看人群中有没有好莱坞明星，例如影片主角杰克·尼科尔森和安——玛格丽特。但她谁也没认出来；因为只有律师可以在最高法院发言，演员没有必要到场。她倒是在人群中认出了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蒂；也注意到瓦伦蒂弄到前排一个座位。

奈泽继续说下去，偶尔暂停，回答一个法官简短的问题，这当间，弗朗西丝看了看她正在专心致志听审的金发女儿，她是圣地亚哥州一名大二学生。黛博拉·哈姆林是弗朗西丝第二次婚姻中生的第二个孩子，现在正在学习成为一名护士。挨着黛博拉，坐着一个黑眼睛的19岁女孩——从本宁顿学院辍了学的朱迪·弗莱什曼，哈姆林出版公司的律师斯坦利·弗莱什曼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坐在律师席上的弗莱什曼，此前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六次以上；正是他在“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中采取了正确的法律策略，该案涉及便衣警探在时报广场买下的两本哈姆林的平装小说。

54岁的斯坦利·弗莱什曼是业内公认的才华横溢、脸皮颇厚的律师，因为他坚定地为美国的色情狂和浪荡子辩护。二十多年来，在数不清的法庭为淫秽案辩护之后——他的委托人包括放映《深喉》的电影院老板、亨利·米勒小说的出版商、黛安娜·韦伯照片的出版者，还有砂岩隐居

地的主人，弗莱什曼很自豪，因为经由他的辩护，没有一个被告在监狱里受过苦。

约翰·威廉森1970年将他的裸体主义庄园开放给俱乐部会员之后，砂岩被洛杉矶郡官员和一个公民组织起诉，检察官控诉开放砂岩违反了洛杉矶30年代制定的反裸体法令。但经过很多法律斡旋和几次审讯，弗莱什曼最终说服加州中级上诉法院该郡法令违宪——它侵犯了隐私权，侵害了砂岩成员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法律权利；砂岩于是被允许继续运行，不受进一步干涉。

弗莱什曼1965年为黛安娜·韦伯的一张裸照，还有洛杉矶出版商米尔顿·吕斯的杂志中其他加州模特的照片做过辩护，那个庭审比砂岩的更昂贵，因为政府证明，吕斯的一些杂志和淫秽读物曾被寄到过爱荷华州，坚持在那里起诉；在苏城的审判持续了三个月，听审的是个性情暴戾的法官和一个几乎完全由农妇组成的陪审团。因为审判恰巧在农忙时节，几乎所有能当陪审员的农夫都成功逃过听审之责；弗莱什曼面对的这十个女人看起来无趣至极，他只要一提到性，她们就脸红皱眉——不出所料，庭审最后，她们判吕斯犯有淫秽罪。但是弗莱什曼马上将案子上诉到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成功推翻原判。

暂时的挫折吓不倒斯坦利·弗莱什曼。虽然他身材瘦小，从小就被骨髓灰质炎蹂躏折磨，但他行动果决，在支架和拐杖的帮助下走进全国的法庭，战胜了只有他自己拒绝承认的残疾。他1920年出生于纽约下东区，父母是俄裔犹太人，他妈妈数年来用一辆大号的婴儿车推他在街坊走动。5岁时，他在皇后区的一所残疾儿童之家注册，他父母搬到了那里，这样就能方便地定期看望他。在残疾儿童之家，尽管全身绑着石膏绷带局促受限，他学着靠拐杖站立和行走。他和其他40个残疾儿童在这家机构里待了近十年，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级中学教育。

14岁时，父母将他转到皇后区一家公立高中，在那儿他第一次接触到身体没有残疾的同学，这加剧了他被孤立的感觉；他每天都遇到年轻的姑娘，怯怯地爱慕着她们健康且含苞待放的身体，晚上他在绚丽的幻想情景中头晕目眩。但是只有和母亲在一起时，他才最为安适轻松，她一直都爱他保护他，虽然有时候有些专横。他父亲是一个谦逊的人，每天在纽约《每日新闻》的排字房里工作很长时间，在家里从不强势。对斯坦利青少年时期举足轻重的唯一一个男性，是纽约大学一名叫伯纳德·休伊特的学生，他30年代开始与斯坦利的姐姐弗洛伦丝约会，最终喜结连理。休伊特扮演兄长的角色，常常替斯坦利从他母亲那儿争取独立；斯坦利18岁时，休伊特说服弗莱什曼夫人送儿子去离家远的大学，让他能远离她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担忧，尽己所能地进步；斯坦利赞同这个建议，说他想去佐治亚大学。

他知道佐治亚州是因为他的偶像，也是小儿麻痹症患者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经去过该州沃姆斯普林斯，在那里曼妙绝伦的泉水中游泳休憩。虽然弗莱什曼不知道沃姆斯普林斯的养生温泉离雅典市的校园有多

远，在他的想象里那一定是够近，让他能时时拜访总统；带着这种鲜活生动的想象，斯坦利·弗莱什曼于1939年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蹒跚登上火车，伴着夜晚铁轨的哐哐声，开始驶向南方的漫长旅行。

之后那天，他在火车上遇到一群喜好社交的士兵，他们教他掷双骰赌博，他加入游戏后这些士兵从他那儿赢了72美元，那正是他口袋里带着的所有现金。幸运的是，火车抵达雅典车站后，大学校车正等在那儿接他到校园；但到学校后他才发现，他过于高估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像他熟悉的北方建筑，佐治亚宏伟的教学大楼没有扶手，他要花数个小时才能走上走下那些台阶。他宿舍的浴室里也没有扶手，在学校的头三周他晕头转向，虽然一些友善但令人尴尬的学生帮助了他，但他仍旧花了三个星期才整理好行李，并用了更长时间才学会在浴室滑溜溜的地砖上保持平衡。

不过，一年之内，他的信心就开始增强了，有一种从母亲支配性的保护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虽然成绩平平，还是顺利通过了所有课程。晚上在宿舍里，他喜欢和其他新生一起闲聊讨论，南方人和北方人对政治、政府和生活不同的态度尤其让他印象深刻。在佐治亚州第一年的后半年，他准备好了横穿半个州，去沃姆斯普林斯“朝圣”，觉得那位伟大的民主党人一旦得知一个崇拜他的残疾学生登门拜访，定会亲切地打开大门。但是到了温泉疗养院的大门——那儿的样子，让他想起讲南方农场的书中的图片，魁梧的黑人管理员温和但坚定地告诉他，“门诊病人”不能进入疗养院。当弗莱什曼问起总统的去向，说他想要亲自见总统时，他被告知罗斯福先生在华盛顿。运用日后使他成为出色律师的口才，弗莱什曼说服看门人让他至少到院子里看看，解释说 he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只希望能拜访总统著名的小白宫。最终他们同意，领他草草参观了一下并吃了午餐——之后就让他搭乘下一班火车，回到佐治亚校园。

斯坦利·弗莱什曼在校外的一家妓院倒是受到了更热情周到的接待，那家叫“爱妃”的妓院，是市民和一些在校男生常常光顾的场所。在那儿弗莱什曼第一次性交，极乐的感觉让他在离开妓院时决定还要再来，他也这么做了。大二那一年，他变得足够有信心去接近女同学，邀她们出去约会；尽管她们似乎挺喜欢和他一起看电影和去当地酒馆，夜晚却总是就这么结束了，女孩子们的贞洁安然无恙。

快上大三时，弗莱什曼决心投身法律事业，想象自己成为睿智的律师和机灵的辩论家，想象自己职业上的成就不会受到支架和拐杖的限制，虽然它们是他永远的负担。1941年夏天，他拿到经济资助去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决定回到老家纽约，不再待在南方。但回去后他住在晨边高地 [149] 的学生公寓里，仍旧独立于他的家庭。

但是，在194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作为查验遗嘱和处理劳工纠纷的法律助理工作两年后——再加上当出租车和公交车突然转向，擦到他的身体常常使他失去平衡在纽约冬天结冰的路上跌倒，弗莱

什曼决定，最好去个有宜人的热带气候和一排排棕榈树的城市。他1946年出发去洛杉矶，一年后通过加州律师资格考试，从始至终从没后悔过搬到西海岸——尽管1948年他坐在一辆同事开的车里遇到车祸，身体受到重创，住了九个月的院。

他躺在病床上实践法律，起诉了司机，获得了1万美元损害赔偿。弗莱什曼也和医院的营养学家成了朋友，1949年他们结了婚。当医院拒绝付她额外一周的薪水，而她坚称这薪水早就该给她时，弗莱什曼起诉了医院——最终他们连本带息拿到了这笔钱。

50年代初，弗莱什曼在洛杉矶开始小有名气，那个时期，好莱坞正在清除电影从业者中有名气的共产党员。虽然弗莱什曼的委托人中没有什么好莱坞黑名单中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却因为不遗余力地为很多涉及“危险分子”的复杂难辨的案子辩护而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和景仰。有一名被告是编剧和教师，他因为同情共产党而被逮捕，被不定期刑拘在洛杉矶监狱，还不许保释，不管弗莱什曼如何愤慨地向法官抗议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弗莱什曼在报纸上读到，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抵达了他所统辖的西部司法区，在旧金山参加第九巡回法院联邦法官的一个会议；尽管弗莱什曼并没有和道格拉斯法官预约见面，也不确定私下接近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全然合宜，但弗莱什曼还是迅速离开办公室去了机场，乘飞机到旧金山，打出租车去会议地点，在走廊里等了数个小时，直到他递给道格拉斯会议室里的口信收到回复——结果是道格拉斯建议保释和召开听证会，最终弗莱什曼的委托人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50年代后期，色情产品经销商逐渐取代共产主义者成为众矢之的，弗莱什曼有时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免费为淫秽案辩护，当时这一法律立场在大多数法官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大部分经销商对此也一知半解，很少有人听说过第一修正案，像年轻的弗莱什曼那样对宪法权利有崇高幻想的人就更少了。虽然色情产品经销商畏惧和憎恨监禁，但他们像大部分赌徒一样静静地屈从了坏运气，因为他们生活中最首要的热情其实是赚钱，与文学自由甚至性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避免牢狱之灾的务实手段，就是贿赂警察或者不断改变商业地址来规避法律。

但是弗莱什曼改变了经销商的想法——不是靠给他们讲解法律，虽然这样的事他也做了不少，而是用他在法庭上的成就，来证明淫秽法案是可变通、可屈服、可塑的，能够允许更大的自由。和英国作家肯尼斯·泰南 [150] 一样，弗莱什曼认为色情作品对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像泰南写的那样，它“缓解了孤独感”，还给那些“性方面只能独自满足”的人，或因各种原因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多种多样的性的人，提供了“释放的幻觉”。因为弗莱什曼自大学时代起就看色情作品，喜欢看到照片上漂亮的身体尽享他所认同的自由，于是在每个他辩护的淫秽案里，他自己都像某种代理被告似的；只要是涉及性和检查制度的案子，对他来说就没有微不足道的。

在洛杉矶，他成功为一家袒胸酒馆的老板辩护；还有一个卖印有玛

丽莲·梦露裸体照茶杯垫的邮购商人；还有贝弗利山一家商店的老板，他在橱窗里展示裸体塑像，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的复制品。弗莱什曼主要的胜利，包括最高法院的“史密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在该案里他为自己的委托人——一位叫埃利埃泽·史密斯的书店老板，因为在他的书架上有一本淫书《比生活更甜美》而被捕——辩护，说他不应该负有责任，除非警方可以证明史密斯知道这本书是淫秽的。在另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决——“一些书诉堪萨斯州案”——中，弗莱什曼使得法官严格限制反堕落小队突袭查抄仓库和书店时可以使用的调查没收手段。弗莱什曼也到其他州——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夏威夷，为桑福德·阿达伊出版《一个警察的性生活》的权利辩护；刚飞过一片暴风雪抵达芝加哥，在旅伴的帮助下走下飞机溜滑的舷梯，弗莱什曼就走进法庭，为一位因销售一本叫《异域历险》的杂志而被捕的烟草店主辩护。弗莱什曼坚持，对性的描述和讨论，有权与对宗教和政治的描述讨论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他对陪审团说：“所有镇压的根基是对非正统的恐惧——不管这种非正统是在宗教、政治还是道德中，这种恐惧在我们的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他又补充道：“只有畏惧性爱的人才会认为《异域历险》是危险的。对性有健康态度的人，根据他们品味的不同，会觉得它要么无聊要么有趣。但他们都会摒弃这种荒谬的想法，即这本杂志会腐化一般人的心灵。”

仔细讨论了六个小时后，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

尽管斯坦利·弗莱什曼此前赢了所有涉及威廉·哈姆林的案子，他在1974年4月中旬这趟去华盛顿为插图报告辩护的旅行中却充满了深切的忧虑，因为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如果像一年前的米勒案那样投票的话，这必然会让他的委托人进监狱。虽然弗莱什曼相当有信心他今天在法庭上的立场会得到道格拉斯、布伦南、斯图尔特和马歇尔法官的支持——四人在米勒案中也站在米勒那一边，但他也知道其他五个人会是个麻烦，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厌恶不仅在之前的投票记录中如日昭昭，也在尼娜·托滕伯格这样的华盛顿记者写的报纸文章中进一步被强调，而她明显在最高法院内部有密切的线人。托滕伯格小姐描述法官们在放映室里看完色情影片后如何反应，她写到鲍威尔法官似乎非常尴尬，布莱克门法官几乎要患上“紧张性神经症”，而怀特法官变得焦躁不安，称这样的电影纯属“污秽”。尽管法院里职分较低的威廉·H.伦奎斯特法官，在《纽约时报》中又一次被描述成是躲躲闪闪的“观望的女孩子”，但人们知道，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一样对色情作品充满反感，而伯格常常会抵制这种放映。

道格拉斯法官大部分时间也缺席，但和伯格的原因不同——他将第一修正案解读为不管荧幕上放的是什么都不允许审查性作品，于是就觉得，没什么正当理由在繁忙的工作日花时间坐在黑屋子里，观看据称是最新的X级丑闻电影。布伦南法官，一个上了年纪的天主教徒，曾经反对色情作品，但最近几年似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了——因此

他经常顺着道格拉斯投票，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许可它们。据尼娜·托滕伯格说，唯一一个似乎觉得这类电影很有趣的法官是瑟古德·马歇尔，书记员无意中听到他在放映室里大笑，偶尔还向演员说鼓励的话。波特·斯图尔特法官，法院里第四个通常反对性审查制度的成员，十年前在他的雅各布斯意见书中写到，淫秽确实是很难去定义的，但是“我看到它就会知道”——日后媒体人私下把这一评论叫作“斯图尔特的卡萨布兰卡标准”，即如果斯图尔特法官在性电影中看到的，比不上他战争年代当海军时在淫荡的卡萨布兰卡港口看到的，那这就不叫淫秽。

弗莱什曼坐在律师席上，知道自己不一会儿就要向最高法院陈词，感到升腾起来的焦虑，也有一点恼怒——后者部分是因为，此前一个小时他不得不坐着听路易斯·奈泽律师为《猎爱的人》做的辩护。为了替他的委托人恳求无罪判决，奈泽过度强调迈克·尼科尔斯电影的艺术价值，将之与通常在四十二街放映的X级电影区分开来，这样就不必要地伤害了哈姆林——但弗莱什曼知道，如果像《深喉》这类电影的导演没有自由的话，像尼科尔斯这样的好莱坞导演也永远不会享有完全的职业自由。

但弗莱什曼试图抑制自己的愤恨，集中注意力于他将要为哈姆林做的辩护上。他今天的主要论点是哈姆林不公正地陷于一个法律过渡期，他1972年被一个圣地亚哥法官判长期监禁和繁重罚款，该法官引导陪审团应用“国家”标准而非“社区”标准来决定哈姆林的插图册是否可以在社会上被接受。在加州的庭审上，弗莱什曼更希望哈姆林能同时以社区标准和国家标准被审判，因为这样，弗莱什曼就可以将一个在城市范围内做的调查，作为相关证据提出，该调查显示圣地亚哥社区在性方面比起“全国”更为放任，他也本可以向陪审团呈递很多圣地亚哥有名望的市民为哈姆林做的辩护。但是弗莱什曼这方面的努力被法庭认为无关而被驳回，就在政府以国家标准定罪处罚哈姆林后，最高法院在米勒判决中释法，认为在所有淫秽案中，应该应用社区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这促使弗莱什曼请求以社区标准在圣地亚哥重新审判哈姆林案。但是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辩护，仍旧判哈姆林监禁和罚款。所以现在，1974年华盛顿早春的一天，弗莱什曼唯一的希望，不管有多么渺远，就是九个最高法院法官中至少有五个能够否决下级法院的判决，相信这是不公正的：只因为一个人寄亮面纸印刷的小册子赞扬插图版报告，批评尼克松总统否认委员会的结论，摘选一些表现裸体的人们性交的彩照，就让他陷于四年牢狱之灾和8.7万美元巨额罚款。

当然，这些照片，和每个法官今天听审之前在私人办公室里检查这些照片时的反应，基本上会决定哈姆林的未来——弗莱什曼知道，这就是为何淫秽案的判决结果常常如此难以预料：这些裁决如此主观，基于情感，取决于个人。第一修正案辩护律师之间流传着一句老话：不管什么，只要能让法官勃起的就是“淫秽”。弗莱什曼相信，对很多公诉人、审查人、陪审员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人可能某天晚上在美国退伍军人协

会大厅很享受一场色情电影，然后第二天作为陪审员投票认为电影制作人有罪。极端自由主义的公民赞同让已定罪的杀人犯重返社会，反对给予毒品走私犯严厉的刑罚，在数不胜数的激进请愿书上签名，却常常会容忍甚至赞赏警察查抄“肮脏的”书店并监禁店主。“虽然左翼卫道士原则上是反对检查制度的，”阿兰·罗伯——格里耶 [151] 写道，“他们也有原则，即从过去继承的道德价值，他们不久就会发现，自己站在审查者一边来反对色情作家。”或者，如同格申·莱格曼 [152] 对美国伦理做的评论：“谋杀是罪。描写谋杀不是。性不是罪。但是描写它是。”

当然问题的一部分是，像弗莱什曼知晓的那样，像泰南写的那样，色情作品是“意图中的高潮”——它最基本的目的之一是让男人勃起，以便他们自慰；因此如果不为自慰辩护就很难为色情作品辩护，而这一点，莎士比亚说过，难就难在在很多人的想法里，自慰仍旧是一种没有男子气概的行为，一种有错的享乐，承认向女人求爱失败，而女人也许比在卧室的枕头上统治了十分钟的书中公主要好。教会谴责它是浪费精子，已婚夫妇谴责它是性方面的自私自利；描写它的书很少被认为是文学，虽然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 [153] 有次承认，他看不出“为何文学不应把激发情欲作为它的意图之一”。但是淫荡文学和它的高潮，从没有被第一修正案的释法者容忍为适宜的自由表达，这部分是因为最高法院从18世纪起主要是由年长者组成的，他们经由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才得以升迁，私人生活里他们也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一种近乎神话的道德标准。除了道格拉斯法官没人离过婚；除了几十年前一位法官——据传说在一名未婚女子的床上有一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甚至没有传言有其他法官有过情妇。

不知色情作品中内含的催情元素是否曾影响过某个法官克制的习惯或私下的举止，反正没人在去世后发表的日记或回忆录里承认过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大楼里的淫秽案审讯中，法官的举止是全然冷静超脱的，所有对性的提及都隐藏在婉语和艰涩的法律术语中，甚至 当他们审理的材料充满了下流和淫诱、纨绔子弟和被玷污的女佣、放浪的马戏团里柔软的女人和健壮的男人汗流浹背地在一起摇荡等，或者，像哈姆林的小册子那样——它被政府作为证据呈递，弗莱什曼也将要为之辩护，里面不害臊地展示了性交、自慰和鸡奸的人，哪怕面对这样的材料，法官们超脱依旧。

首席法官沃伦·伯格以洪亮的声调向法庭宣布：“我们下面将审理编号73505-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伯格坐在他的黑色高背法官椅上向律师点头示意，继续说：“弗莱什曼先生，您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弗莱什曼从律师席起身，在两拐之间转动他高五英尺的身体，以胳膊的力量向发言台移动。起初他看起来几乎像侏儒一样，瘦小的身体穿着订做的黑西装，在法官席前缓慢地、噤噤作响地、步履沉重地前进。

但当他在发言台停住，转向法官，把他橡胶头的拐杖杵进地上一个牢固的点后，他身上似乎突然没有了任何脆弱的迹象。他的双肩宽大坚实。他的头高高昂起，头上是浓密卷曲的黑发。下颌锋锐、鼻子高挺、眼睛深邃尖锐，他的脸像雕像一般，坚实而棱角分明，当他独自站在法庭前面，他的存在似乎是一件未完工的杰作：一个英雄的头颅和尚由支架撑着的躯干。当他开始陈词，他的声音在宽阔的房间里振荡回响，直抵最远的听众席。和很多在最高法院辩护的律师不同，弗莱什曼似乎毫不畏惧，要不是态度敬重正式，他举止中流露出的东西近乎傲慢自大。他是辩护律师，但绝对不是处于守势。

“首席法官先生，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始说，“由于邮寄一份于任何人无害的小册子，哈姆林先生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加上8.7万美元（罚款）。这份小册子为一本充满了质朴严肃的政治价值的书做宣传。这本书是一份插图版的政府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在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里，反淫秽法案应该允许有意愿的成年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以决定是否接触露骨地展露性爱的材料……”

首席法官伯格俯身向前问道：“弗莱什曼先生，最初的报告是否有插图？”

“不，先生，没有插图。”弗莱什曼回答。但他马上补充道，当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审时，两名前总统委员会成员作证说，哈姆林的插图版报告比最初的报告“更有价值”，因为里面的图片为读者阐明了，哪一类性方面的材料是委员会关注的，这是成立总统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的动因。

伦奎斯特法官问：“原陪审团是否有理由像对其他证人一样不信任这些证人？”

“尊敬的法官，我认为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弗莱什曼说，“为委员会报告工作了两年委员，应有比不在行的陪审团更好的见解。”

“但是，”伦奎斯特坚持说，“陪审团确实会因种种原因不信任专家，不是吗？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必须相信。”

“是的，先生。”弗莱什曼急忙同意，不想在这个拐弯抹角的点上继续辩论下去；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来做辩护，其中一部分时间他的同事山姆·罗森韦恩律师还要为哈姆林的三个协助出版插图书和小册子的员工辩护。而且，甚至在今天庭审开始前，弗莱什曼就已经不对伦奎斯特的投票抱有希望了，知道他和伯格和布莱克门一样反对色情作品。取而代之，弗莱什曼决定将大部分辩护词指向怀特和鲍威尔法官，希望其中一个会和四位自由派法官一起，投票推翻原判。虽然怀特和鲍威尔基本上不以自由派的观点来解读第一修正案，但他们此前的表现似乎不像伦奎斯特、布莱克门和伯格那么偏执、那么容易预测；他们甚至也许会从弗莱什曼的辩护中发现可取之处，即他的委托人陷于一个“过渡期”、一个

宪法上的“无人之地”——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到不当处罚，该法院裁决所建基的法律逻辑，正是被现在弗莱什曼面前的这些最高法院法官，于1973年宣布为不合理。

弗莱什曼继续向法官阐述（提及1973年的米勒判决）：“本法庭曾经宣布没有所谓的国家标准——它们是不可确知、不可证明、不切实际的，是抽象的。本法庭曾经表明，陪审团试图在国家标准框架下解决淫秽案问题的举措是徒劳的。因此，”弗莱什曼继续说，提高了声调：“上诉人（哈姆林等人）被定罪的标准，在本法庭的框架里是全然不存在的。”

弗莱什曼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社区标准目前在淫秽案里适用，他的委托人应该得到比在圣地亚哥更好的审判，那里的法官阻挠了辩方所有试图提交与社区性标准相关证据的努力。“例如，我们曾经传唤一名证人，她在圣地亚哥地区就此案涉及的小册子做了问卷调查，”弗莱什曼回忆道，“在科学的基础上，她询问了718名公民对小册子的看法。记录显示，绝大多数人实质上认为，该册子应该被允许在一般美国人之间流传。但是这份证据被排除在外，仅仅因为法庭认为，唯一适用的是国家标准而非当地标准。因此，如果我们再一次遵循政府的建议，使用当地标准的话，很明显该案的判决应该被逆转……”

威廉·哈姆林坐在拥挤的屋子里，周围的人都没认出来他就是本案幕后主人公，他不时点头同意他的律师提出的论点。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她看着远处法官们的脸，寻找他们对弗莱什曼的话作何反应的迹象。她的女儿黛博拉看起来很紧张，黛博拉另一边坐着弗莱什曼19岁的女儿朱迪，看起来很冷静。朱迪·弗莱什曼此前和父亲一起去过法庭，她有信心此案和其他案子一样会获得有利判决。

斯坦利·弗莱什曼陈词时，最高法院的法警在过道上来来回回地走，观察着听众，确保没人使用录音机或照相机甚至记笔记；耳语也是禁止的，盘腿坐或胳膊放在椅背上休息也是不允许的。突然一个法警在哈姆林座位旁边的过道上停住了，冷峻地盯着朱迪·弗莱什曼，摇了摇手指。朱迪被抓到在嚼口香糖。她尽量若无其事地把口香糖吐在一张纸巾上包好，放进裙子的口袋里。

当她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到发言台时，看见父亲已经暂时把位置让给了同事山姆·罗森韦恩律师，一个快要70岁的谢顶灰发男人，他向法官们阐释说：“我所关注的是‘明知’的问题，即有罪的知悉，以及宪法所允许的起诉需要满足哪些主观条件……”停顿了一下，罗森韦恩继续说：“回应我们索要详情说明的动议，（控方）主张，他们并未宣称这些被告事实上知悉涉案材料是淫秽的——他们所宣称的仅仅是，被告知悉小册子的内容，而这已足够满足对‘明知’的要求。”

“罗森韦恩先生，你是否暗示，”首席法官伯格问道：“在陈列或散发材料之前，该材料的负责人必须知晓这些材料是淫秽的，这样才能够立

案？”

罗森韦恩回答：“我的论点仅仅是：控方的举证必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曾知晓 材料的内容，且带着诉诸淫邪兴趣的特定意图来散发此材料。我认为淫秽案的控方需要负有这样的举证责任……”

近旁，坐在政府席位上听着的是哈姆林的指控方——大胡子的耶鲁大学年轻毕业生艾伦·塔特尔，他在副检察长办公室任职。今天早些时候，他把自己的黑胡子修剪到法庭可以接受的长度，私下彩排了很多次他现在随时就要展开的辩论，塔特尔感觉自己在个人和专业方面都做好了准备；遵循所有联邦政府律师在最高法院出庭时的传统，塔特尔身着正装礼服，一件黑色的燕尾服外套、灰色条纹裤、黑色背心、白衬衣和银色丝绸领带。尽管他自己不厌恶性露骨的图片，在最喜欢的华盛顿理发店里也大大方方地浏览《阁楼》，但塔特尔相信，哈姆林的小册子过分生动了，在法律上是淫秽的。要是哈姆林能印上总统报告的一些文字片段，那这本小册子还称得上是有那么一点严肃的意图；虽然斯坦利·弗莱什曼对塔特尔即将阐述的观点的驳斥，是今天口头辩论阶段的结语，塔特尔想不到弗莱什曼能为小册子里这样的图片辩护什么：裸体的戈黛娃夫人 [154] 含着她骑的马的生殖器。

罗森韦恩坐下后，首席法官伯格终于向艾伦·塔特尔点头示意，塔特尔一刻不耽误，马上开始质疑小册子的价值。“首席法官先生，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始说，“我请求最高法院仔细考量涉案的材料。这本小册子只有一页：一边是插图版报告的封面照片和一张礼品券，指明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另一边则完全是一组展示各种性爱场面的照片。在任何 定义之下，在任何 社区标准之下，这都毫无疑问是露骨的色情产品。”

“上诉人却声称应该撤销对他们的定罪，”塔特尔继续说，“他们辩称，米勒判决告诉我们，联邦对于淫秽的标准含糊不清、不合宪法，至少在米勒判决之前是这样……但是我对米勒判决的解读是，最高法院认为，在罗思判决中对于淫秽的定义——例如要求‘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在宪法上是不必要的，而且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很难证明的；最高法院制定了新的规则。但是我不认为，当最高法院决定米勒判决是未来审理淫秽案的标准时，它的意思是所有之前应用了罗思案之定义的判决就都是违宪的，或以违宪的方式判决的，或这些判决所基于的规则就使这些判决无效了……”

“那么那些案例的意思是，”波特·斯图尔特法官打断说：“标准需要非常 具体，才不会在宪法上被认为有缺陷。”

“是的，法官先生，我也正要表达此点……米勒判决要求，判断淫秽的标准被限制为：可适用的州法律中对性行为的具体描述……而且它表明，如果对联联邦标准的清晰性有严重的怀疑，我们需准备好将这些标准理解为露骨的性行为。而且事实上……”

“但是已经定罪之后就难以探讨这些标准了，不是吗？”斯图尔特法官说。

塔特尔和斯图尔特继续辩论下去；然后塔特尔不被打断地说了几分钟，直到斯图尔特法官再次开始问问题，大部分讨论的是，各种各样的社区如何能够公正地解读和实施哈姆林身陷其中的联邦邮政法规。“米勒案应对的是一项州法律，”斯图尔特提醒塔特尔：“在一州之外并不可适用。但是此案中（哈姆林案）我们应对的是一部联邦法律（考姆斯托克法）。”然后斯图尔特补充到，现在这部古旧的联邦邮政法在全国已有数不胜数的地方释义。斯图尔特提出，这就好像：“副检察长办公室里的某人告诉我们，国内税收法规在全国很多地方有了不同的含义。”

但是，塔特尔回答：“最高法院在一个仅涉及州法律的案子（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里回到临时性的社区标准，是因为它发现，陪审团表述和理解国家标准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试图裁断联邦淫秽案起诉的陪审团，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第一修正案和国家标准无关吗？”道格拉斯法官问。

“当然有关，”塔特尔说：“最高法院在分析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国家标准的要求。（关于考姆斯托克联邦邮政限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不认为国会考虑的是所谓地区标准或国家标准——他们考虑的是陪审员会认为是淫秽的材料——而这再一次是米勒案告诉我们的。”

“我设想这是真的，”首席法官伯格用心良苦地补充道：“在肯塔基州经营没有执照的电影剧照生意，比起在其他州经营，也许会从陪审团那里得到不同的回应，因为在其他州这并非是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事。但是法规准则还是同一个准则，对不对？”

“是的，”塔特尔回答，“对于很多罪行都是如此，事实上我要说在大部分情况下，犯罪是……”

“但是，”瑟古德·马歇尔法官说：“你能说在纽约州一张电影剧照不是一张电影剧照吗？”这个问题令塔特尔很困惑。“它是或者不是一张剧照！”马歇尔不耐烦地叫出来，让塔特尔大吃一惊。“它在纽约州和在肯塔基州一样是同一张剧照！”

“我非常同意，马歇尔法官先生，”塔特尔说，“这也是为何我说在那些情况下……”

“但是，”马歇尔继续说，“你能在肯塔基州有《猎爱的人》的剧照，却不能在纽约州有……”

“《猎爱的人》也许超越了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有关坦率的边界，”塔特尔说：“而且《猎爱的人》也许事实上是在勾起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一般人淫邪的兴趣，但是如何评判仍旧是最高法院的权力……”

“塔特尔先生，”马歇尔打断他，说得温和了些：“我唯一的异议是：你在推断米勒判决改变了（考姆斯托克）法规的决定。”

“我并不认为米勒判决仅仅是，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一项决议。”

“那么我来问问你——米勒判决对这项法规的影响是什么呢？”

“米勒判决仅仅涉及淫秽材料……”

“没错。”马歇尔说。

“最高法院自罗思判决起就尝试确定‘淫秽材料’的意涵，”塔特尔继续说，“在每一个判例中，最高法院制定的规则都有些许不同。今日所陈述的米勒判决在社区标准问题上的意见，是该标准必须是当代论坛社区的标准。”

“你能否劝告一名被告是否该当服罪？”道格拉斯法官问，补充道，“……（法规准则）是否足够明确，还是过于隐晦使得我们只能臆测？”

“我认为，”塔特尔回答说，“这是很明显的，法官先生，对淫秽的定义并不像关于其他罪行的法规那么清晰明确……”

“在这项联邦法规下，”道格拉斯推理道，“……从纽约州邮寄材料可以是无罪的，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接收和销售这些材料可以是一项罪行——对吗？”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塔特尔说：“我们可以推测这样的情形。但同时，在材料被散发、罪行被犯下的地点下达有罪判决也是有可能的。”

“塔特尔先生，”首席法官伯格补充道，似乎想要帮助澄清反淫秽法案变幻莫测的性质，如果不是为这种性质辩护的话，“最高法院在过去15年间对淫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定义——改变这些定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吗？……从罗思判决到雅各布斯判决到其他判决一路走来，这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塔特尔同意，“来尝试制定可操作的准则……”

“塔特尔先生，”拜伦·怀特法官问，“你指出在米勒判决之前，有第三条评价准则，即材料需要‘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你所凭借的是哪些判例？”

“我凭借的是‘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

“该评价准则在此案中获得几票？”

“获得了三票。”

“那么，在哪个判例中它获得了五票？”

“.....很抱歉，”塔特尔纠正自己，“正是在‘回忆录案’中它获得了五票。”

怀特法官微微皱起眉头，似乎塔特尔的回答惹恼了他。虽然60年代中期，确实有五名法官在“回忆录案”中允许描写芬妮·希尔的小说合法化，但当时确实也只有三名法官，同意那份观点不统一的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特定语言——甚至在八年以后的今天，怀特法官（之前是反对这本书的）似乎仍旧对那次的结果耿耿于怀；他以清晰硬冷的语调提醒塔特尔，“回忆录案”“并没有获得五票”。

“我认为它获得了五票的原因是，”塔特尔执意解释道，怀特的嘴唇绷紧了，“有两名 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在任何 情况下这本书都应受宪法保护，有三名 法官认为，除非能证明这本书‘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否则它应该受到宪法保护.....”

“但是事实仍旧是，”怀特说，俯视着塔特尔，“从来没有 一个时刻有五名最高法院法官同意那条评价准则。”塔特尔沉默的时候，斯坦利·弗莱什曼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怀特法官展现出来的冷酷性格。此前弗莱什曼认为，自己颇有机会使怀特转而支持哈姆林，但是现在他看出来，唯一的希望只在刘易斯·鲍威尔法官身上了，那个坐在最左边的瘦削、安静的弗吉尼亚州人，正用细长的手指轻抚自己苍白的尖下巴。这时，雄辩的艾伦·塔特尔机智地结束了和怀特的争论，承认怀特对“回忆录案”的记忆很准确，然后继续他准备好的演说，迅速忽略了威廉·布伦南法官打断他的努力。

“请暂停一下，塔特尔先生，”布伦南法官终于说。塔特尔转向这位阴沉着脸的70多岁的老人，正是他起草了广受争议而现在行将消亡的“回忆录案”意见书。塔特尔听到布伦南问，“是否所有这些讨论暗示着，也许甚至米勒判决，也没法给这个非常麻烦的领域下定论？”

“米勒判决给我们.....”

“那不是 我的问题，”布伦南插进来，“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米勒判决必然是这个领域的定论？”

“米勒判决当然不是它的定论，”塔特尔说，“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带着一些问题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问题和米勒判决的应用有关。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质疑米勒判决中所表述的判断淫秽的标准，而仅仅是试图决定，在此种定义之下，一个米勒案之前的判决是否能被维持。”塔特尔停下来等一些回应；由于没有回应，他继续说下去：“现在我们不相信，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包含着的地方标准的批评，必然会使所有在米勒案之前的联邦淫秽案起诉无效。而且我们不认

为最高法院有这样的想法。首先，自米勒判决起，有大量的案子被依照米勒判决发回上诉法院重审。这些都是联邦案例，陪审团被要求使用国家标准，就像（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审时的）陪审团一样。而且我们相信，如果米勒判决之前的案子，因为使用国家标准而令法规准则含糊不清、不符合宪法要求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推翻原判，而非发回重审……”

看到发言台上的小灯开始闪烁，提示他时间快要到了，塔特尔做结语时提高了声调：“……如果人们质疑被告在国家标准之下被错误地审判了，我们会说这是一种无害的错误，因为（哈姆林的）材料在任何标准之下都是淫秽的，上诉人的出版物超越了任何社区的底线。”停顿了一下，他说：“非常感谢。”然后落座。

首席法官伯格点点头，然后面向右边说：“弗莱什曼先生。”

弗莱什曼很明显被塔特尔的结语激怒了，他一到达发言台就开始咄咄逼人地驳斥政府公诉人的论点。

“首席法官，”弗莱什曼开始说，“……这份材料完全不是淫秽的！它在国家标准下不是淫秽的。在地方标准下也不是。……公诉人说它在任何标准下都是淫秽的。我要提醒法庭一部电影《深喉》，它曾经被认为在任何标准下都是淫秽的，却不断被全国的地方陪审团认为不是淫秽的。”

政府对哈姆林的起诉，弗莱什曼继续说，是任意构想的、含糊定义的，在法律上充满缺陷。这份起诉以考姆斯托克式的语词为特点，例如“淫荡”“猥亵”“下流”“污秽”和“龌龊”，但是它却不能证实哈姆林本人犯下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侵害公共道德的罪行。“看看这份起诉状——有明确性可言吗？”他申诉道。“没有，”他回答：“它一点也不明确……起草这份起诉状时法律对淫秽的定义是什么呢？怀特法官提出‘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定义的一部分。就当前的意图而言，我不在意它是否是定义的一部分。我不在意它是地方标准还是国家标准。我不在意你是以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完全没有标准来判定什么是淫邪的兴趣。我只是要说，如果你有一项如此悬而未决的法规，那么绝对不能再降低的最低限度是，我们有权在起诉状中知道所犯下的到底是什么罪，而不是类似‘淫荡’‘猥亵’这样含糊的词，然后说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毋庸置疑一直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继续说，“我们确实有其他观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强调一些由起诉书的缺陷所带来的罪行。例如，回应我们索要详情说明的请求，我们被以法定的语言指控说涉案材料是违法的，因为它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兴趣。但是（圣地亚哥陪审团）……被告知如果材料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兴趣或者一个明确定义好的性反常人群的兴趣，他们就可以定罪。当我们向上诉法院申诉时，上诉法官赞同，应该仅仅根据一般人标准来衡量，但认为这是一个无害的错误……”

“关于勾引的问题也是这样，”弗莱什曼继续说：“起诉书上并没有提到勾引，详情说明里也没有——但是 陪审团却被指导说，他们可以基于一套‘勾引’的说法来定罪，即使完全没有证据表明有勾引存在。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案例表明，一份广告能够‘勾引’起人们对它本身的兴趣……”

“金兹伯格案呢，弗莱什曼先生？”首席法官伯格问，“里面什么也没有表明吗？”

“并没有，”弗莱什曼说：“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对金兹伯格案的理解是，法庭认为涉案书籍是淫秽的，是因为宣传这些书籍的小册子实际上声称它们是淫秽的，因此这点就被考虑在内。但是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完全没有提出，广告可以勾起人们对它自己的兴趣。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小册子被邮寄出去，它或者是淫秽的或者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它也没有让自己去勾引……”

“弗莱什曼先生，是否有记录显示这份5.5万人的邮寄名单是如何编制出来的？”这时传来刘易斯·鲍威尔法官轻柔的泰德沃特——里士满口音，这是他今天第一次说话；弗莱什曼用拐杖将自己转向他的方向，以直接面对这位坐在最左边的询问者，这位法官可能会在这件案子里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律师用谦和的方式回答说：“尊敬的法官阁下，记录并没有显示。我们有的确切的记录是，有12个人受到了冒犯。这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有5.5万或5.8万本（小册子）被邮寄，有12个人受到了冒犯……”

“是否有记录显示这5.5万或5.8万个人曾要求邮寄这本小册子？”

“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记录，尊敬的法官阁下。”

“记录是否显示，”鲍威尔继续说，“有未成年人收到了这本小册子？”

“记录确实 显示完全没有 任何未成年人收到了它。”弗莱什曼回答，很高兴有机会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他也抓住机会补充到，哈姆林的办公室知道有12个人向邮局投诉后，马上从这名经销商的邮寄名单中删除了全部12个名字，保证投诉者日后不会再收到更多与性相关的邮件。

“我猜想，”鲍威尔法官继续轻柔地说，“没办法确定，在这5.5万个收到小册子的家庭里孩子的数量？”

“没有办法，”弗莱什曼承认，“但因为我们是 在猜想，我能这么说，尊敬的法官阁下：我知道这份名单的意旨是，邮寄给此前表露过想要接收性露骨材料的人。只有那样的邮寄名单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得寄给感兴趣的人……如果您想要售卖猫粮，就需要寄给家里养了猫的人。”

注意到鲍威尔严肃的面孔上淡得难以察觉的微笑，弗莱什曼继续说：“所以事实是，小册子被尽可能多地寄给了曾表露出想要它的成年人。现在，我不想误导法庭，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并不在记录中，但是我认为这是对谁是收件人这一问题真实正确的回答。像我说的的那样，我们有12个人受到冒犯。但是，”他总结道，“很多政治宣传小册子也会有12个人受到冒犯，尊敬的法官阁下。”

鲍威尔法官似乎对弗莱什曼的回答感到满意，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分配给辩驳的时间到了，弗莱什曼向法庭致谢，然后听到首席法官伯格宣布：“此案已被提交。”执行官敲下槌子，九名法官站起、转身，迅速消失在红色天鹅绒帷帐后面。听众们开始离席，慢慢穿过拥挤的走道向后面出口移动；但是哈姆林挤到前面律师席和弗莱什曼握手，祝贺他对案子精彩的处理，表示对结果很乐观。弗莱什曼微微笑着，但是提醒他不要过度乐观。十周后宣布的投票结果可能会很接近，弗莱什曼预测；也许会五比四，鲍威尔法官私下的沉思和变化可能会决定整个案子的结果。

1974年6月24日，斯坦利·弗莱什曼从华盛顿收到了糟糕的消息：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哈姆林输了官司。最高法院的四名自由派法官——道格拉斯、马歇尔、布伦南和斯图尔特——支持哈姆林，但是鲍威尔法官还是和其他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以及怀特法官站在同一阵营，组成了多数投票。伦奎斯特法官起草的多数派意见书，驳回了弗莱什曼为哈姆林做的所有辩护。伦奎斯特表明，政府起诉书在阐明哈姆林的罪名方面已经“足够清晰”；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中类似“淫荡”“猥褻”“下流”等词在证明定罪合理方面，并不“过于含糊”；加利福尼亚州法官在圣地亚哥对哈姆林案的审判中，应用国家标准并驳回地方证据，“在宪法上并非不正当”。尽管哈姆林也许真诚地相信，他的小册子在法律上不是淫秽的，伦奎斯特说实际上这无法为他辩护；伦奎斯特援引1896年的“罗森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案中一名叫卢·罗森的纽约出版商声称，他不知道自己期刊照片里女模特摆的造型是淫秽的，最高法院告知他，他对淫秽的认识与本案无关——他的罪名最终成立，因为他知道自己所邮寄的材料的内容。

电影《猎爱的人》被宣判无罪，相伴的意见书也是由伦奎斯特书写——“电影中偶尔有裸体镜头，”伦奎斯特写道，“但是裸体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材料在法律上是淫秽的”——但哈姆林的小册子却是，用伦奎斯特的话说：“一种露骨的色情材料，正是米勒案所描述的那类需要禁止的材料。”所以，对哈姆林的判决是不可改变的了；牢狱之灾不可避免；8.7万美元罚金必须偿付。

全国报纸的社评版上几乎没有同情哈姆林的声音，新闻专栏上也只简单报道了此事——除了CDL的《全国正派报道》，它头版刊印了伦奎斯特法官的照片和一篇吹捧他的判决的文章，大标题是“淫秽案起诉获全

系统通过”。

在弗莱什曼的请求下，一些律师、作家、出版商和编辑与哈姆林的家人一起写信给圣地亚哥的法官恳求慈悲，他现在掌控着哈姆林当前的命运；但在付给罚金后，弗莱什曼取得的唯一让步，是在终端岛 [155] 的刑期减少为不到一年，条件是哈姆林切断与色情出版业一切商务联系，并从此停止书写、编辑或散发任何和性哪怕只有一点关系的材料。哈姆林也认识到，为了不违背五年缓刑期的要求，他应该明智地避免写杂志文章或书来评论性法案的变幻莫测，或者悲叹自己的处境和刑罚——这意味着他对自己案子的观点只能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寄给朋友或律师。似乎他仍旧难以置信，在给弗莱什曼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是一名罪犯……这被决定了。九票中的一票决定了，宣传书的小册子是非法的，我的判刑就这样被确定了。无关的想法，它的混乱体现出它受到的重创：小册子邮寄时布莱克法官还在最高法院……这一票可能会是不同的，我就不会是一名罪犯……但是布莱克法官现在不在（被鲍威尔法官取代），因此我成了罪犯，要陷入囚犯生活和囚犯头衔的灵泊。一个人要如何适应这一点？个人喜好和法律歧义可能使正义的天平以五比四向任何方向摇摆……像黄昏时的风一样反复无常。”

休·海夫纳时髦的黑色DC-9喷气式私人飞机定期载着他和几个玩伴，往返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宅邸，坐在这架飞机的圆床上时他更耽于幻想，将自己视为男性理想的化身，商业乌托邦的缔造者，一部耗资巨大的家庭电影的主角，这部电影在他脑海中，月复一月不断围绕着一个自恋的母题铺陈开来——在绵延不绝的浪漫激情事件里，他同时是制片人、导演、编剧、选角经理、布景师、万人迷偶像和每个性感新星的爱人，不出所料，她们从不喧宾夺主，而是助他提升到他想要的满足之巅。

从青少年时期在芝加哥的罗克尼剧院当引座员时起，海夫纳就被电影迷住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它们最荒诞不经的剧情，在浓烈的感情中憔悴，在冒险奇遇中欢欣鼓舞；站在漆黑的剧院里，他常常希望灯光不再亮起，荧幕上的故事无限继续下去，这样他就永远不用回到他平凡整洁的家里，那里有做会计师的德国父亲和古板的瑞典母亲。是母亲首先注意到他逃避现实的倾向，她从一个正在考取执业资格的心理学家那里得知，她儿子是某种天才，但会因“不成熟”而备受苦恼，这评价令她担忧，但从未让休·海夫纳困窘。正相反，他渴望年轻的幻想，把它们强化成一种激情；现在，70年代中叶，在飞机上放松或在豪宅里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可以回首看看许多快意的日子：他逃离了无趣——其他人把这种无趣合理化为“成熟”，将他的幻想膨胀成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商业帝国。

他的第一桶金当然是凭借《花花公子》赚下的，1953年他用结婚时的家具作抵押，借来600美元创办了杂志；杂志的成功也带来了婚姻的终结，以及他对裸体照片和照片中的模特无尽地追求。《花花公子》中的女人是海夫纳的女人，拍完照片后他恭维她们，给她们买昂贵的礼物，和其中很多人上了床。甚至当她们不再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其他男人稳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后，海夫纳还是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女人，在他杂志的疆域里永远占有着她们。

1960年，他在芝加哥创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把全国数不胜数的兔女郎引入他的生活，一些人就住进了他府邸中的宿舍，这栋豪宅有48间房，毗邻一片湖，坐落在芝加哥独一无二的黄金海岸 [156] 上。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宅邸时，想起了在悬疑片中见过的大房子，里面有隐藏的地道和密门；买下这块房产后，他发现里面并没有这类东西，于是就派人修建了自己的私人通道，还有按一个钮就可以移动的墙和书架。他也在宅子豪华的内室里，添置了一个电影放映厅和爆米花机、保龄球球道、蒸汽浴室，另外，尽管自己不游泳，他还是在地下室安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池子的一部分由玻璃包住，这样在海夫纳的水下酒吧中就能看到裸泳的兔女郎。

海夫纳的众多厨房员工和穿黑制服的管家全天候轮流上班，这样他和访客可以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叫早餐或晚餐；海夫纳喜欢用厚重的帷幔紧紧遮住所有窗子，并安上隔音设备，因此他可以像贵族一样隐居数月，甚至不知外面阴晴雨雪，街上在发生什么，是何季节，今夕何夕。像海夫纳最爱的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命运多舛的盖茨比一样，海夫纳经常举办数百人参加的大派对；而且和盖茨比一样，他有时并不露面，而是待在橡木台阶尽头的私人套房里，设计新一期的《花花公子》，或者只由一小群亲密的人陪伴，或者从他电影资料馆里收藏的数百部影片中挑出一部，在床对面的银幕上观看。

他精心设计自己的套房，提供所有能想象到的舒适和便利，这样，几乎做所有事都不用离开它：他有视频音频设备，躺在床上就能与几个街区外花花公子大厦中的主管们交流；按下几个键，他就能让床向任何方向旋转360度，让它摇动震动，或突然停在壁炉前、棕色沙发前、电视机前，或低平的曲线形床头板前，那个床头板他既当写字台也当饭桌，床头板上还安有立体声音响、很多台电话机和一台冰箱，里面有香槟和他最喜欢的饮料——百事可乐，他每天都要喝十几瓶。在安了镜子的房间里，还有一架电视摄像机聚焦在他的床上，让他可以拍摄和保存与一个情人逍遥时的影像——或者，有的时候，和三四个情人一起逍遥的影像。一天晚上，一位新住进宅邸的房客打开了海夫纳套房的门，发现他裸躺在床中央，周围有六个裸体的《花花公子》模特和兔女郎，每个都在用精油轻柔地为他按摩，而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似乎从观看中获得了同样多的快感：似乎他杂志中的照片突然活了过来，在一场性爱仪式中为他施涂油礼 [157]。

海夫纳花了将近600万美元买下喷气式飞机后，重新设计了机舱，尽量多地再现宅邸中熟悉的舒适感。他将飞机的座位从110个减少到35个，安装了可以变成床的豪华毛绒座椅；他加上了办公桌，既可以举行商务会议，也可以玩他最爱的桌游大富翁和西洋双陆棋；飞机上还有两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九台电视显示屏、三部带分机的空中电话、一套复杂精致的八声道立体声音响系统，他还在机舱前部留下足够的空间跳舞。花花公子空姐穿着饰有白色兔子徽章的紧身黑色制服，与飞机外面的颜色相匹配，她们准备好足够36个人使用的银具、水晶器皿和瓷器，服侍八道菜的晚餐。飞机后部，海夫纳的套房里有圆床和下沉式淋浴，桌子上放着口授录音机、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灯箱，用它可以检查将付印杂志的彩色底片。

尽管飞机后备燃料箱足以支持海夫纳偶尔出国旅行，他最频繁的飞行还是从芝加哥往返洛杉矶，在那儿，他的公司6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投资电视电影产业，也是在那儿，海夫纳于1968年迷上了他新近遇到的18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学生芭芭拉·克莱恩。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叫《夜晚花花公子》的综艺节目里，他做主持人，而她被海夫纳的一个合伙人雇为替补模特，该合伙人一天晚上在贝弗利山的迪斯科舞厅瞥见她，立刻就知道她的长相定会吸引海夫纳。芭芭拉·克莱恩是典型的邻家女孩，绿眼睛、棕色头发、皮肤娇嫩，有着可爱的向上翘的小鼻子，优

雅的含苞待放的身体，休闲但裁剪合体的衣服自然而然地让她的身体更加美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医学预科班之前，芭芭拉·克莱恩是高中啦啦队队长，也代表她的家乡萨克拉门托参加了美国小小姐大赛 [158]；到洛杉矶后，她课后有时当电视模特，为瑟茨薄荷糖拍广告，为“梳理和洁净”做美人鱼模特 [159]。

海夫纳第一次看到她时非常惊讶，她和自己已经离婚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如此相像——不是现在的米尔德丽德，而是少女时期那眼睛明亮的棕发美女，留着刘海儿，穿着短袜，他1944年夏天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后深深爱上的那个姑娘。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是那个最初的邻家女孩，他最纯真的梦想和欲望倾慕的焦点，也是他最悲切痛苦的来源，当她承认——他们订婚之后，她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上教书时和系里一个老师有了外遇。尽管这事极大地打击了海夫纳，他们还是在1949年6月按计划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内，有了两个孩子后，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离婚后，米尔德丽德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而海夫纳就一直在追求《花花公子》里的情人们。

但当他与芭芭拉·克莱恩约会几次后，海夫纳似乎突然想要建立一份更加忠诚牢固的关系。他现在40岁出头，虽然芭芭拉比自己的女儿克里斯蒂（现在与母亲和继父住在芝加哥）大不了几岁，但她和他离婚后认识的几十个年轻女人都不同：她更有求知欲，更活泼，社交方面更泰然自若；出生于萨克拉门托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庭，作为一位医师的女儿，她不像海夫纳大部分女友那样对他的财富和地位充满敬畏。他们约会时，她坚持不让他用配有司机的豪车来公寓接她，而是自己开车到餐厅或派对上见他。她也避免和他独处一室，不想将自己的童贞献给他这种名声和年纪的人。他们刚相熟的时候，她解释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从没和24岁以上的人约会过。”他回答：“这没关系，我也没有过。”

最初的几个月，只要在洛杉矶，海夫纳就会和芭芭拉约会，而且表现得相当得体 and 耐心；她最终同意与他和他朋友一起，飞到拉斯维加斯玩几天，然后到阿斯彭滑雪——他弟弟基思在那儿有一栋大房子，芭芭拉·克莱恩被安排自己住一间卧室。但是他们一起旅行的事，不久就被好莱坞的媒体报道了，这惹恼了她在萨克拉门托的父母，也重新引发了抨击海夫纳的老生常谈，即他和少女约会，是因为他畏惧更年长更具挑战性的女人。对这种断言，海夫纳回答说，年长的女人并不必然比年轻的更加难搞，而且他在情爱生活中绝不是要寻求挑战。“我不是要找个女版休·海夫纳，”他对记者说，又补充道，“对我来说，一段浪漫关系是为了逃离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这是心理和情感的世外桃源。”

芭芭拉·克莱恩和海夫纳在一起交往了更长时间后，认识了很多他在出版和演艺界的朋友，在他的世界里愈发轻松自在，对海夫纳个人的回应也更加热烈。他机敏但不恃才傲物；他似乎不受百万家产的影响，有一种孩子气的冒险精神，令她忘记了年龄的差距。1969年去芝加哥他的宅邸时，芭芭拉·克莱恩不仅做好了准备，而且是迫不及待地在那张大圆

床上完成了他们的关系；在芝加哥时，她也同意为《花花公子》拍封面照，那是第一张照片，日后她拍的很多张照片，使她以“芭比·本顿”的艺名令全国瞩目。海夫纳被芭比·本顿迷住了，为她生机蓬勃的感染力神魂颠倒，当她对海夫纳已经习以为常的漂亮东西和地方展现出少女似的欢愉，她在他的内心中激发出一种动力，使他想要更进一步地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在阿卡普尔科的一个周末，尽管不会游泳，海夫纳还是跟随她和朋友们，轮流玩由摩托艇带起的“水上风筝”，在许多危险的时刻，人们能在阿卡普尔科海湾高高的上空，看到花花公子帝国那颗独一无二的脑袋。

因为芭比·本顿，海夫纳在洛杉矶待的时间，比之前在那儿的所有时间都长；1970年，他花了150万美元在日落大道附近一个繁茂的庄园买下一座哥特——都铎式城堡，由芭比·本顿做女主人。他们一起商议，如何重新装修这座有30个房间、被常春藤覆盖的庄园，它将成为花花公子的西宫。建筑师和工匠用了很多个月，将周围5.5英亩土地改造成缓缓起伏的山丘和草坪，在主屋后开了一片湖和瀑布，也造了一个石头洞穴，里面有一系列温暖的按摩浴池供客人裸体沐浴。音乐在蒸汽岩洞里循环播放，在周围的红木、松木森林里和蔓延开去的绿草坪上，海夫纳新弄到的几十只动物可以闲庭漫步——美洲鸵、松鼠猴、浣熊、兔子，甚至还有孔雀。池塘里有鸭子和鹅，鸟舍里有秃鹰、金刚鹦鹉和火烈鸟。庄园其他地方还有满是珍奇花卉的温室，客房里摆着古董，游戏室里有台球桌、弹球机、游戏机和天花板安有镜子的小私人卧室。在一大片林间空地里，还建了一个下沉式网球场，从一个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室外餐厅可以俯瞰它，在餐厅，打黑领带的管家会用托盘给每对背着网球拍的客人两罐未开封的网球。

除了高高的树篱和树木，从庄园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座豪宅，它的结构像城堡，有高耸的烟囱和塔楼，是模仿一座15世纪的英国庄园建造的。宅邸大门前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喷泉，上面雕着小天使，狮子的头向外喷水；穿过石拱门和厚重的橡木大门，访客进入豪华的走廊大厅，那里铺着大理石地板，高粱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上面的蜡烛几乎有棒球棒那样粗大。右手边是一间华丽的餐厅，抛光长木桌的周围有12把覆盖着蓝色天鹅绒的椅子；左手边是宽敞的客厅，里面摆着三角钢琴、皮沙发和很多椅子，在海夫纳把这间客厅变成电影放映室的晚上，这些椅子上会坐满客人。从门厅向上，是一个木质双栏杆的哥特式楼梯，通向几个私人套房，其中包括芭比·本顿住的主卧，休·海夫纳在洛杉矶的时候也会住在这里。

洛杉矶宅邸和芝加哥的一样，以24小时无间断的餐饮服务为特点，这是海夫纳式的不顾晨昏，只要他来了兴致，他的社交秘书就急忙安排盛大的派对。因为大部分有名望的电影大亨近些年都太老了，无法举办好莱坞标志性的花哨华丽的聚会，因而海夫纳在洛杉矶就特别受欢迎，1971年，他的宅邸一准备好举办第一场私人派对，山脚下的电控大铁门一开，川流不息的劳斯莱斯、宾利、梅赛德斯——奔驰、捷豹和定制吉普车就沿着山路向上，两旁是爬满了蜿蜒蜿蜒的常春藤的山墙，车上载

着顶尖制片人和导演、电影明星和模特，吸着烟斗、穿着丝绸长袍的休·海夫纳在大理石门厅里迎接他们，手里拿着一瓶打开的百事可乐，身边站着他光彩照人的公主，身穿低胸的衬衫和裁剪合体、饰有亮片的蓝色牛仔褲。

作为爱的标志，海夫纳送给芭比·本顿一辆玛莎拉蒂、许多精美的珠宝、漂亮的衣服和一台红色的棉花糖机；他委托雕刻家为她塑了一座半身像，突出她活泼的肉感和坚实翘起的乳房。海夫纳不在洛杉矶时，每天都从飞机上、豪车里或芝加哥的豪华大床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爱她、想她——这些都是真的；但他没有承认，他们分开时他常常和一个新的兔女郎或模特共度良宵，她们在接受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服务生培训，或在花花公子大厦的摄影室试镜期间，都暂时住在芝加哥宅邸里。

尽管海夫纳快要45岁了，从创办杂志以来和几百个上相的女人交往过，他反而比原来更享受女性陪伴了；考虑到他近些年看过和做过的事，对他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每次和一位新的女人在一起都是全新的体验：似乎他总是第一次看着女人脱掉衣服，愉快地再次发现女性身体的美丽，当内裤脱掉，光滑的臀部露出来时，他总是充满期待地屏住呼吸——他从不厌烦做爱。他是贪得无厌的性瘾者。

他也深信，活跃的性生活是他的创造力、商业成功、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和独特性的源头活水；这将他与菲茨杰拉德式多愁善感的角色区分开来，不然他也可能成为那些惧怕年老的时髦浪漫派，在40岁上就凋零，隐入阴暗和绝望。对逐渐变老的海夫纳来说，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40多岁时比30多岁时要开心，他毫不怀疑50岁时他会更加满足。他众多的商业公司会继续蓬勃发展，而且在私人天堂的中心，他会像现在这样占有一个他爱的年轻女人——而他同时能接触一大群来来去去的美人，给他最私人的时刻带来多样性和情趣。

例如，1971年初夏在离芭比·本顿几百英里远的芝加哥，休·海夫纳就对一个体态丰腴、曲线玲珑的绿眼金发美女情有独钟，她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凯伦·克莉丝蒂。凯伦·克莉丝蒂生有结实华美的巨乳，流泻到双肩和背部中央的白金色卷曲头发，她是在达拉斯的一次“兔女郎选拔活动”中被发现的，该活动由海夫纳的合伙人、花花公子俱乐部的一个经理约翰·丹蒂组织，他负责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面试候选人，那些女人看到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想要在全国15家花花公子俱乐部里工作。在达拉斯，凯伦和其他200个申请人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集合，穿着比基尼为约翰·丹蒂和其他花花公子代表摆造型。数周后，凯伦被雇用了，她收到一张到芝加哥的飞机票，受邀住在海夫纳的宅邸，受训为迈阿密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

被雇用后，凯伦又惊又喜，因为她之前从没去过得克萨斯州以东的任何地方，青少年时期她大部分是在阿比林乡下一个频频接到噩耗的家庭里度过的。凯伦3岁时，母亲因一种复杂的肾脏疾病去世。父亲再婚，但凯伦9岁时这段不幸的关系就以离婚告终；四年后，凯伦的父亲

打猎时，遇到意外，被子弹射中致死。那些年，凯伦和妹妹由心地善良但能力有限的父辈祖辈亲戚轮流养大；尽管作为孤儿凯伦受到联邦财政援助，从阿比林库珀高中毕业后，也靠打零工和在一家公司做全职秘书尽量省钱，但是资金不足还是迫使她大一后就从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辍学。

但是19岁时，她在当地报纸看到了《花花公子》的广告；随后她得出结论，做穿着小兔制服的服务生，应该比在办公室当秘书更有趣更赚钱，于是1971年5月，她打包好行李，到达芝加哥机场，然后乘出租车抵达那华丽的黑色铸铁前门，门后面就是海夫纳在北州大道上由石灰石和红砖建筑的领地。门厅的保安核实了她的身份后，凯伦·克莉丝蒂被一个管家护送，穿过大理石大厅，登上橡木楼梯到达四楼，然后管家指给她一扇通往兔女郎宿舍的门。

她听到淋浴声、笑声、电吹风和电台音乐声从门后传来，走过门厅时，她看到几个裸体的年轻女人从屋里跑进跑出，大概是在准备到花花公子俱乐部上班。凯伦对她们的极端不拘礼节感到惊讶，也有点尴尬。当走进分配给她的套间，她发现一个棕发裸女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另一个有金色短发的女人坐在梳妆台上涂指甲油，她变得更加局促起来。尽管凯伦介绍自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友善，也耐心地回答她对明天工作的很多疑问，但她还是感觉到，她们谈话时在苛刻地评估她，仔细观察她衣服下身体的轮廓；后来当她脱下衬衫但没有脱掉胸罩时，一个女人轻轻说：“我们在这儿不穿这个。”凯伦微微一笑，但是并没有脱掉胸罩，继续打开包裹整理东西；直到她们离开去工作，宿舍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时，她才脱掉了所有衣服去洗澡。

过了一会儿，凯伦感觉神清气爽，穿上在达拉斯买的新衣服大胆走出宿舍，走下豪华的楼梯，不久就发现自己站在60英尺长的客厅里，那里铺着柚木地板，20多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镶嵌着用花装饰的壁画。在这间宏伟客厅的一端，有一座大理石雕出的壁炉，大得足够她站在里面；另一端，银质抛光的中世纪盔甲栖息在基座上；两头之间混合着古董家具和现代家具，一架三角演奏钢琴，还有轻柔回荡着爵士乐的立体声音箱。远端壁炉附近的一张咖啡桌旁，坐着一群正在交谈的年轻女人和年长些的男人。海夫纳不在那里，但是凯伦认出那位在达拉斯遇到的约翰·丹蒂；他看到她后马上站起身，走过来向她打招呼。丹蒂是个健壮时髦的男人，40岁出头，友善红润的脸庞上留着利落剃好的小胡子，他穿着敞口的丝绸衬衫，脖子上戴着一个金徽章，窄腿裤上有明显的折痕。尽管他说话温和谦逊，但因为他在海夫纳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屋里的管家却对他非常关照，当丹蒂与凯伦握手时管家仍旧非常留心；丹蒂问她吃什么喝什么时，两个管家迅速站到她旁边准备好满足她的需要。

她被介绍给咖啡桌边的人们，他们在奢华的屋子里聊天休息，而她坐在中间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一个大约30岁的迷人女士加入了他们，她容貌瘦削精致，大眼睛顾盼传神，举止虽然世故老练，但似乎热情自然。她名叫波比·阿恩施泰因，凯伦过后知道，阿恩施泰因小姐是海

夫纳的社交秘书和红颜知己；除了其他责任，她还帮助招待拜访海夫纳的客人和社会名流，安排在海夫纳套房中进行的《花花公子》商务会议，而且海夫纳的大部分私人采购也由她负责，包括寄给他父母、孩子的圣诞节礼物和生日礼物。几年前，波比·阿恩施泰因曾和休·海夫纳有过一段短暂随意的浪漫关系；但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成熟成一种深切特殊的友谊——而且像海夫纳一样，她现在也喜欢比自己小的情人。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咖啡桌前风度翩翩，她微妙地将凯伦·克莉丝蒂纳入谈话，但不需要这个明显很害羞的得州美人必须回答，这让凯伦在陌生人之中自在了许多。但当丹蒂提议领她转转宅邸时，她还是很愉快地抓住了这个从容退出的机会。

之后的半个小时，凯伦跟随丹蒂穿过走廊和秘密通道，经过古董家具和弹球机器，走下旋转楼梯进入水下酒吧——从楼上一个黄铜消防滑杆滑下来也能到那儿。丹蒂几年前在海夫纳建议下搬入宅子，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告诉凯伦它是由一位芝加哥企业家在19世纪建造的，这名企业家随后在房子里招待了像西奥多·罗斯福和皮尔里海军上将这样的客人。1960年海夫纳以低于50万美元的价钱买下它，那时它积满灰尘空荡荡地闲置了好多年；买下它之后，海夫纳又花了至少50万修建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像保龄球场、游泳池、私人套房这样别具特色的装备，那私人套房里布满了电子小玩意和海夫纳自己设计定做的家具。但当凯伦问起她是否可以看看海夫纳的住处时，丹蒂最开始迟疑了一下，解释说，海夫纳今天早些时候刚从洛杉矶抵达芝加哥，现在也许在睡觉；但丹蒂去查看了一下，几分钟后回来说海夫纳醒着，很乐意与她见面。

凯伦由丹蒂陪伴着，走过不久之前他们坐在那儿的带橡木镶板的客厅，爬上两层台阶，穿过一扇门走进一间充满电子设备的房间，里面包括八台分开的电视监控器，每一台负责芝加哥的一个频道，这样海夫纳可以同时录下很多节目，在方便的时候回放。打开第二扇门，丹蒂引凯伦走进一间条纹嵌板的房间，那里铺着厚厚的白地毯，中央一张圆床支配了整个房间，上面坐着正在吃汉堡喝可乐读杂志校样的休·海夫纳。

海夫纳抬起眉毛，带着夸张的微笑从床上弹下来迎接她；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除了和丹蒂一起打趣逗凯伦开心，他和她既严肃又随和地交谈，问她的背景和未来的抱负，带她参观套房里装修豪华、收藏了很多书的图书馆，带有罗马式浴盆的浴室，浴盆大得足够盛下12个人，还有可以激活旋转大床的众多按钮和旋钮，床的直径有8.5英尺，耗资1.5万美元制成。床旁边，一台Ampex牌电视摄像机指向床，它被设计成既可以即时也可以延时地将海夫纳做爱时的影像传递到上方的墙幕上，对此他感到无穷刺激；但是领凯伦·克莉丝蒂参观时，他巧妙地没有提及这台设备。

凯伦离开前，海夫纳说他今晚会和演员休·奥布莱恩还有其他客人玩普尔台球 [160]，又补充到，如果凯伦愿意来他会非常高兴。她回答说她会来的。随后独自在自己房间休息时，她很吃惊，和海夫纳在一起时自己竟如此舒适自在，海夫纳内心的满足如此令人信服。一年前的一个晚

上，凯伦在大学宿舍里看约翰尼·卡森 [161] 的电视节目时，曾经看到过他一次，那时觉得他有些矫揉造作，被迫那般言行举止；但是私下里他的精神更加自由、谦逊，身体也更加迷人。她也觉得，在他住处发现的青少年式的邋遢很可爱——地板上乱丢着纸和旧杂志的碎片，衣服漫不经心地扔在椅子上，加州之旅的旅行箱打开了，但是还没有整理。尽管有很多仆人和管家24小时致力于维持秩序和整洁，休·海夫纳却给人这样的印象：他需要更仔细、更私人的照顾。

几个小时后，凯伦·克利丝蒂和海夫纳的客人在普尔台球室的时候，以及之后站在弹球机器前看海夫纳熟练地用手掌轻推轻拍时，她都不断察觉到海夫纳对她的关心。他用粉笔磨台球棒头时对她微笑，每进一个好球都向她眨眼，而且，给人们讲了一个笑话或发表了机智的评论后，他总会看看她的反应。这些不够微妙精明的举动，要是在一个更世故的女人那里会被扣分，但凯伦却觉得受用，比起一个不那么直率的男人迂回的手段，她目前更喜欢他公开的亲近。他似乎在告诉她还有屋里所有人——尤其是其他聚在那里的迷人女人——他完全被她吸引了；她决定不细想这会有何结果，只是在此刻极度享受这份关注。

夜宵由管家放在银托盘里，端进游戏室放在弹球机器的玻璃盖上，海夫纳和一些客人边吃边玩。夜宵过后，这群人移到水下酒吧喝酒、游泳、谈话。海夫纳和凯伦挨得很近；渐渐地其他人察觉到他想要私人空间，于是留下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他们到达酒吧时已经过了1点，三个小时后他们还在那里，坐在一张小台桌前柔声谈话，朦胧的蓝绿色光透过游泳池闪烁。他似乎渴望了解更多她的过往、她上学的日子、她的朋友、她如何挺过困苦和家人的去世。尽管他的问题没完没了，他的态度并没有像职业杂志编辑那样只是盘根究底——他似乎由衷地想要更亲密地了解她，迫不及待地倾听没人花时间听过的事情，而且他很长时间都不会打断她，让她能从容不迫地整理想法。他谈起自己的过去时她也认真听着，他令人沮丧的婚姻，对孩子们的希望，以及现在在洛杉矶和芭比·本顿的爱情。凯伦尤其欣赏他谈起芭比时的坦诚，要是个不那么诚实的男人，和新欢在一起的第一晚很可能会绕过这种话题。碰巧凯伦知道芭比·本顿，在约翰尼·卡森秀上看到过她和海夫纳在一起，节目上还提到他们有可能最终会结婚；尽管，凯伦记起自己当时怀疑，海夫纳不会为芭比·本顿或任何人毁掉自己享誉盛名的独身生活。一年之后，现在当面见到了海夫纳，看到他在装满玩具的宅邸里多么愉快，凯伦甚至更加确信他不适合结婚——对她来说这并不是批评；相反，她喜欢和一个富有且忙碌的年长男人很亲密，他不知怎么地保留了年轻人喜欢娱乐和嬉戏的生机活力。在这个永恒宫殿的水下氛围里，几个小时飞逝而过，凯伦只知道自己和他在一起时多么愉快自在；当他提议回到他的套房看电影时，她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后来，当他请求她和他共度良宵时，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他们第一个晚上不可思议的心情和氛围持续到了第二天和第二晚；令凯伦又惊又喜的是，他们整整一周都保持了情投意合的恋爱关系——只被他的商务会议和她在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培训打断。但在她能穿上兔女郎制服之前，海夫纳问她是否愿意辞掉工作，这样他们晚上就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他向她保证无需担心薪水的事，暗示说做《花花公子》杂志的模特可以赚得多。她同意做模特后，海夫纳通知摄影编辑安排她试镜；几天拍摄之后，凯伦·克莉丝蒂成为《花花公子》1971年12月那一期拉页上的模特，为此她领到5000美金报酬。

她突然成为海夫纳在芝加哥的情人，这在兔女郎宿舍里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愕和妒忌；但当她们意识到海夫纳是认真的，就屈从了她的特权地位，不久后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虽然她现在可以开一辆豪车，可以在芝加哥商店里赊账、由海夫纳来还款，本质上她和从得州来的那一天一样，还是那个乡下姑娘。她常常光着脚穿着T恤和短裤在宅子里走。如果说受到新环境什么影响，那也只是她不再戴胸罩了；还有，越来越会玩海夫纳和亲密朋友们花很长时间玩的游戏——西洋双陆棋、大富翁和弹球机。她和少女时期一样，看电视上的肥皂剧消磨时光，最喜欢的剧是《另一个世界》，她从14岁住在祖母家的农场时就开始看了；如果因为下午和海夫纳在床上而偶尔落了一集，她知道之后一有空还可以再看，因为海夫纳已经交代工程师录下它的每一集。

每隔一周海夫纳就会离开她去洛杉矶，这些时候凯伦对他仍旧喜爱芭比·本顿没有表现出怨恨；尽管几个月过去后，由于她感情上与海夫纳越来越亲近，凯伦感到越来越孤独，而且私下里想知道芭比是否知道她，知道些什么。但是，海夫纳在加州时每天打来的电话和送的礼物消除了她的疑虑。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月，他送了一块镌刻着“爱”的钻石手表；1971年送她的圣诞节礼物是一件等身长的白色貂皮外套。1972年3月她21岁生日时，他送她一枚蒂芙尼的五克拉鸡尾酒戒指。他也送给过她一枚翡翠戒指、银狐夹克、马蒂斯的画作、一只波斯猫，还有她《花花公子》封面照的漂亮的金属复制品；1972年的圣诞礼物是一辆白色的马克四代林肯。

用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公开露面赚的钱，她给海夫纳的大富翁桌游买了特别设计的物品，例如形状和迈阿密花花公子广场酒店类似的手雕旅馆，以及六个游戏常客的小小的个人雕像；除了海夫纳——他2.5英寸高的小雕像穿着色彩鲜艳的浴袍、抽着烟斗，其他小塑像描绘出凯伦、波比·阿恩施泰因、约翰·丹蒂和海夫纳的两个老朋友，也是宅邸的常客：吉恩·西克儿，《芝加哥论坛报》影评人，以及谢尔·西尔弗斯坦，卡通插画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她还委托一位芝加哥艺术家画了一张海夫纳的立体肖像，那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展现他穿着丝绸长袍抽着烟斗坐在椅子上，头顶上是一片白色烟雾形成的云，里面有凯伦·克莉丝蒂一张小裸体像。她送这件礼物的时候把他逗笑了，因为她指出有她裸体的那一部分是可以取下来的，什么时候他看烦了就可以轻松换上一张其他人的。

但是从1972年到1973年，他们在芝加哥每隔一周的团聚，既没有

让海夫纳厌倦她的照片也没有让他厌倦她的存在，他还开始邀请她一起坐飞机旅行。他带她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迪士尼；去加勒比海的一个度假酒店，在那儿的一个杂志经销商大会上，海夫纳受到人们的致敬；还有纽约市，那儿有个西洋双陆棋锦标赛。在纽约时凯伦想要购物，海夫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包递给她，然后就去开会了。钱包里有3000美元。但是凯伦在第五大道的商店里闲逛时，发现自己在查看价标，抑制购买的冲动；虽然海夫纳可以异乎寻常地慷慨大方，但凯伦也知道他默默地注意每一笔钱的去向——而且她不想占他的便宜，也不想并不真的想要的东西上浪费钱，她后来还钱包时里面只少了200美元。

凯伦·克莉丝蒂敏锐地察觉到海夫纳天性中矛盾的地方——他变化无常的脾气和不明说的愿望，并事事留神——这极大地促进了两人和谐的关系。一天，当他们在芝加哥宅邸玩大富翁时，一个管家通报，海夫纳的飞机已经准备好启程去洛杉矶；尽管光着脚，凯伦立即随他出门坐轿车送他去机场。当海夫纳和商业伙伴及朋友登机的时候，其中一人开玩笑说凯伦要不要也同去——海夫纳突然同意后，她登上了飞机。向西飞时，她和其他人重新开始玩大富翁，在热闹地吃过一顿午饭后，驾驶员在海夫纳的指示下，提前用无线电联络了另一辆轿车，送凯伦去一家贝弗利山的鞋店，然后回洛杉矶机场，那儿已经为她订好了回芝加哥的机票。

这趟旅行过后，凯伦有时候从芝加哥坐商用飞机到洛杉矶机场与海夫纳会合，然后一起搭花花公子飞机回来，这样就能多出几个小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当涉及爱情和享乐时，时间——不是金钱——对海夫纳来说是最重要的。他40岁生日后常说——当个人资产超过1亿美元后，钱不再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时间是；他愿意不惜成本赢得满足浪漫欲求的时间。一次凯伦在得州探亲戚，海夫纳花了超过1万美元派了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从达拉斯接她到洛杉矶机场，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坐花花公子DC-9飞机回芝加哥。

还有一次，他独自回到芝加哥，惊讶地发现芝加哥宅邸外的树上系上了黄丝带，这装饰是受到当时一首全国流行的歌曲《系一条黄丝带》的启发，就在几周前凯伦买了这张唱片送给他；歌曲描述了一位归来的恋人，爱人对他绵延不绝的爱的标志，就是系在橡树上的黄丝带，海夫纳立即喜欢上这首歌，要求在宅邸的大立体声唱片机上循环播放。但因为歌曲是录在45转黑胶唱片上的，无法自动循环播放，海夫纳便要一个管家站在唱片机边，歌曲一停就把唱针抬起放回开头处。管家拨了整整一晚上唱针。

1973年，《花花公子》杂志发行20周年纪念时，月发行量已达600万份，休·海夫纳继续开心地在两栋宅邸、两个女人之间平分他的时间。46岁时，他似乎有了足够多的时间、金钱、权力和想象力来掌控大限之

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原来的电影引座员曾经在漆黑的剧场里，梦想逃离乏味的现实世界，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的抱负：休·海夫纳现在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他隐蔽在精心制作的布景里，控制着灯光和音乐，是《船长的乐园》^[162]里的男主角，在岁岁年年不经意流逝的时光中乐活不息。

外面的世界，通货膨胀和税费高涨让很多美国家庭成为受害者，对很多人来说，像休·海夫纳这样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好，似乎太不公平了，他的生意持续兴旺扩张——像他的宣传部门宣称的，而他忙着泡妞和玩大富翁。尽管很多人比海夫纳富有得多，公众既不知道也不忌妒，因为他们很少上电视，也从不炫耀自己过得好。他们中典型的，是看起来肩负重责的洛克菲勒兄弟；J.保罗·盖蒂^[163]，一位衰弱的老人，在公开的每张照片里看起来都很孤寂；还有霍华德·休斯^[164]，藏在旅馆房间里患有偏执狂的隐士，由审慎的摩门教男护士照顾。有时候，在巴黎的《殷配》和美国新闻杂志里，会刊印后宫佳丽成群的阿拉伯君王的照片，但那些男人无一例外地过度肥胖或横眉怒目，抱怨着个人病患，担心着武装暴徒。而美国政治掮客找下属做情妇的事似乎迟早会被媒体曝光，有时还会在这些女人自己忏悔式的自传中被进一步贬低。

但是海夫纳与女下属和拉页新星们持续不断的、曝光率很高的调情，被《花花公子》宣告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年他似乎都更大胆地破坏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传统将过度放纵与惩罚联系在一起。尽管据说他日渐老去的身体被活泼欢闹的女伴和每日难填的欲望所累，他看起来却从未这么好过。尽管他吃很多垃圾食品，却从不发胖；一瓶接一瓶喝可乐也明显没有腐蚀他的牙齿。尽管作为大公司老板，有几家附属公司，管理全国和海外成千上万名员工，让他遇到很多问题，他却很少露出压力大的迹象，据人们所知，他也从没看过心理医生。

休·海夫纳并不担心《风尘女郎》的成功发行，这本杂志里猥亵、露骨的生殖器照片简直堪比妇科图片——它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相信《花花公子》不久就会过时，海夫纳也不担心《阁楼》现在的月发行量已经升到400万份；他的编辑们回应这些竞争，在《花花公子》中刊登以海夫纳的标准来看太过下流的裸女画报，他于是提醒员工，他不想让邻家女孩看起来像个荡妇。

即使他公司漫不经心的运转方式，似乎应该引起一些合理的担忧，海夫纳天性的乐观和巨大的自负却让他不会采取迅速的补救措施。他从每一份不利的报告中都能看出积极的迹象：花花公子电影部制作的像《裸猿》^[165]和罗曼·波兰斯基^[166]版本的《麦克白》这样的电影，损失了几百万，海夫纳却强调他的公司在这些商业冒险中获得了有价值的经验，他也指出《麦克白》被国家电影评审委员会评为年度最佳电影；有证据证明，他全国主要的俱乐部——还有他在迈阿密海滩和牙买加、日内瓦湖、威斯康星州、大峡谷和新泽西州的度假酒店——几乎都不赚钱，海夫纳回应说他没有泄气，好日子就要来临。同时他继续支持没取得什么大成就的图书部、一家音乐出版和录音公司、芝加哥和纽约的电

影院、豪车租赁公司、模特经纪公司，还有制造带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的小器具小玩意儿的公司。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厦酒店经营不善正在亏钱；而且，《花花公子》有些乖张的姐妹刊物《是！》，虽然1972年出版它是为了更直接地与《阁楼》竞争，但很明显它更擅长把读者从《花花公子》勾引走，《是！》上市后那一年，《花花公子》最高月销量从700万跌到600万份。虽然《花花公子》杂志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杂志，在英国的三个赌场还额外有几百万海外盈利，花花公子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一年后还是跌了12个点——海夫纳认为这不是由于他公司的状况，而是由于全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华盛顿领导层无能。当一个采访者问他，考虑到一些似乎对公司投资不利的情形，他有无可能不久后回到花花公子大厦做日常行政主管时，他强调自己去办公室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回答，“就是生活。”

海夫纳详细阐述了他在宅邸里比在办公室里更高效的观点，他在刊载于《花花公子》的一次访谈中解释道：“人类是唯一可以控制环境的动物，我创造的是个私人世界，让我不必像大多数人那样，浪费太多时间，花太多奔波，能够过自己的生活。在城里工作但住在郊区的人，每天浪费两到三个小时，只是从住的地方移动到工作的地方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拥挤的餐厅吃午饭，很可能吃得匆匆忙忙例行公事。他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支配，那观念规定了日常生活应该是怎样——当然那不是他自己的观念……大部分人的日常秩序，”海夫纳继续说，“是由时钟支配的。他们在社会习俗规定的时间内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他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但是在宅邸里，毫不夸张地说，你想要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当代社会挫败感最大的来源之一，是人们不仅感到无力影响身边发生的事情，也无力影响自己的生活。总而言之，我没有那种挫败感，因为我掌控着自己的生活。”

不过，1973年夏秋他突然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丧失了掌控力，而且因为牵涉他最喜欢的两个女人，家政员工看到他罕见地不那么镇静沉着，甚至有惊慌失措的迹象。引起这些的，是《时代》杂志7月份一篇题为《皮肉生意历险记》的文章；除了强调《花花公子》和《阁楼》之间不断升级的敌对关系，揣测最高法院的米勒判决会如何限制男性杂志，《时代》还刊印了一张芭比·本顿在洛杉矶拥抱海夫纳的照片，以及另一张他坐在芝加哥宅邸里双臂环绕着凯伦·克莉丝蒂的照片。《时代》写道：“海夫纳一直是买什么都要买一双的消费者，他最近把这原则拓展到了浪漫关系里。他的老情人、前花花公子玩伴芭比·本顿住在加州的宅邸；金发的凯伦·克莉丝蒂，芝加哥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前兔女郎招待，被安顿在芝加哥的住处。不知什么缘故这样的安排能继续奏效。”

这份杂志使芭比·本顿第一次意识到海夫纳和另一个女人不是随随便便的关系；他有意让自己和凯伦·克莉丝蒂一起在新闻杂志里上镜，这令芭比难以容忍。没有给海夫纳打电话，也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他，芭比打包了一个行李箱离开了宅邸。当海夫纳得知她离开后，马上召集飞行员载他飞去加州——这极大地打击了凯伦·克莉丝蒂，因为最近几个月她

已经开始相信，比起芭比来海夫纳更爱她，他不仅亲口说过，而且他在芝加哥过夜的时间也比在洛杉矶多。

为了让凯伦放心，海夫纳与她吻别，说她在他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但是仍旧坚持他必须安抚芭比——他必须亲自这么做，然后离开去了洛杉矶。凯伦似乎理解他的离去；芭比比她更早进入海夫纳的生活，而且海夫纳说服凯伦，他应该向芭比直接解释。海夫纳没向凯伦承认的是他想要芭比回来，两个人他都需要，他被两个人吸引是因为不同的原因。他爱慕芭比·本顿的生机活力和无忧无虑；还有，他实际上无法完全掌控这个经济独立的加州人，她还正努力成为一个乡村和西部风格的歌手，这使她对他更有挑战性，而且永远撩人心意。像他的母亲、前妻和大学快毕业的女儿一样，芭比·本顿外表清新健康，性格不凡；但在其他对海夫纳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卧室里，芭比比不上凯伦·克莉丝蒂。尽管凯伦在人群中很害羞，私下里却放荡不羁；海夫纳的性经历丰富多彩，却从没遇到过谁能媲美她的床上技术和激情。看她脱衣服让他激动战栗；在她身上涂满油后——她似乎和他一样喜欢这样——在绸缎上做爱时那光滑、抚慰、闪闪发光的感觉，可以激发他直达性爱欢愉的巅峰。不像芭比——从录音室排练回来后晚上常常很累，如果第二天一早要去试音也不喜欢油进到头发里，凯伦没有什么事业野心，有很多空闲时间洗头发。海夫纳也很高兴凯伦像他一样热爱西洋双陆棋和其他游戏，总是愿意也有空和他一起旅行，不管什么时候他叫她，她都会坐飞机去见他。当他就想和另外一个人黏在一起时，凯伦通常是不二之选；但当他在大派对上当主人时——尤其是他常常赞助的那种为社会活动筹款的派对，他更想要芭比·本顿陪伴左右。她比凯伦在社交场合更泰然自若，口才更好，还有能力发表演讲。尽管目前在电视上，歌手和喜剧演员的形象让她看起来琐碎而肤浅，但她其实聪明机敏；而且是他最近几年遇到的唯一够格做妻子的女人。

虽然他无意以求婚吸引芭比回来，但也无法想象如果她不在，自己在西岸宅邸还会不会开心；他一到达洛杉矶就通过电话联系她，得知她在夏威夷一家旅馆——知道她和一个女性朋友在一起后他松了口气，他再三恳求原谅，力劝她不要让《时代》上一篇文章毁了他们数年的理解和爱情。尽管在电话那头她仍旧冷冰冰的，坚持会在夏威夷再待上一周，可她还是同意回到洛杉矶后会和他当面聊聊。他们再见面时，她仍旧心绪不佳、冷若冰霜；虽然她承认自己仍旧爱着他，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恢复，但她还是宣布，在贝弗利山已经弄到一套自己的公寓，当她想逃离宅邸里的房客、兔女郎还有没完没了的西洋双陆棋时，能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芭比·本顿和休·海夫纳再次上床之后，向他承诺不会和其他男人约会，而海夫纳承诺他会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忠诚；这之后他每天都往她的公寓送花表明自己的爱意。这段日子他也每天和凯伦·克莉丝蒂通话，她似乎急切地盼望他回来；但当搬回芝加哥宅邸后，他能感觉到凯伦不知怎么也有点不一样了，有点矜持，和他在一起不那么自由自在，虽然她说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变。

宅邸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整晚玩弹球戏和桌游；兔女郎在宿舍和俱乐部间穿梭往返；《花花公子》编辑们定期在海夫纳的套房碰面——但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弥漫整个大房子。自从帕特里夏·赫斯特 [167] 被绑架后保安人手增加了，受雇在宅邸周围站岗巡逻，他们站在门后的景象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再加上，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举止中有焦虑的迹象，她曾经给房子带来轻松温暖的氛围，现在却和一个帅气乖张的毒贩陷入一桩麻烦的情事，那毒贩时不时会静悄悄地去宅邸后面她的低层公寓里看她。

海夫纳最信任的男性朋友约翰·丹蒂，这段时间也在某天宣布他必须离开了。他在宅邸里住了好多年，充当海夫纳与俱乐部间的使者，但这份工作现在过于容易，常常令他无聊，最近丹蒂还苦涩地称自己是垂垂老矣的“游戏玩家”。尽管仍旧忠于海夫纳——也永远感激海夫纳1968年借将近4万美元给他，让他能偿还赌博职业橄榄球比赛欠下的债，丹蒂似乎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海夫纳的乐园去休个假；带着海夫纳不情愿的祝福，丹蒂爬上一辆吉普，和1973年年度兔女郎一起向新墨西哥州的陶斯绝尘而去。

然后，一天晚上从商务会议回来后，海夫纳发现凯伦·克莉丝蒂不见了。下午早些时候一些房客和保安还看到过她，但迅速检查过宅邸每间屋子，包括秘密通道和隐匿处后，也没有找到她。午夜时海夫纳很明显开始狂暴不安；一听到有人推测，她可能在一个叫南奇·海特纳的兔女郎朋友的公寓里，因为海夫纳不在时，凯伦·克莉丝蒂常和她一起消磨时光，海夫纳立即在睡衣外套上大衣，跳进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带着保镖在薄薄的积雪上开往芝加哥林肯公园区。

司机停在南奇·海特纳住的一栋老旧的四层红砖楼前，海夫纳和保镖急急忙忙地走向没有顶灯的黑漆漆的门口，然后点燃火柴眯缝着眼睛瞧邮箱，想看到海特纳的名字和公寓号码。邮箱旁有一排六个按钮，但是塑料名牌或者没了或者根本看不清；所以没耐性的海夫纳开始不断按所有六个按钮。当大门终于嗞嗞响着打开，他站在楼梯间向上大声嚷：“你好，我是休·海夫纳——凯伦·克莉丝蒂在这儿吗？”

两个保镖带着对讲机，海夫纳拿着一瓶打开的可乐，暂时等了一下回应。没人回答，海夫纳就继续爬上楼梯敲每扇门，重复说：“我是休·海夫纳，我在找凯伦·克莉丝蒂。”不久，在二楼他听到门那边传来声响，光从门缝和窥视孔流泻出来。

“你想干吗？”一个女人在窥视孔后叫道。

“我是休·海夫纳，我……”

“你真是休·海夫纳吗？”她问，仍旧没开门。然后海夫纳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问，这是在闹什么，她回答：“外面一个疯子说他是休·

海夫纳。”

二楼三楼没人开门，但海夫纳继续走上一层楼梯；他敲了公寓4-A的房门后，听到狗叫声和一个声音说：“凯伦不在这儿。”门开了，南奇·海特纳，一个穿着黑色睡袍的金发年轻女人拉住她的藏獒，让海夫纳和保镖进来。她说：“她不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海夫纳为他这么晚打扰道歉时，保镖检查了南奇·海特纳的房间、壁橱和床下。海夫纳看起来憔悴孤凄，头发被风吹乱了，可乐瓶也空了。保镖搜查完后，南奇·海特纳和他一起走到门口，很为他难过。

片刻后，海夫纳的车几乎还没从路边开走，电话响了。是凯伦·克莉丝蒂呜咽的声音，说她在电话亭，想要过来，还说她不得不离开不忠的休·海夫纳。凯伦到了后——穿着厚厚的大衣和靴子，头发被雪弄湿了，睫毛膏被眼泪弄花了——解释说，今天早些时候她小睡醒了后，无意听到海夫纳在旁边屋子里和洛杉矶的芭比打电话，重申他的爱，甚至准备到阿斯彭和她一起过周末。前一天晚上凯伦还和南奇说，海夫纳向她表明和芭比已经都结束了，还声称最近去加州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为芭比着迷了。凯伦认为很明显海夫纳是在骗她；而南奇·海特纳同意，建议她打包好东西永远离开宅邸。

南奇·海特纳开始厌倦了听凯伦不断絮絮叨叨地讲海夫纳，抱怨他自私的本性，还有和他在一起有多么痛苦。不能独占他让凯伦灰心丧气，他不在的时候还要独守宅邸，凯伦近来养成了不管多晚都给南奇打电话的习惯，在她工作了一天回家时打搅她睡觉，或者打扰她和男人在床上做爱。虽然南奇总是耐心听着，她的情人们都会不耐烦、愤怒，或者在南奇拿着电话时继续，但比起这些，南奇更不愿告诉凯伦她太忙了没法听，因为她最近挺担心凯伦的精神稳定和健康，知道凯伦瘦了15磅，而且过度依赖安眠药。南奇也非常喜欢凯伦，觉得她和自己很像。和凯伦一样，南奇·海特纳在饱经贫困和死亡的家庭长大；而且她也像凯伦一样来为《花花公子》工作，希望通过什么办法能认识有权势的人，获得在穷困的过去所缺乏的社会机遇。尽管在南奇身上还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可她为朋友灰姑娘般的际遇着迷；而且南奇也从里面得到些小小的好处。俱乐部里，经理们知道她和海夫纳在芝加哥最亲密的女人是好朋友，于是也给她礼遇，因为她可以通过凯伦，把消息比用正式渠道更快地传递给海夫纳。的确，南奇经常直接和海夫纳本人通话，他最近开始从洛杉矶给她打电话，都是在极度痛苦的凯伦挂断他电话之后；他会打给南奇让她给凯伦递口信，再告诉他凯伦的反应。海夫纳从没说南奇打电话时他会来付款，因此休·海夫纳和凯伦·克莉丝蒂间的不和让南奇·海特纳的电话账单金额飙升。

南奇仍旧不怎么抱怨，因为能做受他俩信任的调解人让她备感荣幸，她也知道凯伦太迷糊，没法为自己理性行事。要是凯伦爱上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她就能更了解基本规则；但困境就在于，她和一个

孩子般的商业大亨旋风般地陷入情网，而他想独占两个女人的爱情——每次他和一个在一起，对另一个的自尊就是双重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明显是在表明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履行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南奇知道节假日时凯伦尤其沮丧：虽然海夫纳通常和凯伦一起在芝加哥过圣诞，他却在花花公子西宫和芭比一起参加盛大的元旦除夕派对。南奇很确信，休·海夫纳就算不和芭比·本顿，也会和另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总是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享受求爱的过程，而且总会同时被两种类型的女人吸引：像芭比·本顿那样健康的神采飞扬的“好”姑娘，以及凯伦代表的胸大性感的“坏”女孩。南奇知道，和海夫纳在一起的情形凯伦是无法忍受的；他永远不会娶她，最近她还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冀，她的不安全感所需要的个人承诺，他甚至在表面上也不能给她。现在，最近这次海夫纳和保镖来她的公寓之后，南奇·海特纳几乎对凯伦没完没了的肥皂剧耗尽了所有耐性。她同情凯伦，但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海夫纳床侧的女人是不会有未来的；凯伦尽管不时悲伤落泪，也点头同意，允诺马上结束这段感情。

两个姑娘聊了好几个小时，凌晨2点离开公寓，准备在附近四把火酒吧更欢快的气氛里再喝最后一杯。但当她们两个小时后回到公寓时，她们看到海夫纳的汽车在街上巡弋；海夫纳一瞥见她们，就从车中跳出来张开双臂向凯伦跑去。凯伦在南奇旁边停住了，悄声咒骂了一句；但当他满眼是泪地靠近她，手臂向她伸出，凯伦突然向前抱住了他也开始哭泣。当这两人紧紧抱着对方倾诉柔情时，南奇转过身去；当海夫纳带凯伦走向轿车打开的车门，南奇·海特纳爬上她家公寓的楼梯。

第二天，海夫纳向凯伦保证，她听到的那通有关阿斯彭假期的电话不是打给芭比·本顿，而是打给他女儿克里斯蒂·海夫纳的。这多少缓和了凯伦受伤的感觉，虽然实际上比起芭比·本顿，她几乎更不喜欢海夫纳那个加入了ΦΒΚ协会 [168] 的女儿。克里斯蒂和朋友从大学过来玩儿时，凯伦见过她几次，而且她最近无意听到克里斯蒂的男朋友轻蔑地说海夫纳“纳妾”，让她很不舒服。凯伦也听说，海夫纳的女儿和芭比·本顿在洛杉矶相处得很好，有一次在贝弗利山一起购物狂欢，这让凯伦在这个敏感时期更没有安全感。但是休·海夫纳没表现出任何迹象，至少没对凯伦表现出他可能受到女儿对他女人评价的影响；而且他提议他们一起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短期旅行，让她欢欣鼓舞。对凯伦来说，芝加哥的这个冬天漫长而寒冷，她期待能有几天躺在太阳下。

和几个凯伦喜欢的海夫纳的朋友一起，去阿卡普尔科的这趟旅行暂时缓解了前几个月的骚乱；海夫纳给了他最珍贵的礼物——他的时间，在接下来那几个光辉灿烂的日夜里，她在他身边纵情享受，希望永远都像现在这样。但是温暖的户外和静谧的夜，对海夫纳没有太大吸引力；一周之后，以办公室有问题需要他马上处理为由，这位不耐烦的出版商准备提前离开，并且说服凯伦，和他朋友一起留在这里过周末。

去机场的路上，凯伦在车后座紧紧挨着海夫纳，喃喃地问什么时候他们再见面。他含糊地回答后，她执意要他说具体一点，想知道他的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但是他仍旧执拗地闪烁其词、拒人千里——好像他已经在飞机上了，在好几英里远的地方，触不可及。当他和她臂挽臂穿过拥挤的航站楼，走向炫目的跑道，花花公子飞机正等在那儿，她感觉越来越焦虑；然后，和他吻别前她又试了一次，想从他那儿探出对她迫切问题的直接回答——这时候，猝不及防地，他狂暴地把带着的硬皮公文包，用力高高地向飞机猛掷过去。公文包重重砸在地上，向前跳出几英尺远，海夫纳向它猛冲过去，就如同灵缇犬在追逐机械兔子 [169]；追上后他双脚跳上去，上上下下踩了好多次。他的飞行员惊愕地看着，几群晒得黝黑戴草帽的游客也停下脚看，凯伦·克莉丝蒂吓坏了，向他跑去；但跑到之前，他已经奇迹般地恢复平静，狂风骤雨般的爆发在几秒钟内就释放完毕。他从公文包上下来时，看起来既不尴尬，甚至也像不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整理了一下有点破破烂烂的包，和凯伦吻别，然后一刻不再耽搁，他走上金属梯子进入机舱。

那天晚上，他从旅馆给凯伦打电话，说如果吓到她了很抱歉，他一切都好，承诺一解决完遇到的问题就通知她。几天后通电话时，凯伦说想去得州拜访亲戚，他很支持，甚至在她拜访结束后，要花花公子飞机从洛杉矶飞往达拉斯，和她一起回芝加哥。这在他是个豪爽的举动——从洛杉矶经停达拉斯到达芝加哥，基本不是他喜欢走的笔直航线，他还说很高兴见见送她到达拉斯机场的叔叔、姑姑和其他亲戚。

海夫纳信守承诺，尾翼上印着白色兔子标志的黑色DC-9降落在新建的达拉斯——沃斯堡机场；当这架不寻常的飞机在白色航站楼观景台前慢慢停下时，几百个人——旅客、票务员、行李搬运工、卫生间侍应生、戴着高顶宽边呢帽面色红润的男人、抱孩子的女人、背着吉他长头发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突然转过头去，透过俯瞰整个飞机场的巨大窗户向它行注目礼。

这架飞机是唯一一架漆成黑色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正是为了独一无二，海夫纳才选的这个颜色；登机梯降下来机舱门摇开后，海夫纳立即独自出现在最高那层台阶上，他的头发和丝绸衬衫在微风中摆动，那一大群沉默的脸庞从巨大的窗玻璃后面向下盯着他看，他锐利的黑眼睛也注视着他们。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到过得州了。1944年夏天他第一次拜访得州，是乘去往胡德营 [170] 的部队火车来的——那时他是一个瘦削的18岁高中毕业生，同学投票选出班里日后会发达的人时，他排名第三。现在，47岁的他来带走得州最曲线玲珑的金发美女，见她的亲人，而且在不打算结婚的情况下带她去芝加哥——这一举动早些年定会激怒她的亲属，招来子弹。

海夫纳走向航站楼，保镖们在数步之外跟随，他发现凯伦戴着草帽

微笑着在舷梯上向他挥手。凯伦穿着木底鞋，修身的裙子和不怎么引人遐想的T恤，她从人群中挤出来向他打招呼，把他介绍给同住在伊格尔山湖畔小屋里的亲戚。有她的叔叔婶婶、三个堂亲、两个身材瘦长十几岁的继弟弟、20岁的妹妹邦妮带着哭叫的1岁婴儿，还有邦妮的丈夫，一个从东京基地回来度假的空军中士。

海夫纳取下烟斗和他们握手微笑谈话；一个摄影师走过来时，海夫纳同意和这群人拍照。其间他飞机上的朋友——戴金徽章穿开领衬衫的男人，穿着闪闪发光紧身黑制服的兔女郎空姐，还有一个戴羽毛帽、抱着卷毛小狗的拉页模特——走上了跑道，看起来有些不耐烦，抬头看向人群；海夫纳结束和凯伦亲戚的闲聊，挽着她的手臂走向飞机。

人群没有移动，引擎启动时继续看着；当黑色的飞机变成远方天空中一个点，他们还站在那里注视。

离开芝加哥的日子里，凯伦建立了更强的自我意识，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宅邸的日常生活。约翰·丹蒂不在，让她失去了海夫纳不在时唯一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男性朋友；海夫纳在的时候，繁忙的商务会议和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个人问题也占据了他全部心神，这让一种不寻常的隐忍，甚至阴沉的氛围弥漫在芝加哥宅邸里。凯伦回来几天前，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宅邸外被捕，罪名是，早前和男友还有其他年轻人共谋，从佛罗里达州偷运了半磅可卡因到芝加哥。被捕那天从她手包里搜出各种药品，包括一点可卡因。交了4500美元保释金出狱后，她的名字和照片在全国报纸头版频频出现，而且它们还暗示海夫纳、他的随从以及宅邸员工涉嫌吸毒，甚至也许非法买卖毒品。尽管海夫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比·阿恩施泰因，帮她付律师费，过多的曝光率还是让他心烦，尤其是他相信，宅邸里用过的毒品可能还没有美国一般校园宿舍里多。

毒品调查还不是海夫纳这段时间唯一的烦恼：一个没被人事部门晋升的黑人员工指控《花花公子》种族歧视；海夫纳被列入“黑名单”后，最初由尼克松白宫发起的国税局调查变得更严厉；不断有报告表明花花公子股票下跌，酒店经营和其他附属项目亏损显著。突然，经过多年惊人的盈利、极端的快乐和对环境显而易见的掌控，海夫纳的根基似乎开始动摇了；虽然凯伦·克莉丝蒂很愿意留在他身边，只要她觉得在他的世界里有个真实的位置，但此时她确信自己留下来太傻了。她只是他最荒唐的那一部分，勾起他想象力的小道具。尽管她知道这很可笑，但她23岁时就已感觉垂垂老矣，变成了一个偷听他打电话的泼妇，一个他轻易就能替换掉的床伴。已经有一个兔女郎空姐告诉她，飞机到达拉斯的前一天，海夫纳在洛杉矶是和那个抱卷毛狗一起坐飞机来的拉页模特过的夜（芭比·本顿因音乐事务不在城里）；虽然凯伦没天真到期待海夫纳的性忠诚会持续一周以上，但她不再想遵守他的期望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了。在达拉斯有个她认识甚至私下约会过的年轻人。她相信外面的世界还有其他她乐意见到的男人。所以，加上她兔女郎朋友南奇·海特纳的频频鼓励，凯伦·克莉丝蒂最终决定整理行李，不通知海夫纳，永远离开宅

邸。

让她的东西通过保安不是个小问题，但她最后想出一个方案，让她能把财产寄到达拉斯，而不让房里任何可能告诉海夫纳的人警觉。她向女佣和管家解释说，她想把一些不要的衣物寄给得州的穷亲戚，她在硬纸板箱里一点点打包了她的皮草、首饰和一大捆海夫纳送她的衣裙和睡衣。在两周内她寄了30多个箱子给她在达拉斯的姑姑，并设法把她的白色林肯车交给一个她知道可以信任的前兔女郎；然后某一天趁海夫纳在洛杉矶时，她让司机驾车载她去拉什街上最喜欢的时装店购物。

司机和保镖坐在车里等，凯伦走进商店，在一个她认识的女售货员的帮助下，从后门逃到临街，叫来一辆出租车，带她到两个女性朋友和车等着的地方。其中一个南奇·海特纳，帮凯伦一起开长途车到达拉斯，她们用了16个小时，途中用中枢神经刺激剂保持清醒。离芝加哥很远后，凯伦暂时停下来，用路边的电话亭和波比·阿恩施泰因道别，解释说她只是不能再在宅邸待着了。

波比·阿恩施泰因把信息转达给在洛杉矶的海夫纳，他愤怒焦躁，之后一周不断给凯伦打电话，试图说服她回来。尽管她希望保持朋友关系，同意时不时去洛杉矶看他，但她告诉他自己再也不会回芝加哥了。她刚在达拉斯弄到一间小公寓，在当地一家机构做模特，还在和先前在达拉斯遇到的一家电脑公司的年轻主管约会。虽然继续开她的白色林肯，她已经用不着皮草和昂贵的首饰了。她脖子上不久就会戴上新男友送的金链子；上面挂着一个14克拉钻石的价格标，上面印着“已售”。

1974年11月，联邦法庭裁决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有罪，她共谋将半磅可卡因带到芝加哥，被判15年监禁——对那些实际谈判执行这宗交易的男性共谋者最严厉的惩罚，都比她少五年。联邦探员监视她个人，也在她男友罗恩·沙夫电话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知道她了解且赞成他的活动，而且自己也吸毒——这笔交易成交时，还和他一起去了迈阿密，但是她的律师坚称，她主要只是“坐车同去”，只是迷恋小她七岁的年轻的沙夫，她想要证明自己也能混进由他象征的时髦大胆的毒品文化。

她的长期监禁只是“暂时的”，可以大幅削减也许还会缓刑，前提是她能成为政府线人，供出其他相识的吸毒贩毒者的信息——联邦探员就是用这种方法劝诱一个毒犯供出波比·阿恩施泰因、罗恩·沙夫和其他年轻人的。这些使阿恩施泰因的律师相信，执法者比起惩罚她更想利用她，抓住那个他们怀疑是给了她毒品的人，即她的老板休·海夫纳。

好几年来，芝加哥的执法权力机构和宗教组织被海夫纳的享乐主义和膨胀的财富触怒，但他们迄今为止尚不能把他当罪犯监禁起来。1963年，《花花公子》中一张杰恩·曼斯菲尔德 [171] 的照片被认为淫秽，反

墮落小队于是带着搜查令强行进入海夫纳的宅邸，指控他出版下流杂志，真的把他直接从床上拖了下来，拘留在警察局。海夫纳交了保释金被释放，在接下来的审判里，陪审团花了很多时间才做出裁决，但他最终赢得了自由。

但是，针对他最亲密的雇员波比·阿恩施泰因的毒品案，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终于能约束海夫纳和他的影响力了，到如今，那次淫秽案逮捕11年之后，他的影响范围已经大到全国每个报刊亭都公开售卖他的杂志，甚至在非常保守的社区的杂货店里都有。休·海夫纳用一部分财产建立了基金会，游说议会把大麻合法化，并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压迫；联邦和州审查者的揣测是合理的，即使海夫纳本人可能不吸毒，他也经常邀请摇滚歌星、爵士音乐家和年轻的政治激进派参加派对，做东时的慷慨大方可能促使他迎合客人的习惯。在对海夫纳的调查中，打头阵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检察官詹姆斯·R.汤普森，他几年前在芝加哥曾经起诉过伦尼·布鲁斯，而在阿恩施泰因——海夫纳调查期间赢得媒体广泛关注后，他可能会成为下任伊州州长。

波比·阿恩施泰因被判刑一个月后，詹姆斯·汤普森传唤她和律师到办公室，告知他们，他从可靠来源得知外面有人“雇凶”想要她的命，警告她在保释期间不管“朋友或敌人”都不要相信。阿恩施泰因的律师认为，这是试图进一步惊吓已经非常害怕的被告，让她怀疑自己的雇主，也许想吓得她起来检举他。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它并没有成功；但是，尽管波比·阿恩施泰因毫不怀疑海夫纳持续的忠诚和爱意，她在宅邸里却开始感觉有些不安，当管家给她房间送来惯常的饮料和夜宵时，甚至有些警惕。

她已经很长时间以宅邸为家，但现在在那里她每天只要读报纸，孤立和不适就与日俱增，上面报道着，政府不断扩大调查至海夫纳的朋友、同事、宅邸员工、兔女郎，还有很多他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款待过的名人的私生活。调查也从卷宗中挖出一个叫阿德丽安·波拉克的兔女郎的案子，她1973年被怀疑死于安眠酮使用过量。尽管海夫纳声明从没见过阿德丽安·波拉克，尽管她死时正与吸毒的男友同居，报纸头条还是把海夫纳和她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且成立了另一个大陪审团重新调查波拉克案。

几十个人被讯问他们对海夫纳的看法，其中一个叫弗兰克·布雷迪，是《花花公子》的编辑，最近为这位出版商写过一本未经授权的自传；但讯问不集中于海夫纳有多大可能获取或使用毒品，布雷迪被问的主要是海夫纳的风流韵事，和他卧室里发生的事。其他被询问的人也收到类似的问题——似乎调查者急切地想把阿恩施泰因共谋案笼罩在性与毒品、墮落和死亡的氛围里。虽然海夫纳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免受贬低，他决意阻止任何调查者渗入他住宅的企图，他们可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藏一些毒品“栽赃”给他，日后再搜查出来作为指控的证据。在命令保安检查了两个宅邸每一个角落、缝隙和药品柜之后，他要求大门口的岗哨更加警戒，更彻底地搜查送货人、维修人员和其他通过侧门的外人。他

的工程师周期性地检查电话防止窃听，还电子“清扫”屋子和大厅，寻找“臭虫”^[172]的迹象。

在疑心越来越重的这段日子里，波比·阿恩施泰因愈发抑郁，等待上诉之际，她有两次服用了过量安眠药，需要去医院治疗。尽管海夫纳邀请她到环境更阳光点的加州办公室工作——自从凯伦·克莉丝蒂离开后，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那儿，他的律师却力阻波比住在洛杉矶宅邸，警告说她也许还在依赖毒品。当波比在芝加哥的密友、《花花公子》前雇员雪莉·希尔曼商量举家搬到洛杉矶，让波比和他们同住时，搬到西海岸似乎就很吸引人了；但波比还是反对，因为她知道在加州必须得开车。1963年出过一次车祸后，她就害怕开车，那是在肯塔基州，她驾车载着未婚夫，副主编汤姆·洛恩斯——《花花公子》主管维克多·洛恩斯的兄弟，撞上了路上一块凸起物，车被甩向路肩，然后撞到树上，洛恩斯的大众汽车整个翻了过来。她从车里被甩了出来，折断一条胳膊还受了其他伤；但洛恩斯被困在车里当时就死了。此后好几个月，波比·阿恩施泰因时常情绪消沉，白天黑夜都不能独自一人，因为她老是回顾事故，为未婚夫的死一遍遍自责。

不过，1974年冬天海夫纳提议她来加州找他后，她允诺新年假期一过就飞过去。1月的第二周，一个周六晚上她在雪莉和理查德·希尔曼北边的公寓吃晚饭，看起来对未来很乐观，也对官司的结果充满希望。她说自己不太可能被送去监狱。

凌晨1点半，一个朋友开车送她回宅邸，她查看了邮件后——没有新邮件，从值夜班的男佣那儿要了第五杯烈酒，端着回了卧室。喝了几杯酒后，她收拾好一个化妆箱，离开宅邸去散步。在往南几个街区的北拉什街，她推开年代久远的马里兰酒店的旋转门，50年代伦尼·布鲁斯在这家酒店的地下室夜总会演出时，观众中常常有休·海夫纳。在酒店登记簿上签下“罗贝塔·希尔曼”的假名，波比·阿恩施泰因乘电梯到11层楼，进屋后在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还上了两重锁插上门闩。透过屋里的窗子，她能看到那座37层的摩天大楼，楼顶巨大的文字招牌在夜空中闪烁：花花公子。3点过了一会儿，她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开车载她回家的朋友（他没有接电话）；一个打给宅邸，查看是否有晚到的邮件（并没有）；最后一个打给希尔曼的公寓，理查德·希尔曼接了电话，虽然雪莉已经睡了，他说可以叫醒她；但是波比和他说不用了，又加上一句“告诉她我打过电话就行”。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化妆箱里有装着巴比妥酸盐、安眠药和镇静剂的瓶子。每种都吃了足够致死的量后，她在酒店信纸上写下遗言放进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里面是无聊的解释信……”

第二天下午，酒店女服务员进不去房间，经理下令破坏门锁。波比·阿恩施泰因和衣躺在床边死去了。她的遗书这样开始：“这件事是我自己计划实行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我应该说明白，它绝对不是我的任何雇主的决定或行为——在我最近的困境中他们最为慷慨和耐心……”

遗书继续说：“虽然政府的‘明星’证人做了（伪）证，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运输和销售这件案子涉及的所谓毒品……还有一点，虽然我不认为说出来关系重大，但是休·海夫纳是——尽管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坚定正直、道德心不可动摇的人，我很了解他，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现在强加于他的罪行。”最后她补充道：“如果——像之前说另外一个人的那样——我的虚饰（或者心理捏造）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现在这件事令我安慰，知道这最后的决定——我自己的选择……是唯一一件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事……”

得知波比·阿恩施泰因自杀，悲痛愤怒的海夫纳飞回芝加哥；在宅邸主屋的壁炉边召开记者招待会，来的人挤满了屋子，会上他攻击检方，哀悼自己的朋友。他胡子拉碴双眼通红，读着一篇写好的声明：“近几周，有一系列针对我的耸人听闻的揣测和断言，即关于在花花公子芝加哥和洛杉矶宅邸所谓的非法毒品活动——企图把最近花花公子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可卡因共谋指控、芝加哥兔女郎阿德丽安·波拉克16个月前由于毒品使用过量死亡等事件与我联系起来。尽管我和这两个案子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在此事上不首先做任何公开声明，因为我们的法律顾问确信，我说的任何话都只会被利用，来进一步宣传——在我们看来——一项根本不合法的毒品调查，这项调查不如说是政治企图的反花花公子的猎巫行动。”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自杀使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沉默，”他继续说，“不管她在私生活中犯过什么错误，她本应有更好的结局。她本应得到——除了其他事项——和其他受到类似指控的公民一样公正的审判。但因为她和《花花公子》以及和我的联系，在这件她其实只是边缘人物的可卡因共谋案中成了焦点。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如果她为检察官提供了证据，支持任何针对我的严重的毒品控告，她根本就不会被起诉。她最终面临16年附条件监禁刑、长时间上诉的压力、政府检察官和探员越来越多的骚扰，这个已经情绪烦乱的女人到了忍耐力的极限——她自杀了……”

“很难去描述，在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审判和相关对《花花公子》的调查中，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氛围。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巫术审判中，审判官折磨受害者，直到他们不仅供认自己是巫师，还指控家人朋友施行巫术。以类似手段，毒品探员屡次任意、专横、反复无常地利用我们严厉的毒品法，以诱出审判中想要的证词。”海夫纳称波比·阿恩施泰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聪明、有价值的女性”后，他不得不停顿了一下。他的手紧握着讲台，流下眼泪，除了照相机的声音，屋里鸦雀无声。终于，他继续说：“以正视听，我从未使用过可卡因，或其他硬毒品 [173] 和麻醉剂——我也愿意为此起誓，如作伪证愿接受惩罚，如果这能结束毫无根据的怀疑和猜测……一些政府探员追查此案的狂热，更多彰显出控诉者的品性，而不是被控诉者的。似乎水门事件的‘黑名单’思维还阴魂不散；我们出版《花花公子》第一年就挑战的压抑的清教主义遗产，仍旧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怕敌人。”

很多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评撰稿人同意海夫纳对调查的批判，但还有其他报纸并不那么赞成，《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作者就指责海夫纳试图“通过新闻宣传避重就轻”。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詹姆斯·R·汤普森强调“没有人，包括休·海夫纳，高于法律”；关于回应“海夫纳被调查是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出版商”这种指责，汤普森评论道：“我不知道海夫纳本人近来代表着什么有何要紧——或者任何对他的起诉就有什么特殊意义。”

葬礼之后，对海夫纳和其同僚仔细彻底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司法部11个月后以证据不足宣布结束毒品案，媒体仍旧持续关注海夫纳和他公司的问题。报纸头版报道，《花花公子》杂志因为海夫纳的公众形象和毒品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广告收入；负面报道加上相信海夫纳的公司管理不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给海夫纳的信用额度降了两点，总价值达650万美元。这段时期，两个在华尔街有影响力的人退出海夫纳的董事会；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从1971年卖给股民的每股23.5美元，到1975年一度降低至2.25美元一股。尽管花花公子在英国的赌场——主要由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人赞助——每年盈利700万美元，尽管《花花公子》杂志就算月发行量降到600万份，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期刊，媒体仍旧不断强调，海夫纳的竞争对手销量盈利增加。罗伯特·古乔内的《阁楼》给读者“乐而忘忧的裸女照”，月销量快要达到450万份大关；拉里·弗林特的《风尘女郎》1974年6月起家，现在每月已经能卖出将近200万份——1975年6月，它发表了一系列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斯科皮奥岛上裸体晒日光浴的彩照，是由一个意大利摄影师蹲在渔船里用望远镜镜片拍摄的，令男性杂志市场目瞪口呆。

弗林特也打算在《风尘女郎》上刊印一张休·海夫纳和一个年轻女人做爱的裸体照，它从海夫纳芝加哥的私人档案中被拿走后，不知怎么被弗林特得到了。当海夫纳刚得知弗林特的打算——由《搞》的阿尔·戈尔茨坦泄露给了《花花公子》的主管纳特·莱尔曼，便催促莱尔曼联系弗林特要求返还照片，向其解释这是被偷的个人财物，未被授权的发表对牵涉的那个女人非常不公平。虽然莱尔曼和弗林特第一次商量后他的态度不明朗，莱尔曼感觉还是可以和弗林特说道理的。这个八年级就辍了学、极度贫穷的肯塔基州小佃农的儿子，用草垛上生命的临床特写镜头震惊了杂志界，并以此致富，如果海夫纳在洛杉矶宅邸宴请款待他，也许他感觉会被讨好；莱尔曼如此向海夫纳建议后，他提出了邀请，而拉里·弗林特欣然接受。拜访从始至终，海夫纳都魅力十足、关怀备至；把他的出版界同僚介绍给迷人的客人们，还亲自带弗林特参观宅邸和周围的庄园。尽管拉里·弗林特来的时候对海夫纳有所疑虑，怀疑他除了自私自利不会全心追求任何更高的目标，但是海夫纳用他的生命成就的事业，以及用他的钱买的东西，令弗林特印象深刻；走之前，作为友好的表示，拉里·弗林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交给海夫纳，并向他保证没有制作复本。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纳特·莱尔曼成功辅助了海夫纳，维克多·洛恩斯——花花公子伦敦赌场的总管，也被召唤回来缓解一些困难，特别是花花公子度假酒店和俱乐部的财政问题。最近四年，仅酒店一项就亏损超过1000万美元；加上花花公子俱乐部也无盈利——还有电影和唱片部门，1975年公司总利润从两年前的1130万美元降到110万美元。

维克多·洛恩斯是个富有的离了婚的芝加哥人，最近几年都住在英国乡间一栋庄园，由司机开着劳斯莱斯往返办公室，他47岁，自信务实，从来不在意花花公子同僚主管们的认可和喜爱；洛恩斯同意暂时离开伦敦的好日子，到芝加哥为海夫纳做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为自己身为花花公子第二大股东的利益考量。看到赌场的利润和《花花公子》杂志的盈利被一大堆散漫的附属机构吸走，洛恩斯烦透了；一抵达芝加哥，他立即开始向公司冗杂的部位开刀，几乎不在意在总公司人们都管他叫“大白鲨”。

知道海夫纳基本上快废弃不用芝加哥宅邸了，洛恩斯将员工人数从50名减少到12名；削减了芝加哥酒店和当地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服务职员后，他终止了在全国花花公子俱乐部成员间流通的杂志《V.I.P.》，由此公司每年节省了80万出版费用。洛恩斯把花花公子的名头从芝加哥、大峡谷和新泽西的酒店中去掉，力图吸引常规生意；而且，经海夫纳同意，不久就制订了计划，处理掉牙买加的度假酒店，剔除无利可图的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旧金山、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俱乐部。公司的唱片生意逐渐被淘汰，花花公子电影产业暂时搁置。尽管洛恩斯无权过问《花花公子》杂志的业务，因为亚瑟·克雷奇默——A.C.斯贝特斯基的继任者——对杂志有编辑特权；但洛恩斯在编辑办公室出现，就已经足够搅起一些编辑向海夫纳没好气地抱怨——虽然海夫纳一直是同情的倾听者，甚至有时自己也对洛恩斯专横的性格颇有微词，却暗自支持他的行动，只要这些不特别影响到海夫纳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行。

海夫纳已经削减了自己25%的工资，将30多万美元年薪降到23万，还放弃了三个总价值120万的半年期股息红利，将之转入花花公子其他股东账下，海夫纳相信，为了公司的清偿能力，自己已经牺牲得够多了；当 he 从报纸上听闻，洛恩斯宣布也许要卖掉芝加哥宅邸和海夫纳的飞机，这个震惊的出版商就不那么钦佩洛恩斯削减成本的才干了。

海夫纳私下责怪洛恩斯后，公开否认了报道；芝加哥宅邸仍旧在他监管之下，准备好了一箱箱清凉的可乐等待他不定期回来，同时海夫纳固执地抱住他最喜欢的玩具——花花公子飞机，它现在正闲置在加州大太阳下，因为一旦起飞，为维持其运转，公司每天至少要花费1.6万美元。但是当公司接到500万美元的报价，买这架飞了5年的飞机，海夫纳务实的德国基因压过了他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主义，他感到不得不同意卖掉它。尤其是，新主人会把这架黑色的飞机漆成别的颜色，不会利用它曾属于花花公子这件事来牟利，而且它也会去远离美国国境的地方飞

行。买下“兔老大”的是委内瑞拉政府。

但是，DC-9的所有权正式转手时——海夫纳从飞机上取回他的立体声设备、飞行长袍和睡衣，还有大小与圆床正合适的塔斯马尼亚 [174] 负鼠毛床罩，仍旧是洛杉矶宅邸悲伤的一天，无论对休·海夫纳，还是他那些习惯了在奢华环境中免费快乐旅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看到花花公子飞机最后一趟从洛杉矶飞行之后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沮丧。

它被飞到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在那儿，专门的工人如期完全毁坏了内部，拆除了华美的座椅、海夫纳的下沉式淋浴和他特别的圆床。在海夫纳安装了桌游和舞池的走廊里，工人们现在用螺栓固定住将近100个排列整齐的标准乘客座椅。飞机被重新漆成白色，机身外那熟悉的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现在变成了委内瑞拉的七星旗。

1976年最终到达委内瑞拉首都时，这架DC-9看起来和其他民用通勤机没什么两样；不久之后，审慎严肃的官僚商人们每天乘它往返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肘挨肘挤在一起的乏味机舱曾经是个欢乐场，满是开香槟酒塞的砰砰声、笑声、穿着丝绸衬衫的骄奢逸乐之徒和健美丰满不穿胸罩的双陆棋手。

虽然海夫纳经常观看那些展现他登上黑色飞机、在空中狂欢畅饮的自拍影片，来和他过去的飞机保持精神联系，但在1976年3月，多少幻想和追忆都无法安慰他了，为了参加纽约翻新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业庆典，海夫纳和随员被迫在芝加哥机场手持机票、排队等候登上一家商用飞机，而飞机预定好的行期绝不可能受到《花花公子》出版商的睡眠习惯或心情的影响。因此，不仅海夫纳，还有他被惯坏很久的同行者们，在这趟旅行中都需要做一些心理调节；尽管他买的每张票都是头等舱，确保了十个朋友有足够的空间（不过有三个头等舱座位已经提前卖给了从圣阿尼塔到加州高架渠的赛马骑师），但在他们坐好、打开双陆棋盘前，休·海夫纳还是挤出来一个微笑对人群说：“不知怎么地，我觉得我应该道个歉。”

但是除了飞行本身，纽约之行让海夫纳非常满意。数年来第一次，《花花公子》获得了媒体的赞许。改造后的俱乐部位于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交界处，它漂亮的外观、一流的美食和娱乐表演广受赞誉，几十个摄影师在拥挤的酒吧和舞池里穿梭，给所有人——从霍华德·科赛尔 [175] 到伦尼·布鲁斯的母亲——照相。虽然穿着白色新西装的海夫纳和穿着黑色长裙的芭比·本顿是男女主人，但更多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却指向了海夫纳身边光彩照人的年轻棕发美女，她微笑着，机敏的黑眼睛和他很像——她是他23岁的女儿克里斯蒂，某种程度上，纽约的那一晚是她的亮相派对。

从布兰迪斯大学以最优等 [176] 成绩获得英语文学学士一年后，1975年，克里斯蒂·海夫纳作为初级经理进入公司，她已经向芝加哥很多

心怀疑虑的《花花公子》编辑证明，她有机敏的头脑和成熟的性情，有能力和欲望学习，而且从不因为自己是老板的女儿就期待或想要特殊照顾。尽管在花花公子大厦中，特殊照顾不可避免——尤其是她父亲已经公开声明，有天她也许会接管公司，克里斯蒂的机智敏锐，让一个很容易引起怨恨的局面向最好的情形发展；到纽约开业庆典的时候，她已经赢得了父亲几乎所有同侪的善意和尊敬。

在纽约接受的采访，以及随后在全国其他城市的采访中，克里斯蒂·海夫纳把媒体的注意力从对《花花公子》的批评报道转移到她的个人经历和突然晋升这件事上——《时尚》杂志称她的职位为“兔子继承人”。作家朱迪·克莱斯露德描写她拥有“十大啦啦队队长那样生机蓬勃、精心打理的面庞，还成了布雷克香波的代言女孩”，克里斯蒂明显是那种会吸引她父亲的类型；她自己承认和父亲相互吸引，更像是浪漫而非家人关系。

在克里斯蒂少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实际上是个陌生人，像某种隐居的叔父，过着神秘奢华、声名狼藉的生活，让她觉得既诱人又困惑。克里斯蒂2岁时他搬了出去，1960年母亲再婚后，8岁的克里斯蒂和5岁的弟弟改姓继父的姓，她静静地住在威尔梅特北岸社区，并不快乐。克里斯蒂上高中后，偶尔可以去宅邸拜访父亲，坐在那儿对他非凡的玩具和女人们惊叹不已；但是直到上大学，她才能够和父亲深入交流，认出和欣赏他们两个身上类似的特点品质。像他一样，她头脑敏捷，智商很高，自我意识很强，而且一定要成功，也信奉个人主义和性自由。

在布兰迪斯的第一年，她开始和在校园遇到的一个男同学同居；虽然克里斯蒂假期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还和他睡同一张床时，她妈妈最开始很不高兴，但她父亲见过克里斯蒂的朋友后，倒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这段关系，而且更愿意相信，女儿快乐的私生活会促使她学业有成，1973年6月，克里斯蒂最终入选ΦBK协会。

入会时，克里斯蒂坚持在名誉榜上将她的姓写作“海夫纳”，这让她的父亲心花怒放；1974年从布兰迪斯毕业后，她在波士顿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她男朋友去了乔治城大学继续读法学院，后来她接受父亲的聘请回到芝加哥，在花花公子大厦里做他的特别助理。工作第一年，她定期拜访公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赌场和俱乐部，参加商务会议，熟悉公司结构和各部门主管。她也参加办公室派对和会议，和父亲一样，不遵守那些劝阻同事间性行为的格言。她和公司里一个责任广泛的上级主管短暂交往过，她父亲完全知晓，但不大支持。实际上，海夫纳对他女儿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比对那个年长的男人更有信心；这段关系最终友善地结束了，结果没有造成任何公司混乱或自我受伤的迹象，让海夫纳松了一口气。在她那一边，克里斯蒂·海夫纳毫不迟疑地告诉父亲，自己对他那些年轻女朋友们的看法；虽然她的观点从不苛刻，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客观，但她相信，没有一个情人在他生命里真像他愿意想的那么重要——在她看来，她们没有一个在智识和本质上比得上那

个曾是他妻子的女人。

克里斯蒂和父亲的团聚，完全没有减损她和母亲米尔德里德之间密切的联系，她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每周都见面，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喜爱；她知道父母再婚非常不可能——就算母亲1971年已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已经和一个小她12岁的迷人美发师深深坠入爱河三年，现在正在同居。但是，克里斯蒂确实成功强化了本已疏远的父母间的友谊纽带。在克里斯蒂的建议和鼓动下，7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了一些海夫纳家庭团聚，把她父母和他们年轻的情人带到同一屋檐下；她住在阿斯彭的离异的叔父基思，通常由他滑雪胜地的一个小明星陪着；她上大学的弟弟戴维，是个有抱负的摄影师，保留了前继父的姓；她自己的伴侣总是个年长点的男人；还有她头发花白、观念保守的祖父母格伦和格蕾丝·海夫纳，他们似乎很享受团聚，但私下里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有智慧。老海夫纳夫妇坦承一生没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结婚50多年之后，他们说自己无怨无悔。虽然格伦·海夫纳通过投资儿子的股票，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多年来帮助审计公司账目，但他表示自己这辈子一次也没有看过《花花公子》中的裸体照片。他强调自己爱读的杂志只有《财富》和《商业周刊》。

除了少数中层行政人员暗地里提及裙带关系，克里斯蒂·海夫纳在公司里的第三年被宣布晋升为副总裁时，花花公子大厦上下洋溢着庆贺的氛围，这样，她26岁时年薪已经将近5万美元；甚至那些认为她晋升过快的员工也不得不承认，比起其他任何人，她更有效地改善了《花花公子》的公众形象，把它从毒品调查、股票下跌和波比·阿恩施泰因去世时那段阴沉的日子里解救了出来。

但是，和她成功吸引媒体注意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与她无关的事件，也帮助公司在广告公司、银行家和投资者那里恢复了声望。例如，杂志持续购买和出版享誉盛名的作家们——约翰·契弗、欧文·肖、亚历克斯·哈里、大卫·哈伯斯塔姆、[\[177\]](#) 索尔·贝娄——的杰出作品，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迟来的赞誉；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制造新闻的《花花公子》访谈，它采访的对象包括被罢免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 [\[178\]](#)（他失踪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还有未来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的坦白让杂志和自己都成了世界头条：“我曾经充满情欲地看过很多女人的照片。在脑海里犯下很多次通奸罪行。上帝知道我会这样，而他原谅我。”

1976年海夫纳决定，从拥有32份报纸的奈特——里德集团挖来顶尖的报业经理德里克·J·丹尼尔斯，任命他为首席运营官，这也被证明是明智的举动；因为德里克·丹尼尔斯头脑格外清晰，擅于解决有些混乱的管理问题，他在维克多·洛恩斯已经采取的措施的基础上找到进一步节省开支的方法，又不严重影响员工士气，或者损害公司已经获得的利润。最显著的盈利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广告收入，尽管它现在月销量停在了500万份大关，但广告收入马上就要达到创纪录的每年5000万美元，比

最接近的竞争者《阁楼》多了整整一倍。公司的另一份杂志《是！》也开始获利，酒店——俱乐部的亏损逐渐减少。虽然由于一些部门和附属机构被整顿或解散，丹尼尔斯上任头两年，有将近100个职员或者被解雇或者退休，但丹尼尔斯并没有主张保守或防备性的政策。他认识到，一个生气蓬勃的机构，有时为了更高的利润必须冒险，丹尼尔斯管理下的花花公子企业公司，1980年末计划在大西洋城修建开办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酒店赌场，在那里，赌博近期刚被新泽西州立法院宣布为合法。一来是因为“国际度假村”建立的第一个赌场财源滚滚，二来花花公子在英国赌场的成功，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上涨到16美元一股。

完全归功于丹尼尔斯决议的举措，包括擢升克里斯蒂·海夫纳为副总裁；而且丹尼尔斯虽然如摄政王般代她主事，却也让克里斯蒂主管花花公子基金会（每年为公民自由事业和医药——性研究捐赠数千美元）和公司的宣传推广部，她的责任包括在广告团体前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和去全美各地接受媒体采访。

女记者最经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问她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她宣称自己是热心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为何要在一个以贬低女性身体来积累财富的男性沙文主义公司工作。克里斯蒂·海夫纳否认将女性描绘为性感尤物有什么贬低女性的地方，声称性爱和智识、独立性一样，是女性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当采访者提及《花花公子》里有张照片表现一个裸体女人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阴蒂上，问那有没有剥削女性身体，克里斯蒂回答：“我不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她指出，“女性第一次被表现成和她们自己的身体亲密接触，这正是女权运动想要做的。”

她强调，《花花公子》从不把女人和链锁、鞭子和其他古怪装备拍在一起——但很奇怪，她在像《Vogue》这样的女性高级时尚杂志里却会看到，克里斯蒂·海夫纳追述道：“女权运动有影响力后，某段时间有一种氛围，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你就得穿牛仔裤和军靴。所以突然之间，裸体和性爱成了剥削女性。运动中也有一种反性爱、反男性的偏见很严厉地攻击《花花公子》，因为它很明显非常倾向于同性恋，非常倾向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是她继续说，她看不出《花花公子》和女权主义有何本质上的矛盾；对她来说，女权主义代表在生活中拥有大量机会和选择，她强调，告诉女人她们不能裸体——像一些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者现在力阻的，像男性审查员和神父阻止了几个世纪的——和大部分女性解放论者所寻求的独立自主等目标相悖。虽然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花花公子》对女性性质的表现视角有一定局限，但她强调，这是一份男性杂志，它的任务不是展现身为女性的众多复杂面向，就像美国的女性杂志也不想展示男性的复杂性一样。事实上，大部分女性杂志“甚至都不涉及女性的复杂性”，她说，补充到，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变《家庭圈》杂志中女性被表现的方式。

1978年12月，《花花公子》杂志庆祝出版25周年纪念；接下来的

几周里——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举办了一系列派对、晚宴、迪斯科舞会、宴会和其他盛大庆典，共花费了公司100多万美元，全部是由克里斯蒂监督组织的，她现在无疑是休·海夫纳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芭比·本顿仍旧是好朋友，但是28岁的她感觉在海夫纳的乐园里已经停滞不前，决定完全住回贝弗利山的公寓，并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凯伦·克利丝蒂回到得州之后，于1976年和1977年去洛杉矶拜访过海夫纳，最近也写信告诉他，自己刚刚在达拉斯和巴尔的摩小马队的后卫艾德·西蒙尼尼结婚。海夫纳的前妻米尔德里德和年轻的瑞士裔美发师皮埃尔·罗尔巴赫愉快地同居多年后也决定结婚；而52岁的休·海夫纳正在追求最新的女主人桑德拉·西奥多，《花花公子》上22岁的金发的7月小姐，她混合了芭比·本顿和凯伦·克利丝蒂，还有其他邻家女孩的气质，她们都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和改变，但是在海夫纳心里永恒常青。

410页的《花花公子》周年纪念版里有杂志历史上所有玩伴女郎的照片，休·海夫纳在出版人寄语中回忆道：“当我25年前设想这样一本杂志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被仿效、最有影响力但又争议纷纭的出版物之一。50年代早期是一个顺从和压抑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乔·麦卡锡议员的时代，这是20年大萧条和战争的结果。但是，那也是美国再度觉醒的时期——重新强调在自由社会中个人的重要性、权利和机遇——一个财富和闲暇时光不断增加的时期。我想要出版一份既影响到，也体现出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性观念变迁的杂志，但是它首先必须有趣。《花花公子》想要去回应反驳我们的清教遗产中压抑的反性爱、反嬉戏享乐的那一面，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远大梦想。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因为想要提薪五美元的请求被拒绝，愤而辞去为《时尚先生》做推广文案60美元一周的工作……”

1979年1月11日周年纪念闭幕式上，数百名嘉宾汇聚于纽约中央公园绿苑酒廊饭店，在他们面前，一位发言人——《时尚先生》的代表——站起来，赠予休·海夫纳一张放大的五美元钞票复制品，以纪念几十年前被如此坚决拒绝的那次加薪。

我们必须将女性贞洁作为最有价值的国家财产来培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是孩子真正的父亲，是在为自己的血肉卖力工作。没有这项保证，就没有可能有稳固的家庭生活，而这是国家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是为何法律和道德在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方面，对女性的要求比对男性更严格，并不是因为男性的自私。女性自由会造成的后果比男性自由要严重得多。

——麦克斯·格吕贝尔，德国卫生学家，20世纪20年代

女性解放的众多议题中，我个人解放的两个主要前线阵地是性和经济。归根结底二者不可分离——只要女性生殖器对女性来说还不具有性价值，而只是具有经济价值。把我的性爱留给情人/丈夫是我给他的礼物，用以交换经济保障——这被称为“重要关系”或“婚姻”。我的未来取决于，找到可以用性和爱的礼物永远占有的合适伴侣。

在一个两性间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加上对性浪漫化的想象，我被迫用阴道交易以期获得财政上的安全。这种情形下的婚姻是一种卖淫。

——贝蒂·多德森，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

贝蒂·多德森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转变成自由的个体，于是毫不奇怪地，她日日夜夜拜访砂岩隐居地，这和她称为“生殖器女性”的演变是合拍的。尽管多德森女士很久之前在词典里发现，“生殖器”（phallus）的定义同时指阴蒂和阴茎，这一点在当前世界里几乎没机会被大众接受，在她看来，“很多个世纪以来否定女性生殖器，是男性统治和女性臣服的精髓”。部分为了补偿，部分因为她涌现的性欲天性使然，贝蒂·多德森作为画家和作家，近些年致力于向一个想要掩藏女性性形象的社会展现这种性形象。

甚至在她拜访砂岩之前——在那儿，她遇到和她一样的生殖器觉醒的女性主义者，贝蒂·多德森就已经在纽约的公寓为女性组织研讨会，分期进行意识觉醒的练习，鼓励参与者毫不羞耻畏怯地仔细观察自己和别人的阴部。用镜子自我观察，然后轮流张开腿被别人观察，女人们惊讶

地发现，她们生殖器的形状、布局、质地和图案如此不同：一些是心形的，另外一些像贝壳、肉垂或兰花；把阴毛和阴道上方的皮肤向后推，完全显露出阴蒂时，很多女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女性性兴奋的核心，诧异地发现，阴蒂的大小形状从凹进去的珍珠到凸出的子弹，不一而足。

女人们也学到，阴蒂相对于阴道口的位置人所各异，大小阴唇的颜色也从深棕到浅粉各不相同。在多德森女士的建议下，女人们不仅观察也用手触摸、嗅闻、尝尝自己的——有时还有朋友们的，试图克服童年时的压抑以及将这片区域视为邪恶、不洁、诅咒之地的《圣经》传统。

贝蒂·多德森的公寓墙上，挂着一些她巧妙描绘女性生殖器的画作，有时为了启发人们也为受到钦佩，她会放一些表现裸体女人毫不羞怯地显露自己的彩色幻灯片，上面展示出一种贝蒂·多德森称为“阴道主动”的态度。大部分参加她研讨会的人和她一样，是中产阶级异性恋或双性恋的女人，30或40多岁，离异或仍旧结着婚，而且她们尽管支持女权运动，却不同意一些激进分子反性爱、反男性的倾向。作为一个画作被骂为色情的艺术家，多德森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为助纣为虐、贬低女性；但是多德森从未为她的作品辩护过，只评论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于性只有负面经历，那么可以理解，她看到一张关于性的图片会感到被贬低。”

贝蒂·多德森魅力十足精力充沛，留着假小子一样的黑头发，常常裸着矮小健美的身体在门口欢迎访客，她1929年生于堪萨斯州圣经带的威奇托市，在对婚姻和忠贞的理想主义的观念中长大。青少年时期，她会一边想象着新婚之夜一边自慰，想象自己是优雅的新娘，穿着精美的蕾丝长袍晨衣，沉着自信地穿过卧室，走向一个倚靠在她婚床上、没有面目的朦胧的男性形象。当她把长袍褪到地板上露出裸体娇嫩的身体时，她达到渴求的高潮。

虽然青少年时她私下承认，这些独处时的欢愉是邪恶的，意志却无法抗拒，即便她怀疑自己自慰成瘾正在让阴唇变形。她有一天借了妈妈的大象牙手镜，在关上门的卧室里张开双腿，就着窗户透过来的光检查阴部，之后她得出了这个结论。带着惊恐忧虑，她注意到小阴唇伸长了，这让她确信自己是自读的受害者。她立即起誓一辈子都不再这样了，不过只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但她倒是确实更改了方法：觉察到左边阴唇比右边的短点，她之后就只抚摩左边的，希望到时候阴唇能长成一样长。虽然情况没什么改善，刚成年那段时期在堪萨斯州做报纸艺术家时，她还是一直以这种方式，1950年搬到纽约，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国家设计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她也只摸左边。

结婚后她抛弃事业，为讨丈夫欢心做全职主妇，在持续五年的婚姻里都保持忠贞不贰；但是和一个早泄的丈夫的夫妻关系，基本上无法满足她，于是自慰继续是她主要的乐趣来源。但是1965年离婚后，贝蒂·多德森和情人们终于可以享受完全的满足；在她1974年出版的一本叫《解

放自慰：自爱沉思录》的书里，她回忆起一件对她的性解放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当我离了婚，重新进入风流浪漫、烛光晚宴和深肤色英俊陌生人的世界时，我非常兴奋，开始参与所有现在近在眼前的历险……（而且）我过于在意自己长得怎样、怎么处理性爱等问题，这羞得我几乎不能动弹。

我最初的一个情人深深地欣赏女性阴部。有次我高潮过后，他说：“你的阴道很美。让我看一会儿。”哦天哪……哦不，我感到心里一沉，和他说最好不要……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显然我脸色有点发白，说我有那些可笑的小阴唇，像小鸡一样垂下来，很不幸是小时候自慰的后果。深信我的阴部绝对不漂亮，我不是很想让任何人看到它。“哇，”他说，“很多女人都是长成那样的。完全正常，而且事实上，那是我引最喜欢的几种阴部之一。”他去小房间拿出一摞有女人胯部照片的杂志。42本街头色情店卖的海狸书。（“海狸”是女性阴部的俚语，“分裂的海狸”指一个女人用手把阴部张开。）我很震惊，但也很感兴趣。我想那些可怜的女人穿着内衣、吊袜腰带、黑色网袜，不得不那样裸露自己，是多么侮辱人格，但我还是开始看那些照片。确实，一个人的阴部和我的一模一样，然后又发现好几个一样的。我们一起看了几份杂志后，我对女性性器是什么样的有了个概念。真让人宽心！那一次我弄明白自己没有畸形，看起来不可笑也不丑陋……我很正常，而且像我的情人说的，其实很美丽。

被性方面新的信心鼓舞，她的艺术作品也越来越性感，1968年——这一年，裸体在先锋戏剧、电影和反主流文化中正流行，她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威克沙姆美术馆开办个人特展，两周展期内吸引了8000多参观者，他们全神贯注，红着脸欣赏她生机勃勃的描绘，那些大幅裸体画像中的人物相互抚摸或亲吻，还有几幅是在做爱。这次展览吸引了很多人——那些认为自己是曼哈顿上城人的人、艺术赞助人、上流社会的自由主义者和嬉皮士的父母，评论家赞赏她古典的构图、创造性的掌控力和天分。不害羞的崇拜者买下她很多画作，还有一些作品计划在艺术选集中发表，这让她更加高兴。

接下来，她在威克沙姆第二次为期两周的展览却没有那么成功，只有3000名参观者，但她一点也不沮丧。第二次展览中她投注了更多心血和感情，艺术上更相关更不妥协，描述的是独处时的性和变态行为。她为威克沙姆准备的30幅画作里有素描有油画，画中裸体人物有的在自慰，有男人相互之间口交，一个独处的黑人爱抚变大了的下体，白人女人阴蒂挺起、温柔地抚摸对方的下身，还有女人和男人貌合神离地性

交。有些女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冷漠、极度痛苦甚至狂怒，无疑，像任何同时代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一样，多德森在戏剧性地说：在采取了避孕措施的社会里，两性间的战争仍在持续，美国卧室里仍旧有很多疏离。不仅她心里确信这是真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因为她常常从聚在作画前的人群中无意听到类似的评论，或者人们——大部分是女人——在美术馆角落里静静地告诉她类似的事。尽管一些女人坦白，在婚姻关系里她们几乎没有或从来没有过高潮，她们也承认自己太困窘了不敢自慰，或者害怕如果使用按摩棒会“上瘾”。一些男人察看女性自慰的画作时承认，他们不知道女人也会这样，另外一些男人被刺激到，说出怀有敌意的话，尤其是看到一幅六英尺长的画，画中描绘一个金发女人躺着，双眼紧闭用按摩棒自慰。“如果她是我女人，她用不着那东西。”一个男人说。

展览的负面反应并没有使多德森畏缩不前，她和女性主义追随者们变得比原来更加深信，接受手淫和毫无负罪感地进行自慰是女性性解放的核心。“如果我开始前有什么疑虑的话，在美术馆的两周让一切都清楚了，压制和自慰有直接关系，”多德森在她的书里写道，“那么，自慰对于逆转整个过程和赢得自由解放就很重要。寻求性满足是一个基本的动力，而手淫当然是我们最初的自然的性行为。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发现自己的性爱倾向，学习产生性反应，学习爱自己并建立自尊心……当一个女人自慰时她学会爱自己的性器官，享受性和高潮，而且变得对此精通和独立。我们的社会很不适应精通性爱又能独立控制它的女性。”

贝蒂·多德森坚称，女性结婚时放弃本姓这件事意味深长，补充道：“她放弃的其实是自己的身份”；而大部分中产阶级女性在性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她们也常在女儿身上强化这种压制，造成双重标准的延续，也让多数已婚妇女不能“将女性身体开辟为力量、自豪、欢愉之源”。贝蒂·多德森也强调，社会压力让女性去符合男性所定义的“体面”，以免这些女人像“妓女或荡妇”那样遭到社会排斥，而妓女和荡妇正是很多男性道德伪君子光顾资助的对象，结果常常是女人在性方面变成了“残疾”：“我们的骨盆被严厉地锁住了。我们的肩膀僵硬向前。我们的阴部令自己厌恶，永远是不适感的来源。我们肌肉松弛、脂肪过多。这个体系阴险的地方在于，结果是我们接受了自私自利的男性所定义的‘正常’女性性欲。我们暴烈地或阴沉地压抑自慰以及公开展示健康的女性性行为。这一点上，是我们自己装饰了自己的基座，我们成为社会卫道者……成为无性的母亲和家庭奴隶。”与之相反，多德森在《常青书评》杂志的访谈中表明：“如果女人们联合起来对性说‘是’，我们会发现，男性和我们一样对性紧张焦虑，只是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一点。因为女性表现出来他们对性所有的恐惧和保守，男人在性方面就可以感觉且表现得非常主动。无意中，他们依赖于我们说‘不’、我们的迟疑、担忧或被动。”而且当男人在床上不能满足女人时，多德森在书中写到，他们会辩解是因为女人太冷淡，即使这些女人其实能用自慰满足自己。“如果一个女人能将自己激发到高潮，她就是性欲旺盛、性功能正常的，”多德森声称，“‘冷淡’是男人的词汇，要是个女人只获得那种对男性有用的刺激、用传教士体位在五分钟之内不能达到高潮的话，男人就这样说她。

我们不能再固守‘应该’只从性交中获得高潮这种观念。而且我们不能被穿白大褂的大男子主义者吓到，他们仍旧说女人‘性交无能’，而他们自己的实验和数据明显驳斥了这种男性对女性反应的定义。事实是，几乎没有女人能始终在没有其他刺激的性交中获得高潮。要想自由解放，女人必须能自由选择 and 表达她在性行为中的喜好，对什么时候该轮到她也不会有偏见和裁断。”

贝蒂·多德森公寓里的性聚会上，男性朋友和丈夫常常被邀请，那里可能有从瑜伽到群交的各种活动，在那里，女人通常无拘无束，完全能够——用多德森的话说——“负责操”。通过参加她的研讨会，女人们培养出主动性交的自信和能力，告诉情人她们想要怎样被触摸，喜欢多少压力，偏爱什么体位，甚至跨坐在男人脸上控制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发现，男人也常常喜欢转换传统角色成为被动者。多德森很多女性朋友表现出的“阴道主动”的态度，不仅提升了她们的性生活，还提高了她们整体的自我价值感。像多德森一样，一个女人很多年前认为自己的阴部畸形丑陋，多德森的女性阴部彩色幻灯片让她相信，自己和大部分女人一样迷人；第二天在办公室她泰然自若信心十足，要求加薪——然后成功了。

尽管贝蒂·多德森了解团体里女人的进步，也为她们骄傲，但她没有天真到认为她们能代表70年代的美国女性，那时的女性中有很大部分仍旧反对女性的平权修正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甚至是否想要在传统婚姻体系外，过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独立生活。多德森承认，在性方面女性不像男性那样自发天然，但她再一次认为，这是历史上长久的双重标准处境造成的结果；直到传统改变，直到更多女人可以享受一夜情和“开放性”的婚姻——男女在婚姻结合外都有萍水相逢的性行为，在那之前，太多女人很大程度上还是会一直依赖丈夫或一个情人，而不是她们自己，来获得性、经济和情感上的满足。“在任何生活处境中，成为你之所是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贝蒂·多德森说，而且“当你进入多种多样的性爱关系，你必须像男人一样，在社会层面上面对自己达到高潮的潜能”，换句话说就是，性爱关系对女人来说，要较少局限在“重要关系”里，要更多是为了乐趣和消遣、试验和体验。“只爱一个人是反社会的，”多德森说，这和100多年前奥奈达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表达的观点一样；她补充道，“这是很美的概念：社会性的性爱，其愉悦背后是对生命的认可，而不是建立在经济 and 权力上的性，不是买卖、操纵你的性器官。”

但是问题还在，美国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让一个有冒险精神的女人体验男人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当然有不胜枚举的性俱乐部，但这些通常是在过度拥挤的郊区房子里，拉着窗帘偷偷摸摸的聚会，被爱管闲事的邻居投诉后，还会频繁被警察突击搜查。的确，也许全国唯一一个女人可以在舒适开放的环境里纵情于娱乐式性爱的地方，就是砂岩隐居地；贝蒂·多德森在加州长期旅游时第一次拜访那里时，她高兴地发现，它和西海岸的朋友们说的一模一样。庭院非常美，作为背景的山顶远得恰到好处，它的男女主人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婚姻显然是两性平等的缩影；这是两个忠诚的人的结合，对他们来说通奸不是禁

忌，也从来没有必要撒谎。

砂岩的几百个俱乐部成员中，有一些是贝蒂·多德森在纽约派对上见过的熟悉面孔和身体，成员中也有她的好朋友兼女权主义姐妹：人类学家萨丽·宾福德。在砂岩的日日夜夜里，多德森也结交了其他朋友，最有趣的是个灰头发的英国绅士，她一天晚上在楼下“舞厅”时第一次注意到他。那时她裸体和两个也裸着的男人躺在一张垫子上相互轻轻按摩，快活地投入其中；但是她没法不注意到，一个独自坐在屋那边的男人正牢牢地盯着她，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像猫头鹰一样的男人，而且虽然她看到了他在观察她，他却似乎一点也不难堪。终于她向他招手，挥手让他加入进来；他毫不踌躇地站起来照做了。当他走过来坐在她旁边，她伸出手打招呼，然后把他的手放在自己双腿间，这时她意识到，他的手上少了手指。这是贝蒂·多德森和美国当时最成功的性作家和性观察者亚历克斯·康福特医生的初次见面。

不常来砂岩的访客也许会觉得不太可能，砂岩隐居地的“舞厅”除了有不断交换舞伴的性爱玛祖卡舞，也是一个可以点燃和陶冶爱情的地方——而这正是砂岩最老练聪敏的女人萨丽·宾福德博士愉快的经历。历经三次离婚、丰富多彩的风流韵事、在她教人类学的校园附近各种各样工作后的狂欢，还有在不那么圣洁的砂岩消遣嬉闹之后，萨丽·宾福德一天在“舞厅”认识了一个英俊敏锐的特色配角演员杰瑞米·斯莱特，他出演过几部好莱坞电影，1970年和一个洛杉矶记者约会时知道了砂岩，那位记者写过一篇关于威廉森的文章。

40多岁的杰瑞米·斯莱特六英尺高，蓝眼睛，有着优雅的运动员般的身体，幽默感也同样优雅，他1958年在纽约舞台上开始演艺事业，出演百老汇版托马斯·沃尔夫 [179] 的《天使，望故乡》中一个重要配角。那个舞台剧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在剧中的表演也帮他进入了好莱坞，之后十年，他参演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在CBS电视剧《马利布快跑》中饰演一个潜水员；在《太空人》中表现了一位运载火箭舰长；在《辩护律师》和《裸城》等节目中友情客串。斯莱特在约翰·韦恩 [180] 主演的电影《大地惊雷》中是一个亡命之徒；在威廉·霍尔登和克利夫·罗伯逊 [181] 主演的《魔鬼兵团》中饰演一个加拿大飞行员；在其他很多像鲍勃·霍普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182] 这类明星主演的动作片、西部片和喜剧中出演配角。1968年他和第二任妻子演员塔米·格兰姆斯离婚后，在拍摄关于地狱天使摩托党 [183] 的电影时，因摩托车事故受了伤；之后的八个月，他的一条断腿包在40磅重的石膏里，与世隔绝般地住在月桂谷的公寓，沉思冥想、吸烟锅和自慰——一个配角多年来头一次无人相配，没有角色、导演和可控的脚本可以依靠。

就是这段时期，斯莱特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包括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又能灵活行动之后，他决定将精力多花在整理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上，对东演一个角色西演一个角色不再那么上心。他把新公寓搬到威尼

斯海滩一个由艺术家和嬉皮士组成的社区，不再每天浏览好莱坞行业报纸，也不去原来常去的演员酒吧，而是开始对和平运动、反主流文化和新生活方式感兴趣。他那时候约会的年轻女人中，就有告诉他威廉森和砂岩的那个记者；将信将疑地，他答应陪她去那儿，想着和裸体的人们混在一起也许会挺有趣。但当他开上弯曲的山路到达山顶，参观了庄园和它随心所欲的主屋，在楼下朦胧的光线中瞥见勾人性欲的身体后，他几乎觉得头晕目眩，强烈地局促不安——和女友尝试做爱时都不能勃起了。

然而他没有气馁到不再回来，因为他确实享受在户外裸体；当他渐渐和其他人混熟了，自己也更舒坦了些后，就开始陶醉于砂岩女人们主动的性接触，其中一个女人是萨丽·宾福德博士。尽管斯莱特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吸引，随后在舞厅一起做爱也让他狂喜，但性爱游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能在一起的借口，在拥抱中他们在探寻双方都感受到的更深层次的亲密。两个人都是四十五六岁，之前都更喜欢年轻得多的人，用性爱来逃避生活中在智识方面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他们对同辈人的价值观幻想已经破灭了多年，有时认为他们这一代整个就是物质享乐、种族歧视、警犬和燃烧弹的集合，但现在，他们大喜过望地在对方身上发现了一个同是50年代“辍学生”的同伴。虽然萨丽·宾福德比斯莱特在洛杉矶反战运动中更活跃，但他不久就和她一起参加集会和游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共谋者安东尼·拉索在五角大楼文件争议中被捕后，杰瑞米和萨丽一起去离砂岩有一小时车程的终端岛联邦监狱探望拉索，在拉索下狱前砂岩还为他组织了告别狂欢。

事实上，正是在拉索派对后，杰瑞米和萨丽开始在威尼斯海滩同居；因为她不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他也不再当演员，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全国任何想去的地方，1972年，他们在旧金山湾区住了几个月，经济上他们依靠积蓄、杰瑞米原来作品的重播费和他写的两首乡村——西部畅销歌曲的版权费——一首写给特克斯·里特尔的歌叫《月亮之外》，另一首和葛伦·坎贝尔共同创作，坎贝尔著名的《加尔维斯敦》唱片引起的热情减退后，它就上市了；这首歌叫作《为何每次我痒，我都会挠你？》。

1972年晚些时候，杰瑞米和萨丽临时搬到佛蒙特州，之后九个月，萨丽在进步的，思想自由的戈达德学院^[184]教人类学和女性研究，杰瑞米组织了一个男性的意识觉醒研讨班，传播砂岩两性平权的性信条，很多和他一样，认为消除双重标准也会解放男性的男人积极回应。周末，杰瑞米和萨丽有时去新英格兰或纽约拜访去过砂岩的情侣们，他们喜欢和合得来的访客同床共枕；杰瑞米认为仿制版砂岩舞厅流行起来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实，几年后纽约开办了柏拉图隐居地，其他城市也给情侣准备了类似的可以裸体的娱乐中心。

1973年秋天，萨丽·宾福德买了一辆精致的房车，于是她和杰瑞米途经加拿大向加州出发，在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附近停留了几天，拜访不久前抵达的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他们刚在一个叫白鱼的社区选中

了大约200英亩土地，希望在更宽广的环境里建造另一个砂岩，他们在托潘加峡谷顶上那15英亩的地产突然显得很受限。近几个月，砂岩视线范围内的峡谷毗邻的山上正在修建很多新房子，打断了之前连续的从树木和山腰一路绵延到太平洋雾蒙蒙边缘的视野。而且，由于他们几年来都处在氛围紧凑、关系密切的群婚的中心，还要同时尝试运营一家情侣俱乐部，新成员需要不断接受指导，帮他们从最初接触群交的震惊中安下心来，威廉森夫妇在情感上感到精疲力竭，还患上幽闭恐惧，需要暂时远离其他人的亲密接触。等待着继任者买下并继续经营托潘加峡谷里的事业，威廉森夫妇从砂岩挑选了一些同伴一起到了蒙大拿州；尽管洛杉矶很多人表示有兴趣接管峡谷里的地产，但直到1974年，一个婚姻顾问和格式塔治疗师保罗·佩奇才弄到足够多的资金和贷款买下砂岩，重开了在过渡的这几个月里停止运营的情侣俱乐部。

保罗·佩奇34岁，比约翰·威廉森年轻八岁，他六英尺高，整洁健壮，蓝眼睛，留着修剪整齐的黑头发。他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尽管他说话温和，举止间流露出职业顾问的沉着自信，但还是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费了挺大的劲儿来控制内心满溢的烦躁不安的能量和冲突。他吸烟过量，说话流畅清晰，但有时被轻微的口吃打断。除了对性的兴趣、相信大部分世界历史都被人类性欲里的魔鬼影响，保罗·佩奇和约翰·威廉森几乎没有共同点，他是威廉森倦怠的风格的反面，他也认为，威廉森大腹便便发福的身体和他在砂岩马马虎虎记录账目的方式正相配。佩奇追求秩序、纪律和高效的管理；他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性质不能和砂岩想代表的乌托邦原则融合。

佩奇从1972年初就是砂岩的常客和付费会员，他在买下这地方很久以前就感到它的没落了。房屋和园林没有精心保养；引道有了裂缝还崎岖不平，而且约翰·威廉森似乎丧失了做常居古鲁的热情。他晚饭前不和人们聚在主屋，经常在停在砂岩最高山头上的房车里吃晚饭，或者独自坐在客厅的壁炉边读书；如果他屈尊和客厅里的人说话，那通常是极少数他看得起的、算是同伴的人，例如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或康福特医生，或拉尔夫·D.亚尼医生——一位贝弗利山的心理分析师和精神病医生，很久之前就是砂岩的常客了。

尽管1972年砂岩在报纸杂志中轰动一时，但砂岩的管理层缺乏想象力和精力好好利用这一点来招募大量新成员；威廉森夫妇过去一年亏损了很多钱，这件事对老主顾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保罗·佩奇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领导不力，也是因为他们让年会费低至每对伴侣只要240美元，佩奇买下地产装修改善之后，立即让会费翻了倍。除了别的事情，佩奇还指挥重新装饰刷漆了主屋，扩大了露天平台，在屋前草坪上安装了按摩浴缸。他修整了周围的庄园和道路，也改造了客房。他在媒体上为砂岩做广告，自己接受电视采访（不喜欢上镜的威廉森就躲着采访）；保罗·佩奇和同住于砂岩的女友——活泼风趣头发乌亮的特蕾莎·布里德洛夫——一起，在客厅热情欢迎到来的客人和会员，他是砂岩成功复苏的决定性因素。

佩奇过去常常拜访大苏尔的艾莎林治疗中心，受其影响，他在砂岩的员工中增添了几个专家，付费给会员和客人提供罗尔夫按摩、艾莎林按摩、生物能疗法和哈达瑜伽 [185] 课程。非会员的伴侣付250美元可以在砂岩度周末，食宿全包，使用那儿的设施，并在佩奇指导下参与格式塔疗法；某个周末，演员和电视名人奥森·宾恩和妻子卡罗琳来了，不久两人就和保罗·佩奇成了朋友，积极参与砂岩的活动。宾恩曾体验过一次赖希疗法——在他的书《我和倭格昂能 [186] 》中描述过，现在，他开始在洛杉矶《自由报》他自己的专栏上描写砂岩，也在约翰尼·卡森脱口秀上对砂岩有溢美之词。丹·格林伯格在《花花公子》上专门描绘过砂岩；赫伯特·戈尔德在《是！》上、罗伯特·布莱尔·凯撒在《阁楼》上也都写到过它。亚历克斯·康福特在他第二畅销的书《更多欢乐》中给了砂岩一整章的篇幅，他写道：“加州充斥着各种‘邂逅’和‘感性’中心——人们去那儿能‘找到自己’，或者其实不能……（而且）那里大多有这样的气氛，需要经过很多心理建设、说很多话后，才能进行真实的目的：做爱。但在砂岩，人们可以相当坦白地直接做爱，但做爱之后，参与者惊讶地发现，‘感性’、‘邂逅’和很多真正的自我教育常常随之而来；他们既获得享受，也确实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目标和自我形象。结果，”康福特继续说，“砂岩的门徒（有些人可能只去过一次）在各处广泛提供性爱咨询——包括由教会赞助的。因为砂岩的规模限制，加上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最初开创的实验只进行了四年，它通过人脉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假以时日才会变得清晰——对很多异性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有组织的机构里，初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触真正开放的性爱。它在成人身上引起了一种婴儿般的纯真，这种强烈的体验让很多去过那儿的人对它非常怀念或过度热忱，但它能促进个体心理学所致力的那种‘成长’，这种能力相当出色。”

在保罗·佩奇的请求下，康福特医生成为砂岩的非正式顾问，在定期寄出的小册子的职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在特殊场合，例如1974年6月初的公开接待周末，康福特医生会发表演讲，听众每人需付费25美元。200多人在雾蒙蒙的天气里驱车前来，拥挤的房子里有像萨丽·宾福德和杰瑞米·斯莱特这样的老会员，他们几周前把房车停在山坡上，现在就住在砂岩。康福特演讲的那天如此阴沉寒冷，大部分听众都穿上了衣服，这在砂岩是颇不寻常的景象。

除了亚历克斯·康福特的演讲，《搞》的出版人阿尔·戈尔茨坦和《花花公子》的副出版人纳特·莱尔曼也简短地讲了话；当天第二个主讲人、纽约来的作家盖伊·特立斯做了长长的演讲，他在为道布尔戴·康帕尼出版社写一本有关美国性爱的书，正在做相关的调查。

43岁的特立斯瘦而矫健，黑眼睛，一头棕发已经开始变灰，对屋里的人来说，他不完全是个陌生人。过去他常常拜访砂岩，包括它的舞厅，而且他正在写的书在很多报纸杂志上已经受到了过分关注。不过，媒体关于特立斯的报道大多口吻诙谐，强烈暗示他的调查方式，即在色情世界里“参与观察者”——光顾按摩院、下午待在黑漆漆的电影院看限制级电影、和全国的性俱乐部和狂欢作乐者关系密切，其实是为放纵自

己肉欲的别出心裁的手段，对他妻子不忠，却以“研究”性爱之名来打掩护。

特立斯从未公开反驳过这种观念，因为他推测任何否认的努力反而会给人留下他在极力辩解的印象——虽然他确实常常想要辩解，或者给他贴上第一修正案伪君子的标签：纵容色情，但当涉及自己时，就憎恶媒体公正评论的权利。但是他非常清楚，这份据称很理想的工作常常没有其他人想象的那么愉快。更让他烦恼的是，做了三年调查，在打字机前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月后，他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甚至不知道这本书该如何开头。也不知道怎么组织材料。也不知道，他想说的和最近出版的几十本婚姻治疗师、社会历史学家和脱口秀名人们写的关于性的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实际上，特立斯自己近来也常常参加脱口秀，一个新闻记者发现他在纽约一家按摩院做经理后，他就变得广为人知，好似一个沉迷于滑溜溜享乐的好色的普林顿 [187]——特立斯总想反驳这种形象，有的时候过于急切地在电视上强调他文学意图的严肃性。他在砂岩的演讲也有相似意图——想要在听众面前简单朴实地把自已呈现为一个投入的研究者和作家，除了私人生活和坏毛病，正在写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详尽地描绘出近几十年来，那许多重新定义了美国道德伦理的人和事件。

一个叫马丁·齐特的年轻的砂岩职员是屋里极少数完全裸体的人之一，他将特立斯介绍给听众，接着特立斯走向讲台，拿着稿子开始演讲。“这个国家，”他说，“正在逐渐发生一场对感官无声的革命，和老派习俗的决裂。甚至我的研究所关注的中产阶级，对电影和书籍中性表达的宽容也与日俱增，夫妻在卧室里对原来被认为是‘古怪反常’的东西更为接纳——周围摆上的镜子、彩灯和蜡烛、床边的振动器、好莱坞弗雷德里克 [188] 情趣内衣、限制级电影录像带、口交和很多州的法律仍旧定罪为‘鸡奸’的行为。《性的愉悦》几年前可能被贴上‘下流’的标签，现在大获成功再次证明，中产阶级社会对性描写不那么神经过敏了，”特立斯继续说，向坐在旁边的康福特医生点点头，“那本书迄今为止卖出了70万册精装本——这是一本你在大街商店橱窗里和美国中部地带的咖啡桌上都能看到的大众读物，即使它里面有露骨的图画，描绘了裸体情侣们用所有想象得到的方式做爱。”

“在高雅的晚宴聚会上，”特立斯继续说，“你现在能听到人们讨论自己最亲昵的私生活，这在60年代中期的社交场合是会被接受的。同性恋酒吧不再总是警察突袭搜捕的靶子，因为同性恋激进分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大部分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家长已经接受了在校外公寓甚至在宿舍里的婚前性行为，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虽然我不能证明，但我认为，中产阶级的丈夫现在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接受妻子在结婚时不是处女——或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一场婚外情。我不是说丈夫们不为之烦恼，”特立斯强调，从稿子上抬起头来，“我只是提出，当代的丈夫和他的父辈祖辈不同，对这种事不会那么震惊崩溃，更

可能接受女人也有性冲动，而且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以暴力报复不忠的妻子和情敌……”

和大部分比他小十岁或二十岁的听众不同，特立斯自己可以回想起三四十年代严苛刻板的道德氛围，特别是他出生长大的那种同质性强的城镇，那是新泽西州南部一个维多利亚式社区，甚至到了70年代都禁止销售烈酒。他记得在青少年时期，在他做祭坛助手的礼拜日弥撒上，他听到教区神父尖刻的预言：任何教民，如果阅读列在索引上的书，或光顾放映良风团禁播电影的剧院，都会受到神的惩罚。在他的教区学校，嬷嬷劝告他和同学每晚仰睡，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大概这是一种神圣的姿势，而且并非偶然，这姿势让人不可能自慰。特立斯第一次自慰是在大二时，是被当时约会的一个女生，而非男性杂志上的照片激起性欲，他那时太害羞了不敢买那些杂志。

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如其来地，或者对他来说似乎是这样，男性杂志不再私下出售，色情小说不再非法，好莱坞电影中开始出现裸体，这些变化，不仅在大城市中很明显——他当报纸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时在这些城市里到处旅行，也在像他家乡（他定期探访）一样保守的地方出现；1971年，当他构思下一本书的主题时觉得最引人入胜的是美国新近的性开放、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和他感觉到的在中产阶级人群中静静发生的革命，他们开始反抗自清教共和国建立后就是一种抑制性力量的检查者和神职人员。

特立斯读了几本关于性法案和检查制度的书，在法庭旁听了很多淫秽案审判，采访了《搞》和其他类似出版物的编辑，这之后，他开始了自己在性世界里的奥德赛，去按摩院历险，还成了常客。一天他和妻子从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开在自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布卢明代尔百货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上，在一栋楼的三楼窗户那儿，闪烁摇曳着红色霓虹灯招牌“现场裸体模特”，他很惊讶这种场所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营业。

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去到那栋楼，爬上三层台阶，穿过挂着帘子的入口，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是一幢废弃房子客厅的地方。东方风格的地毯磨损褪色；沙发、桌子和落地灯也许是从旧货铺淘来的；在那儿坐等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们好像牙医办公室里的病人，似乎无法专心看眼前的报纸和杂志。

特立斯走向桌后面的经理，一个长头发穿蓝色牛仔戴着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他告诉特立斯，价格是半小时18美元， he 可以从六个女按摩师中任意选择一个，她们的照片都在面前摊开的照片簿上。特立斯选择了一个叫琼的长相可爱的年轻金发女人，照片中她穿着比基尼在一片热带沙滩上；他等了20分钟，一半时间浏览《新闻周刊》，另一半时间观察着男人们静悄悄地来来往往，他们大部分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再老点，穿西装打领带——他猜测他们大半是商人，在中午吃饭时间偷偷摸摸地过来，经理向特立斯招手了。特立斯站起身，看到一个脸上有雀斑

的金发女人站在走廊里，她和照片里的琼只有那儿一丁点相像——也许都不是同一个人，不过还是挺诱人。她的眼睛又黑又大，身材苗条，穿着粉色围裹裙、黄色T恤和凉鞋。她拿着一张从织物壁橱里拿出来的浆过的亚麻床单，和特立斯一起穿过走廊走进五号房，她说话有南方口音。

她说自己来自亚拉巴马州——特立斯在那儿上的大学；他在按摩房里开始追忆南方，她心不在焉地听了会儿，不久就没耐心了。这可是做生意，她提醒他，时间不等人，她建议他脱掉衣服，躺在她刚把床单铺好的按摩桌上。他照做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转过身来露出健美的肉体，他觉得很兴奋。

“油还是粉？”她问，走向按摩桌。他不确定地四周看看。

“这儿有浴室吗？”停顿了一下后他问道。

“没有。”她说。

“那就粉吧。”

她拿来一罐强生婴儿爽身粉，不久他就感觉到她的手指轻柔地抚摩他的肩膀和前胸，然后向下到腹部和大腿。他看着她探向自己的身体，手臂和乳房颤动，双手被爽身粉染成粉笔白色。他能闻到她的香水味，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看到下面已经勃起。他闭上眼睛，听到隔壁房间里其他男人的叹息声，也听到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噪声，汽车喇叭声，公交车从路边开走时刺耳的声音，他想起街对面的布卢明代尔和亚历山大百货公司，一群群顾客和售货员现在正探向柜台买卖交易……

“你想要特殊服务吗？”她问。

他睁开眼。看到她正看着自己的下体。

“能做爱吗？”他问。她摇摇头。

“我不做那个，”她说，“我也不用嘴。我只给本地货。”

“本地货？”

“手活。”她解释道。

“好吧，”他说，“那就本地货。”

“要另收费。”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点头，带着好奇和期待看着她……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经历可耻卑贱，但特立斯却享受这种接触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后他常常又去光顾，不仅让琼还让其他女按摩师按摩，通过她们他知道了纽约市各处都有类似的场所。

那年剩下的时间和1972年，他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定期频繁得让他不仅熟识了女按摩师，还有那些年轻经理和店主。他们中有些人大学时学的是英语或新闻专业，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顾也是他们这种服务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绝妙”；他们接受邀请和他去餐厅吃饭，接受采访，允许他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使用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最终允许他在按摩院里义务做经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于东二十六街132号一栋无电梯公寓的三层，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个角落里；1972年春夏，有很多个星期他在桌子后面从中午工作到下午6点，负责收钱、检查亚麻床单的数量、和等候的顾客闲聊，按摩师和顾客进入私人房间后他也要注意着时间。一个客人离去后如果暂时没有生意，特立斯会询问按摩师情况，问她那男人说了什么，有没有透露什么私人 and 职业生活中的情况，他的挫折、抱负、幻想。特立斯不久就说服按摩师帮他记日记——描述每个顾客，详述在关上的门里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告诉他按摩师自己在满足客人欲望时心里在想什么。虽然特立斯还没有组织场景和故事线索，但他想写下两个真实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关系——一个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个嬉皮士女生，她满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压抑，最终和他成了朋友，帮助他摆脱进按摩院时通常会有羞耻感和负罪感。特立斯和几百个男性顾客见面闲聊后，以及之后在按摩师的日记里读到他们时，他知道自己毫不费劲就能与他们达成认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们，按摩师写下的东西很多也可以准确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特立斯在情感上忠于一个他想要长期维持的婚姻。虽然他有外遇，但从不想为了那些女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尽管他还是爱慕她们，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谊。妓女从不能吸引他，尤其因为现在的娼妓都是贫民窟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年轻女人，有吸毒的问题，甚至很少有好看的。但是他很喜欢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按摩师——另一种“娼妓”——一个普通人可以与她以不仅仅是身体的方式产生联系。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样不喜欢独自自慰；用年轻一代的说法，这样“太逊”。但是被一个迷人的按摩师自慰，有一个女人在场，和她相互之间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爱情，也可以让人心旷神怡、饶有兴味。几个月过去了，特立斯开始把按摩师看作某种没有执照的治疗师。就像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花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那样，这些来按摩的男人花钱请人触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顾和特立斯有什么相像的话——他和这些人

的对话以及读过的日记，使他相信他们确实相像，就是他们和女按摩师的性行为并没有降低他们在家对妻子的热情；事实上，大部分人说他们下午在按摩院待过之后，晚上甚至会更渴望妻子——按摩师显然激发了年长男性身上的性冲动，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在家更满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讨妻子欢心。

但当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后工作了几个月后，倾听顾客说话，和年轻按摩师聊天，加上之后在东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经理，他逐渐意识到，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能给女性带来欢愉的年轻男按摩师。并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车后打着广告，建筑物墙上贴着海报，像《纽约邮报》和《村声》这样的报纸里也有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满足的广告。特立斯相信整个纽约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妇、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许会想要一次带着精妙性享受的午间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东城氛围里，也能获得一些像伊丽莎白·雅顿沙龙，或者奢华的女性健康俱乐部里的那种娇宠。但是，和特立斯聊过天的按摩院主人，还有按摩师都向他担保，没有这种市场。东城一家很好的酒店里开过这样一个场所，打了很多广告，但是没法吸引女顾客来找年轻的男按摩师们，不久就被迫关门大吉。人们得出结论，女人不愿意花钱买这种私人服务。女人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洗头发、设计服装、安抚心灵、在健身课上瘦小腹——但是她们不愿意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提供性服务。

甚至“小白脸”的角色也大多被误解了，非常有资格评论此事的人这样告诉特立斯；虽然富婆确实供养小白脸，但这些年轻人的角色主要是像护卫或儿子，而不是情人。大部分小白脸是同性恋，她们包养的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称关照他们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虫”。除了对男同性恋，似乎阳具本身在美国性市场上也不是很有销路的商品。几乎没有女人只看到勃起的阳具就会有性欲，除非她们对它的主人有热烈的好感。除了在公共场合随便挑个人可能带来的危险，一般异性恋女人不喜欢和没有亲密感或兴趣的伴侣性交。如果只是想要个高潮，比起和一个陌生人的性器接触，她更倾向于在卧室里用阳具形状的振动器自慰。“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类身体的排异反应——拒斥从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样自然，”一个婚姻治疗师某次告诉特立斯。“关键词是‘陌生’；如果一个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体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进来，因为这样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个她认识、相信、想要发展关系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拥抱它、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这是符合逻辑的，”治疗师继续说，“和男人对裸女招贴画的不同反应，女人对杂志上的裸男无动于衷。”很多女人随后和特立斯访谈时也证实这种观点；很少有女人说她会对某个陌生男人的裸体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赋。尽管报刊亭堆满了数不胜数的“皮肉”男性杂志，但只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据称是为女性受众刊载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这种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终放弃了努力，后来完全退出了市场。

1973年，特立斯去了欧洲几个主要城市，看看有没有受到美国清教传统影响的欧陆女人，是否对按摩院（有时叫作“桑拿俱乐部”）中以钱交换的性反应更热烈，对杂志中的男性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欧洲女人似乎和她们纽约的姐妹没有什么区别。在伦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纵享乐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没有发现女人光顾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欢现场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电影，女性杂志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见。他夜间在欧洲大街小巷游荡时，看到和纽约一样的场景：男人独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门口和妓女讨价还价，男人在裸体酒吧沉默地盯着女人看。男性承认自己无止境地为异性裸体本身神魂颠倒；他们以一种分离的无人格的方式欣赏女人，甚至那些被这种关注讨好了的女人也极少能够理解。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女人售卖性快感；男人出钱购买。在鸡尾酒聚会的社交场合，或者寻求办公室恋情的过程中，发起者几乎总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总是女人。一位著名的欧洲女演员最近刚离异的丈夫告诉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敌。女人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开始，常常是不经意地就引诱了男人——她们穿紧身毛衣、画口红、抹香水、扭屁股，当让男人欲火缠身后，她们突然就变得害羞正经起来。”男人想要女人必须给的东西，他承认，但是女人会拒绝，直到达到条件或得到承诺。女人能给一个无力的男人暂时的力量感，至少能让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无能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双腿间那温暖接纳的地方是无可替代的，是男人总想回归的出生之地。他补充道，但是回归几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代价还很高。教会和法律尝试“把阳具社会化”，他说，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价值的场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里。“婚姻是对阳具的一种武力管制”，却不能完全控制过剩的男性性精力，这些精力大部分发泄在色情产业和城市里的红灯区——那些反堕落小队、禁欲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清除的地方。“这些‘净化’运动，”他得出结论，“其实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战，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进行着。”

从欧洲回来后，特立斯继续调查美国，游历内陆，采访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和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交谈。他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几周，印第安纳，俄亥俄，然后南下到圣经带，在那儿参加教堂布道和市政会议，在鸡尾酒酒吧偷听，拜访辖区内的人家和红灯区。白天他在商业区溜达，注意到伍尔沃斯超市和杰西潘尼百货商店与当地按摩院和限制级电影院挨得很近。晚上他在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和其他汽车旅馆的厅堂里徘徊，观察到穿灰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们的房间前会在报刊亭买一本《花花公子》或《阁楼》。

他也观察到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将车开进购物中心；结实的扶轮社会会员和同济会 [189] 会员穿着艳丽的缎面衬衫把保龄球投下狭窄闪光的球道；卷发有雀斑的乡下姑娘，从高中图书馆借出来哥特式小说；晒得黝黑的郊区居民在网球场混合双打；“百事一代” [190] 周日在教堂合唱团唱歌。在这些地方和这些人详细交谈之后，特立斯感觉正常的美国家庭生活与传统表面上还在延续，但内里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评价。旅行从头至尾他不断提醒自己，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

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读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国销售火爆；尽管全国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学毕业以来，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巨大变迁，还是给了他更深刻的印象；虽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社会还是会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怀疑这是否可能。如果那样，就必须判定堕胎和避孕为非法，将通奸者下狱，需要审查的不仅有《花花公子》，还有《Vogue》和周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媚登峰内衣广告。尽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决在那时看来是不祥的声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这样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听淫秽案审判的律师，在后来一起闲谈时预测，米勒判决无力维持这股让公民自由主义者警觉的趋势。据说，大部分当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倾向于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这样保守的城市，在一项淫秽案中，《搞》的纽约出版商也战胜联邦检察官赢了官司。米勒判决一年后，全国书报摊开始售卖《风尘女郎》杂志，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线——虽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亚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击者射出的子弹击中，可能会永久残疾，编辑们却没被吓倒。全国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员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电影——其中一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摄时，特立斯得以在旁边观察。

电影在一个租来的大庄园里拍摄，特立斯与演员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待了一周。团队里的一些成员，包括导演，之前在《深喉》和《琼斯小姐内心的恶魔》中合作过；尽管在宾州拍摄的这部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没有《深喉》和《琼斯小姐》那么赚钱，但在矫揉造作的剧情、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荧幕上女演员进攻性的性行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这些先行者很相像。特立斯怀疑，正是这些女人愉快轻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对无人格的性来者不拒的场景，满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镇上限制级影院的中年男顾客的愿望和幻想。电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马上就献出了身体，不拒绝任何人，几乎不要前戏，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达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诺。像乔治娜·丝波文、玛丽莲·钱伯斯和琳达·洛夫莱斯这样的限制级影片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个精疲力竭后还要第二、第三个；虽然批评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责色情电影剥削女性、美化暴力，这些观点却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场看到的东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时报广场和全国其他地方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的大量内容。

如果观众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级甚至PG级电影里看到——战争片、《教父》诗史三部曲、没完没了模仿《驱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比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对它要有什么合理的愤慨，那也就是售票处每名观众五美元的票价太贵了，电影低劣的质量、幼稚可笑的剧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卧室场景里演员也总是软下来，徒劳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这个价。在电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确实看到过“小猫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为的色情片；但这种电影

极少，受众范围很窄；尽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恋片，但这些片里面处于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样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挤压他们的下体，蹲在俯卧的男人身上往他脸上撒尿也不是那么罕见。对这种场景要还有什么能说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会觉得女人蹲着的特写镜头很有性教育意义，因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测，大部分他这一代的男人并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阴道不是同一个地方。

特立斯离开宾州的电影班子后——他们的拍摄计划延迟了一天，因为一个演员无法在恰当的时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并结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开按摩院的哈罗德·鲁宾，一个有点矮但强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下颌突出，蓝眼睛，一头金色长发用油梳过。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鲁宾时他的言行充满对戴利市长、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筑巡视员抑制不住的蔑视，声称他们正在骚扰他，想要逼他关门。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驱逐通知给特立斯看，那是房东寄过来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称的恶行，还提到鲁宾曾在前窗贴了一张告示，写着：“操尼克松，赶在他操我们之前”。鲁宾说他最近被一个法官罚款1200美元，因为出售据说是下流的书，还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区伯温市政厅台阶上扔了一块马粪，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鲁宾漂亮的棕发妻子是一个女按摩师，她最近烦透了他和法律不断起冲突，抛弃他去了佛罗里达州，留下他们3岁的儿子：他在鲁宾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里骑他的三轮车，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鲁宾承认，因为越来越多的突袭搜查，生意变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几乎无事可做，鲁宾对特立斯说了很多对未来渺茫的希望，回忆起虚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种麻烦。除去他对当局的抗议和宿怨，鲁宾似乎挺欣赏自己在一个相当保守的城市里的这种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头条写手叫他“怪人哈罗德”后，他就用这绰号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但是当他远离生意场的霓虹灯和色情海报，他在社会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评者同样保守；他静静地住在伯温的居民区，每周去守寡的祖母那儿两次，他和儿子住的公寓一尘不染，装饰精美。他收集小艺术品、古董小玩意儿和易碎的小装饰物，把首饰装在玻璃容器和黄铜盒子里，定期除尘擦亮。墙上是世纪之交的海报，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比他祖母的年纪都要大。他用1910年生产的一架爱迪生留声机听音乐，对他的木质冰盒、惠普自动唱片点唱机和同样老的普尔菲口香糖机器感到很骄傲。他井井有条的卧室的书架上，有老版皮质封面的全集书；他的壁橱里整齐地堆着一摞摞50年代的裸体杂志，里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韦伯。

他娶的女按摩师和他梦中的加州模特颇为相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鲁宾会陪她到库克乡村森林保护区，在树木间隐蔽的地方为她拍裸体照，摆的造型和黛安娜·韦伯在杂志中的样子一模一样，那些杂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橱里。哈罗德·鲁宾狂热地回忆，他少年时期在卧室里与黛安娜·韦伯幻想中的接触，这不久就激励特立斯飞到南加州，寻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机会；特立斯通过和她合作过一次的摄影师的帮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电话，但给她写的信和在电话

应答机里留下的几条信息，她完全没回复，后来她在好莱坞做纪录片电影剪辑的丈夫帮了忙，她终于同意在马利布家里接受采访，那是一个灰暗阴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让这个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韦伯绷着脸开了门。这个40多岁赤着脚的女人将娇小但有些丰满的身材隐藏在褪色的蓝牛仔裤和宽大的男士T恤里，长长的棕色头发和黑框眼镜是最近很多女权主义者的风尚，她对特立斯说话时更像是在讲课而非打招呼。她说，特立斯找她时的坚持不懈并没有触动她，她也强调，希望这个采访很简短。她提醒说，她现在不是公众人物了，然后带他走向客厅里现代风格的沙发，这间整洁的客厅可以俯瞰海滩；虽然承认当时做裸体模特很愉快，但她现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职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区当女子舞蹈教练。她说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尔也和她最好的学生和一个演奏中东音乐的乐队在洛杉矶和附近的公共场合表演。

她说话的时候特立斯没有打断，仔细听着，最后她似乎放松下来，对他不那么反感了。尽管他觉得她很迷人，访谈深入后也更加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和能言善辩，但他相信哈罗德·鲁宾如果在这里可能会失望。在老照片上她显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并不是这样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时可能也不是这样。她年轻时脱下衣服、伸开手足裸体躺在加州沙丘上时，很可能脑海中完全没有淫秽色情的念想，不过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摄影师脑中也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男人，在为男人拍摄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们毫无疑问知道，最终挑选出版的照片不久就会让男读者非常兴奋，会在男人性幻想的世界里繁荣兴旺，很多男人在兴奋的脑子里会狂野地强奸她很多次，把她一辈子囚禁在卧室关上的壁橱门后。

但和特立斯访谈时，她将自己的裸体模特事业解释为是一种摄影“艺术”的表达——特立斯抑制住了冲动，没有说出来对她来说的“艺术”，对她的男性崇拜者来说可能就是“色情”。他在这关头的谨慎可能获得了回报，因为她不久同意再接受一次采访，再后来才有了第三次；通过她，他开始认识她丈夫，他们已经结婚20年了，还有他们19岁的儿子约翰·韦伯，一个一度是嬉皮士的英俊小伙，最近为马利布山冈上一个名叫“极乐仙境”的裸体主义者社区工作，报酬颇丰。社区主人是曾经专门给黛安娜·韦伯拍照片的前摄影师、灰胡子的埃德·兰格。

约翰·韦伯住在社区里做做杂活，工作时间很长；但他定期溜达下山回到马利布父母家里。一天黄昏黛安娜·韦伯下了舞蹈课走进客厅，发现儿子裸体躺在客厅地板上，双腿大张着，对着《花花公子》杂志里女演员乌尔苏拉·安德烈丝的照片自慰。黛安娜·韦伯很不高兴。

正是这次去加州时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名叫小帕特里克·麦格雷迪的纽约作家那年早些时候和他说起过砂岩，还有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他们托潘加峡谷的私人庄园里进行的开放性爱实验。特立斯在洛杉矶《自由报》上看到一则砂岩的广告后，给上面列的号码打

了电话，接着受俱乐部经理邀请，他下午开车上山拜访砂岩。

特立斯开上曲曲折折的山路，还迷了两次路，后来终于找到入口的石柱子，把车开进了停车场。他没想到，在这个放纵乐园的短暂拜访会从那白天持续到晚上，持续到后来两个月的大部分时光。这地方的宁静和自由、几乎没有规章制度、它的舞厅和主动出击的女人都把特立斯迷住了。他之前的所有调查，不论是按摩院、性酒吧、现场表演、从性百科全书里读到的，还是从性爱通那里听说的，都没能让他为砂岩这样的地方做好准备。70年代初在美国这个不总是那么民主的共和国里，砂岩毋庸置疑是最自由的15英亩土地：据他所知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双重标准、没有用钱交换的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且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地方。就是在这儿的第二晚，特立斯在舞厅参加了群交，这个欢娱的情景里还有康福特医生和一个著名的好莱坞口技艺人，虽然他把头埋在一个女教师两腿间，但仍旧和自己不在场的木脑袋挚友继续一场幽默的对话。

特立斯在砂岩逐渐习惯了做个裸体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双性恋，但在砂岩学会当男性裸体离得很近时放松下来，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和一些男人成了朋友，和他们用拥抱打招呼，变得像握手一样自然。但是特立斯发现砂岩的很多东西并不那么让人愉快，尤其是在静悄悄的午后，这儿只剩十个常居的人——约翰·威廉森的“大家庭”时。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特立斯都很冷淡，怀疑他的意图，有时会公开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带妻子一起来。特立斯在砂岩住了不到一个月，发觉约翰·威廉森也变得愈发疏远、不友善；好像威廉森在邀请特立斯住在客房、说待多长时间都行后，自己私下感觉犯了个错误——但他没有用突然驱逐特立斯来承认那个错误，而只是听任特立斯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特立斯那时认为，有可能他对威廉森不说话时流露出的性情反应过度，作家麦格雷迪在纽约就预先警告过特立斯他的这种性情；而且特立斯也推测，这有可能是威廉森对外来人特殊的压力考验之一，他有时会考验那些从尔虞我诈的尘世来的，甚至只是暂时和他的裸体追随者和离经叛道者住在一起的人。但是特立斯留在了砂岩，白天担惊受怕，每天热切期待俱乐部成员晚上来的时候带来的欢闹氛围；他能那么长时间抵住威廉森的沉默每天给他的压力，以及和大部分家庭成员孤立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特立斯并非不熟悉作为外人的处境。确实，他的背景让他最自然地是个外人的角色：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教区里的意大利裔教民，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家乡的天主教少数派，是个北方人却去上了南方的大学。50年代他是个总穿西装打领带的保守年轻人，这个有追求的人选择的作为他使命的职业是少数几个对心理伪装者开放的职业之一：他成了一名记者，想以此来克服天生的羞怯，放纵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探索比自己更有趣的人生。

作为一名记者，他毫不意外地被偏离正道的人吸引：纽约城没人注意的流浪汉，在高高的大桥钢筋上工作的流动工人，《纽约时报》办公桌旁古怪的巴托比 [191] 们，黑手党的孩子，走私非法读物的贩子，按摩

院里辍学的女生，现在是像威廉森这样有失体统的先驱者们。特立斯为了最终拿到一个好故事，可以长时间忍受合不来的人，他也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自豪，但就算是他这样的人也是有极限的；就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一天下午客房的门开了，约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正经的微笑，赤身裸体。他仍旧坐在书桌上的打字机前，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他的背，抚摩他的脖子；他没说什么话也没有反对，接着她领他走向卧室开始做爱。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个性主动的女人追求，毫无疑问特立斯的身心都乐于接受这种体验。她高潮之后，也只在她高潮之后，芭芭拉·威廉森开始直率地说话，自特立斯来砂岩之后第一次信任他。虽然没有为她丈夫的阴沉道歉，但她解释说，因为卖掉砂岩这宗生意有很多变动，这不断打击她丈夫重新定居蒙大拿州的渴望。但是她补充道，约翰·威廉森和大多数梦想家一样，沉溺于夸大其词的沮丧中。她回忆起1970年——当他爱慕的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跑掉，在俄亥俄州的伊利亚市结婚后，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忧闷地沉思，有将近两个月几乎不和砂岩的任何人说话。

特立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问问题让她继续说下去，芭芭拉·威廉森告诉了他砂岩是如何开始的，回忆起她和约翰·布拉洛的情事，她丈夫后来和布拉洛妻子的关系，还有在大熊湖戏剧性的周末，这两对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交换配偶做爱。尽管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一年后退出了砂岩，双方也分居了，芭芭拉说他们后来在开放性婚姻里还是性伴侣，补充道他们现在和威廉森夫妇仍旧是朋友，如果特立斯愿意的话可以安排他们见面。

一周后，这事儿就成行了；之后两年特立斯在纽约和加州往返，常常到伍德兰希尔斯拜访布拉洛夫妇，他渐渐赢得他们的信赖，获得允许写下他们的故事，并使用约翰·布拉洛写下的日记和笔记，这些是他在朱迪斯被威廉森和砂岩主要成员们勾引走的那些心理受创的日子里写下的。

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讨论新写作计划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个杂志记者是他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特立斯认为，比起他亲身体验了多少性行为，这个记者会更多报道他的工作方法；所以特立斯相信没什么需要对他隐瞒的。

一天晚上，特立斯和记者一起回到家里，发现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信封放在餐桌上。他打开它，读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而且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她表示，因为他不明就里就同意和媒体讨论其实和它们不相干的事，她最重视的隐私权被他侵犯了；此外她还警告，他在性

方面的坦率也许能撩拨一些杂志读者，却只会让他自己受人耻笑。

特立斯很苦闷，但极想对默默站在旁边的记者掩饰信的内容，那记者正等着和他去一家餐厅结束进行了好几天的访谈，于是特立斯把信放进自己口袋里。之后几小时特立斯抑制住情感，在餐厅里和记者交谈，希望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没被发觉。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周五，下周一妻子回来了，并没做什么解释。他没主动说自己去哪儿了，他也不觉得自己有权过问。他们的婚姻在1973年秋到1974年冬，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和解氛围持续了下来。婚姻得以幸存不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更是由于在一起的多年时间里，他们都能洞察对方错综复杂的行事方式，一种特别的并不总需要说出来的语言，尊重相互的工作，同甘共苦，也都清楚自己是真心喜欢对方。有时在婚姻中更重要的是“喜欢”而非“爱”——因此，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感情日深；1974年夏天，特立斯像每年一样，和妻子孩子一起到家乡新泽西州大洋城他在维多利亚海滩的房子度假。

像妻子预言的那样，他人尽皆知的“调查”引起的消极反应先于他到了，在这个他做过高中体育记者、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一份地方周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研究。比起所有大城市日报和全国性杂志里的八卦文章，这篇社评让他的父母最为光火，他们仍旧住在镇上，半个世纪以来言行都符合这个海滨城市至少表面上的道德规范。虽然特立斯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对他家庭造成的影响最开始让他非常愤怒不安，但他渐渐地也就不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的为人了。他现在找到了开篇的方法，第一章也写完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漫步穿过城镇，在当地书报摊随意翻查一架一架的男性杂志，继续探索他周围性爱习俗的变化——既在他故乡，也在附近亚特兰大城更大的度假胜地探索，还延伸到农场和村庄。

离他长大的地方20英里远，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公园深深隐藏在巨蛋港河边的林地里，他从少年时就知道，但是那时从不敢进去。它叫阳光公园，30年代中期由身材敦实、情绪反复无常、备受争议的牧师伊尔斯利·布恩建立，一小群毫无顾忌的裸体主义拥趸认为他是美国裸体运动之父。布恩牧师一度是新泽西州奥克兰的庞兹归正会 [192] 的牧师，1931年他在德国旅行期间了解到裸体主义，直到被希特勒关闭之前，那里有很多裸体主义者占据的私人庭园，他们相信在户外脱掉衣服对身心都是解放，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布恩牧师最初在新泽西州中北部斯库利山建立裸体主义者居住区的尝试，以房东的驱逐通知告终，但后来，新泽西州南部一个住在梅斯兰丁社区的德裔美国家庭，给了他80英亩林地。1935年他带着救世主般的热忱，和追随者一起在高高的橡木、雪松和松树荫凉下建立了一个河畔隐居处，给它命名为阳光公园。他建造了一栋白色的大木屋，和妻子孩子住在里面，还建造了很多小房子和木屋，一间礼堂和一家学校。他出版了一份裸体主义报纸和一份叫《阳光与健康》的图文杂志，杂志常常遭到梅斯兰丁邮政局长查禁，布恩自己也常常上法庭为之辩护，他在一篇社评中坚称：“除非美国的‘道德’领袖们接

受身体的真实，允许老百姓完全熟悉身体所有地方的样子，否则人们对身体的‘禁地’就一直会有或多或少狂热的兴趣。”

对身体“禁地”“狂热的兴趣”——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特立斯在大洋城的少年时代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街角烟草店询问是否有《阳光与健康》私下出售，那店里明面上摆着的最不审慎的杂志是《警方公报》，但当学校好友大胆讨论晚上要不要偷偷溜进公园爬上树，在那儿躲着，直到日光让他们看到光辉灿烂的女性裸体时，他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不管何时去费城看棒球赛，沿着河畔道路开车经过阳光公园的石头门和醒目的白色布告牌时，他都徒劳地在模糊的树木间寻找禁忌的风景。他也听说，尤其是在周末时，镇上有的船主会沿着巨蛋港河划着或开着他们的船，在阳光公园河岸对面抛锚，只为了看到神奇的景象：那些邪恶的沐浴者在木码头和小沙滩上伸展四肢。

一个夏日周末，特立斯在砂岩拜访几天后回到大洋城，独自开上通往阳光公园的林荫路。公园熟悉的白色标志和他年少时一模一样，他开进大门，沿着幽长曲折的土路，经过茂盛的树林和灌木丛，最终到达一个小木屋门房，那里有位裸体的老人坐在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沐浴着阳光。老人欢迎特立斯，递给他需要填写的登记卡，并收取了费用。老人回答特立斯的问题，说他不是伊尔斯利·布恩，布恩1968年已经去世，又说他帮布恩建造了这个公园，除了房车，它看起来几乎仍旧和40年前开园时一样。特立斯进入内门时老人向他挥手，他沿着沙路开到河边，看到几十个年龄、体型和肤色各异的人裸体在阳光下漫步、躺卧或在河里游泳。有带婴儿的父母，棕褐色皮肤松弛的老人，身体美丽或不美丽的年轻女人，健壮、松弛或虚弱的男人，男孩女孩在沙滩巾上挨着躺着，或者站着随意闲聊。

特立斯停下车脱掉衣服，慢慢走向河水，感觉自然而愉悦。那是一个闷热的7月午后，但他脚下荫蔽的地面感觉很凉爽，而雪松色的河水温暖宜人。他淌过水走向码头的木梯子；爬上去，和其他没见过的裸体主义者混在一起，他发现一些人在向很多帆船和摩托艇招手，那些船停在隔开公园和公海的长绳子外面。

在船的名字下面，大部分船的船尾上漆着它们的归属地“大洋城，新泽西州”；坐在甲板上的人穿戴着百慕大式短裤、帆船帽、泳衣、草帽和墨镜；手里拿着罐装啤酒、保温瓶、晶体管收音机，还有向裸体者挥舞的手帕。船上也传来一些嘘声、口哨声和欢呼声；看了一会儿后，特立斯在甲板上走向前，和其他安静的裸体者分开，面向船只，他认出一些帆船和上面的一些乘客。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很多乘客拿着银色的望远镜和黑色的双目镜，他们僵硬地坐在甲板上在水中摇摆，在阳光下眯着眼窥看。他们是不加掩饰的窥阴癖，正凝视着他；而特立斯回之以凝视。

后记

1980年写完《邻人之妻》，对我的作家生涯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

这本书爆炸性地走红，书店里还没有卖出一本，我的账上就多了400万美元，可围绕本书出版的种种新闻也转移了读者的兴趣，至于我写了什么、为什么写、如何写的这本书，反而没什么人关注。特别是为了收集信息、观察当代美国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现象和性爱实验，我对妻子不忠的原因，也没多少人关心。

我写书的九年里，妻子都公开支持着我，后来还陪我上脱口秀节目对公众解释，说虽然我去了纽约的按摩院和洛杉矶的享乐裸体主义社区做调研，我们的婚姻之爱并未受到威胁，可这也只是加剧了某些评论家对我和这部作品的义愤与嘲笑。比如《华盛顿明星报》的乔纳森·亚德利（“谄媚读者”）；《多伦多明星报》的肯·安达（“他该冲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埃尔帕索时代周刊》的戴尔·L·沃克（“恶心”）；《纽约》杂志的莫迪凯·雷切勒（“有危险性”）；《时代》的保罗·格雷（“惨不忍睹”）；《纽约时报》的阿纳托尔·布罗亚德（“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还有约翰·伦纳德，《时代周刊》的员工，也是几部小说的作者，接受了《花花公子》写书评的约稿，文章开头写道：“我们上次告别特立斯时，他一丝不挂，从唱诗班男孩变成了年轻的神，准备勇敢地跳入雪松色似的新泽西巨蛋港河的河水中。当然，到了该洗澡的时间。”

我明白，批评家的负面评论一旦见报，再争吵也没什么意义，可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回击约翰·伦纳德。我们之前在纽约的社交场合见过，一向就合不来，特别是我的书出版一年前，他在专栏写了篇错误百出的文章，说我写了整版的报纸广告，把色情作家拉里·弗林特与苏联自由斗士相提并论。我自然予以驳斥，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更糟了。

我马上写信给约翰·伦纳德，要求他更正说辞。他没有理我，后来他在《花花公子》上写评论文章，又引用了这段错误的讯息，我很生气，寄过去第二封信，他还是没理会，后来，《人物》的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对伦纳德和其他作家负面评论的看法，我回复说：“这些作家自己没能力写书，所以嫉妒心强得很。伦纳德文笔就不行。他还有婚外情，和朋友的妻子私奔了——结果又跑来这里批评‘邻人之妻’。”

现在我回忆起这些，是在《邻人之妻》出版25年后，我很希望当时不要对批评那么敏感。可那些日子里，出版遇到了太多琐碎、无谓的事情，我也不是总能控制自己沮丧的心情。我真正观察、写作的内容被忽视了，公众只关注我的婚姻状态、我和书里某些人物的私人关系，以及

书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就有了的大批投资。《时尚先生》为正式出版前的节选版付了5万美元，平装本和外国版本又提前付了100万美元，还有好莱坞购买改编电影版权付了250万美元。

本书的原稿送到杂志社以供节选时，几家电影制片厂看到流出来的盗版稿件，开始竞争改编版权，最后由联美公司 [193] 以250万美元得标——史上最贵的改编版权。使大卫·布朗和理查德·扎纳克联合制片、为改编彼得·本奇利的《魔岛生死劫》支付的215万美元相形见绌，也远远超过了近期的书本改编电影合约金额，比如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选择》（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克劳馥的《琼·克劳馥传》（65万美元）和罗宾·库克的《斯芬克斯》（100万美元）。

虽然《丹佛邮报》的图书编辑克拉罗斯·贝克斯说《邻人之妻》“肯定不值250万美元”，但联美公司的发言人，也是帮忙谈判这单合同的高级副总裁斯蒂芬·巴赫说，从这本书的故事里可以拍出三部电影。他建议一部电影讲纽约人寿那位保守的经理人与漂亮、主动的年轻女推销员的婚外情故事；第二部可以讲芝加哥的少年如何仰慕洛杉矶美丽的画报女郎，以致爱上了她的照片；第三部电影可以关注休·海夫纳在花花公子豪宅里花天酒地又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我认为本书会成为年度之作。”斯蒂芬·巴赫在《纽约时报》的访谈里预言，又补充说，“它写的是当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话题，性和道德，同时还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观察。”他的电影公司雇了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编剧玛莎·诺曼来写剧本，导演是著名的威廉·弗莱德金 [194] 。

然而，这部电影再也没能完成。

买下《邻人之妻》的版权一年之后，制片厂破产了。原因是拍了《天堂之门》，预算是750万美元，最后总共花了3.6亿美元。这部电影由迈克尔·西米诺执导，首映式之后就销声匿迹。公司的大部分高管，包括斯蒂芬·巴赫很快被开除，《邻人之妻》已经完成的剧本也就在公司档案里落灰了。

20世纪80年代里，书本身销量很好——三个月内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不过我还是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他们被这本书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内容并无多大联系。有些人期待这本书能让人“大跌眼镜”或是“有下流描写”，他们无疑失望了。《邻人之妻》笔调朴素，长篇大论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地方，从我上大学时的50年代早期，一直到写作本书的70年代初，在我心里，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到了80年代，《纽约时报书评》一位署名罗伯特·科尔斯的作者为《邻人之妻》写了几篇积极的评论，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写道：

盖伊·特立斯是位著名的记者，喜欢挑战其他人认为难于上青天的任务（比如黑手党的运作模式），现在他拿出了一份报告（至少九年工作的成果），写的是我们怎样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偏离了19世纪的道德传统，也偏离了20世纪末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范式。他调研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事实上，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的。他与那些尝试新奇不羁或非传统性爱的男人和女人谈话，努力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曼哈顿的按摩院里打工，也全心全意为按摩院的利益着想。他短暂加入过裸体主义营地，也没有放过在洛杉矶附近的砂岩享受快乐（“性爱共享”）的机会。

对于那些抱着色情想法的读者来说，这部长篇要让他们失望了。这本书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记者写的色情文学。这本书出版后，特立斯先生的经历会被传得比实际上丰富许多，不过很多读者会发现他实际上相当克制。他的秘密爱好是观察自己的人类同胞、倾听他们的谈话，再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的文风干净，不矫揉造作。他有种天赋，随手在这儿写个句子、加个短语，就联结起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1981年，《邻人之妻》的平装本卖得很好，之后便和其他有关性解放的书籍一起淡出了读者的视线。当时最受关注的，是指出全美疱疹和艾滋病不断蔓延的医学报告——80年代的这些疾病，很多人认为是60年代的性放纵所致。不仅那些支持限制自由表达和行为的人持这种观点，公开支持性自由的人也这样认为，比如评论家、学者卡米尔·帕利亚，在60年代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她的书（《性，艺术与美国文化》）里写道：

60年代人们尝试回归自然，结果成了一场灾难。伍德斯托克泥地里惬意的裸体浴和好玩的滑水只是一场短暂的卢梭主义幻梦。我们这一代人有享乐主义的反叛精神，尝试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前卫和极端的東西。我们问道：为何我要遵守法律？为什么我不能实践每一次性冲动？结果是我们退回到了野蛮人阶段。我们痛苦地发现，如果每个人自行其是，社会便无法实现正常运转。而且，60年代的无信仰滥交带来了艾滋病。这一带每个宣扬自由性爱的人都对艾滋病负有责任。60年代美国的革命不堪自身的重负，终于崩溃。

可革命真的崩溃了吗？像每个人一样，我也在近年的报纸上读到了无数民意调查，指出由于艾滋病的影响，单身酒吧不再是一夜情的圣地，已婚夫妇的出轨意愿有所降低，色情小说卖得也没那么好了。新清教主义正渗透进美国的精神。1984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是：《80年代的性——革命已经结束》；1986年，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主持的色情作品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暗示在美国土地上，新的道德战争、传统价值复兴即将来临，公民团体和执法官员不懈的努力也会阻止色情文学和色情杂志的传播、销售。

沃尔玛的业主拒绝在店里销售《花花公子》和其他男性杂志，《花花公子》公司也把封面设计得更低调些（不再有全裸的模特图片了），在报亭贩卖时也包上玻璃纸，希望阻拦那些乱翻书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花花公子》的有线电视台近些年却变得十分大胆（播放交合的情侣、勃起的阴茎、插入、吮吸阴茎和舐阴等镜头）。

除了这些，互联网的访问量也迅速增加，在我看来，现在很少有措施能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这个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肉体乐园”。互联网上日夜都有按摩师和换妻俱乐部的诱惑，当然也有孤独的男人和女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寻求着长期和短期的恋爱关系。我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2008年5月19日），讲的是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市举办第九届父女纯洁舞会 [195]，保证这些少女直到结婚都保持忠贞。而几个月之后，我在电视上看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为 一位17岁的未婚怀孕少女欢呼，就是老大党 [196] 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的女儿。

“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1986年，《时代周刊》杂志的理查德·斯滕格尔这样写道，“从来到新大陆那时起，追求个人自由和要求清教正义的矛盾就存在了，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主义的宽阔大道和乔纳森·爱德华兹大觉醒运动 [197] 的道德狂热之间的矛盾。时代的风气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国家的角色也随之摇摆。政府干预；政府退却；国家出手干预道德，然后洗手退出。镀金年代为改革年代强力的政府手段让道。咆哮的20年代之后就是30年代严格的海斯办公室 [198] 时期。层层包裹的50年代引出了解开纽扣的60年代。就在最近，对性解放的反应催生了重拾家庭价值的狂热运动，并让罗纳德里根高票当选总统。”

我还想补充一句，90年代家庭价值的缺席 也差点将比尔·克林顿赶下总统职位！

不过，要是有人觉得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调情、差点引咎辞职的案例应该 会让其他政客在性行为方面有所收敛，那就大错特错了——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就知道：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

兹，公开承认与一位女性竞选工作人员有婚外情。

2008年，艾略特·斯皮策辞去了纽约州州长一职，此前他宣称重视家庭价值，还热心参与反淫秽的活动，结果被曝出是网上应召女郎服务的常客。

斯皮策的政治继任者戴维·A.帕特森主动对媒体承认，他多年来对妻子不忠——而她也在另一访谈中承认自己对丈夫不忠。

2008年，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利维的同性恋男友告诉媒体，说他和州长（2004年辞职）以及州长夫人（现已分居）参与过几次三人做爱。虽然州长夫人否认了他的说法，前州长却没有。

2007年，拉里·克雷格参议员（共和党，爱达荷州）——结婚多年，强烈拥护家庭价值——被八位男同性恋者控告称与他有性关系。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的男卫生间里因猥亵行为被捕后不久，他态度激烈地否认了此事。1989年，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因为与男妓的交易，处于被驱逐、被谴责的风口浪尖之时，克雷格就是主张罢免弗兰克的一员。可弗兰克后来并没被丑闻打倒，一直在国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20多年前，快写完《邻人之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章写道：“……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尽管全美的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今天，我相信这段话依然适用。不过我也相信理查德·斯滕格尔1986年在《时代周刊》里写的“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所以，我的主要观点是，与民意调查公开发表的结果相反，我很怀疑21世纪的美国人——无论多么害怕感染艾滋病——会屈从于新清教主义的约束，远离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震惊公众的诱惑和特权。我更加坚信，那些年代里还是标新立异的东西，现在已经并入主流，只有新入职的新闻编辑会觉得“新奇”——或者那些每天被巨大职场压力牵着走的人，他们已经到了临界点，认为大众在私下里实践许久的东西还只是“趋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邻人之妻》是关于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关于体现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讲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而从另一层面上讲，这些信息也是不分时间、地点存在的。从黑暗时代和穴居时代起，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已经讲述过、发生过无数次，这本书的内容又怎么可能没有囊括其中？自从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纠缠在一起，两性之间的冲突一直没停过，这永恒的爱恨关系比巴别塔还要古老；因为男人和女人一直说着、理解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言语是无法翻译和解释的——无论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

塔·希尔曾任职的律师事务所里 [\[199\]](#) , 还是在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

《邻人之妻》里并无新事。

也没有过时。

盖伊·特立斯

2009年

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依书中出现顺序，截至2009年）

1

哈罗德·鲁宾，那位芝加哥出生的少年，50年代和洛杉矶一名叫黛安娜·韦伯的年轻裸体模特的照片有一段自慰的恋情——她日后促使他在芝加哥开了一家按摩院，提供服务的是手掌中抹了香脂的女按摩师，警察突袭时常常逮捕她们。他于2007年1月在芝加哥寿终正寝。鲁宾先生享年67岁。他一生只结了一次婚，离婚后，留下一个儿子朱尔斯·鲁宾，据引述，朱尔斯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登的讣告中说，他过世的父亲一生相信美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接触色情产品的权利。

2

黛安娜·韦伯成为裸体主义者时的志向当然不是成为全国男人的梦中女神。她在50年代为艺术摄影师摆裸体造型时相当天真地相信她仅仅是作为身体艺术的范本而被观看和欣赏，远离它在对艺术摄影没有鉴赏力的人——年轻的芝加哥人哈罗德·鲁宾——身上所激发的情欲。现在她年逾七旬，还是住在洛杉矶，常常裸体。

3

休·海夫纳现在83岁 [200]，住在洛杉矶的花花公子宅邸，1955年选择了黛安娜·韦伯作为他的杂志5月刊上的玩伴女郎。我2008年4月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心满意足地和三个丰满的金发女郎合住在豪华的寓所，她们也作为常客参加他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邻家女孩》（*The Girls Next Door*）。除了他的年龄和“课余兴趣”，他坚决把持对那本他1953年创办的杂志最终的编辑权力。

4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一个多世纪前就声名显赫，因为他是反对销售和散发色情图片和出版物全国首要的请愿人，年少时在康涅狄格州他控制不住自慰，以至于他认为这问题无法可解，除非从全国的报刊亭和邮政系统清除任何会诱使他勃起的東西。他逐渐成为控制狂和警惕的检查员，手握权柄能把大部分反对他禁制政策的出版商和自由思想家关押起来。有一个起身反对但最终被投入监牢的人，地下发行人D.M.本内特。

2006年，纽约阿默斯特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发行了本内特的传记——罗德里克·布拉德福德写的《D.M.本内特：真理探索者》。

关于考姆斯托克（卒于1915年）的书包括：《纯真在危难中：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与家庭繁衍》（*Imperiled Innocents: 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作者尼古拉·拜塞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人生与事业》（*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 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作者是安娜·路易斯·贝茨（美洲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本章讨论了休·海夫纳早年间的家庭生活和《花花公子》编辑生涯。他1949年第一次结婚娶了一位西北大学的同学，芝加哥人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1952年这对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第二个孩子大卫生于1955年，但是他们十年的婚姻在1959年终结。米尔德丽德不久就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但又迅速离婚，但休在此后的30年间都是单身汉，虽然他和像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这样的玩伴女郎（本书第24章对两人均有描述）保持了恋人关系。但是在1989年他娶了一位叫金伯丽·康拉德的玩伴女郎，生了两个儿子——生于1990年的马斯顿·海夫纳和生于1991年的库珀·海夫纳。尽管金伯丽和休·海夫纳于1999年分居，她仍旧和儿子们一起住在宅邸地产上一处分开的寓所。

海夫纳和金伯丽分手后——他说自己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对她忠贞不贰，他的“室友”更换得太频繁，很难说哪一位才是宅邸的第一夫人。目前获他青睐的三人组中有一个格外直言不讳的玩伴女郎，28岁的霍莉·麦迪逊，她2008年2月告诉《美国周刊》的记者，她和海夫纳打算要孩子。海夫纳先生对此无可奉告。

6

塞缪尔·罗思，一位博学的色情文学作家，对文学价值的领悟一贯准确，却因为鲁莽不顾反淫秽法，常常入狱，他1974年卒于纽约，享年80岁。他成年后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狱中度过，因为他发行了数十本在性方面露骨的书籍杂志，例如20年代发行的小说《尤利西斯》和30年代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在当局未许可的情况下暗中销售。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早前一项对罗思的判决，但判决书中的用语却缩小了对淫秽定义的范围。结果很多之前被禁止的书籍，现在大众都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架子上看到。

杰·A·格茨曼现在正在写塞缪尔·罗思的传记，他是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的英文系荣誉退休教授。[201]

7

巴尼·罗塞特，格罗夫出版社的前卫出版商，1959年利用最高法院刚放宽的淫秽案审判（由罗思案引起的），（第一次合法地）出版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这样的

作品，还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小说和电影，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格罗夫出版社发行。

2008年11月，86岁的巴尼·罗塞特在纽约第59届全国图书基金会年度晚宴上获得了“文学家奖”，以表彰他在文学自由最前线的事业。2008年早些时候，他也在全国反检查制度联盟赞助的活动中获得了类似的荣誉。他最近写完了一本自传，阿尔贡金出版社计划于2009年出版。[202]

8

约翰·布拉洛，洛杉矶的保险业经理，他60年代和女同事通奸的事不仅在第8章有详细描述，在《邻人之妻》后面大多数章节中都是一个参考事件，他现在76岁，已经从保险业退休很久了。他和第二任妻子辛西娅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但是他和第一任妻子朱迪斯保持了朋友关系，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定期去洛杉矶拜访她，通常他们现在44岁的儿子和42岁的女儿也会来。约翰·布拉洛已经很久没有和他曾经的情妇芭芭拉·威廉森联系过了。

9

芭芭拉·威廉森与约翰·威廉森45年来非独占性的婚恋，一点也没有受到她和约翰·布拉洛还有其他许多情人的亲密关系的影响，1973年卖掉在洛杉矶的自由性爱砂岩社区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全美四处旅行。最近几年他们在内华达州法伦市定居下来，主持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研究他们家里众多从虎斑猫到老虎不等的猫科动物。他们的组织叫作“与猛虎接触”。

10

约翰·威廉森现在76岁了。在有机会宣传他在意的项目的场合，他会接受媒体采访，出现在电视栏目中。2008年春天，他同意作为嘉宾出现在一部叫《性：一场革命》（*Sex: The Revolution*）的四集纪录片中，该纪录片由纽约的佩里电影公司制作（www.perryfilms.com）。2009年1月，他和妻子芭芭拉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 SandstoneCommunity.com，作为威廉森夫妇和很多追随者所认同的准则的信息中心。[203]

11

这一章涉及约翰·威廉森在亚拉巴马州的少年时代，以及创办砂岩之前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做空间工程师的日子，但基本上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12

这章提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性研究诊所，当约翰·威廉森思忖建

立砂岩隐居所的时候，这家诊所是他脑中的一个模范样板。

一本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新书将由基础书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书名是《性爱大师》^[204]，作者是托马斯·梅尔。书中透露威廉·马斯特斯博士与弗吉尼亚·约翰森结婚21年后，在1992年圣诞节要求离婚，使她大为震惊。78岁高龄的他爱上了一个75岁的女人，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就认识但并不熟悉。他们于1993年结婚。2001年马斯特斯85岁时在图森市的临终关怀医院去世，死于帕金森病的并发症。弗吉尼亚·约翰森现在83岁，没有再婚，独自住在圣路易斯市的公寓里。^[205]曾经名声大噪的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与他们的婚姻以及其他托马斯·梅尔在新书中提及的因素一起逝去。他写道：

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他们的解剖学发现和临床描述推行用医疗的方法处理性爱，这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即由美国制药业催生的以药物引起性高潮。大制药厂从前处于精神性欲研究的边缘，现在从伟哥以及其他解决勃起障碍的热卖品中大赚了一笔。1998年把伟哥推向市场的公司辉瑞在十年里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中盈利13亿美元。

梅尔先生继续解释说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医学为导向的方法——有似乎不可思议的80%的治愈率——现在由一个小瓶子里能百分百成功的解决方案取代”。

13

创办砂岩的伴侣们——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以及其他作为大家庭成员在70年代初加入他们的伴侣们，现在住在美国各个地方，相距甚远。但是一个砂岩成员，那时帮助约翰·威廉森管理砂岩的马丁·齐特，他目前住在帕萨迪纳市，承担了某种砂岩老成员负责人的职责。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如何找到以前的成员。他也在写一个关于他自己在砂岩的经历的电影剧本。

14

朱迪斯·布拉洛在砂岩的恋情在70年代初导致了她和约翰·布拉洛的婚姻破裂。她现在73岁，独身在洛杉矶住了几十年，她正和一个男人约会并有与之结婚的计划。

15

本章详述了阿尔·戈尔茨坦70年代初创办杂志《搞》的事业。他和他的期刊成功了几年，但之后一系列因素——健康问题、花费巨大的离

婚、乱花钱且经营不善——最终导致了她的破产。2007年，《纽约邮报》报道他拒不归还向某位前妻借的将近5万美元借款。阿尔·戈尔茨坦那时71岁，无家可归。[206]

16

本章描述了70年代初按摩院的激增，以及它们如何在像《搞》这样的报刊上登广告以吸引人们关注。但是现在按摩院在互联网上登广告，这当然加速了《搞》和其他70年代涉及性交易的抢手期刊盈利下滑并最终停刊的噩运。

17

这章提及的交换性伴侣活动在70年代当然不局限于砂岩隐居所。摇摆俱乐部（Swing Club）全国都是，像上一段提到的按摩院一样，它们以性为导向的期刊上宣传它们的活动。但是现在这些交换性伴侣的人也在用互联网联系；而且据一名正在做调查的作家说，交换性伴侣的活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盛行。这名作家杰夫·舒尔特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东汉普顿，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网上求爱”的书。他也告诉我，在新泽西州的大洋城——我出生的有7000户人的社区，一个世纪前由卫理公会牧师建立，在那儿直到今天销售酒精饮料仍旧是违法的——有20对情侣是Adultfriendfinder.com的会员，另外14对是Swinglifestyle.com的会员。

18

本章大部分关注的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他19世纪中期在纽约州奥奈达市建立的多偶制社区。对我来说，诺伊斯和他的追随者们那时候的活动，似乎与警察2008年4月查抄的西得克萨斯州多偶论者社区里的活动类似。当局抓住了400多名社区里的孩子，说是以一通电话为线索找到了他们，据说该电话是由一名16岁的女孩儿打来的，投诉她49岁丈夫的行为。警方没有找到这名女孩儿，也没有核实是谁据传闻打了这通投诉电话。

19

15英亩的砂岩地产——它的主屋坐落在1700英尺高的马利布群山间——今天看起来和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70年代经营他们的社区时别无二致。它目前作为农场由一个来自圣莫尼卡的家族所有和使用，这个家族以开发地产发家。

20

本章介绍的亚历克斯·康福特博士，那位英国生物学家，也是砂岩的常客——他在拜访时写下了世界畅销书《性的愉悦》（*The Joy of Sex*）——因脑出血卒于1991年，享年71岁。2009年皇冠出版社再版了由苏珊·奎利亚姆修订的《性的愉悦》。

70年代初和亚历克斯·康福特博士一起是砂岩常客的另一位学界人物是萨丽·宾福德，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邻人之妻》将她描述为一位“有着灰白色头发、优雅的46岁离异女人，她美丽匀称的身体总是让一个又一个恋人热情洋溢”。

萨丽·宾福德博士在1993年2月20日自杀，留下了这封遗书：

致我爱的人们，

你们中大多数都知道我考虑离开已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出于绝望或消沉，而是出于让事情善终的渴望。我已足够幸运能有精彩的一生，一大群（难以置信的）朋友和爱人的爱与支持使我的生命无比丰富。我不想让这生命在衰弱和依赖的日子里焦枯。我参加过足够多赌局，知道在你们领先（或至少平局）的时候退出是明智的。你们中熟悉我生日的人会看出，我选择离开的日子让我可以有如下墓志铭：

永远69岁！ [207]

爱和永别，

萨丽

21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1970年作为萨丽·宾福德的客人有时会到砂岩去——1971年他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暴露出美国政府欺骗掩盖在越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历史，这之后尼克松白宫将他视为恶棍反派——他现在77岁，精力丰沛，活跃地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22

查尔斯·基廷，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辛辛那提市检察官，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理查德·尼克松选他做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领袖——他之后入狱，因为卷入一起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储蓄贷款丑闻，此事令纳税人到21世纪都负担繁重。2008年秋天奥巴马——麦凯恩选战快结束的时候，基廷的名字从遗忘中又浮现，政治和社论撰稿人提醒读者80年代末时，约翰·麦凯恩曾是从基廷那里收过捐款的五位参议员之一，这五人也曾被指控试图介入保护基廷的林肯储蓄贷款协会免受法责。 [208]

23

本章详述了斯坦利·弗莱什曼这位残疾但不屈不挠的辩护律师的事业，他1999年9月卒于洛杉矶，享年79岁。作为第一修正案专家，他的委托人名单上有很多本书着重描写的人——砂岩的房客、黛安娜·韦伯、

色情读物出版商威廉·哈姆林，还有制作推销了X级电影《深喉》的制片人。

《深喉》的导演杰拉德·达米亚诺2008年10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迈尔斯堡死于中风，享年80岁。这部电影1972年上映，票房如此成功，常被称为色情电影界的《飘》。

24

本章记述了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杂志以及他其他企业面临的财政困难，这种情况持续到2008年公司的54周年庆。据估计，杂志的月销售量从80年代的340万份下滑到260万份。《纽约时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将这一情况及其广告收入的下跌归因为，这反映出“新旧媒体之间的挤榨”以及“在互联网上轻易就可以看到一丝不挂的肉体”。

25

在《邻人之妻》的最后一章我作为本书作者客串出场，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以表示不管曾和写到的一些人多么亲密地接触，我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做一个观察者。不过，我经常怀疑我的婚姻会否因写作这本书而破裂。但是它持续了下来。2009年6月，南和我将要庆祝我们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

译后记

我总是疏离的，和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想着假如把正在做的事情写下来会怎样，我总是对我能写下来的故事感兴趣。我也许正在打网球，但是心里想的是写下网球场的一个场景。可以说这是我做人最大的失败。

——盖伊·特立斯

《巴黎评论》2009年特立斯专访

1972年的一天，40岁的盖伊·特立斯走进纽约一家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开启了他长达九年、跨越整个美国的调查采访，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邻人之妻》，以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抽丝剥茧般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该书甫一出版即毁誉参半：有誉之为文化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也有对其强烈的道德抨击，书中一些人物物化女性的态度也激怒了女权主义者，最终这些剧烈的反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特立斯和他家人的生活。

现在，《邻人之妻》的中文版第一次引入国内，距离其在美国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38年，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中，不知同样的内容会引起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反响？也许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本书极为丰富、真实、多样的内容，任何反响和讨论都不会是单线条的。确实，当我们受文景委托翻译这本书时，就被它多重复杂的气质吸引：它既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百科全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出版、法律、宗教、家庭、自发组织的俱乐部等；也是一部错综复杂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细腻的笔法串联起了若干精彩而真实的故事；它更是出色的深度新闻报道，其对“参与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的极致运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科学学科有所启示。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有一种让我们既好奇又迷惑的特殊气质：特立斯似乎对笔下真实的人物不持褒贬，以同样的热忱详细展现人物生活的各个侧面，在这种热忱中有一种对于细节的迷恋。随着翻译的进展我们慢慢开始了解特立斯，发现他与其作品的关系是理解这种特质的关键，要把他自己、他的采访、记录、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这个整体也在回应他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的问题。

1932年特立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洋城，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他的父母在那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和女装店。特立斯小时候在妈妈的女装店里帮忙，看到他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如何和顾客交谈，顾客如何向他母亲吐露心声。从这些顾客的个人故事中，特立斯也第一次意识到了外面

的世界。上高一时，特立斯为当地一家报纸写高中生活专栏，这帮他找到了自己在同学中的位置，而他之前因为穿着过于正式（他的衣服都是做裁缝的爸爸为他量身定做的），与这个群体一直是格格不入的。采访和报道给了他与同学们接触的理由。他觉得自己就像卖衣服给贵妇的母亲一样，即使并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成员，新闻采访让他有了和这些人在一起的理由。

也许特立斯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与群体若即若离的关系，会贯穿他的一生。他在《纽约时报》和《时尚先生》当记者时认真而执着，总能采访到大量私人故事；但与这种深入程度相悖，他却似乎一直在采访时和采访后保持一种超脱，受访者很少能在情感或者其他方面影响到他。在为《邻人之妻》做调查时也是如此，虽然他亲身参与所有私密的活动——在性开放的砂岩俱乐部，在按摩院，但他却总有一部分自我跳出这些场景之外，反思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过去等。他既在这里也不在这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参与观察”的理想状态：他一直在既亲身参与活动，又超脱出来观察这些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特立斯在最亲密的私人生活中也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他接下来想写一本关于自己50多年婚姻的书，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来观察它的亲密、复杂以及不和谐之处。或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其实也一直是一个旁观者。他从最开始就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他和妻子写的信（他会在信上标明是在什么情境下收到了这封信）、拍的照片等。他的妻子南·特立斯是著名的编辑，聪明、有人脉、经济独立，在盖伊·特立斯看来，她完全没有必要维持这段婚姻，何况他写作和发表《邻人之妻》时的行为还深深伤害了她的名誉。为了写作这本关于婚姻的新书，他雇佣研究助理来采访自己的妻子，想要知道妻子内心深处的想法，而不是她常常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来的“美好婚姻”。对于他写这本书，南有时接受有时反对。当特立斯的编辑打电话问南时，她说特立斯想写什么是他的自由，但是她恐怕特立斯并不理解什么是婚姻。

如此看来，观察与写作是特立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若即若离是他与人们的关系。最初那个写新闻的高中生，一直影影绰绰地出现，但是他想要成长的冲动固化成了一种模式：他探索和报道周围的一切，但是他仍旧不属于任何群体，而一个没有和他人融合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这种不满足又会推动新一轮同样的探索。这种模式是执着的也是永不满足的，它似乎一步步将世界收于囊中，但是每一步“前进”都会退回原点。这是特立斯的“纯粹、强烈、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想要通过探寻别人的生活，来扩展自我经验的疆界”，这也解释了他对细节的迷恋。《邻人之妻》这本书确实是这种好奇心的集中表达，让人们看到他可以走多远。

无疑，这种模式是由特立斯的个人经历决定的，但是和他书中的人物一样，特立斯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大背景勾连在一起，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特立斯生于“二战”前，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

叛。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虽然在美国，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也正是在这时，“欢愉”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并不是偶然的。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邻人之妻》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海夫纳和约翰·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把“性的欢愉”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后者把“性的欢愉”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的社会理想，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中，特立斯也反对美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常表达对父母忠贞不贰的婚姻生活的轻视。不同的是，他没有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联，而是以永恒的观察者的身份游离于所有群体之外。这固然与特立斯的性格有关，他不像海夫纳和威廉森那样有克里斯玛型人格。但是他的状态却也许更加纯粹、诚实、典型，隐喻出海夫纳和威廉森事业的实质。当威廉森退出砂岩俱乐部后，之前共同体的形态也慢慢消散，这说明他们并没能形成人人自发并维持的真正共同体，最终砂岩也耐人寻味地变成了商业化经营。海夫纳的商业帝国，更加不是以建立所谓共同体为理想，他的“新生活方式”，诉诸个体的欲望，并以消费为方式将这些个体编进资本的大网。这其实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本身的形态：原子化的个体被纳入一个个人无力影响的大系统。

也就是说，特立斯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人生，他若即若离又执着的观察、采访、搜集整理——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缩影。他用来存放素材和写作的地下室，没有窗子，仿佛没有时光的流逝。一如这个永远向前，却又原地未动的时代。特立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工匠精神，让他想要尽善尽美地呈现这一切。他本身所具有的好品质，例如对于小人物的关心、正义感、对历史的尊重，也给这种浩繁的呈现注入一抹温柔的色彩。他深信这样的写作已经堪比文学作品，也许还带着更胜一筹的真实。可以看到，他对于“新新闻主义”的标签是不以为意的，却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想要和同辈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一较短长。

因此当主流文学界忽视他的作品时，他愤懑的心情溢于言表，像受到伤害的孩子。确实，文学是他的成长所指向的方向，他对人的兴趣和探索，必然会使他的野心从探求人物的历史过渡到探求人物深邃的内心，而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的野心。但是前文提到的他成长过程中“固化的模式”，加上这个个人难以与他人融合的时代，使得这一步过渡成了一个他很难迈过的坎儿。他也许确实将非虚构写作的触角延伸到了通常小说才可以到达的领域——人物的心理世界、人物的私生活等，但是在他能够真正“在这里”、真正与人共情之前，他离真正的文学也确实仍有一个拥抱的距离。这个时代的道理也是如此，纯粹的自由只能将人还原为

互不相干的个体，它无法建立起任何东西，在它能够让人们跨越自身的边界相爱之前，它离真正的自由也仍旧只有一个拥抱的距离。

这一切构成了特立斯的凝视。当时代挟裹着所有悸动滚滚而来时，特立斯回以凝视。我们邀请读者一起走进他的凝视，并在其中照见你我。

[1] 拉德克里夫·霍尔（Radclyffe Hall, 1880-1943），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早年以诗闻名，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一生共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六部，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描写女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孤寂深渊》（*The Well of Loneliness*）。——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全书下同

[2] 凯蒂·洛菲（Katie Roiphe, 1968-），美国作家和记者，代表作为《宿醉之晨：性、恐惧与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

[3] 玩伴女郎（playmate），《花花公子》杂志中“精选当月玩伴”页的女模特。

[4] 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时代行政体系中高级官吏的称谓。

[5] 流金岁月（Old Gold），美国罗利拉德烟草公司的一款香烟品牌。

[6] “大天空”（big-sky），常用来意指蒙大拿州。

[7] 巴尔加招贴画（Varga pinups），指由秘鲁籍招贴女郎画家阿尔韦托·巴尔加斯（Alberto Vargas, 1896-1982）所绘制的招贴画。他在20世纪40年代为《时尚先生》杂志创作了许多以女人为主角的招贴画，这些女郎被称为“巴尔加女郎”。

[8] 贵格会（Quaker），又名教友派、公谊会，正式名称是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成立于17世纪，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贵格”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贵格会的特点是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最初也没有专职的神父，无圣礼与节日，而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始终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

[9] 本书于1980年首次出版，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确属在位最久的英国统治者（1837-1901，共63年），而如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即位，已逾66年。——编者注

[10] 塞缪尔·科尔盖特（Samuel Colgate, 1822-189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他的父亲，威廉·科尔盖特（William Colgate, 1783-1857）创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肥皂公司，中文通译为“高露洁”。

[11] 猎巫原指搜捕女巫与巫师或施行巫术的证据，将被指控的人带上宗教审判法庭。这一特定行为从12世纪开始，到16世纪臻于顶峰。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

[12] 此处的监狱（penitentiary）在美国一些司法管辖区中专指县或其他地方监狱，关押民事违法者或短期监禁犯。犯人通常被迫劳动，以使其改过自新。

[13] “小蓝书”（Little Blue Books），是1919-1978年间朱利叶斯名下的公司出版的系列平装书籍，内容为文学名著、思想常识类作品。由于其价格便宜、携带方便，在20世纪初期曾风靡全美。

[14] 灯黑（lamp black），从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中（如从带烟油灯的火焰中）沉积出的、细而疏松的黑煤烟。

[15]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美国作家、漫画家，以冷面滑稽的讽刺小说见长。

[16] 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 1905-1970），爱尔兰裔美国作家，关注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异，擅长描绘有社交方面野心的人物。

[17] W.C.T.U.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

[18] 吉布森女郎, 美国插画家查尔斯·吉布森 (Charles Dana Gibson, 1867-1944) 所画的独立、美丽的女性形象, 成为20世纪初美国女性的标志。齐格飞女郎, 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百老汇的齐格飞 (Ziegfeld) 歌舞团中的女演员, 当时这些演员拥有大量崇拜者和爱慕者。戈尔德温女郎, 塞缪尔·戈尔德温 (Samule Goldwyn, 1879-1974) 创办的音乐股份公司旗下有不少名演员、舞者和模特。鲍尔斯模特, 1923年, 被称为“模特业之父”的约翰·罗伯特·鲍尔斯 (John Robert Powers, 1892-1977) 创办模特学校, 该校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全盛期, 很多模特后来进入好莱坞发展。

[19] 皮尔格林 (Pilgrim) , 意为“朝圣者”。

[20] 《玛乔丽晨星》 (Marjorie Morningstar) , 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1915-) 1955年创作的小说, 主人公是个想当演员的女人。

[21] 伦尼·布鲁斯 (Lenny Bruce, 1925-1966) , 美国脱口秀演员、社会批评家、讽刺作家、剧作家。多次因演出用语而以“淫秽罪”被捕。

[22] 下东区 (Lower East Side) , 纽约市曼哈顿区沿东河南端一带, 犹太移民聚居地。

[23] 爱玛·戈德曼 (Emma Goldman, 1869-1940) ,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因倡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她被媒体冠以“红色爱玛”的绰号。亚历山大·别尔克曼 (Alexander Berkman, 1870-1936) , 以政治激进主义写作著称的无政府主义者, 也是爱玛·戈德曼的爱人与终生挚友。

[24] 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 纽约市曼哈顿南部下西城的一个大型居住区, 被称为艺术家的避风港、波希米亚主义首都、现代LGBT运动的摇篮, 也是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反文化运动的诞生地。

[25] 亚瑟·西蒙斯 (Arthur Symons, 1865-1945) , 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杂志编辑, 受现代法国作家尤其是魏尔伦的影响很深, 诗作充满情色意象, 描写鲜明。乔治·穆尔 (George Moore, 1852-1933) , 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 曾留学法国学习绘画, 深受自然主义的影响。其代表作有《一个青年人的自白》《爱洛伊丝和阿贝拉》《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埃伯利街谈话录》等。

[26] 福利岛 (Welfare Island) , 纽约东河中的岛屿, 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和皇后区之间。1828年划归纽约市, 在此建立工作站和监狱, 因而恶名远播。旧名布莱克韦尔岛, 1921年改名福利岛, 1973年为纪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再次改名罗斯福岛。

[27]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Alfred A.Knopf) , 著名的美国出版人, 他于1915年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公司, 时至今日, 这家公司在国际出版格局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28] 莉莲·史密斯 (Lillian Smith, 1897-1966) , 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代表作《奇怪水果》 (Strange Fruit) 描绘了当时被禁止、具有争议性的种族间恋爱。厄斯金·考德威尔 (Erskine Caldwell, 1903-1987) , 美国作家。他擅长写美国南部的贫穷、种族冲突和社会问题, 代表作有《烟草之路》 (Tobacco Road) 和《上帝的小小田地》 (God's Little Acre) 等。因后者描写农场家庭成员对性和金钱的执念, 纽约反堕落协会要求当地法庭禁止其出版。埃德蒙·威尔逊 (Edmund Wilson, 1895-1972) , 美国作家、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短篇小说集《赫卡特县回忆录》 (Memoirs of Hecate County) 因含有详尽的性描写而被禁止销售。

[29] 詹姆斯·法雷尔 (James T.Farrell, 1904-1979) , 美国小说家。因代表作《斯塔兹·朗尼

根》三部曲（Studs Lonigan trilogy）而知名，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芝加哥南区工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活。

[30] 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案，1948年8月，《时代》周刊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向当局举报民主党人希斯是他的党内同志，称希斯和他的同志们企图在政府机关内安插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钱伯斯的大胆“举证”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希斯立刻被推上了潮头，不得不站出来在法庭上与钱伯斯对质。希斯后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

[31]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38年至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主机构。它名义上是调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组织“违反美国利益”的“非美国的”活动，实际上是反共、反民主，迫害共产党、进步工会和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具。

[32] 米奇·杰尔克（Mickey Jelke）案，指1953年米奇·杰尔克引诱两名年轻女性帕特·沃德和玛格丽特·科多瓦卖淫一案。

[33] 奥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家、作家，继王尔德之后唯美主义运动的突出人物。画风深受新艺术的曲线风格和日本木刻粗犷感的影响，画作中明显的性感和情欲让批评家及公众吃惊，有天才的插图画家之誉。

[34] 盖尔语（Gaelic），主要用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凯尔特文化区，发音类似于德语。包括苏格兰盖尔语和爱尔兰盖尔语。

[35]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知名文学杂志《地平线》（*Horizon*）主编。阿内斯·尼恩（Anais Nin，1903-1977），出生于法国的美国女作家，世界最著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西班牙舞蹈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她被誉为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

[36] 劳伦斯·都瑞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旅行作家，代表作为《亚历山大港四部曲》。

[37] 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G.P.Putnam's Sons），成立于1838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出版社，是全美首家设立伦敦分部的出版社。

[38] 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1923-2004），美国著名时尚摄影师。

[39] 社交名人录（Social Register），美国上流社会家庭的姓名、地址索引手册。

[40]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英国作家、记者，最知名的作品有詹姆斯·邦德系列和儿童故事《万能飞天车》等。

[41] “新边疆”（New Frontier），这是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在提名演说中，肯尼迪说：“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60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和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

[42] 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美国最老字号的服装品牌之一，亚伯拉罕·林肯是它的忠实顾客。

[43] 好莱坞男生俱乐部（Boy's Club of Hollywood），救济贫困少年儿童的慈善组织。

[44] 哈利·胡迪尼 (Harry Houdini, 1874-1926), 本名埃里希·怀兹, 被称为史上最伟大魔术师、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维吉尔·格里森 (Virgil Grissom, 1926-1967),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 执行过水星—红石4号、双子座3号以及阿波罗1号任务。1967年1月27日, 格里森与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在阿波罗1号的一次例行测试中因舱内大火牺牲。查尔斯·爱迪生 (Charles Edison, 1890-1969), 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他是商人, 曾经出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和部长, 还当过新泽西州第42任州长。沃尔特·克莱斯勒 (Walter Chrysler, 1875-1940), 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汽车的总裁和创始人。乔治·卡斯特 (George Custer, 1839-1876), 美国骑兵军官。美国内战期间, 他紧追南方联盟军总司令李将军, 迫使其投降。1876年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的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

[45] 扶轮社 (Rotary Club), 一个全球性的由商人和职业人员组织的慈善团体, 在全球范围内推销经营管理理念, 并进行一些人道主义援助项目。青年商会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 旨在让青年人步入社会的服务性社团, 1915年由亨利·格森比尔创办, 初名“青年励进会”。1919年该社团得到圣路易斯市商会的赞助, 改名“青年商会”, 至1920年6月, 发展为美国全国性的青年商会。

[46] 约翰·伯奇协会 (John Birch Society), 美国的反共极右组织, 支持限制政府权力, 反对财富重新分配和经济干预。该组织反对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 认为该运动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

[47] 罗杰斯·霍恩斯比 (Rogers Hornsby, 1896-1963), 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教练。1963年, 因心脏病发去世。

[48] 什一奉献 (Tithing), 基督教教义规定, 教民须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

[49] 克里奥尔人 (Creoles), 指首批定居在西印度群岛或美国南部的欧洲人的后裔。

[50] 诺福克 (Norfolk),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北部城市。

[51] 原文为Taramolinas, 疑为刊误, 似应为Torremolinos, 是西班牙太阳海岸的中心城市。

[52] 卢奥 (Luau), 夏威夷语音译, 表示传统夏威夷聚会或宴会。

[53] 波纳佩岛 (Ponape), 波恩佩岛 (Pohnpei) 的旧称, 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最大的岛屿。

[54] 特鲁克岛 (Truk), 丘克群岛 (Chuuk Islands) 的旧称, 属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55] 《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 1935年上映的米高梅公司拍摄的电影。该片改编自美国小说家查尔斯·诺德霍夫 (Charles Nordhoff, 1887-1947) 和詹姆斯·诺曼·霍尔 (James Norman Hall, 1887-1951) 合著的同名小说, 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56] 韦恩赫尔·冯·布劳恩 (Wernher von Braun, 1912-1977), 德、美火箭专家, 20世纪航天事业的先驱之一, 曾是著名的V-1和V-2火箭的总设计师。纳粹德国战败后, 美国将他和他的设计小组带到美国。移居美国后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研究开发项目的主设计师, 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

[57] 斯普特尼克号 (Sputnik), 又称卫星1号, 是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 苏联1957年10月4日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将其发射升空。

[58] 代顿 (Dayton), 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59] 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 1923-1998），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执行过水星-红石3号以及阿波罗14号任务。谢泼德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也是第五个踏上月球的人。约翰·格伦（John Herschel Glenn, 1921-2016），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执行过水星-大力神6号以及STS-95任务。格伦是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宇航员。

[60] 安·兰德（Ayn Rand, 1905-1982），原名阿丽萨·齐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Alisa Zinovyevna Rosenbaum），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数本畅销小说。

[61] 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美国纽约市附近的小岛，1892-1943年间是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62] F.U.C.K.为Freedom Under Clark Kerr的缩写。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1911-2003），美国教育改革家、劳动和工业关系经济学家。曾经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12届校长（1958-1967）。

[63] 盖佐·罗海姆（Géza Róheim, 1891-1953），匈牙利心理分析学家、人类学家。

[64] 排便控制道德观（sphincter morality），指婴儿在学会控制排便时期形成的节俭、顽固等人格特征。

[65] 罗尔夫健身法（rolfing），姿势训练与肌肉按摩相结合的健身法。

[66] 弗里德里希·S·佩尔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 1893-1970），德裔心理学家、精神病学专家，创立了格式塔疗法，强调人是有组织的整体，把心理或行为看作情感、思想、行动的整合过程。

[67]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 1895-1986），印度哲学家，同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他是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深入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人，在20世纪一度对西方哲学、宗教产生过重大影响。

[68] 纳芙蒂蒂（Nefertiti），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纳顿的王后。

[69] 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 1899-1978），美国历史学家、记者，代表作是有关美国内战的一系列作品。

[70]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2018），美国作家，代表作包括描述美国犹太人生活的小说《再见，哥伦布》（1959），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肯定。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剧情包含哲学思想，模糊现实与虚构，探索犹太人和美国人身份认同。他因《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逐渐成名，这本小说也入选了《时代》杂志百佳小说。

[71] 莫莉·布鲁姆（Molly Bloom），詹姆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男主角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妻子，放荡不羁，追求肉欲。整部小说在她的意识流中结束。

[72] 弗兰西斯·达菲（Francis Duffy, 1871-1932），加拿大裔美国军人、罗马天主教神父。

[73] 黑魔鬼（Black Devils），香烟品牌名，此处指代黑人。

[74]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正式行政区名为克林顿，又俗称为西中城，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西岸的一个地区。地狱厨房早年是曼哈顿岛上一个著名的贫民窟，聚居着由爱尔兰裔移民组成的劳工阶层，以杂乱落后的居住品质、严重的族群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

[75]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 1882-1947），美国意大利裔政治家、美国共和党成员，曾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迪亚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的强力支持者，因成功领导纽约市

从大萧条中复苏而闻名全国，纽约都会区三大机场之一的拉瓜迪亚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76]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戈尔出身于显赫的政治家庭，是美国政治的犀利评论者。他于1948年写的小说《城与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作为美国第一部明确反映同性恋的小说引起社会争议。

[77] “彼得”代指男性生殖器。

[78] H.L.蒙肯（H.L.Mencken，1880-1956），美国记者、讽刺作家、文化评论家。

[79] 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出版巨头，创始人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该集团拥有《时尚》《时尚先生》《时尚芭莎》《ELLE》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杂志。

[80] 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1880-1946），美国记者、作家，最为知名的是描写禁酒时期纽约百老汇的短篇小说。“达蒙·鲁尼恩笔下的那号人物”通常指出生在布鲁克林或者中城的（由富人的情妇、品行可疑的女人等构成的）“风流社会”人士。

[81] “暖手笼”（muff），在俚语中代指女阴。

[82] 哈莱姆（Harlem），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贫困与犯罪频发的地区。

[83]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1930年诞生于美国底特律，是美国最大的工人协会。

[84] 以上三人都是美国著名电台主播。

[85] WBAI，纽约太平洋广播电台（Pacific Radio Network）的一个非营利性的频道。

[86] 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国作家、记者、诗人、剧作家及影评人，在20世纪40年代，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影评人之一。他的自传体小说《家中丧事》（*A Death in the Family*，1957）在其身后为他赢得了1958年普利策奖。

[87] 《村声》（*The Village Voice*）周报于1955年10月26日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创办，意为该村的声音，因所在地有大量艺术家聚居，故报纸着眼于文化艺术的报道与评论，持左翼立场，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力。

[88] 孤儿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同名连环漫画中的人物，沃巴克斯是位善良的百万富翁，收养孤儿安妮做养女。

[89] 爵士时代（Jazz Age），一般指“一战”以后，经济大萧条以前约十年时间。这段时间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90] 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Cornelius Vanderbilt Whitney，1899-1992），美国实业家、电影制作人、作家，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是美国两大著名家族范德比尔特和惠特尼家族的成员。

[91] 《白日美人》（*Belle du Jour*），法国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1900-1983）的电影作品，片中讲述年轻漂亮的太太塞韦丽娜不满足无聊的家庭生活，每天下午偷偷去妓院卖淫，被冠以“白日美人”的别名。

[92] 古鲁（guru），本指印度教、锡克教中的精神导师、圣人。

[93] 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硬科幻小说大师，其代表作有《星际伞兵》《严厉的月亮》《双星》《银河系公民》《银河行商》等。

[94] 不同教派对十诫的排序略有不同，天主教中第九诫是“不可贪恋邻人的妻子”。

[95]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任美国参议员。他一生政治观点多变灵活。1957年，美国参议院将韦伯斯特评选为“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

[96] 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805-1844），旧译斯密约瑟。

[97] 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1801-1877），旧译杨百翰。

[98] 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1809-1890），美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在美国推广傅立叶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人类的社会命运》（*Social Destiny of Man*）。

[99] 奋兴派（Revivalists），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派别，亦称“教会复兴派”。19世纪，产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为谋求教会的“复兴”，该派制着重鼓动宗教狂热。19世纪中叶，被称作“奋兴布道家”的穆迪、桑基等人先后在美、英各地举行“奋兴布道会”，宣扬“教会大复兴”。有些“奋兴会”在举行布道会时哭喊喧闹，他们称之为“心灵奋兴”（也叫“灵性复兴”或“被圣灵充满”）。

[100] 至善论（Perfectionism）的前提是任何人只要皈依基督就可以得救，而且得救之后还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地。这一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加尔文保守的“预定论”教义，确立了人的地位，并且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

[101] 威廉·洛伊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记者、妇女参政论者、社会改革家。1831年他与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Liberator*）。

[102] 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1775-1863），长老会牧师、美国禁酒协会的成立者和领导人，也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共有13个子女，其中许多人有所成就。

[103] 1872年，媒体披露亨利·比彻与副手西奥多·蒂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有婚外情。1874年西奥多提起诉讼，最终以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此案是当时美国最为著名的案件之一。

[104] 维多利亚女王一生育有九个子女。

[105]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旧译山额夫人，美国控制生育运动领导人，提倡优生学，美国生育控制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创办人，1922年曾到中国宣传生育控制。

[106]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作家、发明家、社会学者及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

[107] 山德士上校（Colonel Sanders），快餐肯德基的创始人。

[108] 褐砂石房屋（brownstones），一种用褐砂石作外墙的楼房，一般为富有阶层所居住。

[109] 曼特罗（mantra），印度教和大乘佛教中的祷文、符咒。

[110] 庞蒂亚克（Pontiac），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09年之前生产的汽车品牌。

[111] 生命之符（ankh），又称“安卡”，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之一，解作“生命”之意，形象是一个上面有圆柄的十字。

[112] 康福特（Comfort），在英文中有舒适、怡然自得的意思。

[113] 普罗富莫应召女郎丑闻，是指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政治家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1915-2006）在1961年与一名19岁的应召女郎克里斯蒂娜·基勒（Christine Keeler）有过短暂的关系，而基勒在同一时期也与苏联驻英大使馆的高级海军武官叶夫根耶夫·伊万诺夫（Yevgeny Ivanov，1926-1994）有染。因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该事件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3年普罗富莫被迫辞去陆军大臣、下议院议员和枢密院顾问的职务。

[114] 《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1977年由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1912-1992）执导的剧情片，讲述了一名女教师晚上到酒吧寻欢，不料惹祸上身，最后引起了一场暴烈的大屠杀。

[115]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 II，1900-1965），美国政治家，以其辩论技巧闻名，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但皆败选。后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6] 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1931-2014）、伊莱恩·梅（Elaine May，1932-）、塞弗恩·达登（Severn Darden，1929-1995）、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1935-）均为美国电影与戏剧从业者。其中尼科尔斯曾在1967年凭借《毕业生》一片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伊莱恩·梅与迈克·尼科尔斯合演即兴喜剧系列节目《尼科尔斯与梅》，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过很大影响。

[117] 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根据时任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的提案于1946年设立。

[118] 贝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他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兴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

[119] 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913年在《傅满洲的谜团》（*The Mystery of Dr. Fu Manchu*）一书中首次出现。按照书中的描述，傅满洲是一个瘦高秃头、倒竖两条长眉、面目阴险的人。这个角色还通过戏剧、电视、广播和动漫等方式活跃了超过90年的时间。他标志性的胡须被称作“傅满洲式胡子”。

[120] 兰德（Rand），一所著名智库公司。

[121] 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美国人艾娣（Mary Baker Eddy，1821-1910）1879年所创的基督教教派。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靠精神来治疗，并称此为基督教的科学。

[122] 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美国童子军的最高级别。

[123] 厄尔·沃伦（Earl Warren，1891-1974），美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担任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53-1969年间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124] 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886-1971），美国政治家、法学家，曾于1927-1937年担任民主党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并于1939-1971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哈伦（John Harlan，1899-1971），美国法学家，1955-1971年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亚伯·方特斯

(Abe Fortas, 1910-1982), 自1965年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至1969年被迫离职。

[125] 正派文学公民联盟, the Citizens for Decent Literature, 简称CDL。

[126] 天主教良风团 (the Catholic Legion of Decency), 于1933年由辛辛那提大主教约翰·麦克尼古拉斯建立, 致力于抗击美国电影中天主教教会认为令人憎恶的内容。

[127] X级, 在美国电影分级中指包含儿童不宜的情节影片。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 有许多主流电影如《午夜牛郎》《发条橙》《巴黎最后的探戈》等都被认为是X级。

[128] 服务俱乐部 (service club), 一种自愿的非营利性组织, 成员定期聚会组织慈善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

[129]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简称ACLU), 是美国的一个大型非营利组织, 成立于1920年, 总部设于纽约市, 其目的是“捍卫和维护美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 这个国度里美国公民享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联盟通过诉讼、推动立法以及社区教育达到其目标。

[130] 门宁格基金会 (Menninger Foundation), 1919年由门宁格家族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市建立, 包括一家诊所、一家疗养院和一座精神病学学校。

[131] 美国商业促进会 (Better Business Bureau), 成立于1912年, 是一个由地方商业促进会组织的一些私人特许经营商组成的公司, 由商业促进委员会统一领导。其目标是促进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 以便买家和卖家能够建立互信。

[132] 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著述颇丰, 其中以他12卷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汤因比治史, 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 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 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26种文明, 并断言, 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于, 它在少数创造者的领导下成功地应对了环境的挑战。

[133] 布鲁诺·贝特兰 (Bruno Bettelheim, 1903-1990),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 出生于奥地利。

[134]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

[135] 上述引语是一则著名的误植, 并非出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详情可参见1995年11月13日出版的*The Weekly Standard* 中“The Tocqueville Fraud”一文。——编者注

[136] 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 萨德侯爵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 法国贵族、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 尤其以他所描写的情色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 (Sadism) 是性虐恋的另一个称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Alberto Moravia, 1907-1990), 20世纪意大利著名小说家。

[137] 在天主教中只有婚姻内的性爱是圣洁的。

[138] 阿尔伯特·艾利斯 (Albert Ellis, 1913-2007),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在1955年发展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139] 荣归主颂（拉丁语*Gloria in Excelsis*）是基督教用于礼仪的一首诗歌，是礼文的一部分。歌词是从《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2：14衍生出的赞词，在公元2世纪已经开始流传，并由教宗西玛克（498-514年在位）最先把它放入重大节庆的弥撒之中。

[140] 布卢博尔，Blue Ball，意指“患了花柳病后变蓝的睾丸”。因特克丝，Intercourse，意指“交媾”。

[141] 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字面意思是“中性”。

[142] 法庭之友（拉丁语*amicus curiae*），英美法系国家一种特殊的司法诉讼习惯，最初源自罗马法。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对案件中的疑难法律问题陈述意见并善意提醒法院注意某些法律问题的临时法律顾问。

[143] 圣经带（Bible Belt），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俗称保守派的根据地，多指美国南部。

[144] 陪审团任选轮盘（jury wheel），一种装置，其中装有具备担任陪审员资格的人员名单，通过转动，从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名单，以组成特定案件的陪审团。

[145] 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192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年在位。

[146]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1922-2007），美国作家，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147] 乔伊斯卡·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1938-），美国作家。她成长于纽约郊区的工人阶级家庭，1963年发表首部作品，自此之后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她的小说《他们》（Them）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148] 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学一个以塞西尔·约翰·罗德（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命名的为国际留学生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获此奖学金的学者即被称为“罗德学者”。

[149] 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主要以拥有教师学院、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河滨教堂和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而著称。

[150] 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1927-1980），一位有影响力并经常引起争议的英国戏剧评论家和作家。尽管泰南的评论通常尖刻而富有争议，他在戏剧界（尤其是伦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戏剧改革做出了贡献，并且对后来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等人有持续影响。其代表作作为前卫音乐剧《噢！加尔各答！》（*Oh! Calcutta!*），剧中演员全部赤身裸体，是百老汇戏剧史上最出位、最色情，也是最具争议的演出之一。

[151] 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法国作家、电影制片人、“新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橡皮》（*Les Gommages*）、《窥视者》（*Le Voyeur*）等。1961年，他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由新浪潮导演阿伦·雷乃摄制，并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52] 格申·莱格曼（Gershon Legman，1917-1999），美国文化批评家、民俗学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下流笑话的基本原理》（*Rationale of the Dirty Jokes*）。

[153]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家和教师。他与妻子黛安娜·特里林都是纽约知识分子集团的成员，是《党派评论》的撰稿人。他没有创立任何

批评流派，但对20世纪美国批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54] 戈黛娃夫人 (Lady Godiva, 约990-1067)，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妇女。据传说为了争取减免丈夫强加于市民们的重税，她裸体骑马绕行考文垂的大街。

[155] 终端岛 (Terminal Island)，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洛杉矶港和长滩港之间的一个岛屿，岛上设有终端岛联邦教化所。

[156] 黄金海岸 (Gold Coast)，芝加哥最富裕的街区之一，主要由湖滨大道的高档公寓大楼组成，毗邻密歇根湖。

[157] 涂油礼是基督教中极为神圣的一种仪式，曾被作为信徒入教的基本宗教礼仪。后来，它变为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殊政治身份和权利的典礼。

[158] 美国小小姐大赛 (Miss Teenage America)，1961年开始举办，参赛选手年龄在13-17岁之间。

[159] “梳理和洁净” (Groom & Clean)，美国一款美发用品的牌子，在广告中使用了美人鱼的形象。

[160] 普尔台球 (pool)，美式台球，有15个球，区别于英式 (斯诺克，21 + 6球) 台球等种类。

[161] 约翰尼·卡森 (Johnny Carson, 1925-2005)，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国家广播公司 (NBC) 深夜时段著名脱口秀节目《今夜秀》 (Tonight Show)。

[162] 《船长的乐园》 (The Captain's Paradise)，1953年的英国喜剧电影，讲述一艘客轮的船长在直布罗陀和北非一个港口之间来回旅行的故事。

[163] J.保罗·盖蒂 (Jean Paul Getty, 1892-1976)，美国石油商人，1930年其父死时给了他50万美元，以后20年间他在股市和石油界不断拼搏，扩大自己的势力。1953年因在科威特边境打井成功，不到三年就积蓄10亿美元，成为美国首富，以后20年保持这种地位，直到阿拉伯国家把石油收归国有。

[164] 霍华德·休斯 (Howard Hughes, 1905-197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投资人、飞行员、航空工程师、电影制片人、慈善家，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165] 《裸猿》 (The Naked Ape: A Zoologist's Study of the Human Animal)，英国科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 (Desmond Morris, 1928-) 在1967年所写的一本探讨人类行为的科学著作。在书里，他把人类当作一种物种，亦即“裸猿”来看待。通过把“裸猿”与其他动物物种比较，来讨论人类的种种行为。1973年，唐纳德·德赖弗 (Donald Driver, 1923-1988) 根据本书的内容导演了一部电影。

[166] 罗曼·波兰斯基 (Roman Polanski, 1933-)，犹太裔导演、编剧和演员，出生于法国巴黎。导演代表作有《水中刀》《唐人街》《苔月亮》，并以《钢琴家》赢得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0年，罗曼·波兰斯基凭《影子写手》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和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奖。

[167] 帕特里夏·赫斯特 (Patricia Hearst, 1954-)，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1974年2月4日在加州伯克利被美国极左派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

[168] ΦΒΚ协会 (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

1776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后扩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会员的秘密社团，后向女性开放，并转型为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它吸纳并培养在文科与科学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大学生，目前已有280余个分会，超过50万名会员。

[169] 灵缇犬（greyhound），一种用于狩猎和竞赛的狗，是陆上速度仅次于猎豹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英美常用机械兔子来训练灵缇犬的速度。

[170] 胡德营（Camp Hood），指胡德堡的营地。胡德堡（Fort Hood）是美国陆军在得克萨斯州基林附近的一处基地，大部分营房位于贝尔县，其他部分位于科里尔县。该基地是以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盟的将军约翰·贝尔·胡德（John Bell Hood，1831-1879）的名字命名。

[171] 杰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1933-1967），美国女演员，活跃在百老汇和好莱坞。在20世纪50年代，曼斯菲尔德是美国金发性感女性的标志之一。

[172] 臭虫（bug），指窃听器。

[173] 硬毒品（hard drug），容易令人上瘾的烈性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吗啡。

[174] 塔斯马尼亚（Tasmania），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角约240公里的外海，是一座呈心形的岛，与澳大利亚本土最南方的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隔海相望。

[175] 霍华德·科赛尔（Howard Cosell，1918-1995），美国著名体育记者，因他狂暴、自负的性格而闻名。

[176] 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拉丁文学位荣誉中的最高一等。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国家大学的传统，用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有时也作为学位评分的标准。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 Cum Laude，最优等；Magna Cum Laude，极优等；Cum Laude，优等。

[177] 约翰·契弗（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瓦普肖特纪事》（*The Wapshot Chronicle*）获得195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欧文·肖（Irwin Shaw，1913-1984），美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生于纽约，是俄裔犹太移民。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1921-1992），美国作家。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76年出版的《根》（*Root*）和其执笔的《马尔科姆·X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1934-2007），生于美国纽约市，犹太人，著名记者、作家与历史学家。他以对越战的报道而闻名，为普利策奖得主。

[178] 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作家，时任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后于1975年失踪，于1982年被法院宣布死亡。

[179]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180]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演员，1970年凭电影《大地惊雷》（*True Grit*）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81] 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1918-1981），美国演员，1953年以电影《战地军魂》（*Stalag 17*）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1923-2011），美国演员，1968年凭电影《查利》（*Charly*）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82] 鲍勃·霍普（Bob Hope）本名莱斯利·汤斯·霍普（Leslie Townes Hope，1903-2003），是美国著名的演艺者、喜剧演员，曾经出现在百老汇、广播、电视以及电影中。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昵称猫王，美国著名摇滚乐歌手与演员，是20世纪最受欢迎

的音乐家之一，常被称为“摇滚乐之王”。

[183] 地狱天使（Hell's Angels），一个被美国司法部视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摩托车帮会，会员大多骑乘哈雷摩托车。

[184] 戈达德学院（Goddard College），位于美国佛蒙特州的普莱菲尔德，于1863年成立，学院性质为一所综合性文科研究学院。

[185] 哈达瑜伽，一种瑜伽门派。瑜伽有多种门派，相对而言可分为智瑜伽、业瑜伽、信仰瑜伽、哈达瑜伽、王瑜伽、昆达里尼瑜伽六大类。当今世界最盛行的是以调息与体位法为中心的体动瑜伽，即哈达瑜伽。

[186] 倭格昂能（orgone），赖希1939年宣称发现的生命和性所特有的自然力。

[187] 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 1927-2003），美国作家、记者、文学编辑、演员，他的体育报道和协助创办《巴黎评论》广为人知。他倡导“参与式报道”，亲自参加过职业体育比赛等活动，而后记录自己的体验和经历。

[188] 好莱坞弗雷德里克（Fredericks of Hollywood），美国著名内衣品牌。

[189] 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一个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任务目标的服务性组织，1915年1月21日创建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Kiwanis”源于底特律地区的一种印第安语中的“Nunc Kee-wanis”，意为“我们交易”。

[190] “百事一代”（the Pepsi Generation），百事可乐在六七十年代的广告词，指喝百事可乐的一代人。

[191] 巴托比，美国文学巨擘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中一位以“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的古怪角色。

[192] 庞兹归正会（Ponds Reformed Church），美国基督教派，起源于荷兰，是北美洲最早的新教教会之一。

[193] 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1919年由四位著名导演及演员卓别林、范朋克、毕克馥、格里菲斯出资创建，逐步发展成为控制美国电影生产和发行的八大公司之一。在1981年并入米高梅公司，改称为米高梅——联美娱乐公司，以出品007系列电影知名。

[194] 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 1935-），美国电影导演，生于芝加哥。1971年导演的《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1973年导演了轰动世界的《驱魔人》（*The Exorcist*），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等。

[195] 父女纯洁舞会（Father-Daughter Purity Ball），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市（科罗拉多州）一年一度的活动。在舞会上，父亲们会阅读一份契约，发誓将尽力保护女儿的贞洁，并在承诺书上签名。纯洁舞会始于1998年，在科罗拉多州首先兴起，现在已经在全美普遍开来。

[196] 老大党（Grand Old Party, GOP），共和党的别称。

[197] 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指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出现的数次复兴运动，由福音派牧师领导，延续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18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首次大觉醒运动由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领导。

[198] 海斯办公室（Hays Office），威尔·海斯（William Hays, 1879-1954）主持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时，对该协会的俗称。1922-1945年，海斯

担任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 MPPDA）主席。他的事务所曾为美国电影业制定自我审查制度。

[199] 美国法律史上性骚扰案的著名案例。1991年，俄克拉何马州大学的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 1956-）在国会听证会上指控当时刚被布什总统提名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 1948-）对其实施了性骚扰，导致后者差点失去担任大法官的机会。

[200] 休·海夫纳于2017年9月27日在美国家中离世。——编者注

[201] 该传记《塞缪尔·罗思，声名狼藉的现代主义者》（*Samuel Roth, Infamous Modernist*）2013年出版。——编者注

[202] 巴尼·罗塞特于2012年2月21日在美国纽约去世。他的自传《罗塞特：我的出版生涯与我是如何对抗审查制度》（*Rossett: My Life in Publishing and How I Fought Censorship*）在2016年由OR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03] 约翰·威廉森于2013年3月24日在内华达州去世。直至去世，他与芭芭拉·威廉森仍保持着婚姻关系。——编者注

[204] 原书名是Masters of Sex，既是传主马斯特斯的姓氏，又有“大师”（复数）的意思。该书于201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版。——编者注

[205] 弗吉尼亚·约翰逊于2013年7月24日在圣路易斯市去世。——编者注

[206] 阿尔·戈尔茨坦于2013年12月19日在纽约去世。——编者注

[207] 原文是法语，Toujours soixante-neuf。

[208] 查尔斯·基廷于2014年3月31日在亚利桑那州去世。——编者注

Thy Neighbor's Wife by Gay Talese

Copyright©1980 , 2009 by Gay Talese

Forward©2009 by Katie Roiphe

Portions of this book have appeared in Esquire magazine.

Copyright©1975 ,

1979 by Esquire, Inc.

A hardcover edition of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0 b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Horizon Media,
Co. , Ltd. ,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ALL RIGHTS RESERVED